

第二国际史

周海乐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第二国际史

周海乐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广勇

封面设计 邹越非

第二国际史

周海乐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4 字数52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 SBN 7—80515—344—2/K·42

定价: 8.60元

为 纪 念
第二国际成立一百周年
而 作

目 录

序言：独树一帜的丰硕成果，深入研究的 良好开端	高 放
1. 1989年在六重意义上值得纪念和反思.....	1
2. 以往研究第二国际的三家著述概况.....	3
3. 本书自成一家，特点鲜明.....	7
4. 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15
前 言	21~45
第一章 从解散旧国际到创建新国际 (1876~1889)	46~98
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	48
1. 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	48
2. 罢工斗争的蓬勃高涨.....	52
3. 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普遍建立.....	55
4. 工人组织的发展.....	58
二、恢复旧国际的尝试	63
1. 对无政府主义国际的反叛.....	63
2. 从根特大会到库尔大会.....	66
3. 创建新国际的时刻尚未到来.....	67
三、创建新国际的领导权之争	70
1. 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势在必行.....	70
2. 排斥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大会.....	74

3. 伦敦国际工会组织代表大会前后	77
4. 为孤立可能派而战斗	80
四、两个同时召开的国际大会	86
1. 鲜明的对比	86
2. 合并尝试的失败	91
3. 新国际的实际开端	94

第二章 始初奠基和凯旋行进时期

(1889~1896)99 ~ 178

一、争取国际劳动立法	101
1.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由来已久	101
2. 工人阶级当前经济要求的系统纲领	105
3. 劳动立法与劳动解放	111
二、团结、战斗的“五一”	116
1. “五一”的历史沿革	116
2. 划时代的五月行动	121
3. “五一”决议的完善和发展	125
三、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	132
1. 新形势下的工会运动	132
2. 罢工和抵制	137
3. 国际工会组织的建立	142
四、对无政府主义的新胜利	145
1. 无政府主义者的重新组合	145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分歧	150
3. 从国际内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	157
五、凯旋行进中的国际工人阶级	161
1. 组织程度的提高	161

2. 议会斗争的胜利·····	166
3. 罢工运动的发展·····	169
4. 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174

第三章 深入发展和内部论争时期

(1896~1914)·····179~331

一、“伯恩施坦问题”的发端 ·····	181
1. 一次危险的“脱毛”·····	181
2. 斯图加特遭遇战·····	186
3. “伯恩施坦问题”的提出·····	192
二、入阁论争 ·····	195
1. 米勒兰入阁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195
2. 入阁论争国际化·····	203
3. 反对修正主义的德累斯顿决议·····	211
4. 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	215
三、殖民政策风波 ·····	221
1. 国际面临的新课题·····	221
2. 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揭露·····	224
3. “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提出·····	229
4. 一场针锋相对的论争·····	235
四、在总罢工问题上的激烈较量 ·····	239
1. 过去论争的余波·····	239
2. 不同类型的总罢工·····	241
3. 从耶拿向曼海姆退却·····	247
五、军国主义、战争和革命 ·····	256
1. 由理论分析到实际行动的转折·····	256
2.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胜利·····	259

3. 一场没有完结的论争·····	268
4. 国际社会党人的反战誓师·····	274
六、国际局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279
1. 国际组织机构的酝酿过程·····	279
2. 国际局工作方法问题的争论·····	283
3. 创建国际局的附属机构·····	286
4. 声援俄国1905年革命·····	291
5.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国际局·····	298
6. 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	300
七、深入发展中的国际及其成员党·····	307
1. 国际自身的发展·····	307
2. 工人国际组织的普遍建立·····	311
3. 无产阶级反战的国际运动·····	317
4. 德国党内日益严重的危机·····	321

第四章 危机加剧和公开分裂时期

(1914~1920)·····332~459

一、陷入泥潭的德国党·····	333
1. 党内机会主义统治的最终确立·····	333
2. 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案的恶劣先例·····	337
3. 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否定·····	340
4. 排斥、打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343
二、世界大战前夕的国际局·····	346
1. 危险的和平幻想·····	346
2. 对俄国党内事务的国际干预·····	353
3. 未开成的代表大会·····	358
4. 七月危机和国际局·····	362

三、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前后 ·····	366
1. 前台和幕后·····	366
2. 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案·····	370
3. 国际性“雪崩”·····	376
4. 左派的崛起·····	381
四、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道扬镳 ·····	387
1. 各国人民的反战斗争·····	387
2. 中派主义者的微妙变化·····	392
3.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孤鸿哀鸣·····	398
4.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内部的激烈较量·····	402
5. 一场新的“和平”喧闹·····	413
五、革命道路问题上的两军对垒 ·····	416
1. 对帝国主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416
2.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国际反响·····	428
3. 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433
六、第二国际组织上的分裂 ·····	443
1. 创建一个工人的革命国际·····	443
2. 共产国际的成立·····	446
3. 第二国际的恢复·····	450

第五章 内部分化和重新组合时期

(1920~1923) ·····460~529

一、“第三种势力”的形成 ·····	462
1. 中派的历史发展·····	462
2. 中派政党对第二国际的背离·····	466
3. 对第二国际传统理论的修正·····	471
二、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建立 ·····	474

1. 中派政党同共产国际的谈判·····	474
2. 社会党和国际工人组织的分裂·····	483
3. 伯尔尼预备会议·····	491
4. 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建立·····	495
三、三个国际执委会柏林会议·····	499
1. 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	499
2. 实现国际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不同方针·····	505
3. 三个国际执委会柏林会议·····	509
4. 九人委员会首次会议·····	514
四、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	517
1. 维也纳国际向伦敦国际靠拢·····	517
2. 维也纳国际的终结·····	520
3. 汉堡合并大会·····	522
第六章 第二国际和中国·····	530~597
一、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交往的先行者·····	532
1. 孙中山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532
2. 孙中山访问国际局书记处·····	540
3. 梁启超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会晤·····	545
二、第二国际关注着中国·····	549
1. 密切地注视中国事态的发展·····	549
2.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评述·····	555
3. 辛亥革命在第二国际中的反响·····	558
4. 王德威尔得的中国之行·····	562
三、中国社会党和国际局·····	569
1. 江亢虎及其社会主义观·····	569
2. 中国社会党的创建和分裂·····	571
3. 加入第二国际的尝试·····	577

四、世纪之交中国舆论的反响	580
1. 《万国公报》等刊物对国际大会的介绍.....	580
2. 对国际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反应.....	585
3. 中国人心目中的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589
4. “五一”在中国.....	593

附 录（王素萍编）

1. 第二国际历史大事记要.....	598
2. 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概况.....	616
3.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概况.....	628
4. 工会组织一览表.....	639
5. 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一览表.....	644
6. 文献论著目录.....	665

序言：独树一帜的丰硕成果， 深入研究的良好开端

高 放

一、1989年在六重意义上值得纪念和反思

1989年是非常值得纪念和反思的一年。它是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和法国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第二国际建立的一百周年，第三国际建立和我国五四运动的七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四十周年。适逢大周年纪念的以上六件大事，其中两件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大事，两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事，两件是我国革命的大事，应该说它们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1789年华盛顿在领导美国取得独立后开创的有任期、有制约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和法国革命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指明了近现代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是这种体制和这些理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总有重大缺陷或者难以完全实现。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才能真正达到并超过这些目标。正是在18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这一天，国际社会主义者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大会的报告指出：“多么美妙的梦想！在一百年前曾经宣布了人权原则的巴黎，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者的代表兄弟般地欢聚一堂，团结一致，郑重地宣布：不争得劳动权，不把正义和平等变成全人类关系的准则，他们就决不罢休！”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标志着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第二国际的建立。第二国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起1847年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

产主义者同盟)和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以来展现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大旗。正是在第二国际活动期间,社会主义思想于20世纪初开始传播到中国,1905年孙中山第二次到欧洲访问期间曾经申请加入第二国际。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中国社会党即于11月5日在上海成立,该党绍兴支部曾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著《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1913年7月15日还成立了万国社会党(即第二国际)上海俱乐部,约定会期每月两次。第二国际确实曾经在中国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1919年3月4日建立的第三国际,实际上继承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成果,把革命思潮播向四方,播向东方。五四运动揭开了我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先是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随后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我国较为系统而自觉的传播。五四运动是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独立、民主、共和”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移植并运用到中国的重要的新起点。这时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无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后,探索了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几经沧桑,几度波折,1949年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为中国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可惜由于第三国际对资本主义和第二国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强调高度集中领导,以苏联模式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样板,“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不能不使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还继续蒙受其害。过粗地消灭封建主义(以为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就完成了反封建主义历史性任务,以致保留了大量封建主义糟粕),过早地结束新民主主义,过急地消灭资本主义,过高地建立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甚至还要跑步抢先进入共产主义,这样势必严重地阻碍并破坏我国的建设事业。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第三国际“左”的指导思想和大党主义、高度集

中的干预，也长期处于内耗和分裂状态。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新实践以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拨乱反正、重新联合的新形势，使我们深感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应当重新总结，第二国际的优秀遗产需要重新挖掘。要使我们党和各国共产党完全摆脱第三国际的不良影响，真正承担起领导好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任务，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和优秀遗产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只要我们善于撷取第二国际的积极成果，彻底清除第三国际的不良影响，同时善于从二百年前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七十年前五四运动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彻底清除各种封建主义糟粕，认真全面筛选资本主义精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必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从这方面来看，我国学者撰写并于1989年出版一部第二国际史的学术专著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二、以往研究第二国际的三家著述概况

历来对第二国际史的研究，就其观点分类主要有以下三家。

第一家是按传统的第二国际观点写的，一般是全面肯定第二国际右翼的改良主义主张。早在1913年出版的龚培尔—莫勒尔所编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中，就有卡尔·马克思的外孙、第二国际和法国社会党领袖让·龙格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书法文本，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第二国际史的较全面而详尽的专著，全书648页，分述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和决议案，社会主义国际局的组织和活动以及各国、各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概况。这本出于当时第二国际领导人之手的最早的第二国际史，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可惜尚未有中译本。1919年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后，第二国际的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于1920年推出名为《国际的过去和现在》的德文小册子，简述第二国际的历史，特别为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背叛行为辩护，同时阐明恢复活动后的第二国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后来系统的论著有英国麦克米

伦出版公司1956年出版的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G·D·H·柯尔著英文多卷本《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第三卷《第二国际(1889~1914)》，分上下两册(商务印书馆已于1981、1986年出版中译本)。此书不仅写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除了开头两章集中写第二国际前后期活动外，用二十五章篇幅分述这一时期各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社会党国际的前书记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以“三朝元老”的经历(他于1907年出席过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参加过历次社会党国际会议，并一度担任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国际书记助理，1949~1956年任社会党国际书记)，于1961~1971年间完成德文三卷本《国际史》(分别于1961、1963、1971年由柏林一波恩迪茨出版公司出版)，综述自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来至1964年为止的国际社会主义史，其中第一卷后半部和第二卷前半部为第二国际史(这两卷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5、1986年出版)。此书基本观点虽然与前几种大体相同，但是在写法上却不象龙格和柯尔的专著，不是着重写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各洲各国的主要活动，而是按第二国际先后发展中面临的若干重要问题来写。

研究第二国际史的第二家是按第三国际观点写的，一般是对第二国际、尤其是对后期的第二国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多方面批判第二国际的错误。这方面最早的论著是1920年英文版的英共建党初期党员、后来成为英共副主席和著名历史学家的帕姆·杜德著《两个国际》和1921年法文版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资深活动家和史学家路易著《世界社会主义的危险(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期间)》。这两部书都是叙述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活动中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如何逐步滋长，终于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招致彻底破产；十月革命后第三国际如何在与第二国际斗争中创立，重振旗鼓，与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1930年德国

汉堡—柏林卡尔霍姆出版社出版德共历史学家约·连茨著《第二国际及其继承者》，此书按五个时期分五章依次论述从1889年至1929年四十年间第二国际的兴亡和第三国际的继起，1964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时采用英译本书名《第二国际的兴亡》。1955年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美共主席威廉·福斯特著《三个国际的历史》（已有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其中第二篇分十三章大体上按历次代表大会顺序分述从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至1914年第二国际破产为止第二国际的全部历史。1956年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德共历史学家罗兰·鲍威尔著《第二国际(1889~1914)》小册子，分前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期，以历次代表大会为主线分述第二国际的历史（该书已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伦敦出版英共副主席帕姆·杜德新著《国际》，概述几个国际组织的历史，其中包括第二国际史。同年巴黎出版若·豪普特著《第二国际(1889~1914年)》法文本。作者是罗马尼亚人，曾任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据说是罗共党员，1958年移居巴黎，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对第二国际研究尤多，曾参与主编出版《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记录》共二十三卷，除历次大会记录外还包括上述龙格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等论著和国际局文件。《第二国际》一书是他对第二国际史料和论著的批判性研究成果，1970年经增补扩充后以《纲领和现实》为题出版德文译本。此外，1965年还出版法文本《未开成的代表大会》，这是他对预定于1914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和筹备情况的研究成果。这次代表大会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开成。1978年他刚届“知天命”之年（50岁），不幸死于车祸。苏联史学界虽然于1928年和1935年出版过史学家卢利耶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间》与《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产生》，但是关于第二国际较完整的专著直到50~60年代才开始出现。这同斯大林全盘否定第二国际的指导思想显然密切相关。直

到1958年，即斯大林逝世后五年才出版列宁格勒高级党校教师И·М·克利沃古斯同С·М·斯切茨凯维奇合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已有三联书店1960年版中译本），1959年苏联又出版克里沃古斯在列宁格勒高级党校的讲义《第二国际（1889～1914）》单行本。1963年苏联出版С·А·莫吉列夫斯基著《第二国际的复活》，专写1919～1923年这一段的第二国际（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中译本）。1965和1966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国际史》两卷本（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下集体编写，И·Л·祖波克主编，此书已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中译本）。1976年苏联开始出版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七卷本，其中第二卷后半部和第三卷前半部集中论述第二国际（该书第二卷已由工人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中文译本）。后两部著作可以说是苏联学术界研究第二国际的新硕果。书中已经开始注意克服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影响下对第二国际作出的一些错误结论，但是仍然处处以列宁当年的论述为依据，并没有以近几十年的实践来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问题，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

研究第二国际史的第三家是西方学者，他们一般是持超国际、超党派立场，既不站在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一边，也不站在第三国际和共产党一边，较为注重实际材料，自认为客观、公正，实际上观点常有偏颇。有的人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1921年英国出版雷·波斯盖特著《工人国际》，书中写了三个国际，但是写得很简略，对马克思多有诋毁。1929年美国出版莱沃斯·洛尔温著《劳工与国际主义》，作者虽然持自由主义立场，但是书中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福斯特在《三个国际的历史》中曾多次引用此书。196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胡佛研究所九个研究人员撰写的《几个革命的国际》，从1864年第一国际写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书中第二部分专写第

二国际，对第二国际的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肯定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的经济理论。这部二百多页的集体论著可以说是西方研究三个国际的较新的权威性成果。1975年英国韦登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公司出版F·W·迪金著《世界共产主义史》，书中包括第二国际史，他把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看作是正统学说与异端的斗争。

三、本书自成一家，特点鲜明

我国学术界对第二国际的看法长期以来深受第三国际和苏联“左”的影响。尤其是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在反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经常以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作为靶子，这样更不可能对整个第二国际作出公正的评价。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册子《第二国际》，即便是作为“历史知识读物”，也不免带有浓厚的时代痕迹，例如强调第二国际内部左派自始至终地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而且常常责备左派斗争还不彻底。当时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和专著基本上也都是持这种论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路线，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此我国学者开始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重新研究第二国际史。中共中央编译局殷叙彝同志写的《第二国际史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载1979年12月出版《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6辑）和李兴耕同志写的《关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对第二国际的评价》（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4辑）等文，是我国学者研究第二国际史带有拨乱反正性质的新的重要成果。为了给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五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三个国际和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提供大量原始资料，我国有关部门于1983年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委会，组织翻译了包括第二

国际在内的全部国际文献，已于1986年起陆续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为深入研究第二国际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海乐同志从1986年起集中力量编著《第二国际史》，充分使用这些原始资料，借鉴前人劳绩，立足超越创新，埋头苦干三年，取得丰硕成果。赶在1989年第二国际成立一百周年之际问世的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可以说是我国学者研究第二国际的第一部学术珍品。我粗读书稿之后，感到本书从观点、内容到体例和写法，都区别于上述三大家，可以说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对第二国际的基本评价上，改变了以往认为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性质或者后期蜕变为机会主义性质的传统观点，经过具体分析，得出了第二国际整个说来是“革命的国际”的新结论。斯大林于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①“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②这个看法支配了整个国际共运几近半个世纪之久。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夸大其词，不合实际，连时间都对不上号。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列宁于1887年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他就出国，参与国际工人运动。曾经引导列宁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范师”普列汉诺夫参与了创建第二国际的工作，并且在第二国际中长期坚持反机会主义、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本人从20世纪初起就直接参加第二国际的工作，甚至直接出席第二国际1907年和1910年的两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事实上恩格斯和列宁在革命工作的时间上也是紧密相连的，怎么能够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时代”呢？本书作者从当时时代需要和斗争要求、

^{①②}《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71页。

第二国际本身的实践活动、机会主义同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关系以及战后第二国际重新组合为改良主义国际的原因这样四个方面着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国际，其间机会主义的影响确实存在，有时甚至很嚣张，但是并未成为一股足以左右国际前进方向的力量，也没有在国际大会（会议）上占上风，更未使第二国际蜕变为机会主义的国际。我认为这个新见解是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

第二，不仅在对第二国际性质的认识上，而且在对第二国际内部争论、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也有新突破。既不固旧说，着力纠正传统“左”的观点，又不是随意附和西方一些右的观点，力求既从当时实际出发，又考虑到后来实践的检验和新发掘的材料，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例如关于1900年法国独立派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担任部长一事，传统观点是谴责考茨基的“橡胶性”（原译“橡皮性”）决议，认为它调和折衷，袒护了米勒兰的背叛行为，“替象米勒兰这种机会主义投机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①而西方社会党人的著作，如柯尔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和布劳恩塔尔著《国际史》则限于单纯叙述考茨基的决议案及其在巴黎大会上通过的情况，不加评论，不分析其是非功过。柯尔在介绍考茨基所承担的草拟文件的任务时，这样说：“其措词既要使中派感到满意，并解除极左派的武装，同时又不致于把右翼赶出第二国际，也不致于使饶勒斯丧失立足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考茨基草案持完全

^①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9页。

^②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9～50页。

赞许的态度。本书在具体阐明巴黎大会争论的过程并且对比了会上各种主张之后指出：在米勒兰入阁问题上，考茨基确曾动摇过，但是他所采取的并不是饶勒斯、奥艾尔等人所采取的支持、纵容、包庇的立场，而是持谴责、反对的态度，只不过反对不那么坚决，谴责不那么明朗罢了。所以很难从中得出考茨基的“橡胶性”决议的“弹性”已弹向机会主义一边，甚至包庇机会主义者，为右派作掩护的结论。我认为这种评价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其它象历来有争议的爱尔福特纲领的性质，考茨基在反伯恩斯坦斗争中的作用，中派集团的形成时间等问题上，作者也都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在内容上拓展了一些新领域。以往的第二国际史专著一般都是着重写历次代表大会以及两次大会之间国际工人运动的事件和活动，对于第二国际的常设机构社会主义国际局只是简略提及。本书第三章第六节和其它章节集中叙述了国际局的成立及其活动，包括国际局的酝酿过程，国际局工作方法的争论，国际局附属机构的创建，国际局对重大国际事件的态度，国际局十六次全体会议和日常工作，等等。这样便于读者对国际局获得全面而具体的了解。以往的第二国际史专著一般都只是写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为止。对于以后有关第二国际的活动只是简略提及，或是从筹建第三国际的角度来写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国际左派反对中派和右派的斗争。本书不仅写大战期间左、中、右三派的活动，而且写战后第二国际恢复活动的情况。关于战时和战后第二国际的活动，几乎占全书篇幅三分之一，这个新领域往常是被人们忽略了的。

第四，在内容上独辟一章“第二国际与中国”，这是很有特色的。早在1986年设计全书结构时，我就建议作者一定要加上这一章，这是外国人写第二国际史一般都不注意的一个偏僻领域。这不仅因为我们中国人写第二国际史要格外关注这一问题，而且

还涉及东西方革命如何开始交接和交融的问题。第二国际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它与东方大国中国革命建立的直接联系，应该说是世界和中国今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可以说，正是第二国际开始在中国架起了沟通西方革命与东方革命的桥梁，后来第三国际进一步拓展了这座桥梁。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瞩目中国的革命，这方面我们已较熟悉。后来威·李卜克内西在1900年临终前的最后一次演说中也曾坚决谴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武装入侵，预见到亚洲即将觉醒，并且深信中国革命意味着“一个世界性的转折”。十年前我初次见到关于孙中山申请加入第二国际的英文材料，于1979年初把它译为中文，并写出《孙中山与第二国际》一文。^①我还读过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等报刊上登载过介绍第二国际的文稿，并且了解一些中国社会党与第二国际交往的情况，所以感到如果能够专写一章“第二国际与中国”，那是很有特色的。我很高兴作者采纳了这个建议，认真下功夫挖掘了很多新材料，如第二国际对中国事态发展的关注，国际局和孙中山，王德威尔得的中国之行，梁启超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交往等等，都是很新颖、很有意义的。作者所开垦的这一块“第二国际与中国”的处女地，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对第二国际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第五，关于第二国际史的下限，通常是断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甚至连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著《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也是只写到1914年。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虽然未能召开代表大

^①此文原载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讯》1979年第3期，1984年12月1日《团结报》转载，后又收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中山先生轶事》一书。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曾于1980年8月将本文译为英文送交意大利葛兰西学院。

会，但是左、中、右三派都在继续活动，并且分别召开过国际性会议，国际局的头头脑脑也在四出奔走。作者认为，第二国际于1914年发生思想政治方面分裂之后，它作为一个组织实体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其作用。当时左派继续坚持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大部分中派也力图维护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只有右翼机会主义集团才篡改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并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战后恢复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曾一度出现转机，由于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人为阻力，使其终于破灭，形成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国际，至此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的历史才宣告终结。基于这种新看法，本书增写了第五章，从战后第二国际内部分化和重新改组着手，具体叙述维也纳国际（即第二半国际）及中派政党起初背离第二国际、倾向第三国际，尔后又远离第三国际、与伦敦国际合并的历史过程。本书把第二国际的下限从1914年8月推迟到1923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建立之前，这是一种新的见解和写法。

第六，由于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得到确认，同时下限延长九年，这样整个第二国际史的分期就要重新考虑。以往通常把第二国际分为两个时期或三个时期，即所谓二分法或三分法。二分法就是把第二国际史分为前期和后期。其中，以恩格斯逝世为标志分为1889~1895年和1895~1914年两个时期；以伦敦代表大会为标志分为1889~1896年和1896~1914年两个时期；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为标志，分为1889~1899年和1900~1914年两个时期；以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为标志分为1889~1904年和1904~1914年两个时期。三分法就是把第二国际史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即1889~1895年、1896~1904年和1905~1914年三段。三分法虽然比二分法更细致地考察第二国际各个时期面临的具体任务的变化和内部机会主义逐步滋长的过程，但是仍旧把第二国际史

的下限断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书作者基于以上对第二国际性质和活动全过程的新看法，把第二国际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四分法：第一时期，始初奠基和凯举行进时期（1889～1896）；第二时期，深入发展和内部论争时期（1896～1914）；第三时期，危机加剧和公开分裂时期（1914～1920）；第四时期，内部分化和重新组合时期（1920～1923）。这种分期法是第二国际史研究中的一种新发展。不过在文字表述上，我认为有的还可以细加推敲。例如，如果把第三时期改为公开分裂和内部对立加剧时期，把第四时期改为恢复国际组织和重新组合时期，这样也许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后两个时期的实际和变化。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第二国际各派就因对帝国主义战争持不同态度而公开分裂了，并不是危机加剧在先，公开分裂在后；在公开分裂之后，内部三派的对立战争期间愈益加剧，而第二国际内部三派的分化早已出现于战前，很难说到战后才开始出现内部分化。这可能是吹毛求疵的意见。

第七，关于第二国际史的写法，历来各家大多偏重于以历次代表大会为主线，详略不同地叙述每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包括开会时间、地点、与会者构成、议程、争论情况和决议等等，再加上大会的历史背景和两次大会之间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事。由于第二国际的活动主要是几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因此这种写法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然而总难免给人们留下单调、枯燥的印象。从龙格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到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在代表大会这条主线之外，又另加上在第二国际影响下这个时期各洲各主要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样拓展了领域，使人们视野更加宽阔，很有好处，但是又令人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布劳恩塔尔著《国际史》一反常规，另辟蹊径。他甚至没有简述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在介绍1889第一次代表大会情况之后就转到分述欧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概

貌，然后提出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进而分为进化和革命、总罢工、殖民地以及战争这样四个问题，加以综合评述，有时还追溯到第一国际。这样写法姑不论其归纳的问题是否全面，总给人以纲举目张之感，颇有新意。但是我认为这种以“论”为中心的写法，在一部历史专著中，不能不使人感到历史线索和历史进程不清楚。本书借鉴前人利弊得失，扬长避短，融汇诸家优点，采取“以史为经，以论为纬，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精心设计全书结构。前五章即按第二国际的创建和上述四个发展变化时期划分。各个历史时期再按历史顺序抽出若干重点问题加以述评；最后一章专写第二国际与中国，其中也按历史顺序集中到几个要点开展铺叙。这样既勾勒出历史线索，又便于在具体问题上总结历史经验。这种经纬交织、史论兼顾的写法，使人们容易比较完整而清晰地把握第二国际的全貌。

第八，博采丰富史料，不作抽象议论，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在研究中，博览群书，广泛阅读了大量资料，主要有以下三部分：1. 第二国际的原始档案，包括历次会议的报告、发言、讨论记录、决议案、公报，还有当时当事人的来往书信等。除了已译成中文出版者外，还直接援引了已译成中文未出版和从外文选译的珍贵材料。2. 前人有关第二国际的论著，包括恩格斯、拉法格、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列宁、斯大林等领导人和活动家的论述，已译成中文出版的福斯特著《三个国际的历史》、连茨著《第二国际的兴亡》、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等等，还有解放前出版的张云伏著《国际运动史》。此外，还参考了未译成中文的龙格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豪普特著《未开成的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和大战》、格仑堡著《国际和世界大战》，以及豪普特等编《第二国际与东方》。3. 有关历史背景和各时期经济政治状况的资料，包括事件、人物、报刊、组织、统计数据等等，除了援引国内已出版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国际工运史知

识手册》、《国际共运史大事记》外，还从外文著作中选取一些新资料，主要有俄文版的《世界经济简史》和《19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人民的罢工斗争》、英文版的《世界共产主义手册》、德文版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组织》等。由于资料翔实，所以立论根据较为充分。书末附录中的六个资料也很有学术价值。

这部专著由于有以上这些特点，可以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学者能够以这样一部具有国际水平的、开拓型的、创造性的论著参与世界各国纪念第二国际成立一百周年的活动，这是值得引以自豪的。

四、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 和深远意义

第二国际成立以来的一百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89年的时候，欧美刚建立了十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有的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处于政府非常法令限制之下无法公开活动；如今已有十五个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着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有二十八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掌握政权，探索另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三世界大约有四十个民族主义政党掌握政权，也主张要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蔚为世界的潮流。一百年前第二国际规定的“五一”节，当今已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它提出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目标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达到，在发达国家已远远超过。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正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借鉴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结合现实情况，采取正确对策，这样才能乘风破浪，开辟未来前进的航道。

本书有关章节和最后结语从许多方面总结了第二国际的历史

经验。我认为当年第二国际遇到的问题至今在很多地方还困扰着当代共产党人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认真思考当时第二国际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在当今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里我想简要地提出如下几点。

第一，第二国际活动的年代，世界正处在由蒸汽时代过渡到电气时代、由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交叉点上。正确地认识新旧时代的交替，是制定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当时拉法格、卢森堡、布哈林、列宁等人先后对帝国主义新时代进行了研究，对时代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则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等等“新设想”。后来历史的发展检验了各种理论观点。当代在时代方面是否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并作出明确回答的新课题。我认为当代正处于由电子时代过渡到光子时代、生物工程时代，由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社会资本主义时代，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对抗和冷战共处时代过渡到和平共处、协作和竞争时代，由战争与革命时代过渡到和平与发展时代。

第二，关于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使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第二国际为防止战争、保卫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即便象饶勒斯这样的改良主义者，也为争取和平牺牲了生命，惨遭沙文主义者暗杀。但是当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却转向保卫帝国主义祖国的立场，犯了严重错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注意力已转向进行高科技的竞争，不可能形成两个军事集团，但是分别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却形成了两个军事集团。以往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使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而在核武器时代，核战争意味着全人类的毁灭。所以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当代全世界人民的首要任务。如

果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的主要错误是犯在战争爆发之后的话，那么当代人们可能犯的主要错误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保卫和平不得力。

第三，关于殖民政策和民族解放运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推行殖民政策，残酷压迫剥削殖民地人民，疯狂镇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世界大战。第二国际揭露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声援并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这完全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万一科尔等右翼鼓吹所谓“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变种。当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被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所摧毁，但是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受到发达国家的盘剥，面临加速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推行带有“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性质的各种方针政策，应该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大力支持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应该认清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

第四，关于国际利益与民族利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第二国际右翼领袖在战争和殖民地问题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只顾本国帝国主义和宗主国的民族利益，推行狭隘爱国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国际利益和国际主义，把自己民族的利益和狭隘爱国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利益和国际主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反过来说，如果只顾国际利益、只讲国际主义，而轻视甚至无视民族利益，背离爱国主义，那也会严重脱离某些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当今无产阶级已经在十几个国家占领导和统治地位的新历史条件下，更要防止借口国际利益和国际主义而损害别国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的各种言行。当国际利益和民族利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发生矛盾时，如何本着互尊、互利、互助、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这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

第五，关于改良与革命。第二国际曾经就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发生过尖锐的争论和对立，主要是逐步的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之

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改良与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改良成效不大，革命却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又扩展为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今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在发生重大变化，难以形成暴力革命的形势，通过长期逐步和平改良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看来是现实主义的可行之路。第二国际进行合法斗争、争取逐步改良的历史经验值得重视。应该改变把改良与革命完全对立起来的旧观念，努力探索使逐步改良取得进展的新路，同时要做好决战时刻激烈斗争的准备。

第六，关于国际统一组织与各国独立自主。第一国际在建立初期较为注意各国支部的自主问题，但是在后期未免过于强调总委员会的高度集权。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本身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国际组织，主要只限于几年一度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作出决议，这些决议对各国党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平时不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允许各国党独立自主地发展。这是第二国际这种国际统一组织成功的经验。当然，在第二国际中后期，内部意见分歧尖锐之时，第二国际显得过于松散、软弱，已暴露出缺陷。后来第三国际又过分高度集权，严重妨碍各党的独立自主。总的说来，国际统一组织应该较为松散，才有利于各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各党发生意见分歧时应该求同存异，留待实践检验，不断重新总结。

第七，关于团结和分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要尽量广泛地团结、联合无产者中的各种派别，善于求同存异，善于通过实践检验来逐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不能急于用组织手段来简单地处理思想认识不同的问题。当分裂成为不可避免时，也要尽量缩小规模，减少裂度。在不同派别之间还要争取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建立联

合阵线，统一战线首先应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建立之初，都团结了工人运动当中各派，较好地处理这一问题；可是后期，当分裂成为不可避免时，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本来在1919~1923年间，三个国际存在重新联合的转机，确实由于受到右和“左”两方面的干扰，致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陷于更深的分裂状态。长期实践证明，共产党和社会党这两支社会主义队伍如果团结不好，联合不起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和胜利的。这一点在当代和未来显得更加重要。

第八，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它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斗争经验的逐步积累而不断向前发展。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又要反对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国际内部在种种问题的分歧和论争中，出现过教条主义，但是更加严重的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使第二国际主要政党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站到错误立场，以民族沙文主义来修正国际主义。正是社会沙文主义导致第二国际在政治思想上破产。如果说第二国际右翼领袖的主要错误是修正主义的话，那末后来第三国际的主要错误则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与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相结合，长期严重危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至在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后，还长期继续肆虐。从4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无的放矢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下使教条主义更加泛滥成灾。当今时代的新变化、世界的新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彻底铲除教条主义，努力向前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真正划清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我们也可以借鉴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

以上八个问题，本书虽然大部分都已论述到，但是由于篇幅有限，有的似乎还欠充分。这些还有待今后第二国际史研究者进

一步更加深入地探讨。

当今世界上各种主要的国际性政治力量都有国际组织，如自由党和民主党组成的自由国际，保守政党组成的国际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基督教民主党国际，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组成的社会党国际，连蕞尔小党托派也还有第四国际，唯独共产党缺少国际组织，这在国际政治中是不正常的。战后各国共产党人曾经采取过国际联合的新形式，如建立几国共产党情报局、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终因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干预，未能处理好各党之间的分歧，以致未获预期效果。可喜的是，近年来各国共产党之间，尤其是中苏两大党之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已逐步接近，各党之间的关系也大有改善。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经过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独立自主的探索，待到各党自主意识和自立力量进一步增长，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得到较为彻底克服之时，建立新的共产党国际联合组织的问题，自然又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此事大概要到本世纪末才能成熟。到那时，类似第二国际这种松散的、不妨碍各党独立自主的国际组织形式，将是值得借鉴的。从这方面来看，深入研究第二国际丰富的历史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蕴含着开拓未来的深远意义。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会成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术界探究第二国际史的良好开端。

1988年12月12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顶斋

前 言

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自主联合的第二国际，自成立以来，已有100个年头。在此期间，许多国家的史学家，从不同角度，按不同观点，对它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出版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国际史著作。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起步较晚，但是在对世界近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已涉及第二国际史这一专门领域，并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是作者力图吸收先行者成果、探索新路的一种尝试，并以此作为第二国际世纪之庆的由衷奉献。

第二国际史，属于国际工人运动史的一个专门领域。与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不同，第二国际在地位、性质和分期等方面有其特点。研究这些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揭示第二国际形成、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第二国际，从成立至重新组合，共经历了34年（1889～1923）。其时限，仅次于已实际存在37年的社会党国际（1951～1988），远远超出第一国际（1864～1876，12年）、第三国际（1919～1943，24年；实际上，1935年“七大”后，即已停止活动）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汉堡国际，1923～1940，17年）。不仅如此，第二国际还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人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所处的时代看，如果说，第一国际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国际组织，第三国际是帝国主义时代旨在进行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的世界性政党，那么，第二国际则是介乎两者之间、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国际联合。这种时代和历史的特点，决定第二国际既不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也不完全是革命高涨年代工人开展革命运动的手段，而是一个由历史转折时期赋予多种任务的工人国际。它既承担着革命和平发展时期教育、培养、锻炼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又肩负着革命高涨年代宣传、动员、组织各国工人政党和团体的艰巨任务。它所面临的问题之广泛，所迎接的挑战之尖锐，所应处理的矛盾之复杂，为整个国际史所罕见。这种转折时期的历史特点，反映到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内，形成了思想十分活跃、论争极其激烈、理论空前繁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它贯串于第二国际活动的大部分时期，为后世留下了历史转折时期开展国际工人运动的宝贵经验。从广阔的时代和历史环境中，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经验，对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在新形势下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方面。

从自身发展的情况看，第二国际也不同于第一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一国际，从成立起，就是坚持集中制的国际组织。它有正式的名称国际工人协会，通过了纲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后改称总委员会）和各国的分支机构（支部或联合会）。第三国际，完全承袭了这种组织形式，而且为实现其推进欧洲（世界）革命的使命，它把这种集中制发展到极端，使第三国际成为具有铁的纪律、高度集中和无条件地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是一个发动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总参谋部。第二国际则与之相反。成立伊始，它既没有常设的中央机构，也没有统一的纲领、章程，定期召开国际大会，一度是它唯一的制度和活动形

式。1900年底成立社会党国际局、1907年正式批准国际组织章程后，它所坚持和强调的，也不是高度的集中、统一，而是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协商。它是各个成员党在自主、自愿基础上的松散联合。这种松散联合的程度，达到了第二国际长期没有正式名称的地步。直到1907年前后，一些文章才开始使用“第二国际”这个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将这个名称肯定下来。^①在此之前，第二国际一直以“新国际”（区别于旧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自称。第二国际以其自身发展为基础，实际上形成了有别于第一国际、第三国际集中型的新组织形式，即自主型的组织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齐聚一堂，使第二国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共存一体的、广泛而统一的国际。它的历次国际大会和国际局历次全体会议，就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各派代表人物进行思想交锋、理论论争的场所和阵地，因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能兼容并蓄、博采众长，通过许多正确的决议，采取当时形势所要求的国际行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自主型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因为思想政治方面的激烈论争，而导致组织上的清除。在34年内，第二国际除了为保证正常工作将从事破坏捣乱的无政府主义者排除于国际大会外，并没有用其他任何组织措施来清除异己力量，包括对付象伯恩施坦、米勒兰这样有争议的人物。这也是第二国际内部长期论争而未立即导致分裂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它过于分散而削弱必要的统一的弊端，尤其是一些党把独立自主夸大到背离国际原则的地步，对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机会主义采取了妥协、退让和组织上容忍的态度，致使其愈演愈烈，最后在世界大战的冲击下，终于使多数成员党的领导集团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第二国际自身也由公开分裂代替了内部论争。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全

^①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66页。以下所引的《列宁全集》均为中文第1版。

面地分析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及其全部活动，才能正确地理解第二国际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部机制，实事求是地总结第二国际公开分裂的历史教训。

从最后结局看，第一国际和第三国际所处的时代不同，结局却一样，都以完成其使命、组织形式已不适应于斗争形势要求而宣告解散；第二国际却不然。尽管帝国主义战争一爆发由于多数成员党的领导集团堕入民族沙文主义泥坑，国际自身也发生公开分裂，因而结束了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共存一体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组织实体的第二国际，很快又以伦敦国际的形式恢复，并于1923年5月，与维也纳国际重新组合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的形式虽不复存在，一度中断活动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却以社会党国际形式恢复，并以第二国际的继承者自任。在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国际之间，也确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奉行的是同一理论即民主社会主义，都以各国社会党为组织基础，并采取松散的自主型组织原则，甚至其领导成员也因袭相承。一大批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和活动家，如王德威尔得、胡斯曼、弗·阿德勒、鲍威尔等，都曾在伦敦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继续活动，并担负领导责任。此外，还有象布劳恩塔尔这样在国际中从事活动的“三朝元老”。他从1907年起，即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成为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记录员，尔后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任国际书记助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以社会党国际书记身分，投入重建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国际不仅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了解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历史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为了解今日仍继续存在的社会党国际，提供了十分宝

①见《国际史》，第1卷第1页。（以下本书引用的各类论著的作者、版本见书后“附录6”。脚注只注书名和页码。）

贵的历史线索。

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第二国际在整个国际史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许多国家包括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界，对这个专门领域，表现出了长期持续而又浓厚的兴趣。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逐步深入，第二国际史已成为国际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的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关心并积极地投身于这一领域，是题中应有之义。

尊重历史，力求真实，不带任何偏见地探讨和研究，这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和责任。但是，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对历史事件、人物的理解和叙述也各异。关于第二国际性质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就说明了这一点。

应如何评价第二国际，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国际？在国内外长期存在着争论。实际上，第二国际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恩格斯和列宁，对此都有过明确的论述。1893年8月12日，恩格斯在国际苏黎世大会的闭幕词中就曾指出，在以独立自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国党的基础上，“现在的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它已由一些小的社会主义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恩格斯非常赞同第二国际“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①尽管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公开分裂，但是，列宁始终没有对它全盘否定。他认为，第二国际“完成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预先地和初步地、极简单地组织社会主义力量这件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②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第二国际具有历史性的功绩，具有觉悟的工人永远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8～480页。

②《列宁全集》，第21卷79～80页。

会抛弃的不朽成果：它创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等等。”^①正是据此，列宁称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②与上述客观评价相反，斯大林却从对本世纪20年代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估量出发，对第二国际作出了脱离历史实际的结论。他断言，在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是按照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的。”^③这个断语，不仅背离了恩格斯、列宁的上述评价，从根本上抹煞了第二国际及在其中起了巨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朽的历史功绩，而且给第二国际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左”的烙印。在这个断语的影响下，苏联、中国一些论著，将第二国际视为机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史，成为一部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历史。经过反对个人崇拜，肃清斯大林断语的影响，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第二国际的活动，客观地估量第二国际的历史进程，仍然是一个存有歧义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由苏联学者祖波克主编、于1965年出版的《第二国际史》，在摆脱斯大林上述断语束缚、客观地评价第二国际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可是，作者却仍然认为，第二国际前期（1889~1904）是基本正确的，而它的后期（1905~1914）内部斗争日益激化，并形成了中派与机会主义者的联盟。这个联盟，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第二国际遭到破产。^④近年，中国有的很有影响的著作，谈及第二国际时甚至认为，1900年国际巴黎大会之后，第二国际就成了机会主义国际。这些

①《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1页。

②同上，第274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1页。

④参见《第二国际史·序言》。

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1889~1914年间的国际，其间虽然不乏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影响，但是，它基本上仍然是革命的国际，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国际。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正确地认识时代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是确定第二国际性质的根本出发点。第二国际所处的时代，是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对于世界历史的这一演变，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各派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原则分歧。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的领导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承认上述演变，甚至认为，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必将为社会主义开辟广阔的前景。因此，在第二国际内部关于帝国主义的论争，并非是否承认帝国主义、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分歧，而是从帝国主义演变中，工人阶级能否立即将社会革命提上实践日程的意见对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围绕着伯恩斯坦提出的关于运动和目的的论争；1910年前后，卢森堡与考茨基关于战略问题的论争；1914~1916年，布哈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论争；以及希法亭等人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世界革命前景的论述等等，都集中地体现了上述意见对立。按照伯恩斯坦和后来考茨基、希法亭的看法，帝国主义这一新的经济政治现象，确曾造成甚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有能力去解决、排除这些矛盾，显示出资本主义应付包括世界大战在内的严重危机的强大生命力和长期的稳固性。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马上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应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改良，并充分地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卢森堡、列宁等人则认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空前激化，造成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全面危机，使社会革命提上国际工人阶级的实践日程。据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

垄断的、寄生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社会革命的前夜。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与只搞改良不搞革命的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迎接和投入业已成熟的世界革命，以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欧洲范围内确曾出现过革命高潮，世界革命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然而，为时不久，除了苏俄在重重危机中得以保存下来外，北欧、中欧、东欧国家的工人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列宁后来也承认，原来对世界革命的前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他在1920年秋，就明确地指出，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第二个浪潮还没有到来。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马上进行革命，而应团结、集结各派社会主义的力量，结成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以粉碎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势力的进攻，捍卫工人阶级当前的经济、政治权益。历史的进程表明，伯恩斯坦、考茨基、希法亭等人对资本主义生命力和世界革命的条件与前景的估量，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纵观第二国际活动的整个时代，应该说，是一个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革命条件又尚未成熟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已在一国首先胜利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时代，即弱小的社会主义同仍然强大的资本主义并存、共处、竞争的时代。摆在国际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不是马上进行革命的发动，而应通过一切必要的改良，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并积极地进行长期的工作，宣传、组织、动员、教育、锻炼工人阶级，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必要的准备。从这种时代和任务的特点出发，就不能把从事必要的社会改良，称之为机会主义；也不能把将活动重点放在为今天的斗争之上的第二国际，称之为机会主义国际。相反，第二国际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所开展的活动，是符合时代需要和斗争要求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称1889~1914年的第二国际为革命的国际。

第二，确认第二国际性质的根本标准，是它的实践活动。第二国际是否是革命的国际，不能凭经曲作家的只言片语，也不能按某个国家特定的模式来确定，而应以它的全部实践作为判断性质的根本标准。定期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包括1900年后不定期召开的国际局会议，是第二国际的基本制度和活动方式。因此，各次国际大会或国际局会议，应是确认第二国际性质的客观依据。由此出发，无论是1900年或1904年之后，都不能得出第二国际已成为机会主义国际或已由机会主义者和中派联盟所控制的结论。

1900年的巴黎大会，在第二国际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它在国际史上首次接触了帝国主义的新现象托拉斯的议题，明确地提出了反军国主义应从抽象分析转向采取实际行动的问题，一致地通过了关于揭露、批判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决议，而且还在于围绕着“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议程，将刚刚发生的因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所引起的入阁论争国际化，并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橡胶决议”。长期以来，这个决议，被许多史学者视为由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内部独占统治并使之蜕变的一个标志。毋庸置疑，这个决议具有调和、折衷的特点。但是，调和决不是丧失原则，折衷也决不是投降机会主义。相反，这个决议，在当时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表明了第二国际的原则立场。它对米勒兰未经党组织的同意擅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一事，公开表示反对；它明确地指出，个别社会党人入阁，不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始，只能认为是与困难环境作斗争时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的特殊手段；它维护了各成员党独立自主和自愿联合的原则，指出个别社会党人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入阁，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应由各国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而不应由国际大会讨论裁定。因此，考茨基起草的“橡胶决议”，不是机会主义决议，而是坚持了正确原则的决议；它之所以要折衷调和，并非庇护米勒兰及其入阁的

行动，也不是掩护机会主义，而是力图维护业已分裂的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由此得出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在巴黎大会上独占统治的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1907年的斯图加特大会，是在德国党于头年曼海姆大会就总罢工问题向工会的机会主义者作出原则让步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期间，在第二国际中享有盛誉的倍倍尔，又在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上，犯有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鼓吹者，还一度在议题委员会内占上风。乍一看，这时的第二国际似乎机会主义化了或已为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所左右。其实不然。这次大会，由于卢森堡、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在争取、团结倍倍尔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军国主义、战争、革命关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决议，在国际史上率先提出了利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灭亡的问题。这个决议被通过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胜利。此外，大会还否决了议题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决议案；正式批准了国际局提出的组织章程，进一步从组织上巩固了国际，加强了各成员党间的国际联系；否决了所谓“工会中立”的原则，并通过决议强调，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之间必须有密切的联系，要不断巩固这种联系；同时，大会几乎一致地通过了由马克思主义者蔡特金提出的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决议。这些史实表明，这次大会，不但没有为机会主义者所控制，相反，却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战胜了机会主义，克服了个别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获得空前胜利。第二国际也因此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总的说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第二国际已经完全巩固，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变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

质和方针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①

至于战前第二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1912年底召开的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尽管其间已表现出一些错误的倾向和主张，但是，大会仍然在军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再次统一思想，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的原则立场，一致通过了反战的《巴塞尔宣言》。这个宣言，后来被列宁称之为“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即1889~1914年期间大量的宣传材料和鼓动材料的总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个宣言概括了各国社会党人发表的千百万篇宣言、论文、书籍、演说。认为这个宣言是错误的，就等于说，整个第二国际都是错误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几十年来的全部工作都是错误的。丢开巴塞尔宣言就等于丢开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②

社会党国际局是1900年底成立并开始工作的。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多年中，它在处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统一问题和对战争危险的估量上，确曾有过错误，并且随着国际事态的发展，在其内部越来越为和平幻想所充塞。但是，全面考察和评价它的活动，却得不出已为机会主义者或中派主义者所左右的结论。国际局在加强国际的组织建设，争取国际劳动立法，庆祝“五一”，协调各国工人阶级的行动，促进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声援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特别是在支援俄国1905年革命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鲜明的革命倾向。它的成就和功绩应予充分肯定。

事实胜于雄辩。纵观战前第二国际召开的9次国际大会和国际局16次全体会议，其主流是革命的，其功绩是不朽的。其间，机会主义的影响确实存在，有时甚至很嚣张。但是，它并未成为

^①《列宁全集》，第13卷第65、66页。

^②《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1页。

一股足以左右国际前进方向的力量，也没有在国际大会（会议）上占上风，更未使第二国际蜕变为机会主义的国际。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战前的第二国际，仍然是革命的国际。

第三，恰如其分地评价机会主义同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关系，是确认第二国际性质的重要依据。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机会主义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股很有影响的思潮和势力。它对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施加过压力并最终使其公开分裂。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问题是如何估量机会主义对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影响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应注意区分以下几种情况。

要把机会主义对某个成员党的影响同对整个第二国际的影响区别开来。在某个问题上在某个成员党内占上风，并不等于就在整个第二国际占了上风。以德国党为例，长期以来在其内部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伯恩斯坦的公开挑战而变得日益激烈。发展到1906年党的曼海姆大会，党的领导集团屈服于工会机会主义者的压力，通过遏制总罢工的决议，使机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上风；1907年党的埃森大会，又在倍倍尔支持下，否决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坚持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决议精神的提案，通过了竭力维护诺斯克关于“保卫祖国”、拥护帝国主义军备政策的机会主义立场的错误决议。这样两次大会、两个决议表明，机会主义的影响，已在德国党内明显地增长，并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占了上风。但是，它们并未影响或左右第二国际的前进方向。对于前者，国际斯图加特大会通过决议指出，国际工人阶级要尽一切努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制止战争，实际上，从原则高度肯定了为德国党遏制的总罢工；对于后者，国际哥本哈根大会（1910年）通过决议重申，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有责任全力反对扩张军备和拒绝为此给予任何拨款，从而坚持了为德国党一度抛弃了的不给统治阶级一个

人、一分钱的原则。因此，不能由于机会主义者在某个成员党内一度占上风，推而广之为机会主义者在整个第二国际中占了上风；更不能把这种在某个问题占上风的情况，归结为整个党或第二国际已被机会主义所统治。

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第二国际及其多数成员党陷入民族沙文主义泥坑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区别开来。应该肯定，第二国际尤其是它的主要成员党德国党陷入民族沙文主义泥坑，有其必然性。由于党内机会主义的嚣张，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者力量弱小和理论上的迷惘，还在战争爆发之前，以1913年召开的耶拿大会为标志，德国党通过否定群众性政治罢工、肯定国会党团赞成政府军事拨款法案的错误立场和打击、排挤坚持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实际行动，完成了机会主义者控制、统治全党的进程。1914年8月4日，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的战争拨款法案、公开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一举，已是瓜熟蒂落，顺理成章。党内机会主义集团应对把整个工人阶级卷入世界大战负主要责任。但是，对德国工人阶级、对其他社会党卷入战争，除了指出机会主义影响、统治这个必然因素外，还应承认其特定的偶然因素。其中，包括统治阶级关于民族沙文主义的蛊惑宣传，本国确实遭受外来（德国）侵略等。尤其是在所谓以攻防论战争性质的错误主张影响下，一些党的领导人，包括战争爆发前不久还在力主用总罢工反对战争的瓦扬等人，突然改变原有立场，转而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能看作是机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特定的偶然因素诱发下，所采取的具有民族沙文主义性质的行动。只强调机会主义影响、统治这个必然性，忽视乃至抹煞某些国家工人阶级或某些党的领导人卷入战争的偶然因素，就难以解释战争期间各国工人阶级明了事情真相后所采取的反战行动，也不能科学地说明一些中派代表人物（如德国党的哈阿兹、累德堡等）为什么后来会公开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多数派并在国

会投票反对政府的军事拨款法案。严格地将上述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区别开来，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机会主义对第二国际的影响程度。实事求是地分析，第二国际及其多数成员党在战争初期陷入民族沙文主义泥坑，不能全然归之为机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第二国际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破产，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机会主义的破产。其中，还应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党人认识上的偏颇和理论上的迷误。更不能把这种破产，说成是整个第二国际的破产。因为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共处、并存的统一体，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国际联合。第二国际及其某些成员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陷入民族沙文主义泥坑，这些国家党内的左派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却挺身而出，揭露、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应是在战争初期第二国际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令是战争初期，也很难把尚未从组织上分裂的第二国际从整体上看做是机会主义的国际。

要把中派领袖人物在战争初期和尔后表现区分开来。中派作为一种思潮，在战前即1910年前后通过考茨基与卢森堡就战略问题的论争已经形成；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政党和国际集团，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事情。中派的主要人物考茨基，在战争初期曾经和党内机会主义多数派站在一边，为其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错误政策辩护，同党内以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作斗争，充当了机会主义的辩护士和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角色。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左派势力的壮大，工人阶级反战斗争的兴起，考茨基对于战争的态度，也曾发生左倾的微妙变化。他同哈阿兹、累德堡一道，公开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多数派的错误政策，认为党内的危险不再是来自左面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来自右面的机会主义者，甚至公开主张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旨在继续战争的军事拨款法案，因而成为德国党内反对派的一员。对于这些变化，应如实地肯定。不能将其战争初期的表现和

尔后的变化混为一谈，继续把这类中派代表人物，视为最主要的危险和比机会主义者更危险的机会主义者。即便是对于战争初期的中派代表人物，也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认真的分析。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德国党主席之一的哈阿兹，尽管他以国会党团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在8月4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赞成政府军事拨款法案的声明。但是，在此之前，也在8月3日的党团会议上，就表明了反对军事拨款法案的立场，后来一直没有改变这一立场。奥地利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弗·阿德勒，为了反对已经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曾同作为党的领导人的父亲维·阿德勒进行斗争，并辞去党的领导职务，甚至采取刺杀政府高级官员的极端行动，为此而被捕判刑。英国独立工党领导人麦克唐纳，也采取了反对战争的立场并辞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职务。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笼统地说中派在战争初期也和党内多数派一样推行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叛卖政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由此断言第二国际的破产主要是由中派领袖造成的，也欠公允。第二国际的破产，主要是指第二国际及其多数成员党领导集团机会主义的破产。它既不应包括左派和广大工人群众，也不应包括大多数中派领袖人物。第二国际的公开分裂，决不仅仅是少数左派同中派、右翼代表人物的分裂，而是以左派为主要代表包括多数中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同少数居领导地位的机会主义者的分裂。

第四，客观地分析第二国际重新组合为改良主义国际的原因，是把握第二国际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前提。第二国际公开分裂之后，特别是共产国际和伦敦国际建立后，形势发生了对共产国际极其有利的变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欧、美、亚、非各国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在党内革命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中派政党先后通过关于脱离第二国际和倾向于共产国际的决议，不少党甚至表示愿接受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等纲领主张，

倡议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广泛国际，以代替两个国际对立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完全有可能实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达到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上的统一，以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在内的广泛的第二国际。由于以原来第二国际右翼为主体的伦敦国际作梗，坚持建立一个排除共产党人的社会党国际，致使上述倡议未能付诸实施。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决不能把未能建立统一而广泛的国际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右翼社会党人的破坏。其中，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照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分析，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参战国尤其是战败国的内外矛盾空前激化，已经具备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由德国开始的欧洲革命或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近在眼前，只要依靠共产党及其拥有的革命力量，就能达到目的。1918~1920年间，欧洲范围的革命高潮兴起的事实，似乎也验证了这个估计。因此，共产国际在它的“一大”通过的章程中明确地提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从这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量出发，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采取了一种孤立、打击的方针。1920年秋，形势急转直下。刚刚兴起的欧洲革命运动，连遭失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也处于重重危机之中。据此，列宁及时修正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制订了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策略。尽管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等领导人，并未改弦更张；就是列宁，虽然他在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上，进一步接近客观实际，但在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上，仍坚持战争初期的看法，把他们统统视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国际工人运动最凶恶的敌人，不加分析地将社会民主党包括中派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当作重点打击乃至消灭的对象。正是依据

这种脱离客观实际的估计，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前来谈判加入条件、积极靠拢自己的中派政党，实行“左”的宗派主义方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了一个使中派政党难于接受的，旨在孤立、打击中派领袖和瓦解中派政党的“廿一条”。“三大”、“四大”又相继提出和制订在国际工会运动中制造分裂以孤立社会民主党尤其是中派领袖的方针。因此，引起社会民主党的极大反感，使一度脱离第二国际、向共产国际靠拢的中派政党再度背离。再加上苏俄在政策策略上的失措，致使中派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维也纳国际，转而向伦敦国际靠拢，最后两者合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形成以共产党为主体的共产国际和以社会党为主体的社会党国际这样两个国际共存、竞争的新格局。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前，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战争初期，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公开分裂，左派或左派政党继续坚持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大部分中派或中派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力图维护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只有极少数右翼机会主义领导人，才篡改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并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帝国主义战争后期，恢复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曾一度出现转机，由于来自右和“左”的方面的人为阻力，使其终于破灭，形成了以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的社会党国际和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的共产国际，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的历史至此宣告终结。

确定了第二国际的性质及其演变，它的历史分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在分期问题上之所以争论不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第二国际的性质特别是对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关系问题认识不一致。持“两分法”的学者，或以1896年国际伦敦大会为界碑，或以1900年国际巴黎大会为起点，或以1904年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为标志，都想说明第二国际前期

是革命的，后期是机会主义或趋向于机会主义的。持“三分法”的学者，虽然比较充分地肯定了第二国际的历史功绩，承认机会主义者统治第二国际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并主张1910年中派主义形成前的第二国际基本上是革命的国际。但是，他们也和“两分法”的学者一样认为，1910年后的第二国际，仍是机会主义的国际。这两种看法，同第二国际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的距离。要如实地确定第二国际的历史分期，除了确认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前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外，还应研究和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二国际史的下限断在哪一年；如何具体地划分第二国际的历史分期？

我们没有把第二国际史的下限断在1914年8月，而是延伸到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1923年5月，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战争初期机会主义者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破产，并未直接导致第二国际组织上的解体。这时，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实体，既没有宣布解散，也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坚持第二国际革命性质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公开谴责机会主义者的背叛，却并未公开宣布退出第二国际。1915年，列宁在瑞士洛桑等地报告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情况，当有人提出是否马上退出第二国际以组建第三国际时，他曾明确地指出，目前我们革命社会党人在第二国际中还未成立左翼，我们本身将不退出第二国际。只是也许有人要驱逐我们，一旦把我们赶出第二国际的时候，我们再退出，同时建立第三国际。^①1916年4月，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第2次（昆塔尔）会议通过关于谴责国际局的决议，左派代表明确地提出要建立新的工人国际。但是，与会的多数代表仍然认为，人为地规定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还没有可能。^②这些史料表明，至少

^①见《列宁回忆录》，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677页。

^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以下简称《文献选编》），第3卷第517页。

在1916年4月以前，包括左派、中派在内的第二国际代表人物，还未决定退出第二国际以与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决裂，第二国际及其国际局依然存在并继续活动。既然如此，这一段历史，就应成为第二国际史的研究对象。不能由于机会主义者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破产，就宣告第二国际的历史已经终结。

第二，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分裂，也不意味着第二国际及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已销声匿迹。由于机会主义的破产和以左派为主体的革命力量的增强，以共产国际和伦敦国际问世为标志，原来的第二国际终于在组织上发生分裂。但是，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组织形式并未消失，并通过伦敦国际得以恢复。这时的第二国际即伦敦国际，在性质和组成上已有别于战前的第二国际。按其实际影响和实力，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却不可忽视。就连坚决同机会主义斗争、表示要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共产国际，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并于1922年4月，与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一起在柏林举行3个国际执委会联席会议，商讨国际工人阶级统一联合行动的问题。因此，要研究第二国际史，特别是要研究它的性质演变和组织形式的特点，对这一时期的伦敦国际即第二国际活动，就不能予以回避。

第三，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是第二国际内部两股改良主义势力分化和重新组合的结果。几乎在共产国际、伦敦国际问世的同时，介乎两者之间的中派政党国际组织维也纳国际，也出现于国际工人运动之中。和前两个国际不同，维也纳国际成立伊始，就在章程中宣布，它不是一个包括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而只是建立这种国际的手段；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恢复联合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而努力。为此，它没有加入前两个国际的行列，而是力图并倡议组成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内的、广泛的工人国际。只是由于上述人为的原因，才使其归于失败，最后在改良主义基础上，按照原来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将

原来第二国际的两股势力，重新组合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社会党国际，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原来第二国际内部两股势力分化后重新组合的结果。第二国际本是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共处并存的统一体；它的历史，应是各派社会主义者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因此，从原来第二国际中分化出来的、后来又在第二国际旗帜下继续存在并重建组合起来的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在这时期中的活动，理所当然地也应成为整个第二国际形成、发展、变化历史的重要内容。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有必要将第二国际史的下限，延伸到1923年5月，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第二国际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不致因回避这一段历史，而在关于第二国际的研究中，出现不应有的断层。

第二国际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是国际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中，为维护自身利益同各国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是各国社会主义者排除各种错误思潮干扰，为寻求符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断探索的历史；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工人阶级逐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历史。简言之，第二国际史，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团体、组织的斗争史、探索史、发展史。世纪之交处于斗争、探索、发展中的国际工人运动，是第二国际这一专门领域的研究对象。正是根据斗争、探索、发展这样一条红线，我们将第二国际34年的历史，划分为相互联结而又各具特点的4个时期。

第1时期，始初奠基和凯旋行进时期(1889~1895)。它以马克思主义者战胜机会主义可能派发端，以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于国际大会之外而告结束。在7年时间内，通过4次国际大会，国际工人阶级在同各国统治阶级和内部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

以实现国际劳动立法为中心，探讨了维护当前经济、政治权益的途径，正确处理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劳动立法与劳动解放的关系，坚持了社会党人的政治策略，通过了关于庆祝“五一”、反对军国主义、土地和农民问题、殖民地和民族自决、垄断组织和经济斗争、工会组织等决议，并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干扰的基础上，迎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高涨，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开展罢工斗争、进行选举和议会活动等，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在同无政府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中，改良主义有所抬头和发展，为下一时期中的内部论争留下了隐患。

第2时期，深入发展和内部论争时期（1893~1914）。它由伯恩斯坦根据资本主义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机会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宣告破产结束。在长达18年的时间内，国际工人阶级通过5次国际大会和16次国际局全体会议，围绕着对新形势下应采取的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通过论争，着重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克服错误倾向、坚持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并就入阁、总罢工、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军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关系、国际的组织形式和原则、反对修正主义等议题，通过了基本符合工人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议，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胜利。正是在这些决议指引下，在国际局和各国党的组织下，国际工人运动逐步深入发展，尤其在加强国际组织的建设、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支援俄国革命、开展广阔规模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第二国际自身，也以斯图加特大会为标志，进入鼎盛时期。同时，在不断深入发展的掩盖下，在日益激烈的论争中，已流露并日益滋长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正是在其侵蚀下，再加上世界大战突发性的冲击，第二国际及其多数成员党很快就从颠峰上跌落下来。

第3时期，危机加剧和公开分裂时期（1914~1920）。它以

机会主义在德国党内占上风并投票赞成政府军事拨款法案为起点，以第二国际组织上分裂为终点。在6年时间内，国际工人阶级不仅同战争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展开激烈斗争，还同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进行公开较量，并以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为中心，集中地探讨了帝国主义与时代、帝国主义与战争、帝国主义与革命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帝国主义观、革命观，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两个国际（共产国际和伦敦国际）、两个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格局，由此导致原来的第二国际思想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公开分裂。尽管如此，国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及其多数领袖人物，仍然坚持或努力维护战前第二国际所通过的各项正确决议，开展反战革命斗争，揭露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政策。尤其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战争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中，利用本国所特有的革命条件，不失时机地夺取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为推动和促进欧洲革命高潮的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4时期，内部分化和重新组合时期（1920~1923）。它以1920年秋欧洲革命运动潮流低落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为终点。处于守势的国际工人阶级，面对着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进攻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以及日益激化的战争危险，进行了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围绕着团结、集结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结成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3个国际尤其是维也纳国际，曾多次努力和不断探索，终因遭到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关于恢复统一的、广泛的工人国际的构想未能付诸实施，而为两个对立的国际和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格局所代替。

关于第二国际史的研究方法，国内外的史学者已作过不少努力和尝试。从我们现在得到的论著情况看，大体上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国际代表大会为纲，通过逐一介绍评述各次大会的过程，或以国际代表大会为中心穿插分述各国工人运动，以反映第二国际的历史发展。德国连茨的《第二国际的兴亡》、美国福斯特的《三个国际的历史》、苏联祖波克主编的《第二国际史》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是以叙述各国工人运动为重点，辅之以各次国际代表大会或国际局活动的评述，以揭示处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第二国际的历史过程。法国龙格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英国柯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国际）就属于这种类型。这样两种研究叙述方法，就其介绍的对象来说，比较集中而系统。但是，从反映和揭示第二国际形成、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来说，又显得过于简单、零碎，使人有杂乱纷繁、不得要领之感。第二国际史，不只是代表大会史，也不是代表大会和各国工人运动之和的历史。作为存在了几十年、又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工人国际组织，有它活动和发展的特点。它是按照时代和历史提出的要求，根据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代表大会形式统一思想、形成决议，以指导斗争，开展活动。因此，以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为背景，以各个时期中的主要问题为纲，对历次国际大会或会议作集中的、综合的介绍，才能全面反映第二国际的形成、发展、变化，并从中引出正确的历史经验。在这一方面，奥地利布劳恩塔尔写的《国际史》，作了十分可喜的尝试。它突破了按国际大会或分国评述第二国际的框框，开始按主要问题来介绍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活动。但是，由于它仍然把重点放在各国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上，因而关于整个第二国际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叙述得还不够突出，有些过于简略。综合各家之长，本书确定了“以史为经、以论为纬、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并以各个时期中第二国际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纲，以各个时期第二国际发展的特点为依据，设计全书的章、节、目，以揭示国际工人运动这个特定时期发展的特殊

性。据此，形成了全书6章的总体结构。第1章，着重阐述新旧国际的历史联系，力求挖掘第二国际形成的历史根源，以作为全书的逻辑起点；第2~5章，集中叙述4个时期中第二国际为解决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多方面活动，力求探明第二国际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这是全书的核心；第6章，主要介绍西方无产者同东方（中国）革命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力求反映第二国际的巨大力量 and 影响。为了弥补对重大事件、组织、人物系统介绍不够的缺陷，特设附录列书后，以资查阅。

这部书稿，虽由作者署名，实际上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它首先得益于学术界。国内外已经出版的论著、译著，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史料、信息、数据和方法，尤其是苏绍智、高放、殷叙彝、李兴耕、校纪英、李骥、张佩航、曹长盛、杜康传、张中云、蔡金培等专家学者，一直关心本书的写作，慷慨地提供帮助，认真地审读初稿，热情地提出修改意见，使作者少走不少弯路。由于校纪英教授的支持，使作者有机会接触了许多原始史料；高放教授为奖掖后学热情地为本书作序，给予作者以很大的鼓励。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许多朋友的爱护和帮助，王亦程、汪叔子、韩丽英、曾筱清为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外文资料；尹世洪及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许多同事，曾参加部分编务工作。对于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直给予大力支持，谢宗范、武曦、张广勇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印刷厂为确保按期出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令作者十分感动。作者的爱人王素萍为本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她不仅为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而且直接参与了本书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字里行间处处包含着她的辛勤劳动。

《第二国际史》一书，原是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

目，曾得到院领导及各方面的关照和配合。苏州大学和萍乡市各界人士尤其是萍乡矿务局、下埠乡及其所属企业的领导、企业家，为本书的出版曾给予大力帮助。趁此书出版的时候，谨向一切关心、爱护、支持、帮助过作者的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谢意，并希望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这部尚不成熟的作品批评、指正，以使之更臻完善。

作者谨识

一九八八、七、一初稿于洪都青山湖畔

一九八九、一、廿五改定于上海

第一章

从解散旧国际到创建新国际

(1876~1889)

1871年5月，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旧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面临着外部敌人的围剿和内部巴枯宁主义者的困扰，难以在欧洲立足。1872年9月，国际海牙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美国。不久，国际工人协会即于1876年7月15日，在费城（费拉德菲拉尔）正式宣告解散。^①这一决定，曾在各国资产阶级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们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失败的证明，并宣称：“国际已经灭亡了！”但是，正如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后来所指出的：“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灭亡，它已经变成各国强大的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并且在它们中间永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②国际工人协会所开创的事业，它所播下的火种，决不会泯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

^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国际实际上就终结了；1874年，因内部分歧，左尔格退出总委员会后，它就完全终结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43~644页。

^②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65页。

工人运动的奋起，它又将破土而出。

19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末，既是新旧国际的交替年代，又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开端。欧、美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髙速度发展，确曾造成一时的繁荣，也激化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复苏，提供了社会历史前提。罢工斗争的开展，工会运动和工人组织的兴起，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建立，所有这一切，把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提到当时政治的首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斗争，将欧、美甚至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人阶级，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垄断组织的形成，强化了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国际化的进程，把落后国家卷入国际经济生活，使资产阶级统治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那么，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同样也加快了各国工人阶级社会生活国际化的进程，要求它成为一个与国际资产阶级对立的、拥有自己的国际联系的革命阶级。将社会主义者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际力量，已是绝对必要的事情。

创建新国际，以代替业已解散并为实践证明其原有形式已经过时的旧国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历时整整13年。其间，包括恢复旧国际的尝试，创建新国际的探索，特别是围绕领导权的激烈争夺，使得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更为复杂。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起，排除干扰，经过艰苦努力，终于避免了国际工人运动分裂的悲剧，使新国际的领导权，一开始就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两个国际大会，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以几乎相同的议题分别召开这一事实，以及两者不同的规模、进程和结果，都充分地显示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错误思潮的战斗力和对各国工人阶级的吸引力。

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

1. 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

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按照列宁的分析，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到顶点的最高阶段。”187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加速了垄断组织的形成，是“卡特尔广泛发展时期”。80年代之后，垄断组织在欧、美各国，尤其在德国、美国逐步扩展开来，从而开始了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①这种过渡，以生产力的急剧发展为基础，它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60~8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科技变革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方面，继英、法之后，其他许多欧、美国家进行了旨在铲除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的改革。其中，包括俄国废除农奴制、美国取消种植园奴隶制和意大利、德国通过王朝战争实现国家统一。这些改革，进一步地扫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和国内市场，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并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②

在经济方面，德、美、意、俄、奥等国，以其先驱者英、法为榜样，相继在60~80年代完成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使生产

①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94页。

②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2页。

技术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使资本主义真正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同时，也增强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实力，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加剧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

在科技方面，60~80年代的重大科技发明，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革命性的作用，并形成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新的工业地区、新的工业国家。炼钢新方法和熔铁炼钢特别炉（马丁炉）的问世，给钢铁工业以强有力的刺激；从铁水中清除杂质的脱磷法的使用，更使拥有丰富磷铁矿的德国、美国得天独厚，黑色冶金工业因此扶摇直上，成为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冶金工业的发展，势必向动力工业提出新的要求。为此，直流发电机和汽轮机应运而生；运距离输电试验也在德国获得成功。不仅如此，这个时期发明的以液体燃料为动力的内燃机，又进一步促进了石油的开采和生产；石油工业的长足进步，派生出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人造染料、人造肥料等新的工业部门；人造肥料的出现，加快了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大幅度上升；整个工农业生产，反过来又推动交通运输、电讯事业的进步，使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空前的高涨。

这个时期，整个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是从前远不能相比的。以1890年和1860年相比，全世界工业生产平均指数（以1913年为100）增长1.26倍。1870~1890年，英、美、法、德4国的煤铁产量成倍地增长，钢产量和棉花消费量也分别增长74%和97%^①

生产力的巨额增长，尤其是重工业的长足进步，不可避免地要增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实力。从数量上看，19世纪70年代，英、

^①参见《世界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和历史》（以下简称《理论和历史》），第2卷下册有关统计。

法、美3国，共有1,200~1,300万产业工人（加上农业工人为3千万）；到90年代初，仅工人（包括商业工人）的数量，已达3,306万，占自立人口10,087.7万的32%。^①其中，重工业部门的工人数量，更是成倍地增长。正是以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国际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激烈搏斗中，充分显示了社会中坚的作用。除了数量上的巨额增长外，这一时期中的欧、美国家，由于生产和资本急剧地集中，大型企业不断涌现，工人集中程度也有显著的提高。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德等国中，显得尤为突出。这种工人的高度集中，使得德国和俄国工人阶级，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站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成为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先锋部队。欧、美国家生产力的急剧增长，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下实现的。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部门（如重工业发展超过轻工业、农业落后于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尤其表现在国家之间，特别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美、德两国，利用其独特的条件，以更快、更高的速度，把老牌的英、法，远远地甩在后面，并使之失去其在世界工业和外贸中的垄断地位。到80年代，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地位，已从第4位跃居到首位。^②

欧、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有利因素。从外部条件来说，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被打破，美国、德国异军突起，使得原有的世界经济生活中一国独霸的旧格局，为群雄火并的新形势所取代。这必将加剧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竞争，强化对国内无产阶级和国外殖民地的剥削奴役和掠夺，从而为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客观可能；从内部条件来

①《理论与历史》，第2卷下册有关统计。

②《世界经济简史》，第38页。

说，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制约和决定着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工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和工人集中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工人政党的不断壮大，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实际上已成为当时欧、美工人运动的先驱。正是在它的影响和带动下，国际工人运动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高涨局面。

70~80年代生产力的急剧发展，是在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实现的。1866年的危机刚过，1873年9月，又在德、美爆发，一直延续到1878年，并在英国达到顶点。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烈度之强，是19世纪危机中最大的一次。这次危机刚刚过去不到4年，1882年又再度爆发，一直延续到1886年。欧、美资产阶级惊恐未定，1890年又爆发了新的危机。如果说，在危机之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有组织的斗争，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会在可能的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的话；那末，危机一旦爆发，这种改善就化为乌有，广大的工人又面临着苦难的深渊：解雇失业，工资下降，物价飞涨，劳动时间延长，童工、女工增加……因此，随着每次危机的到来，总会引起工人的强烈反抗，爆发数以百次计和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罢工。争取劳动权利、提高工资、取缔童工、缩短劳动时间等，往往成为罢工斗争的导火线和主要内容。

生产力的急剧发展，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并逐步地走向垄断。以卡特尔、托拉斯为主要形式的垄断组织，于19世纪70~80年代，首先在德、美两国形成；90年代，美国各主要工业部门，已普遍地建立了托拉斯。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时代特征。

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给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课题。垄断的出现，进一步激化了由它造成的更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仍为资本家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为缓和这个矛盾，

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强化国家机器，对外推行军国主义和战争政策，进行殖民扩张。70~80年代，欧、美国家工人运动中不断掀起的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和对被压迫民族运动的声援，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中的时代特征，而且随着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嚣张，这种斗争和声援，越来越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各殖民地人民所注目。

2. 罢工斗争的蓬勃高涨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阶级备受摧残，各国工人运动也由此而转入低潮。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工人阶级又再度崛起，使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益走上目前政治的首要地位。”^①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重大变化，首先反映在罢工斗争的蓬勃高涨之上。罢工，是国际工人阶级一种传统的斗争手段。发展到19世纪70~80年代，客观情势的演变，使这一时期的罢工具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

宏大的斗争规模。从总体考察，无论是罢工的次数和参加的人数，都有巨大的发展。以一度是欧洲工人运动中心的法国为例，70年代前6年（1870~1875年）和60年代的后6年（1864~1869年）相比，其罢二次数，前者（522次）是后者（426次）的122.5%；参加人数，前者（15.2万）是后者（15.5万）的98.4%。80年代的罢工次数（1,862次），是70年代（840次）的221.6%；罢工人数，是198.1%。这种情况，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显得尤为突出。1882~1887年，美国的29,643个企业，爆发了5,237次罢工，相当于同期法国的486.7%、意大利的1,150.9%；罢工人数，高达80.1万，相当于同期法国的339.4%，意大利的673.1%。其中，参加罢工的总人数，1882~1884年，平均每年16.4万，18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7页。

85年，为25.8万；1886年，达61万。^①从每个国家每次罢工的具体规模来看，也已远远超出时间短、人数少的原有水平，不断爆发数以万计、坚持数月的大型罢工斗争。处在“非常法”恶劣情况下的德国工人，就曾冲破重重阻力举行过有15万人参加的罢工。还在70年代，英国朗开郡棉纺工人，不顾工联主义者的阻挠，举行过持续17周的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直接投入斗争的工人多达30万人。1886年，法国德卡兹维尔的罢工，坚持了5个月；187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矿工罢工，长达7个月。

浓烈的政治色彩。这是70~80年代罢工斗争不同于以往的突出特点，也是国际工人阶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1877年的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起因于铁路公司老板要降低工人10%的工资。为表示抗议，由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开始，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工人率先罢工，并向全国17个州的铁路中心扩展，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罢工。由于遭到政府军血腥镇压，工人被迫奋起斗争。在匹兹堡，罢工者粉碎政府派来的联邦军，夺得大量武器；在圣路易，罢工发展为起义，工人占领该城达两周之久，被资产阶级报纸称之为“一次劳工革命”。有的罢工，属于经济性质，但是，由于它所产生的影响，也往往会变成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1886年1月，法国阿韦龙省德卡兹维尔矿区3千多矿工，为争取提高工资举行罢工，一开始即发生流血冲突。矿工出身的议员巴利，在宣布罢工的第2天起，即赴现场调查，并据此向议会提出质询，由此而在议会中和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辩论结果，包括巴利在内的支持和维护矿工罢工的3名工人议员，宣布同攻击罢工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断绝联系，

①《19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人民的罢工斗争》（以下简称《罢工斗争》），第80、99、114页。

②《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694页。

在议会中组成独立的工人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在欧、美国家中，已经出现纯粹的政治性罢工。1886年3月，比利时列日的工人为纪念巴黎公社15周年而举行罢工，结果为军警镇压，第2天，工人又举行抗议罢工，并扩展到其他城市。工人被迫拿起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警面对面地斗争，最后，以血的代价，迫使反动当局在经济上向工人作了一些让步。这次斗争的规模与成效虽不显著，但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却有其特殊的地位。同年召开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认为，争取政治权利可以也应该采取罢工手段。大会原则上肯定了总罢工，并在90年代初，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以争取普选权为内容的总罢工浪潮。

显著的斗争成果。以无政府主义猖獗的意大利为例，1879~1884年，胜利和部分胜利的罢工次数（150次），占总次数的54%，失败率为46%；1885~1896年，胜利率上升为62.5%，失败率下降为37.5%。美国罢工获胜和部分获胜的次数（339次），在罢工总次数中的比例，由1881~1885年的65.5%，上升为1886~1889年的70.9%。其中，全部获胜的次数，由53.9%，上升为64%，部分胜利的罢工，由11.6%，下降为6.9%；失败率，则由34.5%，下降为29.1%。①在具体成果上，1886年5月，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各工业城市的工人，展开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先后有35万人投入运动。其中，有20万罢工工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在3千多个部门中，工作日从14~16小时减至12小时，还有部分企业由12小时减为10小时。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这一重大胜利，认为它“会以燎原烈火的速度蔓延开来，会从根本上震撼美国社会”。②正是在美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带动下，各国工人阶级相继掀起了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内容的国际劳动立法运

①《罢工斗争》，第85~1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4页。

动，并成为新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3. 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普遍建立

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奠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新形势下，从70年代中期起，欧、美工人进入了普遍建立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①到1889年7月创建新国际时，已有20个国家或民族建立了35个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②总的来说，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大体上可分为3种类型。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一种是由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团体，如普列汉诺夫等建立的俄国劳动解放社、巴克斯与艾威林夫妇等建立的英国社会主义同盟；一种是在旧国际支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后一种占大多数，情况也较为复杂。正是这3种类型的团体、政党，构成了创建新国际的组织基础。同时，由于这些团体和政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工人运动蓬勃高涨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有许多根本不同于旧国际各支部、联合会的特点，因而为新国际的创建，提供了良好的思想理论条件。

这些团体和政党，普遍地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甚至以它为指导，在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这集中地反映在它们所制定的纲领、宣言、章程之中。这些文献，肯定无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强调无产阶级国际

^①《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2页。

^②详见本书“附录5”。

主义和国际团结，坚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最终目的。同时，提出了近期工人阶级的特殊要求以及包含有民主集中制思想的组织原则。当然，各国党的认识及其纲领的表述，并不尽相同。有些纲领，包括法国工人党《哈佛纲领》（1880）、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8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加因菲纲领》（1888）和俄国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纲领（1888），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有些纲领，如德国党的《哥达纲领》（1875），尽管包含有不少拉萨尔主义的词句和精神，但是它仍然揭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关于工人阶级贫困根源的论述，关于工人阶级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情的论述，关于变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为集体（公共）所有制的论述，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述和关于工人运动国际性质的论述，等等。这些论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还为丹麦、葡萄牙、荷兰、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的政党所接受，成为他们制定自己纲领的依据。有些团体和政党，如意大利工人党（1882）、比利时工人党（1885）、波兰无产阶级党（1882）、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884）、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76）的纲领，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在所有制和推翻资本主义等问题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在斗争策略、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仍接受和坚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张。其中，包括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俄国民粹主义的错误理论和主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的社会主义团体尤其在英国费边社（1884）和法国可能派纲领（1882）中，还包含着市政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 and 主张。这既反映了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也给未来的新国际，埋下了不和谐以至内部论争的种子。

这些团体和政党建立后，积极地开展了活动。在和平发展时

期开展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这是德、法、奥、意等国工人政党活动的突出特点。由于马克思的指导，德国党早已投入这方面的活动。到80年代，它已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1890年，它所获选票高达1,427,298张，比1877年增加1.89倍，并首次成为各政党中获票最多的政党。创办社会主义报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用以武装工人阶级，是这个时期中各国党开展活动的重要内容。到1889年，已有15个国家或民族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创办了数以百计的报刊。1878年，德国党及其工会只有65种；1891年，共有125种。其中，最畅销的报纸订户，已超过3万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的国家或民族，如捷克、保加利亚、挪威，都相继办起了工会和党的机关报刊，在教育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展开活动的。他们的思想、理论、策略，无不受到各种思潮的浸染。尤其是随着80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涨和各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策略改变，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工人运动内部的论争乃至公开闹纠纷。1879年10月，法国工人党成立。当时，马克思曾将其誉为“法国第一个工人政党”。但是，不久，党内即在纲领原则问题上产生分歧。以布鲁斯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推行可能主义的纲领，最终于1882年9月，在圣太田大会上发生分裂，形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以盖得为首的法国工人党即“盖得派”和以布鲁斯为首的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即“可能派”。1890年10月，可能派内部再度分裂，形成以阿列曼为首工人社会革命党。还在

①见《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第1卷有关年分的统计。

②见《关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情况的报告》，载《第二国际》，第9卷。

1881年7月，由于大赦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就在巴黎成立了以瓦扬为首的、以布朗基为旗帜的中央革命委员会（1898年，改称革命社会党）。1893年，又新添以饶勒斯、米勒兰为首的独立社会党人联盟（“饶勒斯派”）。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并没有法国那样典型。但是，在德、英、意、波等国的工人政党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种“闹纠纷”的复杂局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特点，也给即将成立的新国际及其以后的活动，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埋下了新国际内部纠纷、矛盾的祸根。

4. 工人组织的发展

各国工会运动的蓬勃兴起，是19世纪70~80年代工人运动的又一特征。其表现之一，就是行业工会和地区性工会向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方向发展并日益集中化。到1889年7月新国际创建时止，已有13个欧、美、亚国家，先后建立了25个行业性工会或全国工会中心。^①还没有建立全国性工会的国家，也陆续建立了大量的地区工会和中央工会。例如，丹麦在1879~1889年间，就已有189个工会；90年代初，瑞典已有250~275个工会组织；1891年，奥匈帝国的工会组织，达300个，共有6万会员。^②这些工会组织，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一样，因而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它们都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使得70~80年代的工会运动十分活跃，异彩纷呈。

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运动，是这个时期中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它主要包括德、奥、比、荷、瑞士等国工会，其特点是工

^①见本书“附录4”。

^②《国际工人运动 历史和理论》（以下简称《国际工人运动》）。第2卷第226~227页

人组织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相互支援。德国党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运动，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1875年，德国工人运动中两派合并后，曾在同年5月28~29日和1878年2月24~25日，分别举行工会代表大会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将两派所属地方联合会统一的决议。决议尚未付诸实施，即开始了“非常法”时期，党和工人运动遭到取缔和镇压。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运动，仍然排除来自政府和企业主的干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878~1890年，中央工会联合会（按行业）由27个增长为59个；所属会员，由5万人增长为23.7万人、①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性工会中心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联合会（自由工会）（1890年11月）。德国的工会运动，不仅在捍卫工人权益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罢工斗争，而且直接和党领导的争取普选权和粉碎“非常法”的政治斗争紧密配合，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工联主义为主导的工会运动，在欧、美国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主要包括英、美等国的工会。和60~70年代不同，80年代的工联运动，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由新工联代替了旧工联。其特点是：由排斥转而吸收非熟练工人，形成了以他们为主体的美国劳联（1881）和全英矿工联合会（1889）；由纯经济斗争的保守、防御战略，转向实行政治斗争的革命进攻战略。在这一方面，1889年，由社会主义者凯尔·哈弟、汤姆·曼、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所发起领导的煤气、杂工工人罢工和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最富于代表性。这些罢工，直接推动了新工联的形成。通过斗争，几乎满足了工人的全部要求，正式成立了以非熟练工人为主体的煤气—杂工工人协会和码头工人协会；②同时，也强化了

①《大事记》，第1卷第119、126、152~153、172页。

②通过煤气工人罢工，煤气公司答应罢工者提出的关于实行8小时工作日、不降低工资的要求，结果工人每周工资实际提高达5~50%。见煤气—杂工工会等向国际布鲁塞尔大会的报告，载《第二国际》，第8卷第476~490页。

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团结战斗的精神以及同旧工联决裂的决心，并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核心。这些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建立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摆脱资产阶级自由党束缚的工人政党，并坚持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而在“英国开始了年轻的、新鲜的、充满新的革命精神的工人运动”。^①

无政府主义工会运动，主要包括罗曼语各国即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是巴枯宁主义者的支柱，并有从事个人密谋活动的历史传统。所以，无政府主义工会运动显得尤为突出。70年代后期，西班牙就已形成以马德里为基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中心，与之相对立，受无政府主义者控制、拥有162个工会联合会的西班牙地区劳动者同盟于1891年9月问世。后来，西班牙又正式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全国劳动者同盟（1888.8）。其影响，仍不足以完全与无政府主义工会运动相抗衡。意大利情况要好些。70年代中期，无政府主义者在意大利北部、南部，发动了两次“直接行动”即密谋暴动，结果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领导这些密谋的领导人科斯塔，从实践中认识到，有必要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并于1876年成立了摆脱巴枯宁组织的北意大利联合会，正式通过关于参加政治斗争、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决议。恩格斯认为，这一事实表明，该组织已“彻底地脱离巴枯宁主义的宗派而同伟大的欧洲工人运动采取共同的立场”。^②但是，在工人运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如是否实行议会策略，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等，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在意大利的中部和南部仍有活动和影响。法国工会运动，1884年后才有较大发展。1886年发生的德卡兹维尔罢工及其在全国引起的争

^①《列宁全集》，第12卷第3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4页。

论，对促进工人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国工团联合会于1886年在里昂宣告成立。这个组织，曾一度受法国工人党的影响，坚持阶级斗争立场，并特别强调应同社会主义政党一起战斗。后来，由于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盖得未能正确处理好党与工会的关系，使之逐渐产生离心倾向。90年代初，由于在总罢工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工团（工会）脱离工人党，走上独立的工团主义道路。

合作社运动，有其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社会主义先驱者欧文和圣西门。到19世纪80年代，它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是，接受工人政党影响、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的合作社运动，还是以比利时为突出。它最初起源于比利时纺织工业中心根特市。其主要组织形式是面包合作社。它是该地社会主义者为摆脱面临的财政困难所进行的一种尝试。从1881年起，他们即着手建立合作社协会；1885年，办起一个大型面包合作社。依靠它，不仅解决了工人的消费需要，减少了商人的中间剥削，并从所获利润中为党和工会提供基金，办起了印刷厂、会议厅、图书馆。在根特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带动下，布鲁塞尔、列日、安特卫普、乔利蒙等地，相继建立起面包合作社或其他的食品供应协会。1881~1889年，这种合作社或协会，已有229个，属于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合作社约占1/10。由于指导思想明确，社会主义合作社运动成效显著。以布鲁塞尔“人民之家”面包合作社为例，1889年，它为2,500个家庭、12,500人，提供价值1,260,000法郎的面包，实现利润52,000法郎，提供宣传经费7,900法郎；1890年，它为3500个家庭、17,500人，提供价值1,580,000法郎的面包，实现利润75,800法郎，提供宣传经费11,200法郎。此外，布鲁塞尔、根特等城市的合作社，还向成千上万个工人家庭，提供医疗照顾和药品救济，深得工人拥护，使广大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①

^①见《立足于社会主义观点上的合作制》（比利时工人党给国际伦敦大会的报告），载《第二国际》，第10卷第687~694页。

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作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一支新军，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站在这支新军前列的，也是比利时根特的工人。1886年11月，该地工人正式成立第1个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新兵协会”。不久，布鲁塞尔也效法组建“共和主义近卫军”，后改称“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并由此而向其他城市扩展。1889年，这些组织的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决定在地区联合会的基础上，组成比利时青年工人联合会。它以15~21岁的青年工人为成员，以进行反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宣传为主要任务，并接受工人党指导。在比利时工人的影响下，荷兰于1886年建立第1批青年团体，两年之后，即1888年，成立受无政府主义者支配的中央联合会；80年代末，瑞士青年也着手建立社会主义星期日学校等青年团体。^①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这时也刚刚起步。尽管美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即已组织独立的妇女工会，并于1881年全部加入了劳动骑士团，但在当时并不多见。^②到80年代后期，由于新工联主义者的努力，妇女运动在英国十分活跃。煤气一杂工工会，为满足女工关于入会的请求，坚持在工会中实行男女平等的原则，允许女工参加工会代表大会，并可在工会领导机构执委会中任职。因此，这个工会，很快成为包括广大女工在内的、有70多个工种的群众性组织。同时，经过伦敦火柴厂女工的罢工和银镇橡胶制品女工的罢工，在马克思主义者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领导下，在罢工胜利、增加工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青年女工联合会。^③

^①见《第二国际时期的妇女、青年、工人运动》，载《德国工人运动》，第606~607页；参见《国际工人运动史知识手册》，第342页。

^②见《法、美、英、德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史》，转引自《国际工人运动》，第2卷第458页。

^③见《煤气一杂工工会等向国际布鲁塞尔大会的报告》。

此外，在欧、美和日本等国，还涌现了一批俱乐部、图书馆、业余学校等工人文化教育组织，开展了许多文化、艺术活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

在新国际创建之前，虽然国际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并不高，其成员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也不大，而且很不平衡，^①但是，通过上述各种形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开始组织起来，并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活动，从而为创建新国际准备了社会基础。

二、恢复旧国际的尝试

1. 对无政府主义国际的反叛

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大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经过周密的调查、审定，决定将在内部保持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的无政府主义首脑人物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从而结束了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内部争论。

对此，巴枯宁及其拥护者迅速地作出了反应。瑞士无政府主义组织汝拉联合会海牙大会闭幕后，立即召开非常代表会议，扯起“反权威”旗帜，公开拒绝承认海牙大会决议，对被国际开除的巴枯宁和吉约姆表示同情和信任；紧接着，9月15~16日，由巴枯宁直接指挥，在圣伊米耶举行无政府主义者的第1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无政府主义国际”，从而在组织上公开

^①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会会员数（23.7万），仅占工人总数的2.4%；法国工会会员数（4.3万），占工人总数的3%；美国劳动骑士团成员数（1886年，70万），为工人总数（1890年）的6.9%；英国工联成员（1,470,191人），为工人总数的17%。

与国际工人协会分道扬镳。由于这个无政府主义国际公开反对一切权威、组织和纪律，尤其是反对革命权威，并决定在半年内召开“反权威”大会，以动员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际工人协会及其总委员会，所以，它被称之为“反权威国际”。

无政府主义国际建立后，一度曾在西班牙、比利时、英国等匡得到支持。但是，这个没有权威、没有领袖、实际也没有纲领的无政府主义集合体，不仅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彻底揭露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就连它的内部也是危机四起，不得安宁。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的团体。其中，除了巴枯宁的忠实信徒外，还有主张依靠二联进行活动的工联主义者，竭力维护私有制的蒲鲁东主义者，主张以工会作为未来社会唯一组织形式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坚持把所有权和产品分配权交给社会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加入“反权威国际”的成员，在国际工人运动激流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脱离巴枯宁主义，从而使“反权威国际”众叛亲离。

1873年9月，无政府主义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总罢工问题时，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科斯塔等，就曾触及巴枯宁及其忠实信徒所禁忌的罢工和工会问题。同巴枯宁反对组织工会和罢工斗争的立场相反，科斯塔认为，总罢工是“革命的优良工具”，局部罢工则是“对工人的欺骗”；汝拉联合会代表茹柯夫斯基则宣称，总罢工就等于社会革命，工人只要停止10天工作，就会完全粉碎现存的社会制度；就连无政府国际的实际领袖吉约姆也不得不认为，工人应把主要的精力花在国际工会组织上去，争取有一天能够进行唯一能够实现工人完全解放的一种罢工，即总罢工。①1874年9月，情况进一步有了变化。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比利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德一巴普，在题为《未来社会中的社会

①见《第一国际》，转引自《巴枯宁评传》，第218、219页。

服务机构》的报告中，又进而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行动、破坏一切国家政权的信条表示怀疑。他公开主张，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高度的中央集权。这种坚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而不是废除中央集权的国家的主张，引起了“正统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使大会陷入一片混乱。大会最后只好通过一个关于由各国无政府主义组织自行决定如何进行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①这一事实表明，无政府主义国际及其基本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并趋于分裂和瓦解。实际上，从这次大会之后，无政府主义国际就日益濒于衰落。1876年10月，在无政府主义国际伯尼尔代表大会上，由于荷兰和法国代表的支持，德一巴普明确地主张另起炉灶。他提议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吸收世界范围内各派社会主义者参加，以重建国际，来取代日趋衰落的无政府主义国际。最后，大会不顾意大利和西班牙联合会的强烈反对，按照多数代表的意见，通过了德一巴普上述提议。

按照伯尔尼大会的决定，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77年9月9~14日，在比利时工业中心根特召开。这是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以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11个国家的49名代表。^②会上，社会党人和吉约姆等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李卜克内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发言，集中地论述了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强调每个国家都应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为了防止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力旁落，李卜克内西对巴枯宁主义者作了集中揭露。大会的多数代表，接受了李卜克内西的观点，并通过

^①见《第一国际》，转引自《巴枯宁评传》，第216~218页。

^②见《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载《法国社会运动》杂志，第51期第118页。11国中，李卜克内西代表丹麦和德国。

了关于建立工人政党、进行政治活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决议。大会的决议主张，为求得自身解放，无产阶级应利用一切可能获得的政治手段：“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应当成为土地和其余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①

关于恢复旧国际以使社会主义组织重新联合的问题，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由于社会党人的积极努力，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下，会议通过的声明指出，在反对占有者阶级统治的世界斗争中，各国工人组织必须统一行动，以加强相互间的物质和道义方面的支持。为此，会议选举成立了同盟执行局（国际联络与统计局）。它负责吸收持各种不同见解的组织参加，并由它另行召开一次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以恢复旧国际。当时，由于被选入这个国际机构的成员复杂，看法很不相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发挥作用，更谈不上成为新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心。它在召开1881年库尔大会后，就已不复存在。

根特大会，虽然在恢复旧国际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就是吉约姆之流已为他们原来的同盟者完全抛弃。”马克思认为，工联主义者黑尔斯和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德一巴普等人对无政府主义国际的再次背叛，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工人阶级是有利的。^②

2. 从根特大会到库尔大会

根特大会之后，法国以盖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打算利用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之机，于1878年9月2日，召开社会主义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成立了负责筹备大会事宜的组织委员会。就在开幕前夕（8月初），大会组委会的23个成员，即被警察逮

^①转引自《大事记》，第1卷第12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4页。

捕，盖得、杰维尔等因此被判处监禁。①尽管这次巴黎大会没有开成，根特大会成立的国际联络与统计局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仍然继续为恢复国际工人协会而努力。1880年10月，安塞尔以比利时党总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倡议，再开一次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以讨论恢复国际工人协会的实际步骤。这个倡议，得到德国党的热烈响应。经过协商，两国社会主义者决定，于1881年10月2～5日，在瑞士库尔发起召开这次大会。

由于几度改变地点，又碰上德、法两党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无暇全力以赴，所以，出席这次大会者寥寥，只有来自欧、美12个国家和地区的18名代表。恢复国际工人协会，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马克思在会前提出的意见和主张，并一致认为，恢复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刻尚未到来。②大会所通过的宣言指出，使各国工人运动能够在统一的组织和策略基础上建立新国际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要创建一个生气勃勃的国际，需要富有生气、活动能力和组织健全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切实地积累力量，才能把国际工人运动联成一个整体。这种组织上的联合，将是各国工人力量积累的必然结果。大会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一旦条件成熟，仍有可能恢复旧国际。所以，大会委托法国工人党在其他国家工人政党的配合下，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此作为恢复旧国际的开端。

3. 创建新国际的时刻尚未到来

①这次大会的原定议程，包括妇女的地位和作用、贫困根源及其消除办法、国家作用和社会主义政权、对社会组织的革命行动、战争和常备军、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态度等。见《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载《法国社会运动》杂志，第51期第120页。

②见《大事记》，第1卷第137～138页。

还在旧国际完全终结其活动时，恩格斯就曾于1874年9月，在给美国社会主义者左尔格的信中，谈及未来新国际的设想。他认为，旧国际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在他看来，新国际决不能重蹈旧辙，而应“创立一个象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它“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自己的原则”。要创建这样一个国际，不能指望召开几次国际大会，也不能只依靠少数社会主义者的努力，而需要有在政治上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象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在思想上需要使马克思的著作对工人运动已产生多年的影响。只有这样，这种新国际，才能适应世界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斗争规模日益广泛的新形势。①这些正确主张，当时并没有被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所接受，特别是由于巴枯宁主义者的一度猖獗，也难于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贯彻执行。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欧、美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无政府主义国际日趋衰落，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间的国际联系不断增强，尤其是库尔大会提出恢复旧国际问题之后，抱有各种主张和目的的人，不断通过书信，向马克思恩格斯请教，促使这两位无产阶级导师特别是恩格斯，感到有必要从正面阐述关于创建新国际的问题。

库尔大会之后，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贝克尔于1882年2月向恩格斯提出，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必须实行一项计划，即按过去的组织形式恢复国际。②恩格斯以他和马克思的名义，在复信中告诉贝克尔，经过慎重考虑，他们认为，实行关于恢复旧国际的建议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旧国际，只会是一个没有本国工人运动基础的流亡者国际。其结果，势必强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43~644页。

②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184页。

化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实力，扩大已趋于瓦解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影响。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创建新国际的时刻是会到来的。这最终取决于俄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业已爆发的俄土战争，加剧了俄国国内的矛盾，出现了行将爆发革命的局势。俄国革命的爆发，又将触发和加速德国革命，必然会把德国党提到首位。到那个时候，创建新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这个新国际，“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恩格斯强调指出，一旦欧洲事态的发展，使创建新国际的条件成熟，当需要把各种力量集合起来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立即就可以实现，无须长期的准备。

1884年7月，侨居在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来自汉诺威的农涅，写信给恩格斯声称：他打算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国际联系，请恩格斯提供帮助。恩格斯明确地告诉农涅，由于所提计划的内容和性质不明确，难以作出确定的答复。他还强调指出，同不是完全采取革命共产主义立场的人，可以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但决不同他们结成同盟。不久，农涅又要求恩格斯提供信息，恩格斯在2月26日的信中用形式上温和、实质上坚决的方法，予以婉言谢绝，并直率地表示，不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这种性质含糊的任务上去，决不同一些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人，处在一个组织里。后来的事实证明，恩格斯如此处置“这么一个蠢货”，是十分正确的。同年9月，农涅的真面目被揭露。由

①按照恩格斯的设想，新国际不应是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积累无产阶级力量的手段，而是革命即世界革命高涨时期夺取胜利的工具。因此，他一度不主张甚至反对恢复或创建国际。实际上，在恩格斯逝世前，欧、美国家均未出现他所期待的革命形势。新国际也未成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工具，仅仅是和平发展时期积蓄力量、准备革命的一种手段。这是恩格斯始未料及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6~268、270~278页。

于他充当普鲁士的奸细和警探，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①

就在农涅就“国际联系”一事纠缠恩格斯的时候，又冒出了一位“重组国际”的热心人。1884年2月17日，旧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盟员达比希尔，致函恩格斯声称，他早就试图重建国际。为此，已建立一个委员会，并为筹建的国际拟订了宗旨和原则。对于达比希尔的计划，恩格斯反应十分冷漠。他在2月17日的口信中指出：“在这方面我本人不能做任何事情”，并且告诉达比希尔，已将其“原则”（纲领），转给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正义报》。②

1876~1884年，欧洲工人运动中的许多人，为恢复旧国际，作过长达8年的尝试。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地作过努力。尽管这些尝试，没有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却为进一步清除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促进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强各国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国际联系，从而为创建新国际，迈出了十分可喜的一步。同时，也暴露出国际工人运动中隐藏的种种矛盾、问题和危险，预示着创建新国际必将有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

三、创建新国际的领导权之争

1. 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势在必行

1882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欧、美，由此而引起国际工人运动普遍高涨和国际生活空前活跃，从而为创建新国际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种情况，在德、法、美、英等国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在1884~1886年中所发生的几件大事，促使恩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06~107、116、118~119、223、732页。

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运动重新作出估价。

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的重大胜利。1884年10月，德国国会举行例行选举，德国党冲破“非常法”的重重阻力，获得重大胜利。和上一届（1881年）大选相比，选票增加76.3%，议席增加1倍。①还在选举结果尚未出来时，恩格斯就曾指出，最终能获得多少席位，那是无关紧要的，主要的是选举表明，“运动正以迅速而又坚定的步伐向前发展。”选举结果公布后，他进而将选举日称为“胜利日”，并指出：“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它是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势不可挡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这支革命力量，尤其是已经成为一个强大政治力量的德国党，使得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认为，德国党在选举中的重大胜利，对欧洲和美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将帮助国际共产主义牢牢地站稳脚跟。②

法国议会中工人党团的出现。80年代初，法国工人党内部的分裂，曾使恩格斯担心，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难以承担筹组新国际的重任。1886年发生的德卡兹维尔罢工及由此而引起的矿工代表、议员巴利在议会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质询，最终导致了他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决裂，并在两名工人议员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对立的独立工人党团即“议会工人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由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名当选的这3名工人议员，一反法国工人追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旧传统，勇敢地打破政治生活的坚冰，与激进派决裂，这将有助于法国工人破除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迷信，增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这3名议员中有两人一度曾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145、138页。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27～228、230页。

忠实信徒，反对政治行动是他们过去的信条。现在他们勇敢起来独立行动，就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尤为重要的是，在这3个议员的背后，站着已联合行动的、包括几乎法国所有社会主义派别（除可能派之外），集中地体现了法国工人运动的进展和各社会主义派别的团结。同时，法国“议会工人党”的出现，在国际上特别在德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法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出现在无产阶级运动的舞台上。”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把法国议会工人党的出现，称之为1886年两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①

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起。1886年春天，美国各大工业区的工人，开展了要求规定8小时工作日的群众运动，以有35万人参加的5月1日总罢工和群众示威达到顶点。这次运动，不仅仅是外籍工人的孤立斗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大量地投入运动，因而使得情况有了很大的进展，“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同年秋天，为了参加纽约市政选举，由中央劳动联合会发起，专门建立了以领导工人进行政治行动为目标的统一工人党。在它领导下，美国工人首次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以占全部选票31%（68,110张）的优势，使该党候选人亨利·乔治当选为纽约市长。尔后，许多城市以纽约为榜样，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并于11月举行的各州立法议会的选举中，分别在许多州使工人候选人当选。当时恩格斯就曾指出，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经过了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只有从政治上组成独立的工人政党才有出路这一真理，美国工人在运动开始后才6个月，就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进行活动，并在纽约市和其他地区的选举中获胜。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美国工人运动确实得到了飞跃的发展，是美国工人阶级发展的真正的起点。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38、440、442、445～446、465、470～471页。

英国事态的新进展。19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英国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几乎收买了整个工人运动，使之一直裹步不前。进入80年代之后，英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团体社会民主联盟，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海德门这样的个人野心家手中，运动一直进展不大。到80年代后期，情况却有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不仅大量的工人加入了由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工人俱乐部，而且工人转而把希望寄托给社会民主联盟，促使它采取一些与其领袖背道而驰的集会和示威活动，因而成为一种力量。恩格斯从这样一个复杂的事态中，看到了英国运动的主流。他指出，尽管不能把群众的行动和领袖的偏执混同起来，但是，只要不带偏见地正视事实，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这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不仅如此，英国最大的工人团体工联内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革。1887年9月5~12日，在斯温西举行的工联年会上，大多数代表不顾工联领袖和其他工人议员的反对，通过了关于地产国有化和建立单独的工人政党的决定。这些决定，显然同工联领袖一贯奉行的只搞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斗争，尤其反对成立工人政党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在老的工联内部开始了革命。^①

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普遍高涨的事实中，恩格斯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1888年1月初，他在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纳杰日杰的信中，以马克思逝世为界，把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划分成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点的阶段。他写道：“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我们党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把两半球的无产者在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大军所做的努力，定将取得彻底胜利”；马克思逝世后，社会主义又在美洲和欧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是这样大，以致有必要制定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59、564、681页。

共同的国际政策，至少对于欧洲的党是这样。”（重点号引者所加）恩格斯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已经成功地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①实现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不仅具备了客观的现实条件即阶级基础，也具备了主观的现实条件即指导思想。至于这种国际联合采取什么形式，要不要立即恢复旧国际，恩格斯仍持有异议。后来，由于可能派在召开国际大会和建立国际的问题上活动频繁，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有可能落入机会主义者之手，为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才实际地投入创建新国际的斗争。

2. 排斥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大会

1881年的库尔大会曾决定，委托法国工人党筹备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可是，为时不久，法国工人党内，因1881年大选失败，引起关于党纲的争论，并分裂为两派：居少数的法国工人党（盖得派）和占多数的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盖得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但忽视群众工作，脱离广大工人群众，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影响不大，再加上盖得、拉法格等人因在外省演讲被指控为“煽动内战和搞阴谋活动”，从1883年5月21日起被囚禁在巴黎监狱，以致工人党工作瘫痪，召开国际大会的大权，落到了当时在巴黎工人中有较大影响的可能派手中。1882年9月30日~10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在英国工联支持下，决定于1883年10月29日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按照可能派领导人在会前的说法，即将召开的国际工人会议“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代表大会，第三步是合法改组国际”。^②也就是说，他们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建立新国际的实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页。

^②《无产者报》（法），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185页。

开端。

为了把改组国际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能派不顾库尔大会的决定，私自将原定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改为“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并竭力排斥德、法等工人政党代表与会，企图把会议变成工联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可能派的一次国际聚会。这次会议，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只不过是可能派“同英国工人运动的叛徒、同工联的官方代表人物结成公开的联盟”。^①

和前次国际会议不同，巴黎会议提出了国际劳动立法问题，并要求对工作日予以限制。但是，会议所通过的相应决议，却用含糊的词句，掩盖了国际工人阶级在劳动立法这个重大问题上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而且把工人阶级斗争完全局限在工作日问题上，实际上，全盘接受了工联主义者否定政治斗争、反对统一的国际劳动立法的错误立场，从而受到工联领袖的欢迎。因此，它得到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喝采，却遭到其他国家工人组织的猛烈抨击。会后，瑞士工人组织代表会议，委托它所选出的行动委员会，专门发出告各国工人的呼吁书，对会议尤其是对它的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决议进行批评，并建议召开新的广泛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瑞士工人组织关于重新召开国际会议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1884年底，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又接过了这个旗帜，倡议于1885年5月召开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由于内部分裂，也未付诸实施。一直拖到第2年5月，在根特召开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在通过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决议后，再次提出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的问题，并委托党的领导机关，就会议问题与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协商，最后确定由可能派控制的国际工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0页。

展览会发起，于1886年8月在巴黎召开。

和上次巴黎会议不同，1886年8月23~29日举行的巴黎工人代表会议，其国际性较为广泛，有来自法、英、德、瑞（典）、比、奥、匈、澳等国的代表。其中，以可能派的代表团最庞大。实际上，会议全由可能派所把持。会议组织者要求辩论不应具有政治性质，只讨论特殊的经济问题。按照会议邀请书规定，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均未被邀请（包括法国盖得派）。工人政党的成员，也只是以工会活动家的身份与会。所以，它仍然是一次排斥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会议。

这次会议，突出地把国际劳动立法包括工作日时数的国际规则列为主要议程。^①

可能派代表达尔，向大会提出一个报告，吁请制定国际劳动立法，实施8小时工作日。这个报告，得到法国代表以及比利时代表安塞尔和德一巴普的支持。但是，英国工联代表对此却持否定态度。德国党代表在奥国党代表的支持下，对英国工联的政策进行严肃而又巧妙的抨击，由比而引起了持续两天的争论。会议最后以多数票通过关于推动各国政府在8小时工作日基础上制定国际劳动立法的决议，可能派也不得不表示赞同，只有工联7个代表弃权。通过争论，英国工联在国际舞台上处境孤立，从而也动摇了一味仰仗工联主义者的可能派领导人的地位。

围绕着关于在1889年召开国际大会的问题，与会代表发生了争论。比利时的安塞尔和德一巴普提出，为了推动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有必要成立一个以此为首要目标的国际组织。他们主张在1889年7月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以成立这个国际组

^①见《法国社会运动》杂志，第51期第124页。列入议程的还有：全面职业教育、工人联盟和各国工会联盟、各国劳动者状况、1889年国际大会等。

织，并作为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他们还建议，委托可能派负责这次国际大会的筹备工作。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比利时代表的建议，从而激化了创建新国际的领导权之争，为可能派控制新国际的创建活动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3. 伦敦国际工会组织代表大会前后

在1886年巴黎会议上，工联主义者遭到政治思想方面的失败，却未放弃对创建新国际的领导权的争夺。1887年9月5~12日，在斯温西举行的工联年会通过决议，定于1888年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会组织代表大会，讨论关于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问题。会议的筹备者为了把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摒之于会外，使之成为一次纯工会的聚会，在关于召开大会的声明中特别规定，与会者应是经由选举正式产生的工会代表，从而剥夺了仍处于非法或分裂状态的德、奥、法等工人政党与会的机会。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德国党首先作出反应。10月2~6日，在圣加仑召开的德国党代表大会，通过倍倍尔提出的议案，委托党的执委会，联合其他国家的工人团体，于1888年秋天，召开一个普遍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促使各国工人，为实现国际劳动立法采取共同步骤，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为加强国际团结，德党执委会表示，只要允许德党的代表出席伦敦大会，即放弃自己准备召开的国际大会。圣加仑大会后，倍倍尔、伯恩施坦受命前往伦敦，拜会了工联议会委员会和工联理事会书记，同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的代表会晤，随后还进行了长期通讯，试图说服英国人改变关于参加伦敦大会的条件。工联理事会顽固地坚持初衷，有意堵塞德国党进入伦敦大会的道路。对此，德国党执委会专门提出了抗议。1888年4月14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就伦敦大会一事发表声明，对德国党抗议工联一事不满，公然站在工联领袖一边。据此，德国党领导人重新提出了另

行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但是，不久，德国党又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支持法国工人党的建议。1888年10月28日~11月4日，即在伦敦大会召开前夕，法国工团联合会在波尔多（因警察扰乱改在布斯克）召开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提议，委托工团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同国内其他工人组织协商，以便在1889年国际博览会期间，在巴黎召开有工会、社会党代表参加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和筹划国际大会的决议，从而继德国党之后，再次同可能派针锋相对，提出召开另一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

伦敦国际工会组织代表大会，于1888年11月6~10日召开。实际上，它仍是一次由工联主义者和可能派主宰的大会。这次大会的代表条件、议程、程序、表决规则，事先都已拟好由工联伦敦理事会一手操纵，所有代表尤其是外国代表，必须遵照执行。^①正是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作出了关于委托可能派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建立国际劳工组织的决议。尽管工联领导人竭力想把这次大会开成非政治性的大会，使决议具有改良主义性质。但是，大会仍然通过了关于进行国际鼓动以尽快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决议。特别值得一提的，大会的多数代表不顾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法国代表团关于建立工人政党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组成阶级政党，并强调这个党应区别于其他政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站在同其他政党对立的立场上，以便由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②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内容和阶级特点的决

①列入大会议程的有：消除劳动者自由联盟的障碍的方法、加强国际工人间的联系、通过立法限制或减少劳动时间等。见《法国社会运动》杂志，第51期第126页。

②《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之间》，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190页。

议，粉碎了工联领导人企图把改良主义强加于国际工人运动的阴谋。同时，它也表明，各国工人阶级包括工联和可能派内部的革命倾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心力，正在增长。

可能派领导人，从伦敦大会再次获得了筹办国际大会以成立新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利以后，积极地进行一系列活动，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大会议程、成员和权限问题，作出了由可能派全权裁定和一手操纵的具体规定。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波尔多通过关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另一次国际大会的决定后，却举棋不定，犹豫彷徨，显得软弱无力。创建新国际的大权行将旁落，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法国工人运动，面临着走偏方向的危险。为了帮助法国工人党摆脱被动局面，1888年12月4日，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根据当时的局势明确地指出：“如果你们一点事情也不做，不宣布你们要在1889年举行代表大会，并准备这个大会，那么人家都跑到布鲁斯派（即可能派——引者）代表大会去了，因为谁也不会跟着退出去的人走。快宣布你们的代表大会吧，在各国社会主义报刊上声张声张，好让人们感到你们居然还存在。”同时，恩格斯还告诉拉法格，当前应努力开好特鲁瓦代表大会，通过大会作好一切准备工作。“这次大会应当成功，否则你们的党就会完结。”^①正是在恩格斯的大力敦促下，法国工人党在特鲁瓦大会上进一步采取了新的行动。

特鲁瓦大会，本来是一次可能派的大会，由可能派地方组织负责筹备。大会召开前，当地地方委员会提出，应该邀请法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与会。可能派领导人担心在外省拥有巨大影响的盖得派左右大会，因而拒不参加。这样一来，特鲁瓦大会就变成了工会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盖得派和瓦扬派在会上占了优势，这次大会于1888年圣诞节期间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15～116页。

来自各地327个工会、社会主义组织的36名代表。鉴于伦敦大会已委托可能派筹组新的国际大会，实际上就是要将一切不受可能派影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排除于会外，因此，特鲁瓦大会决定，1889年在巴黎召开同可能派大会对立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从而确认和批准了波尔多工人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同时，大会还决定成立大会组织委员会，拟邀请一切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到1888年底，由于可能派在工联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拼命争夺召开国际大会的领导权，终于形成了两个国际大会将同时召开的格局。

4. 为孤立可能派而战斗

对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事，德国党一直密切注视着。但是，对于在巴黎召开这种会议，还有它自身的考虑。由于普法战争在两个民族间造成的严重对立，德国党领导人认为，在巴黎开会，德国代表没有免受袭击的安全保障，因此，竭力主张在其他中立国家举行。还在伦敦大会结束不久，德国党就曾于1888年11月26日和12月4日，两次致函可能派，并通过纽文赫斯传递信息，希望在瑞士另行召开国际大会。这一计划，立即遭到可能派的强烈反对。结果德国党关于在瑞士召开国际大会的问题从此不再提起。①同时，可能派还通过海德门等人，在伦敦积极活动，企图拉拢德国党领导人，造成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党将出席可能派国际大会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等人也担心，德国党将倒向可能派，出席可能派的国际大会。为帮助德国党领导人认清形势，恩格斯于1889年1月5日，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从分析两个大会对峙的局势入手，他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同可能派的斗争是“拼死斗争”，而且由于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如果同这帮人混在一

①见《拉维向可能派大会的报告》，载《国际巴黎(可能派)大会记录》。

起，“就意味着你们背叛了以往奉行的整个对外政策。”^①

在恩格斯帮助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共同商定，并经过恩格斯明确地告诉拉法格，德国党从来没有想撇开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而直接参加可能派大会。但是，他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特别是由于可能派已经取得召开大会的合法权利，而荷兰人又以邀请可能派参加大会作为他们与会的条件，很有必要召开一次预备会议，以统一行动。为此，德国党领导人提出，1月18日在南锡召开预备性代表会议，并由李卜克内西出面，正式邀请可能派、盖得派与瓦扬派出席。^②恩格斯支持这一建议，认为“这将是迫使可能派服从的绝好机会”。他批评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犹豫观望。希望拉法格尽快行动，并争取瓦扬派共同行动。^③法国工人党接受了这个建议，同德国党一起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者。

为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作准备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会议，于1889年2月28日在荷兰海牙召开。来自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9名代表和英国社会主义同盟、丹麦社会民主党2名观察员出席。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其中，包括大会的条件、时间和大会的权限。会上，大多数代表主张，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应当是统一的和独立自主的。他们谴责了可能派限制大会权力和窃取大会领导权的企图，坚持即将举行的国际大会拥有最高权力。经过多方努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22～123页。

^② 后来会议改在海牙举行，时间延至2月28日。德国党又再次邀请可能派参加，仍然被拒绝。后来，可能派还以未承认其组织代表大会的权利和参加会议的国家太少为借口，再次拒绝参加海牙会议，并于2月16日发出由它召开国际大会的第1号通知书。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32～133页。

与会代表共同签署并通过了决议。“决议”规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在巴黎举行；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在适合每个国家的政治法令的条件下，派代表参加大会。大会的议程，包括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和对工厂、对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以及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与途径等问题。“决议”强调指出，代表大会在审查代表资格证书和确定议程方面，将是有主权的。关于大会的组织工作，会议出于策略考虑，最后达成如下协议：将召开大会的权力授予可能派，并要求可能派必须完全承认这次会议关于国际大会性质和原则的决议。如果可能派拒不承认和服从上述条件，则由比利时、瑞士两个中立国的社会主义者负责召开国际大会，并将发表一个反对可能派的声明。

3月初，海牙会议代表、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委员沃耳德斯受托前往巴黎，向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递交海牙会议决议。3月20日，可能派开会决定对海牙会议决议作出答复。可能派认为，只有它筹备组织的国际大会才是合法的，其他的大会都是冒牌的，不是国际意志的产物。同时，可能派坚持，代表资格应由各国而不是由大会审查，反对代表大会对议程拥有全权。实际上全盘推翻了海牙会议决议。^①

在创建新国际的过程中，海牙会议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经过会内会外的努力，大多数代表在两个基本点上达成协议，即允许所有人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大会，从而粉碎了可能派排除德、法两党代表与会的阴谋；承认国际大会的最高权力，从而使可能派窃取和把持大会权力的企图不能得逞，进一步孤立了可能派。恩格斯指出，在争夺创建新国际领导权的战斗中，法国马克思

^①见《拉维向可能派大会的报告》，载《国际巴黎（可能派）大会记录》。

主义者已经赢了一半，“要把在海牙所获得的阵地当作一个起点，当作从敌人那里夺得的第一个阵地，并且当作将来获得成功的基础。”为此，务必坚持海牙会议决议，加紧做好大会的准备工作，使可能派的国际大会成为泡影，把它从国际工人运动中排除出去。^①

面对海牙会议的挑战，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也在积极进行活动。一方面，他们在与会代表的条件上作了一些让步，决定接受德国、奥地利、俄国代表的委托书，却拒不承认大会拥有主权；另一方面，他们在比利时、英国等处四出活动，企图抵销海牙会议的影响。3月16日，社会民主联盟机关报《正义报》，发表一篇题为《德国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短评，公开攻击坚持正确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在英国揭露可能派及其同盟者的阴谋，以争取社会主义者和广大的工人，同时也为了揭露在可能派与社会民主联盟间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英国工联领导人，恩格斯让当时居住伦敦的伯恩斯坦写出《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的长文。经过恩格斯的修改，先用英文在伦敦出单行本，后又译成德文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党国外机关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依据确凿的事实，逐一驳斥了可能派及其同盟者在召开国际大会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首次公布了海牙会议决议，说明了社会主义者关于国际大会的原则立场，并明确地指出，可能派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党。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震动。它象一颗炸弹，炸开了海德门—可能派密网的缺口，使英国工人看清了可能派的真面目，了解了两个大会形成发展过程的事实真相。在原来海德门极力拉拢的英国工联中，许多基层组织组成抗议委员会，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反对工联领袖拒绝参加国际大会的错误立场，并主动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61页。

地要求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海德门的社会民主联盟内部，也出现了以秦平为代表的反对派。可能派内部同样不得安宁。巴黎第14选区小组因公开表示不满被可能派领导人开除；第13选区小组也退出了与可能派的联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靠了伯恩斯坦的小册子，我们赢得了第一仗。”^①

就在同可能派争夺创建新国际领导权开始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海牙会议的参加者，却表现出不应有的犹疑和动摇。比利时工人党什么事也不干，对一切来信既不作出回复，又不提出单独召开国际大会的问题，更不按会议要求发表反对可能派的声明，最后干脆找了一个拙劣的借口，说什么海牙会议应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审议，直到4月22日才作出关于向两个国际大会都派出代表的决定，致使良机顿失。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德国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也犹豫不决，他既不催比利时人迅速采取行动，也没有和其他人磋商召开代表大会，而是一味等待。再加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敢反驳来自可能派的攻击，一再在大会准备工作的细节问题上反复挑剔，放松了宣传组织工作。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却趁虚而入，借助各种宣言、通告来控制舆论，并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沉默和犹豫，到处网罗与会代表，甚至还把手伸进德国党内，煽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席佩尔、奥艾尔等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事态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夺得的全部阵地，开始一个一个地被断送掉，甚至有失去全部原有阵地的危险。对此，恩格斯心情十分沉重，他严重警告法国工人党领导人，如果他们不采取积极步骤反击可能派，他将退出创建新国际的工作，重新去搞他已扔下3个月的整理《资本论》第3卷的工作。^②由于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德、法两党领导人的态度才开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96页。

转变。5月2日，李卜克内西正式函告拉法格，德国党决定参加，并以他和倍倍尔的名义，支持法国工人党倡议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大会，为此已作好出席大会的准备。由拉法格积极参加写成的关于召开国际大会的呼吁书，也从5月10日开始分别发表在英、法、德等国社会主义报刊上。为了推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依靠伯恩施坦、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博尼埃等人，通过《星报》、《工人选民》等报刊，继续揭露可能派及其盟友社会民主联盟。这时，伯恩施坦发表了第2篇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它全面系统地披露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同可能派及其盟友斗争的实质。恩格斯还直接参与大会筹备工作，组织人员翻译出版多种文字写成的关于召开大会的呼吁书，通过书信往来和东奔西走，动员各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支持和参加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国际大会。

由于德法两党领导人态度的改变，特别是恩格斯忘我地工作，“象少年人那样地投入战斗”，再加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密切配合，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的进展，出乎意料地快。各国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声明纷至沓来。到6月10日，在《组织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上签名的，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35个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108名代表（含组织委员会成员）。

围绕着创建新国际领导权问题所开展的斗争，持续了数年之久，在海牙会议之后，即1889年3月之后，显得尤为突出。恩格斯始终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并为指导这场斗争付出了全部精力。“三个月来把我的全部时间都占掉了。信件来往不绝，东奔西走，吃尽苦头。”恩格斯之所以如此认真，决非偶然。在他看来，以可能派及其盟友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为一方，同以联合起来的各国社会主义者为另一方的斗争，是过去旧国际（国际工人

协会)分裂的重演。一边是巴枯宁的信徒,只不过无政府主义的旗帜换成了可能派旗帜;另一边,则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和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斗争的结果,“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得更惨。”^①

四、两个同时召开的国际大会

1. 鲜明的对比

1889年7月14日和15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可能派负责筹备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几乎相同的议程、在同一城市(巴黎)开幕,并在同一天(7月20日)结束工作。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实属罕见。看起来,十分巧合。实际上,这一事实本身,集中地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工人运动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两者在人员构成、情况报告、主要议程、最终结局等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点。

出席可能派大会的代表,来自14国共608人。其中,法国以外的代表,只有84人,占代表总数的13.8%;除了英国(39人)、意大利(12人)、比利时(8人)外,其他国家的代表屈指可数。如果扣除中途退会和同时参加两个大会的代表,上述数字还要小。^②占代表绝大多数的,是由可能派领导人指定的524名法国代表。因此,这个大会,实际上是可能派的大会。出席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代表,开始是391人,低于可能派大会的代表总数。但是,来自22个国家的外国代表总数(184人)在全体代表中的比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07、242、263页。

^②本节以下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两个国际大会记录。

例（47%），却远远超过可能派大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许多落后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向马克思主义者大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有庞大的代表团，而且远在美洲的阿根廷、美国以及芬兰的社会主义者，也派代表列席了大会，充分地反映出大会的广泛性和权威性。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团体的国际聚会，在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中，有一大批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工人领袖，如德国党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福尔马尔、列金；法国的盖得、拉法格、瓦扬；奥地利的阿德勒；英国的凯尔·哈弟、艾威林；匈牙利的弗兰克尔；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荷兰的纽文胡斯等。把这次大会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性盛会和检阅，一点也不过分。可能派大会却相形见绌。除了布鲁斯和海德门外，著名人物寥寥无几，而且有一批外国代表，仅属于国外的流亡者，其代表性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就出席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法国代表而言，也不象可能派那样清一色，而是包括了盖得派、瓦扬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生动地体现了各派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和统一。①两个大会的会场布局，也反映出不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能派大会则郑重宣布：“不争得劳动权，不把正义和平等变成全人类关系的准则，就决不罢休。”前者，以“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所有

①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曾指出：在可能派大会那里，“好些国家的代表既没有从这些国家得到委托，而且除了代表自己根本不代表任何人。”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就所代表的民族来说是齐全的，就它所代表的派别来说是齐全的”，“这是配得上称为国际代表大会的”。该报1889年7月27日社论，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8期第178、179页。

权，使生产资料社会化”，作为与会者的目标和要求；后者，则以安放戴有红色弗吉尼亚帽的共和女神塑像，为代表的精神支柱。一个追求社会革命，一个崇尚民主共和。对比何等鲜明。

开幕之后。两个大会都增加了听取各国代表团报告的议题。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用了3天时间，先后听取18个国家29名代表的22个综合报告、5个专题报告和两个讲话，还散发了11个书面报告。这些报告和讲话，全面地介绍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进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具体地概述了各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重点地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现状和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的当前任务。有些国家的代表（如法国的盖得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还结合本国的实际，深入地揭示了运动进展迟缓的原因，指出了使革命运动真正成为工人运动的正确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告，不仅来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展卓有成效的德、俄、英、法、美、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一些小国（如阿根廷、匈牙利、捷克）的运动状况，也在会上得到反映。上述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真正具有广泛的国际性质，它代表着已经超出欧洲范围并仍在蓬勃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在大会上出现了一个年轻茁壮、生气勃勃、日益发展的以及富于乐观情绪的世界工人运动的总的情况。”^①可能派大会则不然。本来外国代表就不多，其代表性也很有限，是否向大会报告各国情况，又议论纷纷，最后只是在5国同意、3国反对、3国弃权的情况下，用了不到两小时，听取比利时、丹麦和西班牙3国代表关于劳动状况的报告。美、英等主要国家的代表，干脆宣布不作报告，而且每个报告人报告不超过10分钟。结果，搞得冷冷清清，不了了之。3个报告人也只是介绍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和争取普选权与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有意地回避了社会主义思想

^① 《三个国际的历史》，第137页。

传播、建立工人政党和坚持政治斗争这样一些当时工人运动中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两个大会、两种报告的情况，不仅突出地说明了两者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反映了两个大会不同的指导思想。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报告人之间，也有着分歧和意见对立。但是，由于倍倍尔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会上占了上风。与之相反，片面强调和美化经济斗争，夸大当前斗争意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是可能派大会报告人的基调和主流。

国际劳动立法，是两个大会共同的主题，并提出了以实现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的立法内容，强调了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实现国际立法的重要性，同时，对反对一切改良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是，可能派大会仅仅通过了一项由英国代表黑丁利（议题报告人）提出的、包括14条内容的国际劳工立法决议案。其中，包括了国际劳动立法的主要原则，却没有提出建立、实施和监督劳动立法的方法与措施。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则不然。为了深入开展争取国际劳动立法的斗争，它不仅深入地讨论了立法的主要原则，而且把实现劳动立法的方法和途径问题，专门列入议程。由于德、法等工人政党代表的坚持和大多数代表的共同努力，最后分别通过两个相应决议。这两个决议不是一般地论述国际劳动立法的主要原则，而是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不断强化的剥削和奴役入手，明确地提出：要把争取国际劳动立法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把当前任务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这个根本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它们还进一步规定了实现国际劳动立法的方法和途径，并突出地强调，要立即开始利用一切手段，包括集会、报刊、请愿、示威游行等手段开展斗争，以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推动国际劳动立法运动，同时，以选举和议会活动等方法保证大会决议的贯彻实施。^①两个大会由于指导思想不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一、争取国际劳动立法”。

同，对同一议程却得出了不同结论。一个就经济斗争谈经济斗争，用改良主义的态度看待社会改良，一个是从政治斗争着眼看待经济斗争，用革命的方法进行社会改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在其他议程上也有表现。马克思主义者大会，除讨论原定的3项议程外。还根据当时斗争的实际需要，新增加了关于废除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的议程，并通过相应的决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以争取实现以8小时工作日为内容的国际劳动立法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大会，根据美国工人斗争的经验，专门通过了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明确规定各国无产阶级应在“五一”这一天统一行动，实行国际性的游行示威，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进一步贯彻、推行大会所通过的国际劳动立法决议。这些文献，更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以马克思主义者大会为起点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立刻而且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①

两个大会体现出的不同指导思想和实际结果，在与会代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在可能派大会进行过程中，就有荷兰代表离开会场，转而参加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美国工人党代表布什，到可能派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去了一趟，发现那儿的社会主义味道不够，因而也转到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来。最有意思的是，7月19日晚上，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主席李卜克内西，在旅馆同上百名法国工人会见。其间，许多参加可能派大会的代表表示，他们不幸犯了过失而参加了可能派大会，对不能参加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感到惋惜。英国代表布劳恩，曾受5.7万名机械工会会员的委托，出席可能派大会。但是，他却极为忠诚地表示想出席马克思主义者大会，以向所有无产者致意。经同意，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页。

7月20日，他在马克思主义者大会作了发言，以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在发言中预期，从现在起的5年之内，工会头头将会转向社会主义阵营。从出席的实际人数看，到最后一次会议时，可能派大会总共剩下58人，①不到原来代表总数的1/10；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到会议的第3天（7月17日），代表总数却由原来的391人增至407人。各国工人阶级在明了真相后，把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马克思主义者大会上。据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记录统计，有许多国家的工人组织向大会发出贺信贺电。这些函电，除表达各国工人关于增强团结、实现国际联合的良好愿望外，还高度评价大会的意义和影响。比、德、法、丹麦等国工人组织，还以进行罢工斗争的实际行动，对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可能派大会却显得特别冷落。大会进行的7天中，它只收到来自英国、意大利、瑞士3个国家的5封贺信，而且几乎都同时向两个大会表示祝贺，希望为加强国际团结而努力。这无异于给可能派一记耳光。就连对工人运动抱仇视态度的德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比其他代表大会重要得多，因为它所有的参加者都是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进程表明，德国人以自己的组织和成就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②

2. 合并尝试的失败

两个国际大会同时召开的格局一形成，就有人提出使两者合并的方案。直到大会开幕前夕，丹麦工人党还再次同可能派联系并建议两个大会合并。7月9日，可能派以全国委员会国内事务

①见《恩格斯与保尔和劳尔·拉法格通讯集》，第2卷第317页。

②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226页。

部书记拉维的名义，在答复照会中指出，只有按照下述条件才能实现两个大会合并：代表委托书的审查，将在代表大会范围内分国进行；只讨论两个大会原定的议程，不再增加任何新内容。^①这个答复照会，实际上以提出对方难于接受的条件的方式，关死了两个大会合并的大门。

与可能派立场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大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即明确地提出：“大会对所有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忠诚战士，都是开放的，凡是愿意共同参加解放事业的人，都不会被拒之于门外。”后来，李卜克内西再次重申，统一的障碍，不在我们这方面，而在对方。7月15日，大会议程一经确定，沃耳斯特即以比利时代表团名义，建议尽快讨论合并问题，并由德一巴普代表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宣读致两个大会的信，要求根据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由于两个大会引起的对立尖锐化。由于比利时代表的这一行动，使大会不能按原定议程进行，而开始了关于两个大会合并问题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在合并问题上形成3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一种是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代表提出的关于无条件合并的主张。他们认为，两个大会议程几乎完全相同，维护世界劳动者的团结统一，是全体劳动者的义务，可能派又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主张双方承认对方代表权的有效性，并选出一个委员会就统一问题进行协商。据此，形成了关于无条件地合并的“纽文胡斯提案”。这个提案，得到凯尔·哈弟、沃尔德斯、克里斯特森等人的支持。一种是以法国工会代表提出的关于无条件地反对合并的主张。他们认为，可能派决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产

^①见《拉维向可能派大会的报告》，载《国际巴黎(可能派)大会记录》。

阶级政治家，决不能同敌人妥协，同最坏的敌人结成联盟。国际大会只能是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大会；但是，欢迎对方前来参加这个大会。据此，形成了关于无条件地反对合并的“特雷桑提案”。它得到莫利斯、拉维涅、多尔梅等人的支持。最后一种是德、法、奥工人政党代表提出的关于有条件地统一的主张。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的统一，曾作过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事实证明，要求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主张，基于统一是无产阶级解放不可缺少的条件，依然准备同对方和解和统一，并要求对方以同样精神通过一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接受的决议。据此，形成了关于有条件地统一的“李卜克内西提案”。这个提案，得到阿德勒、盖得、瓦扬、伊格列西亚斯等人的支持。经过充分的讨论，大会于7月16日，以12票（按国籍表决）赞成，通过了“李卜克内西提案”。“纽文胡斯案”（4票）、“特雷桑案”（2票）被否决。^①

同时参加两个国际大会的意大利代表契普里昂尼和科斯塔，受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委托，于7月16日晚前往可能派大会，通报上述提案的主要内容。经过一个晚上的激烈辩论，可能派大会以8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下述决议：“合并的原则可被接受。但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应把他们的委托书，交统一的代表大会分国审查。”这个决议，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的立场，把自己看作是唯一合法的国际大会，从根本上否认对方的合法性。

7月17日，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听取可能派大会的决议通报后，它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同可能派直接谈判。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大会就此作出如下决议：“鉴于可能派大会本月16日会议所作的决定，大会委托它的常设局，采取必要的措施。”7月17日

^①大会通过的“李卜克内西提案”，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66~67页。

晚，意大利代表受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委托，以大会常设局书记和主席的名义，正式向可能派通报关于合并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地指出：“只同意两个代表大会实行无条件地合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和任何条件，当然也不能接受任何限制和任何条件。”这个决议仍然未被可能派大会所接受，可能派领导人，还把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和形成两个大会局面的责任，完全推到马克思主义者身上。至此，两个大会合并的尝试，由于可能派作梗，以失败而告终。

3. 新国际的实际开端

两个国际大会都曾涉及关于创建新国际的问题，又几乎都得出了不成立常设性国际机构的结论。但是，两者的出发点却不一样。

可能派大会，在讨论“各国工人进行经常联系的手段”议题时，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认为，有必要首先建立国际工会组织，加强国际协商和联系。但是他又强调，不应成立常设的中央委员会，因为“这样的组织势必具有权威的性质”。（重点号系引者所加，下同）法国可能派领导人拉维，并不反对建立国际性的统计委员会，这种机构“仅限于向所有的人通报情况，但不能发号施令，它要服从委托人的愿望”。至于国际性的中央委员会，他认为，“可能孕育很多危险”。“谁需要建立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来指挥一切，不妨就让他去试试吧。”这些反对建立常设性国际机构的理由，带有浓厚的反权威主义色彩。它在强调各国独立自主的同时，却把它与国际间社会主义运动必不可少的协调、相互支援和统一行动对立起来；在坚持维护各国组织及其成员的个性、尊严、独立性的同时，却否认乃至抹煞了各国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的共同性和一致性，从而根本无视建立常设机构的必要性。基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可能派大会最

后采纳英国代表格林伍德的建议，通过相应决议规定，各国之间应建立经常联系，并由一个国际通讯中央机构来推动。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或工人组织的全国委员会，每年轮流履行这个机构的职能。其使命是：接受、翻译和分发有关劳动者社会状况和生产状况的各项情况通报。该委员会不得作出超越上述职能的决定。^①

同可能派大会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并不否认建立常设性国际机构的必要性。为了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它不仅选出了大会主席团，成立了大会常设局，还建立了贯彻国际劳动立法决议的执委会，确定瑞士为执委会的所在国。执委会由5名瑞士代表组成，并在出版《8小时工作制》机关报的那个城市着手工作。同时，这个执委会，还受委托筹备召开下届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和它的常设局领导人，一开始就有把执委会视为经常性国际机构的意图，注意从组织上加强它的作用。但是，他们并不主张，马上就把这种机构变为常设的国际机构和领导中心。7月20日讨论时，两名西班牙代表、1名匈牙利代表曾要求通过一项提案规定，由大会的常务局任命一个由各国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以维护各国工人组织和政党之间的国际团结，当即遭到瓦扬的反对。他认为，从许多国家（主要是指德国）的法律考虑，这个议案行不通，应予撤回。从当时的情况看，马克思主义者大会领导人，之所以不愿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作出决断，并不是象可能派大会领导人那样，基于“反权威”的考虑，主要是因为条件不成熟。还在两个国际大会召开的前夕，当谈到以某种形式恢复旧国际的问题时，恩格斯曾指出：“对于这件事，德国人将全力反对而且应该反对。”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政党，处于反动政府的高压之下，经常有100多人被监禁。“他们没有力量搞国际组织，在目前搞这些组

^①可能派大会的讨论情况和相应决议，详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8期第208~212页。

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①同时，社会主义还没有将欧洲的整个工人阶级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尤其是法国和英国，都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党。欧、美工人运动，由于两个国际大会的召开还处于分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国际都是没有意义的。同时，恩格斯对于积极张罗成立国际领导机构、并与可能派联系密切的比利时人，也存有戒心。1891年8月，当法国工人党的博尼埃告诉恩格斯，他和盖得要恢复国际及其中央委员会时，恩格斯曾直接了当地向他指出：“这就意味着把整个事业交给比利时人（唯一可能的中央委员会），而又明明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这意味着由于愚蠢地企图去做时机尚未成熟的事情。”^②由于恩格斯一再坚持和德、奥等主要工人政党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大会既没有立即产生类似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或总委员会那种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马上为实际已经开始活动的新国际提供一个章程和名称，而是以“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这种国际联系的新形式，作为新国际这个“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实际存在的形式。^③

关于确定下次代表大会的日期和地点问题，正式列入了可能派大会的议程。7月9日，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在致两个大会的信中提出，要求给予它这样的荣誉，由它来组织定于1890年或1891年召开的下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如果都能接受这项建议，那将是两个大会并存局面的结束。7月20日，比利时代表团再次提出关于下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动议。它主张由比利时工人党负责筹备；并规定，凡能证明存在6个月的各国社团均将接到邀请。可能派大会讨论通过了这个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32页。

③ 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14页。

议，并在比利时代表勃朗瓦莱承诺决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派命令的前提下，以5国赞成、2国反对、1国弃权确定，在下次国际大会召开前，由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履行国际通讯中央机构的职能。

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会并没有把确定下次大会的时间、地点问题列入议程，只是在讨论“实现国际劳动立法的方法和途径”议题时，决定成立贯彻国际劳动立法决议的执委会。这个执委会，有权在瑞士或比利时的某个地方，召开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具体地点将在以后确定。和可能派大会的有关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显得含混不清，再加上瑞士人工作不力，致使大会的筹备工作落到接近可能派的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手中，而且后者已开始按照可能派的意图，在英国只邀请英国工联，而不邀请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参加。即将召开的下届国际大会，又将成为一次可能派的大会。为此，恩格斯于1890年9月15日，向拉法格明确地提出两个大会的合并问题，并建议，利用10月在哈雷召开的德国党代表大会举行一次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以确定合并的原则和计划，使统一的国际大会得以正常进行。10月16~17日，参加德国党哈雷大会的9国代表同德国党代表一起举行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可能派在比、荷等国已失去影响、并面临着内部分裂瓦解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由恩格斯提出的决议，定于1891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统一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可能派在承认大会拥有充分的最高权力的条件下被允许参加大会。上述决议的通过，为举行一次统一的国际大会奠定了基础。

新国际，就是以定期召开国际大会的形式，实际上开始了它的工作。在7月21日晚举行的宴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主席瓦扬提议，为“新的国际”干杯；另一位主席李卜克内西提议，为“建立世界联合国家”干杯。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的心目中，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已成

为新国际首次代表大会。^①李卜克内西称它为“19世纪最伟大的文化胜利和文化事件。它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瓦扬认为，“它以光辉的方式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自觉地、系统地提出被压迫者权利和国际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者有计划地一致行动的时代。”

^①对此，恩格斯有保留。直到1891年9月，国际布鲁塞尔大会通过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决议后，他才明确地表示：“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46页。

第 二 章

始初奠基和凯旋行进时期

(1889~1896)

继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之后,新国际分别于1891年、1893年、1896年,在布鲁塞尔、苏黎世和伦敦召开大会,①由此开始了它的第1时期,即始初奠基和凯旋行进时期。这个时期,以马克思主义者战胜可能派发端,以国际工人阶级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于国际大会之外结束。

在历时7年的过程中,新国际始终围绕着争取国际劳动立法而开展活动。它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1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以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经济纲领,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并在欧、美两大洲实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首次统一行动,充分地显示了无产阶级巨大的革命潜力。同时,面对着上世纪末国际政治生活空前活跃的新形势,就军国主义和战争、土地和农民、殖民地和民族自决、垄断组织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等重大问题,通过一系列符合历史

①布鲁塞尔大会,仍沿用“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名称;苏黎世大会,改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伦敦大会,则进而称“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从1900年巴黎大会起,才一直使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名称。

实际和各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决议或结论，从而为国际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国际，是在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运动普遍高涨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工会组织的壮大，工会运动的发展，它也得到壮大发展。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各国的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是国际历次大会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尽管各国的发展水平不一，发展规模和组织程度也各异，但是，作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呼声的一致反映，国际大会作出了关于各国工会组织逐步集中化和国际化的决定，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率先提出关于建立各国工会中心和国际工会组织的问题。与此相适应，建立经常的、统一的国际组织机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果说，旧国际始终贯串着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而且由于巴枯宁主义者的破坏、捣乱，使其不得不宣布解体；那么，新国际的命运要好得多。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事业的继承者，它也曾在其内部一度容纳了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它并没有为其所左右，而是将其坚决地予以排除，再次取得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从而保持了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要不要开展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议会活动，国际大会曾多次进行激烈辩论，并逐步确立了以正确处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政治策略，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新鲜经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迎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并在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这个时期的斗争并不彻底。在强调“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同时，往往掩盖或忽视了右的改良主义倾向，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当作无政府主义来看待。其结果，“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右的改良主义倾向，却在一种认识片面性的影响下，堂而皇之地蔓延开来，为新国际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和内忧。

一、争取国际劳动立法

1.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由来已久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无限贪欲，总是驱使它力图延长工人的工作日，以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资本刚刚问世，小生产尚未为大生产所完全取代，资产阶级还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而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所以，当时，工人还没有直接地感受到资本家延长工作日之苦。在英国，直到18世纪70年代，正常工作日仍为10小时。经过产业革命，情况就不同了。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小生产者大量破产，劳动者已完全隶属于资本，资本家无须再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只要凭借雇佣的经济关系，即可直接地强使工人延长工作日。^①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人的工作日，已延至14~16小时。这种无节制地、人为地延长工作时间，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果。资产阶级国家也担心无产阶级状况的恶化，会造成工业人口的蜕化，而使劳动力枯竭。因此，不得不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之下，由用法律延长工作日转而实行各种工厂法来缩短工作日。这个过程，是从1833年开始的。这一年英国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对少年工人（13~18岁）的劳动时间，稍稍作了些限制，将其控制在每天14小时之内，但没有限制成年工人的工作日。为此，由英国工人率先开展了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这种斗争，一度成为宪章运动的旗帜。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终于通过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10小时工作日的新工厂法（1848年5月1日生效），后又经过1850年和1853年的补充，逐步将10小时工作日，推广到整个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由于英国

^① 详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

工人阶级的影响和推动，通过1848年二月革命，法国采取了适用所有工厂、作坊和所有工人的12小时工作日法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①

8小时工作日运动，起源于英国。1834年2月，英国奥尔丹棉纺厂工人，就曾举行要求8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运动，最终却未取得什么成果。时隔两年之后，当美国费城技工已经取得10小时工作日之后，1836年11月19日，美国《全国劳工报》进而宣称：

“我们决不希望永远保持10小时工作制，因为我们相信每日劳动8小时，对于任何人都已经足够了。”到40~50年代，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日制，已经成为美国许多工会团体的一致要求。波士顿工人则倡风气之先。经过斗争，该城的造船工和油灰工，分别于1842年与1854年5月24日，正式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日。正是在此基础上，美国于60年代初，开始形成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广泛运动。^②

1863年，美国全国机械工会与铁路工会举行年会，正式通过关于要求以8小时为合法工作时间的决议，并发起成立了波士顿8小时工作日同盟。其领导人是机械工人史都华。在他领导下，同盟发起了一场统一的、向各州及全国立法机关请愿以要求法律规定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其口号是：“工时要缩短，工资要提高。”1866年，这个运动，已具有全国规模。当年8月20~25日，全国劳工协会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争取8小时工作日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目前，要把我国劳工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头一件要做的大事，是制定一项法律，使美利坚合众国各州都以8小时为法定工作日制。我们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达到这个光荣的目的。”^③为贯彻执行决议，组成了以大会主席为首、由各州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会见当时的

①《资本论》，第1卷第333页。

②见《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545~554页。

③《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51页。

美国总统约翰逊，要求他给予合作，以实现8小时工作日。经过美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斗争，1868年6月25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关于联邦政府雇佣的一切劳工、技工及其他工人一律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法令。^①可是，这个法令尚未完全付诸实施，由于1872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美国最高法院于1876年宣布，联邦政府可以与雇员就工作时间单独达成协议，从而实际上废除了上述法令。争取8小时工作日同盟也逐渐趋于瓦解。

马克思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工人运动。1866年8月底，在为国际工人协会临时中央委员会写给行将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指示信”中，马克思指出：“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他建议大会为此作出决定，“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同时，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强调这一议案的重要性。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言，“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失败”；对工人本身而言，“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②日内瓦大会，讨论了“指示信”中关于限制工作日的具体建议，在排除反对立法等政治活动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干扰之后，大会通过关于工作日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大会建议8小时为法定工作日制。美国工人现在正普遍要求缩短工作日；我们为全世界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③1868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布鲁

①见《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565～5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5～216页。

③载《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以下简称《历史资料I》），第52～54页。

塞耳代表大会又重申这个决议，而且进一步地强调：“将这个决议付诸实施的时刻已经到来，各分部都必须在有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各个国家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实际的宣传鼓动。”^①后来，由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以及巴枯宁主义者的破坏和干扰，这些决议以及在世界范围进行宣传鼓动的政策和纲领，还未来得及拟制和实施，国际就已陷于解体。但是，国际工人协会这两次代表大会，却在国际范围内提出了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

80年代，特别是1882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美国工人阶级，再度举起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旗帜。1883年8月，劳动骑士团第3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两个主要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公布其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以表明它们对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态度。同时，大会还把争取8小时工作日，正式列为劳动骑士团的近期纲领。^②从此，又掀起了运动的新高潮。到1888年，运动的领导权，由日趋衰落的劳动骑士团，转到“劳联”手中。鉴于1885~1886年通过地方性罢工争得8小时工作日这一成功经验，“劳联”决定重新发动一场运动。具体办法是：每年由一种工业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罢工，罢工者由其他未投入罢工的工人资助，直到每种工业依次每年举行罢工，并普遍争得缩短工作日的让步为止。

美国重开争取8小时工作制运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86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专门听取了关于吁请拟订国际劳动立法以实施8小时工作日的报告。这个报告受到许多与会代表的赞赏。比利时党的代表安塞尔和德一

①《文献选编》，第1卷第364~365页。

②见《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第250页；《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上册第13~14页。

巴普，进而建议成立一个以8小时工作日为首要目标的国际组织，并力主于1889年法国大革命百周年之际，在巴黎召开该组织的成立大会。这个建议，得到会议认可。由此开始了各国工人的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的国际劳动立法运动。

2. 工人阶级当前经济要求的系统纲领

新国际坚持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日制正确方向，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国际工人阶级当前经济要求的系统纲领。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而言，尽管英、美等国部分工人，通过斗争实现了8小时工作日制，劳动条件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成果并不牢固，改善也极其有限。欧、美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仍然极其恶劣，在经济危机时期则尤为突出。以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德国为例，据德国代表团向1889年巴黎大会提供的报告，他们对32家玻璃工厂3,500名工人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仅劳动时间一项，镜子涂料业，每天10~12小时；灯具行业，12~14小时；玻璃珠宝首饰行业，竟高达16~18小时。^①因此，继续进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真正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仍是摆在国际工人阶级面前一项迫切任务。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而言，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在使用鞭子继续奴役工人的同时，也推行了一整套包着糖汁的劳动立法。就连素以普鲁士容克地主专制著称的德皇威廉二世和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在80年代开始实行“社会改革”，连续颁发了济贫法、疾病保险法和意外灾难保险法等法令。“保护劳动”，一度成为欧洲国家统治阶级的一种时髦。瑞士联邦政府还率先创议，在伯尔尼召开各国政府间的国际会议，以制订国际劳

^①见《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记录》。

动立法，是按照资产阶级政府的路子走，还是按照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形成自己的劳动保护纲领这样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摆在新国际的面前。从国际工人运动领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状况而言，国际劳动立法问题的提出，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转变。它是基于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对敌我力量对比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倍倍尔在向1889年巴黎国际大会报告德国运动进展情况时，就十分鲜明地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过去因为忙于从事革命实践，而忽视了理论方面的深入思考，以致得出了“社会改造已经到了门口”的乐观结论。通过反复实践，后来才进一步看清，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注定无可挽回地要趋向灭亡，但就当前来说，它还有足够的反抗能力，以维持其一段时间的生存；工人阶级的力量，又还没有壮大到足以去进行社会的重新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想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把群众一下子争取过来，是不可能的。这就迫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越来越多地注意采取适宜的实际措施，迅速地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实际问题，以便使这些问题具有强大的宣传力，把工人阶级吸收到社会主义潮流中来，从而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倍倍尔认为，国际劳动立法问题的提出，是“我们工作发展进程中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应放在当前工作的“首要地位”，以便首先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①这些看法和主张，为大会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使劳动立法问题，成为新国际成立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

工人阶级当前经济要求的系统纲领，最早是由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两个国际大会提出来的，并在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决议中得到全面阐述。它包括指导思想、原则措施、实施途径这样3个方面。

^①见《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记录》。

关于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决议^①指出：“一个有效的劳动保护立法，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的国家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具有现代文明的所有国家，结果，愈来愈加剧的剥削，造成对工人的政治压迫、经济奴役，引起工人体力和精神上的衰退。为了捍卫工人的切身利益，增强其体力和智力，以为其开展社会、政治活动提供必要前提，首先必须对现有的经济制度的破坏作用，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并通过国际劳动立法，使劳动者的劳动、工作、生活条件有基本保证。这就是摆在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当前任务。这种分析，和空喊革命口号、脱离当前斗争、否定一切改良的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决议”在强调维护工人当前利益、争取实现国际劳动立法的必要性的同时，又明确地指出：“各国工人必须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反对那种压迫他们并威胁着人类普遍发展的社会制度。”“决议”公开地宣布：“只有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努力，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之后，劳动和人类才能获得解放。”^②这就极其鲜明地告诉人们，国际劳动立法，是国际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它是国际工人阶级当前的首要目标，而不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最终目标。这样，不仅同资产阶级政府的国际劳动立法划清了界限，而且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那种夸

^①这个决议是由倍倍尔草案和盖得草案合并而成，有些段落，经过莫里斯、凯尔·哈弟、舍雷尔等人的修改，最后由全体大会通过。

^②《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以下简称《历史资料Ⅱ》），第4～6页；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70～72页。

大合法作用，片面强调当前要求以至放弃革命最终目标的改良主义予以严格的区分，从而体现了把当前利益与长远目标、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为一体的指导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关于原则措施。在巴黎召开的两个国际大会分别宣布了大体相同的劳动立法的原则。^①这些原则包括：8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14岁以下的童工；禁止在有害妇女身体健康的一切部门使用女工；取消包括妇女和未满18岁男工在内的夜班制（个别需连续不断生产的工业部门例外）；劳动者每周至少应连续休息36小时；取缔有害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工业企业和生产方法；废除“血汗制”；禁止以商品支付工资、取缔工厂主开设店铺从事中间剥削；取消雇工介绍所；实行由工人推选出来的监察员对一切手工作坊和工业企业进行监督等。^②两个国际大会都认为，所有这些原则，应成为各国政府或政府间制定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对象，成为现阶段国际工人阶级主要的经济、社会要求。随着讨论深入，从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开始，又提出了保护妇女尤其是保护女工的问题。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专门通过由奥地利党的代表路易莎·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针对着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空喊解放妇女而无视劳动妇女被剥削压迫的社会性质的种种议论，强调应在充分注意妇女的特殊作用的基础上，力争对女工实行立法保护，以实现男女完全平等。“决议”还特别规定，女工工作日，最多不得超过8小时；18岁以下的女工，工作日不得超过6小时；孕妇在产前6个月和产后4周期间禁止工作；在有妇女工作的一切工业部门中，应委派足够数量的妇女担任工厂视察员，以维护女

①可能派大会提出14项，马克思主义者大会提出12项。

②《历史资料Ⅰ》，第5～6页；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71页。

工的特殊权益。^①1896年的伦敦大会，进一步涉及工人的教育和体力发展问题。它是由英国费边主义者悉尼·韦伯提出来的。经过大会讨论，在独立工党领导人哈弟修正案基础上，大会一致通过相应决议。这个决议规定，应从禁止童工、限制少年劳动入手，采取设立补习学校的办法，由社会负担免费对工人子女尤其是孤儿和弃儿进行教育，以为他们提供继承人类共同遗产的机会。“决议”呼吁各国，拟定一套从幼儿园起至大学为止包括体力、科学、艺术和技术(手工)训练在内的十分完善的教育制度。^②这个决议，带有费边主义的浓厚色彩，在当时和以后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历次国际大会，也没有对它进行过深入的讨论。

国际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代表，始终把争取8小时工作日，作为争取国际劳动立法的中心，把它看成是劳动立法的重要原则和根本措施。从1893年苏黎世大会开始，国际把劳动立法问题的重点，转到8小时工作日问题上来。和前两次大会一般地讨论劳动立法的原则和措施不同，苏黎世大会专门把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措施问题列入议程。为此，专门听取了瑞士代表方雷斯的报告，并根据他所提出的草案，通过相应决议。“决议”高度评价实现8小时工作日的重大意义，认为它是使工人阶级最终摆脱资本压迫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一项重要措施。“决议”指出：“一切国家都应为实现8小时工作日而斗争。因为只有通过立法途径，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8小时工作日，才能使这个制度完全巩固，才能保证其有利的影响作用。”

^③同国际工人协会两次大会以及美国工人关于8小时工作日的决

① 《历史资料Ⅱ》，第23、44～45页。

② 见《历史资料Ⅱ》，第55～57页。

③ 《历史资料Ⅱ》，第40～41页。

议相比，新国际的上述决议，又前进了一大步。从广度上来讲，它不只是一个国家、也不只是欧美国家工人政党和团体的纲领，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从深度上讲，它不再局限于工人自身和经济斗争，而是从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完整地揭示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重大意义和巨大作用，从而把经济领域的要求与社会生活、政治斗争紧密地融为一体。这种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末国际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新成就和所达到的新水平。

关于实施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新国际还是在此之前的各国工人组织，都有一个认识过程。19世纪30~40年代的英国宪章派和70~80年代的美国劳动骑士团，都曾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因此，它们一度把向政府行政当局首脑呈递关于呼吁立法的请愿书，看作是实现劳动立法的唯一途径。1889年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考虑到美国“劳联”的经验，曾在原则上规定，利用一切手段（集会、报刊、请愿、示威游行）进行斗争，以争取劳动立法，并提出要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以及议会立法等形式，来宣传、贯彻大会关于劳动立法的决议。这些规定，比之以前将请愿绝对化、单一化的做法，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巴黎大会决议提出的上述途径的着眼点，仍然是以此来影响本国政府，以便迫使其参加由瑞士政府倡议召开的国际劳动立法代表会议，并在会上支持巴黎大会的决议。应该说，其间仍然有着不少对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抱有幻想的成分，因而对于如何依靠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来争取国际劳动立法，就认识不力，准备不足。

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决议，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巴黎大会。它在分析和揭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所谓劳动立法根本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的同时，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利用现有的一切宣传鼓动手段，为实现巴黎

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有力的斗争”的问题，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斗争的意义，仅仅在于指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是如何地敌视一切认真保护工人利益的立法。”为此，布鲁塞尔大会首次提出，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需要从立法上保护工人利益的国际工人运动，应有一个总的方针，并建议各国工人团体和组织，经常研究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及时交换有关改进工厂法和使工厂法具有划一性质的情报。^①

应该说，从完全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到制定出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国际劳动立法，进而感到工人阶级有必要奉行独立的方针，并同统治阶级所谓劳动立法的虚伪伎俩进行斗争，这是国际工人阶级在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是新国际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进而提出了一系列体现工人阶级独立方针的措施和主张。其中包括成立工人阶级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利用传单、讲座、社会主义报刊、游行、集会和各种政治组织、议会以及其他机构，依靠各国议会中社会党代表，通过立法途径，拟定在全世界实行8小时工作日的统一方案，来进行关于8小时工作日的宣传和鼓动，并敦促各工业国家政府召开国际代表会议。这样一来，就不单纯是为立法而立法，而是把经济上改善劳动条件、维护工人的当前利益的斗争，同政治上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工会和政治团体）、开展议会斗争有机地统一起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劳动立法与劳动解放关系的辩论，大会许多代表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把当前的经济斗争，从属于长远的政治斗争，从而把争取劳动立法的斗争，提到一个崭新的水平。^②

3. 劳动立法与劳动解放

①见《历史资料Ⅰ》，第17页。

②见《历史资料Ⅱ》，第40～41页。

劳动立法，是当时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都想利用的口号。新国际成立伊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会引起热烈的争论。其中，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对立，^①就是在当时国际的领袖人物中间，也存在着观点分野。这在巴黎大会后事态发展的看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国际劳动立法的高潮时期。1889年，国际巴黎大会提出这方面的纲领后，为各国资产阶级所注目。刚登基不久的德皇威廉二世，专门颁发诏书，倡议召开柏林国际会议，以在工作日和童工问题上达成协议。在这次会议上，德、英确曾作过许诺，荷、比两国也准备立法。但是，会后与会的多数国家，却以柏林会议只就工作时间和童工问题达成协议为借口，以其他与之竞争的国家缺乏劳动立法为理由，拒绝进一步实行劳动保护立法；就是少数作了劳动保护规定或立法承诺的国家，也是纸上谈兵，并未认真履行。国际工人运动中许多人曾一度抱有热烈期望的国际劳动立法运动，遇到了来自国际资产阶级的挑战。

如何看待这种事态的发展，怎样去迎接资产阶级的挑战？1891年的布鲁塞尔大会，展开了热烈的争辩。

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比利时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作为这个议题的报告人，在会上就事态发展作了详尽的报告。他从各国资产阶级对劳动立法没有诚意的基本事实中得出结论：“毫无成就的柏林国际劳动保护会议，必然使工人相信，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改革。”但是，王德威尔得从这个正确的前提中，却引伸出了一个引起争论的看法。既然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实行劳动立法，所以，他主张，“要进行孜孜不倦的宣传，要派遣社会主义者进入立法机构，去夺取政权和占领议会。”实际上，他主张，社会主义者应通过取得议会多数来夺取

①见本章“四、对无政府主义的新胜利”。

政权。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和利用包括议会在内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经过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来实现以劳动立法等社会改革为首要目标的劳动解放。^①

王德威尔得报告之后，英国代表瓦尔柯针对着他所主张的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搞劳动保护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单单指望政府是幻想”。因为英国政府曾在议会里，不止一次地赞成柏林会议提出的那些最低要求，实际上它根本没有执行。所以，瓦尔柯认为，只有各国工人阶级相互了解，使工会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才能在改善劳动状况方面取得胜利。美国犹太工人代表卡罕，则尖锐批评王德威尔得决议案回避阶级斗争。他要求，决议案应包括关于阶级斗争的声明，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时，他在阐述工会与阶级斗争关系时，十分恳切地说：“永远不可忘记要强调指出，单纯的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人必须赢得政权。”

王德威尔得的上述看法，实际上牵涉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道路问题，尤其是如何看待议会斗争及劳动立法与劳动解放的关系问题。在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王德威尔得并没有在会上得到多少支持。相反，却遭到许多国际工人运动著名领袖的批评和反对。奥地利党领导人阿德勒，在肯定议会斗争必要性的同时指出，不能将议会斗争绝对化，混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选举权、表决权、劳动保护，这些对我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过是使思想革命化以及把亿万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一种良好手段。我们永远不能因运用这些手段，而忘记了我们的根本目的。”阿德勒还郑重地声明：“如果我们自己收起我们的旗帜，我们将不能赢得工人。”匈牙利社会党人弗兰克

^① 见《国际布鲁塞尔大会记录》；参见《历史资料 I》，第16～17页。

尔，直率地批评王德威尔得决议草案“含糊的、软弱的、不肯定的形式”，认为必须强调工人运动的阶级特点，“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夺取政权上。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把国家机器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得到经济上的解放。”据此，他提议，将王德威尔得决议案修正为：“夺取政权是解放工人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手段。”弗兰克尔的发言，集中地反映了与会多数代表对王德威尔得决议案的不满，也高度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根本立场。

倍倍尔虽然没有直接批评王德威尔得的观点，但是，他却对着这种观点所代表的一种倾向，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劳动立法问题上的正确主张。他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不是要获得一个劳动保护法。它首先要向工人阐明现今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以便尽可能快地消除这个社会。同时，他根据德国党的经验鲜明地指出：“谁想试图使党离开这个任务，他自己就不得不立即离开党。”当然，倍倍尔并不反对在革命条件尚未成熟时，开展为争取国际劳动立法的斗争。但是，他认为，必须使用一切方法和途径来进行。这既是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当前状况，也是为了把离工人政党还很远的工人群众争取过来，以增强工人的战斗力，有效地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对劳动保护问题的态度。”倍倍尔的发言，概括了劳动立法与劳动解放的内在联系。社会党人决不是为立法而立法，而是立足于实现劳动解放而进行争取劳动立法的斗争。后者服从前者，前者是后者的根本目的。离开劳动解放侈谈劳动立法，必然走偏方向，不顾当前工人急需劳动立法的现状，而妄谈劳动解放，必然脱离群众而陷于盲动。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不断的改良，着眼于教育、组织和争取大多数工人，一旦时机成熟，就逐步地去实现劳动解放。

由于大多数代表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正确主

张，为大会所接受，最后一致通过对王德威尔得决议的修正案。修正案在两个问题上进行了原则性的修改。一是在原草案之前，加了一段关于申明阶级斗争的导言，以为整个劳动保护决议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客观依据。修改后的决议，一开始就宣布：阶级斗争是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不消灭阶级统治，就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应把争取劳动立法，置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全局之中，并把它看作是消灭阶级统治、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在决议的结尾部分，将原决议案以是否赞成劳动立法作为支持竞选人条件的说法，改为“建议全世界工人联合其全部力量，反对资本家私有制，并建议各地享有政治权利的工人，利用这种权利，把劳动从奴役下解放出来。”^①这样一来，就把议会选举中的工人政党代表，同资产阶级代表区别开来，将争取国际劳动立法、议会斗争等公开和合法的斗争，从属和服务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

这个决议，为后来历次代表大会所援引，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苏黎世大会就是以这个决议为依据，明确地规定和阐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它指出，进行政治活动，包括议会活动，无论对公开阐明和宣传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对争取迫切需要的各种改革来说，都是必要的。因此，各国工人应努力争取政治权利，并利用这些权利来真正地实现工人的要求。同时，“决议”又指出，在进行这些斗争时，必须把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的，即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彻底改造整个社会，放在第一位，“政治活动无论如何不应成为有损我们的原则或我们的独立的种种妥协和联合的借口。”^②

新国际最初几次代表大会关于争取国际劳动立法问题的讨

^①以上发言和决议，未注明出处者，见《国际布鲁塞尔大会记录》和《历史资料Ⅱ》，第16～17页。

^②见《历史资料Ⅱ》，第42～43页。

论,已经远远超出它原来意义的范围。它既是一场关于实际运动的争辩,又是一次关于基本原则的思想交锋。讨论已涉及到当时工人运动中诸如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关系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经过辩论,在基本观点和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还是占了上风,“取得了全面胜利”。^①就连资产阶级报刊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德国大资产阶级的报纸《科伦日报》写道:布鲁塞尔大会的主要成果,是坚决地宣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②奥地利党的机关报《工人报》,则鲜明地指出,大会是“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甚至是在世界史上迈出重大一步的事件之一。”^③

二、团结、战斗的“五一”

1. “五一”的历史沿革

为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日而举行的“五一”示威游行,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它起源于美国,并由此而演变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

最早提出“五一”问题,是1884年。当年10月,美国和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和工会联合会,在芝加哥举行第4次年会。它在通过关于谴责雇佣童工的决议后,又一致地通过下述决议:“自1886年5月1日起,8小时应成为法定工作日,所有劳工组织应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44页。

②③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352、353页。

此作好准备。”^①这项决议所规定的“五一”行动，不是一个工种或一个部门的单独行动，而是所有劳工组织在“五一”这一天采取统一的行动。但是，“决议”并没有对行动的方式作出具体规定。1885年12月，该联合会第5次年会，重申上述决议，并号召其所属组织，为贯彻“决议”、实行8小时工作日作进一步的准备。由于联合会发动并领导的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宣传鼓动，深受工人广泛的支持和拥护，运动迅速扩展，队伍不断壮大，包括8小时工作日同盟在内的新组织纷纷建立，全国各工会的会员增长1~2倍，^②再加上1884年开始并持续到1886年的新工业危机所造成的大批工人失业，不满情绪几乎蔓延全国。所有这一切，为迎接行将到来的“五一”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886年5月1日到来之前，在美国各地已陆续举行各种鼓动集会和示威游行。包括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工业城市和劳动骑士团的成员，不顾其领导人的反对，投入了罢工、示威、游行的行列，到5月1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全国7万多个企业有35万工人投入斗争，几乎包括所有工业部门的熟练、非熟练工人，火车停驶、货栈关门，主要工业部门瘫痪。站在这场运动前列的是芝加哥工人。

以乔治·希林等为首的芝加哥8小时工作日联盟和以斯皮斯等为首的芝加哥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具体地领导了这场运动。5月1日，4万多芝加哥工人宣布罢工，以后又增至8万人。罢工开始是和平地进行的。5月2日，麦考密克收割机厂罢工工人被雇主解雇，由此而引起严重纠纷。5月3日，当罢工者所在的堆木工会举行群众大会讨论与雇主谈判的条件时，为雇主所雇佣的武装人员，在会上挑衅，遂引起冲突，警察局以此为借口，派来

^{①②}见《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第204、250~251页；《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83~84页。

武装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6人，击伤多人，因此而激起工人的愤怒。当夜，斯皮斯起草《告芝加哥工人书》（又称《复仇通告》），号召工人武装起来，为被害同志复仇，并决定次（4）日晚，在芝加哥中心广场——秣市广场，举行纪念大会。5月4日，2千名工人及其妻儿子女，徒手地参加和平集会。连参加大会的芝加哥市长也认为，这是一次和平的集会，无需警察局进行干预。可是，与会群众开始疏散时，176名警察突然包围大会。正在双方进行交涉时，从会场附近小巷扔过一枚炸弹，落在警察当中，当场炸死1人，炸伤多人，在混乱中发生了持续两分钟枪战，当场击毙7名警察、6名工人，打伤110人。

事情发生后，警察当局以有人扔炸弹为借口，对工人组织进行残酷镇压。国际劳动人民协会机关报《工人报》被查封，整个编辑部和排字工人被逮捕，领导示威集会和罢工斗争的斯皮斯等8人，被送上被告席。经过所谓“审讯”和提供伪证，最后以“谋杀罪”，判处斯皮斯等4人绞刑，其它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芝加哥“五一”罢工被镇压了，它却在美国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援救被捕的运动领导人，美国各工业中心，曾举行各种群众大会；英、法、俄、荷、西等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也曾以各种形式，对美国当局表示抗议，以声援受害者。芝加哥工人用鲜血换来的“五一”精神，迅速地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开来。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的“五一”斗争，象一棵茁壮的嫩芽正在破土而出。

1888年，在圣路易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劳联根据阿普勒哈根的提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再次举行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并把1890年5月1日，定为重新开展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总运动日。^①

^①见《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第252页；《1870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84页。

几乎和美国劳联作出上述决议的同时，法国工人组织也决定采取全国性的统一行动，以实际地开展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1888年10月28日~11月4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工团全国联合会第3次代表大会，根据蒙吕松代表多尔莫尔的建议，通过了关于1889年2月进行示威和请愿以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度的决议。大会具体要求：1889年2月10日（星期日），法国所有的工会和工人行会团体，派代表团前往省、专区、市政府，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8小时以内，规定最低工资；2月24日，上述代表团再次前往听取答复，并尽可能地组织工人群众示威游行以作为后盾；大会之后，即着手准备，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行动。由于1886年里昂劳工大会以来，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在法国已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波尔多大会一号召，并经过认真准备，很快就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1889年2月10日，50个城市的工会代表，向各自的省、市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把多年来各次工人代表大会提出的改革定为法律。许多城市还在统一时间内，举行以同一内容为要求的示威游行。①这种工人阶级首次全国统一行动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而且从工人阶级首次成功的统一行动中，萌发了将一国统一行动国际化的设想。

最先提出将工人统一行动国际化建议的，是法国盖得派代表拉维涅。还在1886年里昂劳工代表大会上，他就曾带头主张争取8小时工作日。通过1889年2月的统一行动之后，他更加坚定了信心，并提出把每年5月1日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日子，以将8小时工作日制作为直接要求放到首要地位。据此，1889年2月底召开的海牙会议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议论，并得到德国党李卜克内西有条件的支持。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开始后，拉维涅并没有马上要求将上述设想列入议程，而是把决议

① 见《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84~85页。

草案提交给其他代表，首先是盖得、拉法格，然后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当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但是，由于德国尚在实行“非常法”，工会组织仍处于非法状态，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统一示威游行有困难，因此，他们建议加上“各国工人阶级根据本国特殊情况所规定的具体条件举行游行示威”。经过征求意见和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之后，拉维涅于1889年7月20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就国际劳动立法问题表决之前，以法国全国工团联合会和各社团小组的名义，作为一项有助于贯彻大会关于劳动立法决议的议案，正式向大会提出关于1890年5月1日举行国际性游行示威的决议草案。经过按国籍为单位的表决，除比利时（因对主席团工作不满）、俄国（因考虑难以组织游行）弃权外，其他代表团均投票赞成，最后作为大会决议被通过。

“决议”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宣布：“在一个作为永久规定的日子里，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劳动者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8小时以内，并实现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其他一切决议。”考虑到美国劳联已决定1890年5月1日举行这种游行示威，所以，

“决议”规定，国际游行示威也在这一天举行。^①这是关于在国际范围内举行统一示威游行的第1个决议，也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由一国范围走向世界范围的标志。对此，恩格斯曾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巴黎代表大会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他指出，这次大会是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此，5月1日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团结、战斗的节日。

尽管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将5月1日定为国际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日子，但是，由于德国代表团的坚持和建议，“决议”最后还强调，“各国工人要按照本身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

^①《历史资料Ⅱ》，第9～10页。

组织这场游行示威。”实际上，巴黎大会并没有解决采取什么方式来贯彻“决议”的问题。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以本国条件不允许为理由，采取各自认为是正确的方式，来贯彻大会决议。这一点，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经过实践之后，势必发生争论。由此而把对“五一”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2. 划时代的五月行动

1890年，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按照国际关于“五一”的决议，以战斗的姿态，首次采取国际行动，携手并肩地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而英勇地斗争。法、英、奥、美、德、意、波、荷、葡、西、瑞典、比、挪、丹、匈、罗等国的工人，在不同的时间、采取不同的方式，分别举行集会、停工、罢工、示威游行，法国、意大利的工人，还与军警发生冲突。各国投入这场斗争的工人，有的高达数十万，如比利时就高达34万人。即使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的波兰，参加华沙“五一”政治罢工的，也有3万工人。“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8小时标准工作日。”^①站在这支国际大军前列、为首次国际工人阶级的战斗行动作出贡献的，是法、英、奥、德等国的工人阶级。

法国工人阶级，是“五一”国际游行示威决议的倡导者，也是“决议”的忠实执行者。还在1890年5月1日到来之前，除可能派拒绝参加外，各工会团体和社会主义组织，就曾积极进行准备，并以众议院社会主义党团、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中央革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8页。

命委员会和巴黎市政参议会社会主义团体的名义，向全国工人发出呼吁书。各社会主义团体还专门召开筹备会议，起草了请愿书，提出宗旨以及工人的各项具体要求。

5月的巴黎，阳光灿烂。以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盖得、瓦扬、博丹等为首的游行队伍，手持工人请愿书前往众议院。法国政府惊恐万状，动员了十几个团的步兵、骑兵以及保安警察严阵以待。当游行队伍集结到协和广场时，骑兵队即予以猛烈冲击。游行队伍旋即又集中起来，并于下午2时出发，来到参议院受到议长接待。双方经过会谈，发表了以制定全国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动立法以及实现8小时工作日为内容的会谈纪要。晚上，工人们还分别在5个剧院举行文艺演出。这一天，以巴黎为中心，全国138个城市40万工人同时举行示威游行和请愿。此外，在罗昂等许多城市的工人，还举行停工斗争，使煤矿停产、轮船停卸。在广大工人集体行动的压力下，法国议会和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以维护生产安全和实行集团选举制为内容的《矿工代表法》；内阁颁发了关于企业主应遵守12小时工作日和成立最高劳动委员会的法令。

在1890年欧洲各国“五一”示威游行中，“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①刚刚重建的奥地利党，利用自己的报刊、公开集会和向工人散发传单，进行“五一”示威游行的宣传鼓动。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运动，4月8日召开的奥地利枢密院会议，决定采取果断、强硬的手段，以对工人运动严加打击。据此，政府将外省的军队调进维也纳，大炮也被拉上街头，士兵们处于战备状态。即令如此，各民族工人仍然团结一致地庆祝自己的节日。维也纳有10万工人走上街头；3.5万布拉格工人参加了游行和集会。“‘五一’节这个工人节日的信念，真正传遍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9页。

全奥地利，直至最偏僻的角落。它使人们感到又惊又喜，重新充满希望。最重要的是，随着关于‘五一’节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思想也到处发扬光大了。”“在我们的纲领、我们最优秀的演说远远未能到达的地方，‘五一’节在无产阶级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通过开展“五一”示威游行活动，原来为内部斗争困扰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的奥地利工人运动，重新得到了活力，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891年和1889年相比，社会主义报纸刊物由10种增至35种；工会、教育协会、读者协会等工人团体，由1888年的104个，增至1891年中的230个；成员人数相当于1888年底的3倍多。每月、每周都有几个工会团体成立，工会组织正处在蓬勃的发展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阿德勒写道，1890年5月1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威武雄壮的游行使全世界看到，有阶级觉悟的奥地利无产阶级，已经赢得了并肩走在最前列的权利。”^①

由于英国工联领袖和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海德门等人竭力反对，贯彻执行“五一”决议的重任，就落到了新工联的肩上。还在1月间，布卢姆兹社会主义协会、煤气一杂工工会等先后决定，在海德公园举行大规模集会示威，以庆祝“五一”，并由各家分别派出3人组成委员会进行筹备。3月16日，来自各个团体的代表召开会议，通过关于为法定8小时工作日而游行示威的决定。尔后，还成立了负责组织领导的专门机构中央委员会。^②社会民主联盟和工联一开始反对，不久又改变主意，也申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排除社会主义组织和团体的工会集会，企图以此排挤新工联，破坏示威游行。出乎他们的意料，新工联的

^①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向国际布普塞尔大会的报告。

^②《关于不列颠、爱尔兰情况的报告》（英国煤气一杂工工会等向国际布普塞尔大会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也获准在同一时间（5月4日）、同一地点设同样数目（7个）的讲坛，举行所有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组织参加的集会。结果，1889年巴黎两个国际大会同时召开的情景，又再度在伦敦重演。不过这次工联和社会民主联盟失败得更惨。一面是生气勃勃；一面是死气沉沉。新工联中央委员会的7个讲坛周围，人山人海，有20万工人排着队伍，打着旗帜，奏着音乐，秩序井然地前来参加大会；而工联理事会那边，一切毫无生气，听众少得可怜，不到新工联听众的一半，而且又姗姗来迟，以至有几处讲坛在新工联那边已经结束时才刚刚开场。恩格斯直接参与了游行集会的准备工作，并亲自参加中央委员会组织的这次规模宏大的示威集会。他站在第4号讲坛（一辆大货车）上听取艾威林、拉法格和俄国流亡者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等人的演说。面对伦敦从未有过的、规模最大的群众场面，年已古稀的恩格斯，无限感慨，为40年来再度听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而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90年5月4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①

德国工人庆祝“五一”，面对复杂而又严峻的局势。代俾斯麦而起的新首相卡普里维宣称，如果5月1日停工，则以“违反契约”名义，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集会，则按危害公共治安罪，根据已被废除但尚未终止实行的“非常法”予以禁止。同时，资产阶级报刊也大造舆论，散布所谓“红色幽灵”的神话，说什么国际巴黎大会向德国党下达了总革命的通告，并定于5月1日开始。统治阶级试图以此为借口，在5月1日全部摧毁德国工人的组织。②面对如此局面，德国党领导人不同意在5月1日这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0页。

②见德国党向国际布鲁塞尔大会的报告。

一天普遍地实行停工，更反对进行统一集中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只主张在5月的第1个星期日集会庆祝。1890年4月13日，新选出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哈雷举行会议，专门通过《致德国男女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号召工人用谨慎和纪律，来挫败统治集团的挑衅性计划，坚决反对“青年派”提出的关于5月1日举行罢工的要求。《呼吁书》强调指出，不要为反动派消灭社会民主党提供借口，并建议5月1日只在那些不可能引起冲突的地方停工；其他地方则召开群众集会或进行庆祝活动。尽管如此，德国工人阶级仍然不顾“非常法”的迫害，在5月1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活动。有的举行集会，有的以“五月散步”的方式游行。柏林等城市，有10%的工人参加罢工；汉堡和慕尼黑等地工人则实行停工。全德共有20万人在5月1日天举行停止斗争。○

1890年6月，李卜克内西在回顾新国际成立大会时，曾经指出，代表大会点燃的不是短暂的旺火，它已在首次国际性的行动中表现出来。这个行动，是作为在巴黎已缔结和平、自由和平等的永久联盟的世界无产阶级，所采取的第1个强有力的全球范围行动。④这个行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使各国无产阶级第1次普遍而广泛地联合起来，为一个目标而斗争，并充分地显示出各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成就。同时，通过联合行动，也暴露出国际内部对“五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五一”行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3. “五一”决议的完善和发展

继国际工人阶级首次联合行动之后，1891年5月1日，争取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167~168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第1卷第104页。

②见《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前言。

8小时工作日的国际示威游行，以更加广泛的规模、更加尖锐的程度，在欧、美国家范围内再次展开。英国工人阶级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运动。仅在伦敦一地，参加“五一”游行的工人，就达50万人之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一”斗争，已向一些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展。深受“欧洲宪兵”——沙皇控制的俄国工人阶级，也破除了在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中难以进行示威游行的迷信，开始采取行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勃鲁斯涅夫”基层小组，继利用殡葬机会举行俄国革命史上最早的政治集会之后，又于5月第1个星期日，举行“五一”秘密集会。普罗申、阿法纳西耶夫、波格丹诺夫等，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和主要演说者。他们在会上号召学习西方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的经验，组织起来开展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①1891年的“五一”活动，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越来越具有激烈对抗的形式。根据法国工人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工团联合会第4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专门组织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或地区1千多个工会和社会团体的28名代表组成的全国性请愿团（可能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由它率领工人游行队伍，于5月1日前往议会会见议长，呈递《请愿委托书》，以再次督促议会与政府通过保护工人的法令，并将限制劳动日的做法，推广到所有工业国。议长不但不会见工人代表，而且动用军警，将代表分割开来，关进当作牢房使用的场所，象对待犯人那样进行审讯。外省的工人集会游行也遭到弹压。许多工人领袖被打伤，甚至被捕判刑。^②富米惨案，则把这种暴力镇压推向顶峰。富米，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工业城镇。1891年5月4日，当地工人携儿带女徒手举行和平游行。在行进中，突然遭到全副武装的军警的枪击，军警头一次

^①见《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203～204页。

^②详见《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90～91页。

使用无烟火药和步枪，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进行血腥屠杀。当场有10人被打死，其中包括3名不满18岁的少年儿童。曾参与游行筹备工作的富米社会主义团体书记居林和拉法格，也以发表演说煽动聚众和谋杀的罪名，被分别判处6年徒刑和1年监禁；直接持枪杀害工人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却逍遥法外。为了反对当局的血腥屠杀和卑鄙判决，法国工人再度掀起抗议浪潮。当年诺尔省议会补缺选举，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一致支持拉法格，使他以多数票当选。不久，拉法格即以议员身份被赦免出狱；居林也被鲁贝市推为区议会工人党议员候选人。

由1886年美国工人大罢工发端，到1891年在法国发生富米惨案，国际工人阶级5月的统一行动，其大方向是十分明确的，即通过斗争以实现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的国际劳动立法。但是，由于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程度和水平也各异，指导思想更是千差万别，再加上国际巴黎大会对“五一”的决议并未展开充分讨论，只就统一行动作了一般的规定，且留有很大的余地，因而在实际贯彻执行中，对“五一”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活动方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歧异，形成种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看法。这些看法，概括地说大体有5种。第1种，以首倡“五一”行动的美国劳联为代表，它曾经率先地进行并始终坚持“五一”游行，其目的在于以工人游行为后盾，以请愿和呈递请愿书为形式，再三督促议会或政府，在劳动保护特别是在缩短工作日问题上作出让步，以便维护工人的当前经济利益，为此不惜停工、罢工。第2种，以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示威游行和争取当前的经济利益，而是主张把示威游行变为总罢工，以作为社会革命的开始，一举摧毁所有国家，进入以工团为主体的未来自由社会。第3种，以比利时工人党为代表，他们认为，“五一”活动的目的，不是争取劳动立法，而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争取

工人群众，以实现普选权，争得议会多数，取得国家政权。第4种，以德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为代表，他们赞成“五一”决议的国际团结原则，也主张按决议开展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应在完全和平、合法的条件下进行，以显示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国际团结的精神，不能危及工业，丝毫不破坏任何劳资合同或集体协议。因此，他们既不同意在5月1日这个统一的日子开展活动，也不同意进行停工或罢工。最后一种，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代表，他们以庆祝“五一”为借口，进行无目的的盲动和破坏捣乱，直到进行恐怖、爆炸活动等等。还在1884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中，《自由》、《警钟》等无政府主义报刊和流亡到美国的德国无政府主义的头头莫斯特，在其小册子《革命战争学》中，就曾劝导其信徒，利用工人的示威游行，将自己武装起来，并就如何准备和使用炸弹，作了详细指示。尽管在1886年5月芝加哥大罢工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得很英勇，但是，人们把当时发生的“炸弹案”和无政府主义者联系起来，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以上诸种看法和主张中，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看法，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并没有多大的市场；通过“五一”示威游行以争取议会多数的主张，当时也未占上风。主要的分歧，仍然是法国、奥地利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德国、英国社会主义者观点的对立，集中表现在庆祝“五一”要不要有一个统一的时间和采取什么方式这样两个问题上。由此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大会上引发了阿德勒和倍倍尔之间的争论。

1890年5月1日，奥地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通过斗争，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发展工人团体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第2年5月1日，运动的规模扩大了，却受到严重的挫折和企业主更坚决的抵抗。成千的工人被解雇，一些领导运动的工人领袖也遭到处分。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同反动当局的敌视和反对有

关，同时，德国党一再犹豫而未果断地行动，在客观上也助长了奥地利企业主和反动当局的气焰，使奥地利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尽管如此，奥地利工人党仍未动摇。1891年6月，该党维也纳大会曾专门作出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庆祝“五一”节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同时，对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谨慎的态度也产生了非议。在向国际布鲁塞尔大会的报告中，奥地利工人党就曾直言不讳地声明，如果不按照在巴黎规定好了的庆祝方式，而且在哪一天进行庆祝都变得各不相同的话，那么，“五一”节这个世界无产阶级节日的国际性质，就将丧失它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不单要非常重视本国的情况，还应特别重视各国党承担的国际义务。《报告》指出，德国和英国推迟庆祝“五一”，将对“五一”节的高尚内容及其精神作用，产生不利的影晌，也将使这个本来就不太容易庆祝的节日，更加难以坚持。因此，奥地利党代表坚决主张，要规定一个统一的庆祝“五一”的日期。

布鲁塞尔大会常设委员会，听取了以德国、英国为一方（主张5月第1个星期天庆祝）和以法国、奥地利为另一方（坚持5月1日庆祝，并要求将“五一”定为普遍的劳动休息日）的意见后，最后一致同意，不强求各国采取未经考虑的步骤，而是允许每个国家考虑各自国家可能发生的阻力和困难，并责成报告人彼得逊（丹麦），向大会报告讨论情况，提出一项决议并请求一致地、无争议地予以通过。布鲁塞尔大会的决议，同1889年的“五一”决议相比，进一步地明确规定：“五一”应具有真正的经济性质，即要求8小时工作日和宣传阶级斗争；5月1日，是全世界劳动者的共同节日，世界各国工人在这一天要举行统一的示威游行，以提出共同的要求和显示团结一致。关于5月1日是否停工休息的问题，“决议”只是建议在举行示威游行的地方停止工作，并且只要情况允许，应使这个节日成为停工休息日。当

时，阿德勒等要求就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并进一步表达其看法。由于倍倍尔和其他代表反对，即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通过上述提案。^①

1892年11月14~2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大会专门讨论1893年“五一”节的问题。作为外国来宾的阿德勒，在会上再次申述了他的主张。他强调，“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那么，正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无产阶级具有同一思想的想法，比之仅仅考虑劳工保护的想法的意义要深远得多。”这样统一行动的想法，是运动不可缺少的因素。阿德勒的意见并未被采纳。经过讨论，柏林大会最后以223票对6票作出决定，不就庆祝方式作出总的统一规定，每年的“五一”活动方式，应视情况而定。具体到1893年，大会宣布不考虑将5月1日变为停工节假日。

关于庆祝“五一”的方式问题，再次提到苏黎世大会。阿德勒作为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代表委员会的多数意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谈了对“五一”决议的完善和补充问题。首先，他按照法国代表团的提议指出，5月1日，不仅要成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示威，而且要成为争取国际和平的示威，为此，要求无产阶级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即用一切手段表明，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并以此来争得国际和平，以便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主张，得到包括德国党在内的多数代表的赞成。接着，阿德勒又以奥地利代表团的名义提出，应坚持布鲁塞尔决议，使5月1日成为停工的节假日，而且要使这种停工节假日采取更为尖锐的形式。这个日子，是宣传鼓动的最有力杠杆，是激发无产阶级热情的最好办法。它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节日，而且是无产阶级的节日。因此，每

^①见《历史资料Ⅰ》，第41~42页；《文献选编》，第3卷第82页。

个党应承担这样的义务，即在今天尚不可能实行“五一”停工休假日的地方，使之成为可能。在报告中，阿德勒强调指出：“德国人应明确其责任，不能只声明一下这办不到就了结了。”对此，倍倍尔持反对态度。他以德国党的名义声明，必须保证各国党按照自己情况选择“五一”节庆祝方式的自由。他还以坚持党的纪律、保护工人不被解雇和不因违反契约受法律惩治为理由，坚决主张由各党决定是否停工休假。至于庆祝活动是否采取更为尖锐的形式，倍倍尔指出，德国党不能承担5月1日举行罢工的义务。不然，“将会同资产阶级和政府发生一场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会发生的大战，即使有一天要进行这样一场战斗，也应由我们自己选择战斗的日期。”当时，奥地利代表舒曼埃尔，即对倍倍尔进行批评，“一向站在工人运动前列的德国党，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了。在德国一些地区实行休假日是完全可能的。”他还对德国党没有勇气作实行停工休假日的试验一事，表示特别遗憾。^①

最后，大会对阿德勒提出的决议案按国籍、分部分进行表决。决议案分作3部分。第1部分，重申布鲁塞尔大会的相应决议；第2部分，明确提出了有争议的“五一”停工休假问题；第3部分，则把庆祝“五一”与争取国际和平连结在一起。结果，第1、3部分被一致通过；第2部分，除德国、丹麦、保加利亚、俄国代表反对外，也为多数票（13票）通过。这样一来，国际工人阶级就有了一个较为完善和全面的决议，并对以前的相关决议作了两点重要的补充。一是大会责成各国党，争取将5月1日定为停工休假日，并支持每个地方和每个组织朝这个方面所作的一

^①见阿德勒关于庆祝五一节的报告，载《国际苏黎世大会记录》。

切努力；①二是大会规定，5月1日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示威集会，同时也应表达工人阶级这样一种坚定的意志，即通过社会改革，②消灭阶级差别，并由此开辟走向国际和平（包括本国人民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和平）的唯一道路。从此，国际工人阶级的“五一”节，不仅具有经济性质，而且也被赋予了政治内容，成了无产阶级维护当前经济利益，开展阶级斗争，以最终实现国际和平的团结、战斗节日。

三、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

1. 新形势下的工会运动

工会，作为工人阶级最早成立的群众性组织，起源于英国，还在18世纪中叶就已存在。但是，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并提上议事日程，还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

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大会开始讨论工会问题，并正式通过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针对着当时英国工联

①德国党科伦大会通过的“五一”节的决议指出：“为了隆重庆祝五一节，我们力求达到普遍的罢工。但是，因为在德国经济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实行普遍罢工，因此，党代表大会建议，只有那些实行罢工不损害工人利益的工人和工人组织，除举行其他群众大会外，也通过罢工来庆祝五一节。”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162~163页。这个决议，实际上有条件地贯彻了苏黎世大会决议的精神。

②决议草案的提法是“社会革命”。倍倍尔认为，在德国现有法律条件下，“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据此，大会决议将“社会革命”改为“社会改革”。见《历史资料Ⅱ》，第42页。

主义者和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决议案从考察工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入手，论述了工会的地位和作用。它指出：“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本身和消灭资本权力的一种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决议案认为，工会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最伟大的任务。为此，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①这些基本思想和主张，为后来的布鲁塞尔、巴塞尔大会所重申，成为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日内瓦大会在通过工会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对上述决议案的“补充”。它声称：“工人在过去由于行会组织和工长的特权而处于奴隶状态，现在既存在着法律约束，同时又存在着无政府状态，而在将来工人将同时是生产者、资本家和消费者。”^②实际上，它从根本上否定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建立工会的必要性。这一“补充”为大会接受，是对蒲鲁东主义者的妥协，反映了当时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在理论上的不成熟。

19世纪90年代，工会运动有了长足进步，工会组织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强大的力量，工会问题也成了国际工人阶级特别注目的重大课题。新国际时期的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不仅从数量、范围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按其内容和性质已形成多种模式。除了早已形成的以单纯经济要求为活动准则的工联主义运动外，还有在工人政党领导下、使当前经济斗争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运动和以工会为基础、通过总罢工直接开始社会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运动，以及根据罗马教皇利马十三世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0~221页。

^②转引自《第一国际史》，第53页。

的谕告而在欧洲国家成立并以“教义、人道、博爱”为宗旨的天主教工会。因此，这个时期的国际工人阶级所关心的问题，并非要不要建立工会，而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工会，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工会应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新国际从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开始，到1896年伦敦大会止，总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

布鲁塞尔大会开始接触工会问题，就因意见对立相持不下，以致这一问题的委员会未能就形成共同决议达成一致意见。以法国、英国为一方的代表认为，尽管有种种法律限制和各种惩罚与迫害，在一些国家，建立用以加强国际联系的工会组织，仍是可能的。这种工会组织，以“为创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好基础”作宗旨。其任务是：经济上，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劳动时间和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工资；政治上，承担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实现社会平等这一重任。据此，形成了英、法联合提案。以德国党和工会为另一方的代表认为，由于存在着反动的结社法，工人任何一种组织尝试，立即会遭到统治阶级的暴力阻挠。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建立旨在加强合法国际联系的工会组织，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应把重点放在支持工人反对现行的反动法律，以帮助工会的发展之上。大会最后接受了德国代表团的提案。但是，对于工会所应承担的经济、政治任务问题，并未正面交锋。苏黎世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又前进了一大步。首先，大会常委会，就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加强工会运动，原则上趋于一致；其次，德国代表团的报告人埃尔姆指出，德国参加工会的大多数工人，同英国人有一致的看法，认为一个松散的（工会）组织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会的）地方组织同今天的经济发展情况也不相适应，必须有一个集中的组织，其最好形式是（工会）中央联合会。但是，由于法律上的困难，“在整个德国，今天组织全国性的联合会还没有可能，固定的国际性联合会就更不可能。”讨论又重新回到布鲁塞尔大会的原有分歧。雷得勒代表

英、法、美等国代表，提出一个与德国代表看法相左的决议案，并为大会所接受。它肯定了工人阶级必须“按生产系统组成工会以保护工人利益”的原则。它指出，必须建立同行业的中央联合会和国际联合会，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应成立各行业的全国总工会和国际工会。关于工会的任务，大会决议没有采纳法国代表提出的关于将工会与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并以工会作为未来社会支柱的提法，而是强调指出，除了组织工人共同为提高工资而斗争外，还应使各工会组织的工人，不论种族和职业，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团体，以便在政治斗争、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拥有足够的力量，最终确保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①此外，“决议”还就在美国、澳大利亚建立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依靠自己力量成立劳动力介绍所，加强对外国工人移民的国际主义教育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这个决议，实际上体现了工会运动应从属于党的活动、经济斗争应服务于政治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这一主导思想。

这个时期中，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工会运动的认识，集中地体现在伦敦大会所作出的决议中。它除了坚持前两次大会提出的正确原则外，集中地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并据此全面地论证了这种形势下工会运动的历史使命。德国工人议员莫尔肯布尔代表议题委员会，在题为《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议案中，通过分析19世纪末欧、美国家资本主义新形式卡特尔、托拉斯的发展，明确地指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新形式的出现，不仅给国际工人阶级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也使生产社会化易于进行。所以，全世界的劳动者，应尽一切力量，来实现本国生产的社会化、国有化和市有化。与此相适应，工人阶级的斗争，也不能只局限于孤立的、个别分散的组织和行动。为了反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非有更加广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45～47页。

泛的工人组织和进行国内国际的经常性的宣传鼓动不可。因此，决议案指出，组织工人和开展工会斗争，对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各国工人阶级，不仅要进行争取合理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经济斗争，而且要使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并采取政治行动，直到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社会掌握了生产资料时为止；不仅要开展国内的斗争，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关系日益发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频繁的国际工业冲突，各国工人阶级，必须在近期内采取国际性的行动。决议案要求，凡愿将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人，都应参加自己的同业工会。各国的工会组织，应当成为全国性的组织，任何把力量浪费在建立小型和孤立组织上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为了在经济斗争中保持工人阶级的政治信念，并准备迎接即将爆发的国际危机，应使工人阶级的成员都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应使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代表，懂得如何为共同的利益来治理自己的国家。此外，报告人还把吸收外国工人移民参加居留国工人运动、尽力支持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人的工会、抵制和同盟歇业等，作为工会的任务。①大会通过了委员会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尽管还有一些缺陷，②但是，它在组织上，从对抗国际资本的要求出发，强调使工人联合起来，直到建立全国性工会和国际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在政治上，它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工会的主要任务，并指出了使工人都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正确方向。这不仅概括而且大大超出了前两次大会的相

①见《历史资料I》，第59~63页。

②在生产社会化问题上，“决议”包含了费边社以市有化、国有化来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在治理国家问题上，“决议”也容忍了工团主义者以工会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基础的主张。

应决议，补充了马克思生前未及论述的问题，为各国工人阶级在新形势下建立工会、发展组织、开展运动，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纲领性文献。

2. 罢工和抵制

罢工，是工人阶级经常使用的一种斗争手段，它和工会组织总是密不可分。工会，是罢工斗争不可缺少的组织条件；罢工，则是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加强工人团结和组织的动因。在新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两者经常是一并提出，成为国际工人阶级特别注目的议题。

国际工人协会的布鲁塞尔大会（1868年）曾专门讨论“罢工和工会的问题”，并通过了比利时代表德一巴普所提出的决议案。该决议强调，罢工并不是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手段，但它对当代劳资斗争往往是必要的；这种手段，有规律可循，它要求有一定的组织、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充足的理由。为此，不仅要求加强工会组织，而且各地区还应成立由各团体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对罢工的适宜性和理由是否充分作出判断。^①这些正确的原则和决定，尽管遭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但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最终仍然为大会多数代表所接受，从而为国际工人阶级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实际上，后来新国际的多次讨论，并没有超出这些原则，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组织的增多，特别是由于在具体指导上看法的分野，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内容更加广泛，正确观点代替错误看法的步履也更为艰难罢了。

新国际布鲁塞尔大会首次将“罢工和抵制”列入议程。从委员会讨论开始，即形成两个对立的方案。英、法代表团认为，

^①见《文献选编》，第1卷第362页。

“罢工和联合抵制，是目前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唯一武器，工会必须立足于着手使用这种武器。”与此相反，德国代表团指出，罢工和联合抵制，并非唯一的斗争武器，而是一种“两面锋利的武器”。运用得好，它有可能打击资产阶级；弄得不好，在不恰当的时间或不恰当的地点使用它，给工人阶级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害，要比带来的好处多得多。因此在使用这一武器时“要仔细考虑全局”，选择正确的时机和合适的地方进行。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并不反对对罢工提供支持。但是，他们只主张以此显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除此而外，概不承担其他义务。与会的多数代表接受了德国提案。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现代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在统治阶级时刻打算取消工人的政治权利和使工人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罢工和联合抵制是工人阶级的必要武器，以便抵御敌人的进攻，并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尽可能地改善工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决议”要求全体工人帮助工会发展，反对政府和企业主为限制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所采取的一切做法，并努力废除限制工人结社权利的法律，要求惩办所有妨碍工人享受其应有权利的人。^①如果说，在罢工和抵制问题上，大会比较快地在主要原则上取得了一致，那么，在总罢工问题上却遭到了更为严重和尖锐的挑战。

总罢工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②新国际成立，即碰到这个棘手

^①《历史资料Ⅱ》，第18～19页；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74～75页。

^②据布劳恩塔尔的考证，社会主义史上的首次总罢工，是由英国宪章派于1838年2月宣布的。1842年8月初，它在工业发达的北英格兰爆发，有几十万工人参加，持续3个星期，以失败而告终。它也是工人运动史上首次以争取普选权为内容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见《国际史》，第1卷第336～337页。

的问题。当成立大会的议程行将结束，法国代表特雷桑，要求在1890年5月1日举行一场总罢工。当即遭到大会主席李卜克内西的驳斥：“举行总罢工，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其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足够强大和统一的工人组织，当前这种条件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根本不可能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如果工人组织有一天强大到足以组织一场总罢工，那么，只是这样搞又不够，而应提出更高的要求。大会只经简短的辩论，即以绝大多数反对（只有两位代表支持），而否决了特雷桑关于总罢工的提案。

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它以更加广泛的规模全面展开。在讨论战争一旦爆发工人阶级如何行动的问题时，纽文胡斯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提出，一旦爆发战争，“各国社会主义者，要以号召人民举行普遍的罢工来回答可能的宣战”。同时，纽文胡斯强调，“如果各国政府宣布战争，那么这是一场革命，并且我们方面有权用一场革命来回答，要求人民不要拿起武器。”这些主张，当即遭到委员会报告人李卜克内西和瓦扬等人的反对。李卜克内西强调，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谁要拒绝，就会立即被押上战时法庭并处以死刑。”李卜克内西的这些观点，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最后大会以13票（国）对3票（国），否决了纽文胡斯关于反战总罢工提议。在讨论罢工和抵制问题时，英、法代表再度提出总罢工的问题。他们主张，罢工作为工会斗争的武器，只有在应用于国际范围时，才能发挥作用。一个国家或组织，发起罢工和抵制，首先应同其他工人取得联系，而且主要是应得到其他国家同类组织的支持，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罢工，尽快发展为国际范围的总罢工。他们主张，要在所有国家进行不间断的、不断强化的、有利于工会组织的宣传，以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为酝酿可能发生的总罢工作准备。这些看法，也未被大会采纳。

就在苏黎世大会召开前夕，1893年4月，比利时工人阶级在工人党总委员会的号召下，为争取普选权发动了有25万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5%）参加的全国性总罢工，几乎席卷所有矿区和主要城市，其激烈程度为近20年来所未有，最后迫使资产阶级议会，在两小时内即通过了几十年也未解决的选举法，为部分工人赢得了普选权，从而成为巴黎公社后欧洲国家工人阶级的一大壮举。比利时工人以活生生的事例表明，一个国家的总罢工或者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并非难得不可思议，也不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只要组织得当，领导有力，时机适宜，条件成熟，它也可以成为工人阶级手中的一件强大武器。正是受这一事件的鼓舞，法国工会的代表，再度向苏黎世大会提出国际总罢工的问题，并被正式列入大会的议程。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只在委员会内进行讨论，并由考茨基起草形成了一个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认为，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进行罢工的条件和目的也各异，加上全国范围的总罢工如以和平方式发动，又不足以达到目的；如果采取暴力，则势必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因此，委员会主张，无论是国际还是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都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最多只能举行个别工业部门的总罢工。”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这种大规模罢工，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也是政治斗争的极其有效的武器。为开展这种罢工，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据此，委员会建议，各国党应撇开国际性罢工不谈，而来讨论当前的问题，并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发展工会和政治组织上。^①这个决议，从原则上并未否定总罢工这个无产阶级极其有效的武器，而且把它看成是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同原来笼统地否定总罢工的决议相比，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较为切合实际。

^① 见《历史资料Ⅱ》，第48～49页。

总罢工问题的讨论，在伦敦大会上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形式。围绕着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措施问题，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间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在关于罢工和工会问题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内，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两个对立的派别，即多数派和少数派。以法国工会代表为报告人的少数派，由于苏黎世大会没有将总罢工问题提交大会讨论，重新向伦敦大会提出这个问题。他援引法国工团联合会90年代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工会应宣布“支持把各行业的总罢工，作为解放的一种方法”，而且援引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等国工人通过全国性总罢工获得普选权的事例，明确地指出，虽然国际性的总罢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全国性总罢工毕竟不同于国际性总罢工，它是可以进行的，建议大会邀请全世界工人，特别是工会会员，来研究这个重要问题，以便由下届大会作出决定。以德国代表为报告人的多数派则主张，罢工和抵制是实现工会运动任务的必要手段，但是，并不存在举行国际总罢工的可能性。同时，多数派报告人，以“无权把一些无代表性的东西纳入我们的纲领”为理由，拒绝讨论少数派提出的全国性的总罢工问题。为此，法国工会代表盖拉尔再次以少数派的名义，反对委员会多数派的行为，并指出，多数派没有一次允许讨论关于总罢工的问题，而在法国工人看来，总罢工“是我们持有的最革命的武器”。鉴于早就应该讨论的问题却一直未曾提上大会议程，伦敦大会又行将结束，少数派提议，大会应要求各国工人加强对这个问题细节的研究，以便下届大会能就总罢工问题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个建议也未被采纳，最后通过了以多数派议案为基础的大会决议。

应该说，新国际在罢工和抵制问题上，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原则。但是，在总罢工问题上，处理得过于草率，没有就各种看法充分地交换意见。毋庸置疑，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确曾有过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作为社会革命开端的总罢

工，但是，总罢工问题，决非无政府主义者一家之言。比利时等国工人阶级的实践已经证明，在工人政党的组织领导下，为争取某些政治权利（如普选权），在一定条件和情况下，举行具有政治性质的总罢工是可行的、成功的，它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因此，对总罢工问题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律否定。实际上布鲁塞尔大会和苏黎世大会的决议，已经包含了上述思想和主张。但是，由于伦敦大会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特别是关于是否通过总罢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争论，掩盖或抹煞了上述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再加上在新国际内很有影响的德国党极其担心“非常法”状态卷土重来，因而不敢正视其他国家工人总罢工获得成功的事实，甚至把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际总罢工主张的理由，予以绝对化、扩大化，因而使得刚刚出现的、已经显露工人阶级革命首创精神的全国性总罢工，在国际内部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承认。这是新国际在前进过程中的一大失策，也为以后在总罢工问题上的激烈较量留下了不和的种子。

3. 国际工会组织的建立

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即已提出。①70年代初，各国工人即开始成立行业性的工会国际组织。1871年德国雪茄烟制造工人建成立第1个行业性的国际工会组织。1877年，在根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曾提出建立一个国际局以筹备召开国际工会大会，后因条件不成熟未予实施。1889年，新国际成立时，参加巴黎两个国际大会的矿工代表，于7月18~19日，举行国际矿工代表会议，为在1890年建立矿工工会国际联合会作了准备。这些事态表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工人阶级国际联系的加强和工会运动的发展，建立国际工会组

①见《文献选编》，第1卷第372~374页；《历史资料I》，第176~177页。

织，越来越成为迫切要求，并很快地被提上新国际的议事日程。

1889年，新国际成立伊始，就曾有人提出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计划，当即遭到否决。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再次接触国际工会组织的问题。当时，英、法代表提出，为完成工会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任务，必须创建国际组织，“工人必须不再是法国、德国、英国的工人，他们必须是全世界的工人。”据此，他们主张先从加强同行业工会的国际联系入手，使各国工会与其他国家的工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并在每个国家设立工会书记处，以与其他国家进行联络，收集整个工人组织所需的报告和统计资料。书记处负责出版有关问题的报告、统计资料、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宣传的结果等。这个方案，又遭到德国代表团的反对。最后，经过法国代表的修正，大会接受了德国的议案。这个议案对英、法联合提案，作了两点原则性的修改：关于成立国际工会组织问题，德国议案以将遇到种种困难为理由，只表示了一种“殷切希望”，并未把它看成是现实的要求，而且强调，当前只是以一种共同方法来显示各国工人的团结精神；关于书记处问题，议案没有把它作为普遍的必要的措施而予以强调，只是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全国工会书记处，而且它的活动仅仅限于“密切注意劳资斗争，并在发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都要使各国工人能够采取措施来支援自己的同志。”后来经过补充，才加上从事职业统计和采访报导政治、社会消息等内容。^①实际上，布鲁塞尔大会按照德国党的要求，搁置了关于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方案。

这种情况，到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才有所改观。尽管德国代表团仍然以受法律限制和遭暴力镇压为借口，否认建立工会固定的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并且认为“通过国际卡特尔条约或协议，能够在双方有良好愿望的情况下，达到同建立固定的国际组织同样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18~19页。

的要求。”但是，无论在委员会内，还是在全体大会上，多数代表仍然不顾德国代表团的反对，坚持主张把各国工人组织起来。首先是通过各国的中央工会协议，按不同行业，成立工会国际联合会，以使各国工会合而为一；其次，在条件成熟时，成立包括各行业的国际工会；再次，为传递情况，交流经验，决定按布鲁塞尔大会的要求成立各国工会书记处。必要时，其活动由国际工会书记处来协调，并按行业举行国际代表大会，以讨论与该工会有关的事项。这些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赞成，最后以6票反对、12票同意而被通过，成为国际工人阶级广泛地组织起来的文献依据。苏黎世大会所作出的上述决定，又为伦敦大会所重申，并在关于工人阶级经济政策决议中着重指出：为了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工会运动，在各国必须建立中央工会即全国性工会，它将负责收集关于劳动市场的统计数字，以在国际间进行交换，同时通报并散发各国发生的重要事件的定期报告。

以苏黎世大会通过关于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决议为标志，工会运动进入了陆续建立国际工会组织的新时期。到1896年止，共建立8个行业性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书记处），连同在此之前建立的5个，一共是13个。^①在此基础上，由丹麦工会联合会主席倡议，于1901年8月21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第1届国际工会代表

^①它们是雪茄烟制造工人国际联合会（1871年）、制靴制革工业工人国际工会书记处（1889年）、国际矿工联合会（1890年）、烟草工人国际委员会（1890年）、国际印刷工人书记处会议（1893）、五金工人国际情报局（1893年）、裁缝国际书记处（1893）、纺织工人国际书记处（1893年）、铁路工人国际书记处（1893年）、运输业工人利益国际研究委员会（1894年）、国际制毛皮工人书记处（1894年）、国际制帽工人同盟（1896年）、平版、石版印刷工人暨相关行业工人国际同盟（1896年）。见《德国工人运动（1869～1914）》，第613～614页。

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常设国际工会书记处的决议，并于第2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2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告成立，它拥有17个行业工会书记处、250万会员。

四、对无政府主义的新胜利

1. 无政府主义者的重新组合

1876年，巴枯宁死后，由他鼓吹的以暴动和个人恐怖为特征的巴枯宁主义，日益不得人心，曾一度喧嚣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也日渐衰微。但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组织和流派，在欧、美一些国家，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在新形势下，无政府主义在改变形式，重新组合，再次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而对国际工人运动构成威胁。

俄国的克鲁泡特金，是继巴枯宁之后另一个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尽管他和巴枯宁一直未曾谋面，却积极参与了巴枯宁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巴枯宁死后，他又成为无政府主义国际的精神支柱，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并通过大量著作，以其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左右当时在欧、美国家一度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巴枯宁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同，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天赋的互助、合作本性，它比之个人的自私心和权力欲，更加有力量。但是，这种本性，目前仍受着强制权威的人为压制，使之无法自由地发挥作用。因此，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破坏、消灭以国家议会为代表的强制权威机构，使人们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便按照天赋的合作、互助本性的方向，经过还保留有所有制但已消灭国家的集体主义过渡阶段，到达完全消灭所有制概念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理论，比之巴枯宁主义更为精致。它既

保存了巴枯宁主义的精髓，主张用破坏手段消灭国家、权威，从而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制造炸弹事件、鼓吹暴动骚乱提供了借口；它又不同于巴枯宁主义，突出地强调人的互助、合作和集体行动，并以达到集体主义阶段为目的，从而为以工会为基础、以总罢工为手段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80~90年代，频繁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和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不满情绪象酷暑的干柴，遍布欧、美。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小生产者居优势的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又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60~70年代，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曾是巴枯宁主义的基地和堡垒。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本国以及流亡的德国、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努力，无政府主义者在瑞士几乎已失去影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3巨头之一的科斯塔，也开始公开非议巴枯宁关于放弃政治、煽动暴动的理论，主张建立工人政党和制订劳动立法，以争取群众，并赞成将议会行动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手段。即令如此，无政府主义在意大利仍有较大的市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拉特斯塔和梅尔里诺。前者是巴枯宁信条的笃信者，热衷于煽动武装暴动和制造骚乱，即使在希望渺茫时，仍然全力以赴。他不但在70年代连续两次发动了毫无希望的暴动和起义；90年代，还在米兰、西西里等地，接连不断地制造骚乱，以致1894年意大利政府也步德国的后尘，实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在意大利，还曾受到一定节制的话；^①那么，它在西班牙，则特别放肆。从巴枯宁时代起，西班牙、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泰罗尼西亚地区，马拉特斯塔

^①1892年，意大利工人党，曾通过一项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纲领。见《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下册第194页。

在那里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且无政府主义者还拥有自己独立的组织。1888年，继原来组织解散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又以个人成员为基础，建立了西班牙地区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并与另一个工会团体一起，作为一个双重组织存在。正是依靠这种组织，他们拒绝议会斗争，致力于武装暴动，先后于1888年和1891年，在农村和城市，制造一系列暴乱、恐怖和扔炸弹事件。西班牙政府分别于1894年和1896年，实行严厉的“反无政府主义法”，并处决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属于原来意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巴枯宁主义的幽灵。他们不仅在国内给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把他们所惯用的一套破坏伎俩带进新国际，从而给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制造了一系列混乱。

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满足原有的暴动和恐怖手段，而是适应新的形势，逐步形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新形态革命工团主义。从历史渊源看，它是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必然发展。从现实条件看，又是小资产者由于政治行动尤其是议会活动未能奏效而产生的急躁和绝望情绪的产物。同巴枯宁主义一样，它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行动，主张一举消灭产生一切祸害的万恶之源——国家；同巴枯宁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工会为基础，并把它作为未来社会的细胞，将原来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为内容的总罢工，予以改造，使之成为社会革命的杠杆和开端，以通过它建立起没有国家、没有权威的生产者地方公社。革命工团主义，是法国工会领导人在长期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最后由1895年成立的劳动总联合会书记佩洛蒂埃集其大成。在他们看来，要实践上述理论，关键是准备和发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总罢工。这是工会活动的基本内容。在法国全国工团联合会成立的1886年，即开始讨论总罢工问题。1888年，工团联合会布斯加特大会，通过决议

宣布：“同欺骗它的政客脱离关系”，并认为，局部罢工只能作为鼓动和组织手段，“只有总罢工即完全停止一切劳动的革命，才能引导工人走向解放。”由于对政治斗争和总罢工问题的意见对立，再加上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盖得派未能正确处理党和工会的关系，终于在1894年9月南特大会上，导致工（团）会与党、工会与社会主义者的决裂。同时，南特大会还决定任命一个拥有权力和经费的特别委员会准备总罢工，以使其成为锻炼、教育工人阶级的手段，成为没收资本、消灭国家的信号。站在直接行动即总罢工旗帜下的，不仅有象佩洛蒂埃、盖拉尔等法国工团的领导人，也还有因对温和行动不满并从可能派中分离出来的阿列曼派和半无政府主义者索列尔等人。正是通过他们，在国际内部形成一股力主国际总罢工的势力。

同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站在一边的，还有以纽文胡斯为首的荷兰社会民主联盟。纽文胡斯原来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同巴枯宁主义者也无历史联系，是个血统的路德教派的传教牧师。70年代末（1879年）他才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以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而名闻遐迩。1881年，纽文胡斯建立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内的荷兰民主联盟（社会民主联盟的前身）；1888年，在天主教徒支持下，他成为荷兰第1个社会主义议员。3年后，即1891年，在同激进派的竞选中落选，由此纽文胡斯对议会活动反感，逐渐同联盟中反对议会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接近，卷入无政府主义队伍之中。1891年12月，他在联盟代表大会上，公开要求停止一切议会活动，如果需要利用议会讲坛，也只能用于宣传社会革命。第2年，纽文胡斯将力主开展议会活动的胡斯，从联盟中开除。1893年12月，联盟大会按照纽文胡斯“始终不渝的观点”，进而作出决议，“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那怕是为了宣传”，也不参加议会选举。由于纽文胡斯一意孤行，联盟于1894年最终分裂。主张政治斗争和议会行动的胡斯、特鲁尔斯特拉等人，另组荷兰社会民

主工党，而联盟在纽文胡斯的控制下，越来越成为一个半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在纽文胡斯看来，议会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地盘，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事议会活动是浪费精力。只有通过组织工会，采取总罢工的直接行动，才能预防和制止战争，消灭军国主义，以实现工人的解放。他正是怀着这样一种虔诚的愿望，参加国际大会。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同德、法、奥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发生正面冲突。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原来并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市场。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实行“非常法”后，在党处于危机的紧要关头，哈塞尔曼、莫斯特为代表的少数人，不顾形势的变化，公开要求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宣扬“匕首和毒药”的个人恐怖行为，鼓吹以盲目的暴力行动反对“非常法”，并攻击党的领导，将党内斗争公诸于世。德国党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于1880年8月22日，正式通过伯恩斯坦起草的决议，以绝大多数票决定开除哈塞尔曼和莫斯特。尔后，莫斯特流亡美国，并把一整套爆炸、暗杀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强加于美国工人运动。1890年，“非常法”废除后，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党的工作重点也开始向议会斗争的方面转移。在这转折关头，以柏林的《人民论坛》、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工人报》以及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报》为中心，一批年青的党员记者和编辑组成青年反对派，反对党的路线方针，主张不顾斗争现实条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盲动，幻想一举推翻帝国，取得革命胜利。这个反对派刚冒头，即受到恩格斯严厉批评和党内多数人的强烈反对。1891年10月，党的爱尔福特大会通过关于将反对派首领维尔纳和维尔德贝格开除出党的决议。^①但是，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弥勒、维尔纳等对此不服，而且继续留在工人运动之中。他们先后以工会代表的名义，参加新

^①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85~86、130~133页。

国际的工作，并按照他们原有的世界观和理论观点，参加有关问题的辩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意、西、法、荷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互呼应，成为一股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抗衡的势力。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分歧

新国际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匆忙召开成立大会的。为了团结更多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以对付可能派及其支持者，海牙代表会议和组织委员会发出的通知书，邀请欧、美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大会，而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怀有各种目的、不同主张的组织和团体，闻讯后纷至沓来，从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涌入闯开了大门。因此，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国际劳动立法。在这个问题上，参加巴黎大会的多数代表，同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就要不要争取国际劳动立法有着原则分歧。还在大会发言中，意大利的梅尔里诺就提出，大会将劳动立法列入大会议程表明，它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干一些政府要干的事情。他在决议草案中又指出，劳动立法“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它只能确立对工人的奴役和意味着否定革命社会主义的伟大原则”。^①法国的弗朗舍也认为，劳动立法是全无用处的。与此相反，在7月20日的全体大会上，英国代表肯宁安—德莱安指出，在当前条件下，要把为过度劳累、贫困、酗酒所压倒的工人群众争取到运动中来，就必须用实际问题唤起他们兴趣。争取8小时工作日就是工人所关心并能在国际范围内采取共同行动的实际问题之一。它对于改善劳动状况和促进工人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法国代表韦伊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不能因为英国

^①梅尔里诺在拟于大会发表而未及发表的声明中，除了重申上述看法外，还提议，“把一切主张劳动立法的建议视为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和欺骗性的而予以摒弃”。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8期第202页。

工人处于落后状况和阶级觉悟不高，就有理由使无产阶级停留在虚幻的改良词句之中。这种改良词句，只能欺骗、愚弄工人。发言人指出，通过改良和立法的道路，不可能达到改善劳动群众的境况。为了教育群众，必须灌输造反的思想，“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治好一切社会弊病。”他的讲话，得到法国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鼓掌支持，却遭到比利时代表德一巴普的驳斥。他明确地指出，制订国际劳动立法如同国际邮政服务业一样，是完全行得通的。经过斗争，不但可以为改善劳动状况，逐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同时，工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所提出的要求，会越来越争得公众舆论同情，这也是对政府施加压力。此外，他还从分析社会生产与个人自由的相互关系入手，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谓劳动立法威胁工人自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对此，纽文胡斯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在随后的发言中，指名要同德一巴普、肯宁安一德莱安辩论。他认为，“劳动立法是政府向我们玩弄的最坏的恶作剧”，“采用8小时工作日制，对工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极大的失望。因为弊端不在劳动时间，也不在工资方面”，“弊端的根源，在于不完善的、完全不合理的劳动产品的分配。不铲除这个根子，贫困和奴役永远也不会消除。”实际上，纽文胡斯是运用拉萨尔武库中的“工资铁律”，来为反对和取消国际劳动立法的言行辩护。纽文胡斯的观点，遭到李卜克内西的有力回击。李卜克内西根据德国党在议会活动方面的成功经验指出，劳动保护法的实施，绝不会阻碍工人运动，而是有利于和极有益于工人运动，并促使它全面高涨。辩论中，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气势汹汹，但是，它们的主张却没有为多数代表所接受。最后，大会在无人反对和荷兰代表团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争取国际劳动立法及其措施等两个决议。

关于议会策略。这是当时各国社会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思想、理论分歧的焦点。巴黎大会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是由讨论

实现劳动立法的措施开始的。由倍倍尔等草拟的决议明确提出，各国工人必须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要求社会党人，利用议会来实现本届大会关于劳动立法的决议。这一议案，当即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意大利的梅尔里诺率先挑起争论。他一方面把主张议会策略的社会主义者诬为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又说，社会主义的议员已为政府所腐蚀，“社会主义已越来越被证明不能实现解放人类的任务”，“它会被埋葬，它的党员会消失”，只有象他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才打开大旗，把彻底解放人类写在这面旗帜之上。^① 纽文胡斯说的更直率，他以自己的议员经历为例指出，议会只不过是一种滑稽剧。“议会就是人们在那里讲话和说谎的集会。”因此，他竭力反对议会策略，主张直接诉诸暴力。对此，李卜克内西受德国代表团的委托，郑重地声明：不想同纽文胡斯辩论议会主义的有效性，但是，不能从我们的沉默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同意纽文胡斯刚才所说的拒绝态度。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已强烈地表述了我们的立场。为挽回败局，法国9个工团主义者以其他41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与之针锋相对，大会主席之一的法国代表瓦扬，向大会递交了法国各省200名工团代表的声明，坚决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线，从而粉碎了无政府主义

^①按照梅尔里诺的主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可能用妥协来沟通。妥协，事实上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人们声称打算通过选票和法律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本世纪的巨大迷信和骗局，在工人阶级中助长这种迷信和骗局，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相反，必须破坏和摧毁对立法者和立法的偶像崇拜”。为此，他向1889年巴黎大会提议，“把废除代议制和国家作为真正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写入自己的纲领。”见同上，第201、202页。

者的阴谋。最后，大会以压倒多数（只1票反对），通过美国代表布什所提出的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决议”强调了争取国际劳动立法斗争在实现工人阶级解放中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它又明确指出，对工人阶级解放而言，只靠工人的单纯经济组织工会是不够的。它还对统治阶级使用强制性的暴力，来阻止社会和平地向新社会制度方面发展的危险，提出了警告，并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争取普选权、通过议会争取劳动立法的活动，作了具体规定。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议会策略言行的否定，体现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合法与非法斗争的结合，它的被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①

随着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深入开展，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演变为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政治策略的争论，并在苏黎世大会、伦敦大会达到高峰。根据比利时代表王德威尔得的报告，苏黎世大会通过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的决议。“决议”首先肯定了政治斗争的地位，指出它是“无产阶级取得经济解放的一种手段”；其次，“决议”强调指出，政治斗争对宣传和阐明社会主义原则、争取迫切需要的各种改革乃至夺取政权，变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都是极其必要的；再次，“决议”明确地规定，现阶段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建立国内国际的工会和其他组织，争取和利用政治权利，来实现工人要求，实行直接立法和比例选举制等等。至于采取哪一种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应由各国党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来选择；为坚持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决议”还要求，必须把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的，即把对整个制度经济、政治方面的群众性改革放在首位，决不允许把政治斗争当

^①讨论情况详见《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记录》；另见《历史资料Ⅱ》，第7～8页。

作妥协和联合的借口，而有害于工人阶级共同的原则和独立。^①

“决议”充分肯定议会斗争这个政治斗争的形式，实际是对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作了总结。但是，它对其他形式和内容却注意不够。伦敦大会在关于代表条件争论的基础上，再次通过了《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决议，进一步深化了政治策略的内容，充实了工人阶级应予实现的一系列纲领原则。“决议”根据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经验，明确地规定了政治活动的内容，指出这“是指工人阶级为了夺取政权，通过他们在国家机关和自治机关中的立法与行政活动以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从而使政治活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议会斗争和选举活动，并把它同夺取政权、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决议”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出发，进一步扩大了政治活动的外延，其中，包括争取政治权利、开展议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殖民政策、实现民族自决权等；“决议”强调一切民族完全自决的必要性，揭露了资产阶级把推行殖民政策美化为传播文明的虚伪本质，在国际文献中提供了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范例。^②

关于反战措施。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历来是国际工人阶级关注的议题。新国际成立伊始，就接触这个议题，并通过了《废除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决议。但是，还未对此深入讨论。布鲁塞尔大会则不然，对立双方针锋相对。由李卜克内西代表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分析了军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揭露了战争的经济根源，表达了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持久和平的愿望，它号召各国工人在欧洲形势日益危急和统治阶

^① 见《历史资料Ⅱ》，第42～43页；另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97～98页。

^② 《历史资料Ⅱ》，第53～54页。列宁在论述民族自决权时，曾高度评价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33页。

级沙文主义的挑拨离间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坚决反对一切好战企图和一切支持这种企图的同盟，不倦地致力于成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事业，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决议”强调，这一切，“就是防止可怕的世界大战灾难的唯一手段”。纽文胡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个议案。他指出，这是一纸含糊不清、夸夸其谈的空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大话。他主张，为反对军国主义、防止战争的爆发，应采取切实的步骤。其中，包括反对危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沙文主义，拒服兵役，实行普遍罢工，甚至发动国内战争。“就我们方面来说，宁愿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置于国家间的战争之前。”这个议案，得到英、法、荷部分代表的支持，而遭到瓦扬、李卜克内西的强烈反击。他们认为，纽文胡斯背离和低估了委员会决议所阐明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他所主张的反战总罢工，由于面临着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无疑是一句可怜的空话”；他的以国内战争反对战争的主张，也是“事先宣布一场革命”。比利时代表博尔德斯，力图折中双方的看法，建议允许各国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采取最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做法。此外，英国代表还提出了对纽文胡斯案的修正。①但是，由于德、法两党领导人的坚持，上述提案均被否决，最后以多数票通过了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②

关于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态度问题，苏黎世大会在该议题委员会中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领衔提出的德国决议案，重申了布鲁塞尔决议的基本精神，并提出，党应全力以赴地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意图，更加巩固各国人民的联系；党在议会的代表，有责任否决军事拨款，不断反对维持常备军和

①见《国际布鲁塞尔大会记录》；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75~82页。

②见《历史资料Ⅱ》，第44页。

要求裁减军备，任何一个社会党，都应协助旨在奠定世界和平的一切组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坚决摧毁资本主义这个将各民族分成两个敌对营垒并相互残杀的祸根。很显然，它比之布鲁塞尔决议，又前进了一步，变得更为具体而实际了。以纽文胡斯代表的荷兰代表团决议案则主张，卷入战争的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应起来反对政府宣战，办法是拒绝服兵役（军事罢工），举行总罢工（特别在军事生产部门），以及号召妇女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留在家中。①最后，委员会在3票反对的情况下，以多数票通过德国议案。荷兰的议案也同时交付大会讨论。为了申述自己的看法，纽文胡斯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首先，他援引国际工人协会关于各国工人应以普遍停工反战的决议，②以为他所主张的军事部门工人实行总罢工的观点辩解；其次，他明确指出，不能仅限于德国决议中一般地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企图，还应遏制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德国社会党人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再次，他认为，不能停留于空洞的抗议和陈词滥调式的阻挠，而应做一些实际的并为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是有效的工作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其中，包括拒服兵役、赢得妇女支持和军事部门罢工等。纽文胡斯的这些看法及其议案，在澳大利亚、荷兰、法国和挪威的代表中得到支持，而遭到德、法、俄、奥等国社会党人的反对。作为该议题委员会报告人的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指出，拒服兵役的结果，只能首先解除文明国家的武装，把西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43页。

②1868年，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大会的决议指出：“代表大会特别向各国工人建议：一旦在他们国内爆发战争，就停止一切工作。”“一旦停止生产，社会实际上就无法生存，所以生产者只消停止工作，就可以使由个人操纵的专制政府一筹莫展”。同时它号召抵制兵役。见《文献选编》，第1卷第361页。

欧拱手交给俄国哥萨克；俄国专制主义的胜利，将使我们整个文明付诸东流，代无产阶级自由而起的将是俄国的强权政治。普列汉诺夫认为，荷兰建议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英、匈、瑞士、美等国的代表指出，军事罢工的思路虽然很好，但不现实，没有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最后，大会以14票（国）对4票，否决了荷兰提案，通过了倍倍尔等人提出的决议。讨论中，所有发言的人，都回避了1868年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大会关于反战停工的决议。关于德国党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除了德国、奥地利代表将其指责为攻击外，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①1896年，伦敦大会再次就战争问题讨论，并补充了包括成立国际仲裁法庭、人民直接决定宣战等措施。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被排除和纽文胡斯等退出大会，并未引起更大的争论。

3. 从国际内部排除无政府主义者

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就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展开争论，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采取极不正当的手法，蓄意制造混乱。结果，国际一成立，就面临着十分难堪的局面，不得不应付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挑衅。

1889年7月，巴黎成立大会刚开始不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就以摆脱飞扬跋扈的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兄弟团结的敌人为借口，在会场中捣乱。一些代表的报告或发言，不时为他们的喧嚣、吵闹声打断。为此，大会主席发出将把捣乱者赶出会场的警告，他们置之不理。7月18日，来自意大利、带着无政府主义组织委托书的梅尔里诺，在大会上公然攻击社会主义者，要求在会上阐明他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并对大会的翻译工作故意刁难，

^①讨论情况详见《国际苏黎世大会记录》，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83~89页。

挑起程序性纠纷。为消除无政府主义者所谓大会不听取他们的理论主张的抱怨，拉法格提议，让无政府主义者发言15分钟。这种宽容、和解的精神，反而使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更加肆无忌惮。蒙培恩脱等公开扬言，只有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才能开好大会；以梅尔里诺为首的一伙捣乱者，在可能派大会上老老实实，一到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就大吵大闹，有意破坏大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会断然决定，将包括梅尔里诺在内的3个肇事者带出会场，其他7名意大利和英国的捣乱分子为表示抗议，也随之退出会场。^①

鉴于巴黎大会的教训，布鲁塞尔大会开始加强对出席代表的资格审查。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取消4名既无工会也无其他政治组织委托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资格。其中，比利时3名、荷兰1名。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仍不甘心于失败。在苏黎世大会召开前夕，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以便混进大会，将无政府主义理论策略强加于国际工人运动。为了不重蹈巴黎大会闹剧的旧辙，新国际正式提出关于参加大会的代表条件问题。

1892年7月，负责筹备苏黎世大会的瑞士组织委员会，在向各国工人发布的第1号公报中，明确地规定：向所有“承认建立工人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之必要性”的工会和社会党发出邀请，首次公开地涉及代表条件问题。1893年3月26日，苏黎世大会的预备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关于出席大会的邀请书，正式提出“凡承认建立工人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之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社会党和社会团体均得参加大会”，并就代表资格审查和由组委会向代表颁发合格证件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②

苏黎世大会，在讨论“代表条件”时，有两种对立的主张。

^①见《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记录》，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8期第194~195页。

^②《历史资料Ⅰ》，第39~40页。

一种是考伊费尔等13人提出的法国提案。它以允许发表各种政见和加强无产阶级团结为借口，主张删去有关政治活动的提法，将代表条件改为“所有承认工人组织有必要的产业工人组织、社会主义党派和联盟都可以参加大会”。这个取消政治活动的提案，得到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等人的支持。与之相对立，辛格尔、阿德勒、倍倍尔、考茨基、李卜克内西、门德尔森、朗格等人，主张坚持布鲁塞尔预备会议决议。倍倍尔还专门对代表条件中有关政治活动条款，作了补充说明。他指出：“政治活动，指的是工人政党为了无产阶级事业和取得政权，而行使或争取政治权利和立法机构。”讨论中，由于兰道尔等人肆意曲解上述补充建议，声称“政治活动”一词毫无意义，而且怎么理解都可以。同时，英国一些代表，对补充说明也不甚理解。鉴于此，倍倍尔、考茨基、阿德勒等5人，再度就这一问题发表声明指出，补充说明决非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按定义去采取政治行动，“只是要求每个人承认工人阶级的权利，根据自己的判断，为发展劳动阶级的利益而使用政治权利，并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经过讨论，关于代表条件的决议和倍倍尔提出的补充说明，为多数代表所接受，并根据德国代表团的建议，撤销了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尔和维尔纳的代表资格。^①恩格斯在大会的闭幕演说中，高度评价大会通过的关于代表条件的决议，认为这表明大会“同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划清了界限”。^②

行将被排除出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伦敦大会前又搞了一系列活动，企图再度打入国际大会，与社会主义者较量。以纽文胡斯为中心，他们四出活动，搜罗支持者，并伪造代表委托书，试图混入大会。克鲁泡特金还专门致函纽文胡斯，建议竭

^①讨论情况见《国际苏黎世大会记录》。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9页。

力废除苏黎世大会关于代表条件的决议。伦敦大会开幕前，无政府主义者专门召开反议会主义委员会，具体策划混入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控制会场，破坏大会。大会第1天，以社会主义团体代表身份进入大会的纽文胡斯、科尔纳利森等无政府主义者，再度提出改变苏黎世决议、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出席大会的要求。因此，要不要坚持苏黎世决议，是否允许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就很尖锐地摆在出席伦敦大会的代表面前。在大会的辩论中，英国独立工党领导人哈弟和汤姆·曼主张，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宽容忍让态度，以便容纳不同意见，实行言论自由。实际上，他们早在大会前就曾竭力劝说李卜克内西允许无政府主义者与会。按照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说法，哈弟等是“纽文胡斯在德、法等国同伙的忠诚卫士”。正是在他们的庇护下，纽文胡斯拼命攻击苏黎世决议，大谈自由宽容精神和友好联合，以便按照无政府主义的要求，把大会开成一个非政治的、纯经济的大会。同时，纽文胡斯还以分裂相要挟，要求大会改弦更张。饶勒斯、海德门、蔡特金等人，驳斥了上述主张，坚决不同意将无政府主义者再度引入国际大会。最后，大会按国别表决，以17票赞成、2票反对（荷兰9：5；法：57：56）、1票（意）弃权，再次肯定了苏黎世决议。据此，通过严格的审查，大会决定取消一批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资格。7月29日，退出会议大厅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题为《社会民主党人垄断工人运动》的抗议信；7月30日，纽文胡斯以荷兰代表团名义，声明离开大会，今后也不再出席国际大会，并指责大会是“宗派主义的、不宽容的、有偏见的、党派性的大会”。退出大会后，纽文胡斯随即与克鲁泡特金、马拉特斯塔、兰道尔、米歇尔、勒克律等人，在伦敦召开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会议，公开攻击国际大会，继续坚持反议会主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①

①参见《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378～380页。

1896年8月1日，伦敦大会结束前夕，大会常委会鉴于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实际情况，对参加下次代表大会的条件，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大会常委会受命只向下列代表发送下次大会的邀请书：“1. 愿以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代替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将立法斗争和议会斗争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的各团体之代表；2. 虽未参加政治斗争，但毕竟承认立法斗争与议会斗争之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组织。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排除之列。”^①李卜克内西解释这一建议时又强调，下届国际代表大会，不允许发生本届大会期间令人不快的局面。为了在下届大会上看到社会党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团结一致，他代表常委会明确地宣布：“无政府主义者无权被邀请出席大会”。

五、凯举行进中的国际工人阶级

1. 组织程度的提高

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谈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时，曾以极其欣喜的心情指出：“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②新国际成立7年以来的事实，证实了恩格斯的这一正确估计。在国际团结的旗帜下，各国工人阶级凯举行进，以崭新的面貌，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强大战斗力。

工人阶级组织程度提高的主要标志，是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

^①参见《历史资料Ⅰ》，第6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9页。

团体的发展。到90年代中叶，凡是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几乎都创建了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继德、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俄国、日本、保加利亚等后进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开始组织起来。1896年，欧美国家共有近30万党员。^①这个数字，在各国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增长的速度却很快。德国党，1875年合并时，只有2.5万党员，到90年代末，增长3倍多，达10万之众；奥地利党，由原来的6千党员，增加到4.4万；法国工人党党员，1890年为6千，1898年达1.6万。其他如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等国工人政党，也已有数以百计的党员。党的发展，不仅表现于数量的增长，尤其反映在党的纲领策略水平的提高之上。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国际交往的增加，特别是新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对国际工人运动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的讨论，大大地提高了国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使得各国党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贯串于自己的纲领之中。在这一方面，作为当时国际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德国党，为其他党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榜样。

1887年10月6日，德国党的圣加仑大会，根据施留特尔的建议，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奥艾尔组成3人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党纲，以代替业已过时的《哥达纲领》。由于“非常法”尚未废除，党还不能公开活动，制定新党纲的工作，始终没有充分展开。直到1890年10月，党的哈雷大会，才再度提出此事。1891年6月28日，党的执委会，提出一个主要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起草的新党纲。对于这个草案，特别是它的政治要求部分，恩格斯很不满意，专门写了个题为《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意见。^②党的执委会，只是对草案作了部分

^① 见《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第150页。

^② 6月29日，恩格斯将这些意见告诉了考茨基。

修改，即将它发表在《前进报》上，供全党讨论。^①考茨基对执委会草案也持批评态度。为此，他和伯恩斯坦一起，于8~9月间，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一组题为《新党纲草案》的文章，并提出一个包括绪言和两部分正文的新草案（《新时代》编辑部草案），得到恩格斯的肯定。最后，党的纲领委员会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以《新时代》编辑部草案为基础，形成最后草案，提交1891年10月召开的爱尔福特大会讨论并被通过，从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2个纲领，又称《爱尔福特纲领》。

这个纲领通过后，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指《哥达纲领批判》——引者注）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这个纲领，除某些地方表述欠妥外（也只是措词含糊和过于笼统），至少在初读之后，提不出更多的意见。”^②从总体上看，《爱尔福特纲领》，是《共产党宣言》之后，第1个坚持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基本原则的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第1个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所能达到的理论水平和成熟程度。《纲领》依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根源，并在论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指出，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加快实现被剥削阶级“高度福利与全面和谐发展”这一历史进程；《纲领》指出了依靠无产阶级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统治这一必由途径；

^①主要对绪论和经济部分作了修改。对恩格斯批评最尖锐的政治部分，未作实质性修改。其中，包括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共和国等重大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9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0页。

《纲领》明确地宣布：“工人阶级解放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共同参加的事业”，从而重申并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纲领》还阐述了工人政党作为政治斗争组织者的作用；同时，从当前斗争的实际出发，《纲领》提出了党应坚持的一系列民主主义要求和包括争取8小时工作日在内的劳动立法等工人的特殊要求。^①

正因为《爱尔福特纲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当时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特点，因而它一发表，即为各国党所注目，并为他们所仿效。挪威工人党（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1893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1893年）、比利时工人党（1894年）、普尔瓦提和斯拉沃尼亚社会民主党（1896年）等，在制定自己的党纲或原则宣言时，普遍接受了《爱尔福特纲领》的理论原则，有的甚至在结构、内容和条文表述形式上，完全师承《爱尔福特纲领》，从而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一批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党纲，标志着国际工人阶级在思想理论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后来，列宁就曾指出，德国党的纲领，为所有社会民主党树立了榜样。他主张，使俄国党的纲领接近德国党的纲领。“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仿效好的并没有什么坏处，何况现在常常听到有人对这个纲领进行机会主义的和模棱两可的批判，我们就更有责任公开表示赞成这个纲领了。”^②

新国际成立后，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程度的提高，还表现在工人阶级其他群众组织的发展上。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和会员，都有较大增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开始把眼光转向农村，在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特别是农业工人方面，做了许多

^① 见《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附录），第22～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206页。

工作。丹麦社会民主党，还在70年代，即通过社会民主联合会，在农村建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团体（支部）。1893年，社会民主联合会新增的89个支部，其中67个在农村；1896年，它已拥有239个支部、2.3万成员，其中154个在农村。^①匈牙利党，在发动和组织农业工人的基础上，于1897年2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第1届农业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愿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的决定，大会还选出一个由11人组成的农业工人组织领导的机构，并于4月间创办机关刊物《农业》杂志。^②

合作社运动，在比利时又有新的进展。1891~1895年间，在原有229个合作社协会基础上，又新建了319个。其中，仅1895年就成立了94个。布鲁塞尔“人民之家”合作社，到1895年，已向1.2万个家庭、6万人提供645万法朗的面包，实现利润24.5万，从中提供宣传经费达3.47万法朗。^③在比利时带动下，法国利尔、鲁贝等地，也建立起社会主义合作社，并于1895年成立社会主义消费合作社交易所。这个团体，包括942个合作社、30万会员。他们以根特工人为榜样，用利润的一部分，为工人提供免费医疗和低价药品，还为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提供资金。素有合作社运动传统的英国，到上世纪末，已有两千个消费合作社，170万社员。^④正是在各国发展的基础上，到90年代中，合作社运动已开始朝国际联合的方向发展。1895年8月19~23日，在伦敦召开的有10个欧洲国家、23名合作社组织代表参加的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国际合作社联盟；1896年10月28日，在巴黎召开的联盟第

① 见丹麦社会民主党向国际伦敦大会的报告。

② 见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向国际巴黎大会的报告。

③ 《立足于社会主义观点的合作制》（比利时工人党向国际伦敦大会的报告）。

④ 见《国际工人运动》，第2卷第465~466页。

2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章程。^①

90年代，欧洲国家的青年运动，由于受比利时青年近卫军的影响，已有广泛的发展。90年代初，奥地利、匈牙利就建立了一批青年工人小组；1894年11月14日，维也纳青年工人协会宣告问世。它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维护学徒权益为宗旨。法国青年组织，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成立了全国性联合会。瑞典、英国等，早在80年代，即着手创办社会主义星期日学校和社会主义青年俱乐部，在此基础上，于90年代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捷克）、意大利、挪威、瑞士等国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也在积极筹划之中。所有这些组织及其日益增多的活动，为后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奠定了初步基础。^②

2. 议会斗争的胜利

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这是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国际工人阶级的一种主要斗争形式。德国工人阶级不仅以一个最有力的、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为各国工人阶级做出了榜样，而且“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③还在70年代，德国工人阶级，即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并以国会选举中获得的惊人增长的选票，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④尽管其间实行“非常法”，使党

①见《德国工人运动（1869～1914）》，第620页。

②《德国工人运动》，第607～60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页。

④1871年，为10.2万张（包括全德工人联合会的6.04万张）；1874年，为35.2万张（包括全德工人联合会的18万张）；1877年，为49.3万张。

在1881年获票数一度有所下降（31.2万张）。但是，不久又迅速增长。到1890年达到142.7万张，相当于“非常法”实行前1877年的289.4%，占1890年全部选票的19%。就在这一年，延续达12年的“非常法”被废除。1893年，德国党又一次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178.7万选票，占总票数的23.5%。与之相适应，当选工人议员，由1877年的12人，增长为1893年的44名，增加2.6倍。工人阶级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定期检阅自己的力量，既增强了自己的胜利信心，又增加了敌人的恐惧，因而提供了最好的宣传手段。同时，它使党通过选举直接同人民群众接触，利用议会讲坛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把议会这个历来是欺骗的工具，变成争取工人解放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普选权、议会斗争这种无产阶级崭新的斗争方式，到90年代，越来越被广泛地采用。

在法国，各社会主义团体，在1889年的大选中，只获得10万选票。1893年，获得50~65万（工人党25万），当选议员50人。在国会中，开始有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主义党团。在一些原来工人没有普选权的国家，经过斗争，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利时工人党，在1894年大选中，获得35.5万选票，有28人作为议员进入议会；1897年，奥地利党，获得60万张选票；意大利社会党，获得13.5万张选票。有些小国的党，如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872年，只获得767票；1890年，上升为1.72万，有两人进入议会；1895年，达2.45万，8人当选为议员。^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工党，在议会斗争中作为一支新军崛起。1891年，它在南威尔士选举中，得票10.4万，占总票数26.9万的38.6%；在139名议员中，工人议员37名，占总席位数26.6%。在整个澳大

^①见《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载《第二国际》，第20卷第1922~1937页。

利亚423个议席中，工党拥有94席，占总数22.2%。^①

国际工人阶级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充分地反映了各国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作用不断增长和影响逐步扩大。但是，议会斗争本身，特别是选票的巨额增长，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也使一些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党的领导人，为胜利冲昏头脑，产生了种种夸大议会作用、否认革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幻想。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盖得，由于第1次被选入议会，头脑就有些昏昏然。他在致诺尔省鲁贝市工人选民的信中，就公开宣称，他被当选为议员，“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一场能使你们获得解放的革命的开端。受到你们榜样鼓舞的其他地区，也会投工人党的票，到那时……结束贫困和奴役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只是由于你们的意志和信念，社会解放将通过合法途径来完成……感谢你，鲁贝，你过去已经使社会主义进入市政府、区议会和省议会，现在你又使它进入了波旁王宫。”^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人党开始同从资产阶级激进派中分离出来的米勒兰集团结成选举联盟。

尽管在争取选票、参加议会斗争中，一些党的领导人已流露出错误的想法，但是，它并未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流，而且马上受到批评和制止。恩格斯就曾针对盖得上述说法严肃地指出：“宣称自己当选是一次革命，通过这次革命社会主义就会进入波旁王宫，并为整个世界开创一个新纪元，这对一般凡人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③同时，恩格斯对持有类似想法的李卜克内西也进行了开诚布公的批评。李卜克内西很快就认识了错

^①见《关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载《第二国际》，第9卷第318~321页。

^②转引自《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14页；另参见《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245页。

^③《恩格斯同保尔和劳尔·拉法格通讯集》，第3卷第281~282页。

误，积极地投入了同南德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等所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由于他和其他领导人的坚持和斗争，1891年党的爱尔福特大会和1893年党的柏林大会作出决议，否定国家社会主义的错误主张，使党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继续前进。

3. 罢工运动的发展

新国际建立后，各国工人阶级在利用普选权这一崭新斗争方式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传统的斗争方式——罢工运动，并在规模、水平和取得的成果方面有新的发展。

以当时罢工运动开展十分活跃的法国、美国、意大利为例，1890年~1896年期间，3国共发动13,855次罢工，卷入斗争的工人，达345.2万。同整个80年代相比较，90年代前6年的罢工次数，增长33.4%；罢工人数，增加11.1%。如以90年代的前6年同80年代同期相比较，罢工次数，增长133.6%；罢工人数，增加74.7%。其中，以美国的罢工运动最为突出。1890~1896年，美国共发生10,142次罢工（相当于80年代10年总数的130.5%），占3个国家罢工总次数的73.2%；参加罢工的人数，为257.6万（相当于80年代总数的109.4%），占3个国家罢工总人数74.6%。按照罢工的成功率来看，90年代前期，较之整个80年代，也有很大提高。在美、德、意3国中，1880~1890年，胜利或以妥协告终的罢工次数，是1,406次；1890~1896年，则为2,452次。后6年的获胜率，比前10年提高74.3%。在这一方面，法国更典型，它在90年代前6年的获胜率，相当于80年代10年的340%。值得注意的是，罢工的失败率也在增长。1880~1889年，失败次数为1,032次，1890~1896年增长为1,923次，比之80年代提高86.3%。法国、意大利尤为突出。同整个80年代相比，90年代前6年，法国罢工的失败率，提高147%；意大利，提高106%；相反，美国却降低13.6%。这种情况，既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工人运动镇压的强

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工会运动尤其在法、意两国工会运动中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90年代前半期的罢工，还有着它自身的特点。国际大会关于开展争取国际劳动立法斗争的号召和它所通过的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为这个时期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打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成为罢工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实现8小时工作日，已成为这个时期许多国家罢工斗争的主要动因和要求。以北欧国家瑞典为例，关于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在整个70年代一次也没有；80年代前半期（1880~1884），共发生6起；80年代后半期（1885~1889），上升为17起；90年代前半期（1890~1894），则为55起，相当于整个80年代总数（23起）的239.1%。从“五一”发源地的美国情况看，围绕着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日，在80~90年代，形成了两个罢工运动的高峰。一个是首次举行“五一”示威的1886年，共发生1,572次罢工，投入斗争的共61万人，为80年代美国罢工斗争次数和人数之冠；一个是为贯彻响应新国际关于“五一”决议而投入国际统一行动的1890年，共发生1,897次罢工，斗争的广泛规模，也是90年代其他年份所罕见。饶有趣味的是，在这两个高峰之间，发生罢工的原因，也有一些细微却很有说服力的变化。1888年和1890年之间，为提高工资而发生的罢工，从667次减少为607次；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却从690次增加为833次。^①这些数字的变化说明，国际关于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度的决议，确实反映了国际工人阶级的要求，因而它必然为他们所接受，并迅速转化为群众性的运动。

同争取普选权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并直接为它服务，这是90年代前半期罢工运动又一个突出的特点。无论在工人已获得普

^①以上数据，出自《罢工斗争》有关年分的统计。

选权还是没有获得普选权的国家都有表现。法国的工人早已获得普选权，但也面临着资产阶级践踏工人民主权利的威胁。1892年5月，卡尔莫煤矿公司所属工厂的钳工、独立社会党人卡尔维尼亚克，当选为卡尔莫市市长；7月31日，又以2,011票对1,100票，击败公司方面的候选人，当选为区议会参议员。矿主即以“缺勤”为由，解雇卡尔维尼亚克，当即引起矿工们的强烈反感，认为这是对工人政治权利的严重挑战。在工会号召下，几乎所有矿工都投入了罢工，并明确地提出，公司必须重新录用卡尔维尼亚克，在他复职之前，绝不上工。^①这一维护工人权利的政治性罢工，立即得到广泛响应，在其他行业和其他地区工人的支持下，很快成为全国性事件。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等国的工人，也纷纷支持卡尔莫矿工奋起捍卫普选权的正义行动。尽管政府派来2千人的军队，对付近3千名罢工者，但是，由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进行有理有力的斗争，坚持两个半月后，迫使矿主作出让步，恢复卡尔维尼亚克的工作，公司经理也被迫放弃了议员资格，经过选举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取代了他的职位。以卡尔莫矿工政治罢工胜利为前兆，迎来了1893年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大选中的空前胜利。

1893年，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而举行的总罢工，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工人，包括男性工人，由于选举权受到很大限制，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早在80年代中期，比利时工人就提出了改革现行选举法、扩大普选权的问题，并通过1890年1月和1892年5月两次有数以万计工人参加的总罢工，迫使议会作出关

^①据卡尔莫工会书记马里于斯·罗吉埃称：“在总数2,800个以上的矿工中，至多只有60~80人没有站在自己同伴的行列里，况且是因为大家不要他们参加。”见《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110页。

于修改选举法和选举制度的决定。但是，迟至1893年3月，议会才开始讨论选举制度，并于4月11日，否决关于实行普选权的提案。对此，工人强烈不满并宣布罢工。在群众强烈的要求下，特别是在以青年工人为主体的“青年近卫军”的推动下，工人党总委员会，于4月12日，号召实行总罢工。罢工几乎席卷全国。罢工者要求，凡年满21岁的所有男子，都有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绝不允许作任何让步。许多城市，尤其是矿区的工人，还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使比利时大有革命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一严峻的局面，议会也不得不作出让步。4月18日，议会正式通过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并不彻底，对工人也不够平等，但是，它毕竟给了年满25岁的男子以普选权，使选民人数增加9倍，从13.7万人增加到137万人，从而扩大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正是在此基础上，比利时工人党在1894年大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①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罢工运动又一度消沉的德国和英国，在国际成立后的7年中，其罢工斗争，无论从规模和内容看，都有新的进展，这是90年代前期罢工运动的又一特点。众所周知，由于处于“非常法”状态，工人组织被打入地下，工人的罢工权利全被剥夺。除了个别地区、个别行业进行局部罢工并遭到严厉镇压外，整个德国的罢工运动，处于低潮之中。到80年代末，才开始转向高潮。1890年废除“非常法”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90年代前期的德国罢工运动总的次数和人数并不多，就每次斗争而言，人数、规模却相当大，常有数以万计的工人投入斗争。它们往往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以自发罢工发端，很快就演变为整个行业乃至全国性的罢工。例如鲁尔两万名矿工，为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日，于1891年4月，自发地举行罢

^①见《比利时的总罢工（1893年4月）》，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1卷第263页。

工。德国党领导人曾试图予以劝阻，但工人们仍坚持斗争，不到10天，就波及整个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矿区，成为一次包括166个矿井的全面罢工。再如，1896年2月爆发的2万柏林服装工人罢工，它是由家庭工业和无组织的服装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而发起的，由它率先示范，很快在哈雷（萨利河）、德累斯顿、爱尔福特、布勒斯劳、科特布斯特等地得到热烈响应，成为一次全国性的罢工高潮。这次罢工，不仅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把无组织工人发动起来，使大批女工首次卷入罢工浪潮。^①这些事实，既显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潜力；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国党尤其是工会领导人对罢工斗争领导的软弱无力。英国工人的罢工运动素有传统。进入70年代之后，由于领导权掌握在推行改良主义路线的右翼工联领袖手中，使工人运动走偏方向，和法、美等国高潮迭起的罢工斗争相比，一度陷于消沉。进入80年代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新工联的崛起，特别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推动，情况已有改变。到90年代中期，英国的罢工运动，又以新的规模和面貌，再现于国际工人阶级之中。1890~1896年，全英共发生5,810起罢工，罢工参与者，高达246万人，平均每年35.1万人。1893年，是这一期间罢工斗争的最高点。全年罢工人数，高达63.4万人，仅密德兰矿区一次罢工，就有近30万人，当时，它被称为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②

当然，以上各项，仅就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方面而言，并有挂一漏万之嫌。至于其理论领域的成就，包括关于争取国际劳动立法任务的确定，“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形成，对无政府主义的新胜利，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揭露，对工会组织和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175、198~199页。

②《理论与历史》，第2卷上册第441~442页。

工会运动发展方向的探索，等等，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无论从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指导来说，90年代前期是国际工人阶级凯旅行进的时期，是初创奠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它既是新国际的良好开端，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正是以此为标志，国际步入了它的始初发展的黄金时期。

4. 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国际建立伊始，就面临无政府主义者的严峻挑战。为此，前4次大会，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以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干扰，最后将其从组织上排除。这在国际工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国际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并不彻底。组织上，只有那些公开的、赤裸裸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排除了，而对那些持有工会委托书的无政府主义者，却无能为力；思想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因此，国际对无政府主义的胜利，并不能巩固和持久，一遇适宜气候，又会故态复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国际，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占主导地位，但是，国际并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健康肌体。其间，既有公开自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不少怀有改良主义情绪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前者，以揭露后者的错误为己任，在清除右的改良主义情绪的过程中，使自己越走越远，陷入“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后者，则满足于在组织上将前者排除出国际，结果，在克服“左”的盲动错误的过程中，使原有的改良主义情绪不仅未能克服，而且日益滋长，有的人甚至走向右的极端而不能自省。这样两种对立的思潮、情绪，反映在国际前7年的反无政府主义斗争中，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反常。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从总体上错了，他们在宣扬其错误主张时，却从反面击中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

者中一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要害和弊端。^①这些正确的批评，在当时却被人们当作空话、大话而摒弃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当时方向是正确的，它们在揭露、否定无政府主义者幻想空论时，却流露出种种改良主义情绪，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无政府主义，一古脑儿泼出去。其结果，被否定的并非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而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一些改良主义的理论、主张，却被当作正统而予以肯定。在这样两个方面反常中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就为国际后来的内部论争直至公开分裂，埋下了种子。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

如同新国际一度容纳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改良主义情绪在国际内部也很有市场。还在1889年召开的国际成立大会上，即已见端倪。一些社会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可能派无限宽容，并主张同可能派大会无条件合并；一些名闻遐迩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也流露出改良主义的情绪和主张。奥地利党领导人阿德勒，在谈到劳动立法问题时就曾表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会“自行崩溃，而不需要人们所说的进行帮助”。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它在资本主义自行崩溃到来时已达到的文化教育发展程度。因此，提高无产阶级的物质文化水平，是党的首要任务。他主张争取劳动保护立法，并把它看作是“改良的社会卫生”。^②

^①1907年，列宁在评述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在国际斯图加特大会的表现时说：“在运动处于新的转变的时候，理论上的荒谬观，往往包含某种实际的真理。”（《列宁全集》，第13卷第175页）这一段话，同样适用于国际始初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

^②见《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记录》。

1891年，在布鲁塞尔大会上，比利时党领导人王德威尔得，在关于工人立法问题的报告中进而提出，“利用社会主义者进入立法机构的前提条件去夺取政权和议会”的主张。^①这些情绪和主张，未成为当时国际的主流，并曾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抵制。但是，这些问题，并未从思想理论方面得到清理。相反，在不断增长的议会斗争成就的冲击下，尤其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否定议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这些改良主义的情绪和主张，却日渐滋长，以至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也滋生了某种议会主义的幻想。他在伦敦大会上揭露无政府主义者反议会活动的发言中，一方面，强调议会活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德国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归之于议会斗争，并且号召“选得更多！次数愈多愈好！”^②马克思主义者的迷误，势必助长改良主义情绪的泛滥。同时，伦敦大会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斗争，也使一些本来就怀有改良主义情绪的社会主义者，更加走向另一极端。法国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托特利尔关于取消政治活动的发言中，就曾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仅仅归结为议会活动，政治活动就是“独一无二的议会行动”。^③这样一来，就把议会斗争这个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唯一形式。这种情绪和主张，并没有受到大会的批评，相反，饶勒斯和米勒兰一起提出，要把法国代表团分为两个对立的小组，而且将大多数法国代表，指责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样一种错误举动，除了王德威尔得、瓦扬据理反驳外，却得到大会多数代表支持，最后以15票（国）对5票（国），通过了米勒兰关于法国代表团分为两组即把社会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分开的决议。这

①见《国际布鲁塞尔大会记录》。

②《文献选编》，第3卷第101～102页。

③《国际伦敦大会记录》。

个决议的被通过表明，大会的多数代表，在所谓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实下，对改良主义的情绪和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而把与改良主义相左的社会主义者，视为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作法，为后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公开分裂，留下了祸根。

为什么对无政府主义斗争如此坚决而对改良主义又如此宽容呢？除了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弱点外，还和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特定历史条件有关。国际所处的时期，是革命的和平发展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主要任务；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进行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和争取必要的改良，成为这一时期斗争的主要形式。^①因此，不顾时代特点、不注意斗争发展条件的无政府主义，势必成为革命和平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和怀有改良主义情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改良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在开展合法斗争、议会活动和争取局部改良等问题上，有共同的语言。两者之间，即使有一些矛盾和分歧，也由于后者避免同前者正面冲突，因而在大敌当前消除主要危险的前提下，使改良主义者处处得到宽容，使改良主义情绪逐渐得以蔓延。再加上马克思主义者自身过分夸大改良的作用，过分强调议会斗争的成就，往往易于从坚持必要的改良滑向改良主义，由注意革命的和平发展而倾向于社会和阶级的和平，成为国际内部的一个潜在危险。恩格斯在苏黎世大会的闭幕词中，充分肯定大会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的重大意义的同时，又明确指出：“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实际上，他指出了国际所面临的改良主

^①《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2、583页。

义的潜在危险。但是，新国际的领导人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值得深思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半无政府主义者纽文胡斯等人，却极其鲜明地指出了国际内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这一潜在的危险倾向。譬如，在苏黎世大会讨论社会民主党人对战争的态度时，纽文胡斯针对大会所通过的倍倍尔决议草案，一针见血地触及了它的一些弊端。其一，他指出，倍倍尔在反战问题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只有抗议、强烈抗议。“抗议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句话，一句空话。我个人认为，用几分抗议书，去对付枪炮的进攻，是最典型的空话。”在他看来，这种停留于抗议的反战决议，对一个和平组织可能是个极好的决议，可对一个了解自己力量的工人政党却不然。^①实际上，他已触及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过于贫乏空洞的弊端。其二，他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党的领导人中所潜在的沙文主义的危险倾向。他认为，不仅要全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还要全力遏制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欲望。“这种欲望不存在吗？我没有忘记，在德国，有人赞美对‘世代仇敌’俄国进行战争，我也没有忘记倍倍尔只字不提资产阶级对‘世代仇敌’所犯的罪行。大家别以为发笑，如果把俄国说成是残暴和野蛮的堡垒，德国却似乎成了文化修养和温柔的摇篮。德国象俄国一样是暴君统治，可在德国却有人自以为还有些自由。”同时，纽文胡斯还指出：“如果倍倍尔把俄国视为残暴和文明之敌的堡垒，那么，法国也可以这样诅咒德国，因为法国是共和国。如果社会主义者总是如此责备其它国家，何时才有个完呢？”^②1914年8月，德国党和许多其他党的领导人，以对方国家侵略自己国家为借口，相继陷入社会沙文主义泥坑的悲剧，不幸在20年前，却为一个半无政府主义者所言中，其间，确实包含着辛酸而惨痛的教训。

^{①②}见《国际苏黎世大会记录》。

第三章

深入发展和内部论争时期

(1896~1914)

1896年伦敦大会以后，国际分别于1900年、1904年、1907年、1910年、1912年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召开过5次大会。同时，社会党国际局曾举行16次全体会议。深入发展而又论争激烈，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这既是前一时期国际内部意见分歧的历史延续，也是新形势下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代替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1898~1914年间，帝国主义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①世纪之交的经济政治发展，为国际的活动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向外侵略扩张，连绵不断的战争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反对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揭露和消除战争危险，提上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实践日程。同时，迫于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许多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作了某些让步，工人进一步获得或扩大了普选权，不少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进入各类立法机

^①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4页。

构，拥有越来越多的议席。如何看待政治斗争，特别是议会活动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一个更加普遍而尖锐的现实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国1905年革命，不仅打破了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的沉寂，也提供了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成功经验，使得一度冷却的总罢工问题，再次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从而引起了热烈的论争。

国际的论争，是从其主要成员党开始的。伦敦大会闭幕不久，德国党内发生“伯恩斯坦问题”，由此引起数度思想交锋；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则因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爆发论战，直接导致分裂。德、法两国工人运动的事态发展，又诱发了1900年巴黎大会的国际性论争。由此开始，几乎每次国际大会都是短兵相接，舌战唇枪，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这一时期的终结。卷入论争的人员之多，涉及方面之广，意见分歧之深，在国际史上是空前的。

同前一时期一样，这时的国际也面临着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但是，论争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他们，而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对立面并在国际及其成员党内享有盛誉的著名人物。在长达18年的内部论争中，机会主义者确曾喧嚣一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过迷惘和失误，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在某些方面曾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一切并未左右国际上升发展的势头，机会主义者也还没有形成足以改变国际方向的固定集团。相反，经过艰苦努力和激烈论争，国际在入阁、总罢工、反对军国主义、战争与革命、揭露殖民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方面，仍然坚持了正确的原则，通过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决议，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国际局、国际议会委员会的成立和国际章程的制订表明，国际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也为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联合和斗争，开拓了十分广泛的领域。正是在各次国际大会的推动和国际

局的具体组织下，这个时期的国际工人阶级在加强国际组织，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支援1905年俄国革命，开展广阔规模的罢工斗争，维护自身权益，争取经济、政治权利，宣传和 研究 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并以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胜利召开为标志，使国际进入它的鼎盛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国际，仍然是革命的国际，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在国际中并未占据统治地位。

一、“伯恩斯坦问题”的发端

1. 一次危险的“脱毛”^①

伯恩斯坦之所以在德国党内引起激烈的争论，最初起因于1896~1898年间他在《新时代》发表的一组文章。实际上，酝酿时间更长。正如伯恩斯坦自己所指出的，他的思想理论观点上的变化，绝不是突然发生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②

还在“非常法”实行不久的1879年，刚加入德国党才几年的伯恩斯坦，即在瑞士的苏黎世同赫希伯格、施拉姆一起，共同写作《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回顾》，并以3颗星花署名，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该文通过总结运动的历史经验，评

^①“脱毛”一词，原是指某些动物定期脱去旧羽毛代之以新生羽毛的过程。德国化学家李比希，首先把它用来比喻科学观点的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用这个词形容自己对自然科学的探索。90年代末，这个词在德国很流行，伯恩斯坦把自己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上的蜕化，也称之为“脱毛”。

^②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以下简称《争论》），第64页。

击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并公开主张，党不应是片面的工人政党，而应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党不应“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应放弃“不适当的过火的行为”，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为此，文章认为，不应把不能实现的最终目的放在首位，而应全力进行微小的改良，等等。对于这些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曾在致倍倍尔等的《通告信》中，进行过严厉批评。1880年12月，伯恩斯坦在倍倍尔的引见下，专程到伦敦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一番“忏悔性”的解释，才重新获得两位老人的谅解和信任。从1882年2月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到1890年“非常法”被废除，伯恩斯坦一直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指导和热情帮助，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坚持办报的正确立场，宣传党的原则和策略，积极投入国会党团内部右翼的斗争，为筹建新国际四出奔忙，还和考茨基一起，直接参与《爱尔福特纲领》的起草，度过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因此获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誉。但是，不久伯恩斯坦又发生了动摇和迷惘。

90年代的德国，正处于经济上急剧上升、政治上和平发展的时期。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和平景象，再加上因错误地估计统治阶级政策的变化和过分夸大议会成就而在工人政党内部滋长的改良主义情绪和思潮的影响，为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在各条战线攻击马克思主义，以动摇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舒尔茨—梅弗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后抛出《论社会和平》、《大生产—经济和社会的一项进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科学著作”。它们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财富的巨额增长为依据，千方百计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张抛弃被他们称之为“灾变论”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代之以抹煞阶级对立的“社会和平。”同时，它们利用工人政党和工人运

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将那些视公有化为最终目的社会主义者，称之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将那些把近期目标放在较远目标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认为对后者来讲，上述最终目标是“无关重要的”，“不是必需的”。^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中，正面回答来自资产阶级营垒的挑战，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当然责任。当时，由考茨基主持的《新时代》也曾约请伯恩斯坦通过评论上述“科学著作”，来表明立场和态度。可是，伯恩斯坦读过这些著作后，却无法抗拒舒尔茨—梅弗尼茨和沃尔夫等人的责难，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他在1890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1891年初《新时代》的一些文章中，尽管也批评过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些观点，同时又公开同意他们对马克思的某些指责，特别是同意他们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决不会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按照伯恩斯坦自己后来的表述，90年代初，他的思想理论观点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②这种变化尔后愈演愈烈，特别是90年代中期，德国出现了长期没有过的经济繁荣，似乎进一步证实资本主义不可能崩溃的情况下，伯恩斯坦更加急于想说服党改变政策，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结论，再加上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使伯恩斯坦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监督，终于开始了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从1896年10月开始到1898年6月止，伯恩斯坦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组文章。在第1篇题为《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文章中，他以时代变化为由，

①转引自《争论》，第92页。

②《争论》，第65页。

要求党“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并指出必须修改其对现存制度仍然采取的主要是批评的立场。他认为，“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的说法是“空想主义”。因为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有一些从经济上看条件已经成熟的企业部门就可转归社会所有，再加上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影响的增长，“本应在灾变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提到日程上来。从这一角度来看，谈论社会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

1898年1月，伯恩斯坦在《新时代》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又进而以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发展为依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时所根据的那些前提，现在已经大大改变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将不再会遇到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因此而出现经济上的和社会的“大灾变”。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得到实现”。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作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的扩展，地方自治机构的建立及其职能的扩大。“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伴随着这一发展，经济企业自然会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但是这种管理只能逐渐地进行。”据此，伯恩斯坦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

“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组织工作。”伯恩斯坦之所以提出最终目的和运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要否认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最终目的，也不是反对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这个根本主张，而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自然

生长出来，毋须社会革命。所以人们毋须过多地考虑革命，只要在日常问题的基础上，就可以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不必坚持以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中心的“崩溃论”，只要坚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渐进、和平、改良的策略，即可达到使资本主义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的。^①

实际上，上述各种主张并非是什么新的创造和发明，用伯恩斯坦自己的话来说，“大部分不过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东西”。普列汉诺夫也曾揭示这一点。他指出：“这里面没有一点东西，绝对没有一点东西，不是资产阶级营垒中我们的论敌已对我们说过多少次的。”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分析比较，伯恩斯坦在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论据，甚至表述方式和语言，都是来自舒尔茨—梅弗尼茨、沃尔夫等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②倍倍尔对普列汉诺夫这一分析，作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伯恩斯坦当成新的真理来向我们宣告的东西，是拾舒尔茨—梅弗尔茨等人的牙慧。”^③正因为如此，伯恩斯坦的文章一发表，首先得到资产阶级著作界的喝采和欢迎。沃尔夫写道：“对于他（指伯恩斯坦——引者注）的议论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能算高的。这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当头一棒，是对它的公开宣战。”^④同资产阶级学者热烈喝采的态度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对来自伯恩斯坦的挑战，表示了深沉的忧虑和强烈不满。还在伯恩斯坦发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不久，1898年2月15日，倍倍尔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就曾表示：“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即伯恩斯坦——引者注）把他亲自

^①上述引文详见《关于“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3期第93~105页。

^②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05~418页。

^③《争论》，第107页。

^④转引自《争论》，第93页。

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普列汉诺夫也指出：“假如伯恩斯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史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事态的发展，正如倍倍尔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斯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①这种冲突，首先在德国党的斯图加特大会展开。

2. 斯图加特遭遇战

德国党斯图加特大会于1898年10月3～8日举行。大会原定的议程，包括有执委会工作报告、议会活动的报告、邦议会选举、军国主义、结社权等多项。但是，在会前，许多党员已对伯恩斯坦强烈不满，反对他的观点，并要求大会讨论伯恩斯坦问题。开幕头一天，卢森堡还曾撰文不点名地公开批评伯恩斯坦。她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某些著名的同志的一些言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在某种情况下，只限于在报刊上进行讨论是不够的。”她认为，“对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党的执委会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将伯恩斯坦问题纳入大会议程。不过，在讨论工作报告和议会活动时，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特别是就关于日常政治斗争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开始，主要是施塔特哈根、倍倍尔、蔡特金、舍恩兰克、卢森堡等同彼乌斯、海涅、福尔马尔等，就选举议会活动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除了卢森堡、蔡特金直接涉及到伯恩斯坦外，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并未在会上形成高潮。10月4日，倍倍尔在会上，宣读了

^①见《争论》，第3、5～6、9页。

未出席大会的伯恩斯坦于9月28日写的《声明》。《声明》宣称：“我在《新时代》上所写的东西，是我的信念的表现，我不认为我有必要放弃这一信念的任何主要方面。”同时，伯恩斯坦强调：“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①宣读《声明》后，倍倍尔即指出：“我不赞成伯恩斯坦的观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同他有分歧。”他指出，《声明》“谈的不是策略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的基本观点问题。”倍倍尔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加以讨论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事先必须做好准备，并在报刊上突出地加以讨论。因此，他建议大会不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在此之前一直沉默的考茨基，这时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针对着伯恩斯坦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刚刚宣读过的《声明》，从理论上逐一分析了同伯恩斯坦的分歧，完全不赞同伯恩斯坦为其观点辩护所提出的各种论据，并且在最后强调：“伯恩斯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但是，我们不想按照他向我们建议的道路斗争，我们要按条件为我们规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们就会胜利。”^②考茨基的这个发言，在会上博得一片掌声。蔡特金认为，他以如此杰出的方式，既对伯恩斯坦问题，也对伯恩斯坦的追随者进行了争论。李卜克内西指出：“当考茨基在原则的基础上，并且从理论和科学的高度，对问题作了说明以后，整个代表大会对他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只有考茨基，才把关于策略的争论，引导到恰如其分的原则高度。”同时，李卜克内西还指出：“如果伯恩斯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

①见倍倍尔的发言，载《争论》，第38页。

②见《争论》，第44~50页。

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

在这场同伯恩施坦的争论中，考茨基的态度，为各方面所注目。这不仅是因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以前过从甚密，情谊甚笃，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而且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组文章，首先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公诸于世，而编辑部又未加任何评述。为此，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大会上还曾遭到部分代表的非议。毋庸置疑，1896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开始发表文章时，考茨基曾一度“表示深有同感”，并把它看成是适应条件变化，不断改变党的活动形式的一种探索，在这一方面，恩格斯和考茨基本人都曾作过尝试。可是，随着1897~1898年文章的连续发表，考茨基“就感到它们愈值得怀疑”。^①到1898年4月，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怀疑得很厉害，超过他的文章给人的预感。同时考茨基还担心，“如果他不改换他现在的环境，我担心我们将失去他。”^②经过与伯恩施坦的交谈和斯图加特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辩论，特别是伯恩施坦委托倍倍尔在会上宣读的《声明》，使考茨基的态度更加鲜明。大会之后不久，他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向伯恩施坦严肃地指出：“你这一段时间所进行的，已不再是反对口号的斗争，而是反对我们的基本原则的斗争”，“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用战胜马克思主义一语还嫌太轻。它在你那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是它向更高的形式继续发展，而是你向批评它的人投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我是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

①见《争论》，第50~53页。

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21页。

③见《争论》，第4页。

争。”在信的最后，考茨基郑重地宣布：“我们的共同战斗是完结了。我不能跟着你，我的信念和你的同样深，同样坚定。”^① 这些事实表明，当德国党内开始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时，考茨基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投入了同伯恩施坦的争论。^②

1898年的德国党斯图加特大会，并非专门讨论伯恩施坦问题，只是就一问题展开了一场遭遇战。为了深入开展争论，倍倍尔、考茨基曾先后向伯恩施坦建议，希望他将阐述过的立场，用书籍形式作一总括的说明，以便在报刊上展开辩论；伯恩施坦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已经发表的文章的基础上，于1899年1月，出版了题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伯恩施坦从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入手并指出，由于在经济上世界市场的扩大，通讯和交通的改进，信用制度和卡特尔的兴起，形成经济危机的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现代资本主义已具有抗衡普遍经济危机一

①《争论》，第78、77、83页。

②国外有的学者（如《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的作者布拉约维奇，从考茨基这封信却得出了考茨基“对修正主义妥协”的结论（见中文版第42页）。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这封信中，考茨基确曾讲过：“我不否认，我在一些问题上观点有改变，而且你对党的批评，我大半是衷心同意的。”但是，紧接着考茨基又强调：“这只限于批评党不站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评它的论据往往带有空想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痕迹，这种批评，是为了净化马克思主义，使它摆脱它们先驱者们的思路，而不是为了战胜马克思主义。”（见《争论》，第77页）很显然，在这里，考茨基所同意的并不是要“战胜”即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净化即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从中不可能得出同伯恩施坦妥协的结论。

类经济灾变的适应能力。由于在政治上民主制的发展和工会、合作社、立法活动的作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权将逐步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愈减少”。因此，资本主义作为“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只需要发展它”。^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在于：“促成和保证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制度。”据此，伯恩斯坦并不反对组织工人阶级和采取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他也主张加强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末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总之，在伯恩斯坦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面临“灾变”的资本主义，而是已有很大发展能力、很长寿命并已生长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党的任务不是革命变革而是和平改良，要用和平的、渐进的、改良的策略，来取代党的基于“灾变”的传统策略；党自身，也应由革命的党，而变成和平、改良的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伯恩斯坦再次重申他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②

伯恩斯坦这本书，首先在资产阶级营垒中获得轰动一时的成功。他们把这本书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胜利，认为这本

^①1908年，伯恩斯坦在《前提与任务》一书再版前言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开展我们的斗争实践。”转引自《关于“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②以上引文，见《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转引自《关于“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书不仅全面背离了《爱尔福特纲领》，而且也全面背离了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也直言不讳地宣称：“本书在资产阶级出版物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式各样的称赞象雪片一般地飞来。”^①党内一些同伯恩施坦持相同观点的人，对此书的出版，也是欢喜若狂。龚普洛维奇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部著作确实做了我希望它做的事情，这就是：一次解放的行动”。^②

同资产阶级学者和伯恩施坦追随者的态度相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前提和任务》一书及其代表的倾向，采取了严厉批评的立场。卢森堡在正式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指出，伯恩施坦的理论“总结起来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她认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样一个问题，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最终说来，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③继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之后，考茨基也于1899年在《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同伯恩施坦公开论战。其中，包括《伯恩施坦与历史唯物主义》（第27期）、《伯恩施坦与辩证法》（第28

①见《前提和任务》1920年版“跋”，载《前提和任务》第269页。

②转引自《争论》，第151页。

③《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第2页。该书的第1部分，作为对伯恩施坦在《新时代》发表的论文的评论，于1898年9月21~28日，在《莱比锡人民报》发表；第2部分，针对着《前提和任务》，发表于1899年4月4~8日的《莱比锡人民报》。1899年6月将上述两部分集印成书。

期)、《伯恩斯坦关于价值与阶级的理论》(第29期)。同年秋,他还出版了题为《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的著作,对伯恩斯坦的观点和倾向作全面的分析评论。蔡特金、梅林、帕尔乌斯等马克思主义者,也投入了同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的公开论战。几乎与此同时,1889年5、6月间,列宁在流放地获悉伯恩斯坦上述著作后,对它进行了驳斥。^①尔后,他在1901年写的批评俄国经济主义的著作《怎么办?》中,将这种“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视为国际性的思潮。^②

3. “伯恩斯坦问题”的提出

1899年10月9~17日召开的德国党汉诺威大会,首次将“伯恩斯坦问题”,即“关于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立场的攻击”问题,正式列入议程。这种情况的变化,固然同党的领导集团对“伯恩斯坦问题”严重性的认识,特别是同伯恩斯坦在敌对营垒和党内各种怀有机会主义观点的人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有关,也是当时德国党内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必然产物。

1899年发生的两件事,加快了同伯恩斯坦争论的进程。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巴伐利亚邦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顾党的汉堡大会关于选举中“不得同其他政党妥协和联合”的决议,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中央党,就邦议会选举达成一项协议;同年6月,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在资产阶级面临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背着组织加入内阁。这两件事情,特别是米勒兰入阁,在德国党内引起激烈争辩,党内各种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为福尔马尔和米勒兰申辩。是反对还是同意这样一种策略的改变,极其尖锐地摆在德国党及其领导人的面前。

^①见《列宁年谱》,第1卷第261~266页。

^②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18~319页。

身在病中的李卜克内西也难以自制，一再提醒党的领导机关，要谨防那种可能使党偏离阶级策略的危险，并应柏林同志的要求，出版了题为《不要任何妥协，不要选举协议》一书。这一事态表明，德国党领导人对“伯恩斯坦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有新的认识。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伯恩斯坦问题”成为党的汉诺威大会的中心议题。

倍倍尔就这一议题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他依据确凿的事实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逐一驳斥了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策略纲领的各个方面，全面地论述了反对伯恩斯坦的理由，并代表党的执委会提出关于反对伯恩斯坦攻击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的决议案。在报告中，倍倍尔指出，尽管伯恩斯坦的攻击涉及到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各个方面，并提出了种种论据，但是，“他的思想，他的批评，他建议采取的途径，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甚至机会主义者几十年来经常说的东西。他的著作，只不过是所有这些思想的杂烩。”同时，倍倍尔强调，虽然社会共和国不可能会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时突然来到，可是，伯恩斯坦“把目标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使党丧失牺牲的勇气、热情、献身精神，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质，并且千方百计制造人为的困难，破坏人们对胜利可能性的信念，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策略。”^①这个报告，被列宁称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②它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热烈赞同。大卫在补充报告中，沃尔特曼、奥艾尔、福尔马尔等在发言中，也想通过美化伯恩斯坦来抵销报告的影响，抨击坚持同伯恩斯坦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李卜克内西、考茨基、卢森堡、蔡特金等人的努力，大会最后

①见《争论》，第184、228~289页。

②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

以216票对21票（1票弃权），通过了倍倍尔《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决议。“决议”针对着伯恩斯坦借口形势变化否定党的基本原则的企图指出：“资产阶级社会迄今的发展，没有提供理由，使党放弃或改变它对这一发展的基本观点。”“决议”重申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依靠政权，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而为一切人的最大限度的幸福奠定基础。“决议”并不否认运用一切符合党的基本观点的、使它有希望获得成就的手段。其中，包括根据具体情况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但是，“党在其活动中，处处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并把它获得的每一项成就，只看作是使它更加接近最终目的的一步。”“决议”在阐述党关于建立合作社、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加强各国人民尤其是各国工人阶级的友谊和团结的看法后，强调指出：“党既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策略，也没有理由改变它的名称，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党坚决拒绝旨在掩饰或者改变它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任何尝试。”^①

本来，德国党的领导人希望通过汉诺威大会，将“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告一段落，以便结束怀疑和混乱的时代，开创一个团结一致地对进逼敌人展开确有把握的斗争的新纪元。事实也确实使人们一度充满希望。“决议”被通过的情况表明，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伯恩斯坦的拥护者也赞成决议。伯恩斯坦虽然未曾出席大会，却在委托奥艾尔宣读的声明中表示，在作必要保留的情况下，可以赞成大会决议。事态发展是如此顺利，以致党的主席辛格尔在闭幕词中宣称，尽管讨论非常激烈，党员之间存在

^①《争论》，第281~282页。

着个人争执，“党对基本原则和策略的看法，仍旧是一致的，并且今后在行动上，也会充分协调一致。”^①实际上，远非如此。

大会闭幕不久，大卫在1899第11期《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题为《为什么‘伯恩斯坦分子’能够投票赞成倍倍尔决议》的文章，他以“决议”中有关于“党不拒绝根据具体情况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和关于合作社应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提法为由，认为“决议”包含了很大一部分“实践的伯恩斯坦理论”，对“机会主义的实践”作了让步。^②11月~12月，《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又以《汉诺威大会的成果》为题，在国内外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中；组织了一次意见调查。在17名被调查者中，除了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考茨基、辛格尔和少数国外社会主义者坚持汉诺威决议拒不回答外，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伯恩斯坦的追随者。通过这次调查，他们认为，“决议”承认了伯恩斯坦所要求的对目前实际工作的较高评价，强调“机会主义者”同“激进派”之间的对立，是“性格、不同生活经验和个人见解的对立”，宣称大会埋葬了党长期坚持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论”。^③这些事实表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还远未结束。

二、入阁论争

1. 米勒兰入阁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米勒兰并不象倍倍尔、饶勒斯那样赫赫有名。在法国，他却颇富盛誉。从1882年在巴黎当律师起，他就由于常为罢工者和社会主义者辩护，而为人们所注目。尤其是1886年参加由德卡兹维尔罢工引起的辩论，更使他名声大

①《争论》，第287、283页。

②③见《争论》，第288~289、300~320页。

振，被视为社会主义者的盟友，并从1889年起，数度当选为会议员。1892年，米勒兰列席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由此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运动。由于米勒兰善于词令，又有议会活动经验，并积极地向社会主义方面靠拢，很快就成为与饶勒斯、盖得等齐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和社会主义议会党团的发言人。

1896年5月，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掌握了马赛、卢昂、利尔、土伦、第戎等地的市政府。为庆祝这一胜利，除阿列曼派外的其他各派社会主义者1千多人，于5月30日，在圣芒德举行盛大宴会。各社会主义政党、团体的领导人饶勒斯、盖得、瓦扬等均出席。作为宴会主持者的米勒兰首先发表演说。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集体主义，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人为的，“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泌物”。为达到集体主义的目的，即“逐步用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决不能靠少数人的起义，只要依靠全体人民的选举，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人民解放出来。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包括3个要点的社会主义纲领，即“国家进行干预，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和交换手段，按其成熟到可为社会所占有的程度，逐步从资本主义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权力；劳动者的国际协调。”这个纲领，被称之为“改良社会主义纲领”（“圣芒德纲领”）。其核心，是通过议会选举，掌握国家权力，以逐步使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本来，盖得等工人党领导人，并不同意这个纲领所包含的原则，但是，由于为选举胜利冲昏头脑，担心如表示不同意见，会影响选举中社会主义者的统一行动，因而容忍了这个纲领。盖得本人，甚至在圣芒德宴会上声称：“为了使政权必然落到工人政党手里，选票可以成为合法的工₁具。”正是在他们的容忍和饶勒斯等人的支持下，这个改良主义纲领，几

①见《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第9~19页。

乎为各派社会主义者所接受，成为他们参加议会选举活动的指针，并为后来米勒兰入阁提供了理论依据。

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正处于社会矛盾激化的政治动乱时期。德雷福斯案件及其所引起的政治危机，就是这一时期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法国军队中反动的君主派和教权派，为了在群众中煽起反德、反犹太人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借1894年发生的军事泄密事件，唆使参谋总部情报处长伪造文件，逮捕犹太族青年军官德雷福斯，并以间谍罪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军方企图通过审理此案，利用人民对掌握政权的共和派的不满，动摇共和体制并取而代之。后经查明，德雷福斯案件纯属诬告。1898年1月，著名作家左拉发表《我控诉》一文，公开要求为德雷福斯恢复名誉。以此为标志，整个法国掀起了一股要求重新审查德雷福斯案件、维护民主共和体制的浪潮。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支持下，斗争很快超出它的最初范围，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军国主义、教权主义和君主制的群众运动。以参谋总部为代表的反动军方，拒绝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并制造一系列挑衅活动；民族主义、教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组织，也纷纷上街示威，矛盾不断激化，随时都有爆发国内战争的危险。为摆脱危机，法国内阁不断换马，仍于事无补。在这种情势下，统治集团决定改变政策，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求援，以度过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1899年6月，出面组阁的瓦尔德克-卢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德雷福斯事件一开始，米勒兰曾以不愿追随资产阶级军官和作家为借口，一度置身事外。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各派社会主义者纷纷表示支持重审此案，他才改变立场，公开地站在反对军方的共和派一边，并利用政府竭力谋求社会主义者支持这一弱点，四出活动，以期实现他所提出的改良主义的“圣芒

德纲领”。还在1899年6月13日，杜毕伊内阁垮台的第2天，米勒兰就在自己主编的《明灯报》上撰文声称：“无论谁任内阁总理，他都可以得到共和派的一致支持”，从而向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传递了打算入阁的信息。6月16日，米勒兰以老同学身分，往访正在组阁的彭加勒，建议他面向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共和派力量，并提名独立社会党人维维安尼入阁当部长，结果被拒绝，彭加勒组阁也以失败告终。继彭加勒之后，受命组阁的是以干练、精明著称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瓦尔德克—卢梭。他一反彭加勒的做法，主动要求米勒兰参与并商谈组阁问题。6月21日，社会主义议会党团开会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米勒兰在会上发言声称，他接到了参加组阁的邀请。但是，就此进行的谈判，因无结果而中断，尔后，再无人提起。他并担保，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以社会主义党团的名义参与谈判，没有把党团牵扯进去，仅仅是以个人名义讲话和行动。瓦扬当即发言指出，如果谈判当时成功了，或者今后重开谈判并达成协议，就要求党团发表声明：谈判及米勒兰同意入阁，正如他刚才承认的那样，仅涉及他个人，决不能把党团牵扯进去。党永远不会以任何借口变成政府和内阁的党。米勒兰当即以一个肯定的手势表示同意。^①本来，与会者都以为此事已经了结。可是，一散会，米勒兰即前去会见瓦尔德克—卢梭，最后确定入阁，以“保卫共和国”为旗号的新内阁正式产生，从而开创了一个社会党人未经党组织同意擅自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先例。

6月22日，当瓦扬得悉米勒兰已经入阁而且同镇压巴黎公社

^①据福尔马尔和饶勒斯证实，米勒兰曾就入阁一事，正式征询党团意见，得到包括瓦扬在内的党团成员的同意和支持，见《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第228~241页。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的刽子手加利费（财政部长）一起共事，立即给米勒兰去信指出，入阁一事，把昨天他在党团会议上所讲的话一笔勾销了；他参加有加利费的内阁，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同时，瓦扬认为，加利费的入阁，是对工人阶级的挑衅和挑战，必须起来应战。瓦扬强调，“这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无耻，多么卑鄙，我简直无法相信。”瓦扬要求米勒兰澄清事实真相。第2天（6月23日），米勒兰复信瓦扬声称，他入阁是履行自己的义务，未来将会作出判断。鉴于米勒兰的态度和党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瓦扬派和盖得派商议后，决定发表抗议书，正式退出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成立一个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议会党团。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揭露米勒兰入阁事件，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盖得派），于6月25日，委托盖得、拉法格、福尔坦，泽瓦埃斯起草《致法国工人宣言》，经与革命社会党（瓦扬派）和革命共和同盟商议后，于7月14日发表《联合宣言》。《宣言》指出，社会党人的入阁，是社会党内一些人企图以改良主义政策代替革命政策这一矛盾的总暴露，“必须同实际妥协和背离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彻底决裂。”《宣言》强调，“社会党，作为一个阶级和政党，不可能是一个内阁党，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内阁党，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宣言》认为，社会党不应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而应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并使之变成谋求解放和进行社会革命的工具。①

①同上书第242~244页。8月，法国工人党在埃佩尔内召开的代表大会专门通过决议。它一方面指出，夺取国家政权，就是要从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剥夺只允许占据选举产生的职位。至于是否可以占据其他职位，要在不脱离阶级斗争阵地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研究。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一个折衷妥协的产物，它反映了法国工人党内部对米勒兰入阁事件看法的分歧。

对于米勒兰入阁，特别是同加利费一起参加内阁，饶勒斯开始并不赞成，他曾对米勒兰进行劝阻。然而，经过一番劝说工作之后，饶勒斯却在“为拯救共和国，米勒兰必须入阁”说法的煽动下，改变看法，作出支持入阁的决定。6月24日，饶勒斯在《小共和国报》上撰文声称：“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如果一个部长，为了拯救共和国敢于打击带军官肩章的叛乱分子，那么，他使用什么手段，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饶勒斯而且公开声明：“我支持米勒兰参加这个战斗内阁。”^①可能派领导人布鲁斯，也和米勒兰、饶勒斯持同一立场。他在7月24日写的一篇《走向夺取公共权力》的文章中声称：“我们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渗透到公共政权中去的策略。我们必须实行这种策略并承担它的全部后果。如果期待纯粹的大街上运动的那种革命，我们可能永远也等待不到。”^②同饶勒斯、可能派站在一起的，还有白里安、维维安尼等人。以他们为核心，形成“入阁派”；与之相对立的是，盖得、瓦扬等人结成的“反入阁派”。

这样一来，两个派别，两种立场，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矛盾日剧，隔阂日深，使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再度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为了消除这种混乱状态和分裂危险，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曾提出各种建议，希望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各派的统一，以为集中讨论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创造必要的条件。据此，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于7月17日，向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发出呼吁信，要求进行有效的干预，以防止多年来一直延缓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分裂重新出现，并把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提

^①见《第三共和国史》，转引自《围绕米勒兰事件的一场斗争》，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期第116~117页。

^②见《可能派》，转引自同上第120页。

交各派社会主义者联合代表大会审议。各派经过协商，最后都表示支持召开联合大会的倡议。

1899年12月3~8日，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第1次全体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1,400个团体的800多名代表与会。关于阶级斗争和夺取社会权力问题，是大会的中心议题。这是二十年来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团体成员的首次聚会，也是围绕米勒兰入阁事件在各派社会主义团体间的第1次激烈交锋。

会上，饶勒斯和盖得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饶勒斯从谈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入手，竭力为米勒兰辩护。他认为，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不违反阶级斗争基本原则，而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据此，他主张，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入阁来逐步地夺取政权^①。饶勒斯的这个发言，得到维维安尼、白里安等人的支持。盖得在发言中坚决反对米勒兰入阁，他指出：“乍看几个月来的试验而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当一个社会党人陷入资产阶级多数内阁成员的重围，无疑是绝对无能为力的。”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指出，如果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英国的米勒兰、意大利的米勒兰、德国的米勒兰与法国的米勒兰一起，为了资本主义掠夺而唆使无产阶级互相为敌。请问，同志们，那时还有什么工人的国际团结呢！一旦米勒兰事件由个别现象发展为普遍现象，我们将只能放弃任何国际主义而变成民族主义者，这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同意的。”^②盖得这一席话，博得十分热烈的掌声。经过4天激烈的辩论，大会最后以818票对634票，^③通过盖得提出的并得到瓦扬派、阿列曼派支持的决议（多数派决议）。“决议”宣称：“阶级斗争不允许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接着

^①参见《饶勒斯传》，第387~408页。

^②见《米勒兰事件》，第8~13页。

^③按代表证书数，而不是按人数计。

大会又以1,140票对240票，通过德莱萨尔提出的妥协性提案。它一方面指出，党要集中全部力量去夺取市镇、各省和全国选举产生的职位，以最后通过革命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剥夺；另一方面又承认，也可能出现党必须研究一个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问题的特殊情况。^①这个决议，实际上重申了法国工人党埃佩尔内决议。它是对米勒兰的改良社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并削弱了盖得决议的影响。此外，饶勒斯决议案和瓦扬决议案均为大会否决。

米勒兰入阁后，作为主管劳工问题的工商部长，确曾在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时间、成立工人团体、吸收工人代表参加劳动委员会等方面，采取过一些措施，颁布过有关法令。为此，许多工人团体对他有过好感，并抱有很大希望。但是，这种改良，毕竟是有限的。作为资产阶级政府一员的米勒兰，必然要受资产阶级的监督和控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②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肢解和窒息工人的反抗。一旦工人行动直接危及其根本利益，就会露出它的真面目。1900年2月和7月，包括米勒兰在内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对马提尼克和夏龙罢工工人的血腥镇压（12人被杀、数十人被伤）就是证明。广大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正是从血的事实中，逐步认清了米勒兰入阁活动的实质，并通过各种集会和一系列决议谴责米勒兰入阁。

在工人们逐步认清米勒兰入阁实质的情况下，法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第2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8～30日，在巴黎举行。正当大会审议社会主义议员在夏龙事件质询中的投票情况时，工人党代表安德里厄被叫去询问有关情况，在后台即被饶勒斯派一

^① 见《米勒兰事件》，第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23～224页。

名代表殴打致伤，当即引起骚动。工人党的代表，强烈要求把进行暗算的凶手赶出会场。当这一要求遭到否决，工人党全体代表立即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并另外举行大会建立自己的临时总委员会，以便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实行联合和统一。由此而开始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1901年5月，在里昂举行的各社会主义组织第3次全体大会上，围绕米勒兰入阁问题在饶勒斯派与瓦扬派、阿列曼派之间又爆发争论。由于饶勒斯派凭借多数否决拉波波特关于米勒兰不再是社会党人的决议，瓦扬派、阿列曼派退出大会，经过同工人党等反入阁派团体的筹备，于1902年9月，在科芒特里大会上，正式宣告组成法兰西社会党（革命社会主义统一体）；饶勒斯派等几个入阁派团体，已于1902年3月，正式组成法国社会党。由米勒兰入阁所诱发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局面正式确立。

2. 入阁论争国际化

米勒兰入阁消息刚刚传到德国，倍倍尔即于1899年7月1日，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我认为米勒兰入阁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米勒兰将为政府的整个暧昧态度和愚蠢行为承担责任。”^①李卜克内西在给阿德勒的信中，也表述了这一思想。^②8月10日，他在给法国工人党埃佩尔内大会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者要是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倒向敌人方面，就是使自己屈从于敌人。至少，一个成了资产阶级政府成员的社会主义者，就同我们战斗的社会主义者分离了。”^③当然，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米勒兰入阁也得到了支持和赞扬。比利时的安塞尔得知此事后，

①转引自《围绕米勒兰事件的一场斗争》。

②见《米勒兰事件》，第6页。

③见《不要任何妥协》，第73页。

立即寄给米勒兰一封信，祝贺他“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了“部长的战斗岗位”。丹麦的迈耶尔等人则认为，米勒兰入阁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社会主义者应该“通过一切最微小的缺口，渗透到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去，以便在那里进行爆破，摧毁旧的法律和机构。”^①1899年12月，饶勒斯和惹罗一里夏尔，在《小共和国报》上，曾就“社会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参加政府问题”，作过一次国际性征询活动。11个国家29名社会主义者作了回答。其中，有12人赞成米勒兰入阁，包括伯恩施坦、福尔马尔、万一科尔、哈弟、安塞尔、汤姆·曼等人；有17人反对米勒兰入阁，其中，包括李卜克内西、辛格尔、巴克斯、伊格列西亚斯、拉布里奥拉等人。在上述17人中，费里等6人无条件地反对入阁。倍倍尔、卢森堡、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特鲁尔斯特拉等11人，反对米勒兰入阁，但不排除非常例外的情况下可以入阁。考茨基也在其中。但是，他认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原则上是否定的，除非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并且为了特定的目的。^②这次国际性征询活动，不仅展示了国际在米勒兰入阁问题上的政治思想分野，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关于入阁问题的国际论争。1900年，国际巴黎大会则将其推向高峰。

巴黎大会原定讨论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是布鲁塞尔预备会议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建议确定的。其目的，是想迫使那些鼓吹“运动就是一切，而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批判家们”，说出自己的全部想法，从而揭示它的真正内容。^③这次会议结束不久，法国发生米勒兰事件以及由此引起法国社会主义运

^①见《小共和国报》关于入阁问题的国际征询，载《米勒兰事件》，第28、32页。

^②见《米勒兰事件》，第23～24页。

^③见《米勒兰事件》，第215～216页。

动的分裂，使得这项议程的讨论，变得尖锐而复杂。它不仅成为同伯恩斯坦等“批判家们”论争的理论问题，也是各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在当前形势下应实行什么策略的具体实践问题。

巴黎国际大会共开了5天，讨论这项议题，就用去了2天时间。从议题专门委员会开始，直到大会发言和表决，始终贯串着激烈的冲突，以至有的代表的发言，经常被赞成或反对的叫喊声、喝彩声、抗议声所打断。尽管大会的主持者和国际其他领袖人物极力想回避米勒兰入阁事件这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企图以一般原则的探讨，来掩盖在具体问题上的对立。实际上，上述议题已变成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论争，形成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反入阁的态度，即从原则上反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盖得认为，应以阶级斗争的名义，禁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任何联盟，即使在特殊情况下，阶级斗争也不会采取阶级的合作，除非这种特殊情况会带来致命的危险。^①瓦扬则直率地宣布：

“任何协议，任何联盟，任何社会党人参加政府，都要受到谴责。”（63）与之相对立的，是支持入阁的态度，即从原则上肯定米勒兰入阁。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安塞尔，在会上公开声言，他是首先赞成米勒兰进入内阁的人之一，因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这样做会使他的阶级找到一种新的行动办法。（63）饶勒斯以他特有的演说才能和对问题的深入论证，竭力为米勒兰入阁开脱，而且走得更远。他认为，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这将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目前，“共和国所带来的自由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成熟。”一旦条件成熟，“问题也可能在比利时、瑞士和英国出现。”（55~57）上述两种对立的态度，实际上仍然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两种对立观点的延续。为

^①见《米勒兰事件》，第60、61页。以下讨论情况和决议均载此书，只注页码，不再一一标明。

了缓解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以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一些著名人物出面，表明了力图综合、调和、缓解入阁派和反入阁派的第3种态度。其中以议题专门委员会多数派决议报告人王德威尔得的发言最为典型。首先，他批评米勒兰的入阁行为“害处远远大于好处”。他说：“米勒兰和他的朋友们以个人名义擅自接受这样的任命是错误的。他们坚持违背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指盖得派和瓦扬派——引者）的意志，就犯了更大的错误。”这一席话，激起坐在大厅一侧的法国工人党代表的掌声和欢呼声。王德威尔得马上指出，“我请法国工人党党员不要对我这样鼓掌，因为一会儿他们中间就会有人起来批评我们。”果然，当他说到“入阁问题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应该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由。米勒兰参加内阁，只是在无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偶然事件和插曲，对它要宽容和谅解。（45~47）这时，坐在大厅另一侧的独立社会党人又鼓起掌来，工人党代表则高声喊叫以表示抗议。

在各方面充分表述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两个决议案。一个是以盖得、费里联合提出的决议案，即委员会中少数派决议案。它以法国工人党伊夫里大会决议为基础，明确地指出：“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始终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61）一个是由考茨基提出、经普列汉诺夫补充的决议案，即委员会中多数派决议案。它以考茨基对《小共和国报》就米勒兰事件的国际征询答问为基础。一方面，它指出，“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强调“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同时，它还指出，如果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不服从自己的党，或只是部分地代表自己的党，那么，他入阁势必“在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里，造成混乱和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是说，不是巩固党，而是削弱党，不是

促进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而是阻止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这些论述，得到盖得等人的赞许，认为它实际上从理论上谴责了米勒兰的入阁行为，“已经包含着初步的必要的纠正。”另一方面，考茨基决议并不是从原则上反对入阁。该决议指出：“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44~45）如果党的多数赞成，入阁的社会党人又能成为本党的全权代表，这种入阁才有可能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的后果。但是，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这个内阁在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偏私，社会党人就应该退出内阁。①盖得等人认为，“决议”的这些论述，实际上肯定了米勒兰的入阁行为，是对米勒兰背叛的奖赏；瓦扬则指出，考茨基案是向他曾与之斗争的伯恩施坦投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个决议案的拥护者的观点是如此对立，它们之间的争论是这样的激烈，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问题上，两者又是接近的，几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盖得—费里决议案一开始就强调，必须把夺取社会权力，理解为对资本

①决议案的这一部分，最初是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并无“党组织认为”字样，目的是想以间接办法向米勒兰暗示，在资产阶级屠杀镇压罢工工人的情况下，应放弃部长职位，退出内阁。这个补充为委员会的多数接受。但是，饶勒斯不满，提出应由党来判断内阁是否偏私，因此加上了“只要党组织一旦认为”等字样，从而就改变了原意，把它局限于存在统一的党组织的国家，而不存在统一党组织的那些国家（如法国），社会党人可以留在已明显表现出资产阶级偏私的内阁之中，进一步为米勒兰在资产阶级内阁中的活动作辩护。为此普列汉诺夫对考茨基决议案投了反对票以示抗议。参见《米勒兰事件》，第221~225页。

家阶级实行政治上的剥夺，不管这种剥夺是和平的方式，还是暴力的方式。紧接着它又指出：“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61）这个表述，实际上是对以暴力方式从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提法的否定。在这一方面，考茨基决议案走得更远。它一开始就提出：“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袭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在体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复兴以及逐步夺取市政机构和立法会议的结果。”（着重号系引者所加）（44）对此，只有普列汉诺夫个别地向考茨基提起过，①包括盖得、瓦扬等人在委员会和大会发言中均未触及。实际上，完全为全体代表所默许。这些事实表明，主张用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国家权力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国际的一种正统思想。

大会经过表决（每国两票），最后以29票对9票，否决了盖得一费里决议案，通过了考茨基决议案。其中，全票同意考茨基案的有：德、英、奥、比、捷、丹、西、荷、葡、阿根廷、瑞典、瑞士等国；全票支持盖得一费里案的有：保、爱尔兰两国，美、法、意、波、俄各有一票分别支持两个决议案，匈牙利、挪威弃权。

考茨基决议案具有模棱两可、调和折衷的特点。当时，它在会上就已为对立双方所公认。费里指出，它向人们“提出的是一

①巴黎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在《谈谈最近的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一文中曾谈及这个问题。他指出：正当伯恩斯坦以批判者身份否认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并将其称为“布朗基主义”时，考茨基决议这种只攻击马克思主义，而对伯恩斯坦批判者过于温和的策略是不适当的，至少是不必要的。见《米勒兰事件》，第218～219页。

些橡胶性的规定”。(51)①饶勒斯认为，这个决议“表达了一种均势，一种不很肯定、但现在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按照王德威尔得的说法，“既不应被看作是对法国社会党人的行为的指责，也不应被看作是对它的默许。”(45)对此，考茨基认为，他对《小共和国报》国际征询的回答和巴黎大会决议“是含糊的、橡胶性的”。但是，“把我的决议说成是对米勒兰担任部长的批准，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它的意思不是这样，在忠实地解释时也不能把它理解成这样。它仅仅说明，米勒兰加入内阁，不是从根本上应加以谴责的行为，而必须根据事实来加以审查。”②那么，如何估价考茨基决议的这种橡胶式的弹性，能否从中得出它已弹向机会主义一边，甚至包庇机会主义为右派作掩护的结论呢？

从当时和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看，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巴黎大会不久，卢森堡即在《新时代》撰文评述会议情况。她一方面指出，考茨基决议“只作了一般的理论回答，没有对米勒兰事件明确表示态度”；另一方面，她又强调，“代表大会的多数在通过考茨基决议时，即使没有点出米勒兰的名字，仍是用这个决议来表明，他们认为米勒兰入阁是削弱法国无产阶级和阻碍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③后来，列宁写道：“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

①“橡胶”一词，在德文中同“考茨基”一词（Kautschuk—Kautsky）谐音，费里用它来形容考茨基决议暧昧、调和而富于弹性，考茨基—橡胶性决议由此得名。过去将其译为“橡皮”，应译为“橡胶”更接近原意。

②《米勒兰事件》，第73、75页。

③《米勒兰事件》，第167、175页。

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斯坦）之前，就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动摇。”（重点是引者所加）^①很显然，在米勒兰入阁问题上，考茨基确曾动摇过，但是他所采取的并不是饶勒斯、奥艾尔等人所采取的支持、纵容、包庇的立场，而是持谴责、反对的态度。只不过反对不那么坚决、谴责不那么明朗罢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同当时国际主要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有关。巴黎大会之前，在德、法两党内部，发生了伯恩斯坦问题和米勒兰事件的争论，甚至由此而引起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在大会开幕式上，各主要国家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在致词中，并没有把它们看成是原则性的根本对立，而只是策略或细节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国际的任务，不是要否定这一派，来肯定那一派，而是要以宽容、谅解、调和的态度，以求得各党的团结和统一。大会执行主席王德威尔得在开始讨论“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议题时，就曾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国际代表大会不是进行谴责和宣布革出教门的教令的法庭。相反，我们的作用，就是要宽容和谅解。”他主张，“大会应该在原则问题上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涉及到策略问题，我们应该给与各民族完全的自由。”（46）在大会的多数代表看来，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大会如直接干预，势必加深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也有违各国党的内部纠纷应自行解决、大会不应作出国际裁决的传统。所以，无论是许多代表的发言，还是考茨基决议，都极力回避米勒兰入阁这个纯属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争执问题。考茨基后来曾就此作过以下解释：“代表大会不想也不能走得这么远。如果它由于处理这一问题而被迫干涉法国的国务，那么它这样做也只是出于和解的意图，出于促成统一的意图。”他希望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能够

^①《列宁全集》，第25卷第463页。

成为敌对的兄弟借以彼此接近以便就分歧点达成协议的黄金桥梁，而不是这一个兄弟可以拿来打倒另一个兄弟的武器。这次表决说明，这也是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的意图。”^①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支配下，巴黎大会通过了一个只作原则议论却回避具体分歧，对应该回答的问题含糊其词，躲躲闪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橡胶决议，从而为后来人们从左和右的方面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提供了可能。

3. 反对修正主义的德累斯顿决议

1901年2月，伯恩施坦结束长达20年的国外流亡生活回到德国。倍倍尔、考茨基等人，由于器重他的才能，珍惜他过去的功绩，对其仍然抱有幻想，希望环境的改变能促使伯恩施坦改变观点，共同工作。可是，伯恩施坦回来不久，即于5月17日，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发表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演讲，公开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认为社会主义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包含着—部分空想主义，主张用“批判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次演讲，在党内再次引起强烈不满，也进一步打消了倍倍尔、考茨基等人对他的幻想。倍倍尔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下次党代表大会上，无论如何必须就伯恩施坦事件进行辩论。他给党造成的损害，远远抵销了他过去所有的功绩，这一点一定要对他彻底讲清楚。我下次批评他的讲话，会是他从来没有受到过的严厉斥责。”^②柏林第4、6选区和巴登第2帝国议会选区的党员以及图林根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分别提出提案，毫不含糊地谴责伯恩施坦不顾汉诺威决议继续在党内制造混乱与不和的企图，要求应屈党代会，对伯

^①见《米勒兰事件》，第81页。

^②见《争论》，第384页。

恩施坦问题作出最后决定，并建议拒绝伯恩施坦的政策。①根据广大党员的要求，1901年9月22~28日召开的德国党卢卑克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再度激烈辩论，最后，大会以203票对31票通过倍倍尔提出的、首次点名直接谴责伯恩施坦的决议。②以此为标志，德国党内关于伯恩施坦的理论策略原则的争论告一段落，中间经过1902年9月召开的德国党慕尼黑大会的较量，到1903年德国党德累斯顿大会，重新把“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推向高峰。

同历次大会的争论不同，1903年德累斯顿大会已越出一般的理论策略原则的分歧，开始触及斗争的实践任务，由此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引发一场激烈冲突。

1903年6月16日，帝国国会选举结果公布，德国党空前胜利，共获3,010,771张选票、81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2大党，并控制了几个大工业城市。这一事态发展，引起不同的反响。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题为《从国会选举的结果中得出什么结论》一文，公开要求党，作为第2大党团，参加帝国国会主席团，并为争得副议长席位而努力，即使必须放弃反君主政体的主张，按惯例承担朝见皇帝的义务，也在所不惜。福尔马尔、海涅等人支持这一主张，并要求党在国会内取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放弃革命纲领，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这种主张，不仅遭到许多党组织和社会主义报刊的强烈谴责，也引起了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倍倍尔的强烈不满。在他看来，选举中的空前胜利，本应促使全党乘胜前进，转入攻势，更敏锐地抓住时机，凭借更大的力量扩大目前已有的成果，以推翻君主政体，夺取政权。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时刻，伯恩施坦等人却要党放弃反

①《争论》，第416~417页。

②《争论》，第419页。

君主政体的一贯立场，拜倒在德国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威廉二世的膝下。这无疑是一种叛卖。因此，倍倍尔认为，决不能继续同伯恩施坦等人保持“内部和平”，“要我帮忙维持目前现状，我宁可退休还乡。”^①在回顾自己对党内斗争的认识过程后，倍倍尔指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现在，我们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必须把帐算清，我们互相之间，必须尽可能彻底地开诚布公。”倍倍尔甚至援引别人的话责备伯恩施坦：“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他（指伯恩施坦——引者注）就必须退党！”^②考茨基虽然对内部和平仍抱有幻想，但对伯恩施坦的认识，也有新的飞跃。还在伯恩施坦提出去朝见皇帝以争到副议长职位的要求前，考茨基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就曾断定：“现在情况不同了。伯恩施坦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他是一个“比公开敌人更不理解马克思而且更加敌视马克思（这种情况是叛徒的特性）的人”。^③

德累斯顿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特别是当时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即国会选举、担任国会副议长、修正主义倾向问题。围绕这个中心，一开始就在两个报告人（倍倍尔和福尔马尔）之间进行交锋。倍倍尔指出，在德国面临经济动荡和社会动荡和德皇随时准备动用军队镇压工人运动的严峻形势下，幻想依靠选举的胜利和议席的增加，来推行改良主义，是再没有比这更愚蠢、更荒谬的事情。他认为，企图把法国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策略搬到德国来，这是重大的错误。这样只能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使它变得同现在不一样。^④他指出：“倘若我一息尚存，还能写作和演说的话，就一定会一如既往。我愿作这个资产阶级

①见《争论》，第54页。

②见《争论》，第559页。

③见《争论》，第541页。

④见《争论》，第564~565页。

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死敌，以便破坏它们的生存条件，如果我有可能的话，就消灭它们。”^①会上，考茨基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这不仅是由于他在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党的纲领策略的阐释者；而且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大会上，曾受托就米勒兰入阁事件和对夺取政权的态度问题起草过决议，在会前和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他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对立。考茨基在发言中，就修正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他在说明倍倍尔、辛格尔和他向大会提出的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案时，明确地指出，制订决议的出发点，就在于“党内存在着彼此截然对立、经常互相矛盾的两种倾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一种是修正主义倾向。修正主义是从对党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修正出发，并且由于这个原因获得了修正主义的名称。他认为，两种倾向的策略分歧点，是夺取或掌握政权问题。“修正主义的策略，想要回避巨大的冲突，不是推翻资产阶级，而是从内部把它的政权挖空”，“企图通过逐步挖空统治权来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政权，而不是象通过突击攻下一个要塞那样来取得政权。”在谈到米勒兰事件时，考茨基触及到了修正主义的国际联系问题。他指出，对待夺取政权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其出发点不应在德国寻找，而应该到法国（饶勒斯和米勒兰）、英国（费边主义）去寻找，为了理解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必须到这些国家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逻辑的因果关系。”关于巴黎国际大会的决议，考茨基重申，它不是为米勒兰辩护，而是既想原则上反对米勒兰，又设法使法国人统一起来这样一个相互矛盾心情的产物。同时，考茨基也承认：“这后一个企图失败了。”因而，他和倍倍尔、辛格尔等人向大会提出的决议案，比之巴黎大会决议，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党人不能谋求在资

^①《大事记》，第1卷第237页。

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的条款。^①

福尔马尔、伯恩斯坦等人，在会上就倍倍尔的报告和考茨基的发言进行反驳，并为“批评自由”辩护。但是，他们的主张，并未为多数代表所接受。最后，大会以288票对11票通过倍倍尔等人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问题决议（德累斯顿决议）。

德累斯顿决议，无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国际的历史上，都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它首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从而把原来德国党内的“伯恩斯坦问题”，上升为一般意义上的修正主义问题。“决议”非常坚决地谴责修正主义者的这一企图：“改变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久经考验和已经取得辉煌成就的策略，用一种迎合现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过战胜我们的敌人来夺取政权的政策。”“决议”认为，修正主义策略，会使真正的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针对着修正主义的策略，“决议”重申了党在现阶段应予遵循的策略原则，其中，包括“决不承认能够使统治阶级保持政权的任何措施”和“不能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为此，应谴责为了便于投靠资产阶级政党而抹煞当前的不断加剧的阶级矛盾的任何企图。“决议”并不反对国会党团取得国会第一副议长席位。但是，它强调，应当拒绝承担进宫朝见的义务或者服从以帝国宪法为根据的任何条件。^②

4. 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

巴黎大会通过考茨基决议，本来是力图调和法国入阁派和反入阁派之间的矛盾，以维护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可是，这个决议却为伯恩斯坦等人所利用，将它说成是米勒兰的胜利，继续为

^① 见《争论》，第590～599页。

^② 《争论》，第606～607页。

入阁主义辩护。^①饶勒斯也用它来为坚持和全面推行入阁主义寻求理论依据。开始时，饶勒斯还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看成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权宜措施。巴黎国际大会后，在1900年11月举行的利尔群众大会上，饶勒斯同盖得就入阁问题进行辩论并进而指出，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一种新的行动形式”，“将来总有一天统一的、组织起来的社会党，也会指示它的一个或几个党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以便监督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尽最大可能反抗反动势力的诱惑，尽可能参加改良的工作。”^②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垮台后，米勒兰随之也名誉扫地。尽管饶勒斯派觉得不开除米勒兰不足以平民愤，但并未由此而改变推行内阁主义“新方法”的初衷。1902年6月，孔勃内阁接替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当新内阁在议会宣读声明之后，饶勒斯以法国社会党的名义宣布，决心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结成经常的、不变的联盟，加倍地奉行以民主主义为内容的改良政策，并在内阁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一贯地支持孔勃。这种同资产阶级长期的、无条件的联盟和对资产阶级政府始终不渝的忠诚，比之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还更危险。因此，各国社会主义者，强烈要求修改不能令人满意的考茨基决议，谴责饶勒斯等奉行的“行动中的机会主义”，并就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应遵循的策略准则，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盖得、瓦扬的提议，“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正式列入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的议程。同时，1904年8月9～11日召开的法兰西社会党里尔大会决定向阿姆斯特丹大会提议，将德国党德累斯

^①见伯恩施坦的《巴黎和美国兹》、大卫的《国际代表大会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统一”》、福尔马尔的《关于米勒兰事件》、龙格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载《米勒兰事件》。

^②见《两种方法》，载《米勒兰事件》，第104～109页。

顿大会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作为即将召开的国际大会的决议，以使之国际化。这样一来，入阁论争再度激化。

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议题的讨论，先在议题委员会内展开，大会发言时，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饶勒斯、王德威尔得，阿德勒、安塞尔、布兰亭、特鲁尔斯特拉等人一方，以盖得、瓦扬、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费里等人一方，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激烈交锋。

是否应制定共同的策略准则？饶勒斯认为，每个国家的生活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问题极其错综复杂，大会不可能制定出适合各种情况的规定。“如果硬要把一种‘外来策略’，①强加于法国无产者，这就意味着，用你们的手，去触动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意味着你们在法德人民之间制造新的误解；这种误解带来的灾难，决不会小于上一次。”②在反驳饶勒斯的发言中，考茨基论述了策略原则及其运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应将两者区别开来。确定国际公认的策略原则，不仅不会影响团结，还将“为法国社会主义的两个派别的联合创造了条件，并且由此而成为促进和鼓舞无产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同时，“它可阻止饶勒斯执行使他背离我们的政策。”至于在特殊情况下如何应用这些共同的策略原则，这并不是国际代表大会的事情，应由各国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③倍倍尔指出，尽管不可能对各个时期的所有问题制定出一个策略，但是，“只要我们和一个阶级国家打交道，策略的基本路线也是不变的”。④这是因为国家形式可以有

①指德国党的德累斯顿决议。

②指普法战争。见《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记录》。

③《文献选编》，第3卷第106、107~108页。

④《文献选编》，第3卷第113页。

不同，社会和国家性质却是到处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以阶级统治为基础，并通过国家政权来维护。因此，各国社会党人都有相同的原则立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统一和团结。意大利费里也强调，要想实现团结和统一，首先必须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提出一个确切的准则。“这一准则对我们来说，犹如指南针对航海一样重要。”^①

要不要谴责修正主义的企图？这是对德累斯顿决议态度的核心问题。盖得、瓦扬、倍倍尔等人认为，修正主义，这是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它不仅在德国、在饶勒斯所代表的法国存在，而且在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甚至荷兰都有表现。它对党的生活造成了危害，是“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灾难”。对此，必须在国际范围内采取安全措施，各国的社会党人，都要参与解决这个问题。与之相反，王德威尔得认为，批判修正主义，完全是德国党所特有的概念；丹麦的库特森指出，修正主义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其背后空空如也；饶勒斯则强调，根本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他认为，只有各种为近期目标进行的改良活动。“这些改良主义者在哪儿呢？我不认识他们。”荷兰党的领导人特鲁尔斯特拉则对批评修正主义持否定态度。她认为，德国党在汉诺威开始的向“修正主义”开火，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修正主义“不过是一种没有一定设想的、微不足道的流派；目前也只不过是一股著作思潮。考茨基写书、倍倍尔讲话大反修正主义，这是不对的。只有当修正主义从著作领域发展为行动，那时，党才应该站出来反对它。”她还认为，不要象在意大利那样，使反修正主义的左派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变为反议会派。针对这种观点，倍倍尔强调，巴黎大会通过考茨基决议后，修正主义的倾向和实践还继续存在，而且在不止一个国家里，在实践方面已成一股明显的势

^①见《国际阿姆斯特大会记录》

力。正因为如此，所以格外有必要对这种思潮表明态度。盖得等人主张，直接通过并援引德累斯顿决议，以在国际范围内谴责修正主义。王德威尔得、阿德勒等人则认为，对修正主义者不要谴责，不要漫骂，也不要把他们赶出去，并建议删去关于谴责修正主义的词句，以增强团结，避免分裂。费里虽然也主张通过一个关于共同策略准则的决议，但是，他反对对集团和个人进行谴责，主张大会“应总结和交流，而不应提出谴责或者批判的建议”。法国代表雷诺由于德累斯顿决议把修正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把这个决议称之为“危险的决议”。卢森堡立即指出，我不希望雷诺式的团结（即取消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引者注）。她并且强调，由修正主义者所造成的分裂状态，这是确实存在的现实。针对着有人说反对修正主义是攻击个人，普列汉诺夫指出，德累斯顿决议包含了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它所反对的，是主张妥协的修正主义理论，而非鼓吹修正主义理论的个人。一些伯恩斯坦的追随者也投票赞成决议，就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党人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在大会发言中，饶勒斯和倍倍尔之间展开了一场极其激烈的舌战。饶勒斯为入阁主义的新方法辩护，并把矛头公开指向他一向推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累斯顿决议。他认为，“当前欧洲和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面临的压力，并非所谓妥协，不是那些为挽救自由、进步、世界和平而同民主派结盟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冒险行为，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上的无能。”在他看来，德累斯顿决议的主要缺点，是它力求采用目前强加在德国党身上的那种行动原则，即放弃行动的原则。他历数了德国党取得巨大的议会成就却没有在议会和内阁中采取实际行动的事实后指出，如果大会接受德累斯顿决议，“就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要一切国家，要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它的一切领域，都陷入德国党这种暂时的但却是危险的无能为力状态，陷入这种暂时但又不可能自

拔的瘫痪状态。”因此，饶勒斯认为，德累斯顿决议“是普遍的政治自由发展的障碍，因而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障碍。”倍倍尔针对着饶勒斯攻击德国党似乎不关心共和国的说法，明确地指出：“当然，我们是共和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但是，社会主义者绝不应忘记，资产阶级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阶级国家，它本质上都必然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必然竭尽全力使资产阶级保持全部立法权力。因此，不管我们多么羡慕你们法国人有你们这样的共和国，而且希望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共和国，但是，我们不应为它碰得头破血流，因为这样做不值得。”倍倍尔依据大量事实，特别是饶勒斯派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和殖民预算、全力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事实，揭露饶勒斯鼓吹的同资产阶级长期联盟、无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策略”。他明确指出，德国党并不反对实行局部的改良，但是，断然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按照倍倍尔的分析，德累斯顿决议，决不是象饶勒斯攻击的那样，只适用于君主制的德国，它也同样能够正确地指出其他国家应当遵循的策略。它决不是鼓吹无所作为，而是针对那些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的人，针对那些迟疑不决的人，针对那些想让我们背离它所指出的久经考验的老策略的人。其目的在于，对那种被党视为灾难而进行批判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提出警告。^①

在上述争论的基础上，大会形成了两个决议草案。一个是王德威尔得一阿德勒提出的。它主张保留德累斯顿决议的积极部分，即论述阶级斗争一般原则的部分，删去谴责修正主义的词句和内容。实际上，是要取消德累斯顿决议的核心和灵魂。因此，

^①大会讨论情况详见《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记录》；另见《文献选编》，第3卷114~126页；《历史资料Ⅱ》，第101~109页。

得到饶勒斯及其追随者的赞成，却为大会多数代表所否决。^①一个是盖得提出的。它除了未采纳纯属德国党内部事务的第1段和对个别词句作修改外，几乎全部复述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德累斯顿决议，并为大会所通过，^②从而正式确立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

阿姆斯特丹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比之巴黎大会的考茨基决议，前进了一大步。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巴黎决议只停留在理论领域，小心翼翼地回避实践这个该死的问题；阿姆斯特丹决议则不然，它勇敢地接触实践问题，毫不动摇地作出唯一的、堪称为无愧于当代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回答，采取不调和的反对立场和进行不断的革命鼓动的回答。^③它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文献中，首次提出了在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整体上否定了入阁主义的“新方法”，并为坚持党的最终目标、实现当前任务，向各国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殖民政策风波

1. 国际面临的新课题

鼓吹殖民主义，推行殖民政策，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性。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航海技术的应用，资本主义开始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向海外殖民。一些强国，正是采取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手段，掠夺、奴役、控制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把它们变

^①它在委员会中以16票对24票被否决。经过饶勒斯等人的积极活动，在大会上它得到21票赞成。按大会表决规则，由于赞成与反对的票数相等，最终仍被否决。

^②它在委员会表决时，以27票对3票（10票弃权）被通过；大会表决是25票对5票。

^③见《米勒兰事件》，第312页。

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或保护国。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宗主国的正义斗争，坚持国际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友爱，一直是国际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及其整个活动始终体现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期的殖民主义和殖民政策，在整个国际生活中，还只是局部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被压迫民族与宗主国无产阶级关系的论述，也是着眼于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殖民政策问题，并没有真正提上当时国际工人阶级的议事日程。

新国际成立时，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事态的发展已把殖民政策问题，无比尖锐地提到国际工人阶级及其组织面前。从政治上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已完成民族任务，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已不再是反对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而是向外殖民扩张，以占领更多、更广的世界市场问题。从经济上说，生产力的巨额增长及其发展的不平衡的加剧，使世界政治格局，由过去英国一家独断而成为各国列强的激烈竞争。资本，特别是这个时期在主要国家中已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特性，要求向外扩张，获取更多的殖民地。因此，争夺殖民地、拼命追求世界领土，已经成为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1900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的殖民地面积，已达7,30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总面积的55%）；人口5.3亿（占世界人口35%）。其中，非洲被占领土，1876年仅占总面积的10.8%；到1900年，已达90.4%。“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占完了”。从军事上说，列强对殖民地的疯狂争夺，是在不均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德、美、日），远远落后于进步缓慢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霸占的殖民地的面积930万平方公里，相当

于德国的9.3倍，法国占领的殖民地几乎等于德、日两国的3倍。^①按照实力重新分割世界领土，依靠武力和战争夺得更多的殖民地，势必成为帝国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军国主义蔓延、战争危险加剧，已成为新国际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军事冲突和战争。其中，一类是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向落后国家进行军事征服所引起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如1899~1902年英国远征南非而同布尔人发生的英布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4年初德国征服西南非洲的战争等；另一类是几个资本主义列强为争夺殖民地、附属国而发生的冲突或火并，如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为争夺古巴、菲律宾而引起的美西战争，1911年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利比亚而引起的意土战争，1905年和1911年德国和法国为争夺摩洛哥而引起的两次摩洛哥冲突等。很显然，世纪之交的殖民政策，已大大地不同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它已成为国际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向外掠夺以独霸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同一对连体婴儿，它和军国主义、战争危险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因此，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己任、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为旗帜的国际工人阶级，不能不面对现实，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和大国为殖民地而进行的争夺问题，正式列入国际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新国际首先接触殖民政策问题，是1896年的伦敦大会。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兰斯伯利，代表政治活动委员会，在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决议中指出：“殖民政策无论以宗教为借口，或以假作传播文明为借口，它的实质都只是为了资本家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围。”“决议”“主张一切

^①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6、247、251页；另见《国际工人运动》，第2卷第20页。

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对目前正在遭受军事的、民族的和
其他形式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表示同情，并号召他们
同全世界觉悟的工人一起，为战胜国际资本主义、为实现国际社
会民主党的目标而奋斗。^①这个决议，为大会所通过。但是，由
于当时国际面临着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在讨论政治活动问
题时，各主要国家政党的领导人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政治活动
和议会选举的关系上。所以，尽管波兰代表提出“波兰的独立
和自主，是一项对国际工人运动和波兰无产阶级本身都具有同样
必要的政治要求”，法国工人党代表也要求讨论“工人对殖民地
政策应持的态度问题”，都未列入大会议程。讨论关于工人阶级
政治活动的决议时，饶勒斯、倍倍尔等，均未涉及殖民政策问题。
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大会决议提出“民族自决”问题的着眼
点，也仅仅在于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的压迫，而未把它和反
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它所面对的，是各被压迫国家
的工人，而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全体人民，因而有较大的局限
性。大会决议提出的“民族自决”要求，也未为以后历次国际大
会所坚持。但是，伦敦大会毕竟在关于殖民政策问题上迈出了第
1步，而且从一开始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阶级实质。这
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实属难能可贵。

2. 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揭露

从1900年巴黎大会起，殖民政策问题正式列入国际的议
事日程，中间经过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到1907年的斯图加特
大会把论争推向高峰。在这长达7年的时期内，论争实际上涉
及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何对
待资产阶级的殖民活动及其后果；另一方面，是怎样消除殖民主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54页。

义，社会民主党能否继承资产阶级所开始的海外殖民。在后一方面，国际中一些代表人物曾陷入过谬误，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对论争的实质认识不清；在前一方面，国际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忽略这一点，势必脱离论争的客观实际，从中得出机会主义者全然左右国际的结论。

实际上，无论是巴黎大会和阿姆斯特丹大会，还是斯图加特大会，关于殖民政策的讨论，始终保持着—个基调，即坚决驳斥资产阶级及其学者的殖民主义辩护词，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及其后果，并由此确定社会党人的方针和措施。这样一个基调，集中体现在大会决议中，也反映在专题报告和大多数代表的发言中。这些文献，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首次讨论殖民政策的宝贵记录，如实地再现了国际当时已经达到的理论水准。

关于殖民主义的实质。巴黎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殖民主义扩张”。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榨取无产阶级生产者的血汗和金钱，并且对被武力征服的殖民地土著居民，施展种种犯罪和残暴手段，用这种办法来增加资本主义阶级的利润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①向国外实行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论断，在报告人、荷兰社会主义者万一科尔的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按照万一科尔的分析，对现代社会来说，占有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这既由资产阶级无限贪欲所决定，也为不断爆发的生产过剩并极力寻求新的销售、投资场所的动机所驱使。同时，万一科尔从政治上考察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因。资产阶级为缓和国内日益强烈的不满，以避免内战和社会革命，也需要通过殖民扩张以转移工人阶级的斗争视线。^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万—

①《历史资料Ⅱ》，第75页。

②《历史资料Ⅱ》，第117、113、112页。

科尔把殖民地称之为“排泄无产阶级压力的安全阀”。为了达到上述政治、经济方面的目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势必强化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增加巨额的军费开支，培植军国主义，使工人阶级微不足道的福利被剥夺，承受更加难以忍受的重负，并把国家推上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道路，严重地阻碍工人阶级的解放；在国外，则到处实行暴力侵略和武装占领，残酷地掠夺殖民地国家，培植整个地球上无穷无尽的国际冲突的土壤。正因为如此，万一科尔认为，应坚决谴责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并与其进行无情的斗争。

关于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万一科尔对殖民政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一般论证的水平上。他在分析帝国主义趋向的基础上，进而揭示殖民主义同军国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使军国主义必然增长。特别是由于垄断组织的出现，竞争的加剧，生产过剩危机的频繁发生，国际贸易、军事、政治联盟的形成，使得殖民地对帝国主义有了新的意义。帝国主义国家到处都在争夺，“在一切大陆和海洋上，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你死我活的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的斗争。在东西两半球的棋盘上，摆开了工业战争的阵势。到处都是--堆堆的易燃物，只要一点点星火，就可以在全世界燃起一场大火。”^①巴黎大会集中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它一开始，就把殖民政策和军国主义放在一起考虑，两个专题委员会一直联合开会。军国主义议题报告人卢森堡向大会的报告中，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只是帝国主义同一世界政策新现象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这种世界政策的疯狂性在近6年中发动了4次流血战争，并以持续的战争威胁着世界。卢森堡预言，随着事态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将不是由于一场经济性的而是由于一场

^① 《历史资料Ⅱ》，第115页。

政治性的、因世界政策引起的危险而崩溃。殖民主义是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得以滋生的温床；军国主义和战争又是实现殖民扩张政策的工具。因此，巴黎大会通过的决议号召：“每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必须加倍努力，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①象巴黎大会这样鲜明地把反对殖民政策同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并把这个斗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政策斗争的有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1次。

关于反对殖民政策的措施。在这一方面，巴黎大会决议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措施。但是，它确定了一个总的原则：“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应当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扩张，且在一切适当场合下全力谴责资本主义为了遂其丧尽天良、厚颜无耻的私愿而在世界各大洲作出的不义的残暴行为。”据此，大会向各国党建议，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加强对殖民地问题的研究，并明确提出，要帮助殖民地建立社会党，同时加强殖民地国家社会党之间的联系。^②作为落实上述建议的一个实际步骤，阿姆斯特丹大会，特邀英属殖民地印度代表、80高令的达达巴哈·纳夫罗伊出席，并请他在讨论殖民政策问题时，就印度当前局势作专题发言。纳夫罗伊以亲身经历的事例，揭露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所犯下的可耻罪行，强烈要求结束英国在印度推行野蛮与强盗政策的制度，代之以自我管理的办法，并呼吁世界无产者支持印度人民的斗争，把印度的事情象当作自己的事情一样看待。纳夫罗伊的发言，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使英国代表提出的谴责本国殖民政策的决议得以一致通过。和巴黎决议不同，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殖民政策的决议，进一步规定了各国党及其议会党团必须履行的各项义务。其中，包括大力反对一切帝

^①《历史资料Ⅱ》，第73～74页。

^②《历史资料Ⅱ》，第75页。

国主义的措施和关税保护措施，反对一切殖民侵略和每笔用于殖民地的军事支出；反对一切垄断组织，反对大片领土的割让（租借），不使殖民地的财富落到大资本手中；毫不留情地揭露对土著居民实行压迫的种种事实，采取真正捍卫土著居民利益、反对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措施；提出和支持各种旨在改善土著居民状况的措施；按照土著居民的发展程度，给予他们尽可能广泛的自由和自治，以求达到殖民地彻底解放的最终目标；对由一小撮金融寡头所操纵的对外政策，加强有效的议会监督，如此等等。^① 这些措施，除了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比伦敦大会后退外，其他各项，都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要求。

关于殖民地的发展道路。万一科尔曾在荷兰殖民地爪哇长期居住过，对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作过考察。当他受命报告关于殖民政策的讨论情况时，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这个特长。万一科尔在正面论述决议内容时，曾对殖民地的发展道路，作过一些探索。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在殖民地国家发展阶段问题上，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某些国家在经济进化中至少可能部分地超越资本主义时期的假说并没有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并不是要阻止作为人类历史一个必经环节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象减轻产妇分娩痛苦那样，去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使殖民地有可能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即使必须牺牲旧的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也在所不惜。在对待殖民地内的资本主义（即新兴的资本主义）问题上，万一科尔指出：“在社会党人的策略中，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应是有区别地对待的，这是任何时候也不应当忽略的。”也就是说，要把民族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加以区别，由此而采取不同的对策。按照他的分析，从农业制度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即在殖民地逐步形成

^① 《历史资料 I》，第121~122页。

新兴的资本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封建制度必将消失，正如欧洲国家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进程。这种旧制度灭亡、新制度诞生的过程，将采取一种没有暴力推动的、缓慢地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方式进行。值得称道的是，还在世纪之初，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时，万一科尔就已明确肯定这种新兴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以及它代替封建制度的必然性。在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形式问题上，万一科尔认为，由于在大多数殖民地中，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形成还相当困难，土著居民又满足于自足自给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些国家和民族，“是不会轻易地套上资本主义的枷锁的”。其经济发展，将采取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形式，居民“彻底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或许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也不会表现得那样尖锐。”^①尽管在上述问题上，万一科尔的表述有不尽科学之处，但是，经过认真的探索，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却给后人以启迪。

3. “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提出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国际大会的专题报告人，万一科尔对殖民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思想，为形成谴责殖民政策决议作出过努力。但是，他也有严重的错误。万一科尔是国际内部鼓吹以“社会主义殖民政策”来代替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当然，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并非万一科尔首倡，而是围绕着国际事态的变化，在国际内部逐步蔓延开来的一股错误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还在1896年，伯恩施坦就曾公开地为殖民政策特别是为英国在印度的政策辩护。尽管他也赞成各民族的解放，但是，他认为，支持“抗拒资本主义文明渗入的原始人和野蛮人”，那是空想。

^①《历史资料Ⅱ》，第75页。

象印度这种殖民地人民的处境困苦，并不是殖民政策造成的，而是当地人口繁殖过快的结果。同时，他把世界的民族划分为“高级文明”即“开化种族”和“低级文明”即“未开化民族”两类。前者有权对后者实行统治。①伯恩斯坦的这些主张，当即遭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的批评。后者于1897年12月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殖民政策和沙文主义》一文中指出，伯恩斯坦这些言论表明，沙文主义这种反动谬论，已侵入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头脑，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对此，伯恩斯坦在《新时代》发表了《崩溃论和殖民政策》及附录《批评的插曲》，进一步发挥上述思想，公开主张对殖民政策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从空想观念出发的批评”。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国家向殖民地输出资本，扩大市场，“是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社会民主党不应反对，因为“它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并表明是增加民族财富的一个因素”，而且在工人阶级享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工人也可从中得到一分。这样，“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据此，他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反对将“未开化民族或野蛮民族”纳入文明制度范围。也就是说，不反对把殖民地纳入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同时，他强调，谁要把殖民地人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便借此来阻止文明的传播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加速大崩溃的到来，“首先他就犯了一个天大的时代错误。”②尔后，伯恩斯坦在他的《前提与任务》一书中，进一步将上述主张推向极端，并为德军侵占中国山东胶州湾和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罪恶行径辩护，曾

①转引自《国际工人运动》，第2卷第576页。

②《崩溃论和殖民政策》，转引自《伯恩斯坦言论》，第41~42页。

遭到累德堡、卢森堡等人的反对。^①

几乎在德国党内关于胶州湾事件争论的同时，围绕 1899～1902 年发生的掠夺南非的殖民战争（英布战争），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以肖伯纳、韦伯为首的费边社，公开站在资产阶级政府一边，赞成和支持这场战争。由肖伯纳起草的宣言，以地球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利用自然的生活资源的共同的利益，高于居住在这个或那个区域的民族的利益为由，公开主张不列颠帝国吞并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南非金矿应当国际化，大国有责任按照有利于普遍文明的原则进行管理，从而发挥殖民主义传播文明的作用。《宣言》认为，“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如果妨碍传播世界文明，就得滚它的蛋。”^②《宣言》这种公开袒护殖民政策的错误立场，遭到以哈弟为首的独立工党和以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民主联盟的反对。他们按照国际伦敦大会决议的精神，在报告中和各种集会上，公开抗议血腥屠杀南非人民的英布战争，指责费边社上述宣言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

伯恩施坦、肖伯纳等人所鼓吹的美化殖民政策、肯定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言论和主张，确曾受过批评抵制。但是，这种抵制显得软弱无力，因而这种思潮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反而日益蔓延开来，在德国党内则尤为突出。伯恩施坦把殖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硬拉在一起，宣扬“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主张，除得到大卫、席佩尔、诺斯克等追随者的大力支持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所谓“新理论”也产生了共鸣。1898 年，当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就殖民政策问题“反击”巴克斯时，打的就是考茨

^① 详见本书第六章“二、第二国际关注着中国”。

^② 见《费边主义和帝国。费边社宣言》，转引自《国际史》，第 1 卷第 360～361 页。

基这张牌。他强调指出：“我愿意指出，当我的文章发表后并遭到人们的无情攻击的时候，一位在德国知识渊博的、党的理论家曾来信告诉我，说他几次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文章，在其中并没有找到任何以自己的权利和能力所不应讲的东西。这位理论家就是卡尔·考茨基。”^①对此，考茨基未予置评，照登无误。虽然他在公开的场合，也谴责过伯恩施坦的错误观点，揭露过威廉二世殖民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后果，阐述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民族国家的一般原则；但是，他在殖民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对伯恩施坦作出了不应有的让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是众望所归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揭露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英勇战士，他们在殖民政策问题上也有过迷惘。1899年6月21日，李卜克内西就曾在德国国会演说中指出：“散播和平、推动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殖民政策，是完全可取的。”只不过他担心这种殖民政策的时代尚未到来。^②在这一方面，倍倍尔走得更远，他宣称：“推行殖民政策本身并不是一种罪行，推行殖民政策也许能成为一种传播文明的行为，问题只在于如何推行殖民政策。如果文明民族的代表，是作为朋友、行善者、人类的教育者，来到异民族那里，为的是帮助开发他们的宝藏，以造福于土著居民的和整个人类，那么我就同意这种行为。”他明确地表示：“我们社会党人便是给于这种负有文明使命的殖民政策以支持的第1批人。”^③德国党和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这种错误态度，正是所谓“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得以在国际大会上提出的重要因素。

^①见《崩溃论和殖民主义》前言。

^②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上，万一科尔为其“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辩护时，曾援引这一说法，作为立论的依据。见《历史资料Ⅱ》，第117页。

^③《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记录》。

国际大会接触社会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问题，是1900年的巴黎大会。当关于殖民政策的决议即将交付表决时，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社会主义总委员会的代表夏尔·热朗提出，鉴于社会主义的种子已在殖民地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开始发芽，因此，根据会议要求，应加强对殖民地问题的研究。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制定一个社会主义殖民地纲领。^①由于大会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个临时动议。

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万一科尔进一步发挥了上述建议，首次在国际范围内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问题。还在委员会的讨论中，万一科尔就曾强调，巴黎大会通过关于谴责殖民政策的决议之后，一些党并未就殖民政策的研究给予充分的考虑。在他看来，谴责、咒骂殖民政策所造成的流血恐怖事件固然必要，但是，它还只是一种纯粹的消极态度。随着社会民主党内外条件的变化，应使这种消极态度转变为积极的策略，即以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代替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把成千上万的人，从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不致重新回到无边的苦难和精神庸俗、野蛮的状态之中。^②在大会的报告中，万一科尔全面地阐述了所以要实行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理由。他认为，殖民地不仅目前存在，而且在以后许多世纪里还将存在。因此，不应当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和地点地对任何殖民统治进行谴责。“工人阶级胜利后和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后出现新的需要，将使殖民地甚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必要的。”这种所谓“新的需要”，按照万一科尔的说法，主要包括殖民地的土地、地下资源都应属于全人类共有和享用，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是一切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手段应

①见《国际巴黎大会记录》。

②见《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记录》。

属于全人类所有，当殖民地对这些生产资料无能为力或为所欲为地破坏时，就需要宗主国无产阶级的干预，使之为全人类服务；殖民地要摆脱目前的贫困状态，达到文明水平和经济高度发展的水平，以实现充分的自治，按照当前殖民地的实际能力和水平，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因此不能坐等这种理想制度的到来，需要不断地去扩大殖民地；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社会，需要热带国家即殖民地为其工业和人民生活提供不可缺少的原材料、食品，为过分拥挤的欧洲过剩人口和商品提供市场；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低，没有自治习惯，需要宗主国无产阶级对其实行长期的托管，以保护土著居民的利益，这方面如有所放松，就会重新陷入无政府状态，就如同“把一个身体衰弱的或没有独立意识而非我们帮助不可的孩子完全撇开不管，那无异使他成为无休止的剥削或某种新的统治的牺牲品。”根据这些“新的需要”，万一科尔认为，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必须实行殖民政策”。这种殖民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仅仅在于：社会主义者无须经过侵占，即经过侵略战争和挑起种族仇恨，也可以取得殖民地。^①

万一科尔关于殖民政策的理论，实际上是伯恩斯坦、肖伯纳等人主张的一次集中表述。其根本错误在于，它抹煞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政策的根本对立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利益的根本分歧。究其根源，它低估了殖民地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和创造力，混淆了无产阶级支持、帮助殖民地和对落后国家实行殖民统治的本质界限，反映了资产阶级竭力宣扬的所谓世界历史以西欧为中心的谬论的影响。它注意了社会主义的一般演化进程，而否认了殖民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按照万一科尔的分析，尽管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侵占也可获得殖民地，其结果，势必使社会主义走上经济上残酷剥削、政治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116~118、110~111页。

上血腥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资本主义老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提出者的愿望何等虔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实质上仍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

4. 一场针锋相对的论争

“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口号和系统的理论，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已由万一科尔提出来了。但是，大会并未对它展开讨论。一方面，由于当时论争焦点在“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之上，德、法两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大多数代表的注意力，并不在“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上；另一方面，作为报告人之一的万一科尔，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主张，塞进他和海德门联合提出的决议案中。相反，它按照伦敦大会和巴黎大会决议的精神，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具体措施，为大会多数代表所能接受。所以，大会很顺利地通过了相关决议，从而把社会主义殖民政策问题搁置下来。3年后，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时，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德国党内的事态发展，迫使国际不得不作出强烈的反应。

1904年初，德属殖民地西南非洲的赫累罗人，因为殖民当局修筑铁路将他们赶出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而奋起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起义。10月间，德属西南非洲的霍屯督族人也卷入这次暴动。德国政府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悍然决定派出一支远征军，血腥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按照“格杀勿论、斩尽杀绝”的命令，8万赫累罗人只剩下1万人。此事在德国国内引起了强烈震动。德国党在议会内外进行了一系列抗议和揭露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活动。1906年12月，当政府要求为进行殖民战争而追加军事拨款，德国党国会党团投票反对，使该议案被否决。为进行报复，德皇解散了帝国国会，并在人民中掀起一股继续殖民战争的沙文主义浪潮，把矛头直接指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也因国会

解散迁怒于德国党，并在1907年大选中，联合起来反对它。结果，德国党所获票数，比上届（1903）虽增加248,258票；但所获议席，却由81席降为43席，为1884年以来选举结果的最低点。伯恩施坦的追随者诺斯克等认为，这是德皇的胜利和党的失败。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党实行的是“消极的殖民政策”。据此，他要求党实行“现实的、积极的殖民政策”，并于1907年4月25日，在帝国国会，公然站在沙文主义和殖民政策一边，宣称“假如帝国遭到失败，社会民主党人将欣然保卫自己的‘祖国’”。^①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再度提出了殖民政策问题。大会一开始，就围绕着要不要执行社会主义殖民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

在议题委员会中，主要是德国党两个代表之间的论争。戴维认为，大会只是重申以往决议远远不够，还需发出实际方面的指示，并运用党的全部影响，以保护殖民地人民以及殖民地的自然财富，使之免受资本家的剥削，并使殖民政策承担和负有文化的使命。同时，他以殖民统治有助于落后民族早日达到高度的文化发展为理由，主张在决议之前加一个序，强调“殖民观念本身，是社会主义运动遍及全球的文化目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主张，得到比利时的特尔瓦格纳和法国鲁瓦纳的支持。他们认为，不能从原则上拒绝任何时代任何一种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能起促进文明的作用。与之针锋相对的是累德堡。他把殖民政策所表现出的各种丑恶现象，只看作是资本主义一种派生现象。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有这种现象存在。“殖民政策及其恶果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所以，不存在所谓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累德堡的观点，得到英国劳伦斯和奎尔奇、德国武尔姆和白拉克等人的支持，由此形成累德堡决议案（少数派决议案）。最后，委员会虽然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260~261页。

否决了戴维的建议，却以多数票通过由万一科尔提出的决议案（多数派议案）。这个议案实际上以另一种形式重申了戴维的建议。它明确规定：“大会原则上不是任何一种殖民政策都反对，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能起促进文明的作用。”

大会主要是围绕上述两个决议案特别是多数派决议案提出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问题进行讨论。^①按照万一科尔向大会报告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两种倾向针锋相对，一方持否定态度，一方持肯定态度；一方重视理论，一方重视实践和行动。”实际上，前者，主张从根本上反对殖民政策；后者，坚持只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特别是对它的方法进行改良。伯恩斯坦完全站在后者一边，他在大会发言中认为，“必须推行一种积极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必须打掉那种断然抛弃殖民地的乌托邦幻想。”按照他的分析，开化民族对未开发民族实行一定的监护，这是社会党人也应承认的一种必然性：先进国家的经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从殖民地取得当地居民根本不知如何加工的产品的基础之上。据此，伯恩斯坦指出：“必须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以和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相对立。”这种看法，遭到累德堡、白拉克、考茨基等人的有力驳斥。考茨基提出，伯恩斯坦美化殖民政策，把开化民族对不开化民族实行监护，说成是一种必然性，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两类民族即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的理论。考茨基强调，推行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想在殖民地做一些有益于当地人民的事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殖民政策意味着对一个海外国家的征服和暴力控制。“为使未开化的民族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需要推行文明政策，但是决不意味着需要殖民政策。”“凡是存在着殖民政策的地方，它不是提高各个民族，而是使它们倒退，

^①提到大会的还有英国提案，它主要涉及英国对印度的政策。按其内容和倾向，是少数派决议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状况。”经过与会代表特别是累德堡、马尔赫列夫斯基、武尔姆等人的努力，对万一科尔决议中为伯恩施坦、大卫等人引申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段落，作了原则性的修改，从而扭转了多数派决议的错误倾向，形成了少数派决议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以127票赞成、108票反对、20票弃权，获得通过。^①

少数派决议修正案指出：“大会认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就其内容来说，必然引起奴役、强制劳动和殖民地土著居民退化等现象”。资本主义社会所自封的文明人的天职，只不过用来掩盖粗暴野蛮的专制统治的借口。大会“决议”强调，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国人民才能参加真正的文化生活。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不仅不去增加生产力的总和，反而用奴役土著居民、使他们破产以及发动荼毒生灵的毁灭性战争的办法，不断地毁灭建立了殖民地秩序的国家的国民财富。所有这些论述，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否定。同时，“决议”还以多数派决议案为基础，重申历次大会关于殖民政策的决议，再次反对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对殖民地人民残酷剥削和血腥掠夺的强盗政策。它明确地指出，殖民政策加剧了军事冲突的危险，加重了人民的军费负担和其他财政负担。“决议”号召，各国社会党的代表，应在议会中同殖民掠夺剥削方式进行斗争，努力维护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权益，争取改善他们的状况，并尽力启发土著居民去争取独立。^②

^①上述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国际斯图加特大会记录》；另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51～158页。

^②《历史资料Ⅱ》，第154～155页。参见《国际斯图加特大会记录》。

四、在总罢工问题上的激烈较量

1. 过去论争的余波

总罢工问题，一直是困扰国际的问题之一。从1889年巴黎大会开始，国际就受到来自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方面的挑战。尽管1896年的伦敦大会作出了从组织上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决定，并通过决议否定了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作为社会革命唯一形式的总罢工，但是，斗争并未止息。特别是由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工会的代表，仍然留在国际内部，国际的一些领袖人物又满足于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清除而放松了对其思想理论方面的清理，所以，一有机会，隐蔽的无政府主义者又会挑起新的论争。

还在1896年的伦敦大会上，欧仁·盖拉尔就曾预言，法国代表团将再次提出总罢工问题。果然不出所料，阿列曼在其他5个国家代表的支持下，以工会名义，又向1900年的巴黎大会提出总罢工问题，并被列入大会最后一项议程。其实，还在1899年12月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白里安就曾倡导世界总罢工。他明确地提出：“我深信这一点：总罢工——这就是革命。”^①在国际巴黎大会上，白里安又进而强调说：“总罢工是革命的一种手段，是能比过去提供更多保证的革命，它不再是个别人采摘胜利果实的革命，而是可以使无产阶级能够把社会生产资料拿到手并掌握它的一场革命。”^②据此，他在向国际大会提出的一项决议中写道：总罢工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它是“革命行动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是向资产阶级施加强压

^①载《历史资料Ⅰ》，第93页。

^②见《国际巴黎大会记录》；参见《国际史》，第1卷第343页。

力的简单手段和杠杆，而且它必然导致必要的经济、政治改革，可以使总罢工服务于社会革命。白里安的决议“要求全世界工人同时组织总罢工。”这些主张，得到意大利、葡萄牙、俄国、阿根廷等国部分代表的支持，却未被多数代表所接受，最后被委员会否决。代表委员会和大会多数代表看法的，是德国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列金。他认为，当工人还没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又不拥有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情况下，发动总罢工，势必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最终甚至可能动用武器来对付罢工者，使几十年的工作毁于一旦。因此，他在决议案中提出：“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把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会里，因为罢工能否扩大到整个工业部门或世界各国，取决于组织工作的广度。”在列金提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委员会多数派决议。由于大会议程排得很紧，临近结束时，大会才匆匆讨论总罢工问题。所以，对立双方没有来得及交锋，即以27票对7票通过列金提出的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回顾了国际巴黎大会和苏黎世大会讨论的情况，重申了国际伦敦大会关于总罢工的决议，肯定罢工和抵制是实现无产阶级任务的必要手段，同时又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不可能举行总罢工，从而再次否定了白里安提出的少数派决议案。

应该指出的是，“决议”在否定不可能举行作为社会革命形式的世界总罢工的同时，也回避了在一定条件下、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政治罢工的可能性，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不仅使国际内部持世界总罢工观点的代表不服；一些正在进行政治罢工并已取得成效的工人党，也为之不满。所以，阿列曼派再次向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提出总罢工问题；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讨论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时，法国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爱尔威同盖得、倍倍尔等人，就能否以总罢工反对军国主义和防止战争的问题，发生严重的冲突，并尖锐地批判了后者的软弱、退缩和妥协。但是，无论是阿列曼派还是爱尔威等人关于总罢工的看法，

并未成为国际的主张，而是一直处于被反对和被否决的地位。这些事实表明，国际在总罢工问题上所面临的主要对手，已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半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否定甚至取消政治罢工的改良主义者和犯有改良主义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

2. 不同类型的总罢工

从阿姆斯特丹大会开始，国际内部关于总罢工问题论争的重点，开始由世界范围的总罢工，转向一国范围内为争取工人政治权利为内容的政治罢工。这种转变，同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工人阶级在其政党领导下，为争取和维护政治权利特别是普选权而举行总罢工，在19世纪90年代即已发生。到20世纪初，越来越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它既是30~40年代英国宪章派为争取普选权而举行总罢工的历史延续，也是50年代开始的美、法工人为实现8小时工作日而举行总罢工的历史发展。同从前相比较，20世纪初，以争取政治权利为内容的总罢工，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讲，都有新的变化。从广度上来讲，它不只是个别国家工人的自发行动，而是在其政党领导下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并在许多国家广泛开展；从深度上讲，它不仅局限于争取工人的普选权，而且还包括维护工人的结社权和罢工权、全面实现劳动立法、废除危害工人利益的各种制度等，涉及到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总罢工。

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仍然是比利时、瑞典等国工人阶级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斗争形式。90年代，比利时工人通过总罢工胜利地争得了普选权，但是这种政治权利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因此，进一步争取平等的普选权，仍然是工人阶级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比利时工人党列日代表大会于1901年4月声明：“在紧急的情况下，也要发动总罢工和街头骚动。”在党的号召下，

根特、列日、安特卫普等城市的工人，于1902年4月初，纷纷举行抗议不平等选举权的群众集会和政治示威，并在示威的过程中与军警冲突，甚至发展为街垒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党员委员会遂于4月14日号召举行总罢工。16日参加罢工的人数高达30~35万，还得到英、荷、德、俄、奥等国工人和工人政党的声援。由于工人党领导人担心事态扩展到不可收拾，只进行5天即下令复工。瑞典工人以比利时工人为榜样，于1902年5月15日，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以改革选举法为内容的总罢工，卷入斗争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85%。与比利时不同的是，瑞典总罢工，组织严密、计划性强，只坚持3天，即取得一定的成果。

争取劳动立法的总罢工，是法、俄等国工人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为实现以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内容的劳动立法而斗争，是法国工人罢工斗争的传统，过去一直收效甚微。20世纪初，工人进而诉诸总罢工。1902年9~10月，法国矿工进行一次大规模发动，要求重新审议劳动立法，其中包括实行8小时工作日、固定最低工资、对年满60岁并在矿山劳动30年的矿工发放养老金等内容。参加斗争的有11个省的数万矿工，持续达55天之久。最终虽然以失败而告终，却充分显示出工人的巨大战斗力。同年11月4~25日，俄国工人也进行了类似发动。它以罗斯托夫铁路工人为先导，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废除罚款而举行总罢工，罗斯托夫其他工厂工人随之加入，并波及纳希切万城，3万多工人在社会民主党顿河委员会领导下英勇斗争。11月11日，工人举行群众大会，遭到军警屠杀，死伤30多人，工人仍然举行政治示威。经过斗争，工人的要求得到局部的满足，并在斗争中显示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维护工人结社权和罢工权的总罢工，是荷兰等国工人所采取的斗争方式。由于同以纽文斯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荷兰许多

社会主义者，一直拒不承认总罢工的可行性，工人却自发地倾向于总罢工。1903年1月8日，阿姆斯特丹港栈行的企业主，公然违反同工会签订的合同，开除两名工会会员，因此引起公愤，工人遂于1月9日宣布罢工，很快遍及整个港口并得到铁路工人的声援。罢工者强烈要求保护工会组织，不许企业主破坏工人的罢工权利。迫于压力，港方于2月间答应满足工人的一些要求。但是，政府却准备镇压罢工，并提出禁止罢工的法律草案。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港口、铁路、海员工人于1904年4月5日发动第2次罢工，并于4月9日宣布总罢工，由于罢工领导机构抵抗委员会担心禁止罢工的法律通过后工人会遭到更加严厉的镇压，只坚持3天即宣告复工。许多工人由于对领导不满而大量退出工会。这场总罢工，体现了工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关于总罢工问题的争论，并于1904年的爱尔德赫特大会通过关于总罢工决议，从而为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的讨论奠定了基础。①

上述事实表明，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总罢工这种斗争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所接受。只要领导得力，组织严密，有明确的斗争目的和切实的措施，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总罢工可以取得胜利，即使失败了，也不致造成断送几十年工作成果的结局。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在否定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实行世界范围总罢工主张的同时，鲜明地提出了关于在一国范围内发动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总罢工即群众性政治罢工的问题，并要求将其列入行将到来的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的议程。②

①这个决议是受国际局执委会的委托，由一个专门委员会拟定的，它同时也是为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准备的文件之一。

②除荷兰社会民主党受国际局委托就政治罢工问题作出决议外，1904年7月，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会议和1904年9月法国社会党里尔代表大会都肯定了政治罢工。

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总罢工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3个决议案即阿列曼派决议、盖得派决议和荷兰党决议案进行。

荷兰社会主义者罗兰—霍斯特，是总罢工议程的主要报告人。她认为，国际工人阶级在关于总罢工或者确切地说在关于政治罢工的观点上，开始出现了转变。它不再一般地拒绝总罢工，而是主张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和群众性政治罢工之间划清界限，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至于政治罢工是否可行，其范围和程度，应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历史状况来确定；政治罢工的条件是否具备和有无可能，应由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确定。罗兰—霍斯特以荷兰党决议案为基础，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谨慎、机智、有组织、有纪律”地进行总罢工的决议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告诫工人，不要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的宣传所迷惑，断然停止一切工作的“绝对的总罢工”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工人阶级的良好组织和自觉纪律等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这种总罢工不仅不能获胜，反而“会使一切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都将无法生存下去”，并将诱使工人放弃体现在工会、政党、合作社活动中的日常的斗争；另一方面，决议案又主张，“在那些对于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各个生产部门中或一般地说在大批工业企业中普遍举行罢工，这却有可能成为一种导致重要的社会变革或阻止反动派阴谋破坏工人权利的最极端的手段。”^①这个观点的变化，是以下述认识为前提的。罗兰—霍斯特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可能是一次突然发动的结果。夺取胜利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是无产阶级单独进行的事业，需要具备各种条件，其中包括思想革命化、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根本变化，通过缓慢的日常工作改善工人生活，通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准备，等等。也就是说，夺取政权不可

^① 《历史资料Ⅱ》，第122页。

能是一次性的行动，而必须通过多种途径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因此，罗兰—霍斯特认为，要贯彻这个决议，就必须反对把总罢工解释为社会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解释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①

法国阿列曼派向阿姆斯特丹大会也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它强调指出：“总罢工虽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方法，但确属争取解放的武器。因此，任何一个有觉悟的社会党人，都无权低估或减弱总罢工的作用。”很显然，这是针对着荷兰比较谨慎的决议而言的，它仍然保留有总罢工就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武器和总罢工就是革命的痕迹。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比起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来，它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该决议，抛弃了所谓总罢工是社会革命的开端或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的传统提法，提出“总罢工是实现无产阶级要求和确保政治权利的最有效的方法。”（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这和反对政治斗争特别是日常的政治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显然有区别。^②实际上它从传统无政府主义观点后退了一大步，而向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主张靠拢。这在白里安的大会发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一方面强调，总罢工并不是要组织所有工人采取大的行动，而是要进行一次范围或大或小的罢工运动；另一方面又指出，总罢工作为进行恫吓和压服的手段，既可“借以达到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它还是工人反对剥夺其政治权利的有力武器。”值得注意的是，阿列曼派决议案的支持者，在大会发言中都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和当时普遍开展但成效并不显著的议会活动相比，它“是一种不会被伪造和毒害的武器”。德国社会主义议员费里德贝格，针对着议会活动的弊端进而指出：“从长远看，议会

^① 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31～132页。

^② 见《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记录》。

制会成为工人运动的绊脚石。工会运动远比任何一种法制行动更能改善工人状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说：“总罢工的思想，即工人阶级经济、道义威力的表现，是可贵的。”

法国盖得派决议案，从利用合法性以维护工人的生活 and 尊严以及提高工人觉悟着眼，肯定了“集体总罢工或罢工”。但是，它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取决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所有有觉悟的工人，都应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过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经济和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所有人的福利和自由。”该决议案，强调了由工人阶级夺回国家政权以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思想。它既同荷兰决议案的指导思想，即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经济、政治权力的思想，划清了界限；又同阿列曼决议案中尚未完全消除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即把总罢工视为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魔法的主张划清了界限。

经过讨论，荷兰决议案在委员会中以27票对4票被通过；又以56票对4票为大会通过。阿列曼派和盖得派的决议，只得到瑞士、日本、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而被否决。^①从积极方面说，大会决议在国际范围内就总罢工问题划清了同无政府主义者的界限，再次肯定了一国或一个工业部门范围内的群众性政治罢工，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从消极方面说，它在否决盖得派、阿列曼派决议案的同时，实际上也否定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思想，否定了对陷入议会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社会主义者的严肃批评，而且只是把政治罢工和议会斗争联系在一起，甚至使前者从属于后者，为机会主义者歪曲大会决议直至否定政治罢工，提供了理论和文献依据。国际内部这种微妙的变化本身，包含了当时尚不为人所察觉的、后来公开分裂的祸因。

^①大会决议表决情况，见《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记录》。

3. 从耶拿向曼海姆退却

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政治罢工的决议能否得到贯彻，作为国际中最有威望、最有影响的德国党的态度至关重要。恰恰在这一点上，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想法又很不一致。大会闭幕不久，德国党于1904年9月18~24日在不来梅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有些代表主张，将总罢工问题列入下届（耶拿）大会议程。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费里德堡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完全拒绝议会斗争，鼓吹在德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和总罢工的方针。伯恩施坦等人，一般也不反对政治罢工，甚至认为它是唯一的手段。但是，它只是支持争取政治权利即普选权运动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双刃武器”，它可能打击敌人，也可能伤害自己，弄不好，最后会致冒险主义和浪漫主义，陷入另一极端。所以，伯恩施坦声明：“我决不是那种热衷于把政治罢工提上议事日程的人。”与之相反，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人却认为，群众性罢工问题，“是我们当前和将来的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应当反对那种对群众罢工非常危险的敌对情绪，“为此，必须讨论群众性罢工问题”。同时，卡尔·李卜克内西还明确地指出，要适应斗争的发展，更新斗争方式，防止“斗争手段生锈的危险”。^①争论的结果，大会最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格腊德纳乌厄尔的议案，决定将总罢工问题交党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实际上，从下届大会的议程中，取消了关于总罢工问题。

不来梅大会结束不到4个月，俄国爆发了1905年革命。这场革命，是“世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革命。”^②

^①大会讨论发言情况，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259~263页。

^②蔡特金语，见《新时代》，第23卷第2册第35期第285页，转引自《廿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第4章第1节。

它不仅打破了长期弥漫在西欧国家中和平发展的沉闷气氛，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革命的先声，而且给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处于徘徊状态的德国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经验尤为突出。按照卢森堡的说法，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所有基本的、有争论的问题的焦点。诸如议会主义和议会外群众行动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组织的意义和作用问题，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问题，和平策略和武装起义问题，通过逐渐的改良主义道路“长入”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中的革命“飞跃”问题，以及对革命前途的信念和学习别国经验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同群众性政治罢工有着密切的关连。“一句话，关于总罢工的问题成了在德国工人运动整个世界观上的主要之点。”^①因此，俄国革命爆发不久，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极其注意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积极宣传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经验。还在1905年2月，蔡特金就在莱比锡工人集会上，作了题为《俄国斗争方法即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报告》，并且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当然不能在议会的银花地板上实现，而只能在议会外实现。”她号召德国工人，准备进行坚决的群众性的战斗。^②7月间，她又进一步指出，俄国的事件表明，议会主义和工会经济斗争，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宣传，为俄国革命经验所证实了的群众性政治罢工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面前。

这个时期的群众性政治罢工，不再是局限于上层交谈和大会

^① 见《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书俄文版序言。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150页。

^② 见《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2月15日。转引自《廿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第4章第3节。

讨论的抽象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实践。对于长期习惯于和平合法的议会活动、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沉缅于官僚主义上层活动的德国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工会领导人，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敢不敢于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议会活动工作方式，从上层转而面向下层千百万群众？愿不愿冒打破坛坛罐罐，承担几十年工作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的风险？怕不怕事态扩展导致同强大的德国军事机器正面冲突，进行最后的决战？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德国党及其工会领导人踟躇不前。特别是在俄国革命推动下，德国工人不顾工会领导人的限制，在1905年，掀起空前规模的罢工斗争，更使工会领导人忧心忡忡。

1905年5月底，在科伦召开的德国工会代表大会，正是充满着这样一种担心和忧虑。为了控制罢工斗争的规模，使之不超出既定的轨道，以免影响工会运动的和平与安宁，大会通过了关于反对罢工的决议。“决议”禁止从工会的中央金库为罢工提供财政支援，把举行罢工和解决罢工物质保障问题，完全交由工会中央联合会负责。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准许由中央金库拨付罢工经费，而且还要以工会总委员会有权参与对运动的策略指导为条件。实际上，剥夺了广大会员和基层组织独自使用罢工的权利。^①会上，尽管有代表主张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坚持群众性政治罢工，但是，大会的报告人博尔麦堡，却以反对无政府主义为借口，认为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总罢工的决议，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极可悲的让步”。他以群众罢工是自发产生无须按照命令制造出来为理由，反对预先准备政治罢工，不许工会成为讨论政治罢工问题的场所。由于工会领导人的坚持，大会在只有7票反对的情况下，以绝对多数通过工会总委员会提出的决议。“决议”禁止“以宣传无产阶级群众罢工的方式，预先决定策略的一切企

^① 见《大事记》，第1卷第246～247页。

图”，号召全体工会会员“坚决制止这类企图”。^①上述决议表明，科伦工会大会，实际上是一次在革命斗争高涨年代取消罢工斗争尤其是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大会。其目的，不仅在于遏制正在德国工人中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而且也是为了阻挠各种工人集会特别是党的耶拿大会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深入讨论。

科伦大会的错误决议，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大会闭幕不久，即在莱比锡“遇到了极顽强的、甚至是严酷无情的抵抗。”木器工人集会专门通过决议，对大会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极端的不赞成”，并指出，科伦工会大会“不是工会代表大会，这是工会官员代表大会。”^②从6月起，柏林、不来梅、汉堡、法兰克福、基尔、科伦等地的许多工会和党组织，也纷纷集会表示抗议，强烈要求党的耶拿大会，讨论群众性政治罢工问题。随着俄国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德国工人革命情绪的高涨，要求讨论群众性政治罢工的要求，愈来愈强烈。到7~8月间，整个德国，几乎没有一个工人会议不提出这个要求。7月，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一次选民会上，尖锐地批评了科伦工会大会关于取消政治罢工的机会主义决议。他明确地指出，群众性政治罢工，应是行将到来的党代会的主要议题。不来梅、柏林等地的党组织，公开拒绝科伦决议，宣称政治罢工是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必须采取的战斗手段。由于广大党员和党组织的坚持，特别是卢森堡、蔡特金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政治罢工和社会民主党问题，终于列入了1905年9月底召开的党的耶拿大会议程。

作为大会议题报告人的倍倍尔，回顾了国际大会关于总罢工

^①见《科伦工会代表大会》，第30页。转引自《廿世纪初德国的工人运动》，第4章第3节。

^②见《莱比锡人民报》，1905年6月17日。转引自《廿世纪初德国的工人运动》，第4章第3节。

问题的讨论，尖锐地批评了关于禁止讨论政治罢工问题的科伦决议，并反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对政治罢工及其后果的种种非难。他从德国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基本事实出发，依据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明确地指出：“政治大罢工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践问题，即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和必须运用什么斗争手段的问题。”^①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还进一步指出：“群众性罢工是适用于阶级斗争的一切领域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斗争手段。”这种斗争手段，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总罢工。后者是要代替议会斗争，而前者正是要使议会斗争有可能进行，并使它有坚强的后盾。^②经过热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观点占了上风。大会最后以287票赞成、14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在工人阶级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和结社权受到来自统治阶级威胁和打击的情况下，“全体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坚决地运用每一种适当的手段来保卫它们。”“决议”认为，最广泛地运用群众性罢工，是反击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政治迫害或赢得自身解放的最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为了能够和尽可能有效地运用这种斗争手段，要求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宣传教育，揭露一切侵犯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罪行，正确处理党和工会的关系。^③耶拿大会，按照德国广大工人和党员的要求，以“决议”形式肯定和承认了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政治罢工，实际上是对科伦工会大会决议的否定，给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从而为国际工人阶级贯彻阿姆斯特丹大会决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指出的是，耶拿决议并不彻底，它还包含

① 倍倍尔的报告，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263～283页。

② 李卜克内西的发言，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285页。

③ 见《文选选编》，第2卷第287～288页。

着一些可以为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弱点和毛病。“决议”并没有把群众性政治罢工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手段，而是将其视为在统治阶级高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消极、被动的防御手段；“决议”并不是从夺取国家政权着眼，同议会外的暴力革命相联系，而是从议会选举和议会活动的需要出发，把群众性政治罢工作为达到维护和扩大工人普选权的一种手段；为了求得党内的和平统一，“决议”回避了对科伦大会决议的公开批评，缺乏鲜明的原则性和战斗性。这些弱点，不但在会上为一些机会主义者所赞赏，而且在会后也使决议难于贯彻，甚至走偏方向。

耶拿大会闭幕不久，事态的发展却出乎德国党领导人的意料。1905年10月，俄国以莫斯科为中心爆发了全国范围的政治大罢工。在布尔什维克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政治罢工很快发展为12月武装起义，把革命推向最高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革命斗争达到这样的发展高度，具有这样的力量，使武装起义同无产阶级特有的武器——群众性的罢工结合起来，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明显，这个经验对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意义的。”^①正是借助于俄国的经验，德国工人在1905年末和1906年初，掀起了为要求改革“三级选举制”、争取普选权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并且由自发斗争发展为举行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汉堡罢工。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把工作重点从议会活动和经济斗争，转向议会外的政治发动，组织工人游行示威，发动政治罢工。不少地方的工人，还和军警发生流血冲突。面对这样一种大好形势，德国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在报刊和工人集会上，热烈欢迎俄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充分肯定俄国无产阶级所创造的新鲜经验，认为俄国革命的新阶段已经到来，德国工人应从中吸取有益的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6页。

教训。即使武装起义这种被德国党领导人视为“禁区”的东西，也得到首肯。^①另一方面，当涉及具体运用俄国经验于德国时，党的执委会又不愿超出和平、合法的议会活动范围，更反对把群众罢工与武装起义结合起来。甚至最为激进的左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也主张，不应“机械地”把“俄国斗争方法”搬到德国来，只是号召德国工人吸取俄国的“革命精神”。^②尤其是涉及群众性政治罢工问题，他们更是如履薄冰。1905年11月，在答复布勒斯劳党组织的提议时，党的执委会就认为，进行街头游行示威是“不适时的”。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也强调，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只能限于使用“和平的手段”。也就是说，只能在警察当局所许可的合法范围内，进行报刊宣传和议会活动。随着各地要求群众罢工的呼声日益强烈，党的执委会于12月8日决定“推迟”政治罢工，并以工人还没有成熟到举行政治罢工的程度为由，把运动完全局限于举行和平抗议集会和向地方自治机关递送请愿书。进入1906年之后，随着俄国12月武装起义的失败和德国1月汉堡政治罢工为高峰的工人运动被扑灭，在工会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统治阶级扬言要对罢工运动实行更为严厉打

^①倍倍尔认为，俄国12月武装起义中的街垒战，不愧是千百年来历史上最崇高的战斗，它是为崇高理想而牺牲的榜样。他宣称，武装的街垒战，是“未来革命战斗的”“典型现象”。连过去认为武装起义不可能的考茨基，也在1906年1月承认，根据俄国的经验，街垒斗争是可能的。莫斯科起义即使被镇压，也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失败，俄国还将有决战。见《国会议事记录》，（1915年2月3日）第2卷第996页；《前进报》，1906年1月20日。转引自《廿世纪初德国的工人运动》，第5章第3节。

^②见《莱比锡人民报》1906年1月3日。转引自《廿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第5章第3节。

击的高压下，德国党领导人在政治罢工问题上顺着斜坡向下滑。1906年2月16日，党执委会同工会委员会举行秘密会谈，就群众性政治罢工问题双方达成秘密协定。协定的第1条规定：“党的中央机关不打算宣传群众性政治罢工，并将尽可能反对这种作法。”^①也就是说，德国党向工会承担了义务，不仅不进行宣传鼓动，而且要尽可能反对在德国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从而背弃了1905年耶拿大会决议，走上了同工会领导人妥协的道路，由此开始从耶拿向曼海姆退却。

1906年9月召开的德国党曼海姆大会，只不过是把上述秘密协定公开化而已。同1905年的耶拿大会相比，曼海姆大会，无论从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都处于一种退却的态势。从客观方面说，耶拿大会召开时，俄国革命正处于颠峰状态，德国的罢工也正方兴未艾；曼海姆大会，却是在俄国革命开始退却、德国工运低落的情况下举行的。从主观方面来讲，同样是作为报告人的倍倍尔，1905年，对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表现了满腔热情，时隔一年，却处处强调政治罢工的“困难”，极力为党的领导机关的尾巴主义辩护，并处处向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让步。再加上副报告人列金的推波助澜，结果，大会以压倒多数（386票对5票），通过了关于政治罢工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

^①1905年12月底，在德国党执委会、工会总委员会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工会代表表示，在德国干涉俄国革命时，坚决反对为此而举行政治罢工。普鲁士陆军大臣和帝国皇帝都曾声称，对革命工人和社会党人将采取严厉措施。帝国首相也于1906年初号召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社会民主党。见《大事记》，第1卷第251～253页。

^②见《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06年第48页。转引自《廿世纪初德国的工人运动》，第5章第5节。

上，向工会领导人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关于政治罢工问题，它表面上也承认耶拿大会决议，但是，却确认科伦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与耶拿大会的决议并不矛盾，而且认为一切有关科伦决议精神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实际上，是抹煞两个决议在政治罢工问题上的对立，否定党内外对科伦决议的严肃批评，从而使取消和否认政治罢工的科伦决议合法化。同时，“决议”还规定，“一旦党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它必须同工会的总委员会取得联系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进行富有成效的活动。”也就是说，党在举行政治罢工之前，必须取得竭力反对政治罢工的工会领导人的同意，实际上，等于永远取消和埋葬群众性政治罢工。此外，关于党和工会关系，“决议”虽然也强调“绝对必须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武装工会运动。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则是每一个党员同志的任务。”同时，它又指出：工会的“必要性不亚于社会民主党”，并要求在今后的斗争中，双方“只能相互谅解和合作”。^①这等于正式认可了工会领导人长期所鼓吹的同党“平起平坐”的原则，实际上，把党贬低为一个同工会平行的组织。^②以上几个方面的重大让步，是德国党领导人特别是倍倍尔，从原则立场上的一次退却，也是机会主义者在党内的一次胜利。

德国党内关于政治罢工问题的争论，以曼海姆大会的退却为标志，告一段落。1910年9月召开的马格德堡大会，根据左派的

^①《文献选编》，第2卷第295～296页。

^②考茨基和其他32名党员，曾对决议这一部分，提出一个补充提案，强调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高的和最广泛的组织形式”。该提案，得到卢森堡、累德堡、齐茨等人支持。但在机会主义者的干涉下，考茨基又撤回了提案中的上述提法。见《大事记》，第1卷第257页。

提议，在关于争取普选权斗争的决议中，补充了在必要时进行政治罢工的内容。即令如此，也未遏制住退却的进程，一直发展到1913年9月召开的耶拿大会，通过执委会关于遏制群众罢工的提案和否决卢森堡等提出的宣传群众罢工、实行进攻策略的提案，终于使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上风，走上为机会主义者所独断的邪路。^①

五、军国主义、战争和革命

1. 由理论分析到实际行动的转折

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而斗争，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也是国际工人协会历届大会的重要议题。^②新国际也曾多次接触这一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相应决议。但是，1900年巴黎大会之前，国际初创又面临内部无政府主义者的严重挑战，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未充分展开，只是作了一般的理论分析。1900年巴黎大会却不然，它从分析世界政治中的新现象入手，开始把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同揭露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联系起来，从而为国际工人阶级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措施。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291~292、314~315页。围绕着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展开的关于总罢工问题的论争，将在下一节中介绍。

^②国际工人协会曾在日内瓦大会（1866年）、洛桑大会（1867年）、布鲁塞尔大会（1868年）通过的关于战争和常备军问题的决议，主要着眼于民族国家之间战争的根源和性质的分析，并提出了取消常备军、实行普遍停工和进行社会改革、结束阶级对立以最终消灭战争等措施。见《文献选编》，第1卷第359~360、360~361页。

国际的这种转折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已成为一种常见的国际现象，并对无产阶级和现代社会的和平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世界政治的这种演变，强烈要求国际工人阶级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实际上，在此之前，国际已经对帝国主义这一新的经济、政治现象进行过探索。1896年，伦敦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决议，从全国性和国际性卡特尔不断增多、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经济关系日益发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业冲突日趋频繁的事实中，得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如此迅速，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危机”的结论。^①1900年的巴黎大会，又正式将垄断组织托拉斯问题列入议程。所有这一切，使国际工人阶级，不仅有必要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对世界政治的一些新现象，进行深入讨论。正是依据这些内外条件，卢森堡在巴黎大会上，作了题为《世界和平、军国主义、废除常备军》的报告。

卢森堡在报告中指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世界政策这个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方面。”由于推行这种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结果，战争已成为一种经常而现实的危险。因此，对大会来说，不在于仅仅重复以往的决议，而在于“对世界政治这个新现象，提出某种新的看法”。按照她的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将不是通过一次经济危机，而是通过帝国主义世界政策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来实现的。所以，不能再象过去那样，仅仅局限于发表一般的、空洞的反战宣言，或把实际行动只是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应寻求新的共同的政治活动基地，由各国工人阶级共同采取反军国主义的坚决行动。尽管工人阶级的这种国际行动，不可能马上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资本主义统治也许还要长期地保持

^① 见《历史资料Ⅱ》，第59～63页。

下去。但是，丧钟迟早要敲响。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必要通过不断的国际行动，为这一时刻的到来作准备。据此，卢森堡认为，大会应提出如下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在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斗争中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动的世界政策的日常斗争。”

从分析帝国主义世界政策这一新现象入手，卢森堡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她在回顾上届国际大会以来国际政治中所发生的种种冲突和战争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每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必须加倍努力，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总任务。她要求以各国无产者的联盟，来反对各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世界政治联盟，以便从政治方面比较抽象地显示一下国际政治团结的精神，过渡到在国际范围内采取坚决的行动，过渡到为反对军国主义和世界政策而共同斗争。在实际措施方面，卢森堡的决议案，除了坚持前几次大会提出的各国社会主义议员应投票反对任何军费开支（包括用于海外殖民掠夺的一切费用）外，还突出地强调，应该注意青年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要求国际局执委会加强统一的计划指导，以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一个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运动和请愿运动。^①这个决议，未经讨论即被一致通过。

卢森堡的报告和决议为巴黎大会所接受一事，标志着国际在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上的重大转折。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不再是个别民族国家工人阶级的孤立行动，而是国际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公开对抗；它不再仅仅与反对专制、独裁政权的民主革命斗争相联系，而是直接服务于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必要准备和阶梯；它不再只局限于废除常备军等一般措施，而是同反对帝国主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73～74页。上述未注明出处的引文，见《国际巴黎大会记录》。

义的世界政策，尤其是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动员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群众，坚决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认识上的升华和政策上的转折，为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令人惋惜的是，卢森堡的报告和大会决议，并未引起各国党，特别是德国党领导人的重视。

2. 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胜利

从巴黎大会到斯图加特大会，间隔虽只7年，国际事态的发展，却出现了急剧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演变。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继续进行并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国家间，就土耳其、摩洛哥、波斯、马其顿、中国等问题，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直接诱发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05年的第1次摩洛哥冲突。国际局势已经尖锐到如此地步，“只要稍微触动一下某个强国，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熊熊烈焰。”^①为了在争霸世界中压倒对方，各个强国磨拳擦掌，剑拔弩张，拼命扩充军备，增加军费预算，强化军事同盟。^②1907年8月，英、俄正式签订瓜分波斯的协定。以此为标志，法、俄、英“三国协约”最终形成，它与1882年5月早已形成的德、奥、意“三国同盟”一起，构成最终发动世界大战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在这种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局势下，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已是一个严重的现实威胁。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各国党，究竟采取什么策略方针，已十分尖锐地摆在国际面前。在此期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5页。

② 1907~1908年度，欧、美各主要国家的陆海军军费，在各国全部开支中所占的比重如下：德国28.3%；俄国35.6%，法国37%；英国48.6%，美国59.6%。见《历史资料Ⅱ》，第132页。

间，世界历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1905年俄国革命及其推动下爆发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巨大潜力。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完全有可能制止军国主义的蠢动和战争危险。这种事态的发展，肯定要影响甚至左右国际斯图加特大会的进程，使得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成为大会争论的焦点。

斯图加特大会，包括5项议程。其中，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议题，占用了6天（5天委员会，1天全体大会），占整个会期的6/7，这在国际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大会共收到4个提案。其中，3个来自法国代表团，1个是德国代表团提出的。法国代表爱尔威的提案主张，大会应“拒绝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官方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者的职责是：“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保卫它。”当战争爆发时，要“以武装罢工和起义，来回答无论从哪一方面所提出的宣战”。这个提案，由于它主张以军事罢工和起义来反对一切战争，被称之为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的方案。饶勒斯—瓦扬提案认为，工人阶级必须用一切手段，包括大罢工和起义来制止战争，因而和爱尔威提案接近，被指责为向无政府主义者的让步。同时，由于它把未来的战争，看成仅仅是个别国家间进攻与防御的战争，被进攻并受到威胁的国家，有权“保卫”自己的独立自主，因而又和倍倍尔提案接近。倍倍尔提案是以德国党执委会的名义提出的。它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险，只作了一般的论述，满足于议会内的反战活动，不主张在议会外进行群众性的发动。对阻止和结束战争，它也未提出任何具体措施，而且将帝国主义的战争归结为进攻性或防御性的战争，从而为未来世界战争中社会党人“保卫祖国”提供了口实。这个提

①见《世界通史资料选编》近代部分，下册第323页。

案，被爱尔威指斥为“机会主义的”、“背叛性的”提案。盖德提案，是由法国代表团少数派提出的。它反对爱尔威提出的、为制止战争而举行的军事罢工，认为这“会给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和鼓动造成困难，从而使社会主义者不能及时地组织起来”；关于反战措施，它和倍倍尔提案一样，不主张规定任何措施，而由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自行决定。

这4个提案，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主张。在对未来战争的态度问题上，爱尔威提案认为，要反对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主张“工人无祖国”；倍倍尔提案、饶勒斯—瓦扬提案则主张，帝国主义战争仍有进攻与防御之分，一旦自己的国家遭到外来侵略，社会党人就要尽公民的责任“保卫祖国”。在战争爆发时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倍倍尔提案和盖德提案，只满足于通过议会活动，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来制止并结束战争；^①爱尔威和饶勒斯—瓦扬提案则主张，应采取一切手段，直到举行军事罢工和起义，以制止战争。^②王德威尔得把这样两种对立的倾向，称之为“落后的人拿起武器，先进的人却放下武器”。也就是说，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拿起武器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的现实危险面前，却无所作为地放下自己的武器。从双方对战争爆发时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的分歧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大会围绕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的论争，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论争主要是在议题专门委员会中展开的。参与论争的各方，

^①德提案中的“一切手段”，除议会活动外，还把全世界工人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最好手段。

^②饶勒斯—瓦扬提案中的“一切手段”，还包括议会干涉、公开鼓动、全国和国际社会主义活动等。

充分地交锋，从中暴露出了国际内部的一些带根本性质的弱点。以爱尔威为代表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由于他们主张坚决行动，甚至诉诸总罢工和起义，坚持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并且对德国党内开始抬头的机会主义市侩化倾向作了揭露，反映了广大工人群众反战的强烈愿望，因而得到一些代表的支持。但是，它并没有“把战争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动同整个社会主义的工作联系起来”，而且不问战争性质如何，统统用总罢工和起义予以反对，从反对机会主义的一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不陷入空想，再加上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不得人心，所以，爱尔威提案仍然没有多少市场。真正成为论争焦点的，是倍倍尔提案。本来，按照倍倍尔在国际中的威望和影响，最适宜于承担这样一项重大使命。但倍倍尔却辜负了代表们的希望，加上福尔马尔，诺斯克等人从中作祟，结果，从否定爱尔威的无政府主义，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在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爱尔威表现了“英勇的愚蠢”，那么，倍倍尔、福尔马尔等人的主张，则是“机会主义的怯懦”。^①

这种“机会主义的怯懦”，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原则问题上。

无所作为的历史宿命论。按倍倍尔自己的说法，“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场战争将是最后一次战争，它将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赌本孤注一掷。因此，我们除了进行教育、启蒙、宣传和组织工作，别无其他办法”，从而把反对世界战争的现实危险，视为一种单纯的宣传鼓动。这样一来，实际上取消了当前局势所迫切需要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决行动。^②正是在倍倍尔的鼓动下，福尔马尔等公开主张，只要靠社会主义的精神，宣传、教育、扩大议会影响以及发动社会舆论，即可麻痹战

^①《列宁全集》，第15卷第171页。

^②倍倍尔的发言，参见《历史资料Ⅱ》，第139～142页。

神，而不必靠幼稚的密谋。他完全排除了议会外的、来自下层千百万群众的发动。^①英国社会民主党的拉夫说的更直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出议会里的和平行动……英国工人拒绝挑起带有暴力性质的事件。”这番话，说出了倍倍尔想说而没有完全说出的话。这些错误主张的提出，是基于一种危险的幻想。用倍倍尔的说法，欧洲战争本来早要爆发，只是因为害怕社会民主党，战争才没有打起来；在德国，好战派也没有什么实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德国的权威人士不希望有战争。”所以，用不着争论何时用何种手段反战的问题，只要采取他所主张的“一切最有效的方法”即可。也就是说，只局限于议会内的方法，而排斥议会外的行动。正如爱尔威所指出的：

“德国党对军国主义的态度，仅仅归结为‘把300万张选票的精神影响放至天平上’。”卢森堡在发言中，批评了这种宿命论。她指出，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历史的辩证法了解为闲坐在那里等待天鹅肉掉进口里。”她强调，给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上暮气沉沉的宿命论形式，是极其危险的，这只会引起象爱尔威所主张的那种过火行为。^②

对总罢工的绝对否定。倍倍尔在总罢工问题上的观点，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05年，他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在耶拿大会上，一般地肯定了群众性政治罢工，但着眼点是争取普选权；1906年，在曼海姆大会上，他屈服于工会领导人的压力，实际上否认了作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手段的政治罢工；1907年，在斯图加特大会上，他进而将爱尔威提出的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提案，斥之为“只是重复纽文胡斯多次讲过的东西”。他还郑重地声明，除了进行宣传鼓动外，“我们不能硬性接受对党的生活和某些情况下对党的生存有可能造成灾难的斗争

①②参见《历史资料Ⅱ》，第142、147、149页。

方法。”这一点，阿德勒认为不妥。他提出，对总罢工，应尽量避免做肯定或否定的决定。“我们不是总罢工的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排除这种手段。”卢森堡在发言中指出，德国党一向把总罢工作为无政府主义观点加以否定，可是1905年耶拿大会也把总罢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加以肯定。这决不是由于纽文胡斯的影响，而是表明，德国党从俄国革命历史经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今天，在斯图加特大会上福尔马尔、倍倍尔又绝对否认总罢工。这一事实说明，要讨论反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应该学习俄国革命的榜样，不这样做就是背叛革命。正是在避免“无谓牺牲”实际上是害怕丧失既得利益和已有成就的思想指导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倍倍尔在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站到了机会主义者一边。

“保卫祖国”的攻防论。在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倍倍尔的一个重大理论失误，就是无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根本变化，仍然固守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以攻防区分战争性质的框框，把行将到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按进攻战和防御战作了细致区分。据此，得出了一个先受进攻而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的错误结论。用福尔马尔的话来讲，“对人类的热爱，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妨害我成为一个好的德国人。”这种夸大本民族利益，并将其置于国际工人阶级共同利益之上的看法，也得到王德威尔得的坚决支持。作为这个议题的报告人，他在大会上强调，应“承认各民族有保卫自己独立和反对外来侵略的神圣权利。”^①正是在这种漂亮的言词的影响下，不到7年，各主要国家的社会党领导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几乎全都为沙文主义所吞没，充当了挑动国际工人阶级相互屠杀的帮凶。其实，倍倍尔发言之后，爱尔威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他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144、149~150、152页。

说，倍倍尔如此细致地区分战争的进攻和防御，可是，当两个大国突然发生战争的时候，“全能的资产阶级报刊，就会煽起民族主义风暴，从而使我们无力抵挡。那时候，您和您的一切细致区分就太晚了！”届时，只能导致“各国的无产阶级，你们互相厮杀吧”的后果。

斯图加特大会之后，在德国党埃森大会上，考茨基批评了倍倍尔以攻防论战争性质的错误观点。他问道：“即使真正受到进攻，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是否有责任帮助政府保卫祖国？”我们的着眼点，并不放在进攻性战争或防御性战争上，我们所考虑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民主的利益，是否受到了威胁。”如受到威胁，即使是被进攻的一方，也应坚决反对战争。他还强调，“实际上，一旦发生战争，我们所面临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因为大国之间的战争，将会演变为世界大战，它将席卷全欧洲而不只限于两国。”^①

尽管倍倍尔在上述问题上有原则性的错误，但是，首次参加国际大会的列宁，并没有把他同机会主义者等量齐观。考虑到在4个提案中，倍倍尔提案的理论分析部分有较好的基础，而且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代表倾向于它。因此，大会决定，以倍倍尔提案为蓝本进行修正，并组成了最后审订决议的分委员会。列宁先在俄国代表团会议上提出修正案，并同卢森堡、马尔托夫一起，以俄国、波兰代表团名义，向大会最后审订决议的分委员会正式提出修正案。为了得到倍倍尔的支持，列宁同他作了几次长谈。开始，倍倍尔对修正案中关于革命鼓动和革命行动的尖锐措词并不同意。他担心由此会造成德国检查机构取缔党组织的后果。为了保全内容、争取多数，列宁等对修正案的措词，作了一些修改，并和法律专家一起推敲和几经磋商，最终形成了倍倍尔也表

^①参《历史资料Ⅰ》，第142~143、152页。

示同意的决议修正案，并经大会表决以热烈掌声被正式通过。^①

斯图加特大会经过6天的激烈论争，实际上否决了法国代表团的3个提案；对德国代表团的提案，也作了原则性的修改。最后通过了国际史上第1个全面、深刻地揭示军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内在联系的历史性文献——列宁、卢森堡、马尔托夫修正案。同倍倍尔的原提案相比，它有一系列原则性修改。

关于军国主义的实质。“原提案”只是一般地论述战争的根源和消灭战争的途径，有意地回避了军国主义以及它与战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修正案”则一开始就确认以前历届代表大会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议，并着重指出：“反对军国主义的活动是跟反对资本主义的活动不可分割的。”“修正案”还强调，“战争是帝国主义无休止地扩充军备的竞争的结果。军国主义军备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奴役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就把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揭露了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实质，突破了“原提案”的框框，突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这个国际工人阶级的重大任务，从而弥补了“原提案”的根本缺陷。

关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传的政治目的。“原提案”指出：“统治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经常培养民族主义偏见”，以支持战争。“修正案”则进而指出，这种民族主义宣传的政治目的是：“使无产阶级背弃它的阶级责任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义务。”

关于反对战争的具体措施。除了保持“原提案”的一般措词外，“修正案”特别强调，要努力用各族人民团结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阶级的青年，使他们经常保持阶级觉悟，使统治阶级不敢把青年用来充当反对战斗的无产阶级而巩固其阶级统治的工

^①见《列宁年谱》，第2卷第455～457页；《回忆列宁》，第5卷第73～74页。

具。这是在国际文献中首次提到在青年中运用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特殊的反军国主义的宣传鼓动问题。

关于阻止战争爆发的手段。和“原提案”只强调议会活动和议会斗争手段不同，“修正案”明确要求，如果存在爆发战争的危險，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中的代表，“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帮助下，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个提法，从表面上看，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反战的总罢工和起义。实际上，这种最极端的方法，已经包含在“最有效的一切办法”的条款之中。“修正案”强调，多种多样的方法，究竟哪一种最有效，“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而定”，从而同绝对否定与绝对肯定反战总罢工和起义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关于战争和革命。这是“原提案”所竭力回避的要害问题。它只笼统地表示，如果战争终于爆发了，就应努力使其早日结束，根本不谈战争和革命的关系。“修正案”则与之相反。它旗帜鲜明地提出：“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他们（指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引者注）就应尽一切努力尽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这个修改，一下子就改变了“原提案”的消极基调，为“决议”注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用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它已经包含列宁后来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的基本思想。这是“修正案”的精髓，也是国际在军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关系问题上所作出的

①《历史资料Ⅱ》，第136～138页，另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49～151页。

重大贡献。^①

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是国际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战斗纲领。它全面地回顾了历届国际大会的讨论和决议，具体地体现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始终贯穿着以坚决斗争的新方式取代陈旧保守的议会斗争方法的革新精神。它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军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而且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当前斗争的方向、任务和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列宁在评价斯图加特大会时指出：“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②关于军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关系和问题，是这些问题中的最主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图加特大会通过“修正案”，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胜利。^③

3. 一场没有完结的论争

斯图加特大会之后，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危险越来越

^①对于“决议”的这个基本思想和重大贡献，在会中会后并没有引起代表们的高度重视。饶勒斯从斯图加特回国后，在巴黎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谈到大会决议时，他强调了民族自决权和工人有责任制止战争这样两条由大会宣布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不容分开的真理”，并且强调“必须通过议会的或社会的行动，踏死灾难性战争的苗子”。他始终没有触及以社会革命消灭已爆发的世界战争这个根本问题。见《饶勒斯》。转引自《国际史》，第1卷第399页。

^②《列宁全集》，第13卷，第65页。

^③以上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国际斯图加特大会记录》，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37～151页；《历史资料I》，第139～152、160页。

严重。继1905年德、法之间第1次摩洛哥危机爆发后，1908年10月7日，奥匈帝国宣布吞并巴尔干半岛上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准备世界战争的事态发展，激化了奥（地利）塞（尔维亚）的关系，奥、德和俄国的关系也随之紧张起来，并促使两大军事集团加快军备竞赛的步伐，不断强化战争机器。在这过程中，尤以德国和英国之间海军军备的竞赛，特别引人注目。这场竞赛，是由1906年英国制造第1艘巨型（1.8万吨）战舰“无畏号”引起的。为了赶上海上霸主英国，在未来战争中掌握制海权，德国不惜巨资，大力扩充军备。继1898年、1900年、1906年通过3次扩充海军的法案之后，1908年3月27日，帝国国会又通过了第4次海军法案。它规定，1908~1911年间，每年建造4艘巨型装甲舰“无畏号”，并把军舰服役期限，由25年缩至20年。英国也不甘落后，在1909~1910年度，把海军预算增加到3,514万英镑，并决定德国每造1艘大军舰，英国就造2艘，以示对抗。^①英、德之间的这种“造舰竞赛”，引起了两大军事集团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和各国人民的严重不安。遏制扩军备战逆流，争取裁军和世界和平，把反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引向深入，就成为国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任务。1910年9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认真考虑了这项任务，将“裁军和世界和平”问题正式列入议程，并围绕着对斯图加特决议的理解，再度爆发了论争。论争的焦点，是社会党人用什么方法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日益迫近战争危险。

在议题委员会和大会的讨论中，英国爱尔兰工党、英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党国会党团、意大利社会党和波兰党等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6个议案。其中，贯穿着德、法两党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

^①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43~45页。

一种是以累德堡为报告人的德国党国会党团议案。^①累德堡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不能提出根本行不通的纯社会主义的提案，只有提出连资产阶级人士也为之好感的提案才有可能。按照他的分析，“无畏舰事件”带来的军备竞赛，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尽管各国党在议会中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是，仍然需要社会党人在裁军问题上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他把这种行动，看成是贯彻斯图加特决议的主要方法。为此，他提出，应全面普遍裁军，特别要求达成限制扩充海军军备的协议，并由国际仲裁法庭裁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纠纷。鉴于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事态的发展，累德堡进而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保卫自己的国家，反对武装入侵和武力镇压。”^②累德堡的上述主张，得到奥、意等国代表的支持。意大利代表莫尔加利甚至提出：“要把所有的力量集中于一点：无产阶级代表，要在各国议会中，反复提出议案，首先通过国际协定，把陆军的水平减少一半，并进行必要的理论阐述，使大家看清事情的核心。”奥地利代表伦纳，则把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归结为裁军和国际仲裁法庭。

上述观点，遭到英、法、波等国代表的反对。瓦扬指出，累德堡即委员会决议案，仅列出一些议会手段来防止战争危险，“它们没有群众的压力，没有整个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冲击力来支持，一点用处也没有。仲裁法庭和限制军备，只有以议会外的群众作后盾才有价值。”波兰代表尖锐地指出，德国国会党团在反对军备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难用社会主义的论点来论证

^①该议案，是德国国会党团于1909年3月29日研究提出的，累德堡向大会建议，对它稍作文字修改，即交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以向各国议会提出。

^②累德堡的报告，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84～192页。

的，它与社会主义的准则不相容，现在要就军备规模达成谅解，是毫无意义的。”按照哈弟、瓦扬等人的看法，斯图加特大会已就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达成原则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出实现这些想法的手段。他们认为，当议会手段不足以取得成就，当无产阶级的议员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制止战争的时候，就必须进行群众鼓动，并应不惜任何牺牲来阻止战争。据此，瓦扬和哈弟分别代表自己的组织，对累德堡提出的议题委员会决议案，增加两个补充修正案。该补充提案认为，“在一切用以制止战争的手段当中，最适宜的是工人总罢工，首先是供应战争物资（武器、火药、运输工具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工人总罢工。以最有效的方式在人民中进行宣传，也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个提案，曾得到一些代表的支持。英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琼斯公开主张，“用战争反对战争”。他还根据英国的情况指出，当前的任务，“不是要教育工人阶级，而是要教育工人阶级一些领袖，使之成为反对战争的人，因为有1/6的工党议员投票赞成海军经费。”

瓦扬—哈弟关于军事部门工人总罢工的修正案，遭到德、奥、意等国代表的严厉反驳。累德堡、伦纳等人，并不否认斯图加特大会关于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总罢工）反战的规定。但是，他们认为，不能不顾各国的法律情况，把斯图加特决议的一般规定，强加于各国社会党人。若如此，势必招来新的“非常法”，给社会主义以毁灭性打击。对党来说，这无异是自杀。爱尔兰工党代表格拉西尔甚至指斥一些主张以军事部门总罢工反战的社会党人，说他们准备放弃和平原则，存在着诉诸武力解决的倾向，“这是一种必须加以克服的好斗的动物本能。”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进行总罢工，时机并不成熟。^②与之相反，哈弟却认为，工人阶级的

①《历史资料Ⅱ》，第167页。

②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85～186页。

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制止战争。所以，应当在工会内部，开展激烈的反战鼓动。他强调，根本不是要求所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采用总罢工来防止战争，而是只要求为采取国际步骤而进行宣传 and 准备。“我们和累德堡同志之间的整个分歧在于，他打算推迟甚至取消这种准备；而我们希望从今天起就立即着手进行。”瓦扬则指出，如果否决他们的修正案，就会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似乎只有英、法工人，而不是所有其他民族，才准备采取最极端的手段。

在德国和英、法代表对峙的情况下，王德威尔得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一方面，他批评累德堡给斯图加特决议赋予了一种起削弱作用的精神。他认为，这个决议具有双重含义，即总罢工有可能给实行新的“非常法”提供借口；同时，在采取的一切反战手段中，确实包含总罢工。没有这层意思，斯图加特决议就成为一纸空文。俄国、西班牙、英国工人实行总罢工的经验证明，这些国家已经做到的，其他国家也一定能做到。同时，王德威尔得又指出，当两个国家工人阶级面临一场兄弟间互相残杀的战争时，“总罢工是一个英勇行为”。英国社会主义者准备以总罢工来回答宣战，“给大会留下一个伟大印象，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从而大大地阻止了全面战争的危险。”因此，他请求大会不要否决英、法的修正案，主张在整个国际尚未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将它移交国际局研究后，再交下届国际大会作出决议。他还郑重地声明，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认为总罢工过早或错了，而是坚信它会被一致通过，并说明我们正动员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和手段，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大会最后一致通过了王德威尔得的提案，从而把总罢工的争端暂时搁置起来。大会之后，国际局执委会分发了瓦扬—哈弟提案。列宁于1910年12月10日，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能提的不是‘阻止战争’这一孤立的行动，而是整个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冲击……在俄国当前

情况下，我们认为，阐明1905年罢工的过程和条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①后来，由于战争爆发，国际大会未能如期举行，总罢工的论争，也就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

哥本哈根大会决定搁置关于总罢工问题的论争后，还一致通过以累德堡决议案为基础的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决议。“决议”从分析最近国际事态特别是营造“无畏号”战舰为新阶段的海军军备竞赛入手，确认历届国际大会特别是斯图加特大会决议，重申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障，并号召各国党，在无产阶级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加强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教育。关于防止战争问题，哥本哈根大会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决议关于采取一切最有效的手段来阻止战争以及关于战争和革命关系的原则论述。它还根据代表们的建议，责成国际局对反军国主义斗争给予物质支持，必要时组织联合行动。在出现战争危险时，应采取必要的步骤，使有关国家的工人党协调一致，统一行动，并根据有关国家无产阶级的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关于当前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具体措施，“决议”希望各国代表，在议会中应不断要求由国际仲裁法庭裁决一切国际纠纷；不断提出关于包括限制扩充海军军备的普遍裁军提案；要求废除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决权。按照累德堡的解释，所谓民族自决权，是指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有权保卫自己的国家，反对武装入侵和武力镇压。其中，既包括弱小民族的自治和独立，也包括强大民族在遭到进攻时有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后面这种解释，为战争爆发时大多数社会党领导人堕入沙文主义泥坑提供了理论依据。^②

①《列宁文稿》，第5卷第354页。

②详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88～189页。以上未注明出处者，详见《国际哥本哈根大会记录》；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84～194页；《历史资料Ⅱ》，第167～169页。

4. 国际社会党人的反战誓师。

1911~1912年，是战乱频繁的年头。1911年7月，法、德两国为控制北非，爆发第2次摩洛哥危机；9月29日，意大利利用法、德、英陷入危机，对土耳其发动以吞并的黎波里为目的的战争；这个战争刚刚结束，1912年10月，又爆发俄、德、奥、英、法都卷入其中的第1次巴尔干战争，使巴尔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对抗的政治热点和随时都会爆发世界性冲突的火药桶。而对着这样一种尖锐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面对着战争有可能从巴尔干蔓延至整个欧洲的现实危险，社会党国际局于1912年10月28日宣布，国际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是通过群众运动，以阻止战争向整个欧洲蔓延。为此，决定召开国际的非常代表大会，集中讨论“国际局势和我们在战争中的态度”。

1912年11月24~25日，国际非常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这次大会，只开了两天，包括1次群众大会和3次全体会议。同以往历次国际大会不一样，“这次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和历史性的事件。它不满足于制定适用于整个国际的准则，而且首先强调了我们的必要性和一致性。”^①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在巴塞尔大会之前，国际“总是讨论原则，试图统一我们的纲领、准则和普遍的策略原则”。巴塞尔大会却走出了这个范围，在战争浩劫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迈出了新的一步，第1次不限于进行谴责，不限于号召显示力量，而是用清楚的语言和坚定的语气，阐明了各国无产阶级政策必须遵循的方向，即“各国无产阶级都必须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反对战争上，在每个国家，都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制止战争。”^②各国代表包括

^①见饶勒斯向大会的报告，载《国际巴塞尔大会记录》；另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204页。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见同上书。

^②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203~206页。

倍倍尔、饶勒斯、哈阿兹、安塞尔、哈第、瓦扬、蔡特金、格雷利希等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和直接来自巴尔干战场的保加利亚代表萨卡洛夫等，都一致谴责奥、俄等国对巴尔干事务的干涉，强烈要求停止巴尔干战争，并使之不向整个欧洲蔓延，表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反对战争的统一意志和决心。他们决心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采取坚决、果断的实际行动，同日益扩大的战争危险进行斗争。饶勒斯也认为，不仅要采取合法的议会行动，而且还应在群众中继续采取革命行动。同时，他还庄严地宣告：我们做好了一切牺牲的准备。^①哈第则进而主张，一旦外交官们就巴尔干问题挑起世界大战。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的神圣职责，便是拿起一切可以制止战争爆发的武器。“如果政治行动不足以制止，那么，我希望，工人阶级应不惜一切地使出第2个重要武器，即经济武器——国际的革命的抗战大罢工。”斯图加特大会决议关于战争与革命关系的原则论述，已经为许多社会党人所领会。瓦扬在大会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倘若资本主义不顾会给自己带来不幸而发动战争。那么，它必须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无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后果进行社会革命！”^②蔡特金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在大会上发言时，把反战斗争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进程联系在一起。她强调：“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将成为日益成熟和力量发展的活的源泉，将加速社会主义代替剥削、奴役和残杀人民的资本主义的进程。”^③

尽管代表之间就抗战的方法以及反战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关系问题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在必须坚决行动以反对

①不到两年，这位抗战的英勇斗士，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为法国沙文主义者所杀害，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②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218页。

③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215~216页。

战争这个基本点上，仍然统一了思想，并一致通过了题为《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宣言，即《巴塞尔宣言》。这个宣言，是由国际局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经过大会讨论、通过而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反战文献。它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是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即1889年~1914年期间大量的宣传材料和鼓动材料的总结”。^①

《宣言》充分肯定了斯图加特大会和哥本哈根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决议，并将这些决议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战争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斯图加特决议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的科学规定之上。^②

《宣言》针对着国际局势的新发展，不仅强调了各国工人伟大协作的必然性和“以最大的力量参加有计划的共同行动”的必要性，而且还明确地规定了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在这个共同行动中所应承担的特殊任务，在国际史上第1次为各国党制定了统一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巴尔干各国社会党人，应竭力阻止战争扩大，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友谊，以实现民主联邦制的要求；奥、匈等国社会党人，应继续反对武力侵占塞尔维亚和为争取南斯拉夫、阿巴尼亚人民的民主自治而斗争；俄国、芬兰、波兰的无产阶级，要开展反对沙皇任何战争冒险和任何侵略行为以及推翻沙皇政府的斗争；德、法、英工人阶级，要努力使本国政府不支持奥、匈，不支持俄国，不介入巴尔干纠纷和保持绝对中立，以便全力反对在近东实行的必将导致世界大战的占领政策和停止英、德之间扩充海军军备。

《宣言》根据40年来各种战争及其后果的历史史实，生动、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1页。

^② 见《历史资料》》，第138页，另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51页。

具体地揭示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它要求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去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警告各国统治阶级，不许用战争行动加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群众带来的苦难。它强调，在目前形势下，发动战争对各国政府本身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政府的权贵们仍硬要阻止任何正常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非常的步骤，那么，它们必须对由此产生的危机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在反对战争危险的具体措施上，《宣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及社会党人，“要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地方”，“尽一切力量”，“使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所赋予你们的一切手段”，以使各国政府经常看到，“无产阶级的高度警惕而又生气勃勃的和平意志”，“用和平和人民友爱的无产阶级世界去对付剥削和屠杀群众的资本主义世界”。

按照倍倍尔的说法，巴塞尔大会由于充满着豪情和坚强的意志，充满着为我们的终生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将以金色大字载入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史册”。这次大会，不仅对与会的各国党的代表是终生难忘的，对“我们在一切资产阶级营垒中的对手和敌人也是终生难忘的。”^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塞尔大会是国际社会党人一次反战的誓师大会。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从一些代表发言还是从最后一致通过的《宣言》看，巴塞尔大会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已经暴露出国际内部的一些隐患。

关于欧洲政治格局的分析。国际局当时认为，巴尔干战争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主要来自沙皇俄国。因此，如果沙皇俄国干预巴尔干战争，势必引起俄国无产阶级的反抗，国际工人阶级应满腔热情地予以支持；对英、法、德，国际局认为，主要是使它们之间“谅解”，甚至主张英、德“应该武装起来去消

^①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220页。

灭灾难和压迫”。^①哈阿兹也强调了这一点。他一方面指出，在巴尔干问题上，“必须警惕沙皇政府玩弄罪恶阴谋”；另一方面又强调，“英国、法国、德国联合起来会成为文明和人类进步的栋梁。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团结将成为和平的最强大的保障。”据此，他主张，继续促使英、德两国妥协，工人阶级“将用这种精神为保卫和平和文化进步而奋斗”。“宣言”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它强调了英、法、德联合对付沙俄的必要性，而忽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的侵略好战本性；在规定各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任务时，它正确地提出了俄国工人阶级推翻俄国沙皇的重要任务，而未突出强调欧、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历史使命。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在当时国际领导人的心目中，欧洲政治的演变，未来战争的格局，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火并，而是英、法、德联合并武装起来，为反对沙皇俄国的灾难和压迫的正义斗争。因此，战争一爆发，大多数社会党特别是德国党的领导集团一下子就站在政府一边，以遭受俄国威胁、反对沙皇俄国为由，栽进了“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的泥坑，这决非偶然。

关于反战争的手段。《宣言》正确地指出，要用一切形式和一切手段来阻止战争爆发；瓦扬、哈第也再度提出了军事部门总罢工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的发言者和最后通过的《宣言》，却未对当前所应采取的措施作出具体的规定。唯一提到抗议罢工的地方，也只局限于用来反对沙皇俄国政府，并未把它作为各国工人阶级重要的反战手段予以肯定。相反，和平、合法的议会活动，仍然是许多社会党人的主导思想。就连已处于巴尔干战乱之中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党员都上了前线的情况下，该党领导人仍然念念不忘议会“不能离开的唯一工作地点”，因为议会随时都有开会的可能，所以他们没有来出席巴塞尔大会。国际在

^①见安塞尔代表国际局的发言，同上，第200页。

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时刻，之所以不愿或不敢采取极端手段，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社会党人仍然抱有和平幻想。就象饶勒斯所说的，在战和问题上，“所有政府由于害怕出现无法估计的后果，而不能作出决断。”不少党的政策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估计上，再加上多年和平环境的熏染，一些国际活动家失却了过去那种革命的进取精神，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的自动崩溃之上。阿德勒就曾指出：“历史的罪恶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们希望，如果发生了这种罪恶，那么，自动而来的是（我这里说的是自动地）结束罪恶统治的开始。”既然可以坐等天鹅肉掉进口里，又何必作出无谓的牺牲？！多年来，国际之所以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超出议会活动范围的斗争手段包括总罢工，斥之为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方法，其原因盖出于此。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嘲笑有的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只不过是一次社会主义游行，说他们（社会主义者）只不过希望能在事后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在用抗议拯救祖国。不少社会党领导人犯的就是这种理论脱离实际、雷声大雨点小的“游行病”、“抗议病”。这也是后来国际陷入公开分裂的一个原因。

六、国际局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1. 国际组织机构的酝酿过程

和国际工人协会不同，新国际初期既没有正式的名称，也没有常设的国际机构，定期举行国际代表大会，是它的基本制度。^①

^①阿德勒指出：“国际代表大会成为新的国际的基本制度。”考茨基写道：“第一国际以1864年建立总委员会为其开始，1866年才开第1次代表大会，而第二国际的出发点却是1889年的代表大会，到1900年才建立一个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局。”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期第88页。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斗争的深化，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机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实际上，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已涉及“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问题，并通过了相应决议。“决议”指出：“国际范围内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组织起来乃是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一切承认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并遵守历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组织、协会和党派，均可成为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但是“决议”又指出：“目前各国反动法律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却有碍于这个愿望的实现。”因此，苏黎世大会除了强调全体党员和工人组织成员“为废除一切限制结社权的法律作持久的努力”外，并未在组织问题上采取实际的步骤。^①

1896年，伦敦大会在组织上排除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再度提出并正式讨论了“组织问题”。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代表，先后提出10个提案。其中，英国社会民主联盟执委会的提案指出，随着欧洲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加剧，大会有必要“任命一个国际常务委员会，以注视国际事态的发展，并根据情况采取可能采取的行动”，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国际政策，“同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维护它们的独立，反对外来的武装侵略和欧洲的文化侵略。”英国独立工党的提案主张，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应“组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同盟”。为此，要求大会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以起草同盟的章程草案并提交下届代表大会。此外，德国、荷兰、西班牙的提案，还包括了建立旨在加强联系、协调行动的国际劳工秘书处或国际统计总局以及创办国际社会主义报刊等建议。“组织问题”委员会报告人吉普生，在英国奥尔德汗与伏幸内基工会和独立工党提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最后为大会所接受。“决议”认

^① 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99~100页。

为，“有必要筹备成立常设的国际委员会，并设责任书记，这个委员会应设在最便于其活动的欧洲地区。”同时，“决议”还要求各国代表，全力实现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通过的关于国际咨询局的决议，以广泛地收集情报、加强国际联系。^①为此，“决议”规定，选出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以为建立上述永久性的国际机构拟制建议，并就这一问题向下届大会提出报告。经过选举，大会产生了该委员会并决定在伦敦开会。^②同时，大会还根据瓦扬建议，决定由各国党派1名代表，组成国际议会代表会议，以协调各国党的议会活动。由于没有必要的组织、财政措施作保证，伦敦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并未真正付诸实施。

1900年，巴黎大会又涉及到国际的组织机构问题。在“关于各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办法”议题委员会内，各国代表指出，由于斗争的激化和改革的深入，迫切地要求行动起来，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机构，以研究、总结各国经验，给阶级斗争提供新的动力，并保持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之间的国际联系，加快实施各次国际大会的决议。据此，荷兰代表万一科尔以议题委员会名义，向大会建议，除由召开国际大会的所在国成立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外，应采取如下措施：成立常设的国际委员会（国际局），它由每个会员国派两名代表组成，并掌握必要的经费。^③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批准下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负责邀请

^①布鲁塞尔大会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曾提出建立各国工人书记处的问题；苏黎世大会在关于全国工会和国际工会的组织的决议中，曾提出成立国际劳动书记处的问题。见《历史资料Ⅱ》，第19、46页。

^②参见《历史资料Ⅱ》，第57页。

^③见“国际局第1号文件”（编号系豪普特所加），载《社会党国际局。历次会议情况、记录、宣言及通知书》，第1卷。以下国际局文件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加注。

与会国的组织向大会提供报告。委员会选出领取报酬的总书记 1 人，他负责收集资料，解释说明历次国际大会的决议，分发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告，概述国际大会应予讨论的各项问题的报告，出版有关政治问题的报告和著作，采取必要措施以促进各国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并采取共同行动。大会一致通过包括上述内容的决议，并根据海德门的建议，决定将常设国际委员会（国际局）和总书记处，设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按照海德门的分析，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有以下 3 个方面的优越条件，使之能成为国际局书记处的驻地。这 3 个条件是：中立国地位；属比利时工人党所有的“人民”宫可作为书记处的办公地点；比利时工人党拥有的印刷厂，可作印刷资料、著作之用，以节约经费。经议题委员会提议，大会还决定建立由各国议会中社会党党团组成的国际议会小组委员会，“以便于在国际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它隶属于社会党国际局。大会还应在巴黎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要求，责成国际局书记处，筹组国际社会主义图书馆和文献馆。^①

按照巴黎大会的要求，关于建立国际局的决议，由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大会闭幕后，即着手物色书记处书记人选。9 月，有人提名胡斯曼，由于王德威尔得反对，未果。改而推荐塞维。10 月 31 日，比党由王德威尔得和安塞尔具名，向国际所属各国党的书记发出信函正式通知：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建议各党同意塞维为书记处书记候选人，希望作出选择，并告已决定由安塞尔（司库）、王德威尔得（主席）和塞维（书记）组成国际局执委会。11 月 18 日，在征得各国党同意后，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国际局的人事安排。12 月 15 日，社会党国际局发布第 1 号文件（通知书），宣告成立。《通知书》重申了巴黎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局等 3 项决议，再次明确了国际局的作用、任务和

^① 《历史资料Ⅱ》，第 70~71 页。

责任。至此，国际局的常设机构已经正式成立。它包括由各国1~2名（有的达3名）代表组成的国际局；由国际局所在地比利时工人党代表组成的执委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以书记为首包括2名雇员的书记处。

国际局成立时，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37名代表。几个月后，又增至23个国家和地区的43名代表。国际局成员国及其代表的数目经常变动，有正式代表、候补代表和通讯员之分。代表不能出席时，还可由人代替。一些国家的代表，由于财政限制和政治方面的障碍，经常不能出席会议。参加国际局的代表，必须由其所在国的党或社会主义团体认可和批准方可派出。

1900年12月~1905年2月，国际局书记处书记由塞维担任。后因他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期间的表现，引起国际领导人的不满被解除职务。王德威尔得提名胡斯曼。后者因为前者在1900年曾竭力反对自己，执意不肯接受。经过倍倍尔、饶勒斯等人的恳请，才让步答允。1905年2月8日，胡斯曼在国际文献中正式露面；3月4~5日，国际局第7次会议，正式确认胡斯曼的书记职务，并决定今后这一职务为常任性质。^①在胡斯曼任职期间，国际局的工作有较大进展，并逐步成为国际的真正执行机构。

2. 国际局工作方法问题的争论

国际局成立后，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开展工作。一是定期举行国际局全体会议，根据各国党的要求，讨论国际政治尤其是国际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二是不定期地发表各种宣言、通告，以加强国际联系，协调各国党的行动。举行国际局会议的建议，首先是由瓦扬提出来的。1900年12月25日，他在致塞维的信中指出：“国际局不能只限于用通信来组织行动，而有必要召

^①见“国际局第57号文件”。

开国际局委员参加的国际局会议。为此，你们可以选择在一个议会休假期內召开一次国际局会议；他们将和你们一起讨论你们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并规定以后会议的日期。”书记处征得各党同意后，决定采取这种工作和活动方式。全体会议，开始是每年举行1次，以后改为2次。到1914年7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共举行16次国际局全体会议。除个别外，大部分会议都在国际局所在地布鲁塞尔人民宫召开。①第1次全体会议，于1901年12月3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列入议程的，包括书记处工作报告、确定国际局成员、创办国际公报、筹备阿姆斯特丹大会和帝国主义政策等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关于国际局工作方法的争论。

国际局成立初期，书记处和执委会，曾就英国侵略南非德兰士瓦和土耳其屠杀阿尔美尼亚人民等事件，进行过干预，并号召各国党，在同一时间在议会进行质询、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以表示抗议。对于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德国代表辛格尔首先表示非议。他认为：“书记处不能要求各国的行动都采取同样的方式方法。议会质询、公众集会和示威等，不是经常能做到的。”他还补充声明：“如果有些党没有不折不扣地按照国际局的决议行事，并不是无纪律的行为，这是一个地点和环境的问题。”辛格尔主张，“国际局应该是一个收集资料、情报的中心，一个能为各国社会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文件和材料的中心。”②瓦扬支持辛格尔的主张，不赞成采取抽象空洞的国际行动，而应把重点

① 详见本书“附录3”。

② 据当时《前进报》报导，辛格尔希望书记处应只限于在有必要的地方，建议采取国际性的行动，而让各国自己选择行动的方式。按考茨基笔记记录，辛格尔的意见是限制书记处在政治方面的主权。“书记处不应该领导，而是提供情况。”见“国际局第10号文件”。

放在各国党的具体斗争上。每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体制行事，自己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和方法。据此，瓦扬不同意国际局就南非问题采取国际行动，认为应由当事国英国社会党人负责行动。除了某些严重的事件组织严肃讨论后采取统一行动外，不允许采取统一的国际行动。与此相反，法国代表利夏，却主张加强国际行动。他向会议提出了一项关于各成员党必须采取国际性行动的规则决议案（最后被否决）。其他成员党的代表，有些人，认为国际局行动过分了；有的人，则认为不够。国际局执委会主席三德威尔得和书记塞维认为，国际局的处境十分微妙。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国际性的行动才是有效的；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党内的意见分歧，使得国际局感到为难，执行国际大会决议的任务变得极其复杂。所以，国际局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只是在得到各党参加国际局的委员同意后，才采取国际干预行动，因而延缓了国际局介入国际政治事务的进程。①1902年12月29日召开的国际局第2次全体会议，继续在工作方式问题上进行争论。以海德门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每季度应召开国际局全体会议，以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自觉地介入国际政治；辛格尔、饶勒斯等则认为，海德门的建议，在实践中行不通。国际局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应把各国为此而作出的努力联系起来，而不是起领导作用。为此，饶勒斯、安塞尔、万一科尔提出了一项关于加强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以便无产阶级更实际有效地介入各种国际性事务的决议案，被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突出强调，各国党和国际局本身，都应对各种国际政治问题，进行更为经常、更为精确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报告和形成解决各种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这个决议，回避了国际局协同各国党以共同配合、

①见“国际局第10号文件”。

共同行动这个重要任务。^①

国际局成立初期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大大限制了国际局的活动。到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特别是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其间有几个因素，对国际局工作的开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一是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者统一”的决议，赋予国际局调解各国党内分歧的职权；其二，俄国1905年革命的爆发及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要求国际局采取果断措施，协调各国党的行动；其三，国际章程的制定，正式赋予了国际局“继续执行代表大会职能”的权力；其四，国际局的人事变动，取代塞维任书记处书记的胡斯曼，决心使书记处成为真正的国际执行机构，并声称要使国际局“变成社会主义世界的梵蒂冈。”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一度拘谨、裹足不前的国际局，在工作上有较大的改观。^②

2. 创建国际局的附属机构

按照1900年巴黎大会决议，国际社会党议会党团小组委员会隶属于国际局，并由国际局负责组建。1903年，书记处即着手工作。它要求各党的议会党团指定代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成立这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小组委员会。^③在1903年7月20日召开

①还在会议召开前两天，即1902年12月27日，饶勒斯即在《小共和国报》上撰文指出，国际局的重要目的，是筹备下届国际大会。他认为，国际局的任务，就是要选择它所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列入议程，以使国际大会的讨论，变得严肃而有成效。见“国际局第4号文件”。

②1905年，国际局共发出宣言、通告信和其他信件27件，比1900~1904年文件总和（26件）还多1件。

③到1904年8月15日，国际局召开第5次全体会议时，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德国的辛格尔；法国的桑巴、卢阿内；比利时的费尔内蒙；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万一科尔；瑞典的布兰亭等。见“国际局第22、24号文件”。

的国际局第3次会议上，塞维提出了国际议会小组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并要求解决该委员会代表参加国际局会议和是否拥有表决权以及每个国家的代表人数等问题。根据瓦扬、桑巴和辛格尔的提议，上述问题将提交阿姆斯特丹大会，并在大会期间由各国社会党议员集会就成立这一机构作出最后决定。1904年8月，阿姆斯特丹大会决定成立国际议会委员会，荷兰党议会党团被提名为该机构的临时执委会。大会结束不久，1904年8月27日，临时执委会向12国党的议会党团发出邀请信，请他们指定1名通讯员。9月，荷兰数名议员组成一个小组，作为国际议会委员会的情报局，代行书记处的职能，负责进行管理。1905年3月15日，临时执委会向各国议会党团寄送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组织方案。在此基础上，该委员会于1906年7月17~18日，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8个国家社会党议会党团的代表和国际局执委会成员，共30人。会议集中地讨论了荷兰情报局提出的组织方案。由于该方案对国际议会委员会和国际局的权限划分不明确，加之对是否有足够的财政费用来建立一个新国际机构问题，又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会议接受瓦扬的建议，决定在1907年召开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前维持现状，情报局将一直保留在阿姆斯特丹。同时，会议还决定，将组织方案的初稿，提交国际局全体会议审查。1906年11月10日召开的国际局第8次全体会议，对初稿进行了讨论，并就社会党国际议会委员会的权限及其同国际局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该方案最后为国际斯图加特大会批准。按照批准的《国际议会委员会条例》（国际组织章程的一部分）的规定，“国际议会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由社会党国际局书记担任”。每个国家社会党的议会党团，是一个情报局。国际议会委员会根据自己的力量，提供成员国所需的有关各国议会活动和方法以及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情报。国际局有权派遣代

表出席国际议会委员会会议，并参加讨论，提出决议案，在表决时有发言权。^①同时，斯图加特大会还确定，议会委员会的职能，是寻求实现国际局决议的手段。各国议会党团，必须向国际局书记报告工作。^②按照上述条例的规定，在每次国际局会议之后召开国际议会委员会全体会议。如有5个国家的议会党团要求，还可举行非常会议，以讨论国际局势发展提出的紧迫问题。但是，除了1906年、1907年、1908年、1909年召开过4次全体会议外，再也没有什么活动。

国际局成立时，并没有定期出版的机关刊物。只是利用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第1版，不定期地刊登《社会党国际公报》，发表来自各国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告、通知、消息、报导，以加强同各国党的联系。这种公报，从1901年6~11月，已刊出27期。^③1901年12月30日，国际局第1次全体会议曾讨论创办定期国际公报问题。因为经费限制，只得暂付阙如，改而把上述不定期公报扩大，除在《人民报》继续刊登外，决定在德国党的《新时代》、法国党的《社会主义运动》、荷兰党的《新时代》、英国的《社会民主》和比利时的《社会未来》等报刊上，利用其部分版面，用德、法、荷、英等文字，经常定期转载书记处的国际公报。遇有紧急情况，则由各国党的日报发表消息。^④尽

①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36页。

②见《国际斯图加特大会记录》。

③见“国际局第10号文件”。《人民报》一直到1914年6月，都为发表国际局的文件提供篇幅。见“国际局第5号文件”注3。

④见“国际局第10号文件”及注23、24。这个扩大刊登公报的计划，并未全部付诸实施。

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国际局同各成员党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成员党既不了解国际局书记处的工作和信件处理情况，国际局对各成员党内部情况也往往一无所知。因此，需要共同行动时，常为这种不利因素所贻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胡斯曼任书记后，从1905年2月起，用法文出版书记处的月度报告，发给各成员党书记和国际局代表。其内容，一部分是公开的；一部分是秘密的，涉及国际大会和国际局的活动、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党内部分歧以及各国经济政治情报。经过一年的试验，又补充了德文、英文摘要。胡斯曼还打算，只要情况许可，就出版一种用3种文字印行的定期刊物，以引起国际工人阶级的更大兴趣。经过近3年的积极筹划后，《社会党国际定期公报》于1909年正式出版。每年3期，一直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1913年。^①

成立国际文献图书馆和档案馆，也是1900年巴黎大会赋予国际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构成国际局初期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书记处向国际局每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经常涉及这方面的活动。国际局宣布成立的第1个通知书，就曾把同各国社会主义报刊建立联系、汇编国际代表大会各项决议，作为国际局目前最紧

^①这个刊物，曾得到高度评价。卡尔·格林贝尔格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中指出：“公报对于了解国际和了解各国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组织来源，是种极其重要的资料。因为它不仅刊登国际局的结构、组织和活动的消息，而且报导了正在进行中的国际和各国代表大会以及其他会议，还有这些会议的有纲领性意义的重要决议，影响范围极广的声明。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重要事实和事件。”转引自前述豪普特编《社会党国际局》一书前言。

迫的任务之一。为此，书记处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到1901年12月，已汇编前5次国际大会的文献，正式出版了《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日程和决议》，并着手收集世界社会主义报刊、历次大会记录、各种小册子和统计资料等。为推动这一工作，书记处于1902年7月16日，专门发出通告，号召各国党帮助国际局汇编世界社会主义文献和建立有关档案，以为国际社会主义图书馆打下基础。这个号召，得到许多国家党组织的热情支持。它们积极填写国际局发出的征询资料表格，提供有关书籍、文献和报告。^①1903年，书记处已拥有1,500册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图书，并编就一个目录索引。到1905年上半年，书记处从23个国家的党和工会组织，已收集1.5万册社会主义期刊。正是在此基础上，国际局以4,500法朗的代价（比利时党和工会组织提供了3千法朗），正式建立国际社会主义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规模，按胡斯曼的设想，它包括数以万计的期刊、19世纪上半叶各派社会主义的著作全集、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出版物、新国际历次大会的文献、各会员党的报告乃至人口统计等资料。它为宣传社会主义，研究国际工人运动，保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献和档案。尽管后来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图书馆被毁，大量档案文献资料散失，仍然有不少尚留人间，成为国际发展的历史见证。这是书记处特别是胡斯曼所立下的一大功劳。著名的国际史学家豪普特，在汇编社会党国际局的文献和档案时，就曾指出这一点。他写道：历史学家们曾经多次抱怨缺乏各种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档案资料。其原因，须从工人党的组织结构上去找。很少党组织曾考虑到应该筹集资金建立档案，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设备和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国际局的档案，却幸而是一个例外。国际局的书记卡·胡斯曼，既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一个优

^①见“国际局第13号文件”。

秀的组织工作者。早在1905年时，他就为国际建立了档案，而且规模还相当可观。”“根据我们对这些藏书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党国际的文件都是第一流的。”^①

3. 声援俄国1905年革命

根据国际事态的发展，在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间进行协调，以采取一致行动，这是国际局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成立后的10年时间内，国际局曾就国际政治中许多重大问题，采取国际行动。在这些重大问题中，包括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人民的疯狂掠夺和血腥屠杀，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各国反动派对社会主义者的残酷迫害，军国主义的现实危险和庆祝“五一”以争取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权利等等。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国际最为关注的，就是俄国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专制主义问题。国际局就国际事务所采取的第1个实际行动，就是为反对沙皇政府镇压大学生一事发表号召书。1901年2月，哈尔科夫大学183名大学生因为参加群众集会，而被沙皇政府强制“参军”，由此而激起学生反抗，并得到工人的支持。3月间，斗争蔓延到莫斯科、彼得堡、基辅、喀山、华沙等地，不断发生罢工和示威游行。最后，惨遭军警镇压。这一事件，立即引起国际局的重视。4月21日，由国际局全体成员党的代表署名发表的《号召书》强调指出：“最近几个月的事件，标志着沙俄帝国历史的一个转折。”《号召书》认为，随着情况的发展，斗争正在演变为严重而深刻的社会动乱，它震撼着整个俄国，甚至使俄罗斯社会的基础受到了威胁。《号召书》强调，“这是一种长期而痛苦的，然而却又是极其令人鼓舞的战斗。”^②如果说，当时大学生的骚动及其引起的社会动乱，还是

①《社会党国际局》一书前言。

②“国际局第3号文件”。

一种萌芽状态的话；那么3年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影响则更为现实、更为广泛、更为深远，国际局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更为深刻。国际局不仅在1904年4月25日专门发表宣言，集中地分析这个“1870～1871年战争以来的最严重的国际事件”，而且在1905年1月15日召开的国际局第6次会议上，通过瓦扬提出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和历次事件中兴起的革命力量，已经注定了沙皇主义的失败。”只有依靠英勇的俄国社会党，去促成沙皇主义的失败，这样才能结束一场对殖民地的掠夺性战争。同时，“决议”祝愿俄国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斗争，能尽早地使俄国和全世界摆脱沙皇主义的专制和束缚，“以使俄国无产阶级获得组织和进行解放行动的条件”。^①这个决议，包含着通过国内斗争结束殖民战争和争取反专制斗争胜利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的思想。这个思想，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又有新的发挥。

声援俄国1905年革命，是国际局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页。从革命一开始，直到它转入低潮，国际局始终密切注视着俄国事态的发展，不断采取实际措施，宣传、支持、肯定这场帝国主义时代的第1次人民革命，使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把国际局的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彼得堡星期日流血事件。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俄国首都彼得堡工人为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由加邦牧师带领，在冬宫前举行和平请愿游行，结果遭沙皇政府血腥镇压，上千人被打死，5千人被打伤。因此，全国掀起罢工、游行等抗议浪潮，引爆了俄国1905年革命。消息传出后，瓦扬于1月25日致函国际局，要求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们发表一个强烈而有力的宣言，并应预示这样一次伟大的革命将会引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第2天，国际局即紧急向普列汉诺夫转达。正在病中的普列

^①见“国际局第27号文件”。

汉诺夫，委托马尔托夫向国际局写了一个长篇的备忘录，介绍了俄国形势，并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理事会的名义，赞同瓦扬关于发表宣言的倡议。1月31日，国际局发表题为《谴责1905年1月9（22）日彼得堡屠杀事件》的宣言。《宣言》称刚开始的俄国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富有成果的事件之一”。在这场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他们的英雄主义，将保证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把这个罪恶制度摧毁”，从而肯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宣言》指出，在斗争中，人民“要求实行基本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在西方各国都早已获得”。这种分析，实际上，揭示了这场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同时，《宣言》认为，沙皇政府的血腥屠杀本身，加剧了阶级对抗，加强了反抗者的团结，“敲响了沙皇制度的丧钟”。这场斗争，虽然被镇压。但是，不久将会出现斗争的最高峰。因此，《宣言》号召各国党和工人组织，“采取一切行动，运用一切影响和鼓动方法，支持这一解放事业。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且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应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①这个宣言，曾被全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报刊转载，从而在革命一开始，就把国际工人阶级的注意力，吸引到俄国问题上来。饶有兴趣的是，曾鼓动和率领工人向沙皇和平请愿的加邦牧师，2月间来到俄国流亡者集中的日内瓦，以实行起义和为社会主义胜利创造条件为由，倡议俄国两个社会主义党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并通过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介绍，向国际局呈递了同样内容的声明。基于他在1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国际局于5月2日转发了这个声明，要求响应加邦建议，实行统一和联合。此事，曾在各国报刊引起强烈反响和认真讨论。但是，考茨基却强烈反对加邦的倡议。他在报上公开否认，同社会主义者接触不到几

^①见“国际局第28号文件”。

个星期时间的加邦，能帮助结束俄国各集团派别之间的论争。①

关于“波将金”号舰水兵起义。1905年6月27日，俄国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水兵起义，从而使一部分军队首次投入了无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这是1905年革命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事件发生后，列宁于7月4日致函国际局，要求动员世界舆论，援助起义水兵，并希望发表宣言，以制止外国战舰帮助沙皇政府镇压革命，防止欧洲各国人民充当绞杀俄国自由的角色。7月8日，列宁又要求国际局发表消息，揭露沙皇政府借助外国战舰镇压水兵的阴谋。对此，国际局均未作出反应。②7月，水兵起义失败后，装甲舰为海浪所困，被迫驶向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要求政治避难。俄驻罗使馆，试图向当局施加压力，将起义水兵引渡回俄。普列汉诺夫闻讯后，即于7月11日，致函胡斯曼，要求发起一场国际性的抗议运动，抵制引渡这一卑劣行动，并主张通过社会主义报刊，为起义者的合法权利进行辩护。第2天（7月12日），国际局执委会即向各成员党的代表、书记和社会主义报刊，转发了普列汉诺夫的信件，要求据此发起一次运动，以阻止从罗马尼亚引渡“波将金号”的起义人员。按照国际局的要求，罗马尼亚工人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专门成立了救援会，举行友好仪式，热烈欢迎离舰上岸的俄国水兵，积极地为他们安排工作，保护他们免受当局的迫害，使心情沮丧的水兵为之振奋。参与起义的水兵雷切夫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当他们沮丧地离舰时，“岸上却用雷鸣般的欢呼声迎接我们。欢呼声响彻云霄，传遍了整个海岸。成群结队的康斯坦察劳

①见“国际局第31号文件”及注1。

②见《国际局档案，2472号文件》，《国际局通信清单编号2145》；“国际局第44号文件”注4；《列宁年谱》，第2卷第143页。

动人民欢迎俄国革命装甲舰全船的水兵”。①

国际性的筹款活动。还在1月事件发生不久，国际局在1月31日的宣言中，就曾提出切实有效地帮助俄国革命的问题。2月8日，国际局应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鲁巴诺维奇的要求发出通告，邀请各国社会主义报纸，为俄国和波兰社会党开展募捐，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提供实际支持。②3月6日，胡斯曼又转发了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社会主义俱乐部支援俄国的决议。③在国际局的号召下，各国党和工人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地开展为俄国革命者筹款的活动。到6月1日止，比利时、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和俄国学生已筹款14,184,641法朗。④到1905年底，正当俄国无产阶级掀起武装起义的时候，住在瑞士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巴拉巴诺娃，致函胡斯曼，要求国际局支持瑞士境内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计划。她指出，俄国正经历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正处在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刻。一切决定于彼得堡的事态发展，而彼得堡革命者目前最缺乏物资和金钱，需要国际援助。如果欧洲无产阶级提供援助，斗争将延长，并能获得成功。为此，她要求国际无产阶级作出牺牲，并建议国际局发表宣言，以保证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为俄国革命献出1906年1月22日（俄国革命一周年）那天的工资。与此同时，比利时工人党也采取了类似行动，通报它所属的工会、合

①见《“波将金”号的水兵们》。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210页。

②见“国际局第30号文件”。

③见“国际局第32号文件”。

④6月6日，国际局又收到意大利寄来的4,500法朗，使筹款总数达18,681,64法朗。其中，比利时6,700法朗，澳大利亚125,60法朗，瑞典1,157法朗，荷兰1,251.9法朗，波希米亚2,539.85法朗，丹麦685法朗，意大利4,500法朗。见“国际局第36号文件”。

作社、政治联盟和其他社团，以上述实际行动，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国际局尽管认为，这是“一个成功可能性极为偶然的计划”，仍然同意上述建议，于1906年1月4日发表通告，号召为俄国革命贡献基金。国际局强调，要更有效地帮助那些正在为整个工人阶级事业英勇斗争的人们。“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他们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①按照国际局的要求，为俄国革命筹集资金的活动，在许多国家更加广泛地开展，一直延续到190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两次号召开展筹款活动。1905年11月，它已筹集11万马克。1906年6月，则高达30多万马克。英国仅独立工党，在1905年之内，就达1,000英镑。此外，象美国、奥地利等国也提供了相当的款项，由此而形成一笔数目可观的“俄国基金”。

对于这笔基金的分配，俄国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一开始，社会革命党企图独占这笔款项。为此，遭到卢森堡的强烈反对，并形成两个分配方案。按照鲁巴诺维奇和普列汉诺夫的方案，将整个筹款分成30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各占8/30，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各占5/30，崩得派占4/30。按照卢森堡的方案，将整个筹款分作20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各占4/20，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民主党各占5/20，崩得派占2/20。^②国际局于1905年6月1日，将这两个方案交各成员党组织表决。由于争执不下，而未付诸实施。直到1907年初，国际局才通知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鲁巴诺维奇，国际局所募集的“俄国基金”，将按以下比例，分配给各派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30%，社会革命党25%，崩得派15%，拉脱维亚工人党12%，波兰社会党10%，波兰和立

^①见“国际第55号文件”。

^②见“国际局第36号文件”。

- 陶宛社会民主党 8 %。①

关于对俄国革命的评价。1905年11月，包括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在内的一个美国小组，向国际局建议，在俄国革命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发表宣言。国际局采纳了这个建议。12月2日，以执委会及22个成员党全体代表的名义，发表了题为《纪念1905年1月22日的》宣言。《宣言》高度评价了作为俄国革命起点的“1月22日”，指出“这一天是俄国革命历史中决定性的日期”。它使人民睁开了眼睛，扫除那些对沙皇的迷信和幻想，“把战斗决定性地推向顶峰。这是工人阶级同一个罪恶制度的最后支持者们之间的一次生死决斗。”《宣言》在回顾俄国1905年革命发展的历程后，根据革命不断深入发展、人民节节胜利的事实，概述了这场革命的重大意义。它指出：“1905年这一年的历史，向全世界显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证实了1889年国际巴黎大会的预言：俄国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工人革命运动，才能取得胜利。”同时，《宣言》强调，由于无产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肯定的，而且由于沙皇制度的无可挽回的崩溃，所有欧洲的反动政权，都将从基础上发生动摇。《宣言》最后号召各国党和工人组织，隆重纪念1月22日这个历史性的日子，包括举行群众大会、游行、募捐，以各种方式支持正在反对沙皇制度、为共同事业而斗争的人们。②

在国际局的号召下，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和广大工人，以群情激昂的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纪念彼得堡“流血星期日”一周年。1月21日（星期日），德国19个城市，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下，举行了数以百计次的声援性集会。参加集会的工人，达数十万。这些集会，把纪念俄国革命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被称为德国的“红色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213页。

②见“国际局第53号文件”。

星期日”。^①1906年3月，胡斯曼在向国际局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令人难以忘怀的1月22日的示威所获得的成功，是书记处坚持不渝的行動的结果。俄国各派社会党给我们寄来了决议，向响应国际局号召的全世界各国社会党，表示兄弟般的感情。”^②

为声援俄国1905年革命，国际局及其成员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效。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俄国革命中涌现的苏维埃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和由政治罢工发展为武装起义这一质的转变，国际局却表现出了不应有的“疏忽”。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局并没有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俄国1905年革命的基本经验。

4.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国际局

北非的摩洛哥，地处战略要冲，加之交通便利，矿藏丰富，历来是列强的掠夺对象。20世纪初，法国在摩洛哥已有较大的势力。特别是1900年和1904年，通过同意、英签订协约，法国的扩张和特殊利益得到承认，并进一步加强了控制。因此，引起了世仇德国的不满。为了冲破英、法联合，向法国施加压力，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在首相陪同下，“访问”摩洛哥重要港口丹吉港，并公开扬言：“决心维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要求在摩洛哥同法国绝对平等，还对法国进行战争威胁。法国外长也表示，要对德国的挑战给以坚决回击。由此德、法关系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由此而形成第1次摩洛哥危机。面对这种国际性的危机，德、法两党的领导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以倍倍尔为代表的德国党领导人认为，摩洛哥危机，不会导致不寻常的事件，因而不必采取措施去影响本国政府，不主张开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253页。

^②见“国际局第57号文件”。

展实质性的行动。以饶勒斯、瓦扬为首的法国领导人却认为，要立即开展斗争，以防止战争危险。为此，他们在报刊和议会中，进行宣传鼓动，揭露本国政府的罪恶目的。国际中两个很有影响的党，对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态度一事，引起其他党的担心。1905年6月7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海德门致函胡斯曼，认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很有必要召开国际局全体会议，以避免德、法两党之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瓦扬当即表示赞成，倍倍尔却极力反对。在他看来，摩洛哥危机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变化，德国人也不会如此轻率地被卷入战争。因此，他认为，英国人（海德门）过分紧张，把事态的发展和性质，看得过于严峻。同时，他指出，不能夸大国际局的作用，它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国际局也用不着为一个不太严重的外交纠纷开会作决议。相反，倍倍尔主张，解决俄国党内的分歧，以实现各派的统一，却是国际局应予重视的问题。^①由于德国党执意反对，拟议中的国际局全体会议被迫推迟。

即令如此，瓦扬和法国社会党也没有放弃原有的想法。1905年7月21日、8月16日和8月24日，瓦扬以他和饶勒斯的名义，3次致函国际局，要求设法寻求最紧迫的国际性措施，以防止最近因摩洛哥事件而出现的战争威胁，并以严峻的口气，责备国际局书记处未及时函复，对他们上述创议也无下文。这时，书记处才转发了瓦扬的建议，要求各党认真讨论，并把它列入下次国际局会议的议程。为了在国际局内部充分展开讨论，瓦扬在8月30日在致胡斯曼的信中，全面阐述了关于防止战争威胁的措施。9月24日，法国社会党在巴黎召开的全国理事会又肯定这些措施，一致通过了关于反对战争措施的决议。1906年3月4～5日召开的国际局第7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瓦扬代表法国党提

^①见“国际局第38、40号文件”。

出的上述决议。“决议”指出：“一旦在各国政府之间发生秘密或公开的事件，有导致可能或实际的战争时，有关国家的社会党，应立即自发地并在社会党国际局的邀请下，进行直接接触，以便为避免并防止战争而确定和协调工人、社会主义者共同配合的行动措施。同时，国际局也应通知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同时尽快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以确定社会党国际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为避免和防止战争所应采取的最适宜的行动。”

这个决议，如同当时《前进报》所指出的，“它没有向任何社会主义组织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没有要求任何组织采取会损害自己的措施。”对于这种空泛的议论和以一切措施防止和避免战争的作法，就连国际局书记胡斯曼也表示怀疑。他在《社会未来》杂志上，谈及瓦扬建议时指出，“这样足够了吗？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按瓦扬建议所通过的决议去做，“这又能有什么呢？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主张，“决议”的目标应是总罢工。

“如果各国政府认为一旦发动战争，有关国家都将发生总罢工，他们自然会认真考虑。”但是，他也担心，组织是否强大，工人觉悟是否高，能否坚持在关键时刻行动。^①应该说，胡斯曼的这一席话，反映了国际一些领导人的矛盾心理。既想用坚决行动来反对和防止战争危险，又怕马失前蹄，打烂得来不易的坛坛罐罐。越往前走，逐渐用后者代替了前者，结果走上了用空洞的宣言来抵御实在的战争危险的道路。在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这种状况曾有所好转，但从国际大多数领导人的思想状况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还是摇摇摆摆地掉进了机会主义泥坑。一度采取激进立场的瓦扬、哈第等人，也概莫能外。

5. 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

国际的活动方式和组织原则，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随着

①见“国际局第57号文件”。

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不断用大会决议的形式作出规定。以出席国际大会的代表条件而论，就是按照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要求，以确认“政治行动”为中心，从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开始，经由苏黎世大会和伦敦大会，到1900年巴黎大会才最后作出完整、科学的表述，并为大会所批准。^①关于国际大会的表决方式也如此。头几次国际大会是按人头表决，每个代表都有1票。布鲁塞尔大会进而规定，原则性问题则以国家为单位表决。后来，又发展为凡有3个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必须按国家进行表决。国际伦敦大会，出于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需要，承认和吸收了许多民族的党和工人组织参加大会，因而出现一个国家包括多种民族的党或不同民族同处于一个党或组织之内的复杂情况。再加上一些党的分裂，使得一国一票的表决制度，难以为继。据此，巴黎大会作出新的规定，每个国家的代表团拥有两票表决权，使一分为二的党或工人组织，可以充分地表达两派之间的不同看法。但是，这种平均分配表决票数的制度，并没有解决大国大党与小国小党、一国一党与多国多党在反映意愿上的矛盾。对那些拥有庞大组织、广泛影响的大党来讲，无疑是一种束缚。这在巴黎大会关于入阁论争的最后表决中，已有表现。到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关于社会党国际策略准则的决议时，则尤为突出。主张不提谴责“修正主义”的阿德勒—玉德威尔得修正案，由于支持和反对的票数(21票)相等，按大会的表决规则被否决；盖得提出的决议，只是比它多4票(主要是来自小国或小民族小党的票)而被通过。此事，引起一些党特别法国党瓦扬和荷兰党万—科尔等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应该改变原有的、不足以反映各党地位和力量对比的表决方式。1904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局第5次全体会议上，瓦扬、万—科尔同一些朋友的交

^① 见本书第二章“四、对无政府主义的新胜利”。

谈中，就提出了上述看法。他们主张用一种新的表决制度，代替过去一人一票或一国两票的表决制度。^①与此同时，阿列曼派也提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已不是盖得派和饶勒斯派，作为第3派的阿列曼派，在国际中也应享有和他们一样的平等权利，原有的一国两票已不符合要求。阿姆斯特丹大会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通过王德威尔得的建议。它以不能容忍、鼓励分裂为理由，主张继续保留原有的表决办法。瓦扬关于由国际局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建议，也为大会所接受。于是，以国际局为阵地，以讨论出席国际大会和国际局的代表资格和表决方式为中心，开始了持续3年的制订国际组织章程的过程。

讨论国际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开始于1905年1月召开的国际局第6次全体会议。会上，围绕着要不要改变原有的表决制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以万一科尔、海德门等人为一方，竭力主张改变旧表决制度。他们根据各党或各个组织的力量对比，将其分为几类，然后按各党力量比例进行表决，使大国比小国拥有更多的表决权。海德门甚至主张，象卢森堡、芬兰这些没有政党的小国，就不要参加国际局。以卢森堡公国和保加利亚的党为另一方，反对上述主张。他们认为，表决实行比例制，没有好结果，小国会 被大国压垮，并将造成新的分裂。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中央为此郑重地声明，对原有表决制度的非议，源于阿姆斯特丹大会对德累斯顿决议的表决。要求改变表决制度，是为了压制支持德累斯顿决议的小民族的党和组织。该声明认为，要忠实地反映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发展，就必须使出席国际大会的国家和民族的党处于平等地位，不能听任几个大的社会党的摆布。面对看法上的根本对立，考茨基等人主张，对问题彻底审查后，交下次国际局会议再作决定。为此，会议决定由王德威尔得、塞维和

^①见“国际局第48号文件”。

万一科尔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负责审查各种建议。^①

会后，特别小组委员会尤其是万一科尔积极开展工作，并于7月间提出关于国际大会表决权 and 参加国际局各成员党代表表决方式的初步方案（“第1方案”）。1905年7月8日，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将这个方案分发给各成员党的书记和代表征求意见，以便博采众长，在特别小组委员会上制订出一个所有成员党都能接受的方案。“第1方案”包括两个部分。在第1部分“社会党国际局，参加国际局的代表权”中规定，国际局将由社会党国际各国支部指派的代表组成，每个支部可以由两名代表参加并出席国际局会议。至于哪些民族可以参加国际局，“方案”规定：“为反对同一政府而斗争的居民集团，被视为民族。”按照万一科尔的解释，除了英、法、德等单一民族或种族外，奥地利和匈牙利、芬兰和俄国以及卢森堡、加拿大、澳大利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等23个国家的党都有不同的民族，他们都将有各自的代表出席或参加国际局；而共同居住于一个王国的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在国际局内却不能有各自的代表，而只能由大党来代表他们；居住在高加索只是俄国人口1/50的22个种族，也属于这种类型。第2部分“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方式”主张，按出席大会的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各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力量规定比例，以使不同国家的表决票，具有不同的价值。同时为了保证小国不被大国压垮，拟按各自力量和其他因素，把各党分成不同类别，使之分别拥有2~6票不等的表决票。每个党属于哪一类，拥有多少表决票，主要是根据该党的力量、党的历史、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党的行为责任、党在居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斗争成就、向国际局缴纳会费的数额等。按照万一科尔的解释，如按类

^① 见“国际局第27号文件”。

分等，各党分别拥有2~6票，大致上8~9个大国的党所拥有的表决票数，同14~15个小国拥有的票数相等。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大会议程的细节问题上求得一致，并使大会的表决方式，对所有人都公正的情况下，按比例解决。^①

“第1方案”公布后，在各成员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论。不过，从书记处汇集的意见看，大多数党同意“方案”所提出的原则，一些小民族的党仍然对“方案”的指导思想作了严厉批评。俄国崩德派认为，万一科尔的计划什么也没有满足。他们认为，“方案”拒绝某些俄国党（包括崩德派和拉脱维亚党）在国际局的代表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原有分歧。他们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内部不能有特权的党”。保加利亚的哈尔拉考夫则认为，“方案”是那些对阿姆斯特丹大会决议特别是对关于社会党国际策略准则的决议感到不满的同志们提出来的。“公正、中立而无派性，按各民族的党的力量和重要性来分配表决权，这只是一种借口而已。”他们主张，仍维持原有的表决方式。这将为国际大会坚持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提供保证。^②通过听取各党的意见，国际局发现万一科尔提出的“第1方案”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参加国际局的代表权（第1部分），脱离了国际大会的表决方式（第2部分）。同样一个党，在国际大会上能发挥影响，却被排除在以“继续国际大会工作”为已任的国际局之外。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胡斯曼提出扩大万一科尔方案的第2部分，即把该方案规定的国际大会表决制度，扩大到国际局的代表方式中去，由此形成“第2方案”（胡斯曼方案）。

同“第1方案”相比，“第2方案”包含着一系列原则性的修改。首先，它根据1900年巴黎大会的决议，新增了关于参加国

①见“国际局第42号文件”。

②见“国际局第48号文件”。

际大会条件的条款，即下列组织均可出席国际大会：“一、一切承认以下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团体：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和国际行动；由组织成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夺取政权。二、虽未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并承认政治活动即立法活动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组织。”其次，它把“按民族表决”作为国际大会表决的首要原则，从而肯定了一切民族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都有出席国际大会和参加国际局的平等权利。至于表决票的等级，胡斯曼认为，应按力量比例分成2~10级，比原来2~6级更公正。再次，在国际大会和国际局的关系上，“第2方案”明确规定：“在承认出席国际代表大会各民族支部代表权基础上组成国际局，以继续代表大会的工作。每个民族，将按其参加上届国际大会时所拥有的表决票数，委派代表参加国际局”，从而避免了“第1方案”造成的有的党能出席国际大会却不能参加国际局的弊病。新方案公布后，得到各方面的好评，万一科尔也同意这样的修改，并撤回了他原方案的第2部分（“国际大会的表决方式”）。经过国际局特别小组委员会的讨论和一致通过，在补充修改“第2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出席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代表权调整方案初稿”（“第3方案”）。国际局执委会称这个方案为“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或者叫“规章方案初稿”。

同“第2方案”相比，新方案除了一般文字性修改外，有两处作了重要变更。根据波兰社会党代表的意见，考虑到波兰的特殊处境，在国际大会表决方式的第2款“民族定义”之后，新增加下述文字：“举凡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坚持具有向往自治和精神道义上的统一愿望，虽然附属于不同政府的居民聚居集团，也可被特殊地视为民族。”为了维护各个小民族的党的影响，使各国党尤其是俄国党内各派都能发表意见，各民族支部按级别拥

有的表决票，由原来的2~10票改为3~10票。这个调整方案，经过征询意见和讨论，还作过一些修改。其中，包括重新确认大会一般仍一人一票表决；如按国家为单位表决，表决票等级由3~10票改为2~20票；在原来参加国际大会的条件中，新增加了各成员党中央或书记负责转发国际局决议和转发参加大会邀请书等任务；维持每个党派两人参加国际局的原来决定，取消按大会表决票数确定参加国际局代表数等规定。

1906年3月4~5日，国际局第7次会议，对经过修改后的“第3方案”进行讨论。会上，形成了3种意见。以倍倍尔为代表的一种看法认为，如接受万一科尔方案，将会使国际出现分裂的危险情况；以胡斯曼方案为基础的调整方案也不够简练。倍倍尔主张，国际大会在某些情况下，应按人头表决。^①以饶勒斯、瓦扬为代表的一方主张，代表权应建立在民族支部基础上，使民族支部成为各民族的唯一机构。^②来自拥有多民族的斯拉夫国家的代表，则要求保证一个国家中各个不同民族在国际中都有代表权和表决权，要求在这个问题上维持现状。^③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在保留意见的情况下，把修改后的第3方案，提交斯图加特大会最后裁定。1906年11月，国际局第8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第3方案”，并决定将它提交国际斯图加特大会通过。关于各国党表决票数的分配，1907年7月在斯图加特大会召开前举行的国际局会议，按照倍倍尔、阿德勒、万一科尔、瓦扬、海德门等5人建议，确定了如下分配方案：德、奥、捷、法、英、俄

① 历次国际大会，除东道主的社会党代表团外，德国党代表团是人数最多、最庞大的代表团。

② 1905年，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实现了统一，建立了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③ 见“国际局第57号文件”。

各20票；意大利15票；美国14票；比利时12票；丹麦、波兰、瑞士各10票；澳、芬、荷、瑞典各8票；西、匈、挪各6票；南非阿根廷、保、日、罗、塞尔维亚各4票；卢森堡2票。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对有不同民族、不同派别国家拥有的表决票的分配，作了进一步的确定。1913年12月国际局会议对即将召开的维也纳大会的表决票数又作了调整，因为这次大会未开成，分配办法也未付诸实施。

1907年8月20日，国际斯图加特大会通过修改后的第3方案，它被正式称为《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它和大会通过的《国际议会委员会条例》一起称为《国际组织章程》。

《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包括6条9款。其中，第1条，规定了出席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条件。第2条，规定了各成员党（支部）的组成及其任务。“每个国家或民族的各政党和组织组成一个支部，它应当接纳该国或该民族的所有政党和组织。”各支部的全国委员会，应向其成员转交出席国际大会的邀请以及国际局通过的决议，并按规定的程序向国际局提交、分发提案。第3条，肯定了国际局方案中提出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规则。第4条规定，以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各民族支部的代表权为基础建立国际局，每个支部可以派遣2名受委托的代表。同时，《章程》还规定：“国际议会委员会的各民族书记具有社会党国际局副代表的资格，并且可以以这一资格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第5条，规定了国际局的机构，包括常务书记、书记处（常驻布鲁塞尔）和执委会（由此利时代表团行使职能）。第6条规定，每个成员党应定期向国际局交纳会费。^①

七、深入发展中的国际及其成员党

1. 国际自身的发展

^①《文献选编》，第3卷第133～136页。

：国际有它自身发展的历史。从1889年问世以来，尤其是1900年巴黎大会之后，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世界性政党”的国际，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其力量也在不断地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它已成为国际舞台上—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从出席国际大会的代表情况看，参加1889年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开始有来自19个国家的391名代表(最后增至407人)，其中法国代表占53%左右。到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与会者有来自23个(排列座位的是28个)国家的896人，东道国丹麦代表仅占总数16.3%。国际工人协会从1864年成立大会，到1876年费城代表会议，出席历次大会和会议的代表总数，包括出席成立大会的2千人(大部分是英国工联的成员)在内，只有2,459人。①人数最多的一次大会(1868年布鲁塞尔大会)才99人，②伦敦代表会议才23人。③值得注意的是，新国际历次大会代表的构成，也有很大的变化。参加1889年成立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来自工会、合作社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作为真正工人政党的代表并不多。由于各国工人政党的普遍建立，到1913年10月，参加国际局的已有27个国家的41个党。从历次国际大会名称的变更，也可证实这一点。国际的前5次大会，一直没有固定的名称。有时叫“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巴黎大会)，有时叫“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苏黎世大会)，有时叫“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伦敦大会)。直到1900年巴黎大会之后，一直沿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这个名称。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

①相当于1912年前新国际大会代表数的46.1%。

②相当于1889年巴黎大会代表总数407人的24.3%。

③相当于1889年巴黎大会代表总数407人的5.65%。见本书“附录2”。

无论是旧国际还是新国际的前几次大会，代表几乎完全来自欧、美主要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东方落后国家和西方小国，并没有在国际中占据应有的席位。这种情况到新国际的后期有所改变。不仅欧洲一些小国小民族如卢森堡、芬兰、塞尔维亚的党和工人组织，在国际中的席位得到国际组织章程的确认，而且继阿根廷、南非之后，日本社会主义团体从阿姆斯特丹大会开始出席国际代表大会。其领导人片山潜，还成为国际局中远东国家的唯一代表。^①不久，又传出中国社会主义者将派代表出席斯图加特大会的消息。^②这些事实表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际已开始越出传统的欧洲国家范围，成为一个包括有欧、美、亚、非各种民族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参加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对于国际的这种发展，国际局书记处的态度十分鲜明。还在1901年12月国际局第1次会议上，塞维就已经把收集、整理、汇总欧、美、亚洲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献史料，作为书记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于1905年在国际局第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出版了文献著作《欧洲、美洲、亚洲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

^①本来，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已决定派村吉发吉为代表，出席1900年巴黎大会，后因资金缺乏未能成行。为此，片山潜专门向大会主席团发去贺信说明。他指出，尽管不能与会，但要“让大会从信中尽量得知社会主义思想也是扎根于遥远的东方。”饶勒斯在宣读信后也指出：“正是在远东成为战场的时候，社会主义精神在那里苏醒起来。”片山潜以日本代表的身份，正式出席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并受到热烈欢迎。

^②详见本书第六章“一、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交往的先行者”。

从各国党的发展情况看，进入20世纪以来，这方面有长足进步。19世纪末，欧洲、北美各国约有30万党员；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全世界的社会党党员已达240万，为19世纪末党员总数的8倍；^①1912年，据比、丹、德、芬、法、英、意、荷、挪、奥、瑞典、瑞士、西、匈、美等15国统计，社会党党员已达360余万，为1900年党员总数的12倍。其中，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97万）和英国工党党员（189.5万）为最多，分别约占总数的26.9%和52.6%。美国、荷兰、芬兰的增长率为最高。以1912年和1900年相比，它们分别增长11.5倍、3.89倍、4.65倍。^②以上数字统计，尚不包括欧洲的一些小党（如捷克、波兰的社会党）以及中国、日本、阿根廷、智利等国社会党党员总数，也不包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已于1912年实现党的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总数。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党在发展过程中，女党员的数量和比例有显著的提高。以德国党为例，1907年，有女党员2.94万，占党员总数（53万）的5.5%；1912年，增长到14.1万，占党员总数（97万）的14.5%。^③到1914年，上述15国党员总数达420万。^④

从在议会活动中的影响看，20世纪初，各国党普遍投入了议会选举和议会活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00年前后，约有440万选民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在10个国家的议会中，共有207名议员。1909年，据国际局对19个欧、美国家的统计，社会民主党获得选票744.7万，已有15个国家的478名社会党代表进入本国议会。^⑤按获得的选票数，以德国党最突出。1907年，它所获

①见《德国工人运动》，第599～600页。

②英国工党是集体吸收党员，189.5万党员中有185.1万同时又是工联（工会）成员，见同上书。

③见《国际运动史》，第102页。

④⑤见《德国工人运动》，第599页～601、598页。

票数是325.9万，占上述总票数的43.7%；1912年，它又获425万票，相当于1907年的130.4%。^①按在国会中所占的议席数，以奥地利党最突出，它于1907年大选中，获得88席，占上述社会党议席总数的18.4%，为同年德国党所获议席总数的两倍。以上数字，还不包括俄国党在内。按照列宁提供的数字，在1913年的杜马选举中，选出孟什维克代表的7个俄罗斯选区的工人选民为21.4万人；布尔什维克代表的选区选民却高达100.8万。^②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后起的拉美国家的社会党人，在这期间也开始了议会选举活动。1904年，阿根廷社会党人被选入议会；1906年，智利社会民主党人列卡巴连当选，成为拉美第2位社会主义议员。1912年，阿根廷社会党，又获得两个议席。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所属成员党已拥有1,200万选票、698个议席。^③

新国际，不仅是各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联合，也是各国日益强大的工会组织的联合。不少国家的工会，其发展已远远超过党的发展。到1912年，19个欧美国家的工会、总工会，已拥有739万会员。其中，德国会员255万，相当于党员总数（97万）的263%；法国总工会38.7万会员，比社会党党员总数（6.36万）多出32.34万。^④随着各国工会会员成倍地增长，各种工会机构，各式工会官僚，各种经济政治要求也应运而生，由此产生了工会和党组织的矛盾，甚至造成党组织屈服于工会组织压力、迁就工会领导人改良主义要求等怪现象，引起国际内部无休无止的论争。

2. 工人国际组织的普遍建立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260，302页。

②参见《三个国际的历史》，第224页。

③见《世界工会运动史纲》，第281~282页。

④见《三个国际的历史》，第224页。

工人组织（包括工会、青年、妇女、合作社等组织）的国际化，是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新国际及其成员党影响不断扩大、力量不断增强的突出表现。

建立工会国际组织，是从按行业国际联合开始的。1900~1912年，相继组建了一批行业性工人国际书记处，其中，包括石匠、建筑木工（1903）；机器、店员、伐木工人（1904）；钻石工人（1905）；皮革制品工人（1906）；面包糕点工人、建筑工人、装订工人、产业工人、理发工人、公共服务业工人、制鞋制革工人、制陶工人（1907）；玻璃工人（1908）；酿造工人（1910）；粉刷工人（1911）等国际书记处或国际联盟。到1912年，已拥有32个行业工人国际书记处，350万会员，其中大部分（27个）设在德国。^①与此同时，各国中央工会的国际联合也在加快步伐。1901年8月，由丹麦工会联合会主席倡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第1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建立常设国际工会书记处，以为各国工会提供情报信息。^②1902年6月在斯图加特和1903年7月在都柏林召开的第2、3次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就是否建立国际特别委员会问题达成妥协，确定把国际书记处设在德国，并改名为各国总工会国际书记处。当时，有德、英、法、比等14个国家的中央工会加入，共有237.8万会员，1913年达到20国和750万会员。^③书记处的任务是：在各国罢工时，组织国际声援；制定统一的国际统计办法；协助各国工会交换有关法律、规定等文献资料。从1904年起，书记处开始发表工会运动的年度报告，介绍书记处活动，通报各国工会运动和工人的状况；1912年开始散发各行业工人国际

①《德国工人运动》，第613~615页。

②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丹、德、英、挪、芬、比、瑞典的代表，德国工会领导人列金参加并主持会议。

③参见《三个国际的历史》，第162页。

书记处的报告。1905~1914年，书记处曾先后召开5次各国总工会代表会议，涉及总罢工、反军国主义、党和工会关系等问题。但是，书记处领导人列金却处处作梗，而且还强行通过决议，规定“一切理论问题和有关工会运动的倾向和策略问题”均不在会议讨论之列。^①因此，国际工会书记处，就不可能在重大的转折关头，充分发挥其宣传、协调、组织国际工人阶级的作用，它实际上成为列金在国际范围内扩大其影响、推行其改良主义的工具。

同国际工会组织不一样，国际妇女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一直处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和指导之下。还在1889年国际巴黎大会上，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蔡特金曾提议，应将劳动妇女的解放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将妇女视为社会革命的一种基本力量。但是，大会并未作出相应决议。1896年伦敦大会期间，大会的部分女代表，曾聚会商议建立国际妇女联络处的问题，以加强社会主义妇女的国际联系。这个建议，当时也未付诸实施。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特别是1906年德国党妇女代表会议的倡议，第1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于1907年8月17日和19日，在斯图加特召开。会议议程包括听取各国妇女代表的报告、建立国际总部和争取妇女选举权等内容。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在德国建立国际妇女书记处。其任务是推动各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全面通报和交流情况，为争取妇女的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而斗争。《平等》杂志是它的机关报，杂志编辑部是书记处驻地，蔡特金被选为书记。1910年8月26~27日，利用各国党女代表齐聚哥本哈根参加国际大会之机，书记处召开了第2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由上次15国58人，增加到17国100多人。会议除了讨论并通过有关妇女选举权的决议外，专门讨

^①见《德国工人运动》，第618页。

^②参见《大事记》，第1卷第262~263页。

论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各国妇女为贯彻国际大会决议，反对军国主义危险、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并规定了社会主义妇女所应承担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年的特殊任务。会议根据蔡特金等代表的建议，要求以美国芝加哥妇女为榜样，①在征得本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妇女，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主要是用来争取妇女选举权而进行的宣传鼓动的节日。这个节日，“应当具有国际性质，并认真作好准备。”②这个关于国际妇女节的决定，是书记处为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投入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所采取的重大步骤，也是蔡特金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妇女运动所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书记处的号召和组织下，在各国党和工会组织的热情支持下，1911年3月19日，德、奥、瑞士、丹麦等国100万妇女和男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庆祝第1个国际妇女节。争取民主、和平，争取妇女平等特别是选举权，成为节日游行的中心内容。德国仅柏林及其郊区就有4.5万人参加了42次集会。③由于国际妇女书记处的广泛动员、组织，欧、美国家的妇女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动员妇女投入政治生活，加入政治组织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从各国向第2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报告看，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女党员人数从1908年的3万人增至8.3万人；1908~1910年，加入英国工联的女工，从15万增至20万；参加奥地利社会党的女党员，增加1

①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的女工同全国纺织、服装工人一起，为争取自由平等、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日和获得选举权，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游行，充分显示了妇女在斗争中的威力，并得到欧、美许多国家工人的支持和响应。

②见《德国工人运动》，第605页。

③见《大事记》，第1卷第295页。

倍。^①第3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本拟于1914年8月同国际大会同时召开，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搁置下来。

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组织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德国党著名的反军国主义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1906年9月30日，他在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不久改名为青年男女工人联合会）第1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青年和军国主义》的报告。“报告”揭露了军国主义的实质，强调了对青年进行反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就在这次大会上，李卜克内西等人发起召开国际青年代表会议，得到各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支持和欢迎。在比、挪、瑞典、瑞士、意、荷、奥、丹、法、西、匈、捷等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支持下，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联络处书记处于1907年3月在莱比锡建立，由德曼任书记，李卜克内西任顾问。书记处的当前任务，是了解和掌握各国青年组织发展的情况，探求向青年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反军国主义教育的方式，并为召开青年国际会议积极进行准备。进入20世纪之后，继比利时等国之后，相继在捷（1902）、芬（1901）、意（1901）、挪（1903）、奥（1903）、瑞典（1903）、瑞士（1906）、西（1906）、匈（1905）等国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全国联合会。在书记处的具体组织下，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第1次国际代表会议，于1907年8月24～26日在斯图加特举行。会议听取了李卜克内西关于反军国主义的报告，通过了体现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决议精神的反军国主义决议，并就正确处理青年组织与党的关系、改善青年工人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国际，选出以李卜克内西为主席的国际局，常驻维也纳。紧接着每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代表会议，是它的主要活动方式；以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开展反军国

^①见《向第2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报告汇编》。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550～551页。

主义的斗争，是它活动的主要内容。青年国际成立后，曾先后于1910年、1912年分别举行代表会议。到1909年，它已成为一个包括18个国家的青年组织、拥有12万名成员的国际组织。①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合作社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它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1895年8月合作社国际联盟成立后，也曾吸收社会主义合作社组织为其成员，但不接受甚至反对社会党的干预和影响，奉行所谓“中立”原则，以资产阶级博爱主义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宗旨。到1904年9月的第6次代表大会，由于社会主义者的努力，情况有所改变。大会通过的决议把合作社运动视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运动，并主张拒绝资产阶级的援助。即令如此，该联盟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在1910年第8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修改联盟章程，明确地规定，联盟“应当避免对一定的学说和原则承担义务”。实际上，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对合作社运动的指导。其总书记米勒甚至公开主张，“战胜占支配地位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重新获得唯心主义世界观而奋斗”，从而为在国际合作社运动中传播机会主义、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提供了市场。这种局面的形成，同各国党特别是在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德国党对合作社运动不够重视有关。在德国，合作社运动一直处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相当一部分工人，并没有接受党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加之德国党为了赢得更多选票，对处于资产阶级影响下的合作社，采取一种放任政策，以致使合作运动的性质和方向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国际长期以来也没有认真讨论合作社问题，到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才开始接触，而且拒绝了列宁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一个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②到1913年8月举行第9次合作社组织国际代表大会时，

①详见《德国工人运动》，第606～611页。

②见《历史资料Ⅱ》，第173～174页。

加入合作社国际联盟的组织，由1910年的904个，增至3,926个。但是，联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①

3. 无产阶级反战的国际运动

在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上，出席国际历次大会的各国代表，由于看法不尽一致，陷入了无休止的论争。但是，各国工人阶级对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的现实危险，却表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忧虑。随着国际局势不断加剧，战争阴云四处弥漫，群众性的反战斗争，开始成为一种日益广泛的国际运动。这是1911~1912年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个过程中，1911年7月1日爆发的第2次摩洛哥危机和1912年10月8日爆发的第1次巴尔干战争，直接酿成了反战国际运动的两次高潮。

1905年爆发的第1次摩洛哥危机，一度使德法关系空前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经过较量，特别是通过1906年9月14日在西班牙召开的国际会议，德国不仅没有达到打击法国、削弱英法协约的目的，反而促进了英、法、俄联盟，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得不作出让步，签订了使法国继续控制摩洛哥的国际议定书。第1次摩洛哥危机以其挑动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列强尤其是德、法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缓和下来，时机一旦成熟，又会重新激化。1911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附近发生武装暴动，法国以维护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对摩洛哥实行全面武装占领。此举，引起了德国政府的强烈反应。7月1日，德国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豹”号和“柏林”号战舰，驶入摩洛哥海港，公开向控制摩洛哥的法国挑战，史称“‘豹’的跳跃”。英国、法国声称，战端一开，即履行英、法协约的义务，冒一切危险以保持它在世界

^① 见《德国工人运动》，第620~622页。

列强中的威信和地位。由此而使德国同英、法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面对着国际事态的这种新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率先奋起斗争。摩洛哥危机爆发的第2天（7月2日），勃兰登堡、科特布斯、芬斯特尔德、福尔斯特、法兰克福（奥得河）、古本等城市，即举行抗议集会。7月4日，柏林的集会多达31次。李卜克内西等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在摩洛哥的冒险行动。7月6日，国际局决定召开世界各国社会党会议，以抗议帝国主义在摩洛哥的政策，并动员各国工人为反对战争危险而斗争。德国工人不顾党的领导人的消极反对，把反战活动进一步推向高峰。8月间，在慕尼黑、莱比锡、曼海姆等地，举行了有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大规模抗议集会。9月2～3日，柏林20万群众举行“反对煽动战争、捍卫各国人民和平”的示威集会。有20个社会民主党人，在10个讲台上，发表反战演说。李卜克内西在演说中指出，为了争取和平，应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以战争反对战争”。这次示威，集中地反映了德国工人群众反战情绪的急剧增长。与此同时，法、英等国的群众也开展了抗议活动，并在集会上发出了“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战争”的号召。

这个期间的反战运动，已经成为一场广泛的国际运动。国际局发出反战号召不久，1911年7月16日，来自德、奥、意、瑞士等国的社会党人，在瑞士阿尔邦，举行有8千人参加的国际反战集会。会上，许多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政策的演说。集会还一致通过决议，号召各国工人坚决贯彻1907年国际斯图加特大会的反战决议，竭尽全力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国际大屠杀。8月13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有许多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反战示威。11月5日，社会党国际局执委会，在圣保罗练马场首次举行反战集会。著名的国际活动家桑巴（法）、饶勒斯（法）、王德威尔得（比）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

积极支持国际局于11月2日发出的进一步开展反战活动的号召，并一致通过由王德威尔得宣读的决议案。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反战集会上，来自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的社会党人，号召各国工人，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在这场反战的国际运动中，摩洛哥危机直接对峙的德、法两国的工人阶级，显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共同战斗的革命精神。危机爆发后，德、法两国工会代表团，于7~8月间互访。在各自首都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两国工会领导人，表达了增强团结、反对本国政府对外冒险政策和共同开展反战斗争的强烈愿望。9月17日，根据社会党人的倡议，两国1.5万名代表，在边界附近的勃尤桑村举行友好会晤，共同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本国政府把和平人民拖向战争的强烈要求。

由第2次摩洛哥危机触发的反战国际运动尚未止息，1912年10月8日爆发的第1次巴尔干战争又把它推向新的高潮。尽管巴尔干战争是被压迫民族保、希、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反对压迫民族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但是，由于俄国和德国等列强插手和干涉，而变得极其复杂。由英、法支持的俄国为一方同德、奥、意为另一方的严重对峙，有导致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冲突引爆世界战争的危险。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反战国际运动。

在这场反战运动中，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战争一爆发，列宁即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草拟《告俄国全体公民书》，集中地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俄国沙皇的战争冒险政策，论述无产阶级反战的革命任务。这个文献，最初发表在俄国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由列宁译成德文寄胡斯曼，要求他将这个文献转交国际局各成员党书记和各国社会主义团体。1911年10月13日和14日，这个文献，以《打倒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书》为题，在德国《莱比

锡人民报》和《前进报》发表，对国际工人运动发生了巨大影响。^①与此同时，列宁直接领导的《真理报》，根据党中央国外局会议讨论的精神，就巴尔干战争发表文章，严厉警告各帝国主义政府：“欧洲战争将引起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运动，并将导致深刻的社会动荡。”^②11月17日，列宁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针对着考茨基否认无产阶级反战运动，抹煞战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主张，明确规定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方针，要求党面向无产阶级的、积极的群众性革命行动。俄国无产阶级正是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号召组织下，不顾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形式，积极地开展了反战的抗议活动。1912年，俄国共发生罢工2,032次，是1908~1911年罢工总数（1,920次）的105.8%，投入斗争的有72.5万人，相当于1908~1911年罢工人数（39.2万人）的1.84倍。^③

这次反战的国际运动更有组织、更加主动。巴尔干战争爆发前夕，国际局执委会即向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社会党人提议，起草关于巴尔干冲突的宣言，应按照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大会决议精神，寻求尽快解决冲突的办法。“宣言”指出，巴尔干的社会民主党人要全力支持世界无产阶级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支持它为争取自由、平等、民族解放而斗争。“宣言”写成后，国际局将它分发给了国际所有成员党。^④战争爆发不久，国际局书记处又于10月间采取多种形

①见《列宁年谱》，第3卷第61、62页。

②见《真理报》，1912年1月1日。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493页。

③见《罢工斗争》，第91页。

④《社会党国际定期公报》，第9期第4页。

式，号召工人积极投入斗争，并于10月28~29日，召开国际局会议，作出召开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还就巴尔干战争专门发表反战宣言。11月初，由于国际局势进一步恶化，胡斯曼以国际局书记名义，通知各成员党，欧洲几个大城市的工人将于11月17日同时举行反对扩大战争的示威游行和集会。^①这一天，在国际局的倡议下，欧洲各国首都普遍举行了有外国党的代表参加的国际性抗议集会。在柏林举行的15万人反战示威游行行列里，就包括饶勒斯以及来自英、奥等国的工人政党代表。此外，李卜克内西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党的加香在斯特拉斯堡、国际局及比利时党的安塞尔在伦敦、德国党的莫尔肯布尔和谢德曼在巴黎参加集会并发表演说。这些集会，一般都通过了反战决议，强调各国工人在反战运动中必须统一行动，以防巴尔干战争蔓延至整个欧洲。

无产阶级反战的国际运动，进一步推动了罢工斗争的发展，以英、德、法、俄、美5个国家为例，1912年罢工总数（7,811次），相当于1911年总数（6,011次）的120%；参加罢工的人数（392.7万人），相当于1911年（205.6万人）的191%。其中，俄国最为典型，罢工总次数增长1.36倍，罢工总人数增长5.9倍。^②

4. 德国党内日益严重的危机

1900年以来，国际在它的5次代表大会上所开展的多年内部论争中，由于卢森堡、列宁、李卜克内西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曾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通过许多正确的决议，它并经由国际局的

①见《列宁年谱》，第3卷第65页。

②见《罢工斗争》，第64、73、91、100、114页。

③列宁认为，这些决议“对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方针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66页。

组织和发动，掀起了声援俄国1905年革命和反对战争威胁的国际运动，进一步显示了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生机活力。但是，论争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和问题，尤其在当时最有影响的、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德国党内，表现得尤为突出。还在1907年，蔡特金谈到德国党在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的表现时就曾指出这一点。她说：“不能单靠众多的选民，不能单靠强大的组织——尽管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来保持国际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地位。在当前的大论战中最鲜明、最革命的立场无论如何是保持这种地位的必要条件。”^①如果说，这些弊端和问题，在前几次国际大会中还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那么到哥本哈根大会之后，随着战争日益逼近和内部论争的不断深入，德国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同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却越来越不相称。这种矛盾本身，就蕴含着势必导致党和国际公开分裂的严重危机。

关于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针。1910年，对德国国内政治生活来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这年年初，普鲁士政府通过公布修改过的选举法，拒绝了广大群众关于废除议会“三级选举制”的要求。^②因此，引起强烈不满，以柏林为中心，掀起

①转引自《德国工人运动》，第599页。

②这个选举制，是普鲁士议会于1849年5月30日通过政变而强行通过的。它按照承担直接税的多少，将选举人分为3级。承担直接税越多的等级，产生代表和议员所需的选票数就越少，反之亦然。这是极不平等的选举制，其目的在于保证人数少、选民不多的统治阶级在议会中的决定性影响，而将拥有众多选民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竭力排除在议会之外。以1908年为例，当年选民第1等级293,402人，第2等级1,065,240人，第3等级6,324,079人。通过选举，社会民主党拥有59.8万张选票，只得7个议席；而保守派的选民只有41.8万，却获得212席。参见《国际史》，第1卷第317页。

了一个反对和废除“三级选举制”的示威、集会、罢工的浪潮。仅柏林一地，3月6日参加示威的群众就达15万人。进入4月，斗争达到高潮，不少地方的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事态的发展表明，“德国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伟大的革命斗争时代正在到来。^①在新形势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不要更新斗争方式和采取正确的策略方针，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还在1月初召开的普鲁士邦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就已明确提出，要进行体制改革，以便通过在议会外广泛地开展消灭半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和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斗争，把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向前推进一步。大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在必要时宣传和运用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正是上述思想的体现。^②2月23日，李卜克内西又进而提出，采取人民运动的办法，一定会使“群众冲击……对整个普鲁士统治……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带有危险性。”^③卢森堡同李卜克内西完全一致。她认为，在坚持进行议会内活动的同时，必须加紧利用议会外的斗争方法，并克服党内上层人物回避讨论这个问题的阻力。为此，她要求让最广大的党员群众都能参加讨论，应该由群众自己决定。“我们的任务是给他们提出赞成或反对的论据。”^④

为了完成这个“提出论据”的任务，卢森堡为《前进报》写了题为《还要做什么？》的文章。由于该报同党的执委会和邦的党常委会就不在报上讨论政治罢工问题已达成协议，因此拒绝刊登此文。卢森堡遂将它交给主持《新时代》的考茨基。考茨基开始答应刊登，后来又以文中提出关于以民主共和国代替君主专制的主张不能接受为由拒发此文。结果，该文分别以《还要做什么？》和《播种时刻》为题，发表在《多特蒙特工人报》（3月14～

①《列宁全集》，第16卷第303页。

②见《大事记》，第1卷第280页。

③④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176页。

15日)、《人民哨兵报》(3月25日)上。3月底,14家地方报纸转载。为此,这些报纸编辑部遭到党的执委会的斥责。

4月8日和15日,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现在怎么办?》一文,公开反对卢森堡关于实行群众性政治罢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他和党的执委会站在一起,拒绝讨论政治罢工问题。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反击考茨基,卢森堡在基尔、不来梅、佐林根等地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同志们一致热烈的称赞。”相反,“卡尔(考茨基)的文章却使人们困惑不解”。^①鉴于她在群众中的影响,考茨基一直拖延发表卢森堡的反驳文章,一直到5月底,才在《新时代》发表卢森堡的《疲劳还是斗争》一文。卢森堡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议会内与议会外斗争的关系,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考茨基拒绝政治罢工的主张。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1912年9月德国党的开姆尼茨大会前夕。在此期间,卢森堡发表了《现在怎么办?》、《理论与实践》;考茨基写了《巴登和卢森堡之间》等文作答。论争是由如何看待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引起的。实际上这是一场在新形势下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采取什么策略方针的原则论争。它集中地暴露了德国党乃至整个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下述分歧和对立。

在形势和策略重点的估量问题上,卢森堡认为,已经掀起的反对“三级选举制”的群众性斗争表明,德国第1次出现了超出议会斗争的群众运动,形势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党的任务就是要顺应群众情绪,提出率领他们前进的口号,使之团结起来,进一步推进议会外的街头示威、群众性政治罢工等更为激烈的斗争,用以代替单一的议会主义策略。因此,她主张,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宣传和采用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手段,并进而以民主共和国代替德国现存的君主专制。考茨基并不否认形势的急剧发展,也认

^①见《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177页。

为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物价飞涨、赋税增加和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确实引起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当局的不满和对党的支持。但是，他认为，这种形势尚未导致与统治阶级的决战，而有利于党参加行将到来的（1912年）国会大选。因此，考茨基主张，党在现阶段的策略重点，应放在争取应届国会大选的胜利之上。等到取得应届国会大选胜利之后，同统治阶级的决战就将不可避免。只有到那时，决定成败的群众性政治罢工，才能予以考虑。在此之前，应绝对地避免任何急躁的行为和无效地浪费力量。在目前形势下，宣传和实行群众性政治罢工是有害的，企图以此在短时间内打垮仍然十分强大的君主统治，是极为轻率的。

在实行政治罢工的条件问题上，考茨基认为，政治罢工不同于一般罢工，在当时德国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敌我双方的决战。只有具备绝对地能胜利的条件，然后方可实行。当前由于敌人仍很强大，尤其是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这种罢工几乎不可能实行；即使实行了，也必将遭到严酷镇压。所以，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宣传和采取行动。卢森堡把不适用于德国条件的俄国政治罢工的经验搬来，是完全不适宜和不能接受的。与之相反，卢森堡指出，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口号，不是德国左派的臆造，而是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实际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认为，无论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工人革命情绪的高涨看，政治罢工不仅必要也完全可能。因此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决不能仍然停留在议会斗争一种形式上。考茨基反对宣传和实行政治罢工一事表明，他背离了1905年德国党耶拿大会决议，抛弃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把新形势下顺利发展的工人运动，纳入旧的、老生常谈的纯议会主义轨道。

在党所应采取的策略方针问题上，考茨基援引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指出，1871年以前，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是通过议会外的革命斗争，以“一次性行动”推翻资产阶级、夺权政权。他

把这称之为“击破战略”。巴黎公社失败后，尤其是现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条件的变化，应改而采取已为党的胜利实践证明了的合法、和平、议会斗争的“疲劳战略”，以沿着议会道路，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力量，使之一步步地陷于疲劳，最终使资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卢森堡指出，考茨基在反对民主共和国口号和鼓吹“疲劳战略”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没有根据的。她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其运用于新的条件之中，而不容许抓住旧的教条不放。卢森堡正是在反驳考茨基的基础上，阐明了关于将议会内和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坚持通过政治罢工教育发动群众，以“在普鲁士争取普选权、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廉价面包和在争取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中发动全线进攻”的策略方针。^①

在这场论争中，作为党的主席倍倍尔并未站在考茨基一边，而是处处维护卢森堡。即令如此，党的执委会仍然没有接受卢森堡的上述主张。相反，他们同考茨基一样，沿着议会主义道路愈走愈远。尤其是1912年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一跃而为第1大党，所获选票和议席均居各党之冠。这样一来，更加助长了议会道路的幻想，更加坚定了取消革命斗争、推行妥协退让政策的决心。^②就在这年1月17日，党执委会同进步人民党签订复选秘密协定，向各专区书记发出机密通告。其中规定：“直到复选不得举行集会、不准散发传单、不应给选民送选票和在选举日不

^①见《现在怎么办？》。转引自《大事记》，第1卷第303页。

^②考茨基从这次选举胜利中，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在这一点上存在必然性的话，那么，这次选举必定会最坚决地加强我们的下列信念：我们正站在走向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上，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错误的。”（重点号系引者所加）见《新时代》，1911～1912年第1册第549页。

许为自己拉选票。”一句话，完全停止竞选斗争，取消一切争取、团结、组织群众的努力，进一步向统治阶级靠拢。德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党员，曾通过各种形式，对执委会这一机会主义的决定进行抨击，并在党的开姆尼茨大会上开展过激烈辩论。但是，如同杯水车薪，仍然不能遏止这股山火在德国党内蔓延。1912年7～8月，荷兰社会党人潘涅库克同考茨基就国家问题爆发激烈的论战。7月12日，潘涅库克在《新时代》上发表题为《群众行动和革命》的文章支持卢森堡，尖锐批评考茨基死守合法斗争的策略，坐等“革命危机”，而不去准备和组织群众，以革命行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8月16日，考茨基发表《新策略》一文答辩。他把主张革命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斥为无政府主义者，公开主张党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是“通过议会中取得多数，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

关于投票赞成国家预算案。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德国党的棘手问题，也是使其演变并最终堕入沙文主义泥坑的诱发因素之一。首倡者，是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南德机会主义者。1894年6月1日，南德巴伐利亚邦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从而开创了与统治阶级妥协合作的先例。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丧失原则的事件，得到9月间召开的邦党代会的信任和批准。为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以倍倍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过严厉批评。1901年的卢卑克大会，根据倍倍尔、辛格尔、蔡特金等人的提议，针对着巴登邦议会党团再次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一事，通过关于把否决预算案视为社会主义议员应尽责任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并没有束缚住机会主义者的手脚。因为它允许社会主义议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投赞成票。因此，1907年和1908年，又发生维尔腾堡邦和巴登邦党团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的事件。1908年8月，党的纽伦堡大会，通过关于谴责上述两个党团严重地违反原则的决议。来自巴登、巴伐利亚、黑森、维尔

腾堡的66名代表，却以各邦党组织有权决定本邦政策为借口，公开宣布邦议会党团可以决定批准预算案，以和大会决议相对抗。这种极其错误的狡辩和向党的严重挑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驳。果然，不到两年，1910年7月，巴登邦议会党团多数议员，在邦议会上再次投票赞成预算案。当年，党的马格德堡大会，再次谴责这一行为，并提出警告：如重犯这一错误，将其开除出党。对于这个决议，不仅有关的邦议会党团不服，而且后来事态愈演愈烈，直到整个党的国会党团在帝国国会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

为什么在关于投票赞成预算案问题上，屡禁不止，而且越禁越厉害呢？其中，除了党的决议本身不彻底、多数代表斗争不坚决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次大会的讨论和决议，都没有触及投票赞成预算案的指导思想即“保卫祖国”的错误主张。相反，它在党内却很有市场。1907年4月25日，诺斯克在德国国会辩论军事问题时公然承诺：假如德国遭到进攻，社会民主党人将欣然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一番话，曾得到帝国政府陆军大臣的特别赞赏，却遭到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反驳。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埃森大会，就此展开了激烈论争。蔡特金、李卜克内西、累德堡等人，坚持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关于战争和革命关系的决议，驳斥诺斯克及其支持者福尔马尔、大卫、休特古姆等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个反对诺斯克观点的决议案，最后却被大会否决。^①在这场论争中，倍倍尔采取了维护诺斯克、坚持以战争攻防论性质的错误态度。^②

上述错误主张之所以很有市场，同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特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261、265页。

^②当年11月列宁曾指出：“毫无疑问，倍倍尔在埃森也犯了错误，当时他曾经维护诺斯克，坚持把防御战和进攻战区别开来。”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0页。

别是倍倍尔的两个判断有关。一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沙皇是欧洲反动堡垒的结论，①过分夸大俄国及其盟国法国同德、奥对立，而忽视了它们作为帝国主义的共同本质，结果把未来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看成是反对沙皇俄国的正义之战；二是无视帝国主义时代之前的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区别，继续把帝国主义的火并，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类，由此来确定战争的性质和无产阶级的态度。尽管在战争爆发前，倍倍尔就辞世了，但是，这种理论上的迷误，却有着广泛的影响，并为机会主义者所利用。战争一爆发，德国党和整个国际走向公开分裂，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和政策上的谬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对战争危险的态度。第2次摩洛哥危机爆发不久，胡斯曼即于1911年7月6日，在致各成员党的信中指出：“德国竟然派遣一艘巡洋舰前往摩洛哥，从而加剧了有关各国的紧张关系。”他认为，有必要召开有关国家社会党的代表会议，为此征询各党意见。7月8日，德党执委莫尔肯布尔以个人名义致函国际局认为，德国在摩洛哥挑起事端，只是“企图转移对国内事务的普遍注意力”，为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制造气氛。如果过早地干预摩洛哥危机，势必对即将到来的竞选不利，有损于德国党的“切身利益”。据此，他认为“暂时可以不讨论这个问题”。②莫尔肯布尔这种看法，集中地反映了德国党领导人的指导思想。这种

①1891年，恩格斯曾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主张，德国社会党人为反对沙皇俄国、法国的联合入侵，应进行民族自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4~298页。据此，倍倍尔于1901年3月7日在国会演说中指出，为了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的利益，有可能和有必要进行一次反对沙皇制度及其盟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见《大事记》，第1卷第239页。

②《文献选编》，第2卷第377~378页。

选举高于一切，以致不顾战争危险的错误主张和消极等待的态度，引起了强烈不满。7月24日，卢森堡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莫尔肯布尔致国际局的信，对它进行严厉的抨击。她指出，党的“上层”的路线与党内普通党员的情绪相抵触，认为单纯从选票角度考虑所有问题的执委会，在帮助修正主义。^①8月12日，李卜克内西也针对着执委会在战争威胁面前无所作为的态度，认为无产阶级应“随时准备用无情的战争对付战争”。这样两种对立的主张和态度，在9月10~16日召开的耶拿大会上，发生了正面冲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人，继续批评执委会的态度及其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摩洛哥问题决议案，他们还提出补充提案，要求在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增加强烈反对煽动战争、扩充军备和反对德国统治阶级殖民政策等内容，强烈呼吁党的执委会，组织和领导反战的群众运动，为其指明前进方向。大会不仅以多数票否决了上述正确主张，而且由执委会出面，以泄露机密、违反纪律、欺骗同志等罪名，对批评执委会和莫尔肯布尔的卢森堡进行围攻，有人甚至扬言要实行制裁。党的主席倍倍尔，也站在执委会一边，为其消极等待政策辩护，并以批评方式不妥为由，对卢森堡进行非难。这还嫌不够，德国党还把卢森堡的“违纪”事件，提到9月23日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局会议，由此而引起关于摩洛哥危机的再度争论。在争论中，列宁维护了遭受攻击的卢森堡，谴责了把卢森堡问题提到国际局讨论一事。^②包括倍倍尔在内的德国党领导人，对此极为恼怒。值得称道的是，这次

①转引自《大事记》，第1卷第298页；参见《罗莎·卢森堡传》，第183~184页。

②卢森堡接到会议通知后，即告诉约吉希斯(梯什卡)：“应该打电报通知列宁，让他务必到那里去。”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185页。

国际局会议，由于列宁、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通过了不同于德国党耶拿大会的决议。它对反战的国际运动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国际和平的积极有效的因素”，并再次重申斯图加特大会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著名论断，号召各国党采取一切方法，加强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同时，被耶拿大会否决的卢森堡等人的提案，也为这次会议所接受。在同样一个问题上，面对同一战争威胁，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为了议会选举，而甘愿抛弃一切，把争得资产阶级民主摆在首位；一种是为了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愿采取一切手段，把革命的要求放在最前列。国际内部已显露出来的这种根本对立，最终把它引向了公开分裂的道路。

第四章

危机加剧和公开分裂时期

(1914~1920)

经过长达18年的内部论争之后，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和德国党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案为标志，第二国际由于危机加剧而走向公开分裂。实际上，在此之前，作为第二国际中最大的、最富影响和最有威望的德国党，已经完成在实际政策方面由马克思主义向机会主义的演变；国际局的大多数领导人，也在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这个当时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解除了思想武装；再加上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恩威并济、软硬兼施策略的作用，为和平幻想所充塞的第二国际，一面临突然爆发的世界战争，就手足无措，顺着原来站立的那个斜坡，一直往下滑，倾刻之间，发生灾难性的“雪崩”。它的多数成员党的领导集团竟效德国党之颦，以“保卫祖国”为借口，沿着沙文主义道路，直接卷入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挑起的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残杀。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等少数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左派才挺身而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朝着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方向组织力量，去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就这样，一个实际存在了25年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的国际联盟，终于一分为二。

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第二国际的公开分裂，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它发端于长期潜伏在内部的危机，并首先表现在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根本对立，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道扬镳。这一阶段，是公开分裂的始初阶段。其间，由于机会主义的长期影响和马克思主义者力量的相对弱小，思想政治路线的根本对立尚未导致组织上的决裂。第二国际自身及其主要成员党，如德、法、英等国党，仍然保持形式上的统一。国际社会党人会议，仍然是这些党及其内部各个集团间联系的主要形式。随着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欧、美工人运动高潮的兴起，围绕关于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等问题的根本分歧，终于导致组织上的决裂。以共产国际的创建和第二国际的恢复为界碑，两个对立的国际的格局最终确立。这一阶段是公开分裂的终结阶段。

这个时期第二国际的特点是：以公开分裂代替了内部论争。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围绕着战争与和平问题，形成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的尖锐对立；同时，围绕着革命的形势、道路、策略问题，发生了中派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开冲突。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之所以陷于公开分裂，正是上述对立、矛盾、冲突的产物，正是第二国际内部上述3股势力在新形势下演变的必然结果。

一、陷入泥潭的德国党

1. 党内机会主义统治的最终确立

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工人政党。奥地利党的领袖阿德勒将其誉为“国际的首脑”。从德国党拥有的实力和在国际中所起的作用看，它本应成为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是，世界大战一爆发，它却成了保卫资产阶级祖国、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带头羊”。这种特殊的历史现

象，之所以会出现，固然同客观形势发展有关，如统治阶级对工人运动的策略的改变，资产阶级的收买和反动政府对党施加的种种压力，巴尔干战争爆发和国际局势的紧张，以及由此引起的沙文主义猖獗，党内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倍倍尔、辛格儿的逝世又使党失去同机会主义者抗衡的领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力量的相对弱小及其错误，等等。但是，上述蜕变的终极原因，却来自德国党的内部，尤其是党的领导集团自身。它是机会主义长期影响并最终在党内全面确立统治的结果。

国会党团机会主义多数派的形成。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之一的国会党团，是根据1875年哥达大会的决定开始组建的。“非常法”废除后，随着选举节节胜利和议席不断增加，党团成员不断扩大，它在全党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党的执委会，包括党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在国会中取得多数，也不得不仰仗党团，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同时，按照德国党的惯例，党的执委会主席兼党团主席，许多执委又是党团成员。全党的许多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在党团内部讨论作出决定。由此逐步形成了党内两驾马车并由党团逐步主宰全党事务的领导体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开展选举和国会活动的结果，在党内已形成一个职业议员集团。他们不仅没有“非常法”时期被追捕、镇压的风险，而且物质待遇相当优厚。其思想方法、工作方式、生活作风，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和党员。优厚的物质待遇，使其易于满足现状，努力维护其既得利益；面临选举的实践任务，又使其往往对选举和议会斗争估计过高，将其绝对化；频繁地参加选举和国会活动，使他们易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受群众监督，不了解群众的利益和情绪；从事和平、合法的议会斗争，又使其过于看重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和妥协，而忽视同农民的阶级联盟。所有这些，如果引导得当，教育及时，则有助于革命的深入发展；处置不当，就可能为接受和传播机会主义提供土壤。德国党的悲

剧就在于，长期以来，党的领导集团的精力，几乎全部消耗在选举、国会活动之中，却疏于对党员尤其是专职国会议员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积以时日，机会主义势必滋长、蔓延。正是以这样一些热心于国会活动和思想、工作、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的国会议员为基础，党团内部形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多数派。1912年，德国党在国会中拥有110个议席后，国会党团中的这个机会主义多数派，更加恣意横行，越来越直接干预、左右党的执委会的事务。1913年12月10日，机会主义代表人物谢德曼接任党团主席，进一步把这种不正常情况推向高峰，最后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接引向蜕变之路。

工会势力的增长及其对党的影响的强化。全德自由工会联合会，是在德国党影响下成立的一个工人群众团体。它正式宣告成立的第1年（1892年），只有23万多会员。后来，影响日益增强，势力不断扩大。1904年，它的会员数，突破百万；1910年，达到212万，占当时德国3大工会会员总数的82.8%；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突破250万。随着工会力量的增长，政府也不断地用改善社会服务事业和劳动立法等措施，引导工会走经济实用主义的道路，并通过收买、拉拢工会官员，以对抗和消除党对工会的影响，将工会领导集团纳入改良主义轨道。还应指出的是，德国工会势力的增长，已经超出党的实力增长。这个过程，是从1895年开始的。这一年，工会会员总数赶上和超过党员总数。从此以后，两者的距离，越来越大，而有利于工会。1906年，会员总数超出党员总数3倍多。^①日益为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的工会领导集团，正是凭借这样一支强大的势力，对党有恃无恐，并不断施加压力，以使党听命于自己。党的执委会，在理论上由于一直没有深刻理解党和工会的关系；在实践上，又想保持并发展

^①同年，工会会员是168.9万人，相当于党员数（38.4万）的439%，见《不给一个人，不给一文钱》，第94页。

选票、议席优势，不得不求助于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工会及其机会主义领导集团，①屈服于它们的压力，直到最后同工会秘密协议，并以党代会名义，公开承认工会同党平起平坐，在诸如群众性政治罢工等重大问题上，完全看工会机会主义者的眼色行事，由此而走上了工会影响直到左右党的政策的邪路。

国会选举对党的领导集团的巨大冲击。“非常法”废除后，德国党在大选中，不断地获得胜利。每次大选及其结果，对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等，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以1903年大选为例，德国党的胜利，主要是靠了小资产者的支持。②从此，这些选民的向背，对德国党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党不得不听取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党的策略，也不能不迁就一般小资产者的情绪，接受并推行乃至迎合他们所热衷的妥协、调和方针。这种情况，后来有所好转，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07年大选，由于党坚持反战方针，遭到资产阶级的联合反对而受挫，又带来另一次冲击。德国党的领导人，从中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为争取和发展选举、议席优势，不能得罪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与其实行妥协和联合。为此，1909年党的莱比锡大会，讨论了同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1910年，又下令停止在普鲁士掀起的反对“三级选举制”的运动；1912年，德国党在大选中一跃而为国会中第1大党。这样一来，更加助长了对国会斗争的幻想，坚定了推行同资产阶级妥协、退让政策的决心，因而走向机会主义的步伐越来越快。从这年起，党执委会干脆停止

①在德国党所得的总票数中，1892年，来自工会会员的，仅占12.3%；1903年，上升为29.5%；1912年，高达59.5%。也就是说，德国党的选票有近2/3来自工会集团。见《不给一个人，不给一分钱》，第94页。

②这一年中，党所得票数的53%，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见《德国工人运动》，第545页。

竞选斗争，从而一步步地向资产阶级靠拢。

正是在这种内在动因的促使下，再加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等在理论上的错误和斗争不力，致使党一步步地陷入机会主义泥潭。这种机会主义统治全党的情况，在1912年党的开姆尼茨大会上已有表现。到1913年9月耶拿大会，则已完全成熟，党的执委会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等几个重大问题上，完全倒向机会主义一边。在这个意义上，到1913年9月，德国党的这一演变已基本完成。1914年8月的公开背叛，只不过是这个演变过程终结的标记罢了。

2. 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案的恶劣先例

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加剧和战争危险的逼近，英、法、俄等主要国家，加强了备战活动。其中，尤以后起的德国为最甚。它在集中力量发展海军的基础上，从1911年起，即着手加快扩充陆军的步伐。每年都要通过新的军事法案，增加军事预算。1912年5月，德国国会以法国提出关于延长服役期限的法令和俄国增强军备为借口，拟订了扩编德军13.6万人和关于加强重炮部队的法案，并决定将原定于5年（1912~1916年）内完成的军备计划，提前到1914年春完成。这个法案，在国会通过时，社会民主党党团曾投票反对。1913年3月1日，德、法两党还曾专门发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军备政策的共同宣言，批评了两国政府起草的军事法案和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煽动。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党，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反对政府的军备政策；另一方面，却由党的执委大卫出面，以国会党团名义，在国会表示拥护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并声明：只要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同盟”，德国党就是它的支柱。正如左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指出的，这种认识，只会使国际分裂和有损世界和平。①1913年3月，德国政府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309页。

又提出德国历史上扩军最多的法案。随着军备的扩充，军费也迅猛增长。按新法案的要求，军费将高达21亿马克。在新增的12.91亿马克的军费中，约10亿马克由国防税来抵偿，即凡拥有1万马克以上财产者，均应交纳国防税；其余2亿多马克，则由劳动人民负担。德国政府提出法案时，玩了一个花招。它将扩军法案与为扩军筹集资金的法案即按财产多少征收国防税以抵偿巨额军费开支的法案（“抵偿法案”）分开。这正迎合了德国党国会党团机会主义多数派的口味。^①尽管如此，“抵偿法案”刚刚提出，即在德国工人阶级当中，遭到强烈的反对。4月间，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斯图加特、埃森、法兰克福等地，分别举行了各有数千人（有的高达数万工人）参加的抗议集会，强烈反对政府提出的“军事法案”和“抵偿法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还于4月18日和26日，两次在国会发言，揭露军备竞赛的政治背景。他指出，德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克虏伯公司等，为获得高额利润，多年来通过贿赂陆军部所属机关的高级官员，获得重要情报，从而不断加剧军备竞赛。他认为，危险并非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国内尤其是来自从事国际军火工业的大资本家。

迫于群众的情绪和当时的形势，德国党国会党团，一度采取过一些反对扩军的措施。但是，党团机会主义领导人并未改变对政府扩军筹款案即“抵偿法案”的基本立场。6月间，围绕着要不要否决政府提出的“抵偿法案”即为军事法案筹款的一次性国防税和财产增殖税法，在国会党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机会主义多数派滥用党团的组织纪律，压制37名议员的反对意见，决定在不投票赞成“军事法案”的情况下，只投票赞成上述“抵偿法案”。其理由是，反对军事法案前景渺茫，而实行“抵偿法案”，可以把军事费用的负担加到有产者头上，有利于阻

^①见《卢森堡评传》，第69页。

档军备竞赛，能积极地支援反军国主义的斗争。据此，国会党团于6月30日正式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上述法案，成为整个党公开倒向帝国主义营垒的前兆。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对德国党来讲，并非自1913年开始。但是，在此之前，主要还只是南德地区一些邦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现在却不然，它是整个国会党团即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公开投票赞成正在疯狂扩军备战的德国政府的军事筹款法案。如果说，前者是地方组织中的机会主义者，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帝国主义政策效劳；那么，1913年6月30日党团的投票，就意味着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工人政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叛卖和使整个工人阶级为帝国主义政策效劳。

党团机会主义多数派这一决定，遭到了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谴责。还在7月间，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在群众集会和文章中，就揭露了党的上层的妥协和党团多数派的叛卖立场。他们明确地指出，“这件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完全新的，这是对我们党过去的原则的正式的破坏。这个原则是‘不以一个人一文钱给这个政府’。”^①针对着休特古姆、大卫等机会主义代表人物竭力为叛卖行为的辩护，卢森堡指出，所谓通过征收财产税会使有产者担负一部分军费，并不等于对人民敲诈的终结。相反，有产阶级及其政府，最终仍然会把新的沉重的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任何加强军国主义的努力，都会对人民带来更多的勒索，从而加剧阶级压迫。^②

由于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关于投票赞成政府军事筹款（捐税）问题，正式提上1913年9月召开的党的耶拿大会的议事日程，并成为大会争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武尔姆和休特古姆，作为该议题以及执委会议案的报告人，竭力为多数派辩护。针对着执委会的报告和决议，卢森堡在会上发言，再次谴责多数

^①见《莱比锡人民报》，转引自《卢森堡评传》，第69页。

^②见《罗莎·卢森堡传》，第194～195页。

派。她预言，如果大会同意党团的立场，赞成由执委会和党团多数派提出的决议案，势必把党引向崩溃。一旦战争爆发，“你们就非赞成这个战争费用不可。这是一个斜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是站不住脚的。”^①据此，卢森堡联合蔡特金、累德堡、吕勒、施塔特哈根等81名左派代表，提出了一个同执委会决议针锋相对的提案。大会最后以336票对140票，通过执委会的决议案，并宣布左派议案无效，从而以党代会多数的名义，正式确认多数派6月30日所采取的错误立场，使之在党内合法化。^②这一事态发展表明，德国党耶拿大会的多数代表，放弃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立场，接受了国会党团机会主义多数派的主张。

3. 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否定

在国际和德国党内，群众性政治罢工问题，一直是论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尖锐冲突以至公开分裂的一个重要方面。

1912年，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由此在党内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日益为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的党的执委会，从中得出了只有同统治阶级妥协退让，才能取得国会多数的结论。与此相反，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应该利用选举胜利，扩大群众运动的规模，以乘胜前进。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和根本对立的策略，在耶拿大会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大会召开之前，党的执委会同工会总委员会协商后，提出了一个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提案。它表面上也重申1905年耶拿大会决议，认为在有的情况下，全面应用群众性罢工，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在具体阐述时，却作了种种限制。从内容

^①见《1913年德国党耶拿大会记录》，转引自《卢森堡评传》，第69～70页。

^②见《大事记》，第1卷第314～315页。

上，它认为，群众罢工“不仅为了防御对已有的民权的攻击，而且为了取得新的民权”。也就是说，它只是为了取得选举权，获得更多议席的一种手段。议会外的斗争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议会内的活动，从而抽去群众罢工的革命内涵。从条件上，“提案”指出，“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只能在工人运动各个机构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由有阶级觉悟的、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豪情满怀的并且不怕任何牺牲的群众进行。”（重点系引者所加）。这种表述，完全充满了取消主义精神。党的执委会，完全可以借口一向反对政治罢工的工会领导集团不同意，而取消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罢工；同时，它还可以用群众觉悟不高、组织不完善或会带来巨大牺牲等理由，遏制任何地方群众自发举行的政治罢工。从范围上，“提案”不许群众罢工超出选举活动半步，而且把矛头指向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把群众性罢工视为消除社会危害的必不可少而且可以随时应用的方法”，就是无政府主义，并予以坚决拒绝。也就是说，党的执委会坚决摒弃议会外的任何革命行为。谁坚持，谁就是无政府主义。从要求上，“提案”认为，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孜孜不倦地为扩大政治和工会组织而努力”，从而把全党的注意力，由当前火热的革命斗争转移到和平的议会选举和日常的经济斗争上，实际上是把党和工会的革命力量完全绑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战车之上。^①这个提案，是一个屈服于工会机会主义集团压力、全面遏制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提案。

谢德曼代表执委会，在工作报告中竭力为上述提案辩护，认为只有议会道路，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他把同“党内的不满分子和批评者”即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看成是这次党代会的迫切任务，并不顾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推行遏制政治罢工的方针。谢德曼的报告，得到伯恩斯坦等人的支持。伯恩斯坦认为并鼓吹：“不要对群众罢工的可能性抱有浪漫主义的观点。”

^①提案载《文献选编》，第2卷第427页。

在他看来，依靠完善的组织，通过循序渐进的工作，运动已成为“国中之国”，敌人因此而不得安宁，这比搞一次冒险行动有效得多。他认为，决不能拿运动作儿戏，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以免陷于进退维谷的局面。鲍威尔口头上虽不反对政治罢工，却认为当前不可能、在德国更不可能进行政治罢工。“我们要坚持按部就班地扩大组织，拒绝一切所谓的革命规划。”同时，他以威胁口吻说，“如果谁再继续工人在中掀起与局势不相适应的情绪，唤起目前不能实现的愿望，那简直是犯罪。”执委会的提案及其支持者的言论，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李卜克内西明确地指出，执委会提案，“是要给群众性罢工的讨论套上枷锁，不仅今天，而且永远套上。”谢德曼、鲍威尔等人，“不过是群众性罢工的口头上的追随者，而实质上的反对者。”对于执委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所采取的表面赞成、实际反对的手法，蔡特金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手里敲着退缩的鼓点，嘴里却吹着响亮的革命号角”。她针对考茨基鼓吹、执委会推行的唯议会主义的“疲劳战略”，强调指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们要全线步向强有力的、日益锋利的进攻性政策。我认为，帝国主义性质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迫使我们采取这样一种犀利的进攻策略。”

为了同执委会机会主义提案针锋相对，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累德堡、贝尔滕、潘涅库克等人，提出了一个反提案。针对机会主义所奉行的消极防御、妥协退让的议会策略，反提案认为，“党必须在各方面执行一个进攻性的、坚定的和一贯的策略”，即“有意识地把斗争重点变为群众行动的策略”；针对着执委会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全面遏制，反提案明确地提出：“群众性罢工不能按照党和工会领导机构的命令人为地进行，它只能是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政治形势激化的产物”；针对着执委会反对和取消议会外斗争的主张，反提案坚决主张，“只有通过广大群众争取选举权的狂风暴雨”，才能废止已推行多年的

普鲁士“三级选举制”。

卢森堡等人的提案，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下层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情绪，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使议会活动服务于议会外斗争的进攻策略。表决时，它却以142票对333票被否决；执委会遏制政治罢工的提案，却为大会所接受。这一事实表明，唯议会主义策略，已在德国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德国党于1905年所作出关于实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已最终被彻底否定。^①

4. 排斥、打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坚持原则斗争，越来越引起党内机会主义者的反感，并不断地遭到排斥和打击。这种情况，是从1912年9月党的开姆尼茨大会通过新的组织章程开始的。

德国党从1900年美因兹大会开始，正式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此之前只在执委会中设立监察委员）。按照组织章程的规定，它和党的执委会同是中央领导机构，必要时它们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确定全党的重大问题。监察委员会还负责监督执委会的工作。^②蔡特金从1896年哥达大会起，一直是执委会中的监察委员或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在其中有较大的影响，使该机构在监督执委会执行正确的策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机会主义者在执委会内势力日益增强，他们即着手修改党的组织章程。为此，开姆尼茨大会在8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新的组织章程。和过去的章程相比较，新章程增设了党的仲裁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它同党的执委会共同讨论涉及全党的重大政治问题、党的中央机构的设置问题、党代会的议程以及决定报告人。这种规定，实际上削弱了监委会许多权力。同时，仲裁委员会，并未经

^①耶拿大会关于政治罢工的讨论情况和决议，详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393~426页；参见《大事记》，第1卷第314~315页。

^②《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1900）关于监委会条款，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254页。

由党代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专区和州（邦）的执委会派1名代表组成。它完全掌握在由机会主义者控制的中央执委会和地方执委会手中。^①实际上，是一个执委会的附属机构，从而加强了党内机会主义者的地位，限制了监委会中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为机会主义统治全党，从组织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如果说，开姆尼茨大会还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法，通过正式组织手续，来限制和削弱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那么，1913年耶拿大会，则是对其进行公开的排斥和打击。大会一开始，谢德曼在工作报告中，就对卢森堡等把“俄国人的工作方法”即政治罢工方法，搬到德国来的企图，进行猛烈攻击，说他们进行人为的煽动和渲染对党的不满情绪，指责卢森堡等人公开诋毁执委会，要把党引向歧途。随后，大卫等人又凭借多数，使用各种伎俩，不让马克思主义者把话讲完，随意起哄，用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法，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卢森堡是“革命空谈家”、“阴谋家”，不许她在德国宣传政治罢工，而要她到俄国去……。正是这种疯狂的围攻，把卢森堡搞得精疲力尽。卢森堡在给友人的信中，就她在大会上的处境写道：“我不能思考，不能睡，也不能吃……这次党代表大会使我的健康受到损害达两个月之久。”^②

尽管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者玩弄极不正当的手段。卢森堡等人仍然得到代表们的支持。大会表决时，有近1/3的代表站在他们一边。这本身就是对党的领导机关执行错误政策的一种抗议，是党内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大会期间，蔡特金在给梅林的信中，就指出了这一点。“不管怎样，这次代表大会总算替我们……估算出了左翼的人数并促成了左翼的联合。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了考茨基和反对考茨基。无论如何，根据

^①《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章程》（1912）关于仲裁委员会条款，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387~388页。

^②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199页。

情况，我们对结果还是满意的，我们揭露了（工会）总委员会和其他各‘级’的观点，而且我们的言论在群众中还将继续起作用。”^①大会闭幕后，卢森堡在《理论的半官方性质》一文中，在批驳考茨基观点的同时，继续强调团结左派力量的重要性，并于9月26日在博肯海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猛烈抨击统治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并揭露工会领导人，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因此，更加引起了机会主义者的仇视。他们利用党的个别报纸，煽动起对左派的敌对情绪，并力图争夺左派原来控制的舆论阵地。《莱比锡人民报》，本来是处于左派影响下的报纸，并于1913年9月，由马尔赫列夫斯基任代总编辑。由于党的执委会的干预，新组成的编辑部，根本不把这位代总编辑放在眼里。10~11月间，他们通过拒绝刊登卢森堡关于耶拿大会的两篇论战性文章，迫使马尔赫列夫斯基愤而辞职。随后，党的执委会又让新编辑部改变一贯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并宣布：不经编辑部和党的出版委员会检查，不准发表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梅林的文章，因此，引起一直与该报关系密切的这3位左派领导人与之发生冲突乃至最终决裂，使马克思主义者失去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11月29日，党的执委会，在考茨基的压力下，以停办《新时代》评论副刊为名，使主持这一副刊的梅林，最终被排挤出编辑部。卢森堡等人被排挤之后，正式创办了《社会民主党通讯》。它与蔡特金主持的《平等》杂志一起，成为当时左派的重要阵地，在系统的反战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卢森堡在博肯海姆的演说，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政府不仅派出警察对这个大会进行监视，而且于10月间，由法兰克福检察机关出面，以演说中有煽动不服从法律和不利于国家生存的言论为理由，对卢森堡提起刑事诉讼。1914年2月，对她开庭审讯，并判处1年徒刑。在这前后，德国各地就这一审讯掀起了广

^①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199页。

泛的抗议运动。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千方百计地阻挠，致使反动当局的气焰愈加嚣张。1914年4月2日，另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尔赫列夫斯基被捕；1914年5月，普鲁士陆军部长，又以卢森堡在一次演说中侮辱德军官兵为借口，对她提出新的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执委会和国会党团，却把卢森堡“当罪犯来看待”。当卢森堡准备诉讼而搜集证人证言时，党的执委会却发出专门通知，禁止各级组织邀请士兵出庭作证。^①1914年6月16日，普鲁士众议院，以李卜克内西于1910年在党代会上发言侮辱俄国沙皇为名，将其交付法庭。

就这样，德国党内几位著名的左派代表人物，几乎都被送上反动法庭。由于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排斥打击，反动当局横加迫害，再加上左派自身力量单薄，又未能及时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结果，在党的演变的关键时刻，失去一支同机会主义者抗衡的革命力量，使得德国党陷入机会主义泥潭愈来愈深。机会主义作为一个集团统治全党，终于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

二、世界大战前夕的国际局

1. 危险的和平幻想

1912年底，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11月，由于巴尔干国家盟军的节节胜利，尤其是阿尔巴尼亚爆发武装起义，推翻土耳其的傀儡政权，使土耳其面临军事上的全面崩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俄、奥两国乘机干预。在德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动员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以遏制盟军进攻，声援土耳其。俄国在法国的

^①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204~205页。

支持下，借口支持盟军，也开始局部动员。一场地区性战争，有变为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德皇威廉二世公开宣称：“在必要的时候，德国不惜进行欧洲大战。”^①局势发展如此复杂而又极其尖锐，已到了使人们的神经紧张得快要崩断的地步。为此，消息闭塞的国际局及其成员党，迫切要求了解事态发展的真相，希望从当事国奥地利党那里得到准确的消息，以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此刻，人们把目光集中在阿德勒身上。因为他不仅是奥党和第二国际中享有盛誉的领导人，而且在以往几次国际性冲突中，阿德勒都作出了与众不同的、极其谨慎而冷静的分析。

12月7日，奥匈帝国再次任命一个军国主义首领和主战派为军队总参谋长之后，俄国感到力量不够和准备不足，决定后退，并要求塞尔维亚不要与奥匈冲突。英、法也提出了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巴尔干问题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也不得不改变立场，说服奥接受英、法建议。12月10日，奥党报纸首先传来了缓和的消息并宣称，立即爆发战争的危险已经过去。12月26日，阿德勒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形势又较为温和了。目前，我们可以消除对战争的忧虑。正如我早料到的那样，事情愈来愈清楚。在我国，人们并非真正想要战争，所有的军费开支，只是为了进行恫吓而已。”^②正是从奥党和阿德勒提供的信息中，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于1913年初得出结论：巴尔干战争已开始朝和平解决和地区化方向发展，一度威胁和平的严重危险已被排除，欧洲立即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假设已不复存在。后来，当法国党建议召开国际局会议以研究因各国增加军费可能引起的危险局势时，德国党就认为没有必要并指出，法国对形势的估计缺乏根据。“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愿进行战争。”正是基于这

^①见《世界外交史》。转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68页。

^②见《阿德勒通讯集》。转引自《未开成的代表大会》。

样的判断，当1913年6月29日爆发第2次巴尔干战争的时候，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仍置之泰然，认为它只不过是第1次巴尔干战争的尾声，属于一种地区性的现象，对整个欧洲和平不会带来真正的影响。事情果然不出预料。不到两个月，战争即宣告结束。从此，盲目的乐观情绪和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就更加在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内蔓延开来。到1914年5~6月间，国际局确认，全面的和平与缓和已经到来。正如当时法国《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杂志所指出的：“不论人们怎么看，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多年来，顽固的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试图迫使我们相信战争迫在眉睫，春季即将爆发，但战争没有爆发。和平似乎不会受到干扰，而且还会持续。政府的新口号是和平与安全，人人都使用和解与和平的措辞。”^①这个时期国际局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如沃林所描绘的：“悲观主义让位于希望，现实主义让位于幻想，欧洲会爆发冲突的宿命论预言，让位于经济决定论的乐观主义探讨。”^②

所谓“和平幻想”，实际上是对一贯坚持军国主义政策和正在扩军备战的统治阶级的幻想。其集中表现，就是相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当前各个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短暂休战，已变为持久稳固的和平。按照累德堡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存在着很多强有力的反战因素，资本主义不再被看成是完全好战的了。”^③据此，他相信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会使列强和解并解除武装。^④这种说法，到1913~1914年间，在国际局内部，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就连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而著称于世的饶勒斯，在他被害前3天，还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们无需迫使我们的政府实现和平政策，政府正在实施和平。目前法国政府要求和平，正在努力维护和平。”^⑤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和平幻

^①转引自《社会主义和大战》，第126~127页。

^{②③④}转引自《社会主义和大战》，第123、106、206页。

想，给国际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对帝国主义“和平”政策的盲目崇拜。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欧洲确曾出现过短暂的和平。但是，第1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决非出于帝国主义国家热爱和平，而是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如俄国，自认为战争准备不充分。^①1914年上半年欧洲的短暂和平，也不是各国资产阶级的害怕战争，而是一种制造更大战争的烟幕。从这种表象中，国际局领导人却得出了“战争不可能爆发，因为战争太可怕了”的结论，并且对本国政府的和平意愿与和平言词深信不疑。由过去反对本国政府的军国主义和战争政策，到相信和崇拜本国政府的和平愿望，无疑是个重大的转折。与这种转折相适应，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开始成为各国政府施放“和平”烟幕的工具。还在1913年3月初，当德、奥、法党领导人一致认为欧洲大战危险已经消除时，即开始改变方针，由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转而致力于使大国接近，以通过全面裁军，为实现西方3个大国英、法、德的联合而努力。5月间，在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支持下，瑞士议员发起在伯尔尼召开法、德首届议员会议。两国155名议员（社会党议员66人）出席，其中包括倍倍尔、饶勒斯、瓦扬等著名人物。会议通过的决议，一方面，反对扩充军备和沙文主义的挑衅；另一方面，却竭力主张由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各国冲突，并把注意力放在促进英、法、德3国联盟之上。为此，专门成立了法、德亲善委员会，企图以

^①第1次巴尔干战争达到高潮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曾对派往巴尔干的公使说：“在这个时机，比任何时候更应注意，我们必须避免任何可能引向战争的事件，我们要等五、六年之后，实在说，就是要等到1917年才能应付战争……在绝对必要时，在1915年应战，但不能再早。”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上册。转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69页。

此加强各国议会间的活动。这类为当时各国政府热衷的和平亲善、相互接近的口号，几乎为国际局所有领导人所接受，成为其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连一贯主张用总罢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瓦扬，也改变了看法，转而潜心致力于法、德亲善和3国联盟。在他看来，“对于当前猖獗于法、德两国的扩军备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法、德亲善，从而导致英、法、德3国联盟。只要已同德国接近又与法国友好的英国愿意，它很快就会单独开展促进法、德亲善的初步工作，这时建立3方和平及法、英、德文明联盟是必要的。”^①为此，瓦扬曾在国际局的支持下，通过哈弟，要工党全力以赴地做英国政府的工作，以便使英国议会和政府，参与3国亲善和相互接近。瓦扬诚心诚意地为之奔跑。结果，除了在客观上配合各国政府在战前掀起的和平攻势外，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相反，由于醉心于和平，他一度热衷并坚持的以总罢工反对战争的主张，几乎被搁置起来，以致在为国际维也纳大会准备的报告中，瓦扬关于总罢工的激进主张，被饶勒斯变成了使各国政府信守诺言、尊重国际仲裁的一种手段。正是在这种一味追求国际仲裁以使大国之间相互接近和亲善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意大利社会党于1914年1月和6月两次就阿尔巴尼亚问题，倡议召开奥、法、意党代表会议以进行联合行动的建议，被国际局和胡斯曼所拒绝；一度蓬勃发展的欧、美工人反战的国际运动，到1913~1914年，开始呈现萎缩状态。和1912年相比较，1913年德国罢工人数，由47.9万人，减至24.8万人；英国罢工次数，增加了640次，罢工的人数却由1912年的146.3万人，减至77.4万人。其中，还包括有10万矿工参加的总罢工，不然递减还要更多。^②

^① 《瓦扬致胡斯曼》（1913年7月9日）。转引自《未开成的代表大会》。

^② 见《罢工斗争》，第64、73页。

对沙文主义的退让、纵容。本来，德、法两党在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可是，1913年初以来，一度极为紧张的国际局势的暂时缓和一事，似乎再次证明德国党原来坚持的关于摩洛哥、巴尔干等地区性冲突不会导致欧洲大战的看法是正确的，致使两党之间的原有矛盾，慢慢地溶化在共同的和平幻想之中。再加上法、德亲善以实现持久和平思想的支配，使两党日益接近。在这一方面，饶勒斯和法国社会党，表现了空前的热情。他不但倡导了两党的共同行动，而且对于德国党内已经成熟并充分暴露出的沙文主义溃疡，表现出了无法容忍的退让和纵容。正当法国党致力于两党两国接近、亲善的时候，法国索尔本大学教授、研究德国问题的专家安德勒，于1913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身上存在着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我们现在明白，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党，它准备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决心不去打乱德国的外交，并打算同王朝患难与共。这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政权宝座的唯一的社会党，因此它将迷惑群众的思想。”^①这种看法，在当时一片和平亲善气氛中所产生的影响，无异于突然爆炸一颗烈性炸弹。它首先遭到饶勒斯的反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党）也公开表示不同意。德国党领导人哈阿兹对此更为不满。^②6月30日，德国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筹款法案，曾引起德国左派的猛烈抨击和耶拿大会的激烈辩论。对此，国际局及其成员党（包括法国党）一直未予指

^①见《现代德国帝国主义社会党》。转引自《民主社会主义》，第162页。

^②1913年3月2日，哈阿兹写在给法国的儿子的信中说：安德勒的文章“完全误解和歪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活动，因而使法国沙文主义者有利可图。”转引自《社会主义和大战》，第115页。

责。相反，他们却和德国党领导人一样，认为此举有利于反军国主义的斗争。1914年春，法国党在竞选纲领中谈到德国党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立场时指出：“如果德国的民族独立受到威胁，那么，德国社会党人也会象我们一样，下决心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①对此，国际局及德国党同样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1913~1914年间出现的法、德两党两国的合作亲善，其基本原则并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对军国主义，而只是激进的爱国主义即“保卫祖国”。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领导人所向往的和平，只是阶级之间的和平。这种和平，势必带来党与党之间和党内无原则的和平。其结果，势必对沙文主义思潮予以纵容。这也是国际之所以走向公开分裂的重要原因。

对国际力量的盲目自信。到1914年，第二国际已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其影响已达到远在亚洲的印尼和中国。面对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对1913~1914年国际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完全充满了自信。国际局书记胡斯曼指出：“在最近这3年中，只有国际社会党在各国反对战争……社会党是拥护和平的主要力量。”^②由于国际在争取和平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再加上第二国际差一点要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大奖，^③使国际局的领导人得出了下述结论：各成员党已经表现了向战争开火的坚定意志，对欧洲社会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信心，正在不断地增强，他们能顶住战争的威胁和沙文主义

^①《社会主义和大战》，第131页。

^②见胡斯曼于1914年4月在伦敦的演说，载《未开成的代表大会》附件4。

^③胡斯曼指出：“我们差一点就要得到斯堪的纳维亚资本家阶级那里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大奖。我说‘差一点’，是因为这项大奖授给了一位社会主义者拉丰坦同志（比利时社会党人）。”见《未开成的代表大会》附件4。

的进攻。这种盲目乐观的自信情绪，使国际局领导人在把握当前工作重点和方向上，发生了迷误。还在1914年7月，考茨基就曾强调，第二国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这样团结。从组织观点看，它显然已经变得更加强壮了。可是，它的政治性和理论性，则显得极为不力。因此，他主张即将召开的维也纳大会应着力找出治愈这种病状的药方。^①考茨基的主张，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国际局领导人的主导思想。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队伍十分强大，和平局面已经形成，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发挥这种优势，克服国际内部政治理论方面的病症。因此，工作重点完全放在一些党的统一和即将召开的国际大会的准备之上，而对于军国主义者的阴谋和世界大成的危险，却完全置诸脑后。这种本末倒置、轻重不分的指导思想，为第二国际的公开分裂，留下了隐患。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就是在这种和平幻想中度过的。战争一爆发，无情战火烧灭和平幻梦的时候，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就如同夜半临深池、盲人骑瞎马那样，势必要掉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预先设置的陷阱。这就是国际的悲剧所在。

2. 对俄国党内事务的国际干预

国际局曾多次对其成员党的内部争论进行干预，并为加强有关党的团结和统一作过贡献。^②但是1912~1914年间，国际局和德国党对俄国党内事务的干预却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1903年，在党的“二大”上，因为组织问题意见分歧，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对

^①转引自《社会主义和大战》，第134页。

^②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曾就法国社会党的统一通过决议；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曾讨论奥、捷两党的分裂问题；1914年，国际局会议促成了英国社会主义团体的统一。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498页。

立的派别。1905年，德国党的领导人，以加强1905年革命力量为由，曾提出关于调解两派纠纷以达到党的统一的建议。当即遭到俄国党“三大”的拒绝。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和工人运动低潮的到来，原来在革命高潮时期暴露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策略分歧，进一步在理论、纲领、组织等方面深化。孟什维克不顾沙皇俄国专制主义的残酷镇压，机械地照搬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鼓吹取消和否认适合俄国斗争条件的秘密、非法的党，而代之以公开、合法的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曾同这种取消派进行过长期斗争。1908年12月，党的第5次代表会议和1910年的党中央全会，曾两次通过决议，无保留地谴责取消派和取消主义。但是，取消派拒不服从党的决议，而且继续进行破坏和分裂活动。因此，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党的第6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孟什维克驱逐出党。紧接着，又粉碎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八月联盟”，从而使党成为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并在党的中央机构内部消除了派性。

布尔什维克的这一胜利，遭到孟什维克等取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党的决议斥为“列宁式的分裂”，同时，向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求援，企图在“普遍统一”的口号下，取消布拉格会议决议。对此，德国党首先作出反映。1912年底，德国党主席哈阿兹，在国际局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建议，要求国际局施加影响，以使俄国党各派、各小组联合起来。这个不管双方分歧实质，不讲党的统一条件的建议，立即为国际局所接受。接着，德国党执委会提出，立即召开俄国各派和小组代表参加的统一会议，并要求与会各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对任何被邀的团体提出异议。实际上是抹煞俄国党内的分歧，站在孟什维克一边，以无原则的“统一”来否定布拉格会议决议。这一建议，遭到布尔什维克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拒绝，会议也不了了之。

一年之后，俄国党统一问题，再度由卢森堡提出来。本来，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包括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问题上，卢森堡同列宁和俄国党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但是，在组织问题上，她却认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她自己党内出现分裂，都应归咎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此，她于1913年11月14日，在《前进报》上发表致国际局的声明，要求为消除俄国党的分裂状态、恢复全党统一而进行干预，并把它提上12月召开的国际局全体会议的议程。国际局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将“俄国问题”正式提出讨论。列宁没有出席，但为出席会议的李维诺夫提供了一切必需的材料，并在《也是统一分子》一文中明确地提出，应认真地研究俄国党内的分裂问题，使西欧同志理解党内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争论的实质。

国际局会议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卢森堡提出的，即取消派和维护取消派的集团所同意的方案。卢森堡认为，整个俄国笼罩着无数派别斗争，它是由于列宁派制造分裂的结果。在她看来，俄国党内的意见分歧，根本没有排斥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共同工作的可能性。通过各派和各种组织的妥协，完全可以达到统一。因此，卢森堡主张，“为了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应召集一个统一的会议。”这个方案遭到考茨基的反对。考茨基以国际局主要报告人名义，提出了另一方案。他主张，由国际局执委会出面，组织或安排俄国“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共同交换意见，以便弄清问题的实情和意见分歧到什么程度。实际上，这个方案，早在1911年就由国际局书记胡斯曼同列宁商谈过。列宁认为，这个主张事先交换意见和研究确切材料来处理统一问题的提案，是比较慎重，比较有步骤的，是个“好决议”。考茨基提案，只经过稍许修改，即为国际局会议所通过。但是，会议的讨论过程，也暴露了国际局一些领导人的内心世界。考茨基主张，交换意见时，邀请“所有自认

①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18页。

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人，作为公证的证人，加以评判，因为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死亡。”^①这个主张，当即遭到卢森堡的反驳。她指出：“考茨基说似乎俄国的党已经死亡，这种说法是轻率的。”对此，考茨基提出抗议并进行解释。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即使考茨基没有说俄国党已经消失，他却说过党已经消失，而且一直没有收回这句话。“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事实。”^②它表明，国际局领导人，特别是考茨基这样的理论家，完全听信俄国机会主义取消派制造的谎言，企图通过否定日益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以为国际局和德国党直接干预俄国党的内部事务制造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在会上，公开为俄国党的机会主义者鸣不平。他说：“对于老同志，决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党不再采用旧名称，就干脆开除他们。”^③在这里，考茨基把矛头直接指向俄国党的布拉格决议。在他看来，以布尔什维主义为旗帜的、一直生气勃勃的俄国党已经消失，而从事分裂活动、处境每况愈下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等“老同志”，却代表着“他们的党”！国际局领导人，尽管力图公正处理俄国党的问题，实际上，却站在俄国机会主义取消派一边。出席伦敦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李维诺夫，曾全力反对这一点。他明确指出，在俄国存在着一个完全确定、组织上有定型的党。它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他还声明，布尔什维克党决不同已为革命工人抛弃的机会主义者实行联合。^④

国际局会议关于俄国党问题的决议，虽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相吻合，但是，国际局主要领导人，并不想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要求，而是按照考茨基发言的主导思想，来实现俄国党的“统一”。会议结束后，国际局在“准备统一”的旗下，开始

① 《国际局定期公报》，1914年第11期《增刊》第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30页。

③④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9卷第530、532页。

网罗反对派。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集团正在形成。为了应付这一严峻的局面，列宁于1月18日在布尔什维克讨论国际局决议的巴黎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实现联合的条件。1月25日，列宁到达布鲁塞尔，同波波夫一起，讨论有关国际局的工作问题，并同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王德威尔得会谈。会谈中，列宁明确地提出：“我们将不寻求，也不提出，不讨论任何妥协性的交易……我们绝不作任何思想上的让步。”他主张各有关方面公开阐明自己的全部观点，以便每一方面都在工人阶级面前对自己的观点负责。①同时，列宁邀请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以实地了解情况，搜集材料。为了全面阐述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使国际局充分了解情况，列宁用了两天时间，写出一个简明报告，全面地回顾和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之间分歧的由来、实质、主要内容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和作用。在国际局执委会关于俄国党统一问题的会议召开前夕，列宁又为出席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起草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指示，具体地说明了党内意见分歧的实质，列举了俄国工人运动和党内两派关系的材料，陈述了布尔什维克关于统一的实际建议，并制定了在会议期间应付各种情况的策略方案。

1914年7月16~18日，关于俄国党的“统一”会议，在布鲁塞尔人民宫国际局总部召开。出席会议的，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11个组织的代表。这次会议，经过局密策划，由考茨基代表国际局，提出了一个无原则“统一”的决议。会议公然违背国际局关于不得把强制性决议强加于人的许诺，竭力回避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原则分歧，取消了国际局会议关于先弄清分歧实情然后采取统一步骤的决议。它貌似公允而实际上充满对

①见《列宁年谱》，第3卷第246、249~250页；另见《回忆弗·依·列宁》。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569~570页。

坚持原则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无端攻击和对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庇护。因此，受到除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机会主义者的拥护。当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据理反驳并拒绝投票时，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竟然以将在国际维也纳大会对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惩罚性措施相威胁。结果，在只有布尔什维克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完全支持机会主义取消派的考茨基决议。正是在国际局的袒护和会议决议的鼓励下，俄国各机会主义派别召开会议，实现了“统一”，建立起反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盟（“布鲁塞尔联盟”），同时，还通过特别宣言，并决定派联合代表团出席国际维也纳大会。

布鲁塞尔会议通过考茨基决议一事表明，国际局已倒向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一边。

3. 未开成的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哥本哈根大会，根据胡斯曼的建议，接受奥地利全体代表的邀请，决定下届大会将于1913年在维也纳举行。1912年8月底，国际局即开始征求意见，以规定大会的准确日期。荷兰代表万一科尔和特鲁尔斯特拉，以“丝毫不存在必须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紧迫性”为由，建议将会期推迟到1914年，以庆祝国际工人协会50周年和第二国际诞生25周年。^①这个建议，得到德、奥、捷、意等14个党的支持，却遭到英、法等7个党的强烈反对。瓦扬认为，由于巴尔干战争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局面，“面对造成生灵涂炭和抢劫成性的殖民资本主义的冒险行径，面对军国主义的武力增长以及战争的威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更迫切地需要国际通过代表大会来制订积极的政策，以拯救无产阶级，维护和平”。他的意见，得到饶勒斯的坚决支持。国际局书记处胡斯曼则担心，捷、德两党和捷、奥两党之间的对立，波兰、俄

^①见《国际局档案》，载《未开成的代表大会》，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国、保加利亚等党内部分裂日益激化，如按期开会，有可能开成一个“社会党的分裂大会”，将给全世界留下极坏的印象。因此他极力主张拖一段时间，以便使激动情绪逐步平息下来。这两种对立的看法，在1912年10月28~29日召开的国际局全体会议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由于王德威尔得的折衷，会议在决定立即召开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的同时，将例行的国际大会，推迟到1914年召开。1913年上半年，欧洲局势一度缓和，国际局即开始加紧筹备大会。当年12月13~14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局全体会议，专门研究了大会的组织和议程，成立5个议题委员会，指定了一批报告人。1914年3月，国际局正式向各成员党发出邀请，5月末，基本上完成起草大会报告的任务。直到7月底，战争已经实际开始时，尽管奥地利党提出了关于在维也纳召开例行大会不再适宜的建议，7月29~30日召开的国际局全体会议，仍然决定国际大会改在1914年8月9日在巴黎召开。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国际史上准备最充分的代表大会即成泡影。

这次国际大会最终虽未开成，它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议程和报告，却集中地反映了国际局及其成员党领导人的精神状态和指导思想，也可作为第二国际走向公开分裂的佐证。

从大会的议程看，哥本哈根大会规定了12项。国际局第15次全体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将大会议程精简为5项，即失业（第1委员会）、生活费用昂贵（第2委员会）、帝国主义和仲裁（第3委员会）、酗酒（第4委员会）、俄国政治犯情况（第5委员会）。同历届国际大会集中讨论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问题的情况不同，这次大会，主要着眼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回避了当时国际所面临的两大危机：战争危机和主要成员党内由机会主义者所造成的分裂。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同当时国际局领导人的思想状况有关。诚如前述，1913年春以来，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的领导人

认为，欧洲战争的危險已经排除，国际局势日趋缓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任务，已经不同于巴塞尔大会时期，现实的战争威胁已为“持久和平”所取代。与之相适应，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險问题，首次从国际大会的议程上消失，替而代之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国际仲裁和普遍裁军。^①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内部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按照考茨基的分析，这并非党的领导人的消极态度和错误所致，也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而是由资产阶级各种社会现象诸如失业、生活费用高涨和政治迫害使然。因此，应对这些具体的事实进行准确而仔细的分析，从中寻求解决方案，以便引导信心不足的工人和党员走上新的行动的道路。国际局，正是按照考茨基上述指导思想，来确定未来国际大会的议程。其中，贯串着一条线索：以无条件的国际仲裁和普遍裁军，来代替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社会改良来代替以推翻资产阶级为目标的社会革命。这种议程安排，在国际史上是一种严重的倒退。

从议题报告人的组成看。根据国际局全体会议的決定，每项议题，任命3~4名报告人。他们应从第二国际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才干的人中挑选，以便在各国党初步报告的基础上，就议题提出综合报告。经过筛选，最后确定12人为5项议题的报告人。其中，几乎全是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如鲍威尔、王德威尔得和弗里根。有的报告人，如费边社领导人悉尼·韦伯，还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关于俄国政治犯情况这样一个具有强烈阶级内容的议题，原拟请英国“人权同盟”主席准备报告，因为他突然逝世，又补选饶勒斯，遭到拒绝后，才转而请李卜克内西代替。关于

^①直到1914年7月底，当战争已经打起来时，国际局第16次全体会议，才根据哈阿兹和饶勒斯的建议将“无产阶级和战争”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首位。

生活费用昂贵问题，由于卢森堡的建议，早在1911年9月召开的国际局全体会议上，就曾进行过讨论，并作出决议，但是，国际局并未邀请卢森堡，而是任命鲍威尔和韦伯准备报告。所有这些安排和选择，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国际局内部的力量对比。到大战爆发前，通过报告人左右国际大会方向的，已经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改良主义者。

从主题报告的基本倾向看。大会5个议题，从不同侧面，接触到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问题。恰恰在这个关系国际及其成员党执行什么样策略的问题上，暴露了国际局及其领导人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大会关于帝国主义和仲裁议题的报告人弗里根，从垄断组织发展能解决自身经济矛盾以消除国内社会畸形现象这个基本点出发，认为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在社会主义者的压力下和反战力量的推动下，能逐步缩小或减少国际政治危险。在他看来，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尽管在增长，但是，在国际生活中，“能够为战争辩解的、真正的、确实的利益根本不存在。”他认为，在帝国主义列强政治中，也包含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发动战争”，因为即使赢得了战争，也不能得到足以补偿战争损失的经济利益，而且只要一个大国经济崩溃，全世界文明国家都要遭受经济灾难；“对一些被欧洲列强视为殖民地的地区产生争执的理由，几乎都已消失”；日俄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的历史已经证明，一旦人民提高警惕，利害关系或利害冲突并非注定要流血，大国之间召开会议就能找到解决办法，地区性冲突也可不导致世界大战；任何用暴力作出某种决定的试图，必将遭到各国社会党的有力反击，因此统治阶级承担的风险就更大，尤其是按照现代化武器发展的程度和规模，只要一爆发战争，必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报告人认为，防止战争的道路，就是国际仲裁的道路。依靠已经签订的仲裁条约，战争的危险就可

大大地减少。无产阶级的实际任务，就是“动员和促使交战国人民，在反战中进行合作，以便让各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接受仲裁”。一句话，用国际仲裁来代替反战斗争。此外，鲍威尔和韦伯，在关于生活费用昂贵议题的报告中，从分析帝国主义这个新的经济现象中，得出了帝国主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经济矛盾的结论，因而主张以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以工会斗争取代罢工运动。上述报告人的这些结论和主张，集中地反映和代表了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的思想倾向。德国党领导人哈阿兹在1912年开姆尼茨大会所作的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报告，就已表现出这种倾向。他认为，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存在着3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即英、德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共同行动；国际无产阶级的兄弟般团结；对战争后果的惧怕。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内在利益和经济倾向，特别是战争可能引起巨大的不满和贫困，会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迫使统治阶级不能不予以考虑。以这种思想理论状况，去迎接即将爆发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4. 七月危机和国际局

1914年6月28日，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者、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巡视的过程中，被塞尔维亚一爱国青年击毙。奥匈帝国迅即以此为借口，进行军事动员，扬言要对塞尔维亚进行彻底的“清算”。德皇威廉二世也认为，应借此向塞尔维亚发动武装进攻，并声称，如果因此而爆发奥俄战争，德国将履行自己对同盟条约的义务；俄国也不甘示弱，表示倾全力声援塞尔维亚；法国则向俄国保证，如果发生俄、德战争，将履行同盟的义务，并要俄国必须坚定。世界大战如箭在弦上，整个欧洲充满浓烈的火药味。对此，国际局的主要成员党，却麻木不仁。“他们不相信会爆发欧洲战争，根本不相信萨拉热窝事件

会引起一场战争。”^①事件发生的第2天，即6月29日，在哈阿兹主持下德国党执委会召开会议。党的主席之一的艾伯特在发言中指出，他并不认为发生谋刺事件后国际局势就会复杂起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更加紧张。执委会担心的，倒是事件会给原定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大会及巴尔干国家党的代表会议制造麻烦，使之无法进行。因此，根据谢德曼的提议，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召开国际局会议，以便听取奥地利同志的意见，确定维也纳大会的开法。1914年6月30日，饶勒斯在《人道报》发表的文章也认为，这次事件，只是位于欧洲东方这个“屠宰场——巴尔干半岛上徒然流淌的血河中的一条细流。”^②因此，这个时候国际局及其成员党的注意力，并未放在这个包含巨大危险的事件上，而是忙于消除某些党内的分歧和筹备即将召开的国际大会。直到7月中旬，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的领导人，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如同有意制造和平烟幕的各国政界要人一样，分头去避暑。迟至7月21日，当奥国的战争准备业已就绪，政府新闻机构对奥党报纸关于总罢工的报道作了删节，刚从休假地回来的阿德勒，这时才感到事情不妙，担心在维也纳开不成国际大会。他急于召开党的领导机关会议以商定对策。由于大多数领导人度假去了，拖到23日开会后，阿德勒才向国际局提出改址开会的建议。直到这时，奥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尤其是伦纳，仍然不相信有可能爆发战争。结果，奥党领导人会议结束不到3小时，即7月23日晚6点，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阿德勒当即将上述建议报告国际局。24日，胡斯曼发出关于召开国际局紧急会议的提议，7月26日发出通知，29日开会。

①见《警察局关于1914年6月29日德国党执委会会议记录》，载《未开成的代表大会》附件1。

②见《人道报》。转引自《未开成的代表大会》。

1914年7月29~30日，国际局第16次全体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时，欧洲上空已经是乌云滚滚、战火弥漫了。国际局及其成员党的领导人，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和战争当事国之一的塞尔维亚党领导人外，几乎全都出席了，共32人。会议集中讨论当前国际形势和即将召开的国际大会问题。这次会议，再次暴露了身处危机之中的国际局领导人的精神状态。

奥地利党领导人阿德勒，表现出的是一种悲观、忧郁、压抑乃至绝望的精神状态。作为倍倍尔死后第二国际中最有威望的领袖，阿德勒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向以冷静、谨慎著称，而且他一向真诚地相信本国政府的和平愿望。7月26日，当奥匈帝国已经发出最后通牒，并威逼塞尔维亚限期答复的时候，这位老人仍然相信，奥、塞之争只是象巴尔干战争那样的地区性冲突，到头来，只是一场虚惊，因为奥地利政府不愿意打仗。一旦战争爆发了，他又由盲目乐观很快滑向悲观绝望。当会议开始时，饶勒斯提议按战争事态发展的顺序，请阿德勒以奥党代表身分，谈谈对当前形势的认识。阿德勒一开口就说：“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战争……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在这种情况下，“党无法采取行动”，“无产阶级无能为力”。进行示威，不可能；罢工的念头，都是幻想；整个报纸和组织处于危险之中，30年的工作有可能毁于一旦……。他主张，必须保护无产阶级免受鼓吹革命的毒害，应该保卫我们的机构。^①阿德勒的这种消极悲观态度，引起捷克、德国代表的反对和指责。

与阿德勒情绪相对应的，是大多数代表的乐观情绪。为什么世界大战如此逼近，战火已烧到眼前，国际局领导人竟会如此置若罔闻呢？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迷恋于政府的和平愿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和平幻想。从会议的发言看，除俄国代表外，各大国

^①见《国际局第16次全体会议记录》，载《未开成的代表大会》文件部分。

党的领导人，都对本国政府的和平愿望深信不疑。哈阿兹认为，德国政府想避免做一切可能导致战争的事情，因为战争对德国一点好处也没有。饶勒斯针锋相对地强调，“法国政府愿意和平，它通过促成和平调停支持英国。法国政府为了缓和局势，对俄国作了工作。”英国代表格莱西尔也指出：“英国人希望和平，议会的所有议员希望和平，工人阶级也一样。”^①正是这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和平幻想，使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对以总罢工来对付战争的主张极其反感。当巴拉巴诺娃提起，应属维也纳国际大会应考虑以前国际大会关于总罢工问题的讨论时，代表们却表示惊讶，不予置理；后来又有人提出，应将其列入应属大会议程，饶勒斯也曾讲过“总罢工问题不能回避”这一类话。可是，哈阿兹却以不把有意见分歧的问题列入议程为由，反对再讨论总罢工问题。就连一贯主张用总罢工反战的瓦扬也认为，形势尚未到非采取罢工这个最后手段不可的地步，并主张以建立解决世界争端的国际仲裁来取代罢工。

真诚地相信本国政府的和平愿望，就象一面斜坡，由此起步，势必滑向在战争中同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起，去“保卫祖国”。德国党的主席哈阿兹在7月29日会议上说：“我们知道德国希望和平，但是，如果俄国进攻的话，德国也就干预，这是没有疑问的。”在午餐时，他对法国代表拉波波特的一席话，说得更彻底：“如果只有法国卷入战争的话，那么，我们的态度将十分明了。但是，还有个俄国人。普鲁士的长靴对你们意味着什么；俄国的皮靴，对我们来说，也就意味着什么。”^②哈阿兹的

①会议结束饶勒斯启程回巴黎前还对王德威尔得说：“我们将遇到曲折。但是，这次危机会象以往一样得到解决的。”基于此，回国后，他还在法国政府中活动，直到最后为暴徒所杀害。

②转引自《社会主义和大战》，第208页。

上述发言，给与会代表留下“恐俄症”的深刻印象。格莱西尔在1917年英国工党年会上发言中，就曾证实这一点。他说：“在战前国际局最后一次会议上，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直率地宣布：只要存在俄国入侵德国的一点危险，他们就不抵制动员。即使能够，他们也不会这样做。”

战前最后一次国际局会议，就是在这种和平与妥协的气氛中结束的。会议唯一公开发表的文件《第1号公报》，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决定将原定于8月23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大会，提前于8月9日在巴黎召开。这是当时国际局领导人心中唯此为大的工作。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其中除了一般的号召继续加强反战游行外，①主要是把奥、塞战争视为地区性冲突。“决议”只要求法、德两国工人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以约束奥地利和俄国，而且要求法国从俄国得到保证，以使后者不介入冲突。②这个决议，和《巴塞尔宣言》以及第二国际其他反战决议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它集中地反映了国际领导人对本国政府和平策略的迷信。

三、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前后

1. 前台和幕后

7月危机中的国际局会议，是秘密进行的，未让记者列席，会议记录和报告也未发表。因此，人们并不知道内情，更不了解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人们只看到前台的表演，而不洞悉幕后的活动。实际上，两者大相径庭。在这一方

①这种游行的前提是：“为了以仲裁方式解决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见《历史资料Ⅱ》，第188页。

②以上未注明出处的引文，见《国际局第16次全体会议记录》。

面，以德国党最富于代表性。

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第2天，德军进入紧急状态，总参谋部拟实施“内部动员计划”，并逮捕一切可能惹起麻烦的人们，包括少数民族领袖和社会党领导人。7月2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发表题为《强烈抗议战争挑拨者的阴谋》宣言。“宣言”指出：“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时刻已经来临。任何迟疑都是危险的！世界大战正迫在眉睫！”为此，执委会要求各级党组织举行群众集会，“表示觉醒的无产阶级保卫和平的坚定意志。”①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响应执委会的号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维尔滕堡邦的群众大会于7月25日一致通过由蔡特金起草的“关于反对战争威胁”的决议。“决议”指出，“要以阶级斗争的革命精神来团结和教育群众，让他们准备保卫和平而奋不顾身地发挥自己全部的政治、经济威力”，并向英雄的俄国革命无产阶级这个关键时刻的和平堡垒表示敬意。

“决议”还强调，“强有力地、直率地表现出同各国被剥削者兄弟般的团结和保卫和平的不动摇的意志，这是防止各好战集团以无耻的挑衅活动引起世界战火的唯一可靠的保证。”第3天，大会还一致通过决定，责成党的领导，立即在各地召开会议，以显示无产阶级的意志。从7月26日起，开姆尼茨、莱比锡、柏林、不来梅，慕尼黑、耶拿、布勒斯劳、纽伦堡、斯图加特、佐林根等几十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涌上街头，举行反战集会游行。《马赛曲》声声入云霄，“打倒战争”的口号响彻各个角落，并通过许多反战决议。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7月30日。②对于这一点，饶勒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不久

① 《宣言》载《历史资料Ⅱ》，第189页。

② 《大事记》，第1卷第321~322页；另见《罗莎·卢森堡传》，第213页。

前国际局内交换意见和情况，各国社会党人都意识到了他们的责任。德国社会党人声势浩大的游行本身，就是对那些说德国同志在消极等待的观点的人有力的回击。”^①

就在广大工人热心地贯彻执委会的反战宣言时，帝国政府副首相兼内务大臣德尔布鲁克，却利用私人关系，与德国党国会议员休特古姆接触。后者，建议帝国政府首相霍尔维格会晤德国党的两位主席哈阿兹和艾伯特。7月26日，哈阿兹生平第1次接受政府高级官员的召见。在听取关于存在战争威胁的情况时，哈阿兹指出：如果因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贪婪而使德国受到威胁，社会党人决不允许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同时，他表示，德国党相信政府的和平意图。被召见后，哈阿兹向党的领导机关汇报了全部情况。^②3天后，即7月29日，哈阿兹在国际局会议的发言中，一方面声称，关于他同首相会见的消息纯属谣传，“政府并未对社会民主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又保证：“领导政府的阶级和大工业家，是厌恶战争的”。^③就在同一天，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如何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德皇威廉二世认为，绝不允许社会民主党上街进行反战活动，如果这些麻烦再度出现，他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逮捕领导者。首相霍尔维格和副首相兼内务大臣德尔布鲁克则认为，不能在战前实行恐怖状态，必须顺应形势，使用策略，特别不要使社会党人与政府形成公开的敌对。他们主张，如果爆发战争，最好是赢得社会党人的信任。^④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7月29日，霍尔维格

^①见《人道报》。转引自《未开成的代表大会》。

^②据德国党全国代表会议记录，召见者是普鲁士的内务大臣；另据《社会主义和世界大战》记载，召见哈阿兹的是帝国首相霍尔维格。

^③见《国际局第16次会议记录》。

^④见《社会主义和大战》，第211页。

亲自出马，电话约见休特古姆，两人从下午两点开始，密谈了一个半小时。首相表示，战争的威胁已迫在眉睫，他正努力尽其所能以避免战争。但是，他担心俄国人神经过敏，必须防止他们随时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实际上，首相抓住德国党“恐俄症”这个弱点，企图将其进一步引向“恐俄卫国”的深渊。同时，霍尔维格还警告，“在我国也有一个主张战争的党派”，企图迫使德国党老实就范。从这次密谈，休特古姆不但得出了“首相不愿打仗”的结论，而且在第2天，同党的执委会成员艾伯特（主席）、布劳恩、巴泰尔斯、弥勒和国会议员费舍交换意见后，正式向霍尔维格去信，一致同意休特古姆向首相作出的保证：一旦爆发战争，德国党“出于维护和平的愿望，不打算因而也不必担心会采取任何行动，不论其性质如何（如总罢工或局部破坏等）”。德国党还表示将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案。^①紧接着，7月30日，党报《前进报》公开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德皇“威廉二世总是国际和平的朋友”；^②社会民主党人施塔姆普费尔，在题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文里，公开宣扬“保卫祖国”的口号。^③据此，帝国首相宣称，社会民主党是忠诚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抗议罢工和罢工事件。^④

7月31日，继头天俄国宣布总动员之后，德皇宣称“帝国领土已处于“战争威胁的危险状态”。面临这一严峻的局面，德国党执委会于当日发表第2次宣言。这个宣言，虽然也有不少“力求保卫和平和避免战争”、“永远忠于我们的事业”等漂亮词句，尤其寄希望于妇女们为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而奋斗。但是，

①见《历史学杂志》。转引自《未开成的代表大会》。

②见《民主社会主义》，第167页。

③见《大事记》，第1卷第323页。

④见《插图德国革命史》。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595页。

基调已经开始改变。它要求放弃反战的阶级斗争，“不从事轻率无谓的牺牲”，还号召党员和群众“耐心地等待战争的结束”。^①与之相呼应，受命前往巴黎同法国社会党会谈的党执委会成员弥勒，在当天两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把德国皇帝和帝国首相美化为“是真心实意力求维护和平的”。当8月1日对俄宣战、德军入侵中立国卢森堡从而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自由工会理事会作出决定，支持政府在总动员期间所采取的措施；为进行战争立即停止所有争取工资的运动；不再开展新的争取工资的斗争；停止对罢工者的资助；工会联合会的财力和组织机构应为战争服务。^②这几项决定，连同德国党幕后向政府所作的一系列承诺，就把拥有108万党员、400多万会员和400多万选民的德国党和工会，一下全然捆在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

2. 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案

8月1日之后，欧洲局势急转直下。3日，德国针对法国的总动员，制造借口对法宣战；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参战，以声援法国。4日，德国以比利时拒绝德军过境对法作战为由，开始侵入这个中立国家；据此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随着世界大战的全面展开，增加军事预算问题，再度提上国会的议事日程。还在7月31日，德国党执委会和国会党团联席会议，听取哈阿兹关于国际局布鲁塞尔议情况后，哈阿兹曾建议，对政府向国会提出的军事预算法案投反对票，并得到累德堡的支持。由于谢德曼等人的阻挠，会议未通过相应决议。据此，奉命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189~190页。

②见《大事记》，第1卷第324页。早在7月27日，工会领导人列金已公开宣称：“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只有一件事要做，即‘我们应该自卫’。”转引自《社会主义和大战》。

前往巴黎同法国党就这一问题协商统一行动的弥勒宣称：“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弥勒还同法国党达成了在军事预算问题上弃权的默契。^①8月2日，弥勒回到柏林时，情况却发生巨大变化。德国向俄国宣战后，德国政府及其舆论散布了一系列谎言声称，俄国于8月1日，越过德国国境线；法国于8月3日，轰炸卡尔斯鲁厄和纽伦堡。同时，大肆煽动恐俄惧法情绪，造成德国处于东方（俄国）和西方（法国）夹击之下的危险印象。在不了解战争内幕的情况下，原来潜伏于德国工人阶级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几乎占据了绝对优势。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德国党国会党团主席团在8月2日，以4票对2票，否决了哈阿兹、累德堡的主张，建议党团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案，并于8月3日召开党团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激烈的辩论乃至争吵中进行的。达维德首先在会上发言。他公开主张，在当前情况下，要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重新进行思考，并以党团多数派的名义，建议同意批准军事预算案，同时发表声明无保留地、公开地表示，跟政府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站在一起。达维德和党团多数派的立场，受到李卜克内西、哈阿兹、累德堡等党团少数派的抨击。但是，达维德等多数派，以德国面临俄、法两面夹击的危险为借口，认为支持政府所进行的战争，既可以使法国摆脱与俄国的同盟，又可加速俄国沙皇制度的崩溃，有利于增强德国党的地位，以便在战后迎接强大的民主浪潮。同时，党内的机会主义领袖人物公开扬言，党如不支持政府，则与党分裂。党的理论家考茨基企图再一次“折衷”尖锐对立的两种看法。他提出，如果政府保证没有侵略意图，则同意批准军事预算案；如果政府拒绝作出这种保证，则拒绝批准。这种主张，因遭到普遍反对而被否决。经过激烈辩论，国会党团

^①见《崩溃》。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12页。

最后以78票对14票(1票弃权),通过达维德提出的同意批准军事预算案的建议,^①并责成党执委会和党团主席、反对批准军事预算案的哈阿兹在国会上宣读同意批准军事预算案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在党团会议决议的基础上,由一个专门委员会连夜写出来的。开始,哈阿兹坚决不同意由他在国会宣读,而推荐党团另一主席谢德曼,后在许多议员的鼓励下,哈阿兹才接受了这一任务。^②

8月4日下午,德国国会正式讨论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案问题,帝国政府首相霍尔维格在下午3点开始的第1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战争的长篇演说。他竭力宣扬德国善良的“和平”愿望,拼命掩饰德国挑起战争的真实意图和事实真相,渲染所谓德国面临俄、法两面夹击的现实危险,号召全民团结以进行保卫祖国的自卫战争。霍尔维格这个富于煽动性的演说,得到德国党许多议员包括休特古姆、海涅、弗兰克等人的热烈喝采。稍事休息,国会第2次会议,于下午5时21分举行,对军事预算案进行初读讨论和投票。会议开始,哈阿兹即受托发表党团关于赞成批准军事预算案的声明。尽管“声明”指出了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战争恶果,强调了德国党关于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的一贯立场,并拒绝承担进行战争的责任。^③但是,“声明”的基调,并不是

①反对批准军事预算案的14人是李卜克内西、累德堡、伦施、哈阿兹、阿尔勃雷希特、安特里克、波克、盖耳、亨克、赫尔茨费尔德、库涅尔、派罗特斯、吕勒和伏格特赫尔。未出席这次会议的艾米尔,后来表示和上述14人持同一立场。

②见《1914年8月4日前后》,载《文献选编》,第2卷第431~433页。

③对声明中这种表态,哈阿兹在1916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作过自我解剖:“8月4日声明中明确提到,我们不承担进行战争的责任。但这是言行不一致。投票表决就是行动。企图在言论上拒绝承担责任,而最后通过行动承担起责任,这是自相矛盾。”见《战争期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0页。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保卫祖国”。它公然声称：在敌人的突然入侵威胁面前，“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需要的资金的问题。”“声明”宣布：“我们不能在危险关头把祖国置诸不顾。”德国党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保卫祖国”，按照“声明”的说法，“对于我们的民族和自由的未来来说，沾满本民族优秀分子鲜血的俄国专制制度如果得胜，就将蒙受重大的危险，乃至是绝顶的危险。”^①以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国会党团少数派，还在8月3日会议上，就曾打算发表关于反对批准军事预算案的声明；多数派决议被通过后，少数派又曾试图在国会单独公开投票反对军事预算案。可是，这两项措施，最后都未付诸实施。按照李卜克内西的说法，少数派之所以屈从于多数派压力，而未单独采取行动，一是对党的领导集团存有幻想，以为党还能在战时坚持阶级政策；二是为党的纪律所约束，不敢和党内的错误多数分道扬镳；三是在当时危险的局势下，特别是当人们怀疑党时，不愿因公开与多数派决裂而削弱党。结果国会党团以一致行动的方式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案，公开地站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边，从而宣告了德国党思想政治方面的破产！

德国党，作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典范，其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案的行动，在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8月5日，列宁从克拉科夫报纸上获悉上述消息后，即公开宣布：“这是第二国际的末日，……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要成为共产党人。”^②意大利党也发表声明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支持德国和奥国的战争政策，已失去了称自己为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权利。”8月底，休特古姆受命前往罗马游

^① 《声明》，载《文献选编》，第2卷第428~430页。

^② 《列宁年谱》，第3卷第363页。

说时，就曾受到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冷遇。^①考茨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利用自己在党内和第二国际中的影响，从8月8日开始，在《新时代》上，先后发表《战争》、《战争的影响》、《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和战争》等文章，竭力抹煞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为德国党机会主义多数派辩解。他认为，战争是在参战列强没有一个真正要战争的情况下爆发的，每一个都是勉勉强强地被拉进去的。^②因此，对于任何人都是“自卫”，“保卫祖国”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义务，参加这种“自卫”。他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拿出全部力量来，使国土的独立和完整不受侵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不能因此而责备别国社会民主党人。^③实际上，还在1911年，考茨基就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大家首先都成了爱国者，连抱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也如此；如果个别人竟然会具有超人的勇气，想要起来反抗这种举动并且想要阻止军队开往国境和征集大量军用物资，那么，政府不必费一举小指之劳，就能收拾这些个别人。暴怒的群众自己就会把这些人打死。”^④这些主张，到战争爆发时，很自然地就变成了为“保卫祖国”行径辩护的托词。考茨基还认为，国际团结决不排斥民族感情，即“在本民族的独立

① 见《社会党人和战争》。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17～18页。

② 《战争》，载《新时代》。见《考茨基言论》，第175页。

③ 《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1卷第77页。列宁认为，这种言论表明，考茨基已经堕落到了“比叛徒还可耻的地步”。同上，第78页。

④ 《战争与和平》，载《新时代》。见《考茨基言论》，第109页。

和幸福受到威胁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维护和保卫”。德、法两党的国会代表，就是根据这一精神，对军事预算案投赞成票的。①正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起来揭露国会党团的公开叛卖时，考茨基却鼓吹“有必要保持党的内部团结，放弃任何标新立异的行动”，并以纪律束缚群众行动，要求全党比从前更加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地为党的机会主义实践作后盾。他甚至提出，对党的领导集团所采取的哪怕是错误的措施，也不能由于某种意见分歧，而煽起内部冲突。不然的话，就更加错误，“简直是祸患无穷的了。”为此，他主张，“批判的武器现在也必须默不作声。”“目前我们的成就的最重要条件，不是批评，而是信任。”②列宁认为，考茨基这一系列表现和上述言论表明，他已经滚进机会主义泥潭，并以特别虚伪、庸俗和高傲的诡辩来为机会主义辩护。③同战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相比，考茨基的立场“比他们所有的人更伪善，比他们所有的人更恶劣，比他们所有的人更有害！”④因此，无条件地和公开地同国际机会主义者及其庇护者们(考茨基)进行斗争，尤其是要同最危险的

①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种言论等于说：“国际主义就是一国的工人为了保卫祖国而向另一国的工人开枪。”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页。饶有趣味的是，考茨基晚年作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如实地承认，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军事预算案，影响到国际的所有其他各党，简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打击。这次投票过程中，到处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之前，它被看作是典范和骄傲）投降了帝国主义，二者同流合污了。”见《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第68～69页。

②《战争》，见《考茨基言论》，第178页。

③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页。

④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9～150页。

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作斗争，这是革命社会党人的任务。

3. 国际性“雪崩”

由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到堕入民族主义泥坑，由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本国政府敌对到公开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站到本国政府一边，这种灾难性的转折，酿成了国际史上空前未有的“雪崩”。处于“雪崩”顶端的是和德国党同时投入战争的法、比、奥等国社会主义政党。

法国社会党同德国党一样，都是第二国际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工人政党，而且它在以包括总罢工在内的革命手段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方面，比德国党更激进。在瓦扬的影响下，法国工团非常代表大会曾于1911年10月通过决议宣称，工人必须“毫不迟疑地用革命的总罢工回答任何一次宣战”。这个决定，“在宣战时立即生效……对每一个工人来说，宣战应是立即停工的信号。”1912年11月，工团代表大会再次重申了这个决议。因此在战争爆发前夕，法国政府十分不安，专门拟制了著名的“B号名单”（“工人领袖危险分子”名单）。只要战端一开，拟逮捕2,501名工会干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防止他们发动拟议中的反战总罢工。^②可是，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1914年8月3日，德国首先向法国挑起战端；8月3日深夜至4日拂晓，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以假道进攻法国。这在法国人民尤其在法国社会党人中，很自然地唤起了关于1870年普鲁士军队入侵法国的历史回忆，爱国热情顿时勃发。特别是德国，作为专制主义的国

①列宁在1914年10~11月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书信，集中地表达了上述看法。详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页，第35卷第145~156页。

②见《人道报》和《现代法国的发展》，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25~26页。

家，进攻素有民主共和传统的法国，更触发了民族主义的激情。因此，德国是战争祸首、法国是战争受害者这样一种舆论，很快成为法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主导思想。法国政府充分地利用了一点。总理维维安尼，不失时机地向社会党人作出允诺，将和英国一起，对俄国施加影响，以促使其通过仲裁解决冲突，并作出了不以任何借口挑起边境冲突、不主动宣战的保证。正是在这种“事实真相”的影响和政府保证的迷惑下，在举国反对侵略、维护民主共和传统的气氛中，为沙文主义所左右的法国社会党及其影响下的工会组织领导人，在政策上实行了重大的转变。8月4日，法国党在众议院中，与其他政党一起，未经辩论，即一致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拨款要求，并决定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建立“神圣联盟”，以抗击德国的入侵，保卫法国的民主共和传统。就连一贯主张以总罢工反对战争的工会领导人，也在报上公开号召：“挫败德国军国主义，拯救法兰西民主和革命传统。”^①8月底，面对德国的强大攻势，法军节节败退。为此，法国总理维维安尼出面，邀请社会主义政党派代表参加国防政府。法国社会党迅速作出反应。8月27日，社会党议会党团、执委会和《人道报》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两名老战士盖德（他一直不同意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和桑德参加国防政府。^②8月28日，《人道报》发表法国社会党关于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宣言”指出，社会党人一般地并不同意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现在问题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法国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整个民族，拿出在我国历史上的类似时刻曾经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奋起保卫自己的领土和自由。”“宣言”公开号召：“不仅要为祖国的生存和法兰西的尊严而战，并且要为共和国的

^① 《国际和世界大战》。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25页。

^② 另一社会党人托马，于1915年5月22日，出任内阁军需部副部长，尔后又担任军需部部长。

自由和文明而战。”^①就这样，一个拥有90万党员、139万选民和101名议员的法国社会党，终于投入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火并。

比利时的情况有所不同。它是欧洲的中立国家，并没有象法国、德国那样分别加入对立的军事同盟，而且它的中立国地位已得到各大国的尊重和保证。恰恰是这些人们包括社会党人没有意料到的国家，却受到德国军队的进攻和入侵。因此，比利时社会党人反映之强烈，更胜过法国社会党人。8月2日，德国呈递要求允许德军进入比利时对法军作战的最后通牒后几小时，比利时工人党总委员会在比特兰主持下开会，决定赞成政府决定，对德军的入侵进行自卫，并决定取消原定于3日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第2天（8月3日），总委员会发表《告居民书》，一方面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欧洲大战所造成的流血事件“不负任何责任”；另一方面，又强调，在敌人侵犯国土的情况下，要以极大的热情，“来保卫我国的中立和生存，使其不受野蛮的军国主义者的侵犯。”该党号召应征入伍的工人，要“表现出社会党工人的那种临危不惧的气概”，并认为党属于工人国际同合理地保卫个人和国家并不矛盾。^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比利时工人党议员，于8月6日，在议院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案；作为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的王德威尔得，战争一爆发（8月3日），最先加入比利时国防政府，完全站在比利时所参加的协约国一边，反对同盟国及其社会党人。从此，这位国际局主席，不再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共同领袖，而成了维护本国政府及其盟友协约国利益和政策的一名政府部长。

奥地利，是7个交战国的10个社会党中唯一没有对战争公开表态的党。因为战争全面展开之前议会就已被解散，奥党也无须对军事预算案或加入政府等重大问题表态。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战争问题上，它是一个“中立”的党。还在战争初期，即1914年

^{①②}《历史资料 I》，第206~208、214页。

10月8日，阿德勒就曾在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上指出：“我知道，必须投赞成票（赞成军事预算案）。我只是不知怎样把它说出口来，但又非说不可……。尽管是那么可怕，也别无其他办法。因为相反的一面更加不好……，比战争不好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①在奥地利社会党人看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俄国对奥地利的威胁，比之对德国更加直接、更加危险。一旦战争失败，奥匈帝国将被俄国肢解，整个奥地利就得向沙皇俄国俯首称臣。如同奥、德同盟不可分离一样，奥党关于战争的态度和行动，也几乎和德党同步，而成为其盟国的一个政治附庸。

同率先投入战争的法、比、奥党不同，英国工党并没有处于这场“雪崩”的顶峰。英国早就属于俄、法的盟友，是协约国阵营的重要成员。只不过出于老大帝国的好滑，迟至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后，英国才以保护中立国为借口，正式对德宣战，卷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火并。因此，英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有更充裕的时间在尚未宣战的情况下，开展反战活动，进行有关战争问题的辩论。直到8月4日宣战前几个小时，工联和各社会主义政党联席会，还在抗议英国介入战争。第2天清晨，工党执委会又通过决议，重申反对引起战争的政策，号召为重建欧洲工人之间友好情谊提供最好机会的条件下尽早赢得和平。5日下午，工党议会党团就是否批准政府军事预算案发生激烈论争。包括党团主席麦克唐纳在内的4名独立工党议员，反对批准政府军事预算案，并力主当议会讨论时，宣读工党执委会于5日发表的反战声明。最后，党团多数不顾他们的反对，通过了关于赞成军事预算、支持政府进行反对德国侵略战争的决议。党团因此发生

^①1916年1月20日，阿德勒在“工人报”上写道：“要不是我们被剥夺了表明决心的任何可能性，我们会自己同意拨款来保卫国家抵抗俄国的。”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20页。

分裂。独立工党书记麦克唐纳，因反对投票批准军事预算案，辞去党团主席，独立工党于8月13日发表反战宣言；^①以新任党团主席韩德逊为书记的工党以及费边社，通过10月15日正式发表的宣言，竭力为政府的战争政策辩护，公开号召工人站在政府一边，为反对战争的罪魁祸首德国军国主义、维护英国与欧洲的安全而斗争。1915年5月26日，韩德逊同布雷斯·罗伯茨一起，参加战时联合内阁。同时，工党还同资产阶级政党就在战争期间停止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以实现国内和平问题达成协议。以海德门为首的社会党，则早在8月12日的宣言中，表达了“保卫祖国”的立场。

这场国际性“雪崩”，还席卷了一批小国或小民族的社会主义政党。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就以反对沙皇俄国以争取民族解放为由，公开站在德、奥一边。该党执委会还在宣言中，号召工人武装起来，投入战争，以便“同波兰的历时千年之久的宿敌”沙皇俄国进行战斗。波兰社会党则走得更远，战争一爆发，它就同以贵族和资产阶级议员为主体的波兰俱乐部，联合组成由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直接指挥的波兰军团。该党领导人皮尔苏茨基，担任军团总司令。匈牙利、捷克的社会主义政党、报刊和工会组织，也采取了和波兰党相同的立场。它们以保卫西方文明免遭东方野蛮暴行威胁为理由，完全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并公开主张阶级和平，鼓吹“战争使阶级斗争暂时停止了，富人和穷人，企业主和工人，都在一个队伍

^①独立工党的反战立场，也并不彻底。麦克唐纳在辞去党团主席的第2天，即8月8日，在选区发表演说时，他一方面谴责战争罪责，另一方面又声称，既然战争已经爆发，那就应该把战争进行到底。见《战时的劳工》。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598页。

中进行斗争。”^①荷兰在欧洲是一个处于中立状态的小国，不存在进攻和防御的问题。但是，战争一爆发，18名社会主义议员，在议会中也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军事拨款案和军事动员等应急措施。该党领导人特鲁尔斯特拉等人，还在各种场合公开号召工人，团结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周围。

由帝国主义战争所触发的国际性“雪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噬了第二国际多数成员党。这些党，陷入“雪崩”的情况不一，理由也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使本民族的独立、主权不受侵犯为出发点。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统治、奴役各民族的情况下，这些党维护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弃的是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结果，使各国工人阶级在同一的沙文主义旗帜下，投入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大火并。战前，各国社会党人引以自豪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到战时，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在战场上相互残杀的实践。也正是从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点出发，原来统一于第二国际之中的各国社会党人，按照本国政府隶属的军事集团，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社会党集团：协约国社会党集团和同盟国社会党集团。

4. 左派的崛起

几乎在第二国际多数成员党公开倒向资产阶级的同时，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却异军突起，高举反战和革命的旗帜展开斗争，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

最早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是第二国际中鲜为人知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和荷兰社会民主党的“论坛派”。和比利时

^①见《人民之声报》和《工会公报》。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600~601页。

一样，塞尔维亚也是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但是，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却采取了与比利时工人党截然相反的方针。

7月31日，塞尔维亚议会，在交战国中最早就军事预算案问题投票，在民族主义的喧嚣声中，塞尔维亚党的两名议员明确地指出，本国政府应对目前的战争危机负责。社会民主党不能对政府表示信任。同时，他们还宣布：“在奥匈各族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之间不允许发生战争。”^①议会最后以口头唱名表决，164名议员都表示赞成，唯有两名社会主义议员公开表示反对。

荷兰马克思主义者，采取另一种方式反对战争。1914年8月1日，战争刚刚爆发，马克思主义者即在《论坛报》上提出“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口号，并号召工人开展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揭露机会主义者和民族沙文主义者。同时，他们还专门通过决议指出，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因此，必须拒绝用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目的的任何拨款，并借助于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斗争的支援，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②这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第二国际各国党中确属凤毛麟角。

德国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8月4日投票时没有公开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反战的革命立场。就在国会党团一致赞成军事预算案的当天晚上，敦克尔、梅林、马尔赫列夫斯基、迈耶尔、埃贝莱因、皮克等人，即在卢森堡住处举行会议，就当前局势和任务进行讨论。会上，卢森堡愤怒地斥责了国会党团的叛卖行径，认为放手大胆地向工人呼吁，以最激烈地反对党团，是绝对必要的。她针对着考茨基所谓坐等时机、放弃斗争的主张指出：“现在沉默和坐待良机，就是叛变和可鄙的怯懦。”

^①见《国际和世界大战》。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39页。

^②见《论坛报》。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602页。

最后，会议作出加强同全国各地左派联系和团结的决定。9月3日，李卜克内西针对着费舍、休特古姆在瑞士、意大利、瑞典等国报刊上散布的举党一致支持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案的谎言，通过《不来梅市民报》，披露了党团内部讨论情况。李卜克内西指出，在是否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案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还利用9月访问比、荷的机会，向兄弟党成员介绍8月4日后德国党的情况。与此同时，由卢森堡倡议，李卜克内西、蔡特金、梅林等签署的声明，公开地表示不赞成党的领导人关于战争起因、性质及党在战争中作用的观点，驳斥所谓在争取“国内和平”问题上全党一致的谎言。9~10月间，李卜克内西在集会上和致执委会的声明中，明确地提出了彻底转变国会党团多数派的立场，重建国际、彻底改革德国党等任务，并表示接受地方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他的批评，今后决心毫不妥协地为反战、反对机会主义而斗争。由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努力，柏林、莱比锡等地，已形成一批左派小组。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国会会议上，不致重演8月4日的事件，从11月中旬起，李卜克内西在广泛地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即着手起草并完成了关于世界大战起因和性质的提纲。这个提纲，揭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抨击了统治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进行的蛊惑宣传，戳穿了“反对沙皇专制斗争”和“国内和平”口号的虚伪性，并号召德国和其他参战国人民起来反对战争。^①经过充分准备，在12月2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上，当德国党国会党团几乎一致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第2次军事拨款

^①见《文献选编》，第2卷第440~449页。这个提纲，有一个附录。它是为重建国际奠定巩固基础的纲要。主要涉及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保卫祖国、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阶级斗争与国内和平、通过斗争以尽快结束战争等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法案时，李卜克内西挺身而出，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一大壮举。本来，李卜克内西还准备了一个拟在国会宣读的关于反对军事拨款案的声明，结果被国会党团否决。根据国会议长的指示，“声明”也未被列入国会记录。尽管如此，《声明》却以传单形式迅速传播开来。在“声明”中，李卜克内西除了阐述上述《提纲》的基本观点外，在陈述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法案的理由时还明确地提出：“我反对战争，反对战争的元凶祸首，反对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政策，反对战争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目的，反对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反对军国主义独裁，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至今仍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表现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①李卜克内西的壮举及其“声明”，在德国和国际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它成为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斗信号。就在李卜克内西采取上述行动的同时，博尔夏特于1915年1月间，发表小册子《1914年8月4日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背弃了自己？》它鲜明地指出，由于右派领导人的背叛，德国党已沦为“资本主义的斗争工具”。列宁认为，这是一本“出色的书”，它向群众指出了德国党的政策在8月4日前后“极其明显的矛盾”。^②

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当社会党领导人公开倒入资产阶级营垒时，革命的社会党人仍然在坚持斗争，并发出了正义的呼声。1915年3月11日，保尔·果雷在洛桑作了一次关于《垂死的社会主义和应当再生的社会主义》的讲演。他从战争爆发时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倒戈的基本事实出发，针对着敌人营垒传出的“社会主义已经完蛋”的说法，明确地指出：现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的社会

^① 《历史资料Ⅰ》，第192～193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0页；另见《大事记》，第1卷第333页。

主义，而是“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它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人民愤慨情绪的摧残者；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其勇敢行为的“自动制动机”。果雷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蜕化。各交战国的党，尤其是“组织很完善，躯体很健壮，但是已失去灵魂的”德国党，应负主要责任。根据战争期间社会主义蜕化这一特殊形势，果雷进而提出，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严厉的病要服厉害的药”。他主张，代替这种垂死的社会主义的，应是“国际主义的、不调和的、起义的社会主义”。它必将导致行动，唤起群众，举行革命声势浩大的起义，最后把罪恶的政府扫荡掉。他着重地指出：“在几百万人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切革命行动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合法的。它们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神圣的。为了把我们这一代从血染欧洲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无产阶级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去尝试难以实现的事情。”这个讲演，在理论上仍有缺陷，讲演者在组织上又不敢子同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却是极其宝贵的。列宁称它为我们这个可耻时代的“一件大事情”，并指出，果雷的真诚、正直品格和讲演中所包含的极深刻的内容，“在第二国际的著名的活动家中简直是绝无仅有的！”^①

由于战争的爆发和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面目的彻底暴露，1914年底~1915年中，在欧、美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已形成一支坚决抗战和反机会主义的左派力量。其中，包括德国党内“国际”派（斯巴达克派），荷兰的论坛派、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的紧密派、美国的产联的和社会主义宣传联盟，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奥地利、匈牙利党内的左翼反对派，以及法、英、意、捷、瑞典、挪威、瑞士等国党内的左派小组、团体和国际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7~335页。

者。他们坚持革命的反战活动，尖锐地批评已经腐朽的机会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公开重申社会主义国际的原则，为团结广大群众、积极准备革命斗争，作出了最艰苦努力。但是，由于力量弱小，组织涣散，它们还不能充分发挥其革命潜力，尚未成为领导本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核心。当时，真正站在反战和反机会主义斗争前列而成为左派中坚的，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

8月1日，当列宁在国外获悉俄国已向德国宣战后，即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同志一起，讨论当前的局势。列宁强调，在战时条件下，必须探求党的工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并恢复由于战争而破坏了的同俄国国内各个党组织的联系。他坚信，战争将加速革命的到来。^①8月8日，俄国国家杜马讨论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议会党团，在杜马共同发表宣言指出：“现时的战争是侵略政策的产物，是应当由现今一切交战国的统治阶级负责的。”尽管许多情况阻碍俄国工人公开地对战争进行抗议，然而俄国无产阶级和欧洲无产阶级是联结在一起的，并深信“无产阶级必将找到足以尽速结束战争的办法。”宣读完“宣言”后，社会主义议员未等杜马开始读票表决，即在资产阶级议员猛烈攻击、叫喊、辱骂声中退出会场。^②这个“宣言”由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加米涅夫起草。列宁在国外看到“宣言”后，对于其中“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指出，这个口号是“神甫的口号”，“无产阶级的口号应当是：国内战争。”^③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这场战争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还在列宁参与修改并为国际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已包含这一基本思想，后来为国际巴塞尔大会所肯定。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即1914

①见《列宁年谱》，第3卷第362页。

②见《历史资料Ⅱ》，第229~230页。

③见《列宁回忆录》，第260页。

年7月底，列宁即着手起草《战争与革命》一文的提纲。8月间，他利用被奥地利政府关押狱中的机会，缜密地考虑了党在面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下所应实行的任务和策略。9月初，列宁获释后，又同瑞士党以及布尔维克党人讨论关于战争、国际和反机会主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于9月6日写出《革命社会党人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9月8日，即在伯尔尼布尔什维克党会议上，以此为内容作了报告。尔后，经过征求国内同志的意见，修改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宣言》（《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纲》），于11月1日发表。这是战争初期国际舞台上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在这个文献中，列宁揭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了资产阶级为掩盖战争实质而制造出来的各种谎言，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多数成员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分析了国际机会主义破产的根源，阐释了布尔什维克和国际工人阶级关于战争、和平、革命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变帝国主义现代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从而为团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育广大群众，以革命的新国际代替已为机会主义者把持的旧国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①

四、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道扬镳

1. 各国人民的反战斗争

帝国主义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前线，充当资产阶级炮灰的士兵，大量死亡、失踪、受伤、残废；在后方，各交战国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物资奇缺，食品匮乏，能源紧张，物价飞涨，再加上战争状态所带来的日益强化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空

①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0~17页。

前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各国人民，特别是交战国人民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本国反动政府的斗争，在欧、美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它在战争初期即已见端倪。只是由于第二国际及其多数成员党领导人的背叛，由于各国反动政府对革命者的残酷镇压和沙文主义的煽动，群众尚未组织起来，因而反战斗争尚未成为主流。随着战争扩大、人民群众苦难加深和工人阶级的觉醒，到1915年初，已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①

站在这个运动最前列的，是各国工人阶级。其中，包括军火工业企业的工人。^②罢工斗争，是他们反战的主要手段。以德、俄、法3个交战国为例，1915~1917年间的罢工斗争，呈现出一种直线上升的趋势。1915年，3国共爆发有56.3万人参加的1,163次罢工，平均每次484人；1916年，人数增长99.2%（112.2万人），次数增长58%（1,838次），平均每次610.4人；1917年1~9月，比上年分别增长36.89%（153.6万人）和3.69%（1,906次），平均每次805.8人。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不懈努力和深入发动，在这3年中，俄国不仅罢工次数和人数逐年迅猛增长，而且从1915年4月开始，每次罢工的平均人数，几乎逐月增长：4月，343.5人；5月，364.5人；6月，488.1人，8月，718.7人；11月，达732.2人。按罢工损失的劳动日计算，1914年8~12月，为16万个，1915年1~5月，为61.6万个；1915年6~10

^①列宁指出：“正是在1915年，由于战争引起了危机，各国群众的革命骚动日益增长：在俄国发生了罢工和政治示威运动，在意大利和英国发生了罢工运动，在德国发生了饥民游行和政治示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11页。

^②到1916年，各交战国从事军工生产的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是：英国46%，德国58%，俄国72%。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233页。

^③《国际工运史知识手册》，第671~672页。

月，为96.7万个；1915年11月～1916年3月，则高达174.9万个，相当于1914年8～12月的10.9倍。^①和俄国相比，英国罢工次数、人数交动的幅度不大，但是，就罢工的规模，却相当可观。1915年7月，英国南威尔士矿工罢工，投入斗争的，达20万人，并坚持了1个星期之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交战国的一些重要的军工生产部门，如俄国彼格勒生产军需品的普梯洛夫工厂、莫斯科制造榴弹炮的迪纳莫工厂和德国开姆尼茨赖尼克军火公司、哈特曼机车与大炮工厂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有的还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交战国军队，由于厌恶战争而发动兵变乃至起义，是各国人民反战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连年战争，伤亡惨重，交战国军队中，早就潜伏着一股不满情绪，反战运动日益高涨和左派社会党人的反战宣传，更使士气极度低下，军心日趋动摇，违抗军令、开小差、拒不上前线的事情时有发生。据法国官方统计，开小差的士兵，1915年，为2,433名；1917年，达2.1万人；1917年6月，违抗军令的，高达75个步兵团、23个轻骑兵营和12个炮兵团。^②在俄军惨败、爆发二月革命的形势推动下，法国军队从1917年4月开始，其前线2/3的师发生骚乱。参与哗变的，共90多个团，一直延续到9月才被暴力镇压。^③一些国家的军队还直接触发了起义。1915年10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主力舰“甘古特号”水兵起义；不到两年，德国“路易·波耳特摄政三”号舰400名水兵和锅炉工，在士兵组织的领导下，集体拒服兵役，并结队离舰上岸召开大会，公开号召反对战争和帝国主

①见《俄国史文献。1914～1917》载《文献选编》，第3卷第481～482页。

②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240页。

③见《法国史》，第497～498页。

义。他们高呼：“打倒战争，我们再也不愿意继续作战”的口号。列宁认为，德国水兵这一革命行动，“正是大转折的标志，正是全世界革命前夜的标志。”^①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中，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党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组织群众，进行反战游行示威，散发革命传单，在军队中开展宣传鼓动和出版社会主义报刊等形式，掀起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火热斗争。在这一方面，德国党内的左派显得尤为突出。还在1915年3月18日，即德国国会第3次就军事拨款案投票前夕，200名妇女在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声援德国党尤其是反对军事拨款案的李卜克内西。^②两个月后，在皮克组织下，以妇女为主体的1,500名群众，为反对意大利参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战争爆发后首次群众性反战示威集会，与会者高呼：“我们要和平，召回我们的丈夫”、“给我们的孩子面包”等口号，因此而受到警方追捕。1916年，为庆祝“五一”节，德累斯顿、哈瑙、耶拿等地工人，为争取和平举行示威游行；柏林几千群众齐集波茨坦广场，李卜克内西在游行队伍中高呼“打倒战争”、“打倒政府”等口号。反动当局竟然践踏李卜克内西作为国会议员所特有的豁免权，对他予以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在法庭上，李卜克内西义正辞严地宣称：“我在这里是控告，而不是辩护。不是国内和平，而是国内战争。这就是我的口号！”^③为了抗议法庭对革命者的迫害，6~8月间，斯图加特、不来梅、不伦瑞克、埃森等

①《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页。

②不负众望，第3天（3月20日），李卜克内西和吕勃一起，在党团多数投票赞成的情开下，在国会再次公开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法案和军事预算。见《大事记》，第1卷第335页。

③同上，第357~358页。

城市和地区，分别举行了有数以千计工人参加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组织群众进行反战示威罢工的同时，德国党左派创办的《国际》、《光线》杂志以及李卜克内西撰写的《敌人主要在国内》等传单，在反战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领导和组织群众的反战斗争，左派党和左派组织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除布尔什维克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左派党继续坚持斗争外，在德国已形成以《国际》杂志、《光线》杂志、《不来梅市民报》为核心的左翼集团；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瑞典、挪威、荷兰、美国、瑞士，相继涌现了一批左翼反对派或左派小组。尽管他们的色彩不同，力量还很弱小，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本国党领导人的背叛，因而开始成为一支与各国党内和第二国际内部社会沙文主义者相抗衡的革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已开始采取反战的国际行动。1915年3月26~28日，由布尔什维克妇女组织国外代表倡议，国际社会主义妇女执行局书记处，在伯尔尼主持召开了有来自10个国家30名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4月5~7日，由瑞士青年组织发起，在伯尔尼举行了有10国14名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这两次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或宣言，都明确地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了“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机会主义政策，并号召妇女和青年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进行阶级斗争和采取革命行动，从而为把革命社会党人组织起来，加强反战、反帝的国际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还为革命的社会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斗争提供了国际场所。正如列宁在评价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时所指出的：“大会上发生冲突的是两种宇宙观，两种对战争和第二国际任务的看法，两种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①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79页。

2. 中派主义者的微妙变化

随着群众性反战斗争的空前高涨，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力量的不断集结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哈阿兹等人，对战争和机会主义领导集团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1915年春开始的。

1915年3月10日，党的主席之一的哈阿兹，一反前此尾随多数派支持政府的态度，在战争爆发后首次批评政府的政策。3月18日，德国党内的中派分子武尔姆，在国会党团会议上，进而警告一直压制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党团多数派，不要“把弦子拉得太紧；工人群众对党团多数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中派’立场”^①。3月20日，国会表决军事预算案时，30名中派议员既没有象李卜克内西、吕勒那样采取反对立场，也没有象党团多数那样投票赞成，而是集体离开会议大厅以示弃权。^②尔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又促使考茨基、哈阿兹等人态度进一步左倾。一件事是德国工业家联盟等6大经济团体，向帝国首相递交关于战争目的的备忘录，就缔结和约的条件提出了一项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使德国“获得足以向外扩张的力量”的兼纲领。它充分地暴露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发动并继续战争的侵略野心。另一件事是6月9日由李卜克内西起草、其他9名反战议员签署发表了反对党的执委会和党团多数派政策的公开抗议书，要求党宣布废除“国内和平”政策，按战前的决议和纲领进行反战的阶级斗争。这个抗议书的发表，加深了机会主义集团的分歧，争取了不少受中派影响的干部。几天之内，在它

^①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7页。

^②李卜克内西、吕勒拒绝了中派关于表决时一起退出会场的要求，再次投票反对政府军事预算案。见《大事记》，第1卷第335页。

上面签名的，由开始的10人，增加到1,000人。^①面对这种事态发展，哈阿兹、考茨基、伯恩斯坦，于6月19日署名发表题为《当务之急》的宣言。这个宣言，尽管没有提出反对“国内和平”与组织反战革命行动的口号，^②但是，它确曾表达了劳动者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愿望，对党内多数派的政策进行了批评，并呼吁党的领导集团，转到政府的反对派立场上来。因此，它在党内得到一些组织的响应，并遭到党的领导集团的谴责。^③8月14~16日，在研究对战争和未来和平的态度问题的党团会议上，哈阿兹又提出关于反对德帝国主义兼并政策和侵占比利时的声明，结果被党团（59票对37票）和仲裁委员会（25票对13票）所否决，进一步加深了中派主义者与党团多数派的分歧。^④

1915年秋冬，德国群众性的反战斗争进一步高涨，以致党团多数派也不得不向政府提出和平质询。考茨基、哈阿兹等也采取了新的行动。针对着党团多数派的谴责，考茨基在《新时代》上撰文指出，在党团中投反对票，并不破坏党的纪律。威胁党的统一的，是缺乏言论自由，因为无法讨论党内分歧。党内右翼领袖谢德曼在评述对考茨基这个行动的反应时指出，它在党团中又一次发生了大混乱，又一次众所周知的表示赞成和反对的演说。正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339~340页。

②因此，列宁称这个呼吁书是“一幕滑稽剧”，“它的作用是依靠向左鞠躬来挽救社会民主党中的腐朽的东西，依靠口头上向‘左派’作一些微小的让步，以便实际上巩固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3页。

③6月28日，执委会和党团，在《前进报》上发表题为《反对破坏党团组织的行为》的呼吁书，谴责考茨基等人的言行。这个呼吁书，为6月30日党的仲裁委员会所肯定。

④与此同时，多数派代表大卫提出的包含有兼并要求的提纲，却以多数票被通过。见《大事记》，第1卷第342页。

是在这种背景下，哈阿兹于12月20日在国会党团会议上声明，少数派将在国会投反对票，他本人要求辞去国会党团主席职务，并同自己的拥护者（30人）一起退出会场。第2天，18名中派议员首次同李卜克内西、吕勒一起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第5次军事拨款法案。^①以这次投票为基础，国会党团内部，开始形成以哈阿兹、累德堡为首的反对派（“12月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在第2年3月24日，又同李卜克内西、吕勒一起，在国会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紧急预算案，因此受到党团多数派的谴责与制裁。1916年1月12日，党团多数派以违纪名义，将李卜克内西开除出党团之后，^②同年3月24日，又开除18名反对预算案的中派议员。3月30日，被德国国会党团开除的中派主义者，宣告成立以迪特曼、哈阿兹、累德堡为首的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该社在其通告中，针对着执委会、仲裁委员会、党团主席团于3月27日在《告全党书》中对中派议员的谴责，公开批评党团多数派的立场，表示要坚决地执行党在战前作出的各项决议。^③由此，包括该社和斯巴达克派在内的党内反对派开始形成。1917年1月7日，由哈阿兹、累德堡等发起，在柏林召开反对派代表会议。为进行报复，德国党仲裁委员会，于1月18日以29票对10票将反对派开除出党。1917年4月6～8日，反对派再次在哥达举行代

^①同时，还有22名中派议员在投票前退出会场。盖尔代表中派议员发言时指出，德国的边境是安全的，所以他们投票反对拨款。李卜克内西一方面肯定上述反对派的行动，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并批评了上述说法。见《大事记》，第1卷见345～346页。

^②投票结果是60票对25票，12名未投票的议员事后表示反对这一决定。1月4日，吕勒为支持李卜克内西，也退出党团。见《大事记》，第1卷第347页。

^③见《大事记》，第1卷第347、351～352页。

表大会，宣告成立中派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在保留思想政治上独立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小组加入了该党。^①

应该说，包括考茨基在内的中派主义者，公开批评党团多数派的政策，投票反对军事预算案，表示要执行党在战前的政策和纲领，并和斯巴达克派一起举行反对派会议，宣布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集中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内部对机会主义集团强烈的不满情绪。和他们中有的人如考茨基在战争初期支持帝国政府和党团多数派的立场相比，是一种进步和左倾的表现。但是，中派主义者在反对战争和机会主义的问题上很不彻底，同党内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带根本性质的分歧。

关于对待战争的态度。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在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革命斗争，直至用国内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机会主义者则坚持通过继续和扩大帝国主义战争，以在有利于本国政府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缔结和约。在这个当时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考茨基等中派主义者，并没有同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而是同机会主义者心气相通。还在1915年春，当“国际”派散发李卜克内西起草的“敌人主要在国内”的传单，提出以工人阶级的反战阶级斗争来反对战争的罪魁祸首，以同德国党领导人的“国内和平”政策决裂时，考茨基等人发表的宣言，却闭口不谈革命行动，而主张卷入火并的帝国主义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休战与实现民主和平。为此，曾受到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批评。^②1916年底1917年初，当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德国政府已难以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转而鼓吹和平谈判，试图以帝国主义和平代替帝国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365～370页。

^②李卜克内西在《1915年12月派》的传单中，曾指责中派缺乏革命行动的准备。

主义战争时，考茨基不仅不揭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一阴谋，相反，却通过1917年1月初反对派柏林会议通过的宣言，欢迎帝国首相于1916年12月12日作出的和平姿态，认为它是统治集团中正在产生的和平愿望的象征。在他看来，争取和平的斗争，并非反对整个统治阶级，关键在于破坏统治阶级中的主战派势力。只有通过人民群众对政府施加压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宣言还提出了坚持民主自决、维持边界现状、缔结关于建立国际仲裁法庭以解决国际冲突和限制军备协定等要求。实际上，考茨基等人主张，是在不触动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只要靠帝国主义政府，即可结束由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场革命将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是它对战争及其结局将产生怎样的作用问题。他和其他中派主义者，当时所注目的，并不是如何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发展，而是如何尽快结束战争，以在帝国主义和约基础上，实现他们之间的民主和平。这种取消革命、美化帝国主义和平活动的态度，同斯图加特大会关于战争和革命关系的决议、同巴塞尔宣言的革命精神相比，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倒退。

关于对党团多数派的态度。自1915年春以来，考茨基等中派，确曾对执行叛卖政策的党团多数派，进行过批评乃至斗争。1915年初，考茨基曾指出：“几个月之前对统一的最大威胁，来自左边、来自罗莎（指罗莎·卢森堡——引者注）的拥护者。现在的威胁来自右边”，即来自“聚集在大卫和工会活动家周围的一些人”。但是，中派主义者认为，批评乃至揭露党团多数派的错误政策，其目的不在于与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集团彻底决裂，而是要同其保持组织上的统一。1916年9月，在党的执委会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斯巴达克派代表敦克尔已经明确地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要求同执委会方针决裂，同模棱两可的、主

①考茨基致阿德勒（1915年2月11日）。

要立足于议会活动的方式决裂，把争取和平与革命斗争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以号召群众开展反帝和反战的斗争。哈阿兹却强调，要实现党内的和解，应在社会民主党纲领牢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实现党的统一，而反对派则要无条件地维护党的这种统一。一直到1917年反对派召开柏林会议时，哈阿兹才认为，党已失去独立方针，并成为首相和政府的俘虏。现在是反对派联合起来的时候了。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反对派的这种联合团结，并不意味着党的分裂。他说：“我们希望留在党内。”当时斯巴达克派代表迈耶尔就曾指出，中派很不彻底，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同留在一个党内极其危险。在一个政党内部，不能长期并存两个相互敌对的派别。当反对派留在党内能开展反执委会的阶级斗争，则可继续留在党内；一旦这种斗争不可能进行，则应不惜与党的领导集团分裂。^①显然，在党的统一问题上，反对派内部存在着分歧。斯巴达克派主张，坚决地揭露批评党的机会主义集团，直至与其决裂；中派主义者则认为，应同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实行统一。前者，坚持同党内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立场；后者，则持同机会主义者妥协的立场。

关于对斯巴达克派的态度。考茨基等人，由原来把斯巴达克派视为党的统一的最大威胁，转而与其实现联合，并将机会主义者视为党的统一的最大威胁，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以取斯巴达克派而代之、不惜任何代价地保持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为基点的。1915年底，考茨基就曾在《新时代》上撰文指出，反对党团多数派的情绪正在增长，群众怀有反对心理，这会使激进主义在群众中占上风，而且党本身正分为“两个彼此不相干的极端相反的营垒”。为此，考茨基劝告党团多数派，要允许“少数分子”即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会发

^①参见《大事记》，第1卷第361~362页。

^②参见《大事记》，第1卷第366页。

表一些激进演说，以平息群众的反抗情绪。①1916年8月7日，他在致阿德勒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来自斯巴达克派的威胁是很大的。它的激进主义符合广大未受到训练的群众的当前需要。”他认为，面对着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发展的现实，“问题不再在于反对派是否获胜，而在哪一种反对派获胜？是那些想破坏党的反对派，还是哪些想在党内成为多数的反对派？”前一种反对派，是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派；后一种反对派，则是指他和哈阿兹为代表的中派。同时，考茨基指出，如果没有中派即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党团多数派在大卫、连施、列金的压力下，就会继续向右转，比现在实际上走得更远”；如果中派即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象他希望的那样，在一年前就单独活动，“斯巴达克派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意义”。因此，考茨基宣称：“我们是中派，它的力量大小，将决定是否能够成功地克服来自右边和左边的离心力。”按照考茨基的分析，他并不否认右翼是党的统一的重大威胁，但是他并不愿意倒向左翼，而是要取后者而代之，以在党内占据多数。1917年4月，当反对派哥达大会着手成立新党时，考茨基曾指出，召开大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德国党内的反对派，而不是要形成一个新党。他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及其拥护者单独开会，没有斯巴达克派参加，那么结果当然是另一个样子。②考茨基的上述言行表明，他一度偏离机会主义集团，决不意味着要向马克思主义者靠拢，更不打算全盘接受斯巴达克派的革命主张，只不过想要防范德国党斯巴达克派化，用考茨基主义即中派主义来重新改造党。

3.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孤鸿哀鸣

①见《新时代》，1915年11月26日。

②考茨基：《我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第8页。

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一些尚未卷入战争的中立国社会党，曾试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以使各国党联合行动，尽快地结束战争。其中，由意大利党倡议召开的战时社会党人首次聚会，于1914年9月27日在卢迦诺举行。与会的仅有意大利和瑞士党的8名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强权政策的结果，是资产阶级为占领外国土地、谋求新的出口市场所进行的斗争，也是他们企图击败社会民主党和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进行的一场战争。“宣言”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个别集团也被沙文主义的洪流所裹胁”的事实。但是，它并未揭露和批判“保卫祖国”的叛卖政策和社会沙文主义；它重申无产阶级国际的原则，强调联合行动反对继续战争，却未提出反战革命斗争的具体措施。接着，又于1915年1月17~18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社会党人国际会议，与会的，包括瑞典、丹麦、挪威、荷兰的8位代表以及荷兰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和波兰—立陶宛“崩得”的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表达了用稳定和和平来结束战争的愿望，重申战前第二国际关于裁减军备、国际仲裁等决议，并强调，应敦促工人阶级尽一切努力夺取政权，以便能击败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向会议提交了列宁起草的反战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①

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原打算利用自己国家所处的中立地位，调解已陷入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社会党之间的矛盾，并通过召开所有国家社会党参加的大规模国际代表会议或国际大会，来弥合第二国际的巨大裂缝。结果，遭到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包括英、法、比党的强烈反对。原来视为战友和兄弟的社会党人，由于分别站在已隶属于两大军事集团的本国政府一边，不可能再坐在一起商讨问题。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党人的国际

^①两次会议有关文献，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563~576页。

联系，形成一种特殊的格局，即按两个对立军事集团，召开不同的国际会议。尽管两者的腔调似乎极其敌对，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即竭力为“保卫祖国”的背叛行径辩护，决心把这场使国际无产阶级相互残杀的帝国主义战争打到底。

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14日在伦敦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英、法、比、俄的社会党代表40人。议程包括：1. 民族权利（比利时和波兰）；2. 全部有关殖民地的问题；3. 未来和平的保证。^①王德威尔得实际上是伦敦会议的发起人。他为这次会议提出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指导思想，即“用明确无误的决议，唤起现正进行战斗的无产者的精神，用对协约国社会党人策略的确信无疑，去摧毁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左右下，会前，法国党就曾要求并声称：“只要德国军国主义不消灭，就谈不上和平。社会党人和一切有意使人类今后免遭血腥侵略的人的职责，是将战斗继续进行到底。”据此，法、比两党提出了一个以“打到底”为基调的联合声明。战前，曾坚决主张总罢工、战争一爆发即陷入机会主义泥潭的法国党领导人瓦扬，就联合声明作了一个象过去谈总罢工那样慷慨激昂的、特别“爱国”的发言。他声称，法国不希望战争，但是为了争取和平，法国无产阶级将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德国军国主义完全被摧毁时止。”王德威尔得则完全以一个协约国盟友的身份和一个“受害者”的口气说：“德国和奥地利，仍然是造成这次灾难的罪犯”，并坚持比利时一定要解放。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鲁巴诺维奇，尽管也表示俄国对塞尔维亚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他认为“协约国的胜利，即意味着民主的胜利”。因此，“俄国人民赞成战争”。经过决议起草委员会3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和讨价还价，通过了由王德威尔得提出的关于战争问

^①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576~577页。

题的决议。^①“决议”主张，解放被德国侵占的比利时，使波兰完全独立，使被武力并吞的各国人民，从阿尔萨斯—洛林直到巴尔干的各族人民，都得到充分的自决权。为此，必须消灭威胁各民族独立生存的德国军队。鉴于“德帝国主义的胜利，就等于欧洲民主自由的彻底毁灭”，“决议”表示，各国社会党人将为实现上述目标坚决一致地战斗到底。^②

俄国各派社会主义者，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议。会前，2月6日，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派的《我们的言论报》，曾致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议用“鲜明的革命国际主义”观点，反对“正式的社会爱国主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当即表示同意，并由列宁起草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8点宣言草案。^③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接到邀请，但是，其驻伦敦代表李维诺夫（马克西莫维奇）闻讯后，即赶往会场，代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读了“声明”。“声明”明确地指出，遭受沙皇俄国政府迫害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你们的代表会议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声明”还正式要求王德威尔得、盖德、桑巴退出比利时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内阁；比、法两党应同背叛社会主义旗帜、为掩饰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狂热服务的集团决裂；停止无视沙皇制度罪行的方针，支持反沙皇制度的斗争；德、奥、法、比党，由于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案，同资产阶级缔结“国内和平”，对社会主义和国际犯下了滔天大罪。“声明”最后呼吁与会的各国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打倒破坏无产阶级事业

^①委员会表决决议时，英国麦克唐纳反对，俄国切尔诺夫弃权。由于王德威尔得的工作和瓦扬的让步，麦克唐纳改变态度。仅在1票弃权下通过决议。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577~578页。

^②《历史资料Ⅱ》，第240~241页。

^③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05~108页。

的沙文主义。^①还没等李维诺夫把“声明”读完，即被会议主席哈弟中途打断。为表示抗议，这位布尔什维克代表立即退出会场。孟什维克虽然没有和布尔什维克采取共同行动，但是，它的代表马尔托夫以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名义，向会议递交书面声明指出：“在这样一个人为的限制协约国各党代表权基础上召开会议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拒绝接受按照无产阶级敌人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暂时一致来区分无产者的方针。”“声明”还强调，只要社会主义政党没有使自身摆脱国内和平，没有恢复政治上的独立，就不可能克服国际的分裂。^②

4月12日~13日，同盟国德、奥、匈党的代表，在维也纳由阿德勒主持召开会议。与会者的发言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表示渴望结束战争和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以及重申民族自决权，却只字不提阿尔萨斯—洛林、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前途。相反，却用一种外交语言明确地表示：“尽管战争长期拖延，各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决心全力地维护自己的独立”，以此来表示同本国政府一起，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同盟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侈谈所谓“民主的和平”、鼓吹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和平”纲领的同时，又极力为其“保卫祖国”、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叛行为辩护。与会各党一致同意的决议公然声称：“交战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保卫自己的国家和本国人民的行动，不应该成为各社会党之间保持国际接触和继续进行他们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的障碍。”^③这一席话，彻底暴露了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心声：在“保卫祖国”即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国际，实现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和平”。

4.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内部的激烈较量。

^①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459~461页。

^{②③}《文献选编》，第3卷第581、583~584页。

1914年9月召开的罗迦诺会议曾决定，1915年5月30日，在苏黎世召开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以便联合行动，反对继续战争，并恢复因战争而分裂的第二国际。由于瑞士社会党人认为不合时宜，这个决议并未付诸实施。意大利社会党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1915年4月，该党代表莫尔加利曾与英、法两党和国际局联系。法国党公开表示，由于世界大战是德国统治阶级强加给协约国的，决不同德国社会党人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并决心把战斗进行到底。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王德威尔得的答复是：“只要德国士兵还盘踞在比利时工人住宅里，召开国际局会议就无从谈起。”上述尝试失败后，意党执委会又在一些党的支持下，于1915年5月15日发出呼吁，希望尽快地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邀请各国党和工人组织参加，“只要他们反对任何国内和平，遵循阶级斗争基本原则，愿意与各国党一致行动争取迅速地实现和平。”这个倡议，很快就得到一些党的响应和支持。瑞士的中派分子、《伯尔尼哨兵报》编辑格里姆，马上接过旗帜，并以中派为对象发出邀请书，而把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派党与组织排除在会议准备工作之外，以提出一个中派纲领。列宁得悉这一情况后，即对格里姆的错误作法进行揭露，同时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对这次会议的基本立场：有人请，我们就去；预先把左派即主张采取革命行动和反对本国政府的人团结起来；代表布尔什维克、荷兰、德国左派提出与考茨基分子相反的决议草案，推2~3人，在会上发言。^①经过斗争，布尔什维克代表季诺维也夫正式参加了1914年7月1日在伯尔尼召开的预备性会议（伯尔尼磋商）。但是，荷兰、波兰、德国和拉脱维亚边区的左派党和小组仍被排斥在预备会议之外。会上，除了确定未来的国际会议的议程，主要就与会代表的条件问题，进行激烈辩论。布尔什维克党建议，与会代表必须是：坚决进行反对国内和平的斗争，即反对米勒兰主

^①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327~330页。

义,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领导反对沙文主义者的斗争;努力恢复并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把它发展为革命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布尔什维克党还主张邀请一切左派党的代表参与会议准备。会议几乎全部否定了这些建议,有人还主张无条件地邀请伯恩施坦、考茨基、布兰亭、哈阿兹、特鲁尔斯特拉等参加会议。经过辩论,预备会议决定,不管在社会主义总的概念上存在的原则分歧,对所有准备进行反战斗争的组织和团体,都发出邀请。按照这一决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和本国政府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本应排除在未来会议之外,会议应成为反战的左派会议。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季诺维也夫所指出的,“所谓左派会议,实际上将是一次‘中派’‘调解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会议。”预备会议之后,列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国际会议。从7月22日起,他通过书信、会议、写作等渠道,强调必须团结各国国际主义者,制定革命策略,揭示战争性质,以与考茨基等中派划清界限。为此,他撰写并出版了《社会主义和战争》一书,在左派中散发。会前,他还在伯尔尼召开有左派和部分关心左派纲领的代表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交流看法,协调行动,并对左派将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和宣言草案进行积极准备。^①

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伯尔尼郊区一个山村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以这个山村命名的会议、运动和左派组织,从此著称于世。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俄、波、意、瑞士、保、罗、德、法、荷、瑞典、挪威等11个国家的代表38人。^②这是大战爆发、第二国际公开分裂以来,欧洲反战的社

^①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484~487页;《列宁年谱》,第3卷第478~501页。

^②英国社会党、独立工党、美国社会党、法国教师联盟和罗纳工会同盟等组织,原拟参加会议,因本国政府阻挠,未果。见《三个国际的历史》第249页。

会主义者举行的第1次国际会议（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会上，以格里姆为代表的中派占绝对优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等左派组织代表只有8人。

无产阶级的和平行动，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大战爆发后，首次在一起出席国际会议的法国和德国党代表梅尔黑姆、布尔德朗、霍夫曼、累德堡，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了战争业已暴露的帝国主义本质和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反对派力量被卷入民族主义涡流的事实。它强调，“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表达了“希望通过早日实现和平来结束战争的愿望”，并表示反对国内和平政策，忠于作为社会党国际基础的阶级斗争。但是，“声明”回避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和用革命措施来反对并结束战争的问题。^①与之相对立的，俄国（孟什维克除外）、波兰、拉脱维亚边区、瑞典、挪威、瑞士、德国等国左派，提出了另一个决议草案。它明确地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通过对帝国主义矛盾和战争后果的分析，决议草案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通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战胜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矛盾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决议草案尖锐地指出，宣传社会爱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德、奥、法、英、俄等国党的

^①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494～495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因被当局强制服兵役未与会）。他在致会议的贺信中，鲜明地提出：“毫不留情地清算国际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叛徒及变节者。”他主张，会议应表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立场：“是国内战争而不是国内和平！”他指出，强调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为的是反对假民族、假爱国主义的阶级调和，是为了国际争取和平的阶级战争，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同上，第492页。以下凡出自此书的文献和发言，只注页码，不再一一注释。

某些领袖，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比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宣传家更加危险的敌人。“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是动员无产阶级和恢复国际的首要的必需前提。”为进行反战斗争以实现和平，决议草案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否决拒绝一切军事拨款案；退出内阁；在议会中和各种报刊上，揭露战争的性质；同社会爱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利用战争后果，开展包括反政府示威在内的人民运动；在前线战壕内，宣传国际团结；使经济罢工尽快变为政治罢工等。总之，“我们的口号不是阶级间的国内和平，而是国内战争！”最后，决议草案强调，“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和人类的解放。”（508~510）这个决议草案，遭到许多中派分子的非难。他们认为，讨论原则和制定总纲已超出会议的目标，不是这次会议的任务；有的甚至主张，会议不应成为一种倾向的工具，不应搞不和，而应达成一致。格里姆还指责决议草案没有面向群众。累德堡则指出：“只有处于安全环境的人们（指在国外的列宁等人）才签署”这种决议，等等。列宁曾两次发言，捍卫左派的决议，驳斥和抗议中派的攻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条件下的责任，是从战争中实地寻找革命的出路。由于左派在会上不占优势，决议草案最后以12票赞成、19票反对而被否决。（489）

供公开发表的会议宣言，共提出3个草案。经过7人委员会审订，由格里姆和托洛茨基以《我们的言论报》的草案为基础，写出最后文本，为大会一致通过。会议没有接受左派的宣言草案，但是，在通过的会议宣言中，却接受了左派宣言和决议草案的影响。它明确地指出，是帝国主义造成了这场战争，并揭露了资产阶级为掩盖战争性质而制造的种种谎言；它批评了那些践踏国际决议、参加资产阶级内阁、赞成军事拨款案从而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的社会民主党，并指出了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在战争中已遭失败的事实；它还提出了以革命斗争争取和平的基本原则，

等等。(195~499)从这个意义上,列宁等左派同意签署,并认为,会议宣言标志着“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方面迈进了一步”。①左派对“宣言”并不完全满意。在就会议宣言发表的声明中,左派指出,会议宣言没有包含对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以及用激烈词句掩饰起来的机会主义者予以说明,而后一种机会主义者,不仅是使第二国际陷于破产的主要罪人,而且它还想使这种破产永远存在下去。“宣言”也没有对反战手段加以明确说明。左派在“声明”中表示,将一如既往,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孟什维克、波兰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左派)、波兰代表团和德国维尔滕堡反对派,也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声明、宣言和信函。(501~506)

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成立了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领导机构。会议认为,社会党国际局本身,是促进无产阶级争取和平行动和同各社会党建立与保持必要关系的最合适的组织。然而,国际局目前的状况,使之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成立另一个组织。据此,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决定,选出一个设在伯尔尼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当选为委员会成员的是:莫尔加利、奎恩、格里姆、巴拉巴诺娃。列宁认为,违反国际局的意志,并在公开斥责国际局策略的宣言基础上成立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实际上是新的国际局。②主持委员会工作的格里姆等人却认为,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替现有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当国际局完全可以实行它的任务时,秘书处将马上解散。”(491)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代表会议一个最大的成就。”③经过列宁等人的努力,

①《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3页。

②③《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7、368页。

已初步形成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核心的左派集团。俄国和拉脱维亚边区、保加利亚、波兰、瑞典、瑞士、挪威、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社会党人，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执行局，并于1915年10月18日，由列宁等签署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全体成员和小组的《第1号通告》。尔后，列宁经常主持召开执行局会议，讨论参加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扩大会议，创办左派刊物《先驱》，出版左派文集等事宜。由于左派的积极行动，在组织群众性反战斗争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到1915年底，欧、美28个社会党中，就有13个党和两个党中的8个反对派，先后声明加入这个运动。尔后，奥、葡、塞尔维亚、芬兰、保加利亚、南非、美国等国的党或党的小组、反对派和工会团体，先后成为这个运动的成员。^①

对于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社会党国际局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胡斯曼等国际局领导人，把这次会议尤其是左派，看成是“威胁党的统一的危险”，认为会议是“几个党的光杆义勇兵”的一次集会。^②1916年1月初，胡斯曼还亲自四出活动，竭力为国际局的错误辩护，同时提出恢复国际局活动的计划，倡议召开国际局会议，以便联合各交战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公开对抗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为此，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扩大会议（1916年2月）决定召开第2次代表会议。

会议于1916年4月24~30日在伯尔尼郊区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的有44名社会党人代表。其中，属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代表12人，支持左派的代表19人。同第1次会议相比，不仅左派代表数量增加了，而且各国党内反对沙文主义的斗争正方兴未艾。德国党国会党团，实际上分裂成了3个集团，即执委会党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678页。

^②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56页。

团多数派社会沙文主义集团，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中派集团和斯巴达克派（“国际”派）左派集团。后者于1月、3月、4月，在柏林召开过两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在耶拿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代表会议，并通过了同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者包括右翼、中派主义者作斗争的决议。^①同时，一些党组织，以党的领导机构的行为已不符合党的原则和决议为由，拒绝向党的执委会交纳党费，从而强化了左派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使之成为一支令机会主义者生畏的强大政治势力。法国党，继1915年底在巴黎代表大会上首次出现批评党的领导的反对派之后，又于1916年4月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反对战争政策和资产阶级政府问题，再度发生公开对抗，反对派在会上获得960票的支持（约占代表总票数的1/3），从而给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沉重打击。^②这种情况，在其他交战国的社会党内也有表现。“各地事态的发展均已导致同社会爱国派明显的决裂。”（514）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这种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次会议的进程。

会议的临时议程共9项，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和要不要参加国际局倡议召开的国际会议，是讨论的中心议题。左派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它针对着中派试图用保卫民族独立、保卫民主的口号，来掩饰大战性质这一伎俩，集中地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和实质，在国际舞台上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口号。决议草案写道，正当帝国主义的分赃条约在加深新的战争危险的时候，“小资产者、机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独立工党等）竟力图脱离现实生活，并吸引人民群众也脱离现实生活，而去追求‘民主和约’的泡影。”实际上，这是对人民的欺骗，是遮盖和粉饰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残酷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346、350~352、353页。

^②在党内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盖德和桑巴于1917年初，退出资产阶级内阁。

现实。社会和平主义的客观作用，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替机会主义者助长声势。决议草案从分析反战斗争、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政权的斗争形势和业已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入手，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唯一的和平纲领，即号召和组织无产阶级参加斗争，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冲击，“放下武器、把武器指向共同的敌人！指向资本家政府！”（525~528）由于左派决议草案的影响，各国党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斗争的推动，昆塔尔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有了明显的进步。它在揭示战争性质、根源的基础上，不仅揭露了各国政府及其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且首次揭露了社会爱国主义代理人所散布的“战争目的是建立持久和平”的谎言。“决议”在逐一分析了帝国主义条件下反对兼并、限制军备和监督政府外交的空想性质后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摒弃资产阶级或社会党的和平主义的空想要求。”这种和平主义，“无非是在群众中制造混乱，使群众脱离革命的阶级斗争，是有利于玩弄‘作战到底’的政策。”“决议”还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认为“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只能包括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之内”。“决议”在重申国际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大会决议之后，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不能以这一或那一军事和战略状况为转移”，应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反对交战国一切兼并要求，通过阶级斗争消除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所追求的战争赔款。（522~525）昆塔尔决议，回避了当时国际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对中派主义与社会和平主义关系问题的认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以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方针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潜伏着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内部左派与中派的分裂。

关于是否参加国际局会议的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和激烈辩论。它不仅涉及到对国际局如何评价及对其破产原因的认识，而且关系到要不要以新的国际来代替已陷于分裂的第二国际的问题。在前一个问题上，认识大体一致；关于要不要成立新的国际问题，左派与中派之间的观点针锋相对。

列宁在为布尔什维克党起草并提交会议的提案中，根据上次会议以来德、法、英、美等国党内分裂不断加深和扩大的事实指出：“实际上，全世界已经发生分裂，已经暴露出工人阶级对待战争的两种绝不调和的政策。”针对着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等人想要恢复已经破产的国际局的企图，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向群众说明，同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而实行资产阶级政策的人实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①列宁的这些主张，未为会议接受，并遇到中派的反对。布里宗公开声明：“法国代表团不是为了成立一个新国际而来的。”塞拉蒂甚至扬言，如果代表会议声明退出国际的话，意大利代表团就退出这次会议。^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局的决议，没有提及列宁关于同国际局决裂的要求，却认为，只要无产阶级能够摆脱一切帝国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并重新走上阶级斗争和群众性活动的道路，国际局仍然能从瓦解状态恢复成为一支明确的政治力量。（535）与“决议”有所不同是，会议的正式报导从正面回答了列宁的要求：“代表会议的大多数人强调说，虽然在各国党的行列中，以及在第二国际内部，目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但人为地规定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还没有可能。新的国际，必须通过工人阶级不断的和日益加强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和通过澄清社会主义概念从群众中间产生，而不能由某个代表会议规定产生。”

昆塔尔会议实际上人否决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的要求。但是，在对战争时期国际局的评价和认识上，却有新的进展。这是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3页。

^② 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57~58页。

左派同中派斗争的结果。一开始，左派主张不能支持国际局和召开国际局会议。如果这样做，就等于帮助控制国际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欺骗工人；在会议中占多数的中派则认为，应要求召开国际局会议并进行宣传，以便把国际局这个有用的机关争取过来。经过激烈辩论，仍相持不下，最后由波兰左派代表拉品斯基提出折衷方案，即一方面谴责国际局，同时，把参加国际局会议及相应的宣传，作为悬案搁置下来。布尔什维克也提出议案主张，如国际局召开会议，先在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内部协调行动。在上述议案基础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关于国际局的决议。（516～517、534～536）“决议”从7个方面概述了国际局在战争时期的错误立场和恶劣作用。它指出，由于国际局用所谓全民防御为帝国主义战争辩解，宽恕所有放弃社会主义旗帜的人，并竭力挫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分子，它已经变成所谓“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政策的同谋犯。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由于自己的叛变，“从而使工人国际的中央机构，堕落成为帝国主义联盟手中的驯服工具和人质的可耻角色。”他在最近，又试图通过社会爱国派间的单独媾和，以恢复第二国际。据此，会议决议认为，应当警惕国际局在有利于大国联盟的一方或双方政治利益的时刻，召开国际局会议；万一召开国际局会议，则应首先讨论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联合行动以及在会上“揭露民族社会主义企图转移工人阶级目标的真正意图，……彻底反对这一联盟的欺骗。”“决议”还认为，各国党有权以自己名义召开国际局会议。

昆塔尔会议谴责国际局背叛一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际局在庆祝“五一”的宣言中，公开为自己辩解，指责齐美尔瓦尔得运动“试图将分化的办法用到国际中来”，并声称，只有国际局，“现在是并且应该始终是各党之间进行联系的环节”。^①随后，国际局又于1916年7月31日，召开社会党代表会议（海牙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696页。

会议)，并拟于1917年3月，举行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代表会议，企图以社会和平主义对抗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还没有来得及召开，俄国即于1917年3月10日（俄历2月25日）爆发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

5. 一场新的“和平”喧闹

二月革命胜利时，西线协约国的军队，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当时，协约国联军的军力损失过半，已经精疲力尽，美军又尚未成为可以依赖的对象。再加上国际左派的反战宣传鼓动，工人士兵厌战，要求停止战争以实现和平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同盟国德国，却仍然保持着进攻的势头。^①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寄希望于东线，盼俄军一如既往地帝国主义世界战争打到底，以防止“祸水”西引，缓解日益严重的军事危机。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刚刚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已经掌握政权的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却于3月27日（俄历3月12日），以其第1次全体会议的名义发布题为《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宣言认为欧洲各国人民亲自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刻已经到来，号召德国人民，象俄国工人摆脱沙皇独裁统治那样，砸毁本国独裁统治政权的枷锁，并通过共同努力结束这场可怕的大屠杀。与此同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还倡议实现“不割地、不赔款、以各国人民自决权为基础”的和平，以尽快结束战争。这个宣言，为后来成立的临时政府所采纳。俄国方面的举动，立即引起反响。德国政府加快了与俄国单独媾和以集中对付西方协约国的步伐；

^①据英国M. J. 威廉斯博士的统计，1914~1918年，西线死亡人数，德军120万，英、法两国军队死亡200万。其中，1917年，德军死亡、失踪28万，英、法军队死亡33万。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第273、274页。

站在协约国政府一边的西欧各国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很担心俄国新政府会上德国关于单独媾和的当，使后者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所有协约国。为此，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接踵而至彼得格勒，以说服俄国把战争进行到消灭德帝国主义为止。当时把持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与其同德国单独媾和，最终使德国消灭它在西方对手后，集中全力扑灭俄国革命，还不如同协约国社会党人及其政府站在一边，继续进行战争，抗击德国，保卫革命。据此，他们提出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已经改变，必须以“革命的护国主义”名义，继续世界大战的社会沙文主义纲领。也就是说，要以革命的名义，继续进行战争，来保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把持的祖国。正是以此为前提，俄国和其他协约国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提出了召开世界社会主义代表会议的建议，由此开始了为争取“和平”的“喧闹”。

同盟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也不甘示弱。1917年4月初，由德国党的谢德曼、帕尔乌斯倡议，并经政府外长批准，由丹麦党的柏格比尔出面，以“中立国”丹麦、瑞典、挪威3党的名义，向苏维埃执委会建议参加拟议中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以讨论缔结和约问题。4月22日，国际局荷兰委员会特鲁尔斯特拉、万一科尔、维博和阿尔巴达，向所有成员党包括交战国党内的反对派，发出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邀请。尔后，伯格比尔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的发言中，又向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发出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并把德国党（实际代表德国政府）能够接受的签订和约的条件，即“退还全部赃物”的条件，通知该执委会，当即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接受。经过磋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又决定，自行发起召开国际会议，并于5月15日发表《告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号召书，建议会议于7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同盟国和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协约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反对。英国的韩德逊、

法国的托马和比国的王德威尔得，以英、法、比3党名义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召开一次有同盟国多数派社会党人参加的国际会议，既不可能也极其危险。它声称，德、奥两国社会党，“不在本国国内公开发表声明，取消他们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的联系”，就不可能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俄国孟什维克仍未放弃这种努力。6月16日，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正式批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关于召开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决定，并派出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组成代表团，走访同盟国与中立国，将原来筹备会议的组织局，改为俄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委员会。但是，终因协约国政府认为议和条件尚不成熟，遂由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出面公开反对；德国、俄国党内的左派也坚决反对，喧嚣已久、竞争激烈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不得不宣告流产，而用一系列党际双边谈判（斯德哥尔摩谈判）来代替。①负责筹备的组织局，改名为中立国社会党人委员会，并由原来亲德的组织变为亲协约国的工具。

对于社会沙文主义这种“和平”喧闹，左派社会党尤其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开始就采取反对立场，并对其作了彻底揭露。德国“国际”派还专门发表声明指出，同政府社会主义者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将直接违反国际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因此，“国际”派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加与政府社会主义者一起召开的会议。”“社会党唯一的和平宣传行动，是向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发出呼吁，呼吁他们进行有利于和平的革命阶级斗争，以俄国无产阶级为榜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必须彻底清算各国的政府社会主义者，并以自我批

① 5月11日开始到10月，先后有18个党和6个独立派别的代表到斯德哥尔摩，就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举行预备性谈判。谈判中，各参战国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提交了大量的文件、材料，以便按照本国政府的指令，为帝国主义政策和本党的背叛行径辩护。

评和同各正式的社会党迄今存在的耻辱和堕落决裂的实际行动来开展国际社会主义的和平活动。(545~547)

还在5月间,正当丹麦的和伯格比尔肩负德国党与德国政府使命,前来彼得格勒游说时,列宁就曾指出,伯格比尔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拟议中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滑稽戏”,是一场掩盖外交家幕后勾结的喜剧。列宁为布尔什维克会议起草的决议认为,出席有伯格比尔和谢德曼参加的代表会议,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联合各个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代理人,而是联合在战时与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工人。”^①

五、革命道路问题上的两军对垒

1. 对帝国主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刚刚形成时,就在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内引起热烈的争辩。如何看待帝国主义这种新的经济、政治现象;它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政策,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的出现,是延缓还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怎样去把握它与战争、革命的关系;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迅即走向灭亡,还是更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此等等。不同集团及其代表人物,都作了回答,并从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从而加深了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内业已发生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分裂。

还在1898~1899年,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就曾针对伯恩斯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消除危机仍具有生命力的观点,探讨过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1907年,她在《资本积累论》一书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22~223页。

中，从研究资本积累理论入手又广泛地涉猎过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帝国主义同军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及机会主义的社会、阶级根源等问题，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在其生命历史上的最后阶段”，并力图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揭示帝国主义形成的必然性。应该指出的是，卢森堡并没有深入研究垄断这个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全面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特性，她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战争等问题上还有过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堡并没有创立严整的、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帝国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首推奥地利的社会党人希法亭。他的代表作，是1905年写成、1910年公开出版的《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研究》。^①在这部著作中，希法亭以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为对象，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丰富材料为依据，逐一考察了股份公司的发展促使20世纪使资本集中于银行资本家手中、银行资本竭力控制股份公司及其他企业并与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揭示了垄断发展与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与竞争、危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金融资本的理论。这个理论，肯定了以金融资本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业已到来这个客观现实，论述了金融资本作为“资本表现的最高和最抽象的形式”的实质，明确地指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41）希法亭在形成和阐释金融资本理论的过程中，已指出了生产和资本集中导致垄断以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这样两个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时，他在研究金融资本的对外和对内政策时，还揭示了资本输出、向外殖民扩张以及寡头统治代替民主自由等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希法亭基于对金融资本的政治统

^①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1959年俄文版的页码。转引自《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

治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控制的分析，论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金融资本的完成形态，这是最完备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它们集中在资本主义寡头统治者的手中。它是完成了的资本巨头的专政”，它使夺取政权成为经济解放的前提。“无产阶级的胜利，由于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资本巨头或巨头联盟的手中与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而接近了。”（478）按照希法亭的分析，无产阶级的胜利，决不是退到过去的贸易自由竞争时代，而是向前发展到社会主义，即“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474）

希法亭在揭示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胜利的内在联系的同时，还作出了总卡特尔的形成有可能消除危机，而进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估计。希法亭指出，从垄断组织的发展趋势看，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形成总卡特尔。在它统治之下，“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由一个主管机构有意识地加以调整，这个机构决定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规模。”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发生比例关系失调的经济危机。（312）到20年代，希法亭依据战后科技进步和资本主义工业国际化等新情况，进而提出系统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它将通过唯一自觉的、具有强制力量的组织即国家的影响，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①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由于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付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因而在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②同时，它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认识和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并激化了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以及

①《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第225页。

②《列宁全集》，第25卷第187页。

第二国际内部社会沙文主义的“脓疮”，使得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后果的论争日益白热化，形成了以考茨基、鲍威尔为代表同以布哈林、列宁为代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还在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星期，考茨基写了一篇题为《帝国主义》的文章。大战爆发后，他略作补充修改，将其发表在1914年9月的《新时代》上。这篇文章，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超帝国主义”的理论。1915年2月，他的《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对这个命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尔后，他还在《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1915年4月）、《再论我们的幻想》（1915年5月）等文章中作了发挥，从而形成了中派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超帝国主义”论。

按照考茨基的分析，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它不是一种经济必然性问题，只是工业资产阶级“心甘情愿地”采取的一种政策，即某些大国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强权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来说，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以改变的。某些大国推行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尤其是大国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直至爆发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已使金融资本家认识到，这种扩大剥削范围的方法，这种因追求增殖利润而使资本主义国家对立的政策和活动，将会严重地威胁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到战后，有远见的资本家，将会改变政策，用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来取代旧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全世界资本家的联合，来取代大国之间的竞争。据此，考茨基提出：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①在这个阶段中，帝国主义政策，将被新的“超帝国主义”政策所排除；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将为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所代替。届时，“至少资本主义道义上

^① 《帝国主义》，第17～18页。

的破产趋势就有可能暂时缓和下来。”就有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①并通过国际联盟和世界联盟，“创造一个持久和平的时代，把地球变成自由、平等、彼此友爱地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一个大家庭的居处。”^②考茨基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纪元，“无论如何是可以设想的”。因此，“谈论资本主义的完全的最终的破产，哪怕只是道义上的破产，是为时过早的。”^③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就是等待这个新阶段和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建立国家联盟或世界联系这种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形态的大帝国，并在这种最后、最高级形态中夺得权力。^④

同考茨基一样，鲍威尔也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种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是一种追求新的投资场所和新的销售市场的意图和思潮。它对工人有利，“促进了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欧洲提高了工资的购买力”。因此，他主张，在消除保护关税等弊端之后，应“冷静地对待帝国主义”。^⑤麦·阿德勒虽然也谈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不是客观的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意志。”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只是主观意志。麦·阿德勒同样认为，帝国主义，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联合的结果，必将为一种“世界组织”、“超国家的秩序”所代替。由此，不仅国家、民族间的对立将会缓解，其内部的对立也将真正地消除，而

①③《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第117、118页。

②《社会主义者和战争》，载《考茨基言论》，第494页。

④《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第16~17页。

⑤《鲍威尔言论》，第12~13、23、25页。

使“永久和平梦想”的实现日益接近。^①

由考茨基等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触及到了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还有没有生命力？考茨基等人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实际上，这是德国党内长期论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伯恩斯坦之所以要修正马克思主义，是以此为基点的。希法亭在阐发帝国主义理论中，也包含有这种思想，后来则更为鲜明。战争初期，库诺夫在1915年春出版的小册子《党破产了吗？》和后来发表的《幻想崇拜》中同样认为，帝国主义是“前进了的、加强了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决不是最后阶段，而是处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时期”；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强大的生命力。^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相对的稳定。据此，考茨基又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问题。他认为，世界大战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弹性，它对改变了的形势的适应能力，远比它的脆弱性更加强大。它经住了战争的烈火的考验，而今天，纯粹从经济上看来，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已经极其深刻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它对于最多样的、甚至最绝望的局面的适应能力，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论据足以令人怀疑它的生命力”。^③

同考茨基等人上述看法相左，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却从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这一方面，布哈林和列宁具有代表性。

1914年冬，布哈林即着手收集资料，借鉴各派学说主要是希

①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第266～267、270页。

② 见《党破产了吗？》，第7页。

③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5分册第259页。

法亭的金融资本论，开始撰写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写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全面地阐释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

关于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布哈林是从世界经济入手研究国际垄断组织问题的。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问题。（8）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空前提高，特别是技术的空前进步，世界经济已有迅猛发展。它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了资本主义从未有过的新经济组织：国际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它们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最高的组织发展阶段”。（37）它们的形成，固然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援助措施有关，但是，真正的、必要的条件，则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生产集中。“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过程，是资本积聚与集中过程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延续。”（43）布哈林坚持从生产力发展着眼、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入手，来揭示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垄断形成的原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是他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有价值的看法。

关于金融资本在国际领域的竞争。布哈林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发展，在垄断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银行资本的集中已发展到极大规模，因而使“银行资本向工业资本渗透，从而使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48）布哈林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师承于希法亭，但是在两个问题上却高于希法亭。一是他不仅讲银行资本控制工业，而且强调工业家的代表们也管理着银行这样一个相互交叉结合的新形式；二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他特别重视银行资本国际化的问题。按照布哈林的分析，在国内，金融资本与资产阶级国家相结合，形成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由于它“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

①以下注有页码的引文，均出自中文版《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

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联合企业”，从而排除了竞争，并把它转向国外。（51~52、100~101）在世界经济范围内，金融资本不仅不能排除竞争，而且随着资本生产力的膨胀，外贸的蓬勃发展，各国资本向外扩张趋势的加强，国际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它集中地表现为大国间对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和投资范围的激烈竞争。“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转变成金融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结果。”（78）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大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最终势必由实力对比来解决，直接导致军国主义和战争。“金融资本的统治意味着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就这个意义来说，军国主义和金融资本本身一样，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现象。”（100）布哈林从金融资本的国际竞争和向外扩张中，论证了新形势下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揭示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阐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根源。

关于作为特定历史范畴的帝国主义。和希法亭不同，布哈林认为，不能停留于只对帝国主义“扩张”、“暴力政策”等概念下定义，而应分析产生这种政策的基础。在布哈林看来，金融资本，是一个历史上限定的时期，即仅限于近几十年。作为金融资本的政策帝国主义，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88）它包含着一系列其他的历史倾向和特征。从纵向来说，它是旧的前资本主义和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代的延续和发展；从横向来说，它集中地反映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一定状况的生产关系、一定状况的经济生活的组织形式、一定的阶级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的一定的前途等等。总之，“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生产组织已经相当成熟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政策。换言之，帝国主义政策存在的本身，就证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105）因此，布哈林称他论述的时代，是“金融资本和帝

国主义政策的时代”。（96）从上述论断中，我们不难看出，布哈林不仅仅是从政策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帝国主义这一新现象，而且透过金融资本所推行的政策，揭示了它赖以产生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哈林及其著作，“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①

对“超帝国主义”论的批评。还在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垄断组织时，布哈林就曾指出：“现代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结构上的高度的无政府状态。”其表现，就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和战争。只要这种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存在，即使在国民经济领域里完全消除了自由竞争，工业危机也将继续存在，战争的问题也是如此。（33~34）只有那些看不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经济生活国际化及其无政府状态现实的人，才会去指望资本主义有可能和谐地达到和平的、高度的统一。（40）不仅如此，布哈林还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篇中，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作了集中的评述。针对着考茨基所谓垄断组织间有可能组成一个国际卡特尔的说法，布哈林指出，作为抽象的理论推论，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从帝国主义当前现状分析，没有理由指望各国托拉斯会达成协议或合并，甚至进而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108）针对考茨基所谓由于受到来自下层的压力，资产阶级将会放弃其帝国主义方法的主张，布哈林指出：“我们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或者压力很弱，那末一切依然如旧；或者压力大于‘反抗力’，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将不是一个超帝国主义的新时代，而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社会发展的新时代。”（112）总之，宣称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下可以解决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空想”。（106）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在批评“超帝国主义”论时，主要着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94页。

眼于关于国际卡特尔并不排除竞争和危机的分析。至于国内垄断组织，他认为已完全排除竞争。其中，实际已包含着希法亭、考茨基力主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在1920年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中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随着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从不合理的体系成为合理的组织，从无主体的经济转变为经济的主体。

几乎在布哈林研究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关系的同时，列宁也开始了帝国主义论证。它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并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实践任务为中心。还在1914年10月，列宁即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中指出：“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他还强调，“社会党人决不能放弃在这方面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渝的准备工作。1915年2月，在揭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分析战争发生的条件时，列宁概述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特征，并且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①据此，他在同期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继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时代之后，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的动荡的时代”。^②

1915年8月，列宁利用住在瑞士泽伦堡的方便条件，认真地思考与消化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历史经验，并从伯尔尼、苏黎世图书馆借阅、研究了大量有关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文献和论著，就帝国主义和无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6、1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125页。关于第3个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在1903年就已指出，这是一个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十分紧张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417页。

级革命的关系问题形成以下几方面的成果。

关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工业部门都操纵在垄断组织这些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整个地球几乎都被这些“资本大王”瓜分完毕，金融资本控制了其他国家，垄断代替了贸易自由和竞争。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已由进步走向反动，并为人类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①

关于一国首先胜利的命题。在《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23日发表）一文中，列宁从分析“资本已经具有国际性和垄断性”入手，指出了世界已被少数强国瓜分完毕的事实，揭示了少数强国按照经济发展进程确定的实力并通过战争不断破坏彼此均势这一特点，据此他明确地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②正是这一绝对规律决定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国家首先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由于这个获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势必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仇视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与起义，使整个时代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即“充满政治上经济上巨大震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整个时代。”^③1916年9月，列宁完成《帝国主义论》后，又在《无产阶级军事纲领》中，全面地阐述了上述命题，并指出了先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共处竞争的一般趋势。^④

关于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列宁从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入手，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是一小撮大国对世界各民族进行愈来愈厉害的压迫的时代，是一小撮大国为扩大和巩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5～3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8～3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18～319页。

④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

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交战的时代。”因此，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各民族应在有独立自由、分离自由的基础上，相互接近乃至相互融合。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甚至分离的自由，支援民族解放战争；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应把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团结一致提到首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民族问题，为无产阶级革命争取更多更广的同盟军。^①

关于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评。列宁积极地从事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并从中得出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几国甚至单独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结论，实际上是对考茨基等人鼓吹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否定。同时，列宁在战争初期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严肃的批评。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抹煞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考茨基试图以这种理论来消除使小资产者特别不愉快、特别惊惶不安的冲突，如战争、政治动荡等等，用一种比较和平的、冲突比较小的、灾难比较轻的“超帝国主义”的天真幻想，来避开现在已经到来的、冲突极其激烈的、灾难深重的帝国主义时代。^②列宁还从方法论上，揭露考茨基脱离客观实际抽象地从理论上谈问题的机会主义手法和“超帝国主义”论的非现实性。列宁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现时正在朝着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方向发展”。同时，列宁又强调，“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

^{①②}《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8、392、398、201页。

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①

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宁于1916年1～6月完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一书。在这部书中，列宁以揭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为任务，从论述集中和垄断这个帝国主义实质入手，全面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政治特性和作为资本主义特殊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和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结论，^②并对各种非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尤其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评。

以列宁写成上述著作作为标志，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内，实际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种看法。以考茨基等人的一方认为，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接近死亡，相反，它仍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代替帝国主义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内国际和平的“超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立即进行社会革命，而是等待“超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并使之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平发展。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帝国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大战的进程表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国首先夺取胜利，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与机会主义者彻底决裂，将社会革命提上实践日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样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和主张，最终导致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彻底分裂。

2.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国际反响

二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两个政权的局面。按照列宁的分析，以临时政府问世为标志，政权已从无产阶

^{①②}《列宁全集》，第22卷第96～98、186页。

级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手中，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掌握武装、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之中并拥有巨大优势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怎么办？是按孟什维克以及第二国际内部中派的主张，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等到无产阶级占据俄国人口多数之后，再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并与贫苦农民和各国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从革命的第1阶段过渡到第2阶段，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提上实践日程？刚从瑞士假道德国回到革命俄国的列宁，力排众议，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明确地指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①基于此，他从政治、组织、经济、策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实现上述转变的措施和方针，结果遭到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应由工业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来促进俄国革命。^②1917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7次全国代表会议，不顾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的反对，最后接受了列宁上述关于实现革命转变的措施和方针。

为贯彻上述方针，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和组织下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作，并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其支持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激烈的较量。其间经过“四月危机”尤其是“六月示威”，不仅检阅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表明群众对布尔什维克方针政策的信任日益增强，进一步孤立了临时政府及其支持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正是在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页。

^② 见《文献选编》，第4卷第17～31页。

这种形势下，7月3日傍晚，发生工人、士兵自发示威事件。第2天，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下，举行有几十万人参加的、以反对临时政府为内容的大游行。资产阶级终于把刺刀提上日程，对游行群众进行血腥屠杀，酿成“七月事变”。随后，临时政府又进而制造旨在扑灭革命的白色恐怖。“七月事变”及其结局表明，形势已发生急剧的变化：政权已完全转入推行反革命白色恐怖政策的资产阶级及其支持者手中，一度存在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结束，通过苏维埃由布尔什维克取得多数，进而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已被堵塞，必须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代替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斯大林主持下，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确定了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通过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进一步增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和实力。鉴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全面高涨，也考虑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已出现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列宁于9月上旬和10月初，在《论妥协》和《革命的任务》等文中，再度提出抓住“最后一个机会”，通过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妥协，以保卫革命和平发展，由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但被拒绝。^①孟什维克等妥协党，仍然坚持其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策，克伦斯基政府也在积极地从前线抽调军队以镇压革命，从而又堵死了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再次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10月24日（俄历11日）召开会议。22名中央委员，有12人出席。会议围绕着起义时机是否适宜、要不要立即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最后以10票同意、2票反对，通过

^① 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0～305页；第26卷第50～51页。

列宁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按照“决议”的要求，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具体组织指挥下，于1917年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开始武装起义。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通告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到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手里。”11月8日（俄历10月26日），经过攻占冬宫、逮捕临时政府成员后，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发布《关于行使政权的声明》，正式宣告：“作为妥协产物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切特权随即终止”，“大会兹决定将政府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决定组成以列宁为首的第1届工农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作为十月革命伟大成果的苏维埃俄国正式诞生！^①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将革命由彼得格勒推向全国的同时，刚刚诞生的工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发展胜利成果的措施。其中包括颁发《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等历史性文献；镇压反革命，粉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煽动怠工和排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阴谋；废除旧国家机器，创建工农政府、法院、工农红军等新型政权机构；实现银行和大企业国有化以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初步基础，等等。由此，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新的历程。

十月革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充分地利用了当时俄国业已具备的、使革命容易开始的优越条件，不失时机地把握住革命得以胜利的特殊因素，因而能先于其他国家实现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②一个落后国家率先夺取胜利的事实，不能不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强烈反应。

^①有关文献见《文献选编》，第4卷，第87～93页。

^②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曾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从6个方面分析了这些优越条件和特殊因素。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7～278页。

紧随十月革命之后的，是邻近俄国的北欧、中欧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1918年1月27日，芬兰首都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爆发工人革命，建立以库西宁为首的、由14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几乎同时，德国工人，在斯巴达克派号召下，发动共有百余万人参加的“一月罢工”。以此为起点，罢工浪潮和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到11月3～9日达到顶峰。由基尔工人、士兵武装起义发难，最终爆发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柏林总罢工和武装示威，推翻霍亨索伦王朝，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以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派，曾试图按照俄国革命的经验，把德国革命引向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此，全德各地除柏林外都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工人，还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叛卖、斯巴达克派在组织、政治上的软弱，革命成果最终为资产阶级所篡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只存在18天即被颠覆。以此为标志，德国11月革命宣告终结，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革命发展过程中为资产阶级所暗害。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同步，奥匈帝国也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匈牙利脱离哈布斯堡王朝并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之后，以刚从苏俄回国的库拉·贝恩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人，联合社会民主党左翼，于1919年3月21日，通过工人、士兵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联合政府下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的武装干涉和共产党人政策上的错误，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只存在133天，最终于8月11日被颠覆。

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政党，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对十月革命作出反应的。他们掀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罢工斗争浪潮。以美、英、法3国1917～1919年罢工情况为例，按罢工次数，1917年为5,876次，

1918年为5,017次,1919年为6,008次,罢工人数分别为:239.3万人、253.2万人、790.2万人,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以1919年和1917年相比较,罢工次数仅增长2.2%,罢工人数却增长两倍。其中,英国的罢工次数增长85.2%,美国的罢工人数增长2.39倍。^①为此,英国工人开展了“不干涉运动”;1919年夏,美国工人建立“苏维埃之友同盟”;1920年5月,法国百万工人为要求停止武装干涉苏俄而举行“五·一”总罢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国家的罢工和反对干涉苏俄的斗争,直接导致了革命。如1918年1月,维也纳工人总罢工,建立了苏维埃和赤卫队,最后触发10月奥地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奥地利共和国的成立;1919年,法国驻敖德萨水兵和开入黑海的法国舰队,因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爆发起义,最后迫使法国当局从俄国撤回参与武装干涉的军队。

3. 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俄国革命及其在欧美工人运动中引起的强烈反响,这是一个任何人也不能抹煞的客观现实。问题是如何认识它,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是走俄国人的路,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继续走议会民主的道路,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分裂的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都在作出选择,并从总结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形成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这既是1910~1912年间第二国际及德国党内关于工人运动战略问题论争的继续,也是第二国际最终分裂的思想理论基础。

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不久,当时还在狱中的卢森堡就曾指出,这“是一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留下的痕迹永远不会磨灭”。^②十月革命消息传来,她一方面热情地肯定这个“万世流

^①参见《国际工人运动史知识手册》,第672页。

^②转引自《罗莎·卢森堡传》,第246页。

芳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①另一方面，也为身处逆境、四面受敌的苏维埃俄国担忧，并在狱中对俄国革命进行认真的思考。她于1918年9月写下《论俄国革命》这部尚未完成的手稿^②。在这部手稿中，卢森堡旗帜鲜明地抨击了考茨基和孟什维克所谓经济落后、农业为主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成熟的论调。她明确地指出，1917年的革命同1905年革命一样，“都是准备好了的、内部成熟的产物”。③领导这场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不朽历史功绩就在于：“提出了完整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作为夺取政权的目标；不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69）同时，卢森堡又强调指出，进行“工人阶级专政的第1次世界历史性试验”的苏维埃俄国，是在极端困难、荆棘丛生、陷井遍地的道路上前进的，不可能一切都那么美好，达到完善的顶峰。正是从完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用以指导德国革命的基点出发，她在手稿中，对俄国工人阶级走过的路程，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经过深入思考而形成的结论。

关于专政和民主。卢森堡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她认为，这个专政是要运用民主，而不是消灭民主。她既批评了考

①转引自《大事记》，第2卷第3页。

②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卢森堡出狱时，手稿尚未写完。1921年，德共领导人列维首次以小册子形式发表了手稿的抄件。手稿原件，迟至1928年才在柏林发现并公诸于世。

③见《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增刊），以下引文凡出自此处者只注页码。

茨基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并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代替品的错误，强调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决不能象考茨基主张的那样，在“国家不成熟”的借口下，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献身于民主，而应立即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实行专政。同时，她又批评列宁、托洛茨基决心维护专政，而否定经过普选产生的社会主义机构（立宪会议）和剥夺一切反对派自由的作法。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91）

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卢森堡指出，夺取政权后，应创建社会主义民主制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它是同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她还认为，“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享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意见交锋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苏维埃的生活，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88）为此，卢森堡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实行最广泛的民主自由。“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87）

关于领导和群众监督。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92）特别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

法律的体系”，其实际实现并没有现成的处方。任何社会主义党纲和社会主义教科书也没有加以具体说明，“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实践中发展的。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道路。只有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到成千的新的形式、主意并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因此，来自群众的“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把总结、交换经验，仅仅限于政府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那么“腐化不可避免。”（87~88）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策略。卢森堡在思考革命的经验时，曾就土地、民族、民主、专政等问题，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提出恳切的批评。在民主和专政关系问题上，她甚至认为，列宁、托洛茨基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两者对立起来，“同样都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很远”。（91）但是，卢森堡同考茨基等人是很不同的，她在提出这些批评意见时着重指出：“重要的事情在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同非本质的东西、核心同偶然性区别开来。”在她看来，布尔什维克所犯错误或政策的失误，都是严重困难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行动，和他们的历史功绩相比，都是非本质、偶然性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政策中的本质核心和持久性的东西，正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革命毅力，社会主义本身的取得政权的意志”。在这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始终有着这样的不朽的历史功绩：他们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实践问题，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决战大大向前推进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卢森堡指出：“未来是到处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94）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在手稿中，明确地提出了不能把俄国经验特别是教训予以绝对化的问题。她指出，当布尔什维克把在困难条件下

被迫采取的行动，当作自愿的好事，把“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这样一来，即使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功绩，为被迫犯下的过失所冲淡，又给国际社会主义帮了倒忙。（93）因此，卢森堡极力主张，要肯定布尔什维克创造的社会主义崇高范例，而不应毫无批判地赞扬和热情模仿；相反，应对俄国革命迄今走过的道路，进行“批判性检验”。这将丝毫无损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威望和富有吸引力的榜样”。（62）

同卢森堡的态度相反，考茨基却对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国内战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道路，表示怀疑和否定，并力主通过长期的和平发展，争得议会多数，以实现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之后，考茨基也曾祝贺和称颂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但是，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缺少先决的和必要的条件，更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特别是他得悉苏俄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加强新生政权的措施，弄清了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则更为反感，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反对它”。按照考茨基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得了政权，而不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分享政权”；二是布尔什维克党解散了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民议会”的立宪会议；三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实行“一种反对一切非共产主义者的恐怖主义制度”，以便“能在一夜之间使整个俄国突然变成一个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为此，他给自己规定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两项任务：“反对那种认为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超过工业的西方这一信念”；反对“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用武力恐怖来压制人民大多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妄

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考茨基于1918年8月，发表了第1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①这部著作涉及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考茨基认为，由于俄国经济落后，缺少社会主义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主要是工业发展水平低，工人阶级不占人口的多数，民主不成熟，所以，俄国革命“实际上是最后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首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②俄国革命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在西欧同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布尔什维克不顾条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跳跃阶段的尝试。其结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生下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孩子”，（55）势必用专政来代替他们缺少的物质文化条件。（36）

关于暴力革命。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用一个突然的袭击就会取得国家政权，并给人们带来社会主义。这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10）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是无产阶级过于无知、精神沮丧、不能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状况造成的。其结果，只能形成秘密组织，“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们实行独裁的习惯。”（11）

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纯粹民主。前者，能使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后者，能使无产阶级强大到足以

①见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1923年），第30～31页。他于1919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1年发表的《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又进一步地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的思想。见同上书。

②《无产阶级专政》，第55页。以下几出自此书者，只注页码。

掌握社会的管理，“具有力量和能力把政治的民主转变为经济的民主。”（13）因此，“一个国家在一方面越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越是民主，它就越接近社会主义。”（54）愈有民主的统治，政治革命愈有可能是个和平的革命。相反，现存制度愈是失去人心，仅仅代表少数人统治，就愈有可能采取内战的方式。（32）据此，他认为，“无产阶级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他们的人数庞大的力量。”如果无产阶级不成为人口中最多的阶级，未成为超过小农、小资产阶级数目的地步，无产阶级是不能解放它自己的。（16）他主张，在有着一些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无须采取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采取过的、一次取得显著胜利的方式，也不必实行暴力颠覆政权的办法，而应坚持议会主义等具有压力的非军事方法，即使用和平的经济、法律以及道德手段来实现。

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者之间是为同一个社会主义目的两种根本不同方法的冲突，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冲突。（1）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同时又保护少数的方法，是依靠和发展现有的纯粹民主，用和平方法夺取议会多数，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19~22）专政的方法，就是消灭民主、个人独裁的方法（24）。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农民占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农民专政（44）；由于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排除出苏维埃，所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终于必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内部的一党专政”。（48）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列宁，在纷繁复杂的国务活动和四面受敌的尖锐斗争中，仍然关注着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考茨基等中派领袖的活动。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曾利用暂时转入地下的时间，针对考茨基在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主张，写成《国家与革命》一书。十月革命胜利后，又根据实际情况作了重要增补，对考茨基的错误主张作了深入批评。1918年8月，当考茨基

在其《民主还是专政》一文公开号召批判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时，列宁就曾在9月20日给沃罗夫斯基的信中指出，考茨基的言论，是“无耻烂言、胡说八道和庸俗不堪的机会主义”，要求加强同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理论的斗争，以支持德国左派，并认为应敦促斯巴达克派在报上发表原则性声明。与此同时，他还拟定了同考茨基主义作斗争的计划。^①看到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后，列宁于10月1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文章，并开始以同样标题撰写著作，1918年年底完稿并出版。这部著作，对考茨基的上述主张作了全面的批驳。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考茨基把专政仅仅看成是一个方法问题。列宁指出，这表明，考茨基根本不懂得并且纯粹机会主义地歪曲了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学说。列宁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入手，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实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列宁认为，专政决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那个阶级进行统治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问题，两者不可分割，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关于民主。列宁认为，考茨基大谈“绝对民主”、“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这不过是用那套‘学者’的谎话来蒙哄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性）拿来，而把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用暴力消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9～3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399页。

灭资产阶级)抛弃、抹煞和隐瞒起来。按照列宁的分析,只要各种阶级还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①据此,列宁分析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及其必然为无产阶级民主代替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及其发展前景。

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考茨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仅仅是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而且应该保护少数。列宁指出,这种说法,抽去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基础。实际存在的决不是什么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而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特别是一国无产阶级首先取得革命胜利后,剥削者在事实上还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还会跟着剥削者走。因此,已经失败但不甘心于失败的剥削者,势必进行反抗,并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没有民主。”(238)列宁认为,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决不能以保护少数为名,保护富人的民主和剥削者的民主。(230, 237)

关于革命道路。考茨基为了论证自己的和平发展策略,曾直接援引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关于英、美两国因为没有军阀、官僚制度而使革命有可能和平发展的论述。列宁指出,考茨基这样做“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反映了他“害怕内战的自由主义心理”。列宁强调,考茨基忘记了一件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

^①《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4~225页,以下凡出自此书的引文只注页码。

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20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就连英、美也有了军阀、官僚制度。（220—221）因此，列宁认为，“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219）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全面批驳考茨基的主张、阐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俄国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思潮。他从揭示考茨基主义是一种国际思潮入手，针对着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攻击明确地指出：“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在列宁看来，这个策略，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上面，它为了发展、推动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国所能做到的一切，提供了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实际不同的思想、理论、纲领和策略，并为已经取得的大量成就所证明。因此，列宁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273～274）正是以此为依据，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法，在欧、美各国党内宣传、推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并和原来在这些党内很有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尖锐冲突。①

围绕着关于俄国革命及其历史经验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形成两种根本对立的策略、理论：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理论和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理论。正是以此为基础，第二国际内部的各国党正在集结、组合，

①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阶段、主要内容及其国际意义。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0页。

逐步形成两个国际的格局，使由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国际分裂进一步加深。

六、第二国际在组织上的分裂

1. 创建一个工人的革命国际

从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领导人陷入机会主义泥潭、国际工人运动形成两种对立的策略、理论的事实中，势必得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革命国际的结论。这是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主张。

还在1914年8月4日德国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案的第2天，列宁就曾讲过：“这是第二国际的末日”。^①其中已包含着创建新国际的思想萌芽。8月24日，列宁阐述了“未来的国际的任务”。^②紧接着，在论述关于战争和国际社会主义任务的基础上，列宁于1914年9月28日，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明确地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的问题。^③不久，列宁又将这个国际，称之为与第二国际相对立的“第三国际”，并指出它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的资本主义政府举行革命进攻，发动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④几乎同时，李卜克内西于9月21日，正式提出并重申德国党必须彻底改组、按照革命原则重建国际的问题。稍后，在接读列宁起草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之后，卢森堡于12月到底在致英国《工人领袖报》的信中，无保留地承认了第二国际破产的事实，确信国际将从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⑤列

① 《列宁年谱》，第3卷第363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页。

⑤ 见《大事记》，第1卷第328~329、332页。

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主张，贯串于战争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力量相继在各国党内形成特别是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召开，一些左派曾试图通过成立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来创建新国际。为此，德国维尔腾堡反对派向会议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更集中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要求会议采取紧急措施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它的任务是在各个国家进行集中的、有组织的、广泛的示威运动。李卜克内西致会议的信中曾预言：“新的国际即将出现；它将在旧的废墟和新的更加坚固的基础上出现。”^①但是，由于中派在会上占据优势，关于成立新国际的建议被否定。1916年4月昆塔尔会议召开时，左派力量已有进一步的增长，“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已存在两个党，事实上现在已有两个国际”，^②而且以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国际”派，已经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际”的主张。^③但是，由于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中的中派即多数派拒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幻想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并且声明自己有决心实现这种团结。因此，再次拒绝了左派关于建立新国际的建议。

在列宁看来，上述两次会议就是否建立新国际问题激烈交锋的事实表明，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人的革命国际，必须坚决地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特别是考茨基中派主义的斗争。这两次会议的共同缺点，创建第三国际的尝试遭到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恰恰是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来。所以，列宁主张，新国际应该是“一个排除并反对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他要求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经历一个稍长的进化过程，在清除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基

①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505～506、493页

②《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5页。

③见《大事记》，第1卷第347页。

础上，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熟，“那么我们党将在旧国际内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国党内形成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基础为止。”^①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列宁当时并不主张立即退出第二国际。1915年10月，列宁在瑞士洛桑等地报告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情况，当有人提出现在是否退出第二国际并组建第三国际时，列宁指出：目前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二国际中还未成立左翼，我们本身将不退出第二国际，只是也许有人要驱逐我们。一旦把我们赶出第二国际的时候，我们再退出，并把工人群众一起带走，同时建立第三国际。^②

二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迅猛高涨，列宁正式提出了立即建立无产阶级新国际的任务。他在1917年4月所写的《无产阶级在我们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针对由中派把持的齐美尔瓦尔得国际（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破产的事实，主张立即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③稍后，列宁又再次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应尽快召开世界国际主义者代表会议，以便“建立仅限于左派，仅限于反对考茨基分子的人组成的真正的第三国际”。^④

这个时期中，列宁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建立新国际，是和他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在此之前，列宁曾从考察俄国革命同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的关系、俄国革命同“亚洲觉醒”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关系等方面论述过世界革命业已成熟的条件；那么，到1917年秋，列宁则认为，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8、309页。

② 转引自《第二国际史》，第2卷第67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第60页。

④ 《列宁文稿》，第6卷第451页。

世界革命作为直接的实践任务已提上日程。他指出：“9月底是革命史上，同时十分明显，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从俄国来讲，二月革命胜利之后，经过四月危机、六月示威、七月事变、八月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群众已转向布尔什维克，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将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从世界看，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经由左派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反战革命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动荡不安，到1917年8月也进入转折关头，在德国开始的军队起义，“正是大转折的标志，正是全世界革命前夜的标志”。据此，列宁认为，“危机成熟了”，“不容怀疑，我们正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门口”。①为了迎接已经到来的世界革命，列宁在俄共（布）党内，提出了立即举行起义以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提出了建立新的工人国际，以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主张。但是，后一个主张，却未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并遇到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反对。他们以与会代表人数太少、由此而成立国际的事业必将失败为理由，拒绝列宁的上述建议，并决定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之中，派代表参加列宁极力反对的第3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由于列宁的主张未能付诸实施，再加上不久十月革命胜利，建立新的工人的革命国际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来。

2. 共产国际的成立

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到1918年，又迎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新局面。通过年初同德国订立代价高昂的布列斯特和约，处于帝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57～58、65页。

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严重威胁的苏维埃俄国，终于获得了暂时喘息的机会。特别使人振奋的是，列宁曾寄予厚望的德国革命，从1918年1月开始迅猛发展，再加上受十月革命胜利鼓舞的欧、美无产阶级尤其是中欧国家无产阶级的广泛出动，使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前景，得出了十分乐观的结论。1918年3月，列宁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中曾引出一条教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当时列宁认为，德国革命的到来，并不象人们希望的那样快。“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中的开始，决不会象俄国革命开始时那样容易”。①事态发展，特别是德国革命的发展使列宁很快修正了自己的看法。10月1日，他在致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写道：“一周以来，国际革命越来越逼近，甚至可以视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他提出：“为了援助国际工人革命，春季以前，我们应当成立一支拥有300万人的军队。”②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月后，德国即以工人起义为先导，各地纷纷成立苏维埃，终于酿成以推翻帝制为内容的十一月革命，再加上匈牙利等国革命的胜利，由此更加坚定了列宁推进世界革命的信心。1919年3月，他即开始预言：“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建立。”③1919年7月12日，他又进一步地指出：“我们将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将以这个彻底巩固的胜利来迎接明年7月的胜利。”面对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当时欧、美工人运动的现状却极其不适应。“欧洲的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就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因此，列宁提出了“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支持各国都有的真正国际主义无产者的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8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1、36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1、449页。

革命组织”，以便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去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任务。^①在列宁看来，成立一个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革命国际势在必行。特别是1919年2月召开的伯尔尼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更加促使列宁加快创建第三国际的进程。经过短暂而紧张的准备，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第1次代表大会。

在国际工人运动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潮即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情况下，创建共产国际，经历了艰难的路程。创建伊始，即面临着一个如何塑造新国际形象和要不要立即创建新国际的争论。还在筹备过程中，季诺维也夫等就曾于1918年底、1919年初提出，应采取“工兵代表苏维埃国际代表大会的形式”，创建一个革命苏维埃国际。这一构想，曾得到匈牙利共产党人贝拉·库恩的支持和进一步发挥。他认为，苏维埃和党与工会不同，它第1次把全体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他提出必须修改国际的基本原则，创建一个广泛的苏维埃国际，而使党和工会成为“苏维埃的辅助机关”。^②这些构想，遭到列宁的反对。列宁认为，未来的国际，应是领导推翻资本政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联合。“一大”接受了列宁的主张。它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草案）明确规定，共产国际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③在要不要立即创建共产国际的问题上，也遇到了来自卢森堡和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德共前身）的挑战。卢森堡和1918年底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创建新的工人国际以取代已经分裂的第二国际。但是，在时机和基础是否适合问题上，同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96～97页。

② 转引自《列宁和共产国际》，第42页。

③ 见《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202～208页。

布尔什维克党有着不同的看法。卢森堡认为，未来的国际，应该以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为基础，而不仅是以俄国一个群众性政党为基础。她主张成立新国际不宜操之过急，要求等到群众性政党特别是西欧国家群众性政党建立时再议。为了表达这种愿望，由卢森堡提议，斯巴达克派联盟委托埃贝莱因前往莫斯科。在1919年3月1日预备会议讨论成立国际问题时，埃贝莱因根据斯巴达克派联盟即刚成立不久的德共的指示发表声明，反对马上成立共产国际。他以准备时间太短、应到代表尚未到齐为理由，建议只召开共产主义代表会议，以制定作为联合基础的政治纲领。会议接受了德共代表的建议，通过关于“会议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召开的决议，决定暂不成立共产国际，推迟制定和通过共产国际章程，集中力量制定行动纲领。3天之后，即3月4日，在大多数代表尤其是在奥、匈、瑞典、巴尔干国家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人声明的催促下，正在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经过唱名表决，又通过关于“组成第三国际并采用共产国际名称”的决议，尔后又决定设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行局。因此，从3月4日起，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实际上就变成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一大”）。在通过关于成立共产国际决议时，德共代表埃贝莱因，以世界上尚未形成建立共产国际的组织基础为理由，再次发言表示反对，并在表决中弃权；挪威代表也声明，需征询本党中央意见后再确定态度。

共产国际，是在准备不够充分、其主要成员党德共持严重保留态度的情况下仓促成立的。它的力量，还不足以同正在恢复的第二国际相抗衡，加之它以布尔什维主义为指导、以俄国革命为榜样、以推行世界革命实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为己任，势必同仍然处于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下的第二国际其他成员党发生冲突，使原来统一的第二国际，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走向组织上的最终分裂。

3. 第二国际的恢复

大战爆发之后，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的领导人，按照“保卫祖国”政策的要求，各自站在本国政府一边，形成了两大社会党集团。尽管国际局也曾试图弥合，仍于事无补。这种情况，持续到1917~1918年间，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下述事态的发展，制约着这种变化。

一是战争期间各国党内左派的奋起和各国人民的反战斗争，特别是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对社会沙文主义的尖锐批评和关于创建新国际问题的提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迫使各国党必须作出抉择：是恢复已经中断的国际联系，使第二国际复活，还是顺应历史潮流，抛弃已经陈旧、破产的国际？国际局及其大多数成员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既是原来第二国际内部两种思潮斗争的继续，也是齐美尔瓦尔得运动内部围绕着是否创建新的工人国际问题论争的必然结果。

二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第1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这一切，对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是继续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沿议会民主道路前进，还是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并置几十年形成的成果而不顾，同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公开对抗，直至进行国内战争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按照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成员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它们自然选择了前者，并在此基础上捐弃前嫌，暂时忘却彼此之间的分歧，携手共同对付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当前的危险。

三是战局的发展，俄国由于爆发革命率先退出战争，使德国一度有可能从东线抽出兵力，对协约国加紧发动进攻。但是，由于美国参战，加强了协约国的力量，德国自身也为日益高涨

的革命浪潮所困扰，再加上给养补充不足，军队士气越来越低，到1918年春夏，战局开始日益朝着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协约国首脑们的和平活动频繁。还在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了包括14点内容的关于世界战后体制的纲领（“威尔逊14点”）。其中，包括主张立即解放被德军占领的比、罗、法等国领土，保证奥匈各民族自治和建立国际联盟等。这些主张是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领导人为之奋斗、梦寐以求而未得手的理想之物。因此，在战争接近尾声、使参战国社会党人彼此间敌视的根源即将消除的情况下，原来相互对立的两大社会党集团，又在威尔逊和平民主纲领的基础上，逐步靠拢并共同联合起来。

以上3个方面的事态发展，引起了两大集团社会党人关系的新变化，使得它们弥合彼此之间的历史裂痕有了必要和可能。在这方面，率先采取行动的，是以“胜利者”自居的协约国社会党人。

1918年2月20~24日，由英国工党发起，在伦敦召开协约国社会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倡议召开工人运动世界代表大会，以实现“不割地、不赔偿”的和平，给所有民族以自决权，同时决定采纳英国工党提出的备忘录，以作为国际和平的纲领。会后，还专门成立了由3名曾担任战时内阁部长的社会党人（英国的韩德逊、法国的托马和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于1918年9月17日，再度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在各国政府召开和会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以对和会施加影响。会前，韩德逊曾以英国工党名义致电列宁，邀请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出席。列宁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表示不能参加这次会议。^①

^①见《列宁文稿》，第7卷第43页。

按照原定计划，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应于1919年1月18日与和会召开的同时在巴黎举行。由于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拒不给敌对国家社会党代表签发入境证，会议改于1月27日在伯尔尼举行（因代表中途受阻，实际召开日期是2月3～10日）。

伯尔尼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是战争爆发以来社会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也是两个对立军事集团国家的社会党人的首次聚会。来自德、英、法、奥、俄、意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2名代表出席。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左派党抵制参加，使会议的代表性大为逊色。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威尔逊提出的“14点”，讨论欧洲新秩序的纲领和重建国际。会议一开始，两个对立集团国家，主要是法、德两党，就战争罪责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大会主席、瑞典社会党人布兰亭试图折衷调停。他认为，不应责备社会党人。德国社会党人犯错误，主要是由于“当权者把事情真相完全掩盖起来，使全体人民相信问题只在于反对卑鄙的侵略、保卫国家和生活。”经过争论，伯尔尼会议并未消除第二国际内部因战争爆发而形成的尖锐对立和深刻的分裂，只是在德国党代表表示认错和发表了声明之后，按照布兰亭观点，通过一项妥协性决议。“决议”认为，通过辩论和德国党的声明，已将战争罪责问题弄清楚了。不管德国党战时个别政策如何，它以推翻应对战争负责的旧制度的实际行动证明：“它坚决愿意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和平，并在国际的队伍里同各国社会党人一起为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的联盟而奋斗。”^①这样一来，不仅为德国党战时叛卖政策和在十一月革命中的叛卖行动开脱了罪责，而且也掩盖了所有交战国社会民主党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煽动国际无产阶级相互屠杀所犯下的罪行。“决议”实际上以有利于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形式，

^①《历史资料Ⅱ》，第256页。

“解决”了战争罪责问题，从而为恢复第二国际及两大集团的社会沙主义者的联合，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最能反映会议倾向的，是关于民主和专政即俄国问题的讨论。会议一开始，布兰亭即以主席身分，在演说中为讨论奠定了基调。他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它就是少数人的恐怖统治，同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相抵触。他主张“社会党必须忠于民主原则”，“坚决反对偏离社会主义的任何行为，因为这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危害”。由于会议一度陷于战争罪责问题的辩论，冲淡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气氛。为此，列斯纳主张，会议应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对社会主义来讲，今天的危险不是来自德国党过去的行为，而在于布尔什维克和左翼政党运动。他特别提请会议予以警惕。正是在这种浓烈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俄的气氛中，会议掀起了一股攻击苏维埃俄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浪潮。站在前沿的是考茨基。继出版《无产阶级专政》小册子之后，考茨基在国际会议上，首次公开对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的抨击。他指出，俄国革命不仅破坏了大工业，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而且还选择了破坏民主的方法，即破坏言论自由、民主权利等方法。他公开宣布：“布尔什维克行动唯一的积极的结果乃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军国主义。”^①他主张，决不能采取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方法，而应通过定期的议会选举赢得多数，在此基础上取得政权，并依靠这种彻底的即纯粹的民主，来组织社会主义。会议最后通过由布兰亭提出并根据讨论情况作了必要修正的多数派决议。这个决议从头至尾贯穿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它主张“坚持不懈地遵守民主原则。任何一项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如果不牢固地依靠民主制所提供和发扬的自由原则，便不可能推行，便不可能真正实现。”

^①转引自《民主社会主义》，第200页。

它号召各国工人发扬民主共和制度，以在这种制度的范围内完成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虽然没有象讨论中考茨基等人那样点名攻击苏维埃政权，却以含蓄的语调，极其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决议”指出：“既然会议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同民主制度充分结合才能真正获得发展，所以从一开始就应当反对那些得不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社会化的方法。更危险的是试图实行那种仅仅以一部分无产阶级为依靠的专政。这只能使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遭到屠杀，最后则导致反动派专政。”为了和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决议”最后还郑重地告诫各国政府，不应把灾难深重的无产阶级的任何行动，都说成是布尔什维主义以进行诽谤。^①

会议除了在上述两个方面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鲜明立场外，并未取得什么具体成果。^②在关于今后工作的决议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由布兰亭、韩德逊、胡斯曼3人组成执委会（后改成“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以推动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际资产阶级施加影响，并负责筹备召开新的代表会议以“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在最短期间内恢复国际”。

伯尔尼会议之后，执委会于1919年4月26~29日和8月1~9日，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和卢塞恩召集过两次代表会议。和伯尔尼会议不同的是，这两次会议，特别是卢塞恩会议，涉及到了恢复第二国际的问题。少数派坚持在伯尔尼提出的原则，主张力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谅解，为一切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革命的社会党敞开大门，并努力防止作出任何一项不利于将来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决议；^③多数派主要是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从反

^①《历史资料Ⅰ》，第256~258页。

^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际联盟、关于领土问题、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等决议，见《历史资料Ⅰ》，第260~268页。

^③见《历史资料Ⅰ》，第258~259页。

对布尔什维克体制、反对一切形式专政这一基本点出发，拒不同布尔什维克和解，坚持在议会民主原则基础上恢复第二国际。由于两派意见对立，在如何恢复国际的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卢塞恩会议根据荷兰代表弗里根的报告，决定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同时为这次大会确定了议程，商讨了大会将要通过的国际章程的原则，并选出了负责起草报告的专门委员会，从而实际上采取了恢复第二国际的具体步骤。^①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31日～8月5日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正式恢复大战爆发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第二国际。其中，包括撤销1900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局，代之以新选出的执行局；将国际的中央驻地迁至伦敦（恢复后的第二国际，因此被称为“伦敦国际”）；通过卢塞恩会议提出的国际新章程；委托英国工党，采取措施与其他未出席大会的党接触，以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这次大会，是第二国际恢复的一个标志，也是同共产国际“一大”公开对抗的大会（它又叫第二国际第10次代表大会）。在战争罪责、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这样两个困扰各国社会党人的基本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与会者的思想，从而为原来意义上第二国际的组织分裂，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战争罪责问题，是两大集团国家社会党人统一行动的一大障碍，也是伯尔尼、阿姆斯特丹和卢塞恩会议试图解决但并未彻底了结的问题。它被提到日内瓦大会，并要求大会作出“最后裁决”。德国党代表布劳恩在专门委员会上的报告、谢德曼等在向大会提交的“备忘录”（《关于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中，一方面

^①后来由于奥地利党认为恢复第二国际有操之过急之嫌，遂决定推迟到1920年7月31日举行。

承认德国党在战争面前反对当时的制度不力，以致国会未能控制帝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终于导致战争爆发，对此表示遗憾；另一方面，德国党的代表又声称，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德、奥政府缺乏冷静态度，决不能责备曾竭力阻止敌对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德国人民。他还以德国已经爆发革命、推翻曾发动战争的帝国政府为借口，完全推卸和拒不承认德国党在战争期间对推行叛卖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所应承担的罪责。大会经过争论，最后以谢德曼提交的“备忘录”为依据，通过了一个冗长的决议。这是一个进一步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开脱罪责的文件。它以谴责已被推翻的德国皇帝及其政府的罪行，来掩盖协约国和同盟国对这场战争不可推卸的罪责；以轻描淡写的“遗憾”和反对军国主义斗争成效不显著等说法，来庇护德国及其他国家社会党内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战争期间推行的叛卖政策。对此，与会代表都很满意，一致予以认可。正是在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气氛中，一度分为两个集团的社会党人，重新握手言和，为反对共同的对手布尔什维克党而联合起来。

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日内瓦大会的基调。这一问题的讨论，把在伯尔尼和卢塞恩会议上曾一度受到遏制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浪潮，推向高峰。

大会是在“凡尔赛和约和军国主义危险”这个响亮的旗号下，提出布尔什维主义问题的。比利时党的拉丰汉，代表议题委员会，在向大会提出的决议及其报告中，抗议凡尔赛和约中那些给永久和平制造障碍的条款，提出了工人阶级面临的军国主义危险问题。他强调指出，协约国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政策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些“边缘国家”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布尔什维克甚至还采取更野蛮的手段直至挑起战争。他认为，对人类的威胁，既来自帝国主义，也来自布尔什维主义，而且布尔什维主义对文化与和平比欧洲反动派更

危险。基于这一认识，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应针对国际联盟”。实际上，它是煽动国际工人阶级把矛头集中指向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这一点，是前几次代表会议所不能比拟的，但却为与会绝大多数代表所接受。这一事实表明，两个国际格局的形成和对立，已经远远越出原有的思想、理论方面的分歧，而成为在实际政策上两种制度的根本敌对。

在大会其他问题的讨论中，也贯串着这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并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

关于改变现存制度的方法。英国独立工党向大会提交的《关于社会主义与政府》备忘录承认，现存的民主制已经衰败，它有许多缺陷。但是，“备忘录”反对采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方法，主张通过经常的教育和宣传手段来克服，通过社会主义团体在各国议会中的有力活动来改正这些缺陷。“备忘录”主张采取议会活动方法，反对直接行动这种失败的、危险性很大的、政治上可实现性很小的方法。该党领袖麦克唐纳在一封信中曾具体地谈及这一方法。他指出：“独立工党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精神和主观心理之中找到了能使人奋起行动的真正动因。它改变着社会舆论，进行着一场革命，只有这种革命，其影响才能不局限于生活的外部，而是深深地渗入生活的中心。工人们的政治组织会使改变了的舆论在改造社会的事业中具有行动的能力。”麦克唐纳认为，“此种方法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并铺平了通向未来的捷径。”^①大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决议明确地指出：“代表大会拒绝采用相鲁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它认为，未来的工人政府，必须以民主和社会主义为立法的根本原则，决不能以专政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基础，也不能试图以镇压民主作为自己的任务。^②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的复活》，第127页。

^②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189页。

关于接管政权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工人运动蓬勃高涨的事实使大会不得不承认，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失灵，工人阶级接管政权已成为历史的必要。但是，独立工党的“备忘录”认为，俄国革命的道路，决不能为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所接受。“步俄国的后尘是目光短浅。”“备忘录”主张，采取使议会机构同拥有监督、咨询权的工人阶级组织即代表制工人委员会紧密结合以不断充实议会的办法，逐步克服现有民主制的缺陷，能使无产阶级和平地接管国家政权。

关于社会化。这是独立工党“备忘录”关于通过经济手段以消灭资产阶级统治、使社会主义逐渐到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会接受了这一主张。按照大会决议的说法，所谓社会化，主要是通过把行政管理权从资本家手中转到社会手中，以按照人类的需要来改造整个工业，使之为公众谋福利，而不是为个人谋私利，并沿着这条道路，通过工人普遍参加生产领导，以改变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被奴役的地位。“决议”认为，社会化应分阶段实行。当现有工业尚未为更好的组织形式代替之前，决不随意摧毁它，决不采取剥夺私有财产的办法，而是采用赎买的方法，通过国家所有、地方团体所有和建立合作社等形式逐步实现社会化。对社会化条件尚不成熟的工业部门，应成立有资本家企业主、工人代表、技术人员和社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或地区的管理委员会，以实行社会监督，并与资本家企业主之间签订协定。^①总之，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有补偿的社会化，以作为在经济上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

日内瓦大会及其建立的“伦敦国际”，不仅从组织上实现了战时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党人的联合，而且通过大会的一系列决

^①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日内瓦国际代表大会》。转引自《第二国际复活》，第123～129页。

议，在国际范围内开始提出了与布尔什维主义公开对抗的社会民主主义。按照王德威尔得的说法，大会决议明确地“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制度和第二国际的民主制度之间划分了界限”。^①

^①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189页。

第 五 章

内部分化和重新组合时期

(1920~1923)

第二国际组织上分裂之后，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共产国际的方向发展。其标志是在革命潮流冲击和广大党员的压力下，许多中派政党进一步左倾，陆续通过关于脱离第二国际并倾向于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是，这种势头并未持续多久。由于思想政治方面的根本分歧，特别是由于共产国际在社会民主党问题上，采取“统统打倒、一概排斥”的方针，通过让中派政党难于接受的“廿一条”，使一度靠拢的中派政党重新集结，成立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维也纳国际”）。①由此，昔日包容各种派别、组织、政党的第二国际，遂为国际史上特有的“三足鼎立”局面所代替。在发展日益广泛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3个国际：坚持布尔什维主义、以共产主义为纲领的共产国际；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旗帜的伦敦国际；介乎两者之间、自认为既不同于前者又有别于后者、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维也纳国际。

①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因它在维也纳宣告成立，通称“维也纳国际”。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人及章程都不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际，而只是达到未来广泛国际的基础或手段。为简明起见，本章涉及联合会的地方，按约定俗成原则，通称“维也纳国际”。

20世纪20年代初，国际工人运动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胜利的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欧、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第1个浪潮已经过去，第2个浪潮又还没有到来。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这种形势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也日趋严重。摆在国际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是团结联合、共同对敌。对共产国际来讲，虽然自成立以来有所发展，但是，力量仍很弱小，影响也不大。为对付日益严重的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危险，为维护四面受敌的苏维埃俄国，非联合、团结拥有强大力量的其他两个国际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不可；对伦敦国际尤其是维也纳国际来讲，尽管议会主义、民主思想在其内部仍有广泛影响，可是，广大党员和工人受十月革命和欧、美革命高潮的推动而日益革命化，具有同情、支持苏俄并同共产党人联合行动的强烈愿望，这不能不制约其领导人的政策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形成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由于维也纳国际的倡议，也曾出现过3个国际协商以采取联合行动的局面。结果，由于伦敦国际领导人坚持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方针，试图以第二国际取代共产国际；由于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不顾形势变化，继续坚持“进攻理论”，推行旨在打击、消灭社会民主党人的方针，致使3个国际柏林会议迅即流产，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策略也未真正付诸实施。

维也纳国际和伦敦国际领导人之间一度有过的分歧，只是在革命高潮年代具体策略方面的分歧，他们基本的理论、纲领、策略，并无大的差异。一旦革命高潮过去，两个国际的分歧势必消失。特别是面对着共同的对手共产国际的强劲挑战和双方都予以否定的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实践，更使他们增多了共同语言。正是这种共同的基础，使“离异”不到3年的两个国际的领导人愈益接近，最后通过汉堡合并大会，终于重新组合成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仍以第二国际自命。但它的纲领主张、组织规模和活动内容，已不是原来那种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共处一体、包括以欧、亚、美、非各国工人政党和团体的统一的国际，而是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为主体的民主社会主义国际。从此，国际工人运动中实际上有两个中心，即以社会党为主体、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以共产党为主体、以共产主义为纲领的共产国际。这样两个中心共处、竞争的新格局，实际上代表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股政治势力和政治主张，集中地体现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两种不同的探索。一种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势力，它坚持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一种是由社会党人组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它坚持和平民主的议会道路，主张通过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长期合作，以达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随着国际工人运动两个中心、两股势力、两种主张的格局的形成，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的历史即宣告终结。

一、“第三种势力”的形成

1. 中派的历史发展

作为工人运动中一种既不同于机会主义右翼、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思潮、派别和国际性集团，中派有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它大体上经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中派的思想理论基础即中派主义的形成阶段（1910～1914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党和第二国际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1910年，他和卢森堡就在德国是否宣传和运用群众性政治罢工与是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开始发生激烈的辩论。考茨基提出了以议会主义为中心、以争取下届国会选举（1912年大

选)胜利为重点的“疲劳战略”，以和卢森堡主张的把议会内和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积极宣传和准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以争取普选权，进而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实现社会主义作准备的“进攻战略”相对抗。^①按照考茨基的分析，他的“疲劳战略”，既不同于南德巴登邦议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的机会主义右翼策略，也不同于卢森堡等左翼不顾德国条件、照搬俄国经验的进攻策略，而是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心”的正确策略。在《巴登和卢森堡之间》一文的最后，考茨基写道：“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地图上的巴登和卢森堡两个大公国就会发现，在它们之间，是马克思的诞生地特利尔。人们从那里向左走，越过边境，就到了卢森堡（卢森堡公国——引者）。人们要是使劲向右走，越过莱茵河，就到了巴登。地图上的位置还象征着今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在他看来，党既不应向右的巴登机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也不能朝左的方向前进。站在卢森堡等人一边，而应站在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心位置上。“党将在巴登和卢森堡之间走向胜利。”^②考茨基这种在机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偏不倚、居中调停的思想，在国际巴黎大会讨论米勒兰入阁问题时有所表现，但当时并未形成系统的中派主义的理论。1910~1914年间，随着机会主义愈来愈在德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斗争日趋激烈，以同卢森堡辩论为标志，它开始成为一种系统的思潮。在理论上，它以马克思主义中心和正统自居；在政治上，以争取选票、进行议会活动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在组织上，强调党的统一和团结，包括同在党内日益占上风的机会主义者的统一和团结。尽管考茨基及

^① 详见本书第三章“4. 德国党内日益严重的危机”。

^② 《新时代》，第28卷第2册（1909—1910）第667页；参见《罗莎·卢森堡传》，第178页。

其拥护者，在当时德国党内尚未成为以中派主义为旗帜的、独立的政治派别或集团，这些中派主义主张却为尔后形成的中派或中派国际集团，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中派作为一个独立政治派别在各国党内形成的阶段（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此而引起各国党的激烈分化。是拥护还是反对这场帝国主义之间的火并，是投票赞成还是否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案？对此，许多国家的党分裂为针锋相对的右翼集团和左翼集团。在这个关系国际工人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一些著名人物如考茨基、龙格、普列汉诺夫等人，再次采取了“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场，集中表现在国会投票问题上，采取了既不赞成也不否决而是弃权的立场。他们口头上也反对战争，却为本国政府和本党领导人“保卫祖国”的叛卖立场辩护，极力抹煞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口实，压制乃至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揭露和批评。和前一阶段不同的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尤其是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反战、反社会沙文主义者斗争的广泛展开，中派开始左倾。他们和左派一起，投票反对政府的军事预算案，反对党内右翼领导集团，因此而遭到党的领导集团的纪律制裁。这些中派领袖人物，与右翼有一定的矛盾，而且也曾采取过反对战争的行动，但是，他们在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等问题上，又和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着根本分歧，不愿也不可能同后者合作到底。同时，他们还担心马克思主义者代替右翼而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基于此，他们开始重新集结，以中派主义为旗号，以中派领袖人物为核心，组成独立的中派集团或中派政党，因而在各国党内形成了3股相互制约的力量，即党的左翼、右翼和中派集团。战争期间，各国党内这种激烈分化和重新组合，为尔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分化和改组奠定了基础。

中派成为国际性集团的阶段(1917~1920年)。1917年,俄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继完成民主革命之后又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一事态发展,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集中表现为声援俄国革命的斗争和世界范围内革命运动的兴起。世界革命大有迅即来临之势。在这种局势下,不仅国际工人阶级日益革命化,维护苏维埃政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以推动本国的工人运动,几乎成为他们一致的呼声;而且在革命潮流的推动下,各中派党内部形成了拥护俄国革命、接近共产国际进而主张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左翼。正是在日益革命化的工人阶级的推动和广大党员的压力之下,经过左翼积极努力,许多中派政党领导人同极力反对和攻击苏维埃政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右翼领导人发生矛盾和冲突,并公开支持和维护俄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由此而对坚持布尔什维主义、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国际表示同情和接近。尽管这些中派政党并不主张将俄国经验普遍化,也不认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适应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们认为,一个已经成功的、并经受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围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予肯定和维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各国中派政党开始组合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集团,1919年共产国际的建立,1920年伦敦国际即第二国际的恢复,更进一步地加快了中派国际性集团的形成过程。

这个阶段的中派国际集团,同战争初期各国党内的中派相比,其成员更为广泛。实际上它由3种中派政党或中派领袖人物组成。一种是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那样的中派政党。战争初期,其主要领袖人物曾和党内右翼一起站在“保卫祖国”的立场上,尔后才开始左倾;一种是象英国独立工党麦克唐纳那样的中派领袖,他曾投票反对军事预算案,采取了不同于工党其他领袖的反战立场;还有一种是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他在

战争中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战立场，同以他父亲维·阿德勒为首的党内多数派进行过斗争，甚至采取过刺杀奥国总理这样的极端行动，被捕判过刑，因此而声名大振。从组成情况看，中派国际集团，并非清一色的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机会主义者，而且由于它的许多领袖人物在战争初期的反战活动，使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这个阶段的中派国际集团，从其实际活动看，也不同于战争初期各国党内的中派。它与右翼的分歧，已从是否赞成军事预算这样的国内政策的分歧，深化为对整个帝国主义战争的责任应由谁承担这样的国际问题。两个国际对立格局形成之后，中派又面临着新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它既没有贸然进入恢复了的第二国际即伦敦国际，也没有立即参加刚刚创建的第三国际，而是始终主张建立一个包容两个国际在内的广泛的工人国际。为此，中派国际集团经历了一个先是接近、甚至试图加入共产国际，由于被拒而单独成立中派国际即维也纳国际，最后因同共产国际发生根本冲突，而与伦敦国际合并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3个国际间的较量和第二国际的重新组合。

2. 中派政党对第二国际的背离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内的中派与右翼，就战争和军事预算案表决问题发生的意见分歧，已经包含着背离的萌芽。到1919年2月为恢复第二国际而召开的伯尔尼会议上，则以公开的形式显露出来。当德、法两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互相推卸、共同掩盖各自在战争中的罪责时，出席会议的法国社会党代表龙格就曾指出：“全世界社会党人，都没有经受住战争爆发时沙文主义飓风的袭击”，都没有互相攻讦的理由。英国独立工党领导人麦克唐纳，在会后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

点。他认为，在战争罪责问题上，德国党的多数派即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对德国多数派的谴责，并不能说明战争的起因。”在他看来，问题在于：“伯尔尼的讨论并没有公开涉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对战争所持的立场。”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伯尔尼会议占压倒优势的，是一片谴责、攻击布尔什维克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声浪，并据此通过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多数派决议。与之相对立，弗·阿德勒和龙格却不同意这种谴责，投票反对多数派决议，并据此形成了少数派决议。该决议指出：“对苏维埃俄国的情况所抱的任何一种态度都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可以对此作出判断。”如果资料不足，就轻易作出结论，势必为资产阶级用来反对俄国革命，成为“官方造谣诬蔑的牺牲品”。同时，该决议还主张，应防止任何一项不利于将来各国无产阶级联合的决议，并强调指出，会上攻击苏维埃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告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少数”。这个决议，在会上曾得到荷、西、挪、爱尔兰代表团以及法、德、奥、希代表团部分代表的支持，由于不占多数而被否决。^②在随后召开的卢塞恩会议上，当多数代表提出以帝国主义国家间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作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起点时，在伯尔尼会议上形成的少数派，即明确地指出了和约的帝国主义性质，强调必须抗议帝国主义对俄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干涉，并着重指出，保卫俄国革命是革命国际应尽的责任。因为布尔什维克进行的社会变革正是所有社会党人的共同目标。这些事实表明，第二国际恢复时，它不仅遭到共产主义政党的坚决反对，也受到来自中派政党的巨大冲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274页。

②见《历史资料Ⅱ》，第259页。

步扩大了第二国际一些主要政党内部业已形成的裂痕。到1919~1920年，在德、法、意等中派政党中，终于形成一股脱离第二国际的潮流。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一个拥有80万党员、地位举足轻重的大党。它一直处于中派主义的影响之下。但是，由于革命潮流特别是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冲击，再加上仍留在其中内的左派蔡特金等人的大力工作，^①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发生了不利于第二国际的分化。这种分化，是从1919年3月2~6日召开的柏林非常代表大会开始的。根据左翼的要求，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公告》中，包括了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但同时又认为，苏维埃制度应由资产阶级宪法作出规定。^②虽然这是一种折衷，但是以此为起点，围绕着对待两个国际的态度，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论争。9月9~10日，在党的柏林全国代表会议上，两种意见又展开了交锋。左翼代表施特克尔，要求党与第二国际决裂并参加共产国际；与之相反，希法亭则认为，应继续留在第二国际。到11月间召开的莱比锡大会，除上述两种对立看法之外，又增加了累德堡的第3种主张，它也主张由中派党与共产党共组一个妥协性的国际。最后大会以227:54票通过了累德堡上述决议案。它明确地规定，正式与第二国际决裂，并通过有关谈判，使中派党与共产国际联合。即使其他中派党不响应，德党也应单独参加。不仅如此，党内的左翼力量，又

①按照约吉希斯和卢森堡的建议，为加快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分化，以使更多的左翼摆脱中派领导人而参加共产党，当斯巴达克派退出该党之后，蔡特金仍留在该党。直到1919年3月柏林大会后，她才宣布退出而加入共产党。见《大事记》，第2卷第54页。

②见《大事记》，第2卷第53页。

有了进一步增长。施特克尔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虽然被170票所否决，却得到110票支持（比上次大会所得票数增加1倍多），而且大会在《行动纲领》中，删去了柏林大会关于通过宪法规定以推行苏维埃制度的提法，并明确规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①

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工人阶级在坚持总罢工以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方面，曾作过不少努力。战争一爆发，包括一些力主总罢工的社会党领导人，也陷入了社会沙文主义泥坑。这一事实，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加深对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改良主义实质的认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当1919年2月伯尔尼会议提出恢复第二国际的设想时，法国社会党内多数人的想法，是按照反对改良主义的1904年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决议的精神，在团结和联合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工党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基础上重建国际。为此，当年4月召开的法国社会党巴黎大会专门通过决议，主张重建的国际时应重申阶级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纲领，并以俄国、匈牙利和德国的榜样作为社会革命的方向。这次大会，尽管以多数票否决了苏瓦林、洛里夫等共产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提案，但在与第二国际决裂的道路上，却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1919年11月，法国大选，社会党所获选票略有增长（由140万增至170万）；当选议员的人数，却从原来的103人，降至68人。从这个事实中，党内许多人，更加深了对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推行改良主义政策的认识。1920年2月，斯特拉斯堡大会以压倒多数（4,333：337票）通过决议决定同第二国际脱离关系，声明同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相一致，并决定派党的总书记弗罗萨尔和《人道报》总编辑加香，前往

^①见《大事记》，第2卷第73～74页。

莫斯科，就加入共产国际一事谈判。^①

英国独立工党在本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也是一支很有影响的力量。战后，它和其他中派政党一样，发生了不利于第二国际右翼领导人的革命性变化。1920年4月4～6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年会，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党员革命情绪的决议案。其中，包括禁止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制裁在议会中不愿捍卫工人利益的该党议员，立即承认苏维埃政府并与之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以及退出第二国际并立即加入共产国际等议案。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宣布同第二国际脱离关系。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年会虽然以多数票（472票对206票）予以否决，但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事实，彻底弄清共产国际的性质、目的、方法和策略。为此，年会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以着重了解共产国际是否是一个适合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联合起来的组织。

与上述中派政党一样，瑞士、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美国的社会党，在1920年7月前，都作出了脱离第二国际的决定。因此，当国际社会党日内瓦大会着手从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时，它已经不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代表大会，而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大会。不但象俄共（布）这样的共产主义政党对其进行抵制，就是一些原来曾参与伯尔尼会议筹备工作的中派政党也纷纷背离。1919年，出席伯尔尼会议的共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党代表；1920年7月，参加日内瓦大会的，只剩下15个国家和地区。日内瓦大会后，这种决心脱离第二国际、打算加入共产国际的势头，仍然有增无已。1920年8月中旬～1921年5月，表示要参加共产国际的社会党组织有：英国10个，斯堪的纳维亚诸国14个，德国6个，瑞士9个，法国162个，意大利17个，巴尔干和斯拉夫诸国16个；

^①见《民主社会主义》，第257～258页；《国际史》，第2卷第226页。

表示赞成加入共产国际的工会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德国30个，法国35个，英国200多个；此外，奥地利、葡萄牙、近东等国的党和工会组织，也通过了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①一个脱离第二国际、加入共产国际的势头，正在欧、美国家社会党内形成。

3. 对第二国际传统理论的修正

同中派政党脱离第二国际、准备加入共产国际的形势相适应，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中派主义，也有新的变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鲍威尔，于1920年完成、1921年公开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一书对此作了集中的阐述。②

在暴力和专政问题上，鲍威尔不同于考茨基，对此采取了原则肯定的态度。他不但不否认，甚至认为最好不要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并对考茨基攻击苏维埃俄国的言行进行过批评。在鲍威尔看来，处于以下两种情况中的无产阶级，应坚持暴力和专政。一种情况是，当资产阶级已不再强大到足以用民主制统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又尚未强大到足以用民主制统治资产阶级的时候，政治权力的分配，将由于两者尖锐对立而彻底垮台。这两个阶级，都必然要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本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成为阻止资产阶级粗暴的反革命专政的唯一手段。”这时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采用民主制专政的形式，而只能采用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专政即苏维埃政权。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依靠民主制夺取政权后，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那么，无产阶级将采取专政或恐怖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消极抵抗。但是，鲍威尔强调，“人们也可以

①见《共产国际》。转引自《第二国际的复活》，第159页注。

②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中文版页码。

把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和布尔什维主义专政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专政。这不是反对民主制的专政，而是民主制的专政。”（121~123）鲍威尔认为，采用这种暴力和专政的手段，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防御性的。后来，在1926年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鲍威尔指出：“社会民主党将以民主的方式行使政权，并为此而全面确保民主。然而，如果资产阶级想用有计划地破坏经济、暴力反抗或同国外反革命势力勾结一起等办法来反对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到底的这种社会改革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就只好用专政赋予它的手段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鲍威尔的这些观点，得到党的领导人们弗·阿德勒和其他代表的支持。这次大会通过的《林茨纲领》正式使用了“国内战争”和“专政手段”的提法。^①

鲍威尔主张，各个国家由于情况不同，其施行暴力和专政的方法，也应不同。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仅仅是俄国一国的现象。它只是由俄国特殊环境而不是从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中产生的；它所使用的“横施暴力”的方法，只适合俄国经济、文化落后这种特殊情况，而不能应用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业发达的、无产阶级人口占多数的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模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而必须代之以完全不同的方法。（5~6）这样两种不同环境、条件和方法的革命，形成了两种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两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剥夺剥夺者的生产资料的方法不同。后者，使用专政、恐怖手段，以一次完全剥夺、没收，即用暴力强制、采取法律行动，以实现“财产社会化”，进而推动条件尚不成熟的“生产社会化的经济过程”；前

^①见《从哈布斯堡至希特勒的奥地利》，第5卷。转引自《民主社会主义》，第251~252页。

者，采取民主的而不是暴力的方法，逐渐地、有步骤地、按部就班地改造现有的法律制度，从加强已经形成的“生产社会化的经济过程”入手，逐步实现“财产社会化”（111、116~177）。

之所以有这样两种革命方法、两种社会主义，鲍威尔认为，关键取决于不同国家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按照他的分析，一个阶级的力量，首先取决于它的“社会力量因素”，即它的人数、组织性、在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及其掌握的经济实力手段、阶级成员的政治积极性、其成员的教育水平及其影响力和吸引力。其次，取决于它拥有的物质暴力手段，即武装力量的数量、武器装备的数量和完善程度、给予武装力量的领导和组织的质量。（117）据此，鲍威尔把现有国家分为两种类型：民主制国家和非民主制国家。在前一种国家中，民主制是形式，其内容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政治权力的分配只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那个阶级的人数越多，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大；那个阶级组织得越好，对议会的组成、活动的影响就越大。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发展到无产阶级占据人口的大多数，使其“社会力量因素”的增长，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因素”的增长，无产阶级就能依靠“一般民主”，通过议会选举获得多数，使民主国家的权力成为无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使民主制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制，而不必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后一种国家即非民主制国家中，政治权力的分配，不是按照“社会力量因素”，而是按照物质暴力手段，主要是依靠武装力量来确定。（117~119）这些国家，由于经济落后，无产阶级不占人口的多数，即使用暴力取得政权，由于“无产阶级只占全国微不足道的少数，所以，它只能暂时巩固其统治。一旦农民群众在文化上发展到足以自己掌握国家政权时，无产阶级必然重新丧失这种统治。”（76）

由鲍威尔提出并得到弗·阿德勒等人支持的上述主张，反映了十月革命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

级革命、专政学说的巨大影响。一方面，战后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工人革命斗争的血腥镇压和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逐步巩固的实践，已宣告关于只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就能争得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二国际传统理论的破产，已证明考茨基完全取消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议会主义策略行不通。同时，法西斯势力的抬头，资产阶级反动集团日益加剧的挑衅，也使鲍威尔等人感到就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受到威胁，必须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对暴力和专政的必要性应给予有条件地肯定，以引导和组织工人阶级对付当前现实的危险。另一方面，俄国革命胜利后，尽管许多欧洲国家都已出现革命高潮，甚至一度出现过革命形势。有些国家如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的工人阶级还取得了局部、短暂的胜利。但是，它们最终都被扑灭了，就连苏维埃俄国这样新生的工人国家，也由于工作和政策的失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布尔什维主义灵不灵，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否能普遍适用于所有发达国家，在鲍威尔等人心目中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此，他得出了十月革命道路只适应俄国而不适应西方发达国家的结论，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第二国际传统理论、又不同于布尔什维主义学说的新理论，即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必要修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各种动摇于第二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中派政党，开始集结并形成“第三种势力”。

二、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建立

1. 中派政党同共产国际的谈判

中派政党同共产国际谈判加入条件问题，首先是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19年底提出来的。该党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正式地表明了这一要求。当时，按照列宁的分析，欧、美国

家正处于革命的高潮之中。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以及帝国主义同国际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为革命浪潮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摆在国际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利用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危机，作好在国际范围内采取革命行动的准备，以便通过德国革命带动欧洲革命，在近期内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把俄国革命推进到欧、美国家。但是，列宁认为，当时欧、美工人阶级并没有作好迎接世界革命的准备。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很有影响的大党及其党员和工人群众，仍然处于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中派领袖的统治之下。因此，中派主义是工人运动的最大祸害；考茨基、龙格等中派领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和应予重点打击的“主要敌人”。①列宁对当时革命形势和中派领袖的如是估量，在他于1920年1月20日为俄共（布）起草的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②

在“复信”的前言中，列宁明确指出，这封信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应于法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目的不在于面向这些国家的中派政党及其领袖，而在于向这些国家同情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工人群众说明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些国家“工人的领袖都在（有意和或无意地，即自欺欺人地）欺骗工人，这些领袖只在口头上拥护流行在工人中间的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事实上仍和从前一样，不按这些口号的精神，而是违背这些口号的精神进行工作，进行宣传 and 鼓动。”③据此，“复信”从16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揭露了中派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策略的背叛，实际上提出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13、188~206页。

② “复信”的基本内容，是后来共产国际执委复信的基础。

③ 见“复信”草稿（提纲），《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5页。

了中派政党加入共产国际所必须遵循的条件。最后，列宁强调指出：“总而言之，（德国）独立党和龙格派的一切宣传、一切鼓动、一切组织都是市侩民主主义的，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是和平主义的，而不是社会革命的。因此，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承认’，就只停留在口头上。”“复信”的结论是：尽管列宁和俄共（布）并未拒绝同一切愿意同它商谈和知道它的意见的政党进行商谈，但是，“俄共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不同独立党和龙格派联合在一个国际内，等到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中的革命群众纠正了独立党和龙格派的弱点、错误、偏见和不彻底性以后再说。俄共认为共产国际不能容纳这样的政党。”^①用德国左派共产主义者戈尔登贝格的话说，就是要分裂这些中派政党，尽力孤立其领袖，争取和团结其群众，使之成为共产党之后再接受其加入共产国际。^②很显然，列宁和俄共（布）之所以与中派政党谈判，并非准备吸收其加入共产国际，而是要通过揭露中派领袖，将其影响下的广大群众，争取到共产国际这一边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共产国际执委会，除了按照上述方针答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外，还于6月20日，专门发表了《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所有地方和区域组织书》，号召该党的基层组

①同上第311页。列宁后来在评注龙格来信的《政论家短评》（《列宁全集》，第30卷第319～330页）和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见《回忆列宁》，第5卷第302～309页）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②见《共产国际‘二大’会议记录》。这个主张，在会上得到许多“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不仅反对中派政党加入，就连同这些党谈判也主张取缔。列宁认为不能取消谈判，因为一部分工人还站在中派政党一边，需要把这些工人争取过来。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同上书。

织，派代表直接出席“二大”，试图以此将中派领袖孤立起来。

即令如此，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仍然派出由其主要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去苏俄商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①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已明确表示准备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对德国党复信中提出的条件。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仍然认为这还不够，进而向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使中派政党更加难以接受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廿一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冲突，使中派政党更为不满。这种冲突和不满，在会前已有反映，到召开“二大”时，又在以下几个问题上集中地表现出来。

如何看待中派政党特别是其领袖人物？会前，列宁在“复信”（提纲草稿）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论著中，已经明确提出，中派政党及其领袖是主要危险和主要敌人。

“不把这类人物无情地从革命政党中驱逐出去，不面向下层，不日益广泛地面向群众，面向被剥削者中的真正多数，就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讨论一开始，季诺维也夫又以俄共（布）中央的名义郑重地声明，不打算并拒绝同法国、德国党的右翼领袖考茨基、龙格等进行任何合作。他还强调，“要把和我们战斗在一起的工人与暗中破坏斗争的领袖加以区别”。季诺维也夫在历数那些想加入并正在努力争取加入共产国际的中派党的社会和平主义、改良主义错误之后，充满信心地提出：“我确信，无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对我们抱什么态度，无论法国社会党领袖想干些什么，各国工人群众的心，总是向着我们的……他们将全然不顾他们的犹豫不决的领袖而向我们伸出手来，他们必将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正是基于这种对中派政

① 详见《回忆列宁》，第5卷第302～3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10页。

党内部情况的盲目乐观估计，季诺维也夫向大会提出了由他和列宁起草的“廿一条”（提纲）。这个提纲，没有满足于一般地要求驱逐改良主义者，而是指名道姓地不许屠拉梯、考茨基、希法亭、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莫迪利扬尼等为代表的、人所共知的改良主义者有权自称为共产国际的成员，要求与他们完全决裂。^①同时，“廿一条”（提纲）还明确地规定必须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洗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第13条），必须把拒绝服从共产国际提出的加入条件和指导原则的那些党员开除出党（第21条）。

共产国际“二大”的上述估量和要求，遭到中派政党的强烈反对。还在大会召开之前，即7月11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复信。该党中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出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本应尽可能真诚地对待和自己进行会谈的外国革命工人组织，但是，它却断言：“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与他们的右派领袖”。该党认为，执委会制造的这种说法不切合实际，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奉行协约国的方针，没有什么根据。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不存在的分裂，强加于德国党头上，是对德国党内生活的干预。前来谈判的该党代表克里斯平，在大会辩论“廿一条”时，作了长篇发言，介绍了该党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公开反对把该党领导人推到右派领袖一边去。他强调指出：“你们当着全体代表的面，侮辱我们党的领袖，好让群众抛弃我们。你们以为这一手，会在德国产生影响。你们的想法大错特错了……你们

^①见“廿一条”第7条。原来的提纲草案，只点意大利屠拉梯、莫迪利扬尼的名。经过执委会讨论，认为不仅要要点出意大利机会主义者，而且要痛斥其他国家改良主义分子。因此，决定至少要要点出每个国家的1名改良主义分子。

想争取群众，从而挑动他们去反对党的领导人。你们这样做法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谈及自己之所以一度反对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时，克里斯平指出，这是因为共产国际“一大”曾决定取消独立社会民主党，决定把它毁掉，使之不复存在，决定将它彻底消灭。“可是，你们要知道，要被消灭的政党代表，却首先愿意同决定消灭自己的同志进行协商，谋求团结。我们赞成加入共产国际，但我们首先要求取消那些敌视我们的决议。你们打击了我们，还要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因为你们打击了我们。这是不行的。这个问题需要认识清楚和加以斟酌。”克里斯平的发言，得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另一代表迪特曼的支持。已经加入共产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塞拉蒂也有共鸣。塞拉蒂在会上公开反对以清洗、开除屠拉梯等改良主义者内容的“廿一条”。他指出，尽管他不同意屠拉梯的阶级合作的主张，也赞成屠拉梯应该退党，但是，对象屠拉梯这样在工人中有很影响的领袖，不要采取开除的办法。“否则，工人群众就会离开我们”。同时，他特别强调，贯彻“廿一条”必须善于适应各国的特殊情况，不能不顾意大利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猖獗的实际情况，马上搞清党和分裂。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张，由于世界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成立。因此，应按照俄国党建设的经验，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和坚强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以便能到处打击敌人，随时给予自己的任何队伍以最大的援助，以做好充分准备，去反对那些必将与之较量的敌人，从而推进世界革命。向“二大”提出的《共产国际章程》和“廿一条”，就集中地体现了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据此，《章程》和“廿一条”明确地规定，各国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拥有充分的权力、权威和广泛的职权（第12条）；共产国际

执委会有权开除那些成员党中违反国际纪律的集团和个人，也有权将违反代表大会决议的成员党开除出共产国际（《章程》第9条）；共产国际及执委会的一切决议对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都具有约束力（第16条）。

这种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忽视乃至抹煞各成员党独立自主原则的要求和条件，对于长期在平等、协商基础上活动的第二国际中派政党来讲，是个难以接受的条件，也是横亘于中派政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的一道障碍。英国独立工党同其他中派政党一样，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加入或同共产国际创建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也认为这种国际对国际问题应有统一的见解。但是，它主张，新的国际应让每个党有行动的充分自由和独立性，各国党有权保留“利用其所属国家在经济和民族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有利时机”的自由。^①法国社会党的龙格甚至主张，新的国际可以向所有支部作基本的策略性指示，以取得最大限度的革命效率，并尽可能建立一个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战斗的统一战线。同时他强调，“一个政党决不容许强迫它接受某种组织形式和章程，因为组织和章程不可能是所有国家都相同的。它们只应该在保持党的充分自由和广泛权限的情况下，由它自己加以决定。”^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则通过自己的机关报公开表示，并不打算创立一个国际来同共产国际抗衡，而只是想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广泛国际。它应是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国际，而不是象共产国际那样“尚软弱无力的国际”。同时该党认为，“问题不在于创立一个新的国际，而只是在于各党代表之间可能举行的谈判，因按‘莫斯科提出的条件’，这些党派是不可能加入共产国际的。”^③很显然，在以一个广泛的国际代替已经公开分裂的第二国际问题上并无歧异，问题是要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新国际，如何使它具有

①②③转引自《第二国际的复活》，第161、162、163页。

广泛性和普遍性？是建立一个排除右翼的、广泛而又松散的国际联合，还是另组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战斗联合？在这一点上，不仅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派政党有原则分歧，就是在共产国际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共产国际“二大”讨论关于工党加入条件的问题时，英国工厂委员会的代表拉姆赛指出：“就这一问题从这里发指示是个策略错误。”坦纳从一般意义上反对过分的集中和统一。他说：“应当让每一个组织在本国有充分活动的自由，使它能按照特殊条件并适应这种条件从事活动。”^①荷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怀恩科普甚至主张，共产国际的章程，只有首先由各国党审议讨论，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并将其包括进去，才能交国际代表大会通过，才能付诸实施，才能实际体现各国党的意愿和要求。怀恩科普还提议，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不应该驻在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与外界隔绝的俄国。如果代表大会认为执委会驻地不能变动的話，那目前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的执委会，势必只能成立俄国的执委会。中派政党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政治立场和主张上各持一端，在关于共产国际与其成员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上，却殊途同归。这集中地反映了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关于建立一种与共产国际截然不同的新国际的主张。

怎样坚持暴力和专政原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国党，在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中明确地指出，必须用国内战争来打倒剥削者，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武力和恐怖手段对付共产党人的条件下，如果放弃暴力和恐怖，“那就变成了多愁善感的小资产者，就是在散布社会和平的反动市侩空想，说得具体些，就是害怕大刀警棍。”^②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复中指出，它并不反对暴力，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其他

^①转引自《列宁和共产国际》，第260页。

^②《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8页。

任何一种专政那怕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专政，也不例外）离开使用暴力就不能存在”。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把暴力绝对化。“暴力使用到什么程度，这要由反革命的反抗情况来决定。”它也不同意把暴力和国内战争这个“俄国所特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上升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原则”。这样一来，就“忽略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必须采取不同的革命形式这一点。”它还强调指出：暴力是一个使新社会得以产生的接生婆，而它并不能使旧社会母腹中尚未发育成熟的新社会胎儿提前降临人间。该党还特别反对把暴力和恐怖手段相提并论。“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各种灾祸充斥的王国，要使用国家暴力手段来对付无辜的人们，其目的就在于吓唬人们，使他们打消一切反抗的念头。”这样做，“并不表示运动的强大。恰恰相反，它表明运动内部十分虚弱。因此，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历史的经验出发，反对颂扬恐怖手段。”克里斯平在“二大”讨论“廿一条”时重申了上述观点。他指出，恐怖手段和暴力，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不诉诸暴力。”但是，他反对尚未掌握政权之前，就把恐怖手段当作一种政治原则来实行。就连该党的左翼代表施特克尔，也援引卢森堡的论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无需用恐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少数人不顾一切地企图用暴力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强行改造世界，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列宁在发言中，对克里斯平的发言作了驳斥，而且认为，“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的。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①这个结论并不公允。因为反对把暴力、国内战争、武装斗争绝对化或滥用暴力的，并不止于中派政党及其代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7～218页。

表，一些共产党的代表也有类似看法。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比兰主张，不应将武装斗争表述为革命运动的目的，而应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把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作为普遍原则来宣布，而不考虑整个国家中的条件，即不考虑那里的先决条件是否成熟，这种武装斗争是否真正需要进行和实际可能进行，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即在一些国家中还不具备进行这种斗争的先决条件，这个号召就会起挑衅作用。”经过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了这个主张。被大会通过的章程文本谈及推翻资产阶级时，以“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武装斗争）”的提法，代替了原来只讲武装斗争的提法。

中派政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就加入条件问题进行的谈判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经验和布尔什维主义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当时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强调战略策略的灵活性，坚持从各国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但是，其着眼点，却是要求它的成员党照搬和仿效俄国经验，突出地强调布尔什维主义的普遍性、国际性。他们试图通过普遍推广俄国革命经验和布尔什维主义，使共产国际成为一个纯粹的、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以尽快地建立起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种指导思想和实际作法，势必同主张各党独立自主、行动自由的中派政党，发生尖锐冲突。正是上述分歧和冲突，使一度热乎的中派政党倾向甚至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势头，迅即冷却下来，并引起各个社会党和国际工人组织的分裂。

2. 社会党和国际工人组织的分裂

1920年8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二大”的闭幕词中，谈到想依靠共产国际又要保留“自治权”的中派政党时指出：“我们希望，我们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些先生

面前把门紧紧关上。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必将使旧的政党发生分裂。凡是真诚地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他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所有腐朽的家伙，必将象废物一样被丢开，再也不能阻碍工人阶级前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出的代表的直接参与下，欧洲几个主要社会党，于1920年底1921年初，围绕着是否接受“廿一条”特别是关于立即开除改良主义者的条款先后发生了争论和分裂。

对共产国际“二大”首先作出反映的，是1920年10月12日召开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法国社会党的龙格、俄国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布拉莫维奇专程前来与会；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身份，同刚刚成立不久的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一起，坐镇指挥。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长达4小时的讲话。他试图以德、意、英、奥皆已具备革命形势、世界革命已经到来为理由，全面论证了与危害革命的改良主义政党及其领袖彻底决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个富于煽动性和充满盲目乐观情绪的讲话，首先遭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等人的反对。希法亭认为，当时的形势与其说是世界革命业已临近，不如说是世界资本主义正趋于稳定。在这种革命处于守势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可能再发动一次类似十一月革命的攻势。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分裂工人阶级，只能带来毁灭党的严重后果，无异是一场灾难、一种劫运。^①这种看法，得到克里斯平、累德堡、迪特曼等人的支持，却并未在大会上占据优势。相反，季诺维也夫关于形势的乐观估量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后大会以81票之差（237票对156票、2票弃权），正式通过施特克尔—多伊米希的联合提案，决定承认“廿一条”，加入共产国际。在会上公开拒绝承认“廿一条”、不同意加入共产国

^① 详见《国际史》，第2卷第260~262页。

际的少数派立即退出大会，另行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由此，独立社会民主党一分为二，形成以多伊米希和霍夫曼为主席、拥有30万党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和以克里斯平和累德堡为主席、拥有30万党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前者，于1920年12月，同德共合并为统一共产党（1921年8月改称共产党）；后者，于1922年9月，并入社会民主党。

法国社会党的情况稍有不同。该党总书记弗罗萨尔和《人道报》总编辑加香，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谈判和在共产国际“二大”的发言中，从原则上并未公开反对“廿一条”，也表示回国后要按照“廿一条”的要求作好工作，力争该党加入共产国际。但是，两人在“二大”宣读的声明，却回避了清洗和开除中派领袖这个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根本要求。为此，曾遭到一些代表的讥讽和非议。季诺维也夫甚至称加香“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和平主义者”。回国之后，弗罗萨尔和加香，一方面积极宣传加入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坚持可以在不开除任何人的前提下，贯彻“廿一条”。在1920年12月召开的图尔大会上，弗罗萨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提案不主张搞任何开除……我不仅在这里，而且在莫斯科和在争取加入第三国际的活动期间声明过，象我一样的人，会被曾经同他们一道为争取社会主义革新进行过多年斗争的同志诽谤和开除而搞臭……我今天再次表示，如果有人要求我现在开除龙格，或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开除他，我就和龙格一起退党。”这个观点，得到该党中派领袖龙格和福尔的支持，后者还提出关于以承认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正当大会行将表决之际，秘密出席大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蔡特金，转递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其他执委签署的电报。它明确地提出，必须以开除龙格等中派领袖，作为该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必备条件。^①面对如此苛刻的

^①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228~229页。

要求，大会的多数代表，出于对俄国革命的支持和对共产国际的向往，仍以压倒多数（3,028票对1,022票），通过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是，勃鲁姆等少数派，却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一举动，并以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分裂为理由，立即宣布退出大会，另行成立社会党。以弗罗萨尔、加香为首的多数派，则于1921年5月，在马赛大会上宣告成立法国共产党，并以图尔大会通过关于加入共产国际决议的时间（1920年12月29日）为党的成立时间。从此，统一的拥有30万党员的法国社会党也一分为二，形成有14万党员的共产党和只有3万党员的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还在“二大”之前，就已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该党领导人塞拉蒂对“二大”所提出的“廿一条”持反对态度。为此，他在“二大”表决“廿一条”时弃权。回国后，塞拉蒂又在公开刊物上指责“二大”通过的作为“即兴而作”产物的指导原则和“廿一条”，要求重新审议“二大”决议，因此而与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公开冲突。冲突的爆发点，是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革命形势的不同估计。按照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分析，当时在意大利北部发生的工人占领工厂运动和南部西西里农业工人占领土地运动，标志着意大利正在走向革命。一旦无产阶级在意大利取得胜利，势必招来英、法、美等国的封锁，从而加速这些国家的革命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意大利最迫切需要的，是在决定关头不会动摇、不会畏缩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政党，它应成为意大利革命无产阶级真正的先锋队。为此，不仅把屠拉梯等改良主义者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指塞拉蒂等——引者注）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①与之相反，塞拉蒂在公开信中指责列宁“对意大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6页。

利形势完全不清楚”。他认为，不仅意大利而且欧洲国家都不具备革命形势。因此，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贸然发动革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以为摆脱了屠拉梯等人意大利就会进行革命，通过在群众中散布这种建立在迷信奇迹和草率基础之上的偏见，这是贬低革命的作用和意义。正是由于对形势和任务的不同估量，形成了对待意大利社会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两种不同的方针。为了排除来自塞拉蒂的阻力，共产国际特意派出了保共领袖和著名理论家卡巴克奇耶夫和匈牙利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前来出席于1921年1月在里窝那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并强烈要求无条件地接受“廿一条”，立即开除屠拉梯等人以及支持屠拉梯的整个派别。尽管塞拉蒂在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大让步，但是，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述主张的“纯粹共产党人”提案，只得58,783票而被否决；塞拉蒂等“统一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在策略和清洗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方案，却以98,028票的多数被通过。为表示抗议，“纯粹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陪同下退出大会，另行开会宣告意大利共产党正式成立。一个统一的、拥有21.6万名党员的意大利社会党也一分为二。1922年夏，屠拉梯因为接受国王召见而被开除出党，社会党再度分裂，屠拉梯另组新党意大利社会主义劳动党。

根据格拉斯哥大会的决定，英国独立工党曾派以党的主席沃尔舍德和执委艾伦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并以代表团的的名义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就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等根本性问题加以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复信详细地说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确切含义。独立工党执委会经过研究之后认为，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的条件，实际上就意味着要承担在本国发动内战、消灭议会机构以及

①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241～242页。

采取用心险恶的方法来反对“同共产党领袖态度不一致”的社会党人。^①为了进一步作出决定，该党执委会决定将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谈判的两封来往信件以及阐明该党执委会态度的简要前言，提交于1921年3月召开的索思波特大会。经过讨论，大会再次否决了关于接受“廿一条”和立即加入共产国际的议案。所不同的是，上次（格拉斯哥）大会，赞成加入的有206人；这次（索思波特）大会，却减至97人。在此之前，英国工党也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提议。就这样，一个拥有435.9万党员（1920年）和423.6万选民（1922年）的英国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受到国际性分裂的冲击，并作为一个统一的党继续存在和发展。^②

国际工人组织的分裂，与各国社会党的分裂是同步进行的。国际工会组织成立于1902年6月，当时叫“各国总工会国际书记处”，1913年改称国际工会联合会。1914年，它已成为一个拥有19个成员国、739.4万会员的国际工会中心。世界大战爆发后，以列金为首的领导集团，陷入社会沙文主义泥坑，使该组织趋于瓦解。但是，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仍然坚持反战罢工斗争。到1915年，在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分别形成了3个工会中心。战后，由于工会组织的急剧发展，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工会中心，已成为国际工人阶级迫不及待的要求。还在1917年6月，俄国工会代表会议就曾提出召开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以建立统一的国际工会问题。只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断绝了俄国与外界的联系，致使

①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223页。

②1921年1月，由几个小团体联合组成了英国（大不列颠）共产党。该党人数很少，到1923年1月仅有2,300名党员。其影响力远不如英国工党。

③见《国际劳工运动史》，第80～82页。

这项建议未能付诸实施。重建国际工会中心一事，就落到正在恢复的第二国际肩上。

1919年2月，与伯尔尼会议召开的同时，举行了一次有关国家工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以重建国际工会中心。这次大会，于同年7月28日在阿姆斯特丹开幕。经过讨论，决定重新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和出版有关工人运动与社会方面的刊物、材料，负责工会运动的统计工作，仲裁劳动纠纷等等。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实际是处于伦敦国际影响下的一个工人国际组织。它从成立起，就敌视苏俄工会，多次拒绝或否定苏俄工会关于参加该组织的申请，因此而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俄共（布）的反感。共产国际“二大”专门讨论了工会运动问题。它所通过的关于工会、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的决议指出，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在工会中从事革命工作，工会不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那么，共产党人就不要被工会组织的分裂所吓住。”季诺维也夫进而指出，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社会党叛徒所领导的几百万工人追随它，因而这些人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应当使他们分裂，并把他们拉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此。”美国一位代表还强调指出：“象我们粉碎第二国际一样，我们也应粉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这是我们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条件。”同时，这位代表认为，分裂是一种革命行动，有时甚至必须促进分裂。正是在这种不惜一切制造分裂的思想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中形成了两个国际工会中心。一个是1920年7月成立并奉行第二国际的理论、纲领、策略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它拥有28个全国性的工会中心、2,400万会员；一个是1921年7月创建并遵循共产国际的理

①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177页。

论、纲领、策略的红色工会国际，它包括41个国家的工会组织，1,800万会员。这种对立的格局，对一些国家的工会运动发生了影响。1920年12月，法国社会党图尔大会分裂之后，劳动总联合会就是否加入红色工会国际问题，展开激烈辩论。1921年7月，它的里尔大会，以1,572：1,325票，否决了关于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提议。由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工会宣布退出大会，并于1922年6月，在圣太田大会上正式成立法国统一总工会。该组织，第二年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由此开始，在法国工会运动中，形成两大营垒，即由社会党领导的劳动总联合会和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总工会。

国际工会运动的分裂，不仅表现为上述两个国际工会中心的对抗上。1920年在海牙还建立了拥有400万会员的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乌得勒支国际）；1922年12月，在柏林形成了拥有300万会员的无政府工会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柏林国际）。

同国际工会组织一样，国际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也是在战前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奠定基础的。到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它已拥有15个组织、17万会员。它在大战期间为团结青年进行反战、反军国主义的斗争，作过积极的贡献。后来特别是李卜克内西被害致使该组织瘫痪后，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统一的、集中的国际青年组织。为此，由德国代表发起，于1919年8月间在维也纳成立临时委员会负责筹备，并于同年11月20～26日在柏林秘密成立青年共产国际。该组织发展很快，它由1919年12个组织22万人，发展到1921年已拥有48个组织80万会员。成员遍布欧、美、澳、非、亚洲。青年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伦敦国际的不安。为使各国青年组织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伦敦国际以建立“纯粹青年国际”、使青年组织不听命于莫斯科为旗号，于1921年5月12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社会民主青年组织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青

年工人国际。同青年共产国际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相反，青年工人国际的纲领认为，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活动，其宗旨是在宪法范围内开展教育、文化、娱乐活动，以强增青年的教养。建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其活动的主要内容。

以工会、青年组织为主要标志的工人国际组织的分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初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激烈斗争和第二国际内部的分化进程。

3. 伯尔尼预备会议

中派政党试图建立一个“超然”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之外的、广泛的国际，其酝酿时间比较长。还在共产国际“二大”和伦敦国际日内瓦大会之前，就已提出这个问题。1919年底、1920年初，根据法国龙格派的倡议，建立了以龙格和福尔为首的恢复国际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既批评刚成立的共产国际，又批评正在恢复中的伦敦国际，并出版一份小报，以协调各中派党的活动。1920年2月12日，斯诺登在英国《工人领袖报》发表文章明确地提出，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之后，要成立第四个“生气勃勃的、行动积极的国际”。^①随后，英国独立工党执委会，于2月28日致函瑞士社会党，建议为恢复国际召开一次左派社会党会议。瑞士党表示赞许，但坚持以排除与第二国际有联系的党和人为先决条件。由于对是否吸收支持第二国际的党参加会议和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进行谈判，花去了大量时间，因此，共产国际“二大”之前，中派政党在这方面并未采取切实的步骤。

在共产国际“二大”正式通过以清洗和开除中派领袖为内容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的复活》，第164页。

的“廿一条”和几个主要社会党分裂之后，各中派政党加快了单独建立国际的进程。1920年10月21日，英国独立工党全国执委会，在听取关于共产国际“二大”和伦敦国际日内瓦大会的报告后，通过决议指出，既没有加入第二国际、又没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以及只是有条件地靠近他们两者之一的社会党，

“应当讨论关于成立真正世界性的国际的问题。这个国际，应该使各国的运动能够按照其斗争条件的经济和历史特点自由地发展。”“决议”主张召开这种会议，并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执行。①这个决议，立即得到广泛响应。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0月29日作出决议并向奥地利、瑞士、法国、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的社会党和英国独立工党发出同样内容的信件，建议讨论成立新国际的会议于12月5日在伯尔尼召开。瑞士社会党执委会，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了邀请书。和上述两党不同的是，瑞士党突出强调了两点。首先，它认为共产国际提出的“廿一条”由于无法执行，应予拒绝。因此，准备同各个愿意加入共产国际而不能同意“廿一条”的党进行联合，以期达到修改加入条件的目的，而使革命的工人政党的国际联合得以实现。其次，它强调，无意建立一个新组织来与共产国际对抗，并表示愿意与共产国际一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际。②这些建议，得到德、英、法、捷、俄（孟什维克）等党的支持。11月7日，奥地利党通过决议，宣布它不再属于第二国际，同时指出，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特别是它提出的21项加入条件看，第三国际只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中央组织，并且企图使工会国际分裂，因此该党不得不拒绝加入第三国际。该党决议表示赞成英、德、瑞士等国党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主张。但是，希望这次会议不是成立新的第四

① 《历史资料Ⅱ》，第279～280页。

② 见《历史资料Ⅱ》第281、280页。

国际，而是探讨建立以团结世界各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为宗旨的世界性工人阶级组织的方法和途径。^①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上述7个党同意召开一次预备会议进行磋商。

预备会议于1920年12月5～7日在伯尔尼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上述7个党的16名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各国工人书》和《告各国社会党书》，拟定了《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论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组织》等提纲，选出了阿德勒、格里姆、累德堡、沃尔舍德等5人组成负责会议事宜的筹备委员会。

《告各国社会党书》是伯尔尼预备会议的主要文件。它扼要地说明了中派党的基本主张，实际上是中派党拟议中的新国际的行动纲领。它从概述战后政治形势入手，明确地指出：“英·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是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同时，英·美·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纵·容·德·国·军·国·主·义，在东亚则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由此而造成“一个直接反对东欧和中欧无产阶级革命、反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自由要求的世界统治体系。”为了反对这种体系，必须集合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以无产阶级的世界政策，来对抗资本统治世界的企图。这个政策的任务应该是：反击帝国主义西方列强的进攻，以保卫苏维埃俄国；挫败德帝国主义在中欧的反革命阴谋，把东欧和中欧革命运动从西欧列强强加给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支持争取解放的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斗争，从而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

接着，《告各国社会党书》分析了无产阶级国际的现状。它指出，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只有当世界无产阶级在革命社会主义原则上统一起来，并团结在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里才有可能。但是，“目前，无产阶级还没有这样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的各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280页

国党，由于采取了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崩溃、垮台了。“第二国际已不再存在了！”现在自称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只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中那些属于纯粹改良主义政党的联合体。自称第三国际的共产国际，现在只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只要它坚持它的第二大代表大会的决议，它就只能是这样一种组织。”在文件的作者看来，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把俄国革命的方法强加给各国党，取消了各国党的自主权，把这些党置于一个大权独揽的国际中央组织的控制之下，并有意识地分化瓦解那些不俯首听命的社会党和竭力分裂工会组织，因而不能把全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正因为现有的两个国际都不足以团结世界无产阶级，所以这些中派政党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机构，以克服国际工人阶级力量极为分散的状态。

最后，《告各国社会党书》涉及到革命的斗争手段和策略问题。它认为，应按照当时革命的形势来确定手段和策略。由于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革命也将采取不同形式。无产阶级既不能局限于采取现有的那些单纯工会活动和议会活动的方法，也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工农群众尖锐的斗争方法。“一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将在资产阶级抵制或反抗无产阶级最高权力的一切地方，运用专政手段。”如果无产阶级是以民主手段取得政权的，那么在资产阶级反抗时，民主政权也会被迫采用某些专政措施；如果在夺取政权的决战时期，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斗争中不宜实行民主，那么专政就必须采取无产阶级阶级组织专政的形式。这种专政机关或形式，可以是工农兵苏维埃，也可以是工会和生产委员会、地方自治组织(公社)或其他各种阶级组织。^①在这方面，《告各国社会党书》以国际文献的形式，重申了鲍威尔关于民主与专政的主张。

^①见《历史资料Ⅱ》，第282~287页。

《致各国社会党书》在结束时，号召各国社会党派代表参加于1921年2月22日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并提出了会议的议程。

预备会议之后，负责筹备的专门委员会，又于1921年1月8~10日，举行会议通过决议，就各代表团人数、代表条件、表决票数的分配、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提出了具体建议。

4. 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建立

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于1921年2月22~27日在维也纳召开，来自13个国家的78名代表出席。会议听取了报告，通过了弗·阿德勒起草的《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章程》，选出由弗·阿德勒（书记）、格里姆、累德堡、龙格、沃尔舍德等人组成的书记处，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由此宣告正式成立。由于它的驻地设在维也纳，又称为“维也纳国际”。^①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和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成立，是中派政党企图超然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之外走“第三条道路”的一种尝试。在其筹备和尔后的活动中，常以推行既不同于共产国际又有别于第二国际的政策自许。这一点，也贯串于维也纳会议的各种文件和决议之中。

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会议根据对战后帝国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面临的新形势的分析指出，世界大战强烈地震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造成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严重危机，使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但是，这种形势发展，并没有造成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条件。弗·阿德勒逐一批驳了共产党关于所有战败国都能夺取政权的观点，认为“只有革命席卷所有战胜国，主要是工

^①由于它在一些问题上与第二国际有分歧，但其基本立场和第二国际相近，列宁和共产国际在公开场合，又称其为“第二半国际”。

业发达和富裕的国家而不是工业落后的国家时，革命才能胜利。”他根据奥地利工人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目前对夺取政权的问题，应自觉地予以克制。正是基于对战后形势的认识，沃尔舍德在报告中指出，各国工人阶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在国际范围内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武装干涉进行斗争，以保卫苏维埃政权；制止协约国对匈、罗、波的干涉和反革命阴谋，粉碎各国尤其是德国反动派向工人阶级的挑战；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新的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以表达工人阶级争取和平的决心，如此等等。无论从指导思想，还是具体措施，维也纳国际所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战略，而不是主动进攻的战略。

关于革命方法。阿德勒在报告中强调，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分歧，只是革命方法的分歧，即在对包括历史和未来在内的历史形势估价上的看法对立。前者，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幼稚、急躁；后者，则过于怀疑而缺乏信心。这两者都不可取。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根据具体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机、阶级力量对比和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采取不同的阶级斗争形式和方法。按照阿德勒的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有一条不容辩驳的规律，即资产阶级始终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哪怕在明显的具有民主性质的国家夺取政权时也不例外，因此专政就不可避免。他指出，这种专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工人阶级夺取民主国家的国家政权以专政方式进行管理；还有一种是在资产阶级强大而且获得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只有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群众罢工、武装起义等等），只有通过对于资产阶级建立专政的方式来夺取政权。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以工农兵苏维埃或其他阶级组织的形式来实现。”前者，即工人阶级取得的民主国家政权的专政，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可行的形式；后者，即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专政，则适合于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

关于维也纳国际的性质。按照设计者的构想，它是力图弥补现存两个国际的缺陷的一种尝试、一种手段。在阿德勒看来，现存的两个国际都没有充分的代表性。第二国际就没有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大党；而共产国际又缺少英国工党这样有影响的政党。因此，应该建立一个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工人国际。在他起草并为会议通过的《章程》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党国际联合会，不是一个包括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而只是建立国际的一个手段。它的任务是：“统一所有加入联合会的各社会党的行动，确定一致行动，努力恢复联合全体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因此，它成立伊始，就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工人国际的实体，只是把自己视为联合所有社会党以成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国际的一种手段。用阿德勒的话说，这仅是迈向新的国际的第一步。关于未来的新国际，按照他的设想，它不应象第二国际那样，限制无产阶级只能用民主方法进行斗争；也不能象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那样，要求其他国家仿效俄国革命采取千篇一律的方法。和“莫斯科国际”和“伦敦国际”不同，它应当是各党的自愿联合，不应采取单一党的方法，而应建立在各党自主的基础之上。

社会党国际联合会所采取的这种超然于两个国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有自己的选择和倾向。还在会议的贺词中，阿德勒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会议在维也纳召开，意在与1914年8月原拟在同一地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相衔接。它表明，这次会议要继承第二国际的传统。他一方面强调，各国社会党之间并不敌对，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敌人——世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着重指出：“我们与之斗争的主要对手，不是日内瓦（即伦敦国际——引者注），而是莫斯科（即共产国际——引者注）。”后来他在报告中，又进一步地指出：“第二国际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使列宁可能在没有得到各国已经觉悟的无产阶级代

表们同意之下，悍然进行一次不仅对俄国工人，而且对世界工人阶级都会引起严重后果的试验。”因此，阿德勒认为，要建立一个新国际，首先不在于同处于无政府状态和防御地位的伦敦国际取得谅解，而在于要同莫斯科即共产国际进行论战，以解决莫斯科提出的有关世界革命形势和历史发展进程的问题。

暴力革命问题，历来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激烈争辩的中心。在这一方面，维也纳国际也有鲜明的倾向性。阿德勒并不否认当资产阶级反抗和抵制的情况下采取武装起义、暴力专政等防御手段的必要性。但是，希法亭坚决反对在德国实行起义，坚决主张摒弃这种灾难性的政策。会议专门通过的决议，还警告德国无产阶级，不要进行徒然的示威和游行，“决不用任何暴力强制解决战争所引起的问题；决不采取那些只会加强德国工人苦难并进一步使他们受奴役的行动。”

在格鲁吉亚问题上，^①更能反映出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的政治倾向。它对这一问题特别关注，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塞尔维亚社会党人拉普舍维奇在报告中，把苏俄政府出兵，说成是对格鲁吉亚的入侵和武装干涉；把苏俄国内事务，视为

^①格鲁吉亚，是俄国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战略地带。十月革命后，当地也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政府，领导权却操于孟什维克之手。他们对外勾结协约国军队、对内联合反革命势力，反对中央苏维埃政权。为此，红军于1920年1月进军格鲁吉亚。为支持孟什维克，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曾到该地考察。尔后不久，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又于1920年11月，再次采取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行动，红军遂于1921年2月出兵推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另建新政府。此举，引起伦敦国际和许多中派政党不满，多次提出关于使格鲁吉亚摆脱苏俄以实现自决为内容的“格鲁吉亚问题”。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纠纷”。会议通过的专门决议，甚至号召国际工人阶级行动起来，抗议苏维埃俄国，并认为“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损坏了社会主义的信誉，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队伍。^①

社会党国际联合会是以中派政党为核心的国际组织，成立时主要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英国独立工党为骨干。1年之后（1922年5月）又有西班牙社会党、俄国社会革命党、波兰独立社会党、美国社会民主党、捷克独立社会工人党以及新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相继加入，而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并形成了国际史上所特有的和第二国际、共产国际并存的局面。

三、三个国际执委会柏林会议

1. 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

从1920年秋开始，欧、美国家的革命运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这年8月，红军进逼华沙受挫；一度震撼意大利的工人占领工厂运动，也于9月以失败而告终；12月，捷克的资产阶级又镇压了工人总罢工。进入1921年，德国中部工人的“三月发动”淹没在血泊中，英国矿工进行的“四月大罢工”，坚持两个月也遭败绩，刚刚摆脱内外危机的苏维埃俄国又因发生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大量自然灾害而再度面临困境……在此期间，尽管亚、非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欧、美国家的革命潮流却日益低落。就连富于革命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也感到精疲力尽，其罢

^①以上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记录》，见《历史资料》Ⅰ，第277～278、289～297页。

工斗争呈现出连年下降的趋势。①这种事态发展，按照列宁的分析，它表明“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二个浪潮还没有兴起”。②与革命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列宁和俄共（布）关于世界革命速度和进程的观念，也有了新的转变。1918～1919年，列宁和俄国党面对世界革命潮流的兴起，曾对其前景得出过于乐观的结论，并预期德、意等战败国将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指日可待。到1921年3月召开俄共（布）“十大”时，列宁即开始修正他原来的设想。他指出：“三年来，我们已经懂得，指望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共产国际“三大”关于《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纲则进一步强调，战后第1个时期的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革命浪潮既没有推翻世界帝国主义，也没有推翻欧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已向工人阶级转入进攻。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所期望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没能实现。相反，刚刚从战后经济发展中缓过气来的欧、美资产阶级，却强化了对各国工人阶级剥削和奴役，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得手，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勾心斗角也蕴含着新的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集中起来，团结携手，共同对敌，粉碎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势力的进攻，成为摆在各国党和工人阶级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为了从内外困境中寻求出路，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建设，从而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和共产国际在充

①1919～1921年，法国罢工总次数，由2,026次→1,832次→475次；参与罢工的总人数，由115.1万→131.7万→40.2万。见《国际工人运动史知识手册》，第672页。

②《回忆列宁》，第5卷第21页。

③《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9页。

分肯定德共一月公开信的基础上，向“三大”提出了以争取工人阶级当前经济利益和维护工人日常的政治权利为内容、以团结群众大多数为目的的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策略。^①但是，这个策略，从制订提出一直到具体实施，始终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它不仅受到德、荷等国共产党内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还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消极抵制，因而使之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对加剧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对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起了很不好的作用。这种“左”的干扰，之所以形成和发展，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在理论方面，对世界革命形势作出了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同列宁一样，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般地并不否认当时世界革命处于低潮这个事实。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低潮仅是短暂的、过渡性的。按照托洛茨基和瓦尔柯在“三大”、季诺维也夫在“四大”的分析，当时，美、英、日、法在经济上确有一个繁荣时期，但这种繁荣，只是一个瞬息即逝的现象，它掩盖不了资本主义危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经历的，不是资本主义周期危机中的一次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黄昏，资本主义的瓦解。尽管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向工人阶级进攻，却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矛盾。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抗在一天天地加剧，资产阶级民主已日落西山，正一天天地烂下去。^②正是以这种分析为依据，共产国际“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客观上仍然是革命的，而且甚至最小的行动目前都可能成为伟大革命斗争的起点”的结论。^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国际

①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258~286页。

②见《共产国际“四大”记录》，第55~57页。

③同上，第1011页。

“四大”明确地指出：“目前，国际工人运动正经历着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①这个过渡时期，不仅仅是从革命高潮向革命低潮的过渡，尤为重要的还是经由短暂的革命低落，迅速使世界革命第1个浪潮过渡到第2个浪潮。摆在共产国际及其成员党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有准备，充分彻底的准备，以便能够十分自觉地、精力充沛地利用日益迫近的下一次革命浪潮。”为此，要求不倦地进行党的宣传鼓动，采取实际行动，“要到群众中去，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夺取政权的先决条件。”^②很显然，共产国际特别是季诺维也夫等人所坚持的统战策略，仍然是基于世界革命高潮行将到来并服务于无产阶级在欧、美国家马上夺取政权的革命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种脱离当时实际和群众的策略。它既不能指导人们去迎接已经失败却还未成熟的革命，也不能引导广大群众去争取必要的改良。尽管后来共产国际“四大”根据德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工人政府”这一实现国际工人阶级统战策略的具体口号，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未曾纠正，它被赋予了“左”的内容。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解释，工人政府只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可能取消斗争、取消内战。“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应用，即使出现了工人政府，我们也不能避免内战的发生。在某种情况下，内战可能通过工人政府更为激烈。”^③由于许多代表的反对，他的提法有所改变，并提出了工人政府的4种形式，其立足点仍然是国内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用他自己的说法，即使成立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也是一种工人政府。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也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起点。“如果顺利的话，我们

①同上，第1019页。

②《回忆列宁》，第5卷第21页。

③《共产国际“四大”记录》，第67、192页。

将把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一政府中请出去，直到政权落在共产党人手中。”这样一种对形势和任务的过高估计，集中地反映了共产国际及其执委会内部的革命急躁病。其根源，就在于把革命高潮时期对形势的某些评价，机械地搬到已处于低潮时期的20年代，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用少数人的愿望代替广大群众的情绪。其结果，旨在争取大多数群众的统战策略，实际上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策略。

在实践方面，对社会民主党及其国际组织推行“左”的宗派主义政策。按照季诺维也夫等人的解释，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策略，决不是同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及其领导人联合的策略，而是孤立、打击、瓦解它以争取在其影响下大多数群众的策略。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在所有重要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都已成熟，一切经济前提也变得明显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唯一缺少的就是所谓主观因素，足够的阶级组织，足够的阶级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现时是很大的。”这种拥有巨大影响和作用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国际组织，当时恰恰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是国际工人阶级“最可恶的敌人”、“国际资产阶级的帮凶”，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本来是一丘之貉，都是反革命组织”。因此，季诺维也夫主张，“我们现时的（也许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战胜社会民主党，这个国际反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国际工人阶级进军中的绊脚石……”同他们的斗争，“是从资产阶级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际工人阶级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最后的代表人物、最后的代理人孟什维克的斗争。”^①这种把拥有广大群众、巨大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国际组织的上层与下层绝对地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看法，为共产

^①《共产国际“四大”记录》，第6～7页。

国际“四大”所接受。“四大”的“共产国际的策略”明确指出：统一战线策略基本的任务，仍然是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只有从‘下层’、从工人群众的底层出发，才能使统战策略真正实现。但是，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不放弃在某种情况下同敌对的工人党的领袖们进行谈判。”^①（重点系引者所加）同敌对的工人政党领袖打交道，是手段；将其打倒并把他们掌握的组织 and 群众拉过来，才是目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要领导人之所以推行上述“左”的宗派主义政策，固然同季诺维也夫等人过低估计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在群众中的影响、过高估计欧美工人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的离心力，以致不顾情况变化机械地照搬列宁在战争期间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论述分不开，同时也和列宁仍然固守对社会民主党的原有估量有关。诚如上述，在世界革命速度和进程问题上，列宁及时修正了以前过于乐观的估量，得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并据此果断地调整政策，提出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策略。但是，在对待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对中派政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的看法，直到逝世之前，列宁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以他在共产国际“三大”所作的策略报告为例。他一方面斥责了否认《公开信》、反对统战策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特拉契尼，并指出，由于“二大”通过“廿一条”驱逐了中派，关于清洗、追究、揭露中派分子的工作做得很多了，已经有点乏味了。另一方面，他又重申“一大”、“二大”关于“打倒中派”口号的正确性，并在谈及策略问题的基本点时，强调指出：“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恰恰是被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所组织起来的那一部分工人。假如国际资产阶级不依靠这一部分工人，不依靠工人阶级内部这些反革命分子，那它早就垮台了。”^②在这里，列

^①参见《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419页。

^②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8页。

宁不仅把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还把他们的组织和控制的一部分工人，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支柱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从“二大”前后开始注意反对和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度将其视为贯彻推行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障碍，但由于对形势的乐观估量尤其是在社会民主党包括中派政党问题上未改初衷，实际上，仍然把中派政党视作主要障碍和最危险的敌人，将国际工人阶级统战策略，作为削弱、分裂直至最后消灭社会民主党的手段。结果，进一步地扩大了同社会民主党的裂痕，延缓了国际工人阶级组织之间形成战略联盟的进程。同时，也加快了中派政党脱离共产国际向伦敦国际靠拢的步伐。这是列宁和共产国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个失误，它给国际工人运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2. 实现国际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不同方针

一般地说，3个国际及其执委会并不反对联合共同行动，但实行起来，却同床异梦，奉行根本对立的方针。

伦敦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奉行的是坚决不与共产国际合作的方针。它的主要台柱英国工党，于1921年6月由布赖顿大会通过决议指出，决心巩固和加强伦敦国际，重建一个以与专政相对立的、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并责成党的执委会，与维也纳国际就召开国际会议进行谈判，以成立一个将共产党人排除在外的、规模广泛的国际。为此，该党书记韩德逊，于6月28日致函维也纳国际常务局，建议召开一次只有社会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为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国际制定统一的原则。7月11日和10月19~20日，这两个国际的执委会成员，分别在法兰克福（美因河）、伦敦，就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问题进行过讨论。同时，在与瑞士、法国、德国党的代表的会晤中，英国工党

代表，以共产国际的“廿一条”造成了各党分裂因而不能接受为理由，还曾提出以伦敦国际即第二国际为基础建立一个排除共产国际的“广泛”国际的构想，并认为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力量团结的唯一出路。对此，维也纳国际持保留态度。阿德勒在致韩德逊的复信中就曾指出，维也纳国际和伦敦国际之间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要消除分歧，以制定出统一的国际的基本原则，需要进一步谈判和交换意见。同时，阿德勒并不排除与共产国际采取共同行动的可能性。正因为维也纳国际持有不同意见，伦敦国际排斥共产国际的方针，并未立即付诸实施。

在伦敦国际积极活动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曾试图围绕着声援俄国灾民倡议采取共同行动。“三大”刚刚结束，共产国际执委会，于7月30日，发表特别呼吁书，呼吁各国共产党同一切工人组织接触，以成立国际救援组织。8月1日，执委会又在—项特别呼吁书中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联合—切国家的劳动群众为反对资本主义进攻而斗争。首先是联合工人群众为争取自身解放进行斗争。要求把群众团结在共产国际周围，使之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联合起来成为敢于对抗资产阶级的一股力量。8月12日，根据执委会倡议，声援俄国灾民的国际工人救援会在柏林成立，并于8月15日，向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建议，就声援俄国灾民共同行动。9月，该会首次例会又明确地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问题。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了上述实际步骤，但是，季诺维也夫等人仍然奉行“左”的宗派主义方针，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制造人为障碍。季诺维也夫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不需要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及其领袖搞任何统一战线，……我们诉诸群众，而不是诉诸谢德曼。”^①拉狄克也认为，统一战线策略，不

^①转引自《列宁和共产国际》，第382页。

会给共产党而只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我们这样做，不是想同谢德曼之流合二而一，而是坚信，我们在相互拥抱时会把他们压死。”^①这样一种以挤垮压死对方为目的统战策略，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反感。^②

在实现共同行动问题上，维也纳国际坚持奉行既不同于伦敦国际而又有别于共产国际的方针，即联合一切力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工人阶级组织的方针。当上述两个国际按各自想法倡议共同行动失败之后，维也纳国际于1921年11月，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以就共同行动问题谈判。条件是：每个组织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谈判仅具有协商性质，如通过共同决议，各党仍保留自行决定是否执行该决议的权利；将如何采取共同行动以促进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问题，列入国际会议的主要议程。^③为此，它与包括共产国际成员党在内的各国党和工人团体建立了通讯联系。由于控制伦敦国际的英国工党拒绝参加这种会议，维也纳国际执委会又于1922年1月15日颁发的《告世界工人书》指出，只有联合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抵抗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它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因战争中断了的工人阶级的国际联系，使工人阶级各支队伍采取共同行动。为此，它倡议召开一次有各个派别、各种团体参加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凡是主张阶级斗争，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并认为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有必要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动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可以参加会议。”^④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拟邀请其

① 《共产国际“四大”记录》，第103页。

② 后来，王德威尔得曾对拉狄克的上述说法提出抗议。见《三个国际执委会会议记录》，第18页。

③ 见《第二国际的复活》，第194页。

④ 《三个国际执委会柏林会议记录》，第7页。

他两个国际的代表，举行一次筹备性质的会议。1月19日，它发出邀请书；1月21日，共产国际接受邀请。伦敦国际仍持保留态度，经过维也纳国际与它进行一系列会谈之后，才最终同意举行3个国际执委会的柏林会议，以就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交换意见。

列宁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922年2月1日，他得悉维也纳国际关于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消息后，即在给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电话中建议，遴选合适人选，出席3个国际执委会会议，力主应事先认真考虑好在会上采取的战略、策略问题，并提出了应予讨论的问题清单。他特别强调，“只提出直接涉及工人群众在当事三方每一方报刊正式声明中均无争议的范围内采取实际共同行动的问题。”针对着伦敦国际对召开3方联席会议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列宁认为，如果对方提出，可以接受这些条件。但是，作为交换，也应把下述问题同时列入会议议程：右翼社会民主党和中派分子对《巴塞尔宣言》的叛卖立场；他们通过资产阶级政府参与谋杀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及德国其他共产党人；他们以同样方式参与杀害殖民地革命者等。同时，列宁还指出，为了达到争取国际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目的，共产国际代表应“极其克制”，“如果不出现绝对不能容忍的极端卑劣行径”，未征询莫斯科的意见，一般不要使会议破裂。^①1922年2月21日～3月4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1次扩大全会，集中地讨论3个国际执委会会议问题。针对着“12月提纲”（《统一战线策略（提纲）》）中一些“左”的提法，列宁强调不要对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领导人使用刺耳的字眼，建议有关文件删去将他们称作“世界资产阶级走狗”的提法。经过讨论，全会最后以多数通过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还通过了给出席柏林

^①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202～203、339～340页。

会议代表团的指示草案。

3. 三个国际执委会柏林会议

1922年4月2～5日，3个国际执委会会议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会前，3方就程序性问题进行了磋商，确定每个执委会委派1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考虑到拟议中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将在意大利召开，因此，不属于3个国际的意大利社会党，派1名参加讨论的代表出席。会议由每个执委会指派1人轮流担任主席，并允许报界采访，3个国际以及意大利社会党的其他执委旁听。^①这是第二国际公开分裂以来各派社会主义者代表的首次聚会。它的人数不多，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就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交换意见。

作为这次会议的发起者，维也纳国际的领导人弗·阿德勒主持第1次会议，并致开幕词。阿德勒把这次会议，称作一项试验，目的是在一定范围内谋求达成协议。他指出，无产阶级内部确实存在分歧，两派对历史前景有着不同的看法，即把重点究竟是放在今天还是明天的斗争之上这样一个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分歧。尽管在具体行动上求得团结不可能抹煞彼此之间的分歧，但是，考虑到世界无产阶级当前的悲惨境况，不管有多少分歧，都绝对有必要把它的力量团结起来，以实现某些具体目的，采取某些具体行动。阿德勒强调指出：“当前的需要使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为今天而斗争。”（7）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蔡特金，宣读了《第三国际宣言》。“宣言”指出，尽管目前国际工人阶级还有着不能团结一致的各种深刻的意见分歧，但是，世界总的形势却迫切地要求他们必须联合起来防御资本的进攻。为实现这

^①见《三个国际执委会会议记录》，第1～3页，以下凡出自此书的引文，只注页码。

种联合,应在最短的期间内,举行包括一切工会组织、所有工人政党参加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以向行将召开的热那亚会议施加压力,实际支援苏维埃俄国战胜帝国主义压力,并使热那亚会议考虑和研究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宣言”主张,拟议中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应只讨论与工人群众共同的直接行动有关的问题,即不是促使工人分裂而是促使他们联合的问题。共产国际主张,未来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议程,应包括防御资本进攻、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帮助苏维埃俄国恢复和发展、凡尔赛和约与恢复被破坏的地区等。(8~13)第二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王德威尔得在发言中指出,他并不反对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但是,他认为,目前缺乏召开这种会议所必需的起码的信任。他指责共产国际《十二月提纲》将他和龙格等人称为“资产阶级的走狗”是对一个社会党人的莫大侮辱。他认为,共产国际的统战策略的目的,是“在拥抱我们以后把我们室杀或毒死”。他公开扬言,如果拟议召开的大会,用来反对伦敦国际,“我们应该拒绝参加”。王德威尔得提出,为了就举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作出决定,共产国际必须回答以下3方面的问题:第一,“你们参加会议是为了一道设法加强我们的共同行动还是为了削弱和分裂我们”;第二,“目前,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权利的民族,乌克兰人、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是否能够自由地选出他们参加共同会议的代表”;第三,“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应该在能够使社会党国际感到满意特别是能够使基本的辩护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进行。”(20~21)①维也纳国际执委会代表福尔和王德威尔得的观点相同。他指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对另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使用思想武

①拉狄克根据列宁关于针锋相对的指示,对王德威尔得的发言作了反驳(24~31)。

器而不是采取恐怖手段，才能使真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得以建立。苏维埃俄国恰恰违背了这一点。他指责苏俄使像孟什维克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遭到“恐怖”迫害；使“社会主义的格鲁吉亚”丧失了自决权；“在共产党的专政下，劳动人民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工会自由”，等等。福尔认为，只有改变上述状况，才能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创造必要的前提。同时，他还强调，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一切争端是不适宜的，应着重讨论为恢复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需要进行的工作。（22~24）

3方分别陈述观点之后，共产国际代表于4月3日，致函会议主席团，建议在争论内容和实质已经弄清的情况下，集中解决是否举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基本问题。由于其他两个国际的代表反对，大会继续发言。4月4日，第二国际执委会代表麦克唐纳，在发言中不仅继续批评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而且在《第二国际宣言》中提出，在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之前，共产国际必须接受下述3个条件：第一、放弃在社会民主党及其工会中建立共产党支部和制造分裂的策略；第二、从3个国际执委会代表中指派一个委员会，对格鲁吉亚及其他处境类似的国家的情况进行调查，以求在社会主义政党之间达成协议；第三、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要在社会主义国际的监督下进行，允许被告有辩护权，并“释放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的人”。同时，麦克唐纳扬言：“如果不打算这样做，就让我们分道扬镳吧！”（32~40）。

面对着伦敦国际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舌战唇枪，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塞拉蒂和维也纳国际执委会代表鲍威尔，采取了折衷立场。他们既批评共产国际，又指责伦敦国际只苛求于人而不苛求于己。他们认为，上述3项条件既适用于共产国际又适用于伦敦国际。会议的目的，不在于彼此审判，而在于共同采取国际行动。为此，要求双方都应谅解对方，而不应挑起敌对情绪，加深伤口。

同时希望会议不要没有达成协议就草率收场。(41~56)在会议气氛有所缓和的情况下,拉狄克在两个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同意由3个国际执委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和其他类似的国家的情况,以便在各个社会主义政党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3个国际的代表在审判社会革命党人时出庭并有权为其辩护。(66、67)

在共产国际代表作出重大让步之后,3个国际执委会代表组成的9人委员会,讨论了阿德勒代表维也纳国际提出的建议。由于王德威尔得以第二国际名义发表声明,坚持要共产国际就3项条件作出书面答复,共产国际代表对此提出抗议,并宣布:鉴于第二国际的立场,谈判已经破裂,共产国际将通过一项决议向无产阶级说明破裂的原因。经过协商,第二国际代表终于接受阿德勒提出的建议,即负责筹备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工作的9人委员会应继续活动,并被赋予消除现有分歧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3方才最后通过由维也纳国际提出的协议(《联合宣言》)草案。(71~72)

《联合宣言》根据第二国际代表团的声明,认为不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实际上否决了共产国际所竭力坚持的主张。《联合宣言》指出:“不管建立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组织是如何需要,但在目前只谈得到由派有代表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个派别举行联席会议,以便为执行一定的具体任务而共同行动。”为此,会议建议3个国际的执委会,同意建立一个由9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①委托它筹备3个国际执委会联席会议,并研究在各国及国际范围内达成协议与恢复工会统一

①参加委员会人员包括:王德威尔得、维尔斯、麦克唐纳(伦敦国际);阿德勒、克里斯平、白拉克(维也纳国际);拉狄克、蔡特金、佛罗萨尔(共产国际)。

战线的问题。

《联合宣言》按照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的要求和共产国际作出的让步，就关于审讯社会革命党人时由国际社会党人出庭辩护和调查格鲁吉亚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宣言》还以苏俄报纸的口吻重申：这次审判将不对任何被告判处死刑。

鉴于最近期间不会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为了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为了表达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意志，《联合宣言》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即4月20日，^①采取直接行动，联合举行群众性示威。示威的口号是：“实行8小时工作日；反对资本主义列强赔款政策并使失业现象严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联合行动；拥护俄国革命，支持饥饿的俄国，争取各国恢复与苏俄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各国和国际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73~74）

《联合宣言》通过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声明指出，尽管第二国际断然拒绝把废除凡尔赛和约作为工人运动示威的口号，否决了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提议，共产国际仍然同意维也纳国际提出的《宣言》草案。该声明指出，为了一心推动而不是阻碍哪怕是最微小的走向统一战线的进展，共产国际宣布放弃关于调查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等人被杀害事件的要求，不再坚持揭露社会民主党在迫害波、匈、南、拉脱维亚共产党人中的作用，也不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改变对无产阶级战士和爱尔兰及其他殖民地的立场，只保留今后提出这些问题的权利。（76~77）

列宁在评述柏林会议时指出，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的代表，在会上“扮演了要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政治上让步的角

^①凡因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原因而不能在这一天则改在5月1日举行。

色，但坚决不让甚至也不想让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任何政治让步。”共产国际的代表恰恰在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同意了其他两个国际代表的要求，从而单方面地向国际资产阶级作了政治让步。这样做，“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尽管如此，列宁认为，不应该撕毁《联合宣言》所达成的协议。因为它毕竟为共产国际打开了一个通向由国际资产阶级和其他两个国际控制的门户紧闭的会场的一大缺口。“我们在没有学会应该怎样讲价钱之前付得多了一点，总比放弃对那些至今仍被改良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最忠实的朋友‘独占’的工人讲话的机会要好一些。”^①

4. 九人委员会首次会议

柏林会议之后，列宁和共产国际并未放松争取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努力。4月9日，列宁在评估柏林协议的得失之后，仍然坚持主张，“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②4月11日，他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信中，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特别注意阐明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首领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政策的批评应有所缓和，使其具有讲道理、耐心和通情达理的性质，而不应使用激烈的言词，以免将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吓跑。他还着重指出，要向这些工人阐明，在柏林会议上他们的代表所接受的口号，包括反对资本进攻、8小时工作制、保卫苏维埃俄国等，同这两个国际整个改良主义策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③当热那亚会议决定延期到5月的消息传出之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向仍在柏林的代表团电告：根

^{①②}《列宁全集》，第33卷第293～297页。

^③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355～357页。

据事态的发展，热那亚会议对立的双方苏俄与协约国，可能在裁军和对待外国资本债务问题上随时会发生分裂。因此建议向9人委员会提出热那亚会议的问题。如果对方拖延24小时不作答复，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应出来发表宣言，号召所有工人进行抗议。第2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柏林协议之后，也就这一问题指示它在9人委员会中的代表，立即采取实际步骤，使3个国际联合行动，以保证热那亚会议顺利进行。同时，主席团还就召开9人委员会会议作出了具体指示，主张把9人委员会扩大为有红色工会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代表参加的会议，主要讨论关于反对战争威胁和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据此，共产国际代表向维也纳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提出：在48小时内召开9人委员会以讨论上述议题，当即对方所拒绝。5月中旬，当热那亚会议行将破裂时，列宁又在5月16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强烈要求尽快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如果第二国际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进行破坏，共产国际将立即召回它在9人委员会的代表，并继续它的宣传鼓动工作，争取建立由于形势而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为了能够达到早日举行国际大会的目的，列宁甚至主张，可由参加9人委员会的俄国代表（拉狄克）发表一项声明，准备从《联合宣言》中取消“支持苏俄”的口号，并把斗争集中在争取8小时工作日、反对失业等问题上。如果其他两个国际真心实意地愿派出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那么，俄共（布）将让代表返回9人委员会。第2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表示同意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的建议，同时责成在9人委员会中的代表发表下述声明：“共产国际作为一个整体，要求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对有关俄国共产党人的声明发表正式声明。如果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们确实坚持以某种形式把支持苏俄的口号予以取消，那末，共产国际代表团准备考虑第二国际和第二

半国际代表的这一声明，并予以充分的讨论。”^①

对此，其他两个国际反应冷漠。还在柏林会议之前，伦敦国际就曾多次拒绝共产国际及其工会组织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议。经过柏林会议的较量，尤其是柏林会议后苏俄政府加快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进程，强化了关于将对社会革命党人判处死刑的宣传。因此，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及其成员党更为不满。5月18日，即共产国际代表公布上述声明的第2天，有英、法、比3国社会党代表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决定，由比利时党向伦敦国际、法国党向维也纳国际的执委会提议，举行一次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无产阶级代表会议。5月19~20日，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举行联席会议，专门通过关于保护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公开号召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为反对苏俄和共产国际、为反对审判社会革命党人而斗争。会议还就国际工人阶级统一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召开拥护这3个国际的工人代表大会，并成立负责筹备事宜的专门委员会。翌日，法、英、比3国社会党发表声明，正式宣布将举行没有共产国际参加的国际代表大会。

柏林会议后的事态表明，由于立场相去甚远，看法截然相反，隔阂日益加深，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协议，已成一纸空文，酝酿已久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已成泡影。

1922年5月23日，在柏林举行的“9人委员会”首次会议，它的开始即意味着它的终结。会议是在一片相互指责声中开幕的。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代表在声明中，以苏俄加紧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害和破坏对格鲁吉亚情况的调查为由，指责共产国际撕毁柏林协议，破坏和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国际代表，则指控其他两个国际，敌视苏维埃俄国，蓄意阻挠在热那亚会议期间举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同时，要求9人委员会，立即作出关

^①转引自《共产国际史纲》，第157~158页。

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要求，当即为伦敦国际代表所拒绝。共产国际代表拉狄克立即宣布，由于上述要求被否决，同两个国际继续合作已无实际意义，决定辞去9人委员会委员职务并退出该委员会。就这样，9人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变成了最后一次会议。由维也纳国际倡议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初次尝试遂告流产。

会议流产之后，维也纳国际在其决议、伦敦国际在其声明中，强烈指责苏俄和共产国际违背柏林协议，通过报刊和有组织活动，对将出庭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的社会党人进行围攻，严重地威胁其人身安全，使这些辩护人未等审判结束就被迫离俄回国。共产国际在其声明中，集中地揭露其他两个国际一系列分裂活动，并针对关于非难辩护人的指责强调指出，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领导人，为了替屠杀俄国工人的刽子手寻找辩护人的角色，精心挑选了一些“丧心病狂的煽动家。”在这种相互指责并日益加深的敌对情绪中，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共产国际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越来越朝着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合流以与共产国际对抗的方向发展。

四、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建立

1. 维也纳国际向伦敦国际靠拢

从1922年6月起，围绕着苏俄开庭审判社会革命党人一事，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并由此而加快了后者向前者靠拢的进程。

6月8日，苏俄组织最高法庭，开始对谋害列宁、杀害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等的罪犯，47名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审讯。

①在此之前，共产国际代表在柏林会议上曾作出许诺，将不对这些罪犯处以死刑。此举，曾受到列宁的批判和舆论的反对。为此，苏俄报刊和群众集会多次提出，对从事反革命暗杀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应判处死刑。消息传出后，维也纳国际执委会于6月15日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决议》。“决议”除充分肯定其代表在柏林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外，严厉地谴责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破坏3个国际间的谈判，尤其反对在审判社会革命党人中苏俄所采取的立场。这次会议，还专门批准一项致苏俄政府的最后通牒，声称如果判处社会革命党人以死刑，那么将断绝一切同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党派达成协议的可能性。6月13日～19日，伦敦国际召开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公开提出反对“左派极端专政”的口号，断然否认有同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和召开国际会议的可能性。会议认为，伦敦国际与维也纳国际之间并无原则分歧，只有策略上的差异，因此应同它一起筹备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会议专门通过一项决议，邀请维也纳国际参加于10月1日在汉堡召开的各社会党代表会议。如果后者拒绝，伦敦国际将单独召开会议。

8月，苏俄最高法院审判结束，最后判处12名社会革命党人死刑，其他35人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这一事态发展，使两个国际特别是维也纳国际领导人十分恼怒，并成为维也纳国际最终向伦敦国际靠拢的导火线。在8～9月间一系列会见、谈判、

①1918年，为配合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社会革命党人搞了一系列暗杀恐怖活动。继杀害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和《红色日报》编辑沃洛达夫斯基之后，8月30日，又谋刺列宁致重伤。为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出号召书，表示要对右翼社会革命党报之以大量残酷无情的恐怖活动。见《文献选编》，第4卷第126页。

接触和专门委员会会议的基础上，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执委会于8月7日和9月2日分别通过决议，决定奉行“不与共产国际进行任何谈判”的方针。维也纳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判决，已不可能同共产党进行合作，而且当前同莫斯科和与之接近的各党进行谈判也已绝望，因此联合一事也不应包括莫斯科在内。”“决议”认为，继续等待共产党人回心转意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它提出，应立即采取实际步骤，成立两个国际联合的行动委员会，直至召集全世界工人代表大会。^①

由于维也纳国际决定采取与伦敦国际联合筹备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它的成员党与伦敦国际成员党的合并进程。1922年9月17~2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奥格斯堡大会未经讨论，即以大多数票通过关于国际和无产阶级统一的决议，决定以这次大会制订的《行动纲领》为基础，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按照大会通过的《组织协定》规定，两党的合并，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章程的基础上，通过独立社会民主党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来进行。大会专门选出了为召开合并大会作准备的纲领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几乎同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格腊召开代表大会，在该党领导人克里斯平和希法亭的鼓动、中间派稍作保留和累德堡等7人反对的情况下，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奥格斯堡大会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协定》，与其合并。就这样，一度分裂的两个政党，终于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合而为一。从此，一度左倾的中派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终于融为一体。与两党合并同步，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联合会（德国青年工人联合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联合会，也合并为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德国两个党的合并，是维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的复活》，第232~233页。

也纳国际向伦敦国际靠拢的一个重要标志和重大步骤。

1922年12月10~15日，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倡议的“反对战争危险”的国际代表大会在海牙举行。出席者多达600人，其中包括以洛佐夫斯基为首的苏俄工会代表团。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反对战争危险，主要讨论法、德两国因赔偿问题矛盾尖锐可能引起的战争危险问题。但是，大会的多数代表除了宣扬战前第二国际领导人鼓吹过的和平主义和护国主义外，并未采取具体的反战措施。

最后，大会通过决议，竭力宣传国内依靠议会、国际依靠国联对军备进行监督的民主和平纲领。这个决议，不仅远远低于战前第二国际一系列反战决议的水平，甚至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也深表不满和反对。就在海牙大会期间，伦敦国际、维也纳国际执委会联席会议，决定于1923年5月21日，在汉堡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两个国际合并成立社会党国际的帷幕。

2. 维也纳国际的终结

维也纳国际，从原则上不反对而且一贯主张建立包括共产国际在内的国际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经过3个国际执委会柏林会议，特别是苏俄于1920年8月对社会革命党人宣判之后，它已完全同伦敦国际站在一条战线上，赞成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应是排除共产国际并与之对立的两个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统一联合行动。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从1922年10月起，这两个国际的领导人即开始采取一系列实际步骤，为建立统一的工人国际而积极进行准备。到1923年1月，他们通过多次会晤、协商、谈判，确定了合并后统一国际的行动纲领的原则，成立了负责合并大会事宜的筹备委员会，并于1923年1月5~6日在科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会议最后发表了由韩德

逊、阿德勒、王德威尔得、克里斯平等10人签署的《通告》。《通告》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现状后指出，面对着资产阶级的全面进攻，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结成一道具有战斗力的巩固防线，以对付资产阶级的反动阴谋。”《通告》认为，同共产国际达成协议，以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在统一的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在一个长时间内是不存在的。”因为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在最紧要的时刻，破坏了柏林会议，使联合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成为不可能。“从那时起，由于俄国社会主义者不断受到骇人听闻的野蛮迫害，因而想与莫斯科执委会达成协议的困难便更为加大了。”在这种情况下，“除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外，已别无他策。”据此，会议确定了汉堡大会的4项议程，提出了出席大会的代表的5个条件。^①4月4日，筹备委员会在奥地利的布雷根茨举行为期3天的会议，全面讨论了合并大会的筹备工作。与之相配合，各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针对着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通告，掀起一场攻击共产国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浪潮。5月18日，在汉堡召开的筹备委员会会议，专门就共产国际的通告通过决议。同时，在柏林召开合并大会的预备会议，确定大会议程，讨论统一国际章程草案和国际执行局的组成，并以维护凡尔赛和约为中心，规定了共同的行动路线。至此，两个国际合并的实际进程已近尾声，合并大会的准备工作宣告完成。在这个进程中，两个国际一致协议的事实表明，原来把两个国际分开的一些局部的分歧已经完全消失。

正是在此基础上，维也纳国际主动地采取自动解体的最后步骤。1923年5月20日，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在汉堡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阿德勒在向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维也纳国际从来

^① 见《历史资料 I》，第327~330页。

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国际，而是将自己视为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的基础。经过努力，奠定基础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据此，会议经过简短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解散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并与伦敦国际合并的决议。这样，存在两年多的维也纳国际，最后以向伦敦国际靠拢的实际行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3. 汉堡合并大会

1923年5月21~26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汉堡举行。来自欧、美30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个政党、团体的620名代表（包括列席代表）出席大会。共产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所属组织，被排除在大会之外。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两个国际的合并，建立统一的社会党国际。同时还接触了当时国际形势和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首次表明了社会党国际的立场。

关于凡尔赛和约的评价。这是当时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它集中地反映了各个国际组织对战后局势的态度。负责这项议题报告的，共有3位社会党人。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社会党人勃鲁姆。他一方面认为和约是靠武力签署的，本身矛盾百出。它所确定的战后国界，是强加于人民的羁绊，符合各国政府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和赞扬和约建立了社会党早已向往的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局，承认了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和合乎情理的赔款原则。勃鲁姆指出，社会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凡尔赛和约的内在矛盾，制定出一个计划来改善德国状况，使各国经济共同繁荣，以最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勃鲁姆在原则上肯定的前提下，笼统地批评了凡尔赛和约。即令如此，伦敦国际领导人也很不满意。曾作为比利时代表参与和约签署的王德威尔得指出，勃鲁姆过于激烈地谴责签署条约的说法站不住脚。“我签署这个条约，是得到整个比利时工人

阶级和比利时工人党的完全同意的”，“如果需要我再一次决定这个问题，我将同第1次一样行事。”与会的其他一些社会党人，也在发言中表示了同本国政府协调行动的立场。勃鲁姆和王德威尔得就评价凡尔赛和约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维也纳国际和伦敦国际的差别。这种差别，经过大会讨论，到最后一致通过《关于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的决议，又逐步趋于一致。

“决议”按照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从原则上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指责凡尔赛和约延长和加深了战争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对世界经济的破坏，强调了国际工人阶级面临的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并坚决反对对鲁尔地区的军事占领。这些表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初欧、美无产阶级对新的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强烈不满和要求为之进行坚决斗争的强烈愿望，也是伦敦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妥协的产物。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方面，“决议”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它也肯定了俄国无产阶级推翻沙皇制度和中欧国家无产阶级争得民主共和这个客观事实，却未涉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欧、美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前景。它把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仅仅局限于监督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争取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权，实现普遍裁军，使国联成为捍卫和平与各国民主权利的机构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民主和平纲领之上。同时，“决议”还具体地肯定了德国必须赔款这一道义原则以及实施赔款的要求和条件。^①“决议”虽然对凡尔赛和约提出了批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反对战争危险和战争赔偿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两个国际仍然采取了同本国政府特别是同协约国一致行动的方针。在合并大会上，以协约国社会党为主体的伦敦国际，实际上起着主宰的作用。

^① 《历史资料 I》，第335～341页。

关于同国际反动派的斗争。20世纪初，国际工人阶级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和新的战争危险。这是任何国际组织都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汉堡大会从议程确定到报告、决议，并没有正视这一客观现实，而是曲解了这个危险。日益猖獗的法西斯主义危险，并未列入大会议程，而只是在“关于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议题中涉及到，并以鲜明的反对苏俄的斗争，冲淡乃至取代了与法西斯危险的斗争。这在鲍威尔的议题报告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他在评述国际局势时，虽然也提到“德国的反革命力量”和意、匈“墨索里尼和霍尔蒂独裁专制”这两个危险的策源地，但是，他认为，主要的策源地还不在这里，而在苏维埃俄国。“那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建立了已经激起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反对的制度”。苏俄政府，对其他反动势力的猖獗和称霸应负部分罪责。因为它的分裂政策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至于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主张，应当找出一种各社会党之间最紧密合作的形式进行斗争。紧接着，他又强调：“我在这里，不是说采取那些不能取得胜利的措施，不是指起义，甚至也不是指总罢工。我们必须把议会活动和议会外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鲍威尔的主张，集中地体现了两个国际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法国社会党人维尔斯，向大会作关于联合斗争以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贺词中，就曾指出：“号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失败的战略。阶级斗争的结局，只可能是更大程度的贫困。”德国代表白拉克进而主张，各国工人阶级应仿效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策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代表乌捷格斯特，把这种策略表述为：“教育群众采取政治行动，因为它们能够保证我们形成必要的多数，通过这种多数我们将取得政权，实现经济民主，走向社会主义。”希法亭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但要彻底消除对武力的信仰。”^①鲍威尔在报告中确实讲过：“保卫俄国，反对

^① 见《历史资料Ⅱ》，第324页。

可能发生的武装干涉，仍是社会党人一项重大任务”，可是却被反对苏俄这个报告的基调冲淡了。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反对国际反动派的国际斗争》决议，以较为隐晦的形式，表述了上述报告和发言的基本倾向。

“决议”揭露了德国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的反动势力，指出了反动政党利用少数民族不满，以遂其私愿的法西斯主义危险，谴责了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意大利法西斯专政以及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它号召各国工人阶级，集中全力来，跟国际反动派进行决战，以反抗资本主义的暴力进攻，在全世界恢复民主制度，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决议”在号召与之斗争的国际反动派中，也包括社会党人曾宣称应予以保卫的苏俄。“大会谴责俄国政府继续使用恐怖手段和不断剥夺民主自由，认为这种做法不但对俄国工人是危险的，而且也危及国际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利益。”“决议”在谴责俄国政府的同时，也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因为这种干涉“并不会使现阶段革命的错误消灭，而只会使革命本身消灭。这种干涉远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而只能是促成西方帝国主义掠夺俄国人民的工具——血腥的反革命统治在俄国的复辟。”^①

关于俄国问题。它几乎贯串于所有报告和决议之中。还在讨论第1项议程“帝国主义和约与工人阶级的任务”时，就已提出恢复格鲁吉亚主权、抗议苏俄在亚美尼亚建立强暴制度和苏俄蹂躏民族自决权的问题。^②关于俄国问题的报告人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认为，俄国革命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苏维埃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共产党专政”，目前在俄国已恢复资本主义。苏维埃红军的行动，危及许多国家尤其是格鲁吉亚。他公开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号召国际工人阶级干预俄国内部事务。“国

①②见《历史资料Ⅰ》，第340、341~342页。

际的义务，是支持在俄国进行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否则苏维埃官僚制度、肃反委员会和红军就会严重地威胁到西欧民主。”^①这些观点得到维尔斯、希法亭、鲍威尔等人的支持。但是，也受到一些代表的激烈的反对。布雷斯福德认为，在批评俄国时，“不要忘记，革命的越轨行为，是资本主义政府推行的政策造成的结果”，“对死在俄国监狱里的人、遭到枪决和流放的人负有主要责任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②最后大会通过激烈的争论，以196对2票（39票弃权），通过阿布拉莫维奇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

“决议”一方面以“千百万社会主义工人”的名义，反对帝国主义对俄国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又以大会名义，“对在俄国和格鲁吉亚受布尔什维克恐怖统治摧残的一切社会党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宣布，给予按本决议的精神行事的俄国社会党人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大力支持，是一切社会党人和工人政党应尽的义务。”“决议”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两项要求：“1、在俄国以及在俄国军队占领下的格鲁吉亚，立即停止对社会党人以及持不同信仰的工人和农民的迫害，立即释放一切因宣传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监禁流放的人；2、彻底放弃一党恐怖专政的制度，实行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自治的制度。”^③“决议”的这些主张和要求，不仅仅是对苏维埃国家内政的干涉，而且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根本否定。正是在这些根本点上，集

① 《历史资料 I》，第324页。

② 见《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汉堡大会记录》。转引自《国际史》，第2卷第322页。

③ 《历史资料 I》第344页。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社会主义国际汉堡大会记录》。转引自《第二国际的复活》，第238~277页；另参见《历史资料 I》，第323~345页。

中地反映了两个国际及其所创建的国际组织鲜明的阶级倾向和政治意图。

关于组织章程。大会通过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章程》包括6个部分、1个附录，共24条。它的第1部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实际是一个总纲，集中揭示了这个新的国际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结构。第1条，规定了国际的宗旨，即“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承认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的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的手段”；第2条，将社会党国际的任务，归结为“把处于分散状态的政党联合起来，并争取根据本章程的原则来实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完全统一。”同时，还规定：“已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不得参加任何其他国际政治组织。”这一条，是针对着共产国际而言的，它企图用民主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坚持布尔什维主义的共产国际，以使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取代共产国际，实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完全统一。”第3、4条，涉及到国际与其成员党的关系。它一方面强调，国际是各国独立自主政党的联合，另一方面又指出，各成员党应受国际决议的约束，在处理国际纷争时，应以国际为最高裁决人。鉴于第二国际在战时陷于瓦解的惨痛教训，《章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不仅是和平时期的工具，并且毫无疑问也是战时的必要工具。”至于如何才能在战争环境中，发挥这个国际组织的作用，大会的讨论与《章程》的条文，都没有加以具体说明。第5条，规定了国际的组织机构，包括至少每3年召开1次的国际代表大会、常设领导机构执委会、日常机构执行局、事务委员会和书记处。^①同第二国际章程不同的是，社会主

^①经汉堡大会选举，进入书记处的有希尔奎特等15人，由韩德逊任主席，托·肖和阿德勒任书记，阿布拉莫维奇等9人为执行局成员。书记处驻伦敦，1925年，迁苏黎世；1935年，迁布鲁塞尔。

义工人国际的章程，从原则上肯定了社会党人的入阁，从组织上明确了国际与工会、合作社的组织关系。第15条规定：“执委会委员如参加内阁，即自动取消执委资格。在他退出政府后，可以再度当选为执委。”《章程》附录第24条，肯定了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和伦敦合作社国际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应与它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并准备和这些国际组织一道召开会议与工人联合代表大会，以解决共同的问题。”^①

大会通过《章程》、选出领导机构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遂宣告成立。与之相适应，原来属于两个国际的青年组织，也于同期合并为社会主义青年国际。至此，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创建工作宣告完成。^②

以两个国际合并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国际工人运动已正式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布尔什维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国际；一个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前者，是作为对第二国际彻底否定的对立面而问世的；后者，虽然以第二国际的继承者自任，但是，从其纲领主张、组织规模和活动内容看，它已不是原来那种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共存一体，包括欧、亚、美、非各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统

^①《历史资料 I》，第330~334页。大会还讨论了关于“8小时工作日和国际社会改革”的议题，通过了关于8小时工作日、关于支持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青年和妇女运动等决议。

^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以后于1925年、1928年、1931年、1933年，分别在马赛、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巴黎，召开过3次代表大会、10次代表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于1940年4月3日召开国际局会议通过庆祝“五一”宣言后即不复存在。

的、广泛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实际上只是一个以社会党为主体的、主张通过议会民主道路来实现其社会主义并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它的前身，是第二国际部分右翼社会党和中派政党的联合；它的后继，是1951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由此出发，原来意义的第二国际已不复存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度存在过的一种运动、一个中心的历史，已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两个中心的共处、对峙和竞争。

第六章 第二国际和中国

当西方无产阶级再度奋起、重新联合组建第二国际的时候，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前夜。一批东方的志士仁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冲破闭关自守的藩篱，走向世界，面向欧、美，和方兴未艾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频繁的接触。欧、美无产阶级及其国际组织，随着力量的增长和影响的扩大，也逐步将视线由西方向东方拓展。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推行瓜分世界的侵略扩张政策所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迫使国际工人阶级思考和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正是这种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把第二国际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交往，始于上世纪末。孙中山、梁启超等曾与欧、美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有过直接联系，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这种联系，毕竟是局部的、少量的。到本世纪初，情况有了根本变化。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发生，在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中引起强烈反响；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更进一步促进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运动的兴起，第二国际和中国的交往，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问题首次列入第二国际的议事日程，引起高度重视；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和国际局及其主要领导人有了直接交往。随着交往的增多，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以其特有的形态传入中国，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论争。以辛亥革命胜利为标志，第二国际和中

国的关系达到顶峰。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对这场民主革命的广泛声援和深入论证上，还反映在中国社会党的建立及其与第二国际着手建立组织联系。与此同时，国际局为促成中国社会党内的联合，促进中国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采取过不少措施。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第二国际发生分裂，中国人民特别是日益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优秀代表，继续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第二国际的事件和人物，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革命的结论。

第二国际及其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志士仁人，特别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通过与它的交往，不仅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外部世界，而且从第二国际的活动和文献中汲取了营养，用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充实、丰富了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从中得到了对中国革命难能可贵的国际声援。毋庸置疑，经由同第二国际的交往，一度在欧、美工人运动中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二国际已经排除的无政府主义，也曾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并曾产生不少消极的影响。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对于推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确实起过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无政府主义者在推行恐怖、暗杀、密谋暴动策略的同时，确曾宣传过不少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主张。象李大钊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正是从接受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甚至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也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

了解和研究中国和第二国际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地认识第二国际的广泛影响，正确地把握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内在联系，而且也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走向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只有这样，才

能把第二国际的历史，如实地看作是东西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实现本阶级、本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历史，而不仅仅把它视为西方无产者为自身当前利益而斗争的历史。

一、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交往的先行者

1. 孙中山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人接触外部世界，认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非自孙中山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用大炮轰开天朝帝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和东方日本的接触日渐频繁，并经由一些外交官和留学生的实地考察，率先反映过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公社以及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实践活动。^①但是，这些接触，都属于间接的。作为东方革命者直接同欧、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交往，还是由孙中山于上世纪末开始的。

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党人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交往的先行者，有其独特的优越条件。他不仅出生于倡风气之先的广东省，而且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即依仗在檀香山的兄长生活，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后来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期间，又阅读过大量的西方书籍，眼界为之开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1894年，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这种优越条件，以美、日、香港为基地，以海外华侨为依托，开始了反对清王朝的活动。当孙中山奔忙于欧、美、日本之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正在这些地区兴起。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使

^① 详见《走向世界》。《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也曾于1871年，援引西方报刊，对巴黎公社作过报导。见该报第3册第166页；第4册第9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25页。

孙中山一投入民主革命，即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而且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1895年，广州密谋夭折后，为逃避清王朝的追捕，孙中山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翌年10月，他经由北美来到伦敦，不久即被清王朝驻英使馆绑架拘留（“伦敦蒙难”）。为了沟通与外界的联系，以尽快脱险，孙中山曾对使馆派来监护他的英籍仆役柯尔表示，自己同“伦敦的社会党领袖”一样，“声称他在中国也领导了一个同样的党”。^①这个史实表明，孙中山在1896年底，即到伦敦不久，已把自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1894年成立），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同在英国颇有影响的社会党（实为社会主义团体），联系在一起。自此，孙中山和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在国外多年的活动，孙中山同英、美、日、俄、法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有过频繁的交往，从中接受过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在理论上，孙中山深受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拥有很大市场的亨利·乔治主义的熏陶，^②由此而形成

^①转引自《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01页。在与柯尔对质和后来发表的文献中，孙坚决地否认，说他“没有谈及社会党”，只是把自己当时的困境同受到土耳其迫害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徒的境遇相比拟。实际上，孙如实解释是想迎合同情亚美尼亚基督教徒的英国当局，以争取尽快脱险。

^②乔治主义的代表作是《进步与贫困》。按照乔治的主张，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唯一根源，是人民被剥夺了土地。只要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取消租税，只征收单一地价税，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均可迎刃而解。由于乔治主张土地国有、免除一切租税，特别是主张工人的工资收入不纳税，因而深得美国工人拥护。上述主张，被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写进1886年的竞选纲领，乔治本人也因此而被工人拥戴当选为纽约市长。

了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孙中山和俄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有过多年交往，他们推行的个人恐怖策略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团体从事密谋暴动亦不无影响。

孙中山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从小便参加劳动，“知稼穡之艰苦”，^①对身处困境的中国农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心。这为他接受乔治主义理论打下了历史烙印。^②尔后，又从当时在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万国公报》上，阅读过艾约瑟、马林等人关于“富国养民”和“单一税”的文章，并在《上李鸿章书》中，开始提出“生民养民”的思想。^③1895年，流亡美国期间，孙中山不仅亲眼看到了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急剧发展及其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而且直接接触了乔治主义的理论，亲身感受到它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经过实地考察和体验，孙中山几乎得出了和乔治相同的结论。和乔治一样，他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统统地归结为土地问题。“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所不同的是，他赞成以土地国有来代替土地私有，但是，不主张没收地主土地。按照他的看法，土地国有，是通过国家逐步收买私有土地来实现的，同时将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页。

②访日期间，在回答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关于“平均地权”思想来自何处的问题时，孙中山指出：“吾深受幼时境遇之刺激，颇感到实际上及学理上有讲求此问题之必要。吾若非生而为贫困农家之子，则或忽视此重大问题亦未可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3页。

③艾约瑟文，载《万国公报》，第43册（1892.8）；马林文，载1894年12月20日该报；《上李鸿章书》，载该报第69册（1894.10）。

地租的增长额归公，以造福于社会。①

如果说，孙中山在流亡美国时，对盛行于工人运动中的乔治主义，有所接触和感受的话；那么，1896年10月至1897年夏，他在英国逗留的几个月，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有关土地问题各种理论的了解和研究。1897年头5个月，孙中山几乎都是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度过的。据他的老师和挚友康德黎介绍，在此期间，“孙中山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书籍，如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造船、采矿、农业、牲畜饲养、工程、政治经济学，等等，都引起他的注意，并且仔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追求知识上，达到他那样的范围。”②孙中山除了继续阅读和研究当时在英国特别时髦的乔治著作和理论外，还涉猎了马克思、穆勒、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和主张，并会见过全英土地联盟的组织者、英国下院议员戴维斯。通过这些活动，孙中山对西方的社会革命和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从中得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结论。首先，他指出，尽管欧洲列强“国家富强，民权发达”，然而并没有解决相反仍然有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端，为此，只有剧烈的社会变动，直到社会革命，才有出路。“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这是孙中山从亲身感受到的欧、美社会动乱、冲突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团体的强烈呼声中，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其次，他力图把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运用于中国，主张在解决民族、民权问题的同时，采取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以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动乱，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1897年，孙中山离开欧洲之后，为就近策动反清起义，

①见《民报》，第10号第90、91页。

②转引自《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18页。

又于当年8月来到东邻日本，直到1900年7月才回国，历时3年。此时，乔治主义已在日本广泛传播。乔治的讲演稿，还在1887年即被译成日文；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也于1891年在日本出版节译本，由此而形成一股宣传乔治主义尤其是“单一税”的热潮。诸如幸德秋水等人，就是沿着信仰乔治主义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同时，孙在日本的房东和挚友宫琦寅藏兄弟，特别是宫琦民藏又是乔治及其理论的崇拜者，并于1895年春建立了日本第1个宣传乔治主义的团体“土地问题研究会”。尽管孙中山在日期间未曾与民藏谋面，但是，后者的主张及其旅美前写成的乔治主义著作，通过寅藏直接对孙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外部环境的熏染下，孙中山又进一步深化了对民生主义的研究和讨论。据冯自由记载，在1898~1899年间，孙在东京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其他留日学人，结合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王莽新政、王安石的“青苗法”以及洪秀全的“公仓论”，研究和讨论了今日中国的社会问题、土地问题。孙中山在讨论中表示，他最信服美国乔治的“单一税”，把它视为土地公有的一派，而且认为，这种“单一税”的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故倡导唯恐不力。”^①通过认真的讨论，孙中山已经提出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并授田给能耕者，由耕者直接向国家缴租，以免受地主剥削的主张。其中实际上已包含着后来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②

通过同欧、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和对各种有关土地问题理论的研究，孙中山逐步形成了土地国有的思想，并在宫琦民藏于1902年创立的“土地复权同志会”关于人人平分土地的纲

^①见《革命逸史》，第3集第206页。

^②见《杂答导报》，载《新民丛报》，第86期（第4年第14号，1906年12月）。

领的直接影响下，于1903年秋在他创设的东京军事训练班的誓词中，首次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1904年春，在为美洲致公堂制订的章程和1905年同盟会制订的纲领中，在原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主张中，新加上了“平均地权”的提法。1905年8月的《同盟会宣言》还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解释。这些民生主义的主张，按照孙中山后来的说法，是他对乔治的单税法、约翰·穆勒的定价收买之法等数家之言，有所斟酌去取、概括以言而形成的。^①正是在博采众长、参考欧、美、日工人运动中广泛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解决土地问题各种主张的基础上，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正式提出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并把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他“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②当然，孙中山的这种社会主义，尽管按其主观愿望，企图将民族、政治、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以此来解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它所希冀的，并非科学社会主义；所宣传的，也不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善良愿望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所奉行的土地纲领，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而只是适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用来解决反封建任务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民主主义纲领，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③孙中山这种主观社会主义，比之在欧、美、日工人运动中一度流行的乔治主义来，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承担的历史任务各异，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从现有的史料判断，孙中山同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接触，开始

① 见《民报》，第123号第145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页。

于1897年。当时，在第二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虽已遭到反对和抵制，但同无政府主义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民粹主义，在俄国仍然盛行，而且由于它注重农民和土地问题，主张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又使它与流亡国外的孙中山有着共同语言。1897年上半年，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曾和包括伏尔霍夫斯基在内的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有过接触，并就两国的革命问题，交换了看法。孙中山还把自己写的《伦敦蒙难记》亲笔签署后送给伏尔霍夫斯基，后者则邀请孙为其参与编辑的俄国政治流亡者刊物《自由俄国》撰写评论关于法、俄在中国活动的文章。孙中山虽然未曾履约，却表示同意所评文章的观点。^①据孙中山后来回忆，他和俄国流亡者交换看法后，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革命者；在回答俄国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的问题时，孙中山对胜利的前景极为乐观，并作了一个需要30年才能完成的保守估计，俄国人却感到非常惊讶。他们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大国，革命胜利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俄国能在百年之内使革命成功的话，就很满意了。^②

1897~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逗留期间，继续并进一步扩大了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交往。据《孙中山全集》记载，孙曾与俄国人罗斯基有过一次晤谈。孙问道：“无政府党如何？”罗斯基答道：“百年之内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吾党满足，恐吾身之不及见也。”在回答罗斯基关于“中国如何”的提问时，孙中山对比了中俄两国的革命并指出：“中国情形与俄国全反，予及身不成功，中国革命亦归泡影。”他认为，由于俄国沙皇与欧洲列强联姻，一旦爆发反对沙皇的革命，列强必将帮助沙皇以压制人民。中国人由于受外族入侵和政府腐败之苦，就连梁启超这样的君主

^①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7页。

^②见孙在1923年10月16日和1924年11月20日的讲演。

立宪党也被清王朝视为革命党。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不要20年“吾得见中国革命大成功也”。^①

随着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和同盟会的建立，孙中山和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交往，又有新的发展并在加强彼此间的关系上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1905年10月，孙中山去东南亚途中，曾在长琦停留。经日本友人介绍，与侨居日本的俄国民粹派《民意》杂志主编鲁塞尔（尼·古·苏济洛夫斯基）在船上晤谈两个小时。他们讨论了两国的革命问题。会晤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民意》杂志联合创办《革命评论》，以共同推翻本国的专制独裁统治，帮助中俄两国人民革命。^②翌年11月8日，孙中山曾致函鲁塞尔，集中地谈了对后者撰写的《中国之谜》一文看法，同时，他强调，应动员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人士关心、支持中国的复兴。^③一个星期之后，即11月15日，由西伯利亚逃亡到东京，拟去美国的俄国社会革命党暗杀团（“战斗小组”）创始人该鲁学尼，前往孙中山的住地登门拜访，作了彻夜长谈。在场的还有宫琦寅藏、平山周等日本友人。^④

上述接触、交往表明，孙中山和俄国社会主义者主要是民粹主义者的关系，是持续并逐步深化的。无疑，它将会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发生影响。实际上，在同盟会及其前身兴中会内，确曾有过热衷于民粹主义个人恐怖活动的著名人物，如杨笃生（毓麟）、吴稚晖等；在孙中山参与或领导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尤其是他前期活动中所策划的广州暴动，惠州起义等，确曾推行过少数人密谋暴动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及其同盟会

①③④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4~585、318~320页。

②见《第二国际和东方》，第37页。从此，他们时有书信往来。1906年底两人曾谈及中国政治革命与欧美社会革命、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等关系问题。见《孙中山全集》，第322~323页。

受过俄国民粹主义思潮和策略的影响，是不为过的。但是，孙中山在一个根本点上却有别于俄国民粹派。他并不反对遏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是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并以空想社会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其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同时力求避免和防止欧、美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弊端。他不象俄国民粹派那样面向过去、美化小生产，而是面向未来，立足于发展大工业、大生产。这一点，和孙中山多年接触欧、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深受大生产的感染和工人运动的影响，不无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又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只不过是一位力图在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并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实际上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者。^①

2. 孙中山访问国际局书记处

1905年，无论对国际局还是孙中山来讲，都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头。这年初爆发的俄国革命，不仅显示了俄国无产者和俄国革命唤醒的东方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而且从实践和理论方面提出了包括群众性政治罢工在内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在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内引起热烈论争，促使国际局越来越关心东方。一时，东方问题成为它活动的主导内容。对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来讲，也面临着重大抉择。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主要依靠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和香港、海外华侨进行密谋活动，以推翻清王朝。历经广州暴动尤其是1900年惠州起义之后，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孙中山的声望，同时也暴露出上述密谋策略和依靠力量的局限性。为了从会党、华侨的狭小圈子中跳出来，着眼于争取知识界，尤其是具有革命潜力、大量涌入欧美的留学生，以形

^①关于孙中山是否是民粹主义者的争论，详见《回顾和展望》，第240~253页。

成一个有革命纲领的坚强组织，孙中山于1901年又开始了他的环球革命游说活动。经日本、美国，于4～5月间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期间，孙中山由贺之才陪同，于5月中专程访问社会党国际局。他先到国会拜访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王德威尔得，适逢后者正在国会演讲，未曾谋面。遂与王德威尔得的朋友、国际局书记处书记胡斯曼一起作了长谈，并表达了参加国际局、派代表出席下届即斯图加特国际大会的意愿。^①尔后，由胡斯曼出面安排弗拉芒文社会主义日报《前进报》记者桑德对其进行采访，并在5月18日的《前进报》上作了报导。据此，比利时工人党法文报纸《人民报》，于5月20日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为题，作了转载。

孙中山此行的目的，是向国际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为了向国际局及其成员党宣传自己的主张，他向桑德谈了

^①1930年8～10月间，王德威尔得访华期间，曾两次谈及这次访问。一次是9月6日，王德威尔得在北师大演讲时“遇见一位久未晤面的教授”。王德威尔得指出：“当1906年（？）时，我曾偕孙中山在北京布鲁塞尔访问兄弟，欲与兄弟晤谈。当时兄弟因事在外，致未会见。后来，我有一位朋友曾与孙中山先生晤谈一次。”（《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一次是10月1日，他在上海交大演讲时说：“中山先生于1906年（？）曾来北京，至国会访余，适余正在开会演讲，遂与余之友人等，作长时间之谈话。”（《申报》，1930年10月2日第3张）。《前进报》记者桑德的报导，也只说他充当了孙与国际局领导人之间的中介人，并未谈及王德威尔得是否在场。（见《190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第52页）从这些材料推断，孙中山当时实际只访问了国际局书记处，而与王德威尔得并未直接接触。

“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据桑德报导，孙简要地介绍了以下两点。①第一，驱除篡权的清朝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②实际上，孙中山概要地介绍了他自己业已形成的三民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其中，包括以“驱除鞑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建立民国”为中心的民权主义，以“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

在阐述自己的纲领和主张时，孙中山特别强调了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为此，既要采用欧洲的机器生产方式，又要避免其种种弊端。既要吸收欧、美文明的精华，又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在此基础上，“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阐述上述看法时，孙中山再三强调，这种“一次革命论”的社会主义，是可行的、乐观的。从阶级状况看，通过行会中国工人“全组织起来了”，他们的境遇比任何国家的都好。“今天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远非可怜的。穷人很少，而真正富有的甚至更少。”从实际制度看，中国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即按财产赋税的制度，并不是象欧洲那样把负担放在大多数没有财产的群众头上，而且中国社会主义者希望进一步改进这种按财产

①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见1905年5月18日《前进报》桑德的报导，载《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52~54页。

②据《人民报》转译稿，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期。此处中译文为：“不应忘记，中国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土地是公有财产，也就是说，那里的地主很少；土地按一定的规章租给农民。”

赋税的制度，使它同国际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以防止发生欧洲所有国家发生过的“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

最后，孙中山着重谈了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关系。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①

《前进报》记者桑德的上述采访报导，由于不是原始记录文献，加上孙中山谈话本用英语，后又经辗转翻译，不尽符合原意。同时，它仅是单方面报导，因而不可能充分地表达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但是，把它与孙中山一贯的思想理论主张相对照，其基本精神是可信的。

①法语《人民报》这段话的中译文是：“几年之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最大胆的设想，因为我们的行会和同业公会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生活在完全的集产主义制度下。你们也将从中受益不浅，不仅因为榜样的说服力，还因为它将表明，集产主义并不是虚构和空想。我们那里完成的事业将比多年的争论和数以百计的会议，更能促使人们改变信仰。”（重点号系引者所加）在这后面，孙中山还讲过这样两段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已不象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处在襁褓之中。我敢说‘它已结束了幼年时代’。所有的行会都赞成我们的主张，只等一声号令便开始战斗。此外，中文的社会主义报刊有54种。这个可观的数字，可以使你们认识到我们读者和信仰我们思想的人数量之多。更何况中国的文盲比你们这儿多得多。”

对孙中山这次访问，反应十分强烈。1906年3月4～5日，胡斯曼向国际局第7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把“中国社会党人”孙中山的采访，视为“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壮大和统一”的一个例证。他还特别提到：“书记处曾接纳了来自中国的、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党人的访问。他们似乎表示愿意来参加下一届斯图加特代表大会。”^①值得注意的是，胡斯曼提到来访的“中国社会党人”，不是称“他”，而是用“他们”这个复数人称。这显然不仅是指孙中山，还包括了充当陪同和介绍人的贺之才；与桑德报导不同，他没有涉及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王德威尔得是否在场，而只提书记处即胡斯曼自己出面接待。这一点，同王德威尔得后来的回忆吻合。胡斯曼还明确地转达了孙中山关于拟出席斯图加特国际大会的要求。对此，国际局会议未置可否。国际局领导人对“中国社会党人”孙中山等的访问，是十分重视的。1930年10月，王德威尔得访华时，曾特意提起这次访问，并把孙中山前来国会会晤他以及与其友人（胡斯曼）的面谈，看成“是为余与孙中山直接间接之关系”。王德威尔得还特意提起，他访华期间，在北平游西山碧云寺瞻仰孙中山遗像时，“默察往游者，均有一种敬仰之表示。”^②豪普特等编的《第二国际和东方》也曾提及：“1905年5月中，孙中山访问国际局后，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者，包括来自比、英、法、美的，有时是在这些国家里，有时是记者来中国旅行。欧洲左派报纸发表了各种倾向的中国革命的文章。”^③尽管国际局一直没有在接纳孙中山的“革命党”问题上采取实际步骤，这次访问却是东方革命者倾向于国际社会主义

①见“国际局第57号文件”。

②《申报》，1930年10月2日第3张。

③见《第二国际和东方》，第49页。

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①

3. 梁启超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会晤

和孙中山不同，梁启超是以维新派的著名人物身份，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戊戌变法之前，他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代言人而名闻遐迩。为鼓吹变革维新，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该报率先报导过国际伦敦大会的消息，译载过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暗杀活动的新闻，并在一篇评述德国政党的文章中，向中国读者介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而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信息的桥梁。对于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外部世界、认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起过历史作用。但是，梁启超从来不以社会主义者自许，并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即使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迫亡命国外，也未改拥君立宪以变革维新的初衷。梁启超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主导思想，基于促进和加强北美维新会的建设，从1899年起，开始了他的北美之行。应旧金山华人的邀请，梁启超本拟于当年12月20日从日本出发，在檀香山小住后即赴旧金山。由于清王朝闻讯责令驻美使臣阻止其登岸，结果梁中途折返。3年之后，即1903年1月23日，梁启超再度从日本出发，经加拿大于4月间抵达纽约，先后在哈佛、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辛辛那提等城市考察达5个月之久。

这次美国之行，使梁启超大开眼界，真正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包括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急剧发展，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

①作为孙中山访问国际局的一个佐证是：1930年10月，王德威尔得（当时称“樊迪文”）访问广州中山大学，当时的校长朱家骅赠送孙中山遗像给王德威尔得时曾题词称：“本党总理孙中山与樊迪文为旧交。”（重点号是引者所加）见《中国革命之透视》，第192~193页附图。

的进步性。同时，也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活动家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正是依据这些真情实感，梁启超写道：“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7/10属于彼20万之富人所有；其3/10属于此7,900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1/400。”由此，梁启超推而广之，“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已矣。”“观于此，而知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①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党人能有如此认识，确属难能可贵。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所说的“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指的是与他无关的欧、美国家。至于能否适用于中国，则又另当别论。这在梁启超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的接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据《新大陆游记》记载，在美期间，梁启超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过4次接触。一次在维多利亚，一次在纽约，一次在赫勒拿，一次在碧架雪地。其中，以同《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总编）哈里逊的会晤记载最详。

前来拜谒梁启超的哈里逊，也和其他与梁接触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一样，竭力向他鼓吹社会主义，力主中国要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入手。按照哈里逊等美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大改大革和小改小革所费之力，相去不相上下。与其花差不多力气搞小改小革，不如直接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大改革。哈里逊以“狮子搏兔”和“狮子搏虎”作对比，说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对此，梁启超却不屑一顾，认为这些社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

^① 《新大陆游记》，第45、46页。

的国情，不愿与他们深辩，而且以社会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为由，谢绝了来访者关于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建议。哈里逊等为了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将其党纲和他主编的《丛报》送梁，并想通过梁进行联络，以把社会主义移植于中国，还想以海外或国内几家报纸为其机关报。当即被梁启超婉拒。梁以中国人现在尚未达到足以谈论社会主义的程度为理由，将哈里逊的上述建议置之不顾。

通过与社会主义者的接触，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并非没有选择。实际上，在美期间，他已提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与中国关系的看法。梁启超认为，“极端的社会主义”，“不仅对中国，即使对欧、美也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他所热衷的，并非这种社会主义，而是由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还在赴美前夕的一篇文章中，谈及今日中国究竟是采取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还是采取君主专制国家的干涉主义时，梁启超就曾强调：“窃计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①在美国考察5个月，尽管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大量事实，梁启超仍然不改初衷。在与哈里逊等社会主义者的接触中，他坚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日趋健全，“中国可采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较欧、美更易者”。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际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条件下，“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②梁启超力主国家社会主义，却反对土地

^①《新民丛报》，梁启超编，横滨版第17期，第65页。

^②为了说明中、西方在国家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默契，梁启超在1903年10月发表于《新民丛报》的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中，专门举出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来说明，自上而下地靠中央集权推行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同上，第46~48期（合刊），第302~303页。

国有，声称此说“万不可行”。但是，他认为，如果包括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业的大部分，归于国家所有，“若中国有人，则办此真较欧、美易矣。”在梁启超看来，国家社会主义虽好，今日实行却不是时候。他在同哈里逊等社会主义者的交往中，谈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时，总是强调：“今日言之，非其时也。”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实行君主立宪，咸与维新。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接触中，已充分感觉到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巨大发展和强大实力。哈里逊告诉梁启超，全球社会党人所获得的选票数共900万；其党员数，近一两年内，以几何级数增长，不用10年将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政治势力。对此，梁启超认为，“其言虽不无大过，然其盛大之情况，固在意计中也。近来国际社会党最发达，此亦人类统一之一征兆。”当哈里逊谈到，日本已有900余人加入社会党，而中国却无一人是社会党党员时，梁启超即在其“游记”中补充道，美洲就有一个中国人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员，该人还曾向梁表示，未能为该党有所尽力。据该人称，想加入该党的，尚不止此数。这一事实表明，在美期间，梁启超不仅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过交往，而且还同社会党的一般党员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有过接触。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从与社会主义者的接触交往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忱。他写道：

“所见社会党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其于麦喀士（马克思）（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苏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亦宜。”^①这一席话，虽然不乏贬击之词，却从一个侧面反

^①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新大陆游记》，第47—49页。

映了世纪初年社会主义者在传播和坚持真理方面所表现出的热诚与潜力。

不无巧合的是，正是梁启超赴美考察并与社会主义者接触的1903年，由梁在日本筹资创办的广智书局，连续出版了3本有关社会主义的日文译著，第1次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思潮，介绍给中国读者，^①使之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当时社会党的概况、包括马克思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流派、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异同等。由此开始，社会主义书刊大量增加，社会主义一度成为一种时髦。仅1903年，各书店、团体出版的日文著作中译本，竟达187种，成为空前的一大壮举。^②这种情况，固然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活跃和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努力有关。但是，它同梁启超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尤其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特殊兴趣，不无关系。

二、第二国际关注着中国

1. 密切地注视中国事态的发展

揭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声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向来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第二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

国际局刚刚成立即涉及中国问题，这决非偶然。1898年，德国迫使中国签约，强占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从而使整个山东成为

①这3本书是：1889年，由福井准造撰写、赵必振译的《近世之社会主义》；1901年，由西川其次郎写成、周百高译的《社会党》；1889年，由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

②1903年下降为17种，见《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第83页。

其势力范围；1900年，中国爆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为镇压这一运动，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实行野蛮远征。1900年12月22日，国际局首次提出，拟针对欧洲在中国的政策发表一个宣言。第2年4月25日，国际局在为庆祝“五一”发表的《致劳动人民书》中，正式谈到中国已发生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的诱惑下，整个欧洲帝国，怀着从不满足的贪婪，扑向黄色的王国。”^①11月3日，当八国联军在中国血腥屠杀、肆意抢掠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国际局又在《告各国工人党》的宣言中，严厉地指出，“开往中国的远征军表明，人道的公约所值几何！”^②同时，国际局第1次全体会议讨论帝国主义政策时，专门通过了海德门提出的决议案。该议案指出：“整个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在中国犯下了一系列不公正的血腥勾当，更使我们时代的历史留下了罪恶的印记。”^③1902年，当日本与俄国为在中国争夺霸权而发生火并直至大动干戈时，英国代表H. W. 李向国际局提出，要注意中国、日本的形势发展，并建议为此而发表宣言或决议。据此，国际局在4月25日发表的《五一节宣言》中指出，俄国在中国满洲和整个欧洲犯下的罪行，“将遭到愤怒的指责和不屑的唾弃。”^④

第二国际各国党，特别是德国党，采取了比国际局更为鲜明的立场。这是该党内部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1895年11月，德国海军部队在中国山东胶州湾登陆实行军事占领，并于1898年3月，迫使中国政府将这一地区“租借”给德国99年。这个侵略、掠夺的帝国主义行径，在德国党内引起强烈反响。威廉·李卜克

①见“国际局第2、4号文件”。

②见“国际局第9号文件”。

③见“国际局第10号文件”。

④见“国际局第11号文件”。

内西、倍倍尔和德国党国会党团，在国会中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发表声明指出，出于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共同财富”的原因，坚决反对任何殖民政策。伯恩斯坦虽然并不赞成掠夺胶州湾的方式，也不主张德国拥有更多的殖民地，但是，他认为，出于开发热带资源的需要，为了使德国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有“参与决定性发言”的把握，使“更高的文化在这里说到底也有更多的权利”，他支持德国“租借”胶州湾，认为对殖民地的掠夺、攫取，并不是什么最恶劣的坏事，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在原则上反对。①与之相反，卢森堡则采取揭露和抨击的立场。她指出：列强分割、侵吞亚洲，是世界已被瓜分完毕的标志。后起的德国，只是随着对胶州湾的占领，才确立了它的世界政策即帝国主义的新纪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通过对中国事态发展的分析，于1899年进一步揭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实质和目的。她指出，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并不说明它要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而只不过是已经确立的欧洲对立，被移植到中国，并在中国土地上爆发而已。”其结果，势必激化列强之间的矛盾。②

德国远征军对中国的野蛮行径，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浪潮。1900年6月20日，当德国等8个国家决定派出远征军，以镇压义和团，并进一步控制和瓜分中国时，德国许多城市的工人，于6~8月间举行了一系列抗议集会。党的许多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讲话和文章进行抨击。7月25日，施塔特哈根在柏林发表题为《德国人想在中国干什么？》的演说；7月28日，倍倍尔在瑞士苏黎世演说，抨击德国对中国的侵略；8月16日，蔡特金发表题为《使用武力的世界政策和无产阶级的利益》

①见《前提与任务》，第218~219页。

②见《卢森堡全集》，第1卷第1册。转引自《卢森堡与中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期第24页。

的演说；①威廉·李卜克内西临终前10天（7月29日），还满腔热情地在德累斯顿群众集会上发表题为《世界政治。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的演讲。他针对着两天前德皇威廉二世的一篇臭名昭著的“野蛮演说”，②坚决地抨击德皇这种可耻的帝国主义者的疯狂叫嚣。他指出，德国的世界政策，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整个社会的危害以及文化堕落。李卜克内西的这个临终演说，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揭露了可能出现的世界大战危险，号召各国人民首先是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掠夺，而且还富有远见地指出，亚洲将会迅速觉醒，中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的转折”。③演说全篇充满着无产阶级的激情和国际主义精神。

德国党对中国事态发展的关注，尤其集中地表现在当年9月召开的美因兹大会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热烈讨论上。党的执委会主席辛格尔，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卢森堡两次发言，尖锐批评党的执委会在事态发展面前行动迟缓。她明确地指出：“在这场战争中起首领作用的国家的党，也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负起发动抗议的职责，不光是在报刊上发表抗议，更不能依靠国会，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直接地诉诸群众。”累德堡

①见《大事记》，第1卷第222～223页。

②7月27日，威廉二世在不来梅检阅派往中国的远征军时，公然号召他们，象千年前野蛮的匈奴人一样，“狠狠地打击”中国人，“不要宽恕，也不要捉俘虏！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就遭殃！”以便“使中国人永远不敢再对德国侧目而视！”这篇演说，由于它要求德军要象以前匈奴人那样残暴、凶狠地对待中国人民，又被称为“匈奴演说”。参见同上书，第223页。

③见《世界政治。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转引自《威廉·李卜克内西传》，第289～290页。

还揭露了伯恩斯坦、席佩尔等为统治阶级辩解的错误立场。^①最后，美因兹大会通过《关于世界政策的决议》。“决议”分析了德国政府推行的武力扩张和殖民政策产生的原因、实质和危险性，坚决抗议帝国政府为出兵中国而蹂躏宪法的非法举动，要求全党广泛地开展抗议活动，为揭露反人民的对华政策而斗争。

“决议”最后向德国工人阶级的呼吁：“为争取人道主义、文化和各国人民的自决权而斗争。”^②为了贯彻大会精神，10月28日，柏林—斯潘道举行了群众抗议集会，并通过了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决议；^③党的执委会两位主席倍倍尔、辛格尔还在国会抗议德军侵华，公开拒绝为此拨款。1900年11月19日，倍倍尔在国会的演说中，根据侵华德军士兵寄回的书信，严厉地谴责了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制造的种种惨案。他明确地指出：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暴力行动。”倍倍尔在国会公开地宣布，他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反抗者一边，并郑重提出：“必须视中国为平等的国家。”^④与此同时，党的报刊还发表了德军士兵写的关于远征军在中国制造血腥惨案的书信（又称“匈奴书信”），以活生生的事例，披露这场殖民战争的实质和目的。美因兹大会的决议，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的抗议斗争，在莱比锡、黑尼欣、米格恩、巴伐利亚、武尔岑等城市和地区，都举行了抗议集会。^⑤

围绕着对中国事态发展的分析，一些国际社会党人，还从中得出了引人注目的结论。饶勒斯分析英、德、法、俄、美、日等

①转引自《卢森堡和中国》。参见《罗莎·卢森堡传》，第68页；《大事记》，第1卷第224页。

②③“决议”载《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5期第64～65页。

④转引自《倍倍尔传》，第166～167页。

⑤见《大事记》，第1卷第226页。

列强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瓜分中国和扩展在华的势力范围的史实后，明确地指出：“美国正在崛起，它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①沙俄和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为了争夺亚洲霸权和对中国的控制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饶勒斯从1905年俄国革命、亚洲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中，指出了亚洲觉醒这一历史趋势。他强调地指出：“那些长期受欧洲剥削、蹂躏的种族的觉醒……和欧洲人民本身国际主义意识的增长……是世界前进的方向。”^②

在前几次国际大会上，国际社会党人的精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内部论争和讨论欧、美工人运动中重大的理论原则和实践问题上。除了俄国问题，很少触及东方尤其是中国问题。到1907年，情况有所改观。日俄战争的爆发和日本社会主义者在国际大会的活动，进一步促使第二国际对东方特别是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密切关联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注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1905年孙中山对国际局书记处的访问以及关于参加国际大会的吁请，又提高了中国问题在国际大会上的份量。因此，中国问题逐步地为国际大会所关注。1907年，国际斯图加特大会讨论工人侨居问题时，曾多次提及中国工人的外流，特别是中国工人与美国本土工人的“竞争”问题；^③1910年，国际哥本哈根大会讨论日本问题时，作为报告人的埃伦博根，就曾向大会指出：“最近在中国出现了工人运动。”他把这种工人运动，看作是“稚嫩的幼芽”。据此，大会通过的关于日本的决议写道：“亚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有着巨大的意义。”“决议”“坚信资本主义的蔓

①转引自《饶勒斯传》，第259页。

②转引自《饶勒斯和中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期第67～71页。

③见《国际斯图加特大会记录》。

廷也在亚洲为社会主义的种子准备了萌生的土壤。”^①1914年5月，瓦扬为即将召开的国际维也纳大会准备的《关于失业问题报告》，具体地描述了法国资产阶级为对付本国工人而招募廉价的中国工人向法移民的情景。根据他的调查，在巴黎郊区、诺曼底、底埃普的纺织厂以及南方的葡萄种植园中，都有中国苦力在那儿干活。1914年春，一次就招来500名中国移民。^②尽管这些史料比较零碎而不连贯，但已反映出国际大会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国际大会通过自己的正式文献，充分地肯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无产阶级解放的意义，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的土壤里中国社会主义必将发芽成长的历史趋势。这种认识和结论，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2.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评述

1905年，孙中山访问国际局书记处之后，国际局和中国革命党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事态的发展，日益成为欧、美社会主义报刊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个方面，法国社会主义报刊作了大量的工作。正如《人道报》所指出的：“在法国出版物中，是我们率先对一个许多人并不知晓的运动的整个重要性试图作过说明的报刊，我们因此而感到欣慰。”1908年1月8日，该报在第2版发表列昂·雷密的文章，刊登孙中山的肖象，将孙中山为同盟会制定的纲领，概述为“废除满洲王朝、建立一个以最广泛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治机构、废除私有财产、竭尽全力维护国际和平”等4个基本观点。实际上，是用欧、美社会主义者的语言，介绍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和平的对外政策。该报还强调指出：

^①见《国际哥本哈根大会记录》，参见《文献选编》第3卷第194~195页。

^②见《未开成的代表大会》文件部分。

“他们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即是我们自己也同样信奉的；他的同志们所追求的，即是我们所期望的一切。”^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道报》通过下述两种形式跟踪报导中国事态的发展。一是发表来自东方的简要消息报导，如1907~1908年，就曾摘发革命党人击毙安徽巡抚的事件、关于中国宪政改革的诏书等；二是在头版首页发表专门论述中国事态发展的文章。其中，包括饶勒斯等著名人物关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很有深度的评论文章。^②1908年5月，《社会冲突》杂志还专门出版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增刊。除了全面地论及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外，还发表了由法国人和中国人合作提供的一幅相当详细地记载中国革命中各个政治派别情况的图表。其中，包括当时中国各种期刊的名目、发行年份、周期、出版地点及其政治倾向，并附有从各个途径搜集来的一批有关的中国代表人物的照片。^③由于增刊所依据的，大都是来自中国的文献史料，因而为后来欧、美社会主义者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对于在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内澄清当时中国事态的真相大有裨益。在注意报道中国事态发展和加强对孙中山思想评述的同时，1907年之后，欧、美社会主义报刊，还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它们所发表的文章，一方面，肯定了下述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自由因而使社会主义传播极度艰难的国度里，社会主义已经由“只是醉心于西方文明的知识青年的专享品，渐渐地日益散播到各阶层人民之中”；^④另一方面，这些文章又强调指出，如果“把我们中国朋友的社会主义与白种工人们的社会主义同等对待，那将是危险的。”根据文章作者的看法，中国当时并不存在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2~53页。

②③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1~53页。

④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3~54页。

资本主义大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富有革命传统和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阶级的划分不明显。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基于工业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民主的，在其实行中则主要是农业的。”作者认为，孙中山企图通过在尚未建立大工业的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来引进现代文明，以便更向前进，“这是一种空想”。在上海工作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克·克劳夫，率直地批评了所谓中国没有贫困的说法。他提醒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注意：“千万不要上当。在这个国家里，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运动”，“那些中国的期刊，无论如何不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期刊”。克劳夫这封寄自上海的信，发表在1908年8月出版的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述评》。国际社会主义报刊的这些评述，对国际局及其成员党深入了解中国问题发生了影响。国际局成员、荷兰社会党人万一科尔，1913年12月和1914年2月，在致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鲁巴诺维奇和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中，就曾重申过上述报刊提出的类似观点。他主张，国际局对中国的事情不要插手太多。他认为，孙中山“说不定是空想主义者，不见得是个有所作为的人。”^①饶有兴味的是，国际局及其主要成员党对孙中山及其理论的评价，几乎都回避而实际上否认了孙是民粹主义者的说法。

国际局不仅从其成员党的报刊上获取有关中国运动的信息，而且还专门进行过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调查，并通过驻华的社会主义记者，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一些来华的社会主义者，也确实曾向布鲁塞尔发出过有关报告。美国记者格·勒·哈丁，是孙中山的朋友，又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他充分利用这种优越条件，将他在华旅行期间的见闻写成一个长篇报告，寄送国际局。其中，详述了中国“二次革命”时期发生的各种情况，并

^①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4~55页。

向国际局建议，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义务性组织，负责向中国传播社会主义著作，宣传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各种观点。国际局并不满足于这种同中国的间接联系，而是力图同中国革命运动直接接触。1905年孙中山访问国际局书记处不久，德国党《前进报》编辑部的肯内尔脱，为继续发表文章揭露德军士兵在中国的残暴行为，曾通过国际局书记处，要求和一位曾接受比利时报纸采访的中国社会主义人士即孙中山联系，以求有助于上述揭露。为此，书记处帮助完成了这件事。^①

3. 辛亥革命在第二国际中的反响

以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为标志，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同中国的关系，达到颠峰状态。

法国社会党人饶勒斯，率先对辛亥革命作出反应。武昌起义胜利不久，饶勒斯即于11月撰文明确地指出：“一场自由派的，也许是共和派的革命，震动了天朝帝国的广大民众。他们不仅谴责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循私枉法和腐朽堕落，也指责它对侵害帝国利益并以瓜分它为荣的外国奴颜婢膝”。^②这种分析，揭示了辛亥革命反对封建主义以及各国列强这一实质内容。正在柏林的卢森堡闻讯后，也对遥远中国的革命作了热情赞颂。她把当时中国和德国的状况进行对比后说：“中国传来的革命胜利消息，中国和革命！在中国宣布了共和国，可我们还处于中国满清式制度统治之下。如果有4千多年历史的中国都不再能阻挡现代的浪

^①见国际局书记处《1905年7～8月份报告》（1905年9月22日），载《国际局文献》，第1卷附录《社会党国际局月度报告（1905～1907）》。该报告未及叙述帮助完成这件事的具体过程及结果，只好暂付阙如。

^②转引自《饶勒斯和中国》。

潮，难道小小的粪堆似的德国反动力量还能挡住进步吗？”^①与此同时，德国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对这场革命作了充分的肯定。该刊发表的巴罗维司的文章，强调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反清的特点，认为这场革命是“阶级斗争”和“对封建体制的斗争”。同时，它还强调指出，继革命成功之后，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业化运动，将会产生庞大数量的无产阶级，他们又将影响世界革命。^②这种把胜利的民主革命同未来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的分析，在当时评论辛亥革命的文章中，还不多见。

第二国际各主要成员党对辛亥革命的肯定，不只是停留在言词上。当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为谋求欧、美各西方国家的承认并为临时政府借款，孙中山于1911年11月23日途经巴黎时，曾同法国社会党议员阿·马塞交谈，并前往法国众议院（下院）会晤马塞、吕·于贝尔、博雷尔。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当孙中山提出承认中华民国问题时，这些议员均答应准备向当局竭力争取。^③为了具体地支持和声援刚刚取得胜利的辛亥革命，法中协会创始人韩瑞斋，在该协会庆祝辛亥革命的酒会上曾建议，当中国国民大会开幕时派一个欧洲国家议员代表团访华。这个建议得到热烈响应。德国党领导人，就曾向国际局书记处书记胡斯曼要求，可否让欧洲社会主义议员也加入这个代表团。胡斯曼表示同意，并认为“接受邀请并非不合时宜。”欧洲社会主义议员“在组织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将会是有益处的”。后来，由于袁世凯政府的反对，这个代表团访华一事终于搁浅。^④

^①转引自《卢森堡和中国》。

^②见《新时代》，1911年卷第80～81、83页；1911～1912年卷第372～375页。

^③转引自《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下卷第1305～1328页。

^④详见《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6～57页。

1912年，孙中山将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之后，曾于4月1日在南京的一次饯别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演说的前一部分，以《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为题，译成法文刊于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这个演说稿一发表，很快地就为第二国际成员党所注目。刚从巴黎迁居克拉科夫的列宁，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这个演说的法文译本，并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评论文章，连同孙中山演说的俄译稿，发表在1912年7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机关报《涅瓦明星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指出，孙中山在完全离开俄国、俄国经验和著作的情况下，提出了纯属俄国的问题，即亚洲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1905年俄国革命开始后不仅俄国而且也是亚洲面临的问题。列宁在充分肯定孙中山的纲领、主张的进步性的同时，认为孙中山关于防止资本主义的空想和实行激进的土地计划完全与俄国民粹主义相同。^①

根据孙中山的纲领、主张和活动，将其视为民粹主义者，这并不是从列宁开始的。实际上，在此之前，德国党机关刊物《新时代》于1911年发表的巴罗维司的文章，已经较全面地阐述了类似观点。该文作者一方面指出，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家”，是“伟大民主运动的代表者”；另一方面又强调孙中山是“中国民粹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孙中山急于将欧、美资本主义引进中国，是“过高的要求”。^②列宁后来发表的评论孙中山民粹主义的文章，实际上师承并发挥了德国党《新时代》上述文章的观点和主张。

1912年，孙中山拱手交出政权后，登上大总统宝座的袁世

^①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1～157页。

^②见《新时代》，1911年卷第81页；1911～1912年卷第382、569、558页。

凱，试图投靠列强，依赖西方财团贷款，以对付革命派，全盘否定辛亥革命成果，在中国实行专制独裁。^①对于这一事态发展，国际局极其关注，并决定采取实际步骤。1913年9月，国际局就西方国家向袁世凯政府的贷款问题，专门向各成员党发布了一个通知书，要求立即掀起一场运动，以影响各国政府，使之“停止新的贷款。这些贷款同原先的贷款一样，其目的乃在于消灭新生共和国中的那些进步分子。”^②后来，国际局在1913年工作报告中，又重申了这一点，并向各成员党通报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报告”指出：“中国的政治形势是：社会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正在抗争，但是，他们的努力将会落空，甚至失利。因为欧洲政府始终不断地在财政上资助反动派。”^③此后不久，国际局书记处还曾专门致函孙中山，对中国发生的事变表示惋惜，并保证将在欧洲尽其可能地支持中国的事业。对此，孙中山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14年5月，孙中山在致国际局的信中，恳切地写道：“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向您们全体，亦即我的同志呼吁，呼吁您们为了中国而倾注关心和贡献力量，呼吁您们在不同岗位上施展才能奋发工作来帮助我。为了实现我的事业，我需要贵组织成员们的帮助。”^④由于中国和欧

^①当时，饶勒斯就曾作过揭露。他指出，袁世凯“之所以得逞，是由于金融财团提供资金。”他认为，“中华共和国、中国真正的共和派不是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的，而是被欧洲金融家的金钱打垮的。”为此，他还曾揭露法国政府拟向袁世凯提供1.6~1.8亿法郎以在中国建立永久的专制政权的阴谋。转引自《饶勒斯和中国》。

^②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中国》，第57页。

^③见《未开成的代表大会》文件部分。

^④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7~58页。

洲之间相距万里，关山阻隔，当孙中山这封信到达国际局所在地布鲁塞尔时，世界战争的乌云已经弥漫开来，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困扰的国际局，再也无力顾及东方，一度很有希望建立起来的中国与国际局的正常关系，终于被突然爆发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所打断。

4. 王德威尔得的中国之行

从现在的史料看，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访问中国，当首推国际局执委会主席王德威尔得，时间是1930年8~10月。此时，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已告终结，作为第二国际后续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也进入了它的后期。但是，王德威尔得一踏上中国领土，舆论仍把他视为“第二国际领袖和比利时社会党党魁”。

王德威尔得访华，是在一年前开始酝酿的。1929年，当中国驻比公使王景歧即将卸任归国时，王德威尔得曾以私人名义找他，表示想来中国旅游考察，由于资金短缺，希望中国方面予以资助。王景歧归国到达北平后，比利时驻华公使又代王德威尔得向王景歧转达了同一愿望。鉴于1926年王德威尔得任比利时外长时，为废除延期达60年之久的中比商约和废止比在华领事权一事出力甚多，对中国有过友好的表示，加之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在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对同情和支持三民主义的王德威尔得也有好感。因此，由王景歧以私人名义，向中比庚子赔款委员会建议，决定予以资助，并由中央研究院出面，正式邀请王德威尔得以教授、学者身份，来华讲学考察。后来，又经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博览会的褚民谊与王德威尔得联系谈妥，终于揭开了王德威尔得中国之行的序幕。

63岁的王德威尔得偕同其夫人及随员，是在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后，取道西伯利亚，从哈尔滨进入中国的。从8月12日抵哈尔

滨，到10月28日在香港乘法国邮轮“巴多斯”号返欧，历时1个半月，曾在沈阳、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作过逗留，中途还曾从天津往访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地。在华期间，王德威尔得一直由比驻华公使陪同，参观游览，实地考察，发表讲演，接触政要，十分活跃。蒋介石政府对王德威尔得的此次访华，极其重视，接待的规格相当高。王德威尔得抵达哈尔滨，即派专员迎候；沿途由外交部官员陪同。所到之处，尽管是以学校或学术团体出面接待，有关政府负责官员皆宴请接风，并在经过城市举行记者招待会或讲演会，为其提供发表见解的机会。当王德威尔得在上海讲演前夕，国民党市党部，于9月28日专门向各个区党部发出通知，并着令转各分部，责令其下属届时派员听讲，“以观察外人对本党之态度”。通知还特别强调，“王德威尔得对本党向表同情，对三民主义亦有相当信仰。”为了表示特别的优待，当局为王德威尔得前往南京特挂专车。抵宁后，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官员均曾与其接触并宴请。“双十节”那天，王德威尔得夫妇作为贵宾应邀参加庆典，蒋介石还曾接见他，和他及其他贵宾合影留念。最后，由中央大学出面，授予王德威尔得博士学位。

进行讲演，是王德威尔得访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多次声称，仅以在野党的教授学者身份，来华考察社会运动和政治现状。目的在学习，与政治无关，涉及第二国际也“只作学理之推敲，不作主义之宣传”，企图不涉及政治。实际上，在一个多月的访华讲演中，王德威尔得曾多次涉及“苏俄印象和劳农政府”、“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世界社会问题”、“三民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之比较”、“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区别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国际和平及其组织”等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从各个方面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

关于“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这是王德威尔得在沈阳、北平等地讲演的主题。当时，王德威尔得是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的身份谈这个问题的。其中，也涉及到了对1923年5月前两个国际的看法。按照他的说法，第二国际是第一国际解散后原来组织的重新复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虽然都有组织，其反政府的势力却不大；到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势力逐渐强大，“一日千里，成不可漠视之势力”。可是，“有一事实不容否认，即在欧战之前，第二国际只有一个；而于欧战之后，则分为数个是也”。按照他的看法，战后，第二国际实际上已分为政治方面的伦敦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工会方面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公开分裂，责任不在第二国际，而在第三国际。在谈到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时，王德威尔得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维也纳国际之所以要成立，其目的“在拉拢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使双方合作而重新打成一片。”由此导致3个国际的柏林会议。经过数度讨论，“知悉第三国际丝毫不能让步，无合作之可能，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乃重在汉堡会议，第二半国际遂实行加入第二国际。”王德威尔得认为，这种分裂后又重新组合的第二国际，在许多方面根本不同于第三国际。从其组成的成分看，前者是社会党，后者是共产党；从加入的程序看，前者及其工会组织，是欧洲各国工人“自由加入”，后者及其工会组织，则是“强迫其加入”；从拥有的实力看，前者政治上的势力十分可观，它们散处欧洲各国，尤以欧洲西部与南部为最多，其多数成员党，均执有政权，其工会组织，有2,300万会员，“为世界工人最大之集合”。后者的成员，“大部分在莫斯科，换言之，即第三国际会员大部均为苏俄人民”，其工会组织会员，1,300万；从所追求的目标看，前者希望，“联合世界上各级职工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即所谓劳工大

团结，而从事反抗一切不平等待遇，打倒所谓阶级制度，使世界上无不平等，大家联合一气，向人道及和平道路上前进”。^①后者，以1922年苏俄状况为例，它的经济秩序虽已恢复，政治秩序却依然如故，“苏俄人民完全为红军所统制，而强行压迫秩序恢复也”，“惟在苏维埃制度之下，工人无强大之势力，不能反抗政府”。把王德威尔得上述言论，同他曾参与和通过的第二国际章程关于国际宗旨的规定相比较，把第二国际主要领导人现在对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态度，同当年中派政党的态度相比较，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倒退。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第二国际成员党执政时的政策为什么同第二国际的目标不一致的问题时，王德威尔得解释说，社会党在野和在朝的环境不同，所以，它所推行的政策也不得不一样。他以英国为例指出，保守党执政，之所以不能推行过分压迫的对外政策，就是因为有在野的社会党（工党）的监督；社会党（工党）政府之所以不能完全实行其主张，也是由于有在野的保守党监督之故。同时，社会党政府还只是少数党员的政府，它不能不顾及一切反对党的意见。^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为当时的社会党政府完全推行资产阶级政策、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作辩护。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国际成员党由原来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蜕变为工人的改良政党这一历史进程。

关于“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比较”。这是王德威尔得在天津、上海、南京多次讲演的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他回顾了1905年5月孙中山对他和国际局书记处的访问，表示了对孙中

^①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时，王德威尔得将第二国际的最终目标归结为：“求民族之平等、自由、博爱”。见《申报》，1930年10月2日第3张。

^②《第二国际领袖万德威尔在平演词汇记，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第1～4页。

山和三民主义的仰慕之情。在讲演中，王德威尔得对三民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逐一作了剖析，并表明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孙中山所讲的民族主义，在欧洲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即以武力征服弱小民族，这是为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一种是民族自决主义，即以民族本身要求自由、独立、平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属于后一种。对此，王德威尔得表示同情和拥护，并望尽早能实现，尤望能联合世界之弱小民族，努力于世界公道、正义之建设。按照王德威尔得的分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根据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思想而形成的。尽管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民智之低欲谈民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王德威尔得指出，这是一种必须有的过程。因此，孙中山说，从专制到民主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即训政时期，以逐渐向前发展。王德威尔得强调，“这绝非开倒车，我亦极表赞成。”至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王德威尔得说，它和社会主义相似。所不同的是，两者的实施方法各异。欧洲由于工业发达，大资本家压迫十分厉害，所以，社会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自己联合起来，努力奋斗，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中国由于以农立国，所以，民生主义者主张劳资合作，以解除两者之间的纠纷。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只是所处环境不同，根本主张并没有什么差异，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王德威尔得表示对两者都十分赞成。^①在北平的讲演中，他只在一点上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孙中山所说中国只有大穷人小穷人而无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划分，“未免有点夸大其词”。王德威尔得以在北平的所见所闻“证明中国人之阶级观念确存在”。^②

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王德威尔得来华访问的1930年，正处

①《樊迪文在交大演讲》，载《申报》，1930年10月2日第3张。

②《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第7页。

于十年内战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正大张旗鼓地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和在国统区四处搜捕已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组织。有趣的是，1930年10月23日，《申报》在报导王德威尔得于广州发表“中国宜实现民生主义”的演讲的同时，在同一版、同一栏，紧挨着上述报导的地方，发了一条“厦门捕获重要共党”的消息。对此，王德威尔得却讳莫如深，而且多次声言，不愿就中国现行的政治表示意见。同时，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声明，尽管他在欧洲读过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但是直到现在尚未与其发生关系。作为一个富于政治经验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的王德威尔得，是懂得怎样表明他的心迹的。9月13日，他在北平比利时驻华使馆与某国大使晤谈时，就曾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的党纲，与社会党的党纲相似，它比共产党稳健，这是因为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的缘故。9月29日，在上海与一位友人的谈话中，他又进一步地指出：“中国在革命过程中，内战是此起彼伏，绵绵不息，惟中国社会经济教育事业仍旧进行，此亦足令人十分钦佩。”王德威尔得抵沪后，曾看见当地共产党组织贴出称他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标语。为此，他在9月30日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其事地宣称：“此属冤枉”。同时，他还指出，自己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渠前任比国外交部长时，对中国极表同情，天津比租界之归还中国，渠不无微劳。渠任外长，曾被保守派竭力攻击”云云。^①正因为王德威尔得在上海的表白如此鲜明，国民党政府对他由沪抵宁特别看重，接待规格不断升级，最后成为蒋介石的座上贵宾。

关于国际和平。这是当时世界人民尤其是欧洲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王德威尔得每处必讲的一个基本内容。按照他的分析，在欧洲当时确有法、意关系恶化的苗头，然而他公开地表

^①见《申报》，1930年9月13、30日、10月23日。

示：“在最近的将来无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为此，他以捷克总统所谓“火无燃料不烧”的说法，作为上述看法的论据。首先，他指出，1914年8月，欧洲之所以燃起战争烈火，是因为当时欧洲已满储燃料，“现在，该项燃料均已烧成余烬，烧无可烧，火安由起？”其次，他认为，欧洲人民可以说没有一人不厌恶战争，而且各国军备势均力敌。如果谁去发动战争就须事前各自拉拢、组织联盟、打破均势之后才有可能。然而最近时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眼下，虽有几国政府发表危险性言论，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实际上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魁，以引起一场绝无把握的战争。再次，日益猖獗的德国法西斯的现实危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王德威尔得却表现了一种原国际局内盲目乐观的情绪。在他看来，当时欧洲出现的独裁政治，只是战后之反动。即使极右的希特勒国家社会党在德国选举中获胜，也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将来的欧洲必然是民主政治的天下。^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盲目乐观的估计，王德威尔得出了同16年前国际局基于和平幻想得出的同一结论。实际上，正当王德威尔得大谈最近不可能有世界大战危险的时候，西方的德、意法西斯已经磨刀霍霍，东方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也在酝酿对中国发动战争。不到一年，就在他访华的第2站沈阳，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讲演和私下交谈中，王德威尔得还曾涉及国际联盟、苏俄工农政府、法德关系等问题。在时间上，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已经超出第二国际史的范围。但是，从其实际影响和涉及的问题看，仍和本书前面介绍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密切相关。

^①《樊迪文在沪招待中外记者》，载《申报》，1930年10月1日第4张；《第二国际领袖万德威尔在华演词汇记。世界和平之组织及保障》，载《国闻周报》，第7卷第38期第4～6页。

它直接地反映了当事人——原国际局执委会主席对历史的态度和立场，是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佐证。

三、中国社会党和国际局

1. 江亢虎及其社会主义观

中国社会党的发起者江亢虎，是个政治上多变的复杂人物。他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陶湾江家村的一个仕宦之家。其祖父是前清进士，父亲当过知府并长期在北京供职。江亢虎从小就随侍其父左右，并就读于当时专门培养留学生的北京同文书院，打下了较好的外语基础。1901年，首次东渡日本，在西风东渐的地方接受中学、大学教育，后因病于1904年辍学回国，在袁世凯手下，做过北洋编译局的“总办”兼《北洋日报》“总纂”；不久，又改任刑部“主事”，办过女子学堂。因此，同袁世凯结下历史因缘。1907年，再度赴日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常以留学生代表身分出席日本社会党集会，并通过幸德秋水的译介，阅读了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倍倍尔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由此而对妇女和家庭问题发生兴趣。1909年，赴日本、欧洲考察期间，不仅接触了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的乔治主义、费边主义，而且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曾以“徐安成”为笔名，向在巴黎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投过两篇宣传“三无”（无宗教、无国界、无家庭）社会的文章。通过多方面的接触，到1910年底，江亢虎因奔父丧回国时，已经以社会主义者自命。实际上，他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斑驳陆离的大杂烩。其中，既有乔治主义的影响，费边主义的浸染，又有无政府主义的烙印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印痕，此外还夹杂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

从其信奉的社会主义的性质看，它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社会主义。江亢虎就曾说过，他的

社会主义，是“不偏不倚于极端”的社会主义，即“和平幸福之社会主义，非激烈危险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①由此出发，尽管他同意孙中山实现共和的目标，却反对辛亥革命所采取的暴力、起义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反对他们所采取的暗杀、暴动手段。“无政府主义者以暗杀、暴动、大破坏为先锋，余则大不赞成。”^②从这个意义上说，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更接近于社会改良主义和费边主义。

从其信奉的社会主义的内容看，它并不赞成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学说，而是信奉改良的、渐进的社会主义。同孙中山一样，江亢虎力主不触动私有制，并通过实行“单一税”政策，试图避免资本主义以推行国家社会主义。对于孙中山师承乔治主义提出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即不进行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江亢虎不仅极表赞成，而且在他创建的中国社会党党纲中明确地规定：“本党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同时，他还把孙中山力主的“专征地税”，作为8条党纲之一。所不同的是，江亢虎认为，世袭遗产制度是“人世间一切罪恶之源泉”，破除这种罪恶的制度，是他及其社会党所应完成的任务之一。^③在这一点上，又反映出江亢虎身上的无政府主义烙印。

从其信奉的社会主义的前景看，它并非追求未来的共产主义，而是向往带有浓厚的大同色彩的主观社会主义。江亢虎如同孙中山一样，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一体，而且认为，中国工人尚未达到足以缔造社会主义的地步。所以，现在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传播社会主义，进行启蒙教育。他所鼓吹

① 《社会星》，第2号。

② 《江亢虎文存初稿》，第124页。

③ 《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73、175页。

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大同主义。江亢虎自幼就深受儒学的熏陶，并虚构了“大同之治”的理想。后来经过考察欧洲和日本，发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他原来虚构的“大同之治”，竟“暗合十之八九”。^①于是，他“交通近世之言论”，形成所谓“中国古已有之”、将乔治的“地税归公”即“单一税社会主义”与孟子“井田制”揉合在一起的新社会主义。在1911年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时，他公开宣称：“社会主义者大同主义也”。^②

江亢虎的社会主义观，尽管它来源混杂，观点多变，但是，其中，却贯串着一条主线，即在不触动现存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争取和实现局部的社会改良。正是沿着这条主线，江亢虎把中国古已有之孔孟之道、欧美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思潮揉合在一起，形成了混杂的社会主义观。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和无政府烙印的社会改良主义。同当时欧、美工人运动中正在左倾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相比，显然大为逊色。但是，它在世纪初年的中国，却颇有影响。因此，当江亢虎回国伊始亮出社会主义旗帜时，颇为引人注目。“今人一般人之心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③

2. 中国社会党的创建和分裂

江亢虎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是他访欧归国不久的1911年。这年6月，他在杭州惠兴女校以“社会主义与女学”为题，发表演讲，首次亮出社会主义旗号。因为言词过激，当即被人密报。据此，浙江巡抚下令将其驱逐出境。江亢虎却因此而声名大振。到达上海后，他即仿照日本社会党人办团体

①《洪水集》，第16页。

②《社会党》，第2号。

③《无政府主义资料选》，上册第283~284页。

的办法，于7月10日在张园举行“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吸收了近50名成员，形成未来中国社会党的核心。也是在这个会上，该研究会发表了宣言，自称其信奉的社会主义，即“大同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江亢虎为研究会规定的宗旨是：“介绍西来之学说，发挥古人之思想，交通近世之言论，一以公平之眼光，论理学的论法出之”。^①为了给创建中国社会党作准备，9月初，江亢虎又为之草拟了党纲。

正当江亢虎积极张罗时，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面对形势的突变，为团结工人以为将来的国会选举作准备，江亢虎仿照欧洲社会党的办法，注意从事工人运动。为此曾派出亲信，在南京码头工人和北方一些铁路工人中，倡言组织工人团体。^②1911年11月5日，上海革命党人宣告独立的第3天，江亢虎在上海召集特别会议，决定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由江亢虎拟订的《中国社会党宣告》，针对着民主革命已经胜利的事实，指出“社会革命尤为万事根本”，“社会主义欧美极盛，在中国则本党为最初唯一之团体机关，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会议决定采纳“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破除世袭遗产制度、普及平民教育、振兴事业、专征地税、限制军备”等8条党纲。^③按照会议公议，中国社会党应成为一个以上海为中央本部驻地的全国性政党，江亢虎被推选为本部长，《人道》为党的机关刊物。但是，按照江亢虎的想法，该党不是一个政治党派，只是一个以研究、传播社会主义的教育会社。其作用是通过向当局施加压力以实现其社会主

①《社会星》，第2号（1911年）。

②见《邓中夏文集》，第427~428页。

③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74~175、184、190页。

义政策。

该党宣称，到1912年8月，支部已届400个，党员逾20万；到1913年初，支部达490个，党员52.3万。^①它在上海、北京、天津、苏州、盛泽、南昌、绍兴、重庆、张家口、广州等地，设立了分部。各个分部或支部相继开展了不少活动。其中，包括举行公众集会，讲演“社会主义”、“欧洲社会主义形势”；发行或自办日报、周刊或小册子；开办小学和免费托儿所；组织工会；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下乡巡回演出，宣传社会主义等。该党绍兴分部，在其于上海出版的《新世界》杂志上，专门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保持各地与本部的联系，各支部还从其收入中上缴5%给上海本部。

中国社会党的问世引起广泛影响，首先为孙中山所注目。还在中国社会党成立并公布其党纲不久，1911年12月31日，孙中山应江亢虎之请，曾与之在上海寓所作过交谈。江亢虎介绍社会党的历史和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后，孙中山当即竭力赞成江的看法，并表示，对社会党提倡的社会主义，“必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当江亢虎声称，孙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和专征地税的主张与中国社会党的宗旨相同，孙中山明确地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同时指出，除上述主张外，“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伙”，希望再作长谈。临别时，孙中山对江说，要送几本欧、美最新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给江，“顾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②1912年8月

^①该党党员号称52万之众，无疑过于夸大。据伯纳尔考证，若按出席该党会议和集会的人数计，20~30万的数字仍然可信。

^②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9~580页。两天后，孙中山派人送给江亢虎4本著作：《社会主义概说》、《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地税原论》。

20日，当孙中山获悉，中国社会党上海崇明支部组成地税问题研究会，悉心探讨他所力主的单一税理论一事时，专门去信感谢为之呼应，希望继续努力，同时特意提及：“江亢虎先生峻才雅藻，卓犖一时，发起社会主义，深具救国之婆心。”^①同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又应中国社会党本部之请，连续作了3天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说。在这个长篇演说中，孙中山再次公开地重申他信奉社会主义。他从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入手，高度评价马克思，将其视为是“社会主义之教父”，声称共产主义为一切社会主义之最高理想。同时，孙中山还集中地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纲领，即按照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他认为，乔治和马克思两人的学说，表面上似乎稍有不同，实则互相发明，当彼此并存，互相补充。他赞同共产主义，但怀疑中国人已具有实现这一理想的思想准备；他主张搞社会主义，但是不同意搞“极端的社会主义”，而倡导以土地和资本国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他同情和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党，但是，希望它多参与政治活动，组成强有力之政党，以为实行合法、改良的社会政策而努力。^②

孙中山为对付日益严峻的、来自袁世凯的威胁，对于拥有相当力量的中国社会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有统一思想、严格组织的政党。它的党员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既有地位低下的“戏子”、工匠、失业者，也有来自士绅阶层的大学生；既有江亢虎这样颇怀野心的政治家，也有如李大钊（当时为中国社会党天津分部干事）这样冲破旧的藩篱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由于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该党成立伊始，就蕴含着严重的分歧，集中地反映在党纲和党的

^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14~02页。

^②详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524页。

作用问题上。1912年10月，该党在上海召开有58个支部代表出席的第2次大会。会上，形成两种尖锐对立的主张。一部分持国家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提议将党变成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改良政党；一部分拥护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则认为党纲不激进，应予修改，以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争论中，江亢虎试图中立和调停。他提议，将党分为“无治党”和“民主党”，都冠以“中国社会党”之名，均须遵守原来的8条党纲，并在《规章》中加入合法活动和党员得从事政治活动的条款。11月，该党制定的《中国社会党规章》，体现了江亢虎的这些想法。但是，江亢虎关于将党一分为二的计划由于没有人支持而未果。①《规章》规定：“中国社会党为社会党在中国组织之团体。”它重申8条党纲，并以讲演、鼓吹社会主义，交通各国社会党加入世界社会党大会、联络中外宗旨相近之团体等为任务。此外，《规章》还规定了党员的条件、权利、义务以及党的经费、领导机关和联合大会制度，从而使该党的组织进一步完善。②

以年轻的医科大学生沙淦（愤愤）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和党的纲领，十分不满。在第2次大会上，他们对江亢虎的理论和党的纲领策略作了严厉抨击。由于分歧严重、裂痕很深，会后，沙淦等决定与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分离，另行组建“纯粹社会党”。该党以“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以“消灭阶级、实行共产、尊重个人、教育平等、破除界限、国无远近、无亲疏、无迷信”为纲领，党的任务是：“鼓吹（杂志、书籍、讲演）、破坏（实行铲除强权、预备世界大革命）、建设（育婴院、幼稚院、学校、医院、养老院、农工场、公园）”，

①见《无政府主义资料选》，上册第301页；另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208～209页。

②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73～174页。

并对党员规定了“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充军警、不奉宗族、不称族姓、不婚姻（已婚姻者，以二人同意解除夫妇名义）”的“六不”戒约。^①

“纯粹社会党”发起不久，袁世凯即于1912年11月13日接获大总统府秘书厅转呈的私立侦探团的报告，内称该党“即无政府党之变相”，希望政府注意。据此，袁世凯以该党“实行共产，铲除强权，必至劫掠煽乱。解除夫妇名义，必至灭伦伤化。至预备世界大革命，则意在破坏现存之秩序，为万国之公敌”为由，下令按法律严行戒禁，“以遏乱萌”。^②

“纯粹社会党”被戒禁后，中国社会党仍然存在，继续办报，并向国会呈递一系列阐释、修正其纲领的请愿书。1913年春，江亢虎专程去北平，竭力拉拢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议员，以在国民会议中通过社会党的提案，由于袁世凯同孙中山对立日益严重而未果。同年，中国社会党在上海举行庆祝“五一”的集会上，还请一位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作关于比利时形势的报告。

7月5日，又专门成立了万国社会党（第二国际）上海俱乐部，拟每月举行两次会议。与此同时，“纯粹社会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两个激进团体，也举行了一次揭露袁世凯政府横征暴敛劣迹的公众集会。^③

为了使中国社会党生存和继续发展，江亢虎利用他同袁的老关系，竭力吹捧袁。以前江曾称袁“不仅为中国之伟人，而为全球之伟人”；1912年4、5月间，江又数次上书向袁表白，他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性质的，对政府“有利无害”，并面谒袁世凯，要求实行国家社会主义。1913年3月，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准备以

①《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86~187页。

②《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85页。

③参见《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8页。

武力镇压孙中山等革命派。为此，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江亢虎却倒向袁世凯，反对“二次革命”，鼓吹宋教仁谋杀案应依袁世凯政府的法律“谋正当的解决”，并专门发表《本党对宋案借款两事反对兵力解决宣言》。所有这些友好的表示和忠顺姿态，仍然没有使中国社会党逃脱被取缔的厄运。

3. 加入第二国际的尝试

中国社会党及其各分部成立后，一直未被当局所承认。1912年7月18日，内务部以“该党宣告、规章有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等语，核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三款人民有保有财产之自由之规定相抵触”为由，规定“该会党所请立案之处，应不准行。”为此，江亢虎于7月26日、上海本部及苏州等分部于8月初，曾向有关警厅作过说明。8月23日，内务部仍以该党在“社会主义名称之下含有破坏现社会之主张”为由，通行各省不准立案。^①在此期间，江亢虎花了很大的精力周旋于许多政要之间，确曾收到一定效果。袁世凯听了他的社会主义陈述后，“颇为动容”，还打算给他安排个官职；^②当时的总理赵秉钧，也深信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决为有利无害”，“断不可加以压抑”；在武汉的黎元洪，对江“改容优礼”，允许该党湖北支部“一律复兴”。^③尽管如此，当局对该党仍有戒心。1913年4~5月间，直隶行政公署以在逃女犯的秘密活动和查出的《无政府党纲》，均与社会党密切相关为由，呈报内务部后，于7月4日强行解散该党的天津分部；北京分部负责人和北方党务主持

①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176~185页。

②见《民铎报》，1912年7月30日。

③见《洪水集》，第80页。

人陈翼龙，由于反对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反动措施，并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积极联络起义予以配合。结果被发现，于7月25日被捕，8月4日被处决。警厅从中国社会党北京分部搜出该党“沥血宣誓，骨肉勿告”的秘密简章。其中规定：以军用票充作活动经费；从其骨干中选拔起义的临时官佐；由女党员组成“流行敢死团队”。此外，还搜出陈翼龙一本记有联络外国党徒和同志便于乘间起事的日记本。据此，京师警厅于8月15日，向内务部报告：“查社会党既系乱党机关，证明有案，自应克日解散，以杜乱萌，而保治安。”它要求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即日勒令解散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总机关暨各处支部。^①据此，袁世凯于8月7日，颁发解散中国社会党令。该令指控中国社会党“勾通外国虚无党，妨碍国际和平情事，显系倡乱行动，迥非文明各邦所称社会党研究学理者可比，若不从严禁止，必至酿成巨患，破坏大局。”该令要求严行查禁所有社会党本部、支部；与该党类似扰害煽乱者，也勒令解散，分别惩处。^②

中国社会党，本来就不甚严整，袁世凯禁令一下，即作鸟兽散。正如当时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所描述的：“中国社会党已经纷然而散，溃不成军了。那40万党员，仅只剩下20或30人还敢谈论社会主义，而这些人且有若干位正参加到我们中间来。”^③在解散令下达后，中国社会党于8月31日，秘密召开非常会议，经讨论，决定推选派遣江亢虎去国外，以同其他社会党建立联系，并出席拟于191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后来，江亢虎并没有直接去欧洲，而是改道去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当

^①见《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202~204页。

^②见同上，第205~206页。

^③见Paul Gun的信件。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东方》，第58页。

上了中国文化课程的讲师。^①

对于中国社会党，国际局曾密切地予以关注。开始获悉该党成立的消息时，国际局内许多人认为，该党并不是一个政党，更非社会主义政党。因此，不同意接纳它加入第二国际，直至它在自己的纲领中加上如下条文：“一切生产与交换资料都应成为公共财产”才予以考虑。1912年11月间，该党公布《规章》之后，驻沪的一位英国记者杰·阿·杰克逊，曾向国际局发出一封信，内称：“这里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小政党，我正在把他们的章程（指《规章》——引者）译成英文，……不幸的是，该党已经分裂，出现了一个其观点更为激进、成员更为纯粹的小政党。”^②国际局1913年的工作报告也曾提及此事。《报告》说：“上海（中国）成立了一个社会党。可惜它分裂了，而两个组织都要求加入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我们把有关的程序告诉了他们，同时希望他们先联合起来。”^③这个报告表明，国际局确实了解中国的事态发展，中国社会党及分裂后形成的“纯粹社会党”同国际局都有过直接联系，了解国际包括国际大会筹备的情况，并进行过加入第二国际的尝试。只是由于袁世凯的取缔，两个社会党未及联合起来就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还有一个史料足以证明中国社会党同国际局的交往。1914年，在筹备即将于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大会时，国际局书记处曾提及：“连过去从未派代表出席过大会的国家和大陆，这次也宣布参加，包括中国、波斯以及许多拉美国家。”^④在拟参加的国家中，中国被列于首位，足见国际局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同时，这也和中国社会党非常会议关于派

①参见《第二国际和东方》，第117～118页。

②转引自《第二国际和东方》，第118、56页。

③见《未开成的代表大会》文件部分。

④《未开成的代表大会》文件部分。

江亢虎出席这次大会的决定相吻合。只是江亢虎并未履行其使命，维也纳大会也没有开成，因而中国社会党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终成一桩令人惋惜的历史遗案。^①

四、世纪之交中国舆论的反响

1. 《万国公报》等刊物对国际大会的介绍

由外国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虽然印数不多，发行范围有限，却在知识界和政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向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党人介绍了在西方工人运动中广为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最先向中国人提供了第二国际及其代表大会的信息。第二国际成立大会闭幕不久，该报即于10月第9册上，发表江宁陈奠生写的关于介绍《德国百工保险新法》（“劳动保护法”）的文章，率先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国家劳动立法的情况。^②这可算是对国际巴黎大会作出的关于国际劳动立法决议的最早反应。从1890年1月开始，《万国公报》开始转发欧、美国家有关西方劳工运动的消息，特别是关于庆祝“五一”和国际工人阶级为争取国际劳动立法、实现8小时工作日的斗争。^③由此开始，关于第

^①1920年底，江亢虎从国外考察回来，遂在北京著书演说，并在京津一带鼓吹无政府主义，筹组工会，开展罢工运动；1924年6月，他以宣扬“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为旗号，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发表《中国社会党复活宣言》、《中国社会党主张》、《中国社会党组织大纲》等文件。详见《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②《万国公报》，第9册（1889.10）。

^③见《万国公报》，第12册（1890.1）第24页；第18册（1890.7）第24页；第24册（1890.12）第26页。

二国际及其代表大会的消息，逐渐地在中国传播开来。

最早向中国人专题介绍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情况的，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伦敦代表大会结束不久，该报即于1896年9月27日，在“东方报评”栏内，依据日本《国民新报》的消息，以“社会党开万国大会”为题，专门介绍伦敦大会的情况。在简要地说明大会一般程序后，它着重地转述了大会关于以公费对工人及其子弟进行教育、关于禁止18岁以下童工的夜班劳动、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废除常备军等决议。^①令人遗憾的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时务报》被迫停刊，关于国际大会的专题介绍也就此中断。

1905年5月，孙中山与国际局领导人直接接触之后，中国舆论尤其是革命党人的报刊，对第二国际及其代表大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个时期中，各报刊除了对国际大会作简要报导外，已注意对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作连贯、系统、专门的评述。在这一方面，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挥了先导作用。1906年7月，该报第5号发表强斋（宋教仁）编写的题为《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的长文。它从简述1877年根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开始，实际上向读者介绍了各国社会党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为排除各种干扰创建第二国际的历史进程。尤为可贵的是，它按照历史顺序，集中地评述了1889~1904年间国际前6次代表大会的进程和结局，给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关于第二国际最为完整的历史概貌，也为我们今天了解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国际观，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宋教仁的“史略”，在评述国际及其代表大会时，有几点特别引人注目。关于第二国际（当时称“万国社会党”）的历史根源。“史略”认为，“欲知万国社会党之起源，则万国劳动者同

^① 《时务报》，第6册（1896. 9. 27）。

盟（指国际工人协会一引者）其嘴矢矣。”它肯定地指出，第二国际继承了在马克思指导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开创的光荣传统。因此，“史略”把1889年7月召开的巴黎国际大会，强调为“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复活”。同时，“史略”强调，第一国际是“无政府党（巴枯宁派）”同“社会党（马克思派）”分裂的结果；而第二国际却是国际社会党人战胜“无政府党”、排除“与马尔克（马克思）派尤为势不两立”的“可能派”的必然产物。关于巴黎大会的“五一”决议，“史略”认为，“五一”起源于1886年5月1日北美劳动者争取8小时工作日运动，但是，“以5月1日定为万国劳动者团体之大示威运动日，此因巴黎马尔克派大会之所决议。”同时，“史略”指出，尽管欧、美工人阶级庆祝“五一”一般都采取了和平示威的形式，它“实为激烈革命运动之第一步”。这种斗争形式正在逐步扩展，“逐年赴于旺盛之途。至于泰东之日本，亦闻风兴起焉。”关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史略”在评述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时，突出地介绍了日、俄两国社会主义者不顾两国政府正在进行战争而握手和演说的情景，并且指出，日、俄社会主义者在大会上显示的团结，“实世界社会党发达历史之可大书特书者也。且不仅对于世界之同志而已，实对于世界各国之君主贵族富豪绅士及一切之阶级而表示社会运动为世界一致之运动者也。”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宋教仁在这里强调的世界社会运动的一致，即国际团结的精神，并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太平大同之主义”，即“无国界，无阶级，只以纯粹之人道与天理为要素”的空想社会主义精神。关于国际内部论争，“史略”评介了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社会党策略国际准则的辩论，回顾了德雷福斯案件和米勒兰入阁所引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叙述了在德、法、意党内部的激烈论争以及围绕是否接受德党德累斯顿决议的尖锐冲突，并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德累斯顿决议为第二

国际及其主要成员党接受一事表明，国际中的“硬派”（马克思主义者）由此而成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中心，而“软派”（改良主义者）“几如疾风扫叶虽有残存亦无几许矣”。在宋教仁看来，国际内部的激烈论争，“社会党似乎有内部轧轹之患，固有令人不无遗憾者矣”。然而，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一国一党以加强社会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决议案“竟被全体一致之通过”，“仍足以见社会党公德心之圆满，而团结力之强固矣”。在远隔万里、音信难通的中国，不被激烈论争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仍坚信和肯定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和巩固，对于宋教仁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它却符合第二国际历史发展的实际。①

在1905年前后，中国舆论不仅密切注视国际大会的进展，也对国际各成员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十分关心。继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日本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德、俄等社会党情况之后，1904年10月，《大陆》报对意大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的代表大会情况还作了专门报导。这些报导，除了具体地描述大会盛况、党的发展以及该党内部就大政方针问题进行的争论外，还突出地评述了比利时党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情况和为争取普选权尤其是争取妇女普选权的情况。②同时，《大陆》报从评述意大利党内斗争中，得出了与改良派妥协“实为腐败之根源”的结论。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的公开分裂，在中国舆论界同样引起了关注。对第二国际及其代表大会的评述，也随之进入

①以上引文，均见《民报》，第5号（1916年7月25日）。

②③见《大陆》，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出版）。
《大陆》指出，比利时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已有“百十三个之协会，一万五千之团体。去年因反对军备之事，颁布小册子三十六万部、杂志十万部，开演说会六百次。”

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期间，《晨报》、《东方杂志》、《星期评论》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述第二国际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再满足于就国际评国际，而是力图将第一、第二、第三国际作历史对比，并从中触及到第二国际史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看待第二国际的公开分裂，便是其中之一。李汉俊在《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一文中，从分析第二国际特别是德、奥、法、英等社会党放弃革命原则、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事实入手，指出他们“牺牲了万国同盟的精神，作了资本家阶级的政府的走狗”。据此，他认为，“第二万国同盟（即第二国际——引者）也就无形消灭了”。①《共产党》发表的《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一文，也持同一观点，认为“第二国际是残杀劳动界凶手的组织，是资本家代表的组织。而第三国际是最有进步工人的万国联工会。”不同于李汉俊，这篇文章的作者强调，“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思想上的战争已经快完了，第二国际道理上已经完全打败了。”（着重号系引者所加）②与上述两篇文章看法相左的是，有的作者认为，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发生了公开分裂，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消灭。

《时事新报》副刊发表的《第三国际述评》的文章，针对着第三国际关于第二国际从世界大战开始即已消灭的说法指出：“第二国际至今还依旧存在，时与第三国际意见上发生冲突。近来第二、第三、第四（指维也纳国际——引者）三国际，曾在德京柏林开联席会议。可知第三国际诋毁第二国际之‘消灭’二字，充其量，也不过说他‘名存实亡’罢了。我们要明白，第二国际并没有消灭。”③在当时一片指责第二国际、歌颂第三国际的声浪中，象如此

①见《星期评论》，第51～53号，1920年5月23日～6月6日。

②见《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

③《时事周报》副刊，1922年10月22日。

客观的分析，尚属凤毛麟角。

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中，还论及到三个国际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作用问题。《晨报》发表的《新共产党宣言》，从评述共产国际“一大”及其宣言入手，将三个国际作了历史对比，并初步揭示了它们不同的特点和作用。该文指出：第一国际“不过是劈头一棒，初露端倪”；第二国际“不过是聚集千百万工人，训以组织方法”；第三国际“乃是要取公开行动，实行社会革命”。^①这种评述，尽管有失实之处，但是，仍不失为对三个国际历史发展特点和作用问题探讨的一种宝贵尝试。

2. 对国际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反应

报导欧美工人的罢工斗争，并非自第二国际时期开始。早在19世纪70年代，《普法战记》、《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史记》、《富国策》等译著和《万国公报》等，陆续作过介绍。这些介绍主要来自传教士的口译笔述，其间不乏贬诬甚至攻击之词。当然也透露了有关西方劳资冲突和工人运动的消息。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情况有了变化。随着中国人日益走向世界，向西方请教，特别是孙中山、梁启超等志士仁人的直接接触和考察，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欧、美国家文明进步背后的尖锐矛盾，亲眼看到“社会革命日炽”的活生生现实，并通过公众媒介，传递了许多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信息。国际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1897年，梁启超在他所辑录的《富国养民策》^②中，就曾通

^①《晨报》，1919年8月7～11日。看来，作者立论主要是依据列宁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详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3～281页。

^②该书录自《西政丛书》，1897年慎记书庄石印。

俗地讲述过工人罢工的原因、内容以及工人相互支援的情景。同一年，他所创办的《时务报》，又比较早地报导了英国机械、纺织、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1896年俄国彼得堡工人同盟罢工所作的客观评述。彼得堡3.5万工人，为了缩短劳动时间而倡议罢工，当即得到10万建筑工人的声援，遂成同盟罢工。其势浩大，迫使沙皇政府不得不于第2年颁布缩短劳动时间的新法律。1901年的《清议报》，专门发表了梁启超题为《俄人之自由思想》的译文进行评述。该文认为，这次罢工虽然收获很少，然而其意义十分重大。这次同盟罢工是一个新的起点。经过斗争，工人完全可以迫使政府颁布符合自己意愿的新法律。这次罢工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而且又文明地进行斗争，主要是“有识人士为之尽力，而大学生实为其中中心点”。罢工之后，俄国各大城市建立了工人团体，并在此基础上，于1898年“合各都会之同盟为一大同盟，称为俄国共和党。”最后，该文颇有远见地写道：俄国工人运动及其所产生的俄国党，“其范围若何之广，其势力若何之强，虽可不计，然俄政府虽竭力与之战，而不能灭之”。^①该文对1896年彼得堡同盟罢工及其意义的评述，实际涉及到了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有识之士为之尽力，而大学生实为其中中心点”）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和党”）的成立问题。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能接受并宣传这样一些观点，是值得称道的。

1905年俄国革命，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之强烈是空前的。彼得堡流血事件发生不久，1月30日，《新民丛报》即以“禧禧！出出！俄国革命”为标题，几乎是逐日对事态发展作出反应。紧接着，《万国公报》于2月、《大陆》于3月、《东方杂志》于

^①见《清议报》，1901年。

1906年2月，开始作集中跟踪报道。有的报刊，如《万国公报》，还就事态的发展发表专论文章；《东方杂志》以《一千九百零五年各国事记》、《新世纪》以《万国革命之风潮》为题，收集和综述1905年俄国革命的国际影响。一时，革命、罢工几乎成为中国舆论的中心话题。还在革命开始时，面对着工人罢工斗争所形成的“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路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犴鞬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目，全球桥舌”的壮烈场面，《新民丛报》就曾指出：“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①《万国公报》指出：“旁观者审俄国之历史，与其今日之现状，则如俄政府苟不及早变计，从其人民所愿欲。曩时法国大革命之祸，不能免也。”^②

宣传国际工人阶级的总同盟罢工（总罢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舆论界的重要议题之一。这固然同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日益高涨的反战斗争相关，也和坚信以总同盟罢工来实现无政府革命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努力分不开。还在1907年，刘师培就曾为张继编译的《总同盟罢工》一书作序，竭力为之鼓吹。^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师复在《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中倡议，利用当时奥、塞之间战争所构成的对欧洲和平的威胁，“与工团党及反对军备党携手运动，实行万国总罢工，则吾党之进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④由于欧、美罢工斗争方兴未艾，不仅无政府主义者为之鼓吹，其他社会主义者也显示了满腔热情。

①《新民丛报》，第61号（1905年1月20日）。

②《万国公报》，第193卷（1905年2月）。

③《无政府主义资料选》，上册第118~120页。

④《无政府主义资料选》，上册第303页。

1912年3月，由英国开始的欧、美矿工总罢工，很快就在中国报界得到反应。从5月开始，《东方杂志》、《新世界》等报刊，转译外论，以“欧洲矿工大罢工”、“劳动界之新革命”为题进行评述。和前一时期报导俄国1905年革命中的罢工斗争不同，有的报刊已触及总罢工和无产阶级革命前景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东方杂志》指出，这次总罢工，“其规模之宏大，与英国各阶级之非常痛心，其耸动世界之视听，及其举动之稳静，皆为前如此未闻。”它表明，“今日之劳动运动，已从国民的范围进于国际的范围。”^①有的文章认为，这次罢工旷日持久，声势浩大，是“受新革命之影响”，“新革命之兆朕，已弥漫于这次罢工之中。”按照文章作者的看法，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德、美的矿工罢工，都是这种新革命的一部分。它不限于一洲，而是普及于全世界，“盖实最大之社会革命”。它一旦成动，“必资本家之权力尽归工人，各种工业皆由各业工人自己管理，而后达革命之目的。”同时，这种革命的提倡者还主张采用强迫手段。^②实际上，当时一些中国报刊，从英国及其他欧、美国家矿工总罢工中，已经得出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将来临的结论。

此种认识，在十月革命后欧、美、日本所掀起的世界性罢工风潮中，似乎得到印证。1919年9月，《民国时报》从日本兵工风潮日渐扩大的事实中，就曾指出：“今则工人公然与政府当局对抗。武力压之不屈，甜言诱之不从。此实日本社会上之大变革，将来如何趋移，甚可注意。”^③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在1918～

①《英国煤矿工人之同盟歇业》（译自日文报纸），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1912年8月1日）。

②《劳动界之新革命》（译自美报），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2号（1912年7月14日）。

③《民国日报》，1919年9月6日。

1920年间，中国许多报刊对当时欧、美、日本的罢工，尤其是同盟罢工，倾注了满腔热情。为此，《民国日报》于1919年6月，对欧、美罢工风潮作了连续报导。《太平洋》杂志，于1920年1月，发表《同盟罢工论》，历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两个月以来世界同盟罢工“恶潮披昌，弥演益厉”的事实，并认为“大战虽终而阶级战斗之烈，固方兴未艾也”。①《少年世界》，还对1919年欧、美、日本罢工，作了详细统计，并从中得出下述结论：“1919年，是罢工的年，1919年的世界，是罢工的世界。”②为了说明总同盟罢工的发展趋势，《少年中国》对1838~1922年间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30次总同盟罢工，作了分析。其中，属于政治性的13次，经济性的17次；成功或部分成功的14次，失败或无结果的16次。文章作者依据这些事实指出：“总同盟罢工这出戏，自最近半世纪以来，已经演得有声有色了。”③

3. 中国人心目中的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随着第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人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国社会主义者在了解德、法、俄、比、意、美等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同时，也逐渐地熟悉这些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理论家，已受到人们的推崇；倍倍尔、阿德勒、饶勒斯、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常为中国报界提起。他们的著作和活动，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一样，受到中国读者的尊

①《太平洋》，第2卷第3号（1920年1月5日）。

②《日英美罢工风潮》，《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1日）。

③《少年中国》，第3卷第10期（1922年5月1日）。

重，为知识界、舆论界所传诵。不过，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者来讲，在第二国际诸多代表人物中，最富影响和威望的，莫过于德国党的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第二国际中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且他们在德国革命高潮时期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和最后为敌手杀害的悲惨遭遇，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无比的尊敬和深厚的同情。

中国人民是透过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严峻考验认识李卜克内西的。1918年4月，《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称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反对战争主义之领袖”、“廿世纪的马丁·路德”。1914年，当德国发动战争，正是李卜克内西“当众人附和之际，（彼）独能挺身起立反对战争。”^①同时，作者简要地回顾了李卜克内西反对军国主义的实践活动，并介绍了《论军国主义》一书的主要内容。卢森堡则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高潮中作为“过激主义”的代表人物，介绍到中国来的。1918年11月21日，《民国日报》根据上海顾家宅无线电台收到的消息称，在德国革命中，只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所领导的一个小党，即斯巴达克派，“抱激进主义”，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许资产阶级加入政府。^②1919年1月15日，当斯巴达克派组织的游行示威被反动军队镇压、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同时被捕和遇害的消息传出，《民国日报》于1月19日根据法国里昂17日电，对两人的惨死作了报导；1月26日，《晨报》和《每周评论》继报导消息之后，“以二氏生平奋斗事迹不可湮没”，专门发表《惨死之德国过激派首领小

^①《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1918年4月）。此处系指1914年12月帝国国会就军事拨款案表决时，李卜克内西只身一人投反对票，并拟发表反对战争的讲演。

^②《民国日报》，1918年11月21日。

史》，略述了两人从事革命的一生。^①从此，这两位德国革命家被越来越多的报刊所介绍、称颂。同时，他们的思想理论和著作，也逐渐在中国人民中传播开来。

真正地对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作出正确的评论，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事情。1922年1月15日，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殉难3周年。为表示对这两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怀念，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团体，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在上海，曾举行有上百人包括来自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友人参加的纪念会。陈独秀和日本朋友讲话，号召学习两位先烈的斗争精神，强调他们的思想永存；在北京，一批青年举行哀悼纪念活动；广州、长沙、武汉也举行了类似纪念会。与此同时，一些报刊发行纪念专刊和文章表示哀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机关报《先驱》，以4版的篇幅出《李卜克内西纪念号》，向中国读者作全面介绍。在“本社同人”撰写的《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文中，作者认为，纪念他们，就是要以其为榜样，树立献身精神，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不仅仅是崇拜他们，而应和他们一样思想行动，努力去实现他们已在自己国内实行了的东西。“纪念专号”刊登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小传、6张照片，并向中国读者首次摘要介绍了李卜克内西的两封家书、一篇文章和卢森堡在德共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该报记者在读后感中强调，要做一个象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这样真正的革命家，必须有奋斗的精神和深渊的学识，两者缺一不可；应象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坚信社会主义不是靠法令，不是靠政府，而是靠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人民来实现。通过这样的介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清新的理论思想。^②

1923年1月15日，《先驱》再度出专刊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

①《晨报》，1919年1月26日。

②见《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内西，而且同纪念被湖南军阀杀害的黄爱、庞人铨结合起来。①题为《四个死者，一个精神》的文章指出，尽管他们4人遇难时的情况不同，对手也不太一样，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革命精神，却完全相同。这种精神，就是“始终一贯、百折不挠、牺牲一切，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而奋斗的精神”。他们英勇地献身了，他们的精神却“活泼泼地流动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血管里！”专刊发表了庞、黄小传，并发表题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长文。这篇文章，从“李卜克内西及其青年时代的活动”、“卢森堡的为人”、“战争勃发和非战活动”、“斯巴达克的厥起及其碰跌”、“革命运动的牺牲”等5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评述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再次向读者介绍了他们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和《资本积累论》等名著。令人感兴趣的是，专刊首次发表了一位中国妇女写的《卢森堡和中国女子》的文章。作者以满腔的热情，称卢森堡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而牺牲的女先锋”，认为在开展妇女运动中，应“使一切女子和一切男子都由财产的压迫和男女竞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要急起直追这为无产阶级牺牲的卢义(森)堡！”文章最后强调，“卢森堡是坚信社会主义的一个，他的死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死。姐妹们，我们要社会革命、经济革命，非明白认识社会主义不可，非坚信社会主义不可②。”这篇文章，代表了早期中国妇女运动活动家的心声，也是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的代表人物在中国

①庞、黄是湖南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因组织罢工，被湖南军阀赵恒惕于1922年1月17日杀害。被害时一个25岁，一个24岁。《先驱》于1923年1月出专刊时，适逢庞、黄遇难一周年。

②《先驱》，第15号（1923年1月15日）。

妇女中得到的最初反响。

从20年代初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中国革命者熟识起，他们的业绩和精神就成为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一股力量。定期纪念这两位革命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传统。

4. “五一”在中国

中国人对“五一”这个名词并不陌生。早在国际工人阶级于1890年首次统一行动为争取劳动立法而举行示威游行集会时，消息即经《万国公报》等报刊传到中国。到本世纪初，“五一”这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节日，越来越为中国人所熟识。1904年，《大陆》曾广泛地报导过日、英、法、美、德等国数以万计工人参加的“五一”庆典，并称它为“世界劳动者之祭日”；^①1909年，《新世纪》以“五月一日风潮小记”，详述了世界瞩目的巴黎14万工人在总工会组织下开展的反对军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府的示威、集会和讲演活动。^②1914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师复，还曾撰文充分肯定每年一度的“五一”活动必将有益于“工党之进步”。^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经过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中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日渐成熟，遂将“五一”活动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此之前，诸如香港、广州、哈尔滨等城市，由于倡风气之先，举行过有少数人参加的庆祝“五一”活动。但是，真正有影响的庆祝活动，还是1917年以后的事情。

1918年5月1日之前，《劳动》杂志即于4月20日发表《不

①见《大陆》，第2年第9号（1904年10月28日）。

②见《新世纪》，第96号（1909年5月8日）。

③《五月一日》，载《师复文存》。

入清人之梦之五月一日》和《五月一日之产物》两篇文章，公开号召“直接行动”，“为争固有之权利，与侵夺吾权利者奋斗”。^①“五一”这一天，北京的知识界还散发了纪念传单。5月20日，《劳动》杂志就上海当局在5月1日这一天向小贩加捐一事提出抗议。^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五一”已不再是报刊议论的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而是实际地展开了纪念活动。5月1日，广州机器总会、雄球织丝厂、士敏土厂、兵工厂、印字行、茶居行、理发行、广东工团、共和工党、东山铸像公司、等团体和各级记者等，共160多人，举行“劳动圣节纪念”。会上，发表了关于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业余教育和工人当家等内容的演说，中间还举行化装舞会，气氛甚为热烈，为“广东空前之盛举”。^③以此为标志，中国工人开始了自己庆祝“五一”的活动。

同上年不同，到1919年，《晨报副刊》出了《劳动纪念专号》，从而开了中国报纸首次纪念“五一”的先河。其中，尤以李大钊写的《“五一节” May Day 杂感》引人注目。它简要地叙述了“五一节”的来由和内容并明确地指出：这“是世界工人党第一次举行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告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圣经典颁布的日子。”在文章的最后，李大钊写道：“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④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920年5月1日，上海、北

① 《劳动》，第1卷第2号。

② 《劳动》，第1卷第3号。

③ 《劳动》，第1卷第5号。

④ 《晨报》，1919年5月1日。

京、广州、汕头、九江、漳州、唐山、哈尔滨等地的工人，举行了全国性的庆祝“五一”活动。

上海，还在3月14日，即由《星期评论》出面，为发行“劳动运动纪念号”征稿；①4月18日，着手筹备并按照陈独秀等人的主张，将纪念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特请陈独秀讲演“劳工要旨”；4月26和27日，发出“纪念五一”的传单和《上海工界之‘五一’纪念宣言》。②纪念大会，原定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由于军阀派出军警进行压制和阻挠，两次变换地址，最后只好在靶子场后一块荒地举行，原来与会的5千人也只剩下几百人。尽管如此，与会者仍然情绪饱满。这次大会，是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发起筹备，有5人在会上发表讲演，阐述“劳工神圣”、“改善工人生活”、“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等主张。演说之后，工人挥舞小红旗，高呼“劳工万岁”、“中国工界万岁”等口号。③为表示对军警的抗议和工界的态度，会后经发起大会的团体议定，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答俄国劳农政府之通告》。“宣言”指出：“从今日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精神，已经足以使压制我们的人胆战心惊。”它最后指出，明年的5月1日，将“再表示我们的勇气和人格”。④“通告”要求苏俄政府，给予“很猛烈的援助”，并决定同苏俄政府同力合作，以担负起“创造新

①《星期评论》（沪），（1920年3月14日）。

②见《时事新报》，1920年4月20日；《新闻报》，1920年4月29日。

③见《新闻报》，1920年5月2日。

④见《新闻报》，1920年5月3日；《时事新报》，1920年5月3日。

的、美丽的、永久的人类世界这个责任。”^①

为了配合全国性的“五一”纪念活动，各地许多报刊发行纪念专号，发表纪念文章。^②其中，包括上海《新青年》杂志发表李大钊写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第7卷第6号）、《新社会》的《什么是五一的纪念？》（第19号）、《晨报》的《劳动纪念小史》（1920年5月1日）、《民国日报》的《法国之劳动纪念日》（1920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周刊》的《劳动节祝词》和《“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第14号）等。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明确地指出，“五一”纪念日是一个“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的纪念日”。他认为，1886年5月1日，是“全美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为欧洲劳工团体所采用，“是在1889年在巴黎开会的万国社会党大会里决定的。”^③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在5月1日这一天举行纪念集会，上街演讲宣传，高呼“劳工万岁口号”，挥舞写有“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等字样的红旗，并在市民和长辛店工人中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里。”^④

1920年，波及南北、震动全国的“五一”纪念活动，其规模空前，涉及的方面广泛，提出的问题也极其尖锐。上海工人，除

①②《时事新报》，1920年5月3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

③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的纪念专号除发表文章外，还刊登了工人生活图片32幅、工人亲笔题词12幅，介绍了俄、日、美等国的工人运动，报导了香港、上海、北平等17个省市、地区的劳动状况和工人斗争情况。

④原件存南京史料整理处。

了在纪念大会上提出“每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8小时”的要求外，还在传单中号召：“联合起来，推翻政府和资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不许地主和资本家存在，废除法律、宗教和结婚仪式。”^①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次庆祝活动，除了个别地方有共产主义者参与筹划外，主要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严格地讲，1920年的“五一”活动仍然是文人运动。这种情况，从1921年起开始改观。1921年5月1日，在邓中夏领导下，长辛店工人举行“五一”活动，并成立了长辛店工会；1922年5月1日，在刘少奇、李立三领导下，安源工人举行游行，并成立了路矿工人俱乐部。以此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崭新的斗争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从此，“五一”在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①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4月30日）。转引自《中国工运史料》，1979年第1期（总第9号）第152页。

附录（王素萍编）

1、第二国际历史大事记要

（1889.7~1923.5）

1889年

- 7月14~21日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在巴黎举行。
- 7月15~21日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可能派大会）在巴黎召开。
- 7月18~19日 国际矿工代表会议召开。
- 7月 制靴、制革工业工人国际工会书记处成立。
- 8月12日~9月14日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并成立工会。

1890年

- 5月1~4日 欧、美工人首次庆祝“五一”。
- 9月30日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
- 10月 法国工人党和工团联合会分别通过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
- 1890年 英国新工联成立“争取8小时工作日和国际劳动立法同盟”。

1891年

- 4月27日~5月5日 德国鲁尔矿工罢工。
- 5月 比利时工人党通过关于总罢工的决议。
法国发生屠杀庆祝“五一”工人的“富米惨案”。

- 5 月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秘密庆祝“五一”。
- 6 月28日 奥地利工人党通过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
- 8 月16~22日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2次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
- 8 月 机器工人召开第1届国际代表大会。
- 10月14~20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爱尔福特纲领》。

1892年

- 5 月3~9日 波兰罗兹工人举行政治总罢工。
- 5 月 欧、美工人举行“五一”示威。
- 8~10月 法国卡尔莫矿工政治罢工。
- 9 月24~28日 法国党讨论土地和总罢工问题。

1893年

- 4 月11~18日 比利时25万工人开展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
- 6 月15日 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所获票数居各党首位。
- 7 月9日 维也纳5万工人为争取普选权而示威。
- 8 月6~12日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3次大会）在苏黎世举行。
- 8 月 五金工人国际情报局成立。
- 8~9 月 法国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获44万票、50个议席。
- 10月22~28日 德国党科伦大会讨论工会与党关系问题。
- 10月24~27日 奥地利工会通过关于反对总罢工的决议。
- 12月 美国劳联通过包括要求法定8小时工作日

在内的纲领。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发动采石工人总罢工。

荷兰社会民主联盟通过关于无条件地拒绝议会选举的决议。

1894年

3月25~31日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通过关于总罢工的决议。

3月 瑞典社会民主党通过关于政治罢工的决议。

6月1日 德国党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率先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

6月26日 美国普尔曼公司10万工人罢工。

9月14~16日 法国党通过新的土地纲领《南特纲领》。

10月21~27日 德国党讨论土地问题和垄断组织问题。

11月底 恩格斯发表《法德农民问题》。

1895年

3月6日 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全面阐述议会斗争思想。

8月19~23日 第1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合作社国际联盟。

1896年

2月11~21日 德国柏林2万服装工人罢工。

5月30日 米勒兰发表改良社会主义纲领。

5~6月 俄国彼得堡3万工人罢工。

- 7月27日~8月1日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4次大会）在伦敦举行。
- 10月28日 第2届国际合作代表大会通过联盟章程。
- 10月 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新时代》开始发表系列文章，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
- 11月21日 德国汉堡码头工人开始罢工，坚持到1897年2月。
- 1896年 英国采石工人爆发持续7年之久的罢工。

1897年

- 上半年 孙中山在伦敦同俄国民粹派接触。
- 11月14日 倍倍尔等人在国会强烈谴责德军侵占中国胶州湾，
- 1897年 第3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在荷兰召开。

1898年

- 7~9月 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公开批评伯恩施坦。
- 10月3~8日 德国党斯图加特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争论。

1899年

- 1月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
- 6月22日 米勒兰加入法国资产阶级内阁。
- 8~9月 列宁、考茨基等公开批评伯恩施坦。
- 10月9~17日 德国党汉诺威大会通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

12月3～8日 的决议。
法国社会主义者因米勒兰事件发生严重分歧。

1900年

6～8月 德国党及其领导人和广大工人反对、抨击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

9月23～27日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5次大会）在巴黎举行。

9月28～30日 因米勒兰事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公开分裂。

12月15日 社会党国际局成立。

1900年 第4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

1901年

4月25日 国际局公开谴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5月7日 彼得堡奥布霍夫兵工厂工人发动政治罢工。

8月21日 第1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工会书记处。

9月22～28日 德国党卢卑克大会通过关于点名谴责伯恩施坦的决议。

10月18日 国际局就土耳其军队屠杀阿尔明尼亚人发表宣言。

11月3日 国际局公开揭露英军在南非的罪行。

12月30日 国际局召开第1次会议。

1902年

4～5月 比利时、瑞典工人举行总罢工。

- 5月1日 国际局发表“五一”节宣言。
- 6月 第2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在斯图加特召开。
- 9月 梁启超撰文高度评价马克思。
- 9~11月 俄国、法国爆发工人总罢工。
- 12月29日 国际局召开第2次会议。
- 1902年 第5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召开。

1903年

- 1月8日 阿姆斯特丹港口工人自发罢工；4月9日转入总罢工。
- 4月15日 国际局公开号召声援荷兰工人总罢工。
- 4月 梁启超访美时多次与社会主义者晤谈。
- 6月 德国党成为国会中第2大政党。
- 7月20日 国际局召开第3次会议。
- 7月30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 7月 第3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在都柏林召开。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公开分裂。
- 9月13~20日 德国党通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德累斯顿决议”。
- 9月27~29日 法兰西社会党通过“兰斯—德累斯顿决议”。

1904年

- 2月7日 国际局召开第4次会议。
- 2月 西班牙巴塞罗那工人总罢工。
- 4月23日 国际局发表宣言抗议日俄战争和军国主义。

- 8月14~20日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6次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 8月15日 国际局召开第5次会议。
- 8月 机器工人国际联合会成立。
- 9月15~20日 意大利米兰工人总罢工。
- 9月18~24日 德国党不来梅大会讨论总罢工问题。
- 9月 第6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讨论合作社性质问题。
- 12月 俄国巴库5万石油工人总罢工。
- 1904年 澳大利亚工党首次执政。
- 1904年 荷兰社会民主党通过关于总罢工的决议。

1905年

- 1月7日 鲁尔10万矿工开始罢工，坚持到2月19日。
- 1月15日 国际局召开第6次会议。
- 1月22日 俄国开始第1次民主革命。
- 1月31日 国际局就俄国的“流血星期日”事件发表宣言。
- 1~2月 德、意、英、法工人公开声援俄国革命。
- 3月6日 国际局通过关于声援俄国革命的动议。
- 3月31日 德、法之间的第1次摩洛哥危机爆发。
- 4月23~25日 法国社会党两派实现联合。
- 5月中旬 孙中山等访问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
- 5月22~27日 德工会大会通过关于否定政治罢工决议。
- 6月23~24日 第4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召开。
- 上半年 国际局建立社会主义图书馆。
- 7月8日 国际局公布章程草案。

- 9月17~23日 德国党耶拿大会通过关于肯定政治罢工的决议。
- 10月10日 捷克布拉格工人总罢工。
- 10月30日 芬兰社会民主党宣布要进行总罢工。
- 10月 孙中山在日本与俄国民粹派讨论合作创办革命刊物问题。
- 11月26日 中国同盟会号召效法俄国革命。
- 12月2日 国际局号召纪念俄国革命一周年。
- 12月底 卢森堡去华沙投入俄国革命。

1906年

- 1月17日 汉堡10万工人首次举行政治罢工。
- 2月16日 德国党和工会领导人秘密达成不搞政治罢工的协议。
- 3月4~5日 国际局召开第7次会议。
- 3月 法国加莱海峡省矿工罢工。
- 7月17~18日 社会党国际议会委员会举行第1次会议。
- 9月23~29日 德国党曼海姆大会通过关于否定政治罢工的决议。
- 11月10日 国际局召开第8次会议
- 11月15日 孙中山在东京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作彻夜长谈。
- 11月 国际局讨论通过《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

1907年

- 6月9日 国际局召开第9次会议。
- 8月17日 社会党国际议会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

- 议。
- 8月17和19日 第1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决定建立国际妇女书记处。
- 8月18~24日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7次大会）在斯图加特举行。
- 8月24~26日 第1届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及其国际局。
- 9月15~16日 第5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再次否决关于讨论总罢工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提议。
- 9月15~21日 德国党埃森大会讨论对战争和殖民主义的态度。
- 1907年 第7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讨论联盟章程。
奥党成为第二国际最大的议会党团。

1908年

- 7月13~29日 印度孟买爆发政治罢工。
- 8月2日 瑞士党发起召开争取和平与各国谅解的国际集会。
- 9月13~19日 德国党通过关于反对批准政府预算案的决议。
- 10月11日 国际局召开第10次会议。
- 1908年 基督教工会国际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建立基督教工会国际委员会的决议。

1909年

- 2月13~14日 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分裂。
- 3月8日 美国芝加哥妇女和全国服装、纺织行业的

女工联合罢工。
 5月3~8日 阿根廷10万工人总罢工。
 8月30日~9月1日 第6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召开。
 8月 瑞典30万工人总罢工获胜。
 11月7日 国际局召开第11次会议。
 1909年 《社会党国际定期公报》出版。

1910年

3月14日 卢森堡和考茨基就党的战略问题开始发生争论。
 5月 日本发生镇压社会主义者的“大逆事件”。
 8月26~27日 第2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国际妇女节的决议。
 8月26日 国际局召开第12次会议。
 8月28日~9月3日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8次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
 9月4~5日 第2届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军国主义的提纲。
 9月18~24日 德国党再度通过关于反对投票赞成政府预算案的决议。
 1910年 第8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通过新的联盟章程。

1911年

3月19日 欧洲百万工人庆祝第1个国际妇女节。
 7月1日 德、法之间爆发第2次摩洛哥危机。
 7月14日 英国利物浦的港口、铁路工人罢工。
 7月16日 国际社会党人集会号召全力防止战争。

- 8月10~12日 第7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召开。
- 9月9日 意、土之间爆发战争。
- 9月23~24日 国际局召开第13次会议。
- 9月 国际局就意土战争发表《告各国工人书》。
- 10月10日 中国爆发辛亥革命。
- 10月 法国工团非常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以革命的总罢工制止战争的决议。
- 11月5日 中国社会党建立并召开第1次大会。
- 11月 欧洲各国工人举行反战的群众集会。

1912年

- 1月12日 德国党拥有110名议员,成为国会中最大的党团。
- 2月20日 英国百万矿工罢工,持续到3月。
- 3月11~19日 鲁尔24万矿工罢工。
- 4月17日 俄国发生屠杀罢工者的“连拿惨案”。
- 7月 意大利社会党分裂。
- 10月8日 第1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持续到1913年5月。
- 10月28~29日 国际局召开第14次会议。
- 10月 国际局及其成员党号召防止新的战争危险。
- 中国社会党在第2次大会上分裂。
- 11月24~25日 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9次大会)在巴塞尔举行。
- 11月 第3届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代表会议通过《青年国际与战争》决议。

1913年

- 5月11日 德、法议员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谴责沙文主义的决议。
- 6月29日 第2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持续到8月10日。
- 6月30日 德国党国会党团投票赞成政府的扩军筹款法案。
- 8月7日 中国社会党被解散。
- 8月25~28日 第9届国际合作社代表大会就合作社性质问题发生分歧。
- 9月6~19日 第8届国际工会代表会议、行业工会国际书记处第1次代表会议同时在苏黎世召开。
- 9月14~20日 德国党耶拿大会通过决议为党团投票赞成扩军筹款法案事辩解并否决关于以群众性罢工来反对军国主义的提案。
- 9月 国际局就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袁世凯政府贷款一事向其成员党发出通知书。
- 12月13~14日 国际局召开第15次会议。

1914年

- 年初 国际局致函孙中山表示将尽可能地支持中国革命。
- 5月 孙中山函请国际局提供帮助以使中国成为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
- 6月7~14日 意大利工人、农民起义。
- 6月28日 奥地利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 7月16~18日 国际局召开俄国社会主义组织的统一会议。
- 7月29~30日 国际局召开紧急(第16次)会议。
- 7月31日 塞尔维亚两名社会主义议员在议会公开反对政府的军事预算案。
- 7月 德、奥、英、法等社会党开展反对战争危险的活动。
- 8月1日 德国对俄国宣战,第1次世界大战开始。
- 8月4日 德国党国会党团一致投票赞成政府军事预算案。其他许多党也持同一立场并相继加入战时内阁。由此,第二国际及其成员党公开分裂。
- 9月27日 国际社会党人会商在卢迦诺举行。
- 11月1日 列宁起草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发表。
- 12月 国际局从布鲁塞尔迁往海牙。

1915年

- 1月17~18日 中立国社会党人召开代表会议。
- 2月14日 协约国社会党人举行代表会议。
- 3月26~28日 第3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召开。
- 4月5~7日 第4届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代表会议召开。
- 4月12~13日 同盟国社会党人举行代表会议。
- 9月5~8日 国际社会党人召开第1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1916年

- 4月23~30日 爱尔兰爆发反英的民族解放运动。

4月24~30日 国际社会党人举行第2次会议（昆塔尔会议）。

1917年

1月18日 德国党组织上分裂。
3月（俄历2月）
10~12日 俄国爆发第2次民主革命（二月革命）。
4月16~23日 柏林、莱比锡军火工人罢工。
4~5月 协约国社会党领导人访问苏俄。
5月15日 瑞典社会民主党分裂。
5月20日 法国士兵团队哗变。
8月2日 德国水兵举行反战起义。
8月29日 意大利都灵爆发反战、反饥饿起义。
9月5~12日 国际社会党人举行第3次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
11月6~7日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

1918年

1月14~20日 维也纳数十万工人举行政治罢工。
1月27日 芬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1月28日 全德百万工人卷入一月罢工高潮，持续至2月4日。
2月20~24日 协约国社会党举行代表会议。
5月1日 中国广州集会纪念（“五一”）劳动圣节。
9月22日 保加利亚士兵起义。
10月 匈牙利布达佩斯发生武装起义。
11月3~9日 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

1919年

- 1月中旬 商讨筹建共产国际的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
- 2月3~10日 国际社会党人(伯尔尼)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
- 2月5~9日 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决定恢复改良主义工会国际。
- 3月2~6日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召开成立大会。
- 3月21日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 4月13日 慕尼黑工人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 4月26~29日 第二国际代表会议讨论凡尔赛和约问题。
- 5月4日 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 7月28日~8月2日 战后首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国际工会联盟(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
- 8月1~9日 第二国际召开卢塞恩代表会议。
- 9月22日 美国50万钢铁工人罢工,坚持到1920年1月。
- 年底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商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问题。

1920年

- 5月1日 法国百万工人为拒运反苏武器而罢工。
中国上海、北京等地庆祝“五一”。
- 6月19日 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乌得勒支工会国际)成立。
- 7月19日~8月7日 共产国际“二大”通过以清除中派政党领袖为主要内容的“廿一条”。

- 7月31日~8月5日 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10次大会）在日内瓦举行。
- 8月30日 都灵工人发动占领工厂运动。
- 9~10月 第二国际领导人访问格鲁吉亚。
- 10~11月 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等倡议建立新的中派国际。
- 11月5日 第二国际声明主张民主社会主义。
- 11月22~27日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召开第2次代表大会。
- 12月5~7日 筹建中派国际的预备会议在伯尔尼召开。

1921年

- 2月11日 苏俄红军出兵格鲁吉亚。
- 2月22~27日 社会党国际联合会（维也纳国际）召开成立大会。
- 2月26~28日 社会主义青年国际成立。
- 5月1日 北京长辛店工人庆祝“五一”并成立工会。
- 7月3~17日 国际工会联合会（红色工会国际）举行成立大会。
- 7月23~31日 中共“一大”召开。

1922年

- 1月13日 香港海员罢工，坚持到3月6日。
- 1月15日 维也纳国际建议召开国际无产阶级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
- 2月21日~3月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接受维也纳

- 2月25~27日 国际的建议。
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决定同共产国际举行预备会议。
- 3月25日 3个国际的代表进行预备性谈判。
- 4月2~5日 3个国际执委会会议在柏林召开。
- 4月20~26日 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召开第3次代表大会。
- 5月1日 各国工人为争取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统一战线而示威游行。
- 5月18日 英、法、比社会党代表会议提出召开排除共产党人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问题。
- 5月19~20日 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联席会议决定召开社会党及其工人组织的代表会议。
- 5月23日 3个国际的组织委员会（“9人委员会”）举行会议。
- 6月8日 苏俄最高法院开始审判进行暗害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
- 6月18~19日 第二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决定拒绝同共产国际继续谈判和共同行动。
- 8月7日 苏俄审判社会革命党人案结束。
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的执委会商讨合并问题。
- 9月24日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
- 12月10~15日 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的联席会议决定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 12月25日 无政府工会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柏

林工会国际)成立。

1923年

- 2月8日 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的组织委员会举行第1次会议制定加入统一国际的条件。
- 4月4日 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的组织委员会讨论召开合并大会的问题。
- 5月18日 捷、波、匈、奥、格鲁吉亚等社会党代表会议讨论统一国际的章程和常务局席位分配问题。
- 5月20日 维也纳国际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解散组织以与第二国际合并的决议。
- 5月21~25日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维也纳国际合并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党国际)。

2. 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概况

序号	名称	召开时间	地点	代表人数	议 程	主要决议	中心议题
1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马克思主义者大会)	1889. 7.14 ~21	巴黎	407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国际劳动立法——从法律上调整工作日; 2. 对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实行监督; 3. 实现这些措施的手段和途径; 4. 废除常备军和实行普遍全民武装。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 新增听取各国劳工运动报告, 两个大会合并等议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关于联合问题的决议; 2. 关于国际劳工立法的决议; 3. 关于实现国际劳工立法要求的途径和手段的决议; 4. 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 5. 关于庆祝“五一”的决议; 6. 关于废除常备军和实行普遍全民武装的决议。 	劳 动 立 法

续上

1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可能派大会)	1889. 7.15 ~21	巴黎	608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国际劳动立法; 2. 各国工人进行经常联系的手段; 3. 雇主同盟和当局干预; 4. 下次大会的时间、地点和准备工作。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 新增取部分代表报告的议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关于联合问题的决议; 2. 关于国际劳动立法的决议 3. 关于下次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等决议。 	劳 动 立 法
---	---------------------	----------------------	----	------	--	--	---------

续上

2	国际工 人代表 大会	布鲁塞尔375人	1. 关于劳动立法; 2. 犹太人问题; 3. 罢工和抵制; 4. 军国主义; 5. 计件工资; 6. 妇女问题; 7. “五一”节; 8. 海员组织; 9. 利用议会和普选 权; 10. 社会主义政党同资 产阶级政党联盟。	1. 关于劳动立法的决 议; 2. 关于犹太人问题的 决议; 3. 关于组织联合和鼓 动的决议(罢工和抵 制); 4. 关于工人阶级对军 国主义态度的决议; 5. 关于废除计件工资 制的决议; 6. 关于妇女问题的决 议; 7. 关于“五一”劳动 节的决议; 8. 关于海员组织问题 的决议。
---	------------------	----------	---	--

罢 工 和 抵 制

3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1893. 8. 6~12	苏黎世	411人	<p>1. 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p> <p>2. 庆祝“五一”节；</p> <p>3.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p> <p>4. 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时期的立场；</p> <p>5. 保护女工劳动；</p> <p>6. 各国工会和国际工会的组织；</p> <p>7. 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问题；</p> <p>8. 土地问题；</p> <p>9. 总罢工。</p>	<p>1. 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的议案；</p> <p>2. 关于工人阶级对待战争态度的决议；</p> <p>3. 关于庆祝“五一”节的决议；</p> <p>4. 关于保护女工的决议；</p> <p>5.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的决议；</p> <p>6.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p> <p>7. 关于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决议；</p> <p>8. 关于全国工会和国际工会组织的决议；</p> <p>9. 关于总罢工的决议；</p> <p>10. 关于普选权的决议。</p>	<p>政 治 策 略</p>
---	--------------	---------------	-----	------	---	---	----------------

续上

4	国际社 会主义 工人代 表大会	1896. 7.27~ 8.1	伦敦	535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土地问题; 2. 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 3. 教育和体力发展; 4. 组织; 5. 战争; 6. 经济和政治斗争; 7. 侵犯自由; 8. 参加下次代表大会的条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2.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的决议; 3. 关于教育和体力发展问题的决议; 4.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5. 关于反对战争的决议; 6. 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 7. 关于反对侵犯自由的决议; 8. 关于参加下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决议。 	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
---	--------------------------	-----------------------	----	------	--	---	-----------

续上

5	国际社1900. 会党代9.23~ 表大会27	巴黎	791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关于各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办法;2. 通过国际劳动立法来限制工作日;3. 劳工解放的必要条件;4. 世界和平、军国主义和取消常备军;5. 殖民政策;6. 组织海运工人;7. 为争取实现普选权和直接立法权而斗争;8. 市政社会主义;9. 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10. “五一”节;11. 托拉斯;12. 总罢工。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关于各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办法的决议;2. 关于通过国际劳动立法来限制工作日的决议;3. 关于规定各国最低工资额的可能性的决议;4. 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决议(“考茨基决议”);5. 关于劳工解放的必要条件的决议;6. 关于殖民政策问题的决议;7. 关于世界和平、军国主义、废除常备军的决议;8. 关于为实现普选权和直接立法而斗争的决议;	夺取社会权力
---	-------------------------------	----	------	---	--	--------

续上

6	国际社 会党代 表大会	1904. 8.14~ 20	阿姆斯特 丹	476人	社会党策略的 国际 准则； 1. 社会党策略的 国际 准则； 2. 殖民政策； 3. 移民出境和入境； 4. 总罢工； 5. 社会政策和工人保 险； 6. 托拉斯和失业； 7. 庆祝“五一”节； 8. 党的统一。	党 的 策 略 准 则
					1. 关于社会党策略的 国际准则的决议； 2. 关于社会政策和工 人保险的决议； 3. 关于殖民政策问题 的决议； 4. 关于总罢工问题的 决议； 5. 关于党的统一问题 的决议； 6. 关于庆祝“五一” 节的决议； 7. 关于妇女选举权的 决议； 8. 关于托拉斯问题的 决议。	

续上

7	国际社 会党代 表大会 1907. 8.18~ 24	斯图加特 381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2. 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3. 殖民地问题;4. 工人的侨居;5. 妇女选举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2. 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3. 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决议;4. 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的决议;5. 关于工人侨居问题的决议;	军 国 主 义 与 国 际 冲 突
---	---	--------------	--	--	-------------------

续上

8	国际社 会党代 表大会	1910. 8.28~ 9.3	哥本哈根896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失业保险；2. 各国社会党的统 一；3. 发起反对死刑的国 际抗议；4. 反对军国主义和战 争；5. 工会运动的统一；6. 国际团结；7. 工人立法；8. 避难权；9. 合作社与政党的相 互关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关于失业和失业保 险的决议；2. 关于反对死刑的决 议；3. 关于工会运动统 一问题的决议；4. 关于反对军国主义 和战争的决议；5. 关于各国社会党的 统一的决议6. 关于国际团结的决 议；7. 关于避难权的决 议；8. 关于党和合作社关 系问题的决议。	反 对 军 国 主 义 和 战 争
---	-------------------	-----------------------	----------	---	--	-------------------

续上

9	国际社 会党非 常代表 大会	1912. 11. 24 ~25	巴塞 尔	555人	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 统一行动。	《关于国际局势和反对 战争的统一行动宣 言》(《巴塞爾宣言》)。	反战 统一行动
10	(国际 社会党 代表会)	预定 1914. 8. 23 ~29	维也 纳		1. 失业; 2. 生活费用昂贵; 3. 帝国主义和仲裁; 4. 酗酒; 5. 俄国政治犯的情 况。		因战争 爆发未 开成。

续上

10	国际社1920. 会党代7.31~ 表大会8.5	日内瓦	120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国际章程; 2. 战争责任; 3. 和平与国际联盟; 4. 社会化; 5. 劳动立法; 6. 组织工人报刊; 7. 建立和恢复国际; 8. 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主义。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战 争 责 任</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 2. 关于凡尔赛和约和军国主义的危险性的决议; 3. 关于社会化的形式和方法的决议; 4. 关于对待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态度决议; 5. 关于劳动立法的决议; 6. 国际章程; 7.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决议。
----	--------------------------------	-----	------	---	---

3.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概况

序号	时间	地点	代表人数	议程	决议
1	1901年 12月30日	布鲁塞尔	20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国际局的组成; 2. 财政状况和书记处工作报告; 3. 实施巴黎大会决议的措施; 4. 创办国际公报; 5. 支持和平的国际工人会议; 6. 阿姆斯特丹大会; 7. 帝国主义的政策。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关于反对普鲁士对波兰人的压迫的决议; 2. 关于帝国主义的政策的决议; 3. 关于芬兰问题和俄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的决议; 4. 关于声援俄国无产者的决议。

续上

2	1902年 12月29日	布鲁塞尔16人	1. 书记处工作报告; 2.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3. 帝国主义的政策; 4. 国际局的工作方法。	1. 关于延期召开国际大会的决议; 2. 关于加强国际政治问题研究的决议。
3	1903年 7月20日	布鲁塞尔16人	1. 书记处工作报告; 2. 联系, 向社会党国际局提出要求; 3. 阿姆斯特丹大会; 4. 保护外籍工人; 5. 马其顿。	1. 关于对外国工人给予保护的决议; 2. 关于同情意大利社会党的决议; 3. 关于应届国际大会议程的决议。

续上

4	1904年 2月7日	布鲁塞尔 16人	1. 书记处工作报告; 2. 联络; 3. 书记处的活动规划; 4. 阿姆斯特丹大会; 5. 国际政治。	1. 关于抗议驱逐在阿根廷工作的外国工人的决议; 2. 关于抗议对在德国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迫害的决议; 3. 关于俄日冲突的决议; 4. 关于支持巴尔干人民的独立和反对马其顿大屠杀的决议。
5	1904年 8月15日	阿姆斯特丹 27人	1. 阿姆斯特丹大会; 2. 书记处工作报告;	

续上

6	1905年 1月15日	布鲁塞尔17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法国社会党的统一问题；2. a) 各国社会党统一的情况, b) 保加利亚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3. 书记处的工作；4. 国际代表大会的表决方式；5. 日本的社会主义情况；6. 解除社会党国际局书记的职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者联合的决议；2. 关于俄日战争和俄国革命斗争的决议；3. 关于抗议对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迫害的决议；4. 关于向路易·米歇尔致敬的决定；5. 关于组成负责审查国际大会表决方式建议的委员会的决定。
---	----------------	---------	---	--

续上

7	1906年 3月4~5日	布鲁塞尔	21人	1. 有关出现战争危险或发生战争时应采取的措施； 2. 关于国际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方式； 3. 关于俄国事件及其影响； 4. 书记处工作报告。	1. 关于发生战争和战争危险应采取的措施的决议； 2. 关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国际局决议方式的方案； 3. 关于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以声援俄国革命的决议。
---	-----------------	------	-----	---	--

续上

8	1906年 11月10日	布鲁塞尔	22人	1. 斯图加特大会的筹备; 2. 斯图加特大会的议程。
9	1907年 6月9日	布鲁塞尔	24人	1. 斯图加特大会的最后议题; 2. 代表大会不同民族支部名额的分配; 3. 其他问题(出版国际刊物;海牙会议;联合;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 1. 抗议对美国煤矿工人的诉讼案; 2. 反对任意引渡俄国革命者。

续上

10	1908年 10月11日	布鲁塞尔	30人	<p>1. 接受非社会主义团体参加国际局和代表大会；</p> <p>2. 政治形势；</p> <p>3. 社会党国际局会议；</p> <p>4. 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不列颠工党请求加入国际；</p> <p>5. 国际局的法国代表团；</p> <p>6. 亚美尼亚共和国社会党在国际局的代表权。</p>	<p>1. 关于接受英国工党加入国际局的决议；</p> <p>2. 关于国际形势（防止战争）和联合行动的决议；</p> <p>3. 关于土耳其问题的决议；</p> <p>4. 关于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p>
11	1909年 11月7日	布鲁塞尔	30人	<p>1. 哥本哈根大会的组织、日期和议事日程；</p> <p>2. 荷兰社会民主党的联合；</p> <p>3. 其他（保加利亚的谅解；阿根廷社会党的怨言；匈牙利—克罗地亚工人的联合；萨洛尼卡工人的联合；美国代表权。）</p>	<p>1. 关于摩洛哥远征的决议；</p> <p>2. 关于声援瑞典、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的决议；</p> <p>3. 关于反对罗马尼亚当局对社会主义者迫害的决议；</p> <p>4. 关于反对死刑的决议；</p> <p>5. 关于荷兰社会民主党加入国际局的决议。</p>

续上

12	1910年	哥本哈根	27人	<p>1. 各国议会委员会会议的准备;</p> <p>2. 投票方式和国际局代表制的形式;</p> <p>3. 代表中央工会的捷克代表委任状的有效性;</p> <p>4. 美国代表;</p> <p>5. 国际局的美国代表团;</p> <p>6. 失业问题;</p> <p>7. 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会址问题;</p> <p>8. 各加入党提交给国际局会议的文件。</p>	<p>1. 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决议;</p> <p>2. 关于失业问题的决议;</p> <p>3. 关于下届(维也纳)代表大会的决议。</p>
----	-------	------	-----	---	--

续上

13	1911年 9月23~ 24日	苏黎世	25人	1. 摩洛哥问题; 2. 联合国问题(国际社会 主义青年的联合); 3. 生活费用昂贵问题; 4. 其他。	1. 关于摩洛哥殖民冲突 (支持国际团结)的决 议; 2. 关于反对的生活费用 昂贵的决议。
----	-----------------------	-----	-----	---	--

续上

14	1912年 10月28~ 29日	布鲁塞尔	26人	<p>1. 国际政治形势； 2. 下次代表大会； 3. 联合； a) 大不列颠社会党； b) 荷兰社会民主党； c) 加拿大社会民主党； d) 南非劳动党； e) 澳大利亚西部社会党； f) 新西兰西部社会党； g) 新西兰社会主义党； h) 维多利亚社会主义党； i) 联合社会主义党（南非）； j) 布隆捷克中央工人党。</p>	<p>1. 关于近期内召开国际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 2. 关于巴尔干事件和反对战争危险的决议； 3. 关于有关成员党内部联合问题的决议。</p>
----	------------------------	------	-----	--	--

续上

15	1913年 12月13~ 14日	伦敦	28人	1. 关于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党派的统一; 2. 书记处工作报告; 3. 维也纳大会的准备; 4.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会。	1.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联合的决议; 2. 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统一的决议; 3. 关于维也纳大会议程的决议。
16	1914年 7月29~ 30日	布鲁塞尔	32人	1. 最近事件造成的国际形势; 2. 应届国际大会。	1. 社会党国际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2. 关于紧急召开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

4. 工会组织一览表

国名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备注
英国	工联(工会联合会理事会)	1860.7	
美国	全国劳工同盟	1866.8	1874年后停止活动。
英国	职工大会(英国工联代表大会)	1868	后来其成员是工党集体党员。
德国	希尔施—敦克尔工会	1868	
美国	裁缝工秘密同盟(劳动骑士团)	1869.12	劳动骑士团前身。
荷兰	全荷兰工人联盟	1871	
瑞士	工人联合会	1873.6	存在到1880年。
俄国	南俄工人协会(工人的政治团体)	1875下半年	不久被取缔。
比利时	劳动委员会(各工人团体的联合)	1875	
俄国	北方工人协会(工人的政治团体)	1878	1880年停止活动。
阿根廷	职工联合会	1878	南美第1个工会组织。

续上

德国	天主教工会	1879	
瑞士	工会联合会	1880	
西班牙	地区劳动者同盟	1881.9	1888年被取缔。
美国	美国和加拿大工会和工人协会联合会	1881.11	
挪威	工会同盟	1883	
印度	孟买工厂工人协会	1884	
乌拉圭	劳动者联盟	1885	
法国	全国工团联合会	1886	
美国	劳工联合会(劳联)	1886.12	
法国	劳动介绍所	1887	1892年改称全国联合会。
西班牙	全国劳动者同盟	1888.8	1893年并入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
波兰	工人联合会	1889	
俄国	工人联合会(中央工人委员会、勃鲁斯涅夫小组)	1889	1892年被取缔。

续上

英国	新工联	1889	由全英矿工联合会、码头工人联合会、煤气—杂工工会等组成。
德国	全德社会主义工会联合会 (自由工会)	1890.11	1890年11月组成领导机构；1893年“一大”宣告成立。
阿根廷	工人联合会	1890.12	
意大利	全意劳动委员会联合会	1893	
荷兰	全国劳动书记处	1893	
荷兰	钻石工人联合会	1894.11	
保加利亚	索非亚印刷工人中央联盟	1894	第1个全国性工人组织。
美国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1895.12	1905年停止活动。
法国	劳动总联合会	1895	由工团联合会和劳动介绍所联合会合并而成。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奥班恰尔工人协会	1896.1	
日本	工会筹备协会	1897.7	
瑞典	总工会	1898	
瑞典	工会同盟	1898	

续上

比利时	工会委员会(工会中心)	1898	
丹麦	全国工会联合会	1898	
阿根廷	工人区域联盟	1901.5	
阿根廷	劳动总同盟	1902	1909年瓦解。
菲律宾	工人民主同盟	1902	
塞尔维亚	工人联盟	1903.8	
保加利亚	独立工会(宽广派)、工人总工会 (紧密派)	1904.7	
俄国	全俄铁路工会	1905.4	1907年2月解散。俄国第一个铁路工会。
美国	世界产业联合会(产联)	1905.6	包括加、澳、英和拉美的分会组织。
意大利	劳动总联合会	1906.10	
智利	工人联盟	1909.9	
罗马尼亚	工会联合会	1912	

续上

俄国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旅俄华工联合会	1917.6 1917	全俄工会领导机关。 原称中华旅俄联合会（刘泽荣）。
印度	全印工会大会	1920.10	
美国	工会教育同盟（工会团结同盟）	1920.11	
中国	香港海员总工会（中华海员工 人联合会）	1921.3	
中国	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 工会前身）	1921.8	
法国	统一总工会	1922	

5. 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一览表

序号	国名	名称	成立时间	主要领导人	机关刊物	发展演变情况
1	德国	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派)	1869.8	李卜克内西、倍尔	《前进报》(1876.10); 《新时代》(1883~1923)	1875年5月与拉萨尔派合并称社会主义工人党并通过《哥达纲领》; 1890年起称社会民主党并于1891年通过《爱尔福特纲领》。
2	瑞士	社会民主党	1870.3		《工人呼声报》(1881~1908); 《伯尔尼哨兵报》(1893)	1872年瓦解; 1888年重建; 1890年10月改称社会民主党; 1920年12月左派退出并于翌年与共产党合并。

续上

3	丹麦	社会民主 党	1871		1872年被取缔; 1876年重建, 通过党纲; 1884年前称社会民主联盟。
4	匈牙利	社会民主 党	1873.3	弗兰克尔	1873年4月被瓦解; 1878年4月以“非选民党”名义活动; 1890年12月重建。
5	奥地利	奥匈社会 民主工党	1874.4		不久瓦解。 《平等报》、 《工人报》
6	葡萄牙	社会党	1875		1877年正式成立制定党纲。

续上

7	美国	社会主义 工人党	1876.7	左尔格、 德莱昂	<p>前身是1874年成立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1877年7月改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 1880年分裂； 1881年在芝加哥另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向于国际主义。</p>
8	瑞士	工人党	1877.5		<p>由工人联合会和格留特利联合会组成。</p>
9	捷克	社会民主党	1878.4		<p>隶属于奥匈社会民主党。</p>

续上

10	墨西哥	社会党	1878			1881年被取缔。
11	美国	社会民主党	1878			
12	比利时	社会党 (工人党)	1879.1	安塞尔、 王德威尔 得	《人民报》 (1884)	1885年4月以它为基础建立工人党，并通过党纲， 1894年通过原则宣言。
13	西班牙	社会主义 工人党	1879.5	伊格列西 亚斯	《社会主义者报》 (1886)	1888年8月召开“一大”并通过纲领。
14	法国	工人党	1879.10	盖得、 拉法格	《平等报》 (1877)	1879年成立，1880年定名为工人党 并通过《哈佛纲领》。
15	匈牙利	全国工人党	1880			1890年解体

续上

16	丹麦	社会民主党	1880	克里斯特森	《社会民主党报》	1884年8月改称社会民主联盟，通过纲领； 1885年创刊； 1907年改称社会民主党； 1911年起为社会党（机关报）
17	英国	民主联盟（社会民主联盟）	1881.6	海德门		
18	意大利	罗曼尼亚革命党	1881.8	科斯塔	《前进》 (1881)	
19	荷兰	社会主义同盟	1882.3	纽文胡斯	《人人权利报》 (1879年创刊， 1883年为机关报)	1882年通过党纲； 1884年改为社会民主联盟； 189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工党； 1909年分裂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党。

续上

20	意大利	工人党	1882.5	柯罗齐	1892年停止活动，同年8月成立社会党， 属于工会性质的团体。
21	波兰	“无产阶级”党 (“无产阶级” “伟大的， 无产阶级”)	1882.8		1885年被沙俄当局破坏。
22	法国	社会主义工人党 (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 (可能派)	1882.9	布鲁斯	《无产者报》 从法国工人党中分出。
23	日本	东方社会党	1882		

续上

24	俄国	劳动解放社	1883.9	普列汉诺夫、苏利奇、阿罗克、里罗得	1888年通过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纲领， 1903年宣告解体。
25	英国	费边社	1884	肖伯纳、悉尼·韦伯	1900年与工联等团体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工党前身）。
26	英国	社会主义同盟	1884年底	莫利斯	从社会民主联盟分出并通过《社会主义同盟宣言》； 《公益》（周刊，1885年） 1889年宣告解体。
27	美国	统一工人党	1886年秋		
28	挪威	工人党	1887.8	耶佩森	由各行业工人团体联合组成， 1884年制定党纲。 《我们的工人报》（1884年）；《社会民主党人报》； 《工人报》（1866年）

续上

29	奥地利	社会民主党	1888.12	维·阿德勒	《工人报》、《平等》周刊	1888年通过《加因非原则宣言》； 1897年实际分成6个民族小组； 1918年左派退出参加筹备奥共。
30	波兰	第二个“无产阶级”	1888			1891年被破坏。
31	瑞士	社会民主党	1888	格雷利希		1904年制定纲领。
32	英国	苏格兰工党	1889.1	哈弟	《矿工》 (1887年初) 《工人领袖报》 (1889)	1893年加入英国独立工党，成为其分部。
33	瑞典	社会民主工党	1889.4	布兰亭	《社会民主报》(1889年创刊)	
34	波兰	工人联合会	1889	马尔赫列夫斯基		1893年同第二个“无产阶级”党 联合组成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

续上

35	意大利	米兰社会主义同盟	1889				
36	丹麦	社会民主党	1889.11	彼得逊			
37	法国	工人社会革命党 (阿列曼派)	1890.10	阿列曼			从可能派中分出， 1901年加入法国社会党。
38	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	1890.12	恩格尔曼	《工人记事报》 (1876年创刊)		由“非选民党”和工人党合并组成；1890年采用“加因菲纲领”；1894年改称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制订纲领。
39	俄国	亚美尼亚革命联盟 (德罗沙克)	1890年				1907年加入第二国际，其右翼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 1921年2月因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被取缔。

续上

40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	1891.8	布拉戈耶夫	<p>《新时代》1891年制定党纲； 1894年改称工人社会民主党； 1902年， 1917年1903年7月分裂为工人社会民主党 为保共机(紧密派)和社会民主党(宽广派)； 1919年紧密派改称保共(紧密派)。</p>
41	澳大利亚工党	1891		
42	意大利劳动党(社会党)	1892.8	屠拉第、塞拉蒂	<p>《社会评论》1893年后称劳动社会党； 1895年1月改名为社会党； (1891年初创刊) 1912年比索拉蒂被开除后另建改良 《前进报》社会党。 (1896)</p>
43	波兰加里西亚和西里亚社会民主党	1892		<p>《前进报》 (1892)</p>

44	英国	独立工党1893.1	哈弟	《工人领袖报》 (1889年创刊)	1893年1月召开“一大”并制定纲领; 1921年该党加入维也纳国际,其左翼加入英共。
45	波兰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	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	《红旗报》 (1902~1913)	由波兰工人联合会和第二个“无产阶级”党联合组成; 1900年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左翼联合组成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46	罗马尼亚	社会民主工党	拉科夫斯基	《比萨纳比亚》 (1897)	1893年制定党纲; 1899年停止活动; 1901年重建改称社会民主党; 1910年重建为社会民主党; 1918年11月又改称社会党。

续上

47	捷克斯洛伐克	社会民主党	1893.12				
48	立陶宛	社会民主党	1893			1896年形成政党； 1900年左翼参与组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49	波兰	社会党	1893			1906年分裂为左派与“革命派”（右派，弗拉克派）； 1918年12月左派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 右派于1919年同德奥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组织合并仍称原名。	
50	法国	独立社会党人联盟（饶勒斯派）	1893			1902年3月与其他“入阁派”组成法国社会党； 1905年参加统一的法国社会党。	《小共和国报》（1975年出版）

51	荷兰	社会民主 工党	1894.8	特鲁斯 特拉	1893年从社会主义同盟中分出； 1899年6月与社会主义同盟合并仍 用现名； 1909年分裂为“社会民主党”和 “社会民主工党”。
52	俄国	工人阶级 解放斗争 协会	1895.11	列宁	1898年后为经济派控制。
53	俄国	俄罗斯、 波兰社会 民主党	1895	卢森堡、 约吉希斯 业报》	从社会党中分出； 1900年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称 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 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
54	南斯拉夫	社会民主 党	1896		属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部分。 1896年制定党纲。
55	阿根廷	社会党	1896.6		《先锋报》前身为1891年建立的社会主义联合 会。

续上

56	日本	社会问题研究会	1897.4	片山潜	1898年10月改称社会主义研究会。
57	美国	社会民主党	1897.8	德布兹	
58	匈牙利	独立社会党	1897.9	瓦尔科尼	
59	俄国	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工人联盟(犹太党)	1897.9		1921年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国共产党。
60	智利	社会党	1897	列卡巴连	1900年被取缔， 1901年改称民主党。

续上

61	俄国	社会民主 工党	1898.3	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	《火星报》(1900.12) 《真理报》(1912.5)	1903年7~8月在“二大”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1912年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政党； 1917年开始用社会民主工党(布)名称； 1918年3月改称俄共(布)。
62	爱尔兰	社会主义 党	1898			
63	芬兰	工人党 (社会民 主党)	1899.7		《工人日报》(1895~1918)	1901年7月召开“一大”制定党纲； 1903年前称工人党。
64	英国	工党	1900.2	唐 克 纳、韩 德 逊		由工联(1860)、职工大会(1868)、费边社(1884)等团体联合而成，起初称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定名为工党。

续上

65	日本	社会民主党	1901.5	片山潜	《劳动世界》(1897.12)《社会主义》	不久被取缔。
66	美国	社会党	1901.7	希尔奎特		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分出；1919年分裂，退出该党的左翼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核心。
67	法国	社会党	1902.3	饶勒斯	《人道报》(1904.4)	由可能派、饶勒斯派、阿列曼派等合并组成。
68	法国	法兰西社会党	1902.9	盖得、瓦扬		由盖得派、瓦扬派、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等组成。
69	俄国	社会革命党(革命社会主义统一体)	1902	鲁巴诺维奇		1906年分裂为人民社会党(劳动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1917年12月分出左派社会革命党；1923年被取缔。

续上

70	卢森堡	社会主义 工人党	1902			
71	塞尔维亚	社会民主 党	1903.8	德拉戈维 奇	《工人新 闻报》	1919年加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 党(共产主义者)。
72	英国	苏格兰社 会主义工 人党	1903		《社会党 人报》 (1904. 1909~19 10. 1918. ~1920)	从社会民主联盟中分出; 1920年同 社会党合并。
73	俄国	亚美尼亚 社会主义 工人组织	1903			
74	俄国	拉脱维亚 社会民主 工党	1904.6		《公报》	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改 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续上

75	古巴	社会党	1904	巴利诺	1905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
76	法国	统一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905.4	饶勒斯、盖得、瓦扬	《社会主义者报》(原为工人党机关报,1905年起为社会党机关报)。 由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组成,1920年左派另组共产党。
77	加拿大	社会党	1905		
78	墨西哥	自由革命党	1905	马冈兄弟	
79	日本	社会党	1906.2	片山潜、幸德秋水	1907年该党分裂为以片山潜为代表的议会政策派和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直接行动派(无政府主义派)。

续上

80	英国	社会民主 党	1907		前身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884); 1911年9月30日与独立工党左翼和 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合并组成社会 党。
81	荷兰	社会民主 党(论坛 派)	1909.3	潘涅库克《论坛报》 (1907)	从社会民主工党中分出; 1918年参与组建荷兰共产党。
82	南非	工党	1909	恩德柳斯	
83	乌拉圭	社会党	1910.12		1912年8月通过党纲。
84	中国	社会党	1911.11	江亢虎	1912年分裂出纯粹社会党; 1913年8月被袁世凯政府解散。

续上

85	智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 1912.3	列卡巴连	从民主党中分出; 1922年1月2日改组为共产党。
86	英国	社会主义联合会 1913.7		由独立工党、社会党、费边社组成,隶属于工党。
87	中国	中华革命党 1914	孙中山	《民报》前身是1894年的兴中会和1905年的同盟会; 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88	德国	独立社会民主党 1917.4	哈阿兹、累德堡、考茨基	《自由报》(1918~1922)前身是社会民主劳动友谊社(1916.1920年发生分裂,同年12月左翼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其他成员仍称独立社会民主党,直到1922年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续上

89	伊朗	社会主义党“正工党”	1917			1920年在俄部分组织加入了俄共(布),在伊朗境内的党员则成为伊共核心。
90	阿根廷	国际社会主义党	1918.1			1920年12月改名为阿根廷共产党。
91	德国	斯巴达克同盟	1918.1	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红旗报》	前身是1915年形成的“国际”派(“斯巴达克派”);1917年曾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 1918年底1919年初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成立德共;1920年12月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建立统一德国共产党。
92	意大利	《新秩序》派	1919	葛兰西	《新秩序》周刊 (1921年改为共报)	社会党内左派,1921年退出组建意共。

6、文献论著目录

- 说明： 1) 按本书援引的先后顺序编号排列。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著和报刊均未收入。
3) 凡属转引的只标明被转引的文献论著版本。
4) 多卷本的著作一次标明不再分列。

- [1] 《国际巴黎(马克思主义者)大会记录》，载《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1975年迪特莱夫·奥维曼出版公司版。
- [2] 门德尔逊：《世界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和历史》，1976年三联书店版。
- [3] 库钦斯基：《世界经济简史》，196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
- [4] 波诺马廖夫主编：《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1985年工人出版社版。
- [5]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史部分)，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
- [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概况》，196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
- [7] 《世界通史》，1975年三联书店版。
- [8] 樊亢等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
- [9] 《19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劳动人民的罢工斗争》，1979年莫斯科版。
- [10]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三联书店版(两卷集)。

- [11] 贝托尔特等：《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两卷集）。
- [12] 《第二国际》，1975年瑞士冈考夫出版社版（廿卷集）。
- [13] 弗里克：《德国工人运动（1869~1890）。关于工人运动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1976年柏林狄茨出版社版。
- [14] 张佩航、吴吉祥、周海乐主编：《国际工人运动史知识手册》，1987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 [15] 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五卷集）
- [16] 李显荣：《巴枯宁评传》，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 [17] 豪普特：《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载《法国社会运动》杂志，1965年4~6月第51期。
- [18] 朱宾斯基：《威廉·李卜克内西传》，1984年人民出版社版。
- [19] 祖波克主编：《第二国际史》，人民出版社版（两卷集）。
- [20] 《国际巴黎（可能派）大会记录》，载《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
- [21] 《〈社会民主党人报〉关于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社论和文章》（殷叙彝、王学东译），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8期，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
- [22] 福斯特：《三个国际的历史》，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 [23] 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1965年三联书店版。

- [24] 《可能派1889年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各国工人组织在不损害自主的条件下，为建立经常联系所应采取的最切实可行的手段”议程的讨论和决议》（承中译），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8期。
- [25] 希尔奎特：《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史》，1974年商务印书馆版。
- [26] 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一国际）》，1964年三联书店版。
- [27] 《国际布鲁塞尔大会记录》，载《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
- [28] 泽瓦埃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1983年三联书店版。
- [29]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三卷，1986年商务印书馆版。
- [30] 韩佳辰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1986年知识出版社版。
- [31] 《苏联共产党历史》，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 [32] 《国际苏黎世大会记录》，载《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
- [33] 耶克：《第一国际史》，1964年三联书店版。
- [34] 布劳恩塔尔：《国际史》，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两卷集）。
- [35] 《国际伦敦大会记录》，载《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
- [36] 克里沃古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1963年三联书店版。
- [37] 《爱尔福特纲领》（1891），载《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附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

- [38]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1961年三联书店版。
- [39] 殷叙彝：《关于“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期，1987年人民出版社版。
- [40] 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
- [41] 布拉约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1986年东方出版社版。
- [42]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73年三联书店版。
- [43]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973年三联书店版。
- [44] 《列宁年谱》，三联书店版（五卷集）。
- [45] 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不要选举协议》，1964年三联书店版。
- [46] 米勒兰：《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1978年三联书店版。
- [47] 李兴耕：《围绕米勒兰事件的一场斗争》，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期。
- [48] 拉波波特：《饶勒斯传》，1982年三联书店版。
- [49] 《米勒兰事件》，1980年三联书店版。
- [50] 《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记录》，载《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
- [51] 《伯恩施坦言论》，1973年三联书店版。
- [52] 《国际巴黎大会记录》，载《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记录文献》。
- [53] 阿金：《廿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1903~19

- 06)》，1954年莫斯科版。
- [54] 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编》（近代部分），1964年商务印书馆版。
- [55] 《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版（五卷集）。
- [56]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7年柏林前进出版社版。
- [57] 萨那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
- [58]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1911年根特版。
- [59] 《国际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1912年柏林版。
- [60] 殷叙彝：《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期。
- [61] 豪普特编：《社会党国际局。历次会议情况、记录、宣言及通知书》，第1卷（1900~1907）。
- [62] 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61年工人出版社版。
- [63] 张云伏：《国际运动史》，1930年神州国光社版。
- [64] 叶夫泽罗夫等：《罗莎·卢森堡传》，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
- [65] 斯廷森：《不给一个人，不给一分钱》，1981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版。
- [66] 厄斯纳：《卢森堡评传》，1964年三联书店版。
- [67] 豪普特编：《未开成的代表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1967年维也纳版。
- [68] 蒙普特：《社会主义和大战》，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版。
- [69] 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98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 [70] 贝文：《战争期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13年伦敦版。
- [71] 《考茨基言论》，1966年三联书店版。
- [72] 米盖尔：《法国史》，1985年商务印书馆版。
- [73] 莫瓦尔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 [74] 希法亭：《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研究》，1959年俄文版。转引自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 [75] 考茨基：《帝国主义》，1964年三联书店版。
- [76]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1976年三联书店版。
- [77]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64年三联书店版。
- [78] 《鲍威尔言论》，1978年三联书店版。
- [79] 库诺夫：《党破产了吗？》1977年三联书店版。
- [80]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5分册，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 [81]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 [82]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
- [83]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58年三联书店版。
- [84] 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65年三联书店版。
- [85] 亚历山大罗夫：《列宁和共产国际》，1984年求实出版社版。
- [86] 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196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

- [87] 莫吉列夫斯基：《第二国际的复活》，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
- [88] 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78年三联书店版。
- [89]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0年彼得格勒版。
- [90] 罗尔文：《国际劳工运动史》，1934年中华书局版。
- [9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1923年共产国际出版社版。
- [92] 《三个国际执委会会议正式记录》，1966年三联书店版。
- [93] 索波列夫等：《共产国际史纲》，1985年人民出版社版。
- [94] 钟叔河：《走向世界》，1985年中华书局版。
- [95]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
- [96] 《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 [97]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 [98]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版（6卷集）
- [99] 豪普特等主编：《第二国际和东方》，1967年巴黎法文版。
- [100] 《回顾与展望》，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 [101]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 [102] 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 [103] 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1965年台北版。
- [104] 《孙中山访问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的一篇报导》（王以平译），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

- 期, 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
- [105] 周懋庸:《卢森堡与中国》, 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期, 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
- [106] 巴尔特尔等:《倍倍尔传》, 1987年人民出版社版。
- [107] 马胜利:《饶勒斯和中国》, 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期, 1982年人民出版社版。
- [108] 《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 [109]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 [110] 《辛亥革命回忆录》, 1963年中华书局版。
- [111] 《师复文存》, 1928年广州新书局版。
- [112] 江亢虎:《洪水集》, 1913年上海社会星出版社版。
- [113] 《邓中夏文集》, 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
- [114] 《中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党》,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 [115] 《中国工运史资料》, 1979年第1期(总第9号)工人出版社版。